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5)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五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目 录

第五卷说明	XI XXI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3—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埃蒂耶纳·卡贝的信 ——反对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声明	6—7
卡·马克思。给“黎明报”编辑的信	8—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

六 月

“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声明	13
法兰克福议会	14—18
许泽尔	19—20
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	21—24
民主派	25—27
康普豪森在 5 月 30 日会议上的声明	28—31
生死问题	32—35
康普豪森内阁	36—37
战争的喜剧	38—40
反动派	41
柏林社会安全委员会	42—43

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	44—48
柏林的妥协辩论	49—53
妥协辩论	54—59
奏折问题	60—61
对波兰的重新瓜分	62—63
王朝之盾	64—65
科伦在危急中	66—70
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承认自己有名无实	71
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	72—89
一	72
二	75
三	79
四	85
科伦各党派的情况	90—91
6月15日的妥协会议	92—93
布拉格起义	94—96
瓦德涅尔的被捕。——泽巴尔特	97—99
6月17日的妥协会议	100—105
施图普的修正案	106—109
在波兹南的新政策	110—111
康普豪森内阁的垮台	112—113
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的第一件事迹	114—115
汉泽曼内阁	116—117
“新柏林报”论宪章派	118—119
“盖尔温努斯报”的威胁	120—122

帕托夫赎买法案建议书	123—125
起义的民主性质	126—128
巴黎消息	129
巴黎消息	130
6月23日事件的详情	131—134
巴黎消息	135
“北极星报”论“新莱茵报”	136
6月23日	137—141
6月24日	142—146
6月25日	147—152
六月革命	153—157

七 月

“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	158—166
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	167—176
一	167
二	171
德国的对外政策	177—179
马拉斯特和梯也尔	180—181
妥协辩论	182—188
逮捕	189
逮捕	190—193
妥协辩论	194—201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202—204
柏林的妥协辩论	205—211

办事内阁	212
妥协辩论	213—217
内阁危机	218—219
7月4日的妥协会议(第二篇论文)	220—229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230—234
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	235—238
7月7日的妥协辩论	239—246
福斯特曼先生论国家信用	247—250
妥协辩论	251—257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	258—262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	263—266
斯图加特和海得尔堡俱乐部被封	267—269
普鲁士出版法案	270—273
市民自卫团法案	274—285
一	274
二	278
三	282
“祖国报”论和丹麦的休战	286—288
和丹麦的休战	289—292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	293—298
都灵的“协和报”	299—300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完)	301—306
强制公债法案及其说明	307—317
一	307
二	312

关于区等级会议的妥协辩论(7月 18 日的妥协会议)	318—322
巴登各民主团体的解散	323—324
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	325—331

八 月

“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	332—337
关于瓦德涅尔案件的妥协辩论	338—341
俄国的照会	342—349
汉泽曼内阁和旧普鲁士刑法草案	350—352
“科伦日报”论强制公债	353—354
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	355—359
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	360—366
“模范国家”比利时	367—370
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371—414
一	371
二	381
三	389
四	394
五	402
六	409

九 月

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415—431
七	415
八	419
九	426

德国公民权和普鲁士警察	432—433
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目前失败的原因	434—437
“科伦日报”论意大利	438—441
“阅报室”报论莱茵省	442—444
调停和干涉。拉德茨基和卡芬雅克	445—446
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	447—450
马克思和普鲁士国籍	451—454
和丹麦的休战	455—459
办事内阁的垮台	460—462
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	463—468
危机和反革命	469—478
一	469
二	471
三	474
四	478
柏林的辩论自由	479—481
休战协定的批准	482—484
法兰克福起义	485—489
一	485
二	487
反革命内阁	490—491
科伦的戒严	492
十 月	
“新莱茵报”复刊	493

维也纳革命	494—495
“科伦革命”	496—499
普富尔内阁	500
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证券的全国抵押银行 的演说	501—505
“法兰克福总邮报”和维也纳革命	506—508
普鲁士国王答国民议会代表团	509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答市民自卫团代表团	510—512
“改革报”论六月起义	513—514
英法在意大利的调停	515—517
“模范的立宪国家”	518—520
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	521—526

十一月

“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	527—530
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	531—534
维也纳革命和“科伦日报”	535—536
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最后消息	537—539
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	540—543

弗·恩格斯的遗稿

从巴黎到伯尔尼	549—571
一 塞纳河和罗亚尔河	549—564
二 勃艮第	565—571

附 录

告全体德国工人书	575—576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会议记录	577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578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迫害	579
关于召开莱茵地区各民主团体代表大会的通知	580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迫害	581
1848年8月11日科伦民主协会全体会议记录摘要	582—583
科伦民主协会抗议将波兹南并入德意志联邦	584—585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586
关于1848年8月28日马克思在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上的发言	587
关于1848年8月30日马克思在第一届维也纳工人联合会上 的演说	588
辟谣	589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迫害	590
民众大会和安全委员会	591—594
沃林根民众大会	595—596
科伦民众大会关于法兰克福起义的决议	597
“新莱茵报”负责发行人关于报纸停刊的通知	598
呼吁订阅“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	599
通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命令	600
黑名单	601
马克思就当选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发表的演说(摘自1848年 10月16日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602—603
1848年10月22日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摘要	604

马克思就维也纳事件发表的谈话	605
注释	609—65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652—666
人名索引	667—697
期刊索引	698—701
译后记.....	702

插 图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传单).....	2—3
“新莱茵报”第一号的一页.....	12—13
1848年6月巴黎市区图	142—143
载有卡·马克思“六月革命”一文的“新莱茵报”的一页.....	154—155
卡·马克思的1848—1849年的护照	452—453
弗·恩格斯的“从巴黎到伯尔尼”的手稿第一页	547
弗·恩格斯画的从奥克萨里到洛克尔的路线草图.....	564—565

第五卷说明

第五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收集了他们在 1848 年 3 月至 11 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以前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原理,拟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理,确定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中最重要的原则。

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当前的事件,确定无产阶级在各个革命斗争阶段的策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切都在本版第五、第六卷中反映出来了。

本卷开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具体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在起草“要求”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从革命的基本历史任务出发的,因为德国人民以后的命运要取决于这些任务的解决。“要求”中主要的一条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为了给德国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首先必须消灭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状态(当时德国分成 36 个大大小小的邦),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在“要求”中,同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任务有机地结合着的,还有德国革命中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消灭

封建压迫,废除农民所担负的一切封建义务,消灭反动贵族统治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因此他们在“要求”中还拟定了一系列过渡措施,关于这些措施的性质,“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超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这些措施是:把封建领地变为国家财产并在这些土地上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把矿山、矿井和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国家保证所有工人都有工作做,同时照顾丧失劳动力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的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小农是能够用坚决斗争的办法来实现这些要求的力量。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般原理具体运用于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即运用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情况的第一个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到德国之后所写的发表在1848年6月1日至11月7日的“新莱茵报”上的那些文章构成了本卷的主要内容。这些文章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形,反映了他们在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的策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新莱茵报”是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名义出现的,但是“这个民主派随时随地都显示出它的独特的无产阶级性质”(恩格斯)。报纸的这个方针是由德国革命的历史特点、革命中阶级力量的配置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由于德国经济上的落后,由于德国工人的软弱性和无组织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到祖国之后不能立即着手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二三百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对于广大人民群

众是起不了什么显著作用的。因此,敌视任何宗派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翼。他们加入了科伦民主协会,并建议拥护他们的人也采取这种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同民主派结成联盟绝对不是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错误和幻想放弃批评,相反地,必须以对他们的错误和幻想进行批评为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推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更坚决地行动,竭力把人民群众争取过来。同时,他们要自己的拥护者注意工人协会的组织,注意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注意为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先决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这个旨在动员一切民主力量的策略,来对抗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和反对同民主派结成联盟的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斥责波尔恩的机会主义策略,因为他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和工会的利益,并使无产阶级脱离摆在德国人民面前的总的政治任务。

打着民主主义旗帜的“新莱茵报”代表德国人民中一切进步力量的利益,首先是代表最坚决和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战士(即工人阶级)的利益。由马克思领导的“新莱茵报”编辑部是无产阶级真正的战斗司令部。

“新莱茵报”评论了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一切最迫切的问题,极其巧妙地用政治上的揭发来与封建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在人民群众中起了教育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这个报纸所以在人民群众中有巨大的影响并且很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的出色的政论性质:它所刊载的文章具有热烈的战斗精神,笔调精辟入微,讽刺敌人尖锐有力。在无产阶级报纸的历史上,“新莱茵报”理应占一个光荣的地位。

“新莱茵报”对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态度特别清楚地表现了它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德国,而且几乎在整个欧洲,“新莱茵报”是一开始就坚决站在起义者方面的唯一报纸。关于六月起义,恩格斯写了一系列文章和短评,其中有“6月23日事件的详情”,“6月23日”,“6月24日”,“6月25日”,“‘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马克思也写了一篇非常有力的文章“六月革命”。在战斗的日子里以及在战斗刚结束后所写的这些文章洋溢着斗争的热情,同时对六月起义的原因和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分析。

关于六月起义的文章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恩格斯在阐述六月起义的军事问题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街垒斗争的性质、意义和方法的重要结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武装起义的原理。在“六月革命”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六月起义同过去一切革命有着原则上的区别: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劳动反对资本的战斗,是无产阶级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的独立发动。就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作出了一个理论上的重要结论,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对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是能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的国家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为解决德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即为实现国家的民族统一而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在“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阅报室’报论莱茵省”和其他一些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把德国统一在普鲁士或奥地利的霸权之下的资产阶级计划,同时也反对想建立一个象瑞士那样的联邦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方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文章

中论证 :只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统一和真正民主的国家 ,才能彻底消灭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状态以及国内的一切封建渣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主张“从下面”来统一德国 ,也就是要由人民群众对德意志联邦各邦 ,首先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腐朽的专制制度实行猛烈的革命冲击。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 :德国的统一是全欧洲的问题 ;只有欧洲的革命力量起来向英国的反革命统治阶级以及沙皇俄国这个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进行斗争 ,德国才能达到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对沙皇俄国进行革命战争不仅是保卫革命的手段 ,而且也是使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 1848 年德国三月革命的直接后果时 ,指出这次革命的性质是不彻底的 ,因为人民没有能彻底战胜封建制度 ,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整个官僚机关和警察机关仍然不可侵犯 ,而人民群众则赤手空拳地面临武装的反革命的威胁(见“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斯图加特和海得尔堡俱乐部被封”等文章)。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德国革命的这种性质是由获得政权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所决定的 ,这个资产阶级 ,如马克思后来所说 ,“宁可和奴隶制妥协也不愿意看到一点为自由而斗争的前景”。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德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吓坏了德国的资产阶级 ,他们背叛了人民的利益 ,和封建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在几篇阐述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以及分析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内阁的政策的文章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激烈地反对“妥协论” ,这个“妥协论”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提出的 ,目的是要证明他们和封建君主势力妥协是正当的。为了与这种贩卖性的理论相对抗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坚持人民政权和

革命人民的主权的思想(“法兰克福议会”、“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等文章)。他们认为人民的革命专政是胜利完成革命的必要条件(“危机和反革命”一文)。弗·伊·列宁分析了这些非常重要的原理,指出在这些原理中含有革命民主专政的概念。

在一系列论述全德国民议会的活动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的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这些代议机关,指责它们不是把实际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去消灭反动的德国政府和取缔大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而只是进行毫无结果的辩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德国建立真正的人民代议机关而斗争,这些机关应当是人民意志的忠实表达者,应当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都要依靠人民的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他们的文章中着重指出,人民选出的议员必须向人民报告自己的活动和实现人民的意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革命的人民有权对议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采取有效的革命措施(“柏林的辩论自由”等文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德国革命最初几个月的经验得出结论说,人民革命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更换一切旧的行政、军事和司法机关,彻底清洗一切国家机构(“7月4日的妥协会议”等文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主权的最重要的保证就是把人民武装起来。在“6月15日的妥协会议”、“6月17日的妥协会议”、“市民自卫团法案”等一系列文章中,他们维护了人民的武装的权利。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柏林人民群众在1848年6月袭击军械库以夺取武器的尝试。“新莱茵报”在指出这次发动是半途而废的革命时,斥责了不敢公开站在人民方面的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议员的

胆怯行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回击反革命势力的必要条件,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因素,因此,他们维护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起义者,这些起义者在1848年9月起来反对法兰克福议会批准与丹麦签订的可耻的休战协定。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一再着重指出,过早的和没有准备的起义只会使革命力量受到摧残,并且使反革命势力更加猖獗。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号召科伦工人不要理睬普鲁士政府的挑衅,而要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备决战(“科伦在危急中”和“科伦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在科伦的战友们进行了艰巨的解释工作,才使莱茵省的民主力量在九月的日子里没有受到摧残。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扩大和巩固民主阵线的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反对德国的封建残余的革命斗争。本卷中载有一系列关于土地问题和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关系的文章(如“帕托夫赎买法案建议书”、“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等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农民起来为立即彻底地和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而斗争,他们揭露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这个资产阶级背叛了农民,即背叛了“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见本卷第33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普鲁士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要求抱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它力图与反革命势力妥协,它害怕废除封建所有制会使资产阶级所有制遭到侵害。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代表,热烈支持农民的革命的反对封建运动,认为他们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动力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他们欢呼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认为他们是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反动势力和反对欧洲其他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的同盟者。

在“德国的对外政策”、“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民族间的真正自由和友爱的思想,同时严厉地斥责德国资产阶级继续实行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压迫其他民族的旧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是为德国的过去赎罪的方法,而且是保证德国人民将来成为自由民主的民族的必要条件。“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见本卷第 178 页)。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坚决地、不调和地为波兰的独立而斗争,他们认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对波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收入本卷的弗·恩格斯的“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等文章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的政策,因为普鲁士政府挑起了波兹南的民族解放起义,然后又加以镇压,并且在“改组”的幌子下把波兹南的一大部分土地划归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斥责了批准重新瓜分波兰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资产阶级多数派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热烈支持 1848 年夏天捷克人民的革命斗争。弗·恩格斯在“布拉格起义”和“起义的民主性质”这两篇文章里着重指出了起义具有人民的性质,并且还指出,捷克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所以失败,不仅是由于奥地利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而且还由于把捷克人推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

卡·马克思写给意大利民主报纸“黎明报”编辑部的信以及“新莱茵报”上发表的一些分析意大利革命斗争的文章,对于正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意大利人民表示热烈的同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所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对于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的一切活动都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斗争精神。他们对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的态度,对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的支持,与英国宪章派的团结,都表现出了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斗争精神。“新莱茵报”维护宪章派,反对德国反动报纸对它的攻击(“‘新柏林报’论宪章派”一文),并且表示支持宪章派的革命的机关报“北极星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几篇文章是分析法国革命的进程的。这些文章对于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充满了希望,在这种新的革命高潮中法国无产阶级应当起主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着重指出,欧洲各国的革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他们认为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对于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法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会促进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促进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如恩格斯后来所指出,这表现了他们对于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的估价过高,其实当时欧洲大陆的经济还远没有达到足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本卷的结尾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有关维也纳十月起义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次起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

为它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决定了德国革命的命运,而且也决定了欧洲革命的命运。马克思把巴黎的六月起义称为欧洲悲剧的第一幕,而把维也纳的十月起义称为第二幕(见本卷第542页)。本卷中有一系列文章(“维也纳革命”、“‘法兰克福总邮报’和维也纳革命”、“维也纳革命和‘科伦日报’”、“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最后消息”、“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等文章)是论述维也纳起义的经过和分析它失败的原因的,如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背叛。

在“弗·恩格斯的遗稿”这部分中发表了旅途随笔“从巴黎到伯尔尼”。在这篇随笔中恩格斯以鲜明和生动的笔调叙述了他游历法国的印象。随笔中有一大部分是描写法国的农民和他们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恩格斯在指出法国农民对1848年革命持否定态度而同情路易·波拿巴时,说明这种情形是由法国资产阶级造成的,因为它蛊惑性地利用了农民的私有天性,它的税收政策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从而使他们脱离了革命。

载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以及其他的一些著作,为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中的策略,阐明他们还在革命过程中就已根据人民群众在暴风雨般的革命时期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所作出的结论和理论上的概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

在本卷附录中刊载了一系列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和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直接工作的文件。这里也收集了一些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民主协会和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文件,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民众大会和民众会议的新闻报道,这些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者

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附录中还收集了一些有关法院和警察局通缉“新莱茵报”编辑的材料；这些材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在政府的迫害和“善意的”报刊的诽谤下仍然勇敢地捍卫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报。

* * *

要确定登载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是出于卡·马克思的手笔还是出于弗·恩格斯的手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文章下面没有署名，作者本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有限，而且也找不到原稿。产生这种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文章看来好象是两位作者一起写的，这一点可以由恩格斯在1885年5月写给施留特尔的信得到证实，信上这样说：“一般说来，马克思当时写的文章和我所写的几乎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之间是有计划地分工的”。

在不能确定某一篇文章究竟是出于马克思的手笔还是出于恩格斯的手笔的情况下，在文章的末尾就不注明作者是谁。

本卷中收集了第一版中所没有发表的39篇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文章。其中几篇曾经用俄文在苏联杂志上和其他刊物上发表过。其余的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在文章后面的编辑说明中注明了。刊载在附录中的文件也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48年3月—11月

Forder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

„Wann werden wir das tun?“

1. Die Kommunisten sind zu einer einzigen, einheitlichen Partei zu sein.
2. Jeder Deutsche, der 17 Jahre alt ist, hat das Recht, an der Partei teilzunehmen.
3.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und Arbeiterinnen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4.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5.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6.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7.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8.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9.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10.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11.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12.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13.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14.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15.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16.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17.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18.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19.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20.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21. Die Parteiorganisation soll sich auf die Arbeiter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gründen, die sich mit der Arbeiterbewegung verbinden.

Das Comité:

Paul Werra, Karl Geyer, O. Werra, J. Geyer,
J. Werra, B. Werra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传单）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¹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2 凡年满 21 岁的德国人，只要未受过刑事处分，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发给人民代表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

4 武装全体人民。今后，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不再象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于它的给养费用。

此外，这也是组织劳动的一种方法。

6 诉讼免费。

6 无偿地废除一切至今还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义务，如徭役租、代役租和什一税等等。

7 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

8 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

9 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

实行第 6、7、8、9 各条中提出的这些措施,是为了减轻农民和小租佃者所担负的社会义务和其他义务,同时也不致减少抵偿国家开支所需的资金,而且不使生产本身遭受损失。

至于既不是农民,又不是租佃者的土地所有者是不参加任何生产的。因此他们的消费纯粹是挥霍。

10 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所有的私人银行,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法定的比价。

实行这一措施就能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调节信用事业,从而破坏大金融资本家的统治。实行这一措施就能逐渐以纸币代替黄金和白银,使资产阶级流通的必要工具,即一般的交换工具减价,因而就有可能把黄金和白银用到对外贸易上去。最后,为了把保守的资产者的利益和政府的存在联系起来,这个措施也是必要的。

11 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等。它们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无偿地由无产阶级支配。

12 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有家眷的官员,即需求较大的人的薪金可以比别人高一些。

13 彻底实行政教分离。各教派牧师的薪金一律由各个自愿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支付。

14 限制继承权。

15 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

16 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

后来在科伦印发的传单上用的不是“和政府的存在联系起来”,而是“和革命联系起来”。——编者注

17 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些措施,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并且今后还有可能受少数人压迫的德国千百万人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政权。

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卡尔·沙佩尔,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约·莫尔,威·沃尔弗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48年3月21日—29日之间
1848年3月30日左右在巴黎印成传单
:并载于下列各报:1848年4月5日
“柏林阅报室”第82号的号外;1848年4
月6日“曼海姆晚报”第96号;1848年4
月6日“特利尔日报”第97号的附页和
1848年4月9日“德意志总汇报”第100
号的附刊,而在1848年9月10日之前
在科伦又印成传单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阅报室”,
并照科伦的传单原文校对过

给埃蒂耶纳·卡贝的信—— 反对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声明²

卡贝先生！

我们请求您把随函寄上的声明发表在最近一号“人民报”上。声明所谈的问题是：共产党对于已经在一部分德国人中间煽起了旧的反动民族成见去反对法国人民的那种事情和做法不负任何责任。德国工人联合会，即欧洲各国各种工人协会的联合会（英国宪章派的领袖哈尼和琼斯两位先生也是这个联合会的成员）是完全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并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所谓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实质上是反共产主义的，因为它声明自己不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因此，这里所谈的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发表意见，发表声明，正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劳驾阁下帮忙。（这封便函不必公开发表） 致以
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下面署名的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德国工人联合会在欧洲各国的各个支部声明：它同向法国公民要服装、金钱和武器的那些行动、声明和宣言毫无关系。在巴黎，德国工人俱乐部是和联合会保持联系的唯一组织，它同自称为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并由海

尔维格先生和冯·伯恩施太德先生领导的那个协会毫无共同之处。

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签名：卡·马克思，卡·沙佩尔，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约·莫尔，威·沃尔弗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写于 1848 年 3 月底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给“黎明报”编辑的信³

亲爱的先生！

由卡尔·马克思主编的一种新的日报“新莱茵报”，从6月1日起将在科伦城开始出版。这个报纸将在我们北方为“黎明报”在意大利所提出的那些民主原则而斗争。由此可见，我们对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争执的问题将抱什么态度是用不着怀疑的。我们要捍卫意大利争取独立的事业，要和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在德国和波兰的专制统治作誓死的斗争。我们向意大利人民伸出兄弟之手，并且要向他们证明，德国人民绝不会参与那些在我国也经常反对自由的人们对你们所实行的压迫。我们要竭力使两国的伟大和自由的人民能够结成联盟并和睦相处；由于丑恶的政治制度，这两国人民至今还互抱敌意。因此，我们要求粗暴的奥地利丘八立刻撤出意大利，使意大利人民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独立意志来选择他们所需要的政体。

为了让我们能够注视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而你们能够评判我们是否忠实于自己的诺言，我们建议互相交换报纸；这样，我们就可以按期每天把“新莱茵报”寄给你们，而你们把“黎明报”寄给我们。我们殷切期望你们能同意这个建议，并且希望你们能尽速开始把“黎明报”寄给我们，以便在我们最初的几号报纸上就能够利用它的材料。

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们也寄一些其他的报道来。我们保证,在我们这方面,对于凡是有益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事业的东西,我们都予以最大的注意。致以
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新莱茵报”编辑部

编辑 卡尔·马克思博士

写于 1848 年 5 月底

原文是意大利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29 日

俄文译自“黎明报”

“黎明报”第 258 号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

1848年6月1日—11月7日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N. 1.

Wohn, Düsseldorf, 1. Juni.

1848.

Di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erscheint von 1. Juni an täglich.
Der Abonnementspreis beträgt für das Quartier 1 Thaler 10 Sgr., für das halbe Jahr 2 Thaler 10 Sgr., für ein Jahr 4 Thaler 10 Sgr. Einmalige Beiträge sind nach dem Tarif zu zahlen. Die Redaktion ist in Düsseldorf, in der Straße, welche die alte Rheinbrücke überbrückt, bei No. 12. Die Expedition ist in Bonn, in der Straße, welche die alte Rheinbrücke überbrückt, bei No. 12. Die Expedition ist in Bonn, in der Straße, welche die alte Rheinbrücke überbrückt, bei No. 12.

Der **Verleger**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 ist Herr **Joseph Weyers**, in Düsseldorf, in der Straße, welche die alte Rheinbrücke überbrückt, bei No. 12.

Redaktions-Comité:
Herr **Max Scheler** in **Chef**,
Herr **Weyers**,
Herr **Weyers**,
Herr **Weyers**,
Herr **Weyers**,
Herr **Weyers**.

Redaktion
Di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ist ein Organ der Demokratie. Sie vertritt die Interessen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und fordert die Einführung der allgemeinen Wahlen, die Abschaffung der Feudalrechte und die Einführung der Demokratie.

Verleger
Herr **Joseph Weyers**, in Düsseldorf, in der Straße, welche die alte Rheinbrücke überbrückt, bei No. 12.

Druckerei
Di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wird gedruckt in der Druckerei von Herrn **Weyers**, in Düsseldorf, in der Straße, welche die alte Rheinbrücke überbrückt, bei No. 12.

Verleger
Herr **Joseph Weyers**, in Düsseldorf, in der Straße, welche die alte Rheinbrücke überbrückt, bei No. 12.

Druckerei
Di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wird gedruckt in der Druckerei von Herrn **Weyers**, in Düsseldorf, in der Straße, welche die alte Rheinbrücke überbrückt, bei No. 12.

Redaktion
Di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ist ein Organ der Demokratie. Sie vertritt die Interessen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und fordert die Einführung der allgemeinen Wahlen, die Abschaffung der Feudalrechte und die Einführung der Demokratie.

Redaktion
Di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ist ein Organ der Demokratie. Sie vertritt die Interessen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und fordert die Einführung der allgemeinen Wahlen, die Abschaffung der Feudalrechte und die Einführung der Demokratie.

Redaktion
Di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ist ein Organ der Demokratie. Sie vertritt die Interessen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und fordert die Einführung der allgemeinen Wahlen, die Abschaffung der Feudalrechte und die Einführung der Demokratie.

Redaktion
Di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ist ein Organ der Demokratie. Sie vertritt die Interessen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und fordert die Einführung der allgemeinen Wahlen, die Abschaffung der Feudalrechte und die Einführung der Demokratie.

“新莱茵报”第一号的一页

“新莱茵报”⁴编辑部的声明

“新莱茵报”原定于7月1日出版。和通讯员们商定的也正是这个日期。

但是,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九月法令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起就开始出报。我们和各界有广泛的联系,本来可以使报道和各种通讯内容丰富,但是由于提前出报,如果在初期还无法做到,尚请读者鉴谅。我们在最近一定能满足读者在这方面的一切要求。

编辑委员会：

总编辑 卡尔·马克思

编 辑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恩斯特·德朗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
特,斐迪南·沃尔弗,威廉·沃尔弗

写于1848年5月31日
载于1848年6月1日
“新莱茵报”第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1835年9月颁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现金税,禁止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对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实行监禁和课以大量罚款。这里是指德国很快就要颁布类似的法令。——译者注

法兰克福议会

科伦 5 月 31 日。由全体德国人民选举的制宪国民议会在德国已经存在两个星期了。

德国人民几乎已经在国内所有大小城市的街道上 ,尤其是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街垒中 ,夺得了自己的主权。而且已经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行使了这个主权。

国民议会的第一个行动必须是 ,大声而公开地宣布德国人民的这个主权。

它的第二个行动必须是 ,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德国的宪法 ,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

国民议会在开会期间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便粉碎反动派的一切偷袭 ,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 ,保护革命所夺得的人民主权不受任何侵犯。

德国国民议会现在已经开过 12 次会了 ,然而却一事无成。

但是它用以下的伟大事迹保证了德国的安全 :

国民议会认为它需要会议规则 ,因为它知道 ,只要有两三个德国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就需要有一套规则 ,否则就会摔桌甩凳。有个学究已经预见到这种情况 ,他为最高会议草拟了一个特殊的会议规则草案。有人提议暂且通过这个学究气的草案 ,这个草案大多数议员连看也没有看过 ,但是议会根本没有讨论就通过了。因为如

果没有会议规则,德国的代表们将成为什么样子呢? *Fiat reglementum partout et toujours!* [会议规则随时随地万岁!]

科伦的拉沃先生对于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的利益在个别场合下发生冲突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⁵,但是议会却讨论最终的会议规则。虽然拉沃的建议很迫切,然而会议规则毕竟是更加迫切的。 *Pereat mundus, fiat reglementum!* [让全世界毁灭吧,会议规则万岁!]但是,聪明透顶的庸俗的议员们并不拒绝给拉沃的建议提些意见,于是当还在议论应当先讨论会议规则还是先讨论拉沃的建议这个问题时,对这个建议就已陆续提出了近两打的修正意见。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讨论、辩论、喧嚣、磨洋工,并把表决从5月19日拖延到22日。22日恢复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纷纷提出了新的修正意见,一再回避主题,于是在冗长的演说和无数的争吵之后,决定把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问题退回到各个单位去。这样一来,时间悠然地过去了,而议员先生们就吃饭去了。

5月23日,先是为记录问题争吵起来,然后又听取无数的建议,而当美因兹的齐茨提出了关于普鲁士军阀的粗暴行为和美因兹的普鲁士司令官专横暴虐滥用职权的问题时,又想马上转到议事日程上去,即转到特别受人喜爱的会议规则上去。这里曾提出了反动派公然猖狂进攻的问题,也就是提出了议会绝对有权干涉的事件。应当追究胆敢当着国民议会的面威胁要轰炸美因兹的无耻暴兵的责任;必须保护被解除了武装的美因兹市民,使他们能安居乐业,使他们不受强行驻扎在他们那里和受人唆使来反对他们

的暴兵的迫害。但是巴登的空谈家巴塞爾曼先生却宣布这些都是鸡毛蒜皮；让美因兹听天由命去吧，重要的是整体的利益，这里是国民议会在开会，在为全德国的利益而讨论会议规则；实在说，轰炸美因兹怎么能和这相提并论呢？*Pereat Moguntia, fiat reglementum!*〔让美因兹毁灭吧，会议规则万岁！〕但是议会又于心不忍，于是选出一个委员会到美因兹去调查这件事情。这时休会和吃饭的时间恰好到了。

5月24日我们完全失去了议会讨论的线索。会议规则大概已经准备就绪，或者被丢在一边了；不管怎样，我们再没有听到关于会议规则的任何消息。但是善意的建议层出不穷，自主的人民的许多代表在这些建议中表现出顺民的驯服⁶的顽强性。然后接踵而来的是建议、请愿书、抗议书等等，最后，民族污水的洪流在无数东拉西扯的发言中排泄出来。尽管如此，不能不指出，当时还选出了4个委员会。

最后，施略费尔要求发言。埃塞伦、佩尔茨和勒文施坦等3个德国公民接到了在当天下午4点钟以前离开法兰克福的命令。聪明透顶的警察局硬说上述几个人在工人联合会中的发言引起了公民们的不满，因此应当驱逐出境。在预备国会⁷宣布了德国公民的权利之后，在17个“受托人”（*hommes de confiance de la diète*）⁸起草的宪法草案承认了公民的权利之后，警察局竟敢作出这样的事情！情况刻不容缓。施略费尔先生要求就这个问题发言，但是遭到拒绝；他要作紧急发言，根据会议规则，他有权提出这个要求，而这一次得到的回答是：*fiat politia, pereat reglementum!*

俏皮话：Hassermann——德国姓，《Wassermann》——“空谈家”。——编者注

〔警察局万岁，让会议规则灭亡！〕显而易见，为什么回家吃饭的时间又到了。

5月25日，在潮水般的建议的冲击下，议员们的聪明的头又垂了下来，象成熟的麦穗受到倾盆大雨的打击一样。两个议员又想提出驱逐问题，但是不许他们发言，甚至不许他们作紧急发言。一些请愿书，特别是波兰人的一个请愿书，比议员们所有的建议都重要得多。后来，被派到美因兹去的委员会终于获得了发言权。它通知说，要到第二天才能提出关于调查结果的报告。果然不出所料，它来得太晚了。8 000把普鲁士刺刀已经解除了1 200个市民自卫军的武装，恢复了秩序。现在只好转到议事日程上去。他们也正是那样作了——立刻转到议事日程上去，即转而讨论拉沃的建议。因为在法兰克福对这个建议的讨论还没有结束，而在柏林由于奥尔斯瓦特的声明，这个建议早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国民议会决定把这个问题延至明天讨论，现在大家去吃饭。

5月26日又提出了无数的建议，接着，美因兹委员会提出了最后的极不坚决的报告。报告人是过去的“人民活动家，和 Pro tempore〔现在的〕大臣海尔根汗先生。他提了一个非常缓和的决议案，但是国民议会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竟认为这个胆怯的建议太尖锐了；国民议会决定让美因兹市民去接受许泽尔指挥下的普鲁士人的恩典，并且“希望当局能执行自己的职责”，于是议会就转到议事日程上去！这个议事日程正好又是议员先生们去吃饭。

5月27日，在对记录问题作了长久的初步讨论后，终于讨论拉沃的建议了。东拉西扯到两点半钟，然后吃饭去了；但是这一次在晚上也举行会议，所以这件事情总算结束了。由于国民议会过于迟缓，奥尔斯瓦特已经使拉沃的建议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拉沃先生

便同意了威纳尔先生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对于解决人民主权的问题采取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

我们没有关于国民议会以后开会情况的消息,但是我们完全有根据认为,国民议会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就休会吃饭去了。议员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早就去吃饭,应当感谢罗伯特·勃鲁姆的一个意见,他说:先生们,如果你们今天决定转到议事日程上去,这个议会的整个议事日程就很可能用极特殊的方法来缩短!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5 月 3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1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 号

许泽尔

科伦 5 月 31 日。美因兹的许泽尔先生借助于古代的农奴服役章程和德意志联邦的陈旧法律发明了一种使普鲁士人及其他德国人遭受甚至在 1815 年 5 月 22 日⁹ 以前也没有受过的奴役的新方法。我们建议许泽尔先生索取他那新发明的专利权,因为这个新发明无疑能给他带来大笔收入。这个新方法是:放两个或好几个喝醉酒的士兵到大街上去,他们自然会和市民吵架。当局便进行干涉并逮捕士兵;这就足以使任何一个要塞司令宣布城市戒严,没收全部武器,让居民去受肆无忌惮的丘八蹂躏。这个方法在德国特别有效,因为这里的要塞多半用于反对内部敌人,而不是反对外部敌人。这个方法之所以特别有效,是因为任何一个由人民供养的要塞司令,不管是许泽尔,或者是罗特·冯·施莱根施坦之流的封建人物,都可以做出国王或皇帝所不敢做的事情:他可以取消出版自由,可以禁止非普鲁士人的美因兹居民对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国家制度表示反感。

许泽尔先生的计谋只不过是柏林反动派的巨大计划的一部分。柏林反动派企图尽速解除全部市民自卫军的武装,特别是莱茵省市民自卫军的武装,逐渐地彻底地消灭刚刚开始形成的人民武装,并把我们的赤手空拳地交给多半由德国其他部分的居民组成的军队去摆布,这些居民很容易受人唆使或者已经受人唆使来反对

我们。

在亚琛、特利尔、曼海姆和美因兹都发生了这种事情，在其他地方也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写于 1848 年 5 月 31 日

载于 1848 年 6 月 1 日

“新莱茵报”第 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¹⁰

波旁王朝还没有走完它那光荣的生活道路。可是，最近它的白旗上却布满了污点，雕谢的百合花无精打采地垂下了脑袋。查理·路易·波旁出卖了一个公国，并被迫可耻地从另一个公国逃跑；斐迪南·波旁失去了西西里岛，而在那不勒斯，革命迫使他同意实行宪法。路易·菲力浦虽然是个隐蔽的波旁，但是总算走过了法国波旁王朝所有后裔的传统道路，越过海峡到英国去了。而那不勒斯的波旁则为自己王朝的荣誉出色地报了仇。

议院在那不勒斯举行会议。有人想利用议院开幕那一天来进行坚决的反革命斗争。暗地里把臭名昭彰的德尔·卡烈托的警察局的一个警官康坡巴索从马尔他岛召了来。于是，经过长期休息之后，无数武装巡警在他们旧上司的领导下又在托列多大街上耀武扬威；他们解除市民的武装，脱下他们的大礼服，强迫他们刮胡子。议院开幕的日子——5月14日快要到了。国王要求议院必须宣誓对他恩赐的宪法不作任何修改。议院拒绝了这个要求。国民自卫军声明它站在议员方面。双方进行谈判，国王让步，各部大臣辞职。议员要求国王下诏宣布他所做的让步。国王答应第二天公布这个诏书。但是当天夜里，所有驻在附近的军队都向那不勒斯开动。国民自卫军相信它被出卖了；它构筑起了街垒，由五六千人守卫着。但是和他们对抗的有两万名士兵（这些士兵一部分是那不勒斯人，

一部分是瑞士人), 并且还有 18 门大炮。介乎双方之间的是两万那个那不勒斯流浪汉, 他们暂时还没有加入斗争。

15 日早晨, 瑞士人还声明他们不反对人民。但是混在人群中的一个瑞士奸细在托勒多街上向士兵们射击; 圣艾里莫要塞立即升起了红旗, 这个信号发出后, 士兵便猛烈攻击街垒。可怕的屠杀开始了; 国民自卫军虽然遭到了士兵的大炮轰击, 但仍然英勇自御, 反击超过自己 3 倍的敌人。战斗从早晨 10 点钟延续到半夜; 如果不是法国海军上将勃丹的卑鄙行动使流浪汉转到保皇党方面去, 虽然暴兵占有优势, 人民还是会取得胜利的。

海军上将勃丹率领着相当强大的法国舰队守卫在那不勒斯。只要及时而简单地用炮轰威胁一下皇宫和要塞, 就会迫使斐迪南让步。但是路易-菲利浦的老奴仆勃丹已经习惯于在 *entente cordiale* (亲切协商) 时期对法国舰队的容忍态度, 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因而驱使已经倾向于人民的流浪汉投到军队方面去了。

那不勒斯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这一步骤预决了革命的失败。瑞士的近卫军、那不勒斯的常备军和流浪汉合力向保卫街垒的战士冲去。被霰弹肃清了的托勒多大街上的宫殿被士兵的大炮弹摧毁了。狂暴的战胜者匪帮冲入住宅, 杀戮男人, 刺死儿童, 强奸和杀害妇女, 抢光所有的东西, 然后把被抢劫一空的住宅付之一炬。流浪汉贪得无厌, 瑞士人残酷无情。人数多出 3 倍、装备精良的波旁王朝的雇用兵以及素来以同情圣仰派¹¹著称的流浪汉, 在战胜了几乎被消灭的那不勒斯国民自卫军以后所干出的那种卑鄙野蛮的行为, 简直是难以形容的。

最后, 甚至海军上将勃丹也觉得这未免太过分了。难民在他的军舰上相继出现, 他们叙述了城里发生的事情。他的水兵们的法国

的血沸腾了。只是现在,当国王的胜利已预决了的时候,勃丹才想到实行炮击。流血渐渐停止了;大街上不再杀人了,只是还有抢劫和暴行发生;可是,不经过法庭审讯就把俘虏带到要塞去枪毙了。半夜以前一切都已结束,斐迪南的专制政权实际上恢复了,波旁王朝的荣誉受到了意大利鲜血的洗涤。

这就是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象往常一样,正是瑞士人用自己的武器解决了这场有利于波旁王朝而反对人民的斗争。在1792年8月10日,在1830年7月29日,在1820年那不勒斯的各次战斗¹²中,我们到处都看到特里和维凯里得¹³的子孙在扮演波旁王朝的雇佣兵和奴仆的角色,这个王朝的名字在整个欧洲早已成了君主制度的代名词。自然,这种情况现在很快就会结束。各个较先进的州经过长久的争论后做到了禁止签订军事条约¹⁴;自由老瑞士的健儿再也不能蹂躏那不勒斯的妇女了,再也不能在发生起义的城市中大肆抢劫了;在他们失败的时候,人们再也不会象对8月10日死亡的将士那样,用托尔瓦德森的狮子来使他们永垂不朽了¹⁵。

但是,波旁王朝暂时又可以轻松地叹了一口气了。从2月24日¹⁶起抬头的反动势力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象在那不勒斯那样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今年的第一次革命正好是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开始的。但是,专制制度的阴谋和国家政变是阻止不了猛烈冲击旧欧洲的革命怒潮的。斐迪南·波旁用5月15日的反革命政变为意大利共和国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卡拉布里亚已被炮火所笼罩,巴勒摩已成立了临时政府;亚普露茨很快也会奋起,所有遭到经济破坏的省份的居民将进攻那不勒斯,并和这个城市的人民一起去向叛徒国王和他的残酷的雇佣兵报仇。而当斐迪南死的时候,起码

有一点会使他心满意足，那就是他的生和死都象一个名符其实的波旁。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5 月 31 日

载于 1848 年 6 月 1 日

“新莱茵报”第 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民主派¹⁷

科伦 6 月 1 日。平常向代表社会舆论的任何新机关报提出的要求是：对于它在原则上同意的党派采取热烈支持的态度，无条件地相信这个党派的力量，时刻准备用实际力量来维护它的原则或者用原则的光辉来掩盖实际的软弱无力。我们将不以这个要求为满足。我们将不用虚伪的幻想去粉饰所遭到的失败。

民主派遭到了失败。它在自己胜利的时候所宣布的原则成了问题，它真正夺得的基地又逐渐被夺回去了，它已经丧失了很多东西，很快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它究竟还剩下些什么。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让民主派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对党派感到兴趣，为什么我们不去考虑民主运动的目的、人民的福利和所有的人的幸福呢？

这是斗争的法则和惯例。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经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

我们要求民主派认清自己的地位。这个要求是从最近几个月的经验中得出的。民主派过分陶醉于最初的胜利。在狂欢之后，它终于大声而公开地说出了自己的原则，它以为只要把这些原则一宣布，就有把握立刻加以实现。除了在大第一次胜利后宣布原则和紧接着胜利作了一些让步以外，它什么也没有干。但是，当它慷慨激

昂地叙述自己的观点并把任何一个不敢立刻反驳它的人作为兄弟来欢迎的时候,那些继承有权力或者受托行使权力的人们行动起来了。他们的活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对于他们的那些仅仅是为了反对已被革命所推翻的制度而提出的原则闭口不谈,他们仿佛是为了重新建立法制和建立表面秩序的利益而小心谨慎地制止住了运动;他们向旧制度的朋友们作了一些虚假的让步,以便在实现自己的计划时能更可靠地依靠他们,后来他们基本上逐渐实现了自己的政治制度。这样一来,他们得以在民主派和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之间占一个中间位置,一方面进攻,另一方面又强行后退,在同一时间内,对专制制度来说是进步的,对民主制度来说是反动的。

这就是谨小慎微和中庸之道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狡猾地欺骗了一开始就陶醉于胜利的人民政党。在人们轻视地把人民政党推到一旁,把它的拥护者宣布为暴乱分子,并且把一切最坏的意图加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它还在梦中;当它还没有认识到,它除了资产者先生们认为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容的那种东西以外一无所得的时候,它已经被人欺骗了。被反民主的选举法弄得自相矛盾的人民政党,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现在反对它的有两个代议机关,而且很难说,其中哪一个更坚决地反对它的要求。结果,它的热情自然象烟一样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醒的意识,即意识到强大的反动派已取得了政权,而且奇怪的是在一般还没有采取任何有利于革命的行动以前就取得了政权。

虽然如此,但是如果民主派在遭到初次失败后(这些失败一部分是由于它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便灰心失望,并回到倒霉的、可惜是德国人所特有的唯心主义那里去,结果把不能马上实现的原则

延搁到遥远的将来,而目前则把它交给“思想家们”去作无害的研究,那就非常危险了。

我们要公开警告这些虚伪的朋友们,他们虽然声明自己同意原则,但是却怀疑它们能够实现,理由据说是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这些原则的地步,而他们甚至也不想去促进世界的成熟,相反地,却宁愿在这个尘世上和一切坏人坏事一起鬼混。假如宫廷顾问盖尔温努斯非常害怕这些隐蔽的共和主义者,那末我们衷心同意他的看法:这是些危险的人。

写于 1848 年 6 月 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2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 号

康普豪森在 5 月 30 日 会议上的声明

科伦 6 月 2 日。Post et non propter [在这个之后,而不是由于这个],这就是说,康普豪森先生不是由于三月革命,而是在三月革命以后当了首相的。康普豪森先生(用郑重而夸大的口吻,并且为了掩盖自己的心慌意乱,表面上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¹⁸) 在 1848 年 5 月 30 日把自己内阁的这种革命后的(nachträglich)性质通知了根据他和间接复选人的协议召开的柏林议会¹⁹。

考察历史的朋友²⁰说:“3 月 29 日成立的内阁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很快就组成的,它过去和现在都不否认这一事件的意义。”

康普豪森先生声明说,他在 3 月 29 日以前并没有组阁,这可以在普鲁士“国家报”²¹近几个月的合订本中得到证实。那个至少可以作为康普豪森的升天节的编年起点的日期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康普豪森先生)。在街垒战中牺牲的战士们的冰冷尸体成了通向 3 月 29 日内阁的道路上的路标和指南,这对他们是个多大的安慰。Quelle gloire! [多么光荣呵!]

总之,康普豪森内阁是在三月革命后组成的。这个康普豪森内阁承认三月革命的“重大意义”,至少不否认这个意义。革命本身是小事情,但是它的意义却很重大!它的意义就是至少在 post festum [事后]成立了康普豪森内阁。

“这个事件(康普豪森内阁的成立还是三月革命?)是改造我国内部制度的最重要的促进原因之一。”

这就是说,三月革命是成立 3 月 29 日内阁,即成立康普豪森内阁的一个“最重要的促进原因”。或者这应当理解为:普鲁士的三月革命使普鲁士革命化了?不管怎样,可以想见“考察历史的朋友”是会庄重地重复这句话的。

“我们处在后者(即改造我国的内部制度)的前夜,政府也认为我们前面的道路还很长远。”

总而言之,康普豪森内阁认为,在我们面前还有很长远的道路,也就是说,它打算长期存在下去。艺术即革命是短促的,生命即在革命后产生的内阁是长久的。它照例对自己估计过高。或者,康普豪森的话也许应当作别的解释?当然,考察历史的朋友未必能发表这样一种庸俗的声明:处在新历史时代前夜的各族人民正处在前夜,每个时代前面的道路就象未来那样长远。

这就是康普豪森首相的枯燥、严肃、客气、庄重和狡猾的演说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可以归结为下面三点:在三月革命以后成立了康普豪森内阁,康普豪森内阁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康普豪森内阁前面有很长远的道路!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二部分。

康普豪森教诲说:“但是,我们绝没有这样来估计形势,即认为似乎由于这个事件(三月革命)而发生了一个彻底的转变,似乎我们的整个国家制度被推翻了,似乎一切现存的东西都已失去了法律基础,似乎全部制度都应该建立在新的法律基础上。恰恰相反,内阁在一成立的时候就一致认为自己存

在的条件是：不管反对召开联合议会的请愿书怎么说，也要使当时召集的联合议会²²能真正召开起来，以便在现存制度和它所提供的合法道路的基础上实现向新制度的过渡，而不割断新旧之间的联系。人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这条无疑是正确的道路；向联合议会提出了选举法，经它同意后颁布了。后来又试图迫使政府用自己的权力来改变这个法律，即把间接选举法变为直接选举法。政府没有同意这样做。政府没有实行专政，它也不可能实行专政，它不愿意实行专政。选举法实际上正是按照它获得合法批准的那种形式付诸实施的。根据这个选举法选出了复选人，选出了代表。根据这个法律你们有全权在这里同国王协商制定能长期存在的宪法。”

为了理论可以放弃王国！为了王国可以放弃理论！

最初出现了“事件”——革命的羞怯的标志。然后出现了理论，并用欺骗的方法把“事件”化为乌有。

不合法的“事件”把康普豪森先生变成了负责任的首相、变成了人物，这个人物在旧条件下，在过去的制度下没有地位，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用翻斤斗的办法越过了旧的东西，并且顺利地获得了负责任的首相，而负责任的首相更加顺利地获得了理论。负责任的首相一出现，君主专制制度就死亡了，毁灭了。在和君主专制制度一块死亡的东西中，首先有已故的“联合议会”——这个令人作呕的古代幻想和现代欺骗的混合物²³。“联合议会”是“亲切而忠诚的”，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顺从的小骗子”。就象德意志共和国只有越过费奈迭先生的尸体才能庆祝自己的降临一样，负责的内阁只有越过“亲切而忠诚的”联合议会的尸体才能出现。于是负责任的首相竭力想把被遗忘的尸体挖出来，或者把亲切而忠诚的“联合议会”的幽灵召唤来。这个幽灵的确出现了，但是它在空中游荡，东摇西晃，丑态百出，这是由于它脚下已经没有基础的缘故，因为旧的法制和信任的基础已被地震的“事件”吞噬了。魔术师向幽灵启

示说,他把它召唤来是为了给它办理遗产手续并取得作它的合法继承人的权利。对这种谦恭的态度是不能予以过高的估价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强迫死人在死后写遗嘱的事情。受到恭维而兴高采烈的幽灵就象中国的木偶一样,连连点头表示愿意听从魔术师的一切命令,在出门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就消逝不见了。间接选举法就是它死后的遗嘱。

可见,康普豪森先生“在现存制度和它所提供的合法道路的基础上实现向新制度的过渡”时所利用的学理主义的戏法是这样变的:

从“现存制度”的观点来看,从“旧事物”的观点来看,非法的事件把康普豪森先生变成非法的人物、负责任的首相、立宪大臣。立宪大臣非法地把反宪法的、等级制的、亲切而忠诚的“联合议会”变成制宪议会。亲切而忠诚的联合议会非法地伪造间接选举法。间接选举法创立柏林议会,柏林议会创立宪法,而宪法又创立后来的一切永世长存的议会。

鹅下了蛋,蛋也孵出了鹅。但是,人民根据拯救了卡皮托里的鹅的嘎嘎叫声²⁴很快就会知道,他们在革命时期放下的勒达的金蛋被盗走了。甚至米尔德议员看来也不是勒达的儿子,不是发光的卡斯托尔²⁵。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6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3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3 号

生死问题

科伦 6 月 3 日。时间在变化,我们也随着时间在变化。我们的大臣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对这句格言想来是不无感慨的。想当年,他们还以平凡的议员资格坐在议会的课桌后面的时候,他们受尽了政府委员和总管²⁶的气!在倒数第二年级中,即在莱茵省议会中,班主任佐尔姆斯-利希阁下对待他们是多么严厉呵!当把他们升入毕业班,即升入联合议会的时候,才算让他们作了一些讲演术练习。但甚至在这里,他们的学校教员阿道夫·冯·罗霍夫先生还把陛下授给他的板子高举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忍受博德尔施文克的傲慢的言词,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听取博伊恩用半通不通的德语所作的演说,他们还不得不对杜厄斯堡的那种粗暴无礼的行为表示顺民的驯服!

现在一切都变了。3 月 18 日结束了政治中的这种书生气味,联合议会中的学生自己给自己发了毕业证书。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当了大臣,他们非常高兴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必要人物”是多么伟大。

他们把自己想象得那样的“必要”,以致他们一出学堂门就翘起尾巴,目空一切。每一个和他们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点。

他们立刻从暂时恢复旧的教室——联合议会做起。在这里必须完全按照指示的形式举行由官僚制的中学向立宪制的大学过渡

的伟大典礼，隆重地发给普鲁士人民中学毕业证书。

人民在许多委托书和请愿书中声明说，他们对于联合议会连知道也不愿知道。

康普豪森回答说(如制宪议会 5 月 30 日的会议)，召集议会是内阁的生死问题，这样就堵住了人们的嘴。

议会召开了，这是个对世界、对上帝、甚至对自己本身都丧失了信心的、被弄得体无完肤的可怜的议会。人们向它示意说，它的职责最多不过是通过一次新的选举法，但是康普豪森先生要求它的不仅是一纸法律和间接选举，而且还有 2 500 万硬币。各选民组仓皇失措，开始怀疑自己的权限，并且语无伦次地在那里嘟嘟啾啾。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康普豪森先生的内阁决定，如果不给钱，如果拒绝给它“信任投票”，康普豪森先生就要离开这里到科伦去，让普鲁士的君主制度去听凭自己命运的摆布。议会的议员先生们一想到这里就出了一身冷汗，立刻停止了任何反抗，带着辛酸的笑容通过了信任案。不言自明，这 2 500 万只有在空中王国才有行情的硬币是在什么情况下和怎样获得通过的。

宣布实行间接选举。反对这样做的奏摺、请愿书、代表团象暴风雨般涌来。大臣先生们回答说，内阁的存在和间接选举息息相关。此后，所有的人又都鸦雀无声，双方都可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

妥协议会在开会。康普豪森先生想强迫议会通过一个奏摺来作为对御前演说的回答。建议由敦克尔议员提出。展开了讨论。对奏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反对意见。软弱无力的议会的无穷无尽的、

慌乱怅惘的废话使汉泽曼先生厌烦了,因为这些废话同他所喜欢的那种议会是不合拍的。于是他斩钉截铁地声明:这一切都毫无用处,——或者是起草奏摺,那末一切都没有问题;或者是任何奏摺也不起草,那末内阁就提出辞职。但是辩论仍然在继续进行。最后康普豪森先生只得亲自出马,他上台向大家说明,奏摺问题是内阁的生命问题。当这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奥尔斯瓦特先生也起来发言,他郑重地声明(第三次),内阁的命运和奏摺的命运息息相关。在这之后,议会才完全被说服,自然也就通过了奏摺。

这样一来,我们的“负责任的”大臣在两个月内就学会了杜沙特尔先生领导议会的经验和沉着的口吻,而杜沙特尔先生(他的作用当然不容忽视)的这种经验和口吻只是在同倒数第二届法国议会打了多年交道之后才学会的。当左派的冗长演说使杜沙特尔先生厌烦了的时候,他最后也总是声明说:议会辩论结束,它可以投票表示赞成或反对,如果它投票反对,我们就提出辞职。于是胆怯的多数派(对他们来说杜沙特尔先生是世界上“最必要的”人)便向杜沙特尔紧紧靠拢,就象羊群在响雷时紧紧靠拢自己的遭到危险的牧人一样。杜沙特尔先生是个轻率的法国人,他把这个把戏一直玩到使他的同胞讨厌时才停立。康普豪森先生是个善良而稳健的德国人,他知道如何适可而止。

当然,能够象康普豪森先生深信自己的“妥协派”那样深信自己人,那就既省时间,又省论证。只要在讨论每一项问题时提出信任案,就不难堵住反对派的嘴。因此,这个方法对于最果断的大政治家,即对于杜沙特尔和汉泽曼之流的政治家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因为他们非常明了自己需要什么,他们对于任何无目的的空谈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对于喜欢在“大辩论中发表意见,就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问题交换意见”(康普豪森在 5 月 31 日会议上的演说)的辩论英雄们来说,对于坚持原则立场并以哲学家的锐利目光来观察目前事件的实质的人们来说,对于象基佐和康普豪森那样高尚的思想家来说,这种微小的世俗手段是根本不适用的,我们的首相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对这点将深信不疑。让他把这种手段授予自己的杜法特尔-汉泽曼,而自己则留在更高的天体中吧;我们很乐意在那里观察他。

写于 1848 年 6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4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4 号

康普豪森内阁

科伦 6 月 3 日。大家知道,在 1789 年法国国民议会之前有过一个名士会议,这个会议象普鲁士的联合议会一样,是根据等级原则成立起来的。奈克尔大臣在召集国民议会的指令中援引了名士们要求召集三级会议的愿望。这样看来,奈克尔大臣比康普豪森大臣有很大的优点。他不是等待巴士底狱遭到冲击和专制王朝颠覆之后再学究式地把旧的和新的联系在一起,再来勉为其难地幻想法国似乎是在旧国家制度的合法手段帮助下建立了新的制宪议会的。奈克尔还有另外一些优点。他是法国的大臣,而不是洛林和亚尔萨斯的大臣,而康普豪森虽然是普鲁士的大臣,却不是德国的大臣。尽管有这些优点,奈克尔大臣也并没有把革命运动纳入平静的改良轨道。严重的疾病是不能用玫瑰油来医治的。康普豪森先生要想用目的在于确定他的内阁和普鲁士王朝旧制度之间的直接联系的虚假理论来改变运动的性质,是更难办到的。用任何阴谋诡计也绝不能把三月革命和德国革命运动变成一系列饶有趣味的插曲。路易·菲力浦是否因为他是个波旁而被选为法国人的国王?或者他虽然是个波旁,可是仍然被选为国王,在七月革命后不久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热烈的争论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忘记的。这个问题本身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革命已经发生问题,证明了革命的利益并不是掌握政权的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利益。

康普豪森先生的声明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他声明说：他的内阁不是由于三月革命而产生的，而是在三月革命之后产生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6 月 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4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4 号

战争的喜剧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我们德国目前正在对丹麦这个小国进行全民的战争,象这样的战争,这样的以武力和外交双管齐下的惊人手法,实在是史无前例的!拥有600个司令官、总参谋部和军事委员会的旧帝国军队的伟大行动,1792年联盟的司令官之间的互相倾轧,已经仙逝的帝国内廷军事顾问的出尔反尔的命令,——这一切和德意志联邦²⁷的新军队目前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演出的、成为全欧洲的笑柄的战争喜剧比较起来,似乎反而是意义重大、激动人心和带有悲剧性的了。

现在扼要地谈谈这个喜剧的情节。

丹麦人从日德兰出发进攻,使部队在北什列斯维希登陆。普鲁士人和汉诺威人占领伦特斯堡和埃德尔战线。丹麦人是生气勃勃和勇敢的人民,他们不理睬德国人给他们制造的坏名声,迅速地展开进攻,经过一场战斗就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队击退到普鲁士人的阵地上去。而普鲁士人却在袖手旁观。

最后,柏林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德国的联军向丹麦人发动进攻,并借助于优势的兵力在什列斯维希击溃了丹麦人。所以能取得这次胜利,主要是由于波美拉尼亚近卫军象从前在格罗斯-培伦和登内维次²⁸那样灵活地进行了白刃战。什列斯维希又被占领,德国为它的军队的英勇事迹而欢呼。

与此同时,为数不超过 20 艘大军舰的丹麦舰队拦截德国的商船,封锁德国所有的港口,掩护军队向各个岛屿撤退。日德兰因而听凭命运的摆布,而且部分地区已被普鲁士人占领,他们向日德兰索取 200 万塔勒的香料作为赔款。

但是,连一个塔勒的赔款都还没有取得,英国就提出了调停建议,主张退出什列斯维希和宣告该地中立,俄国也发出了威胁性的照会。康普豪森先生立刻落入给他设置的圈套,陶醉于胜利的普鲁士人按照康普豪森的命令从菲耳撤向克尼格绍、哈德尔斯列本、阿彭拉特和弗伦兹堡。一度消声匿迹的丹麦人立刻又出现了;他们日以继夜地追击普鲁士人,使撤退的队伍陷入混乱状态,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登陆,在宋德维特打败了联军第十军,只是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才实行退却。5月30日的战斗又是由白刃战来解决的,但这一次枪托却操在梅克伦堡人的坚强的手掌中。德国的居民和普鲁士人一起逃跑了;整个北什列斯维希遭到洗劫,丹麦的旗帜又飘扬在哈德尔累本和阿彭拉特的上空。显然,普鲁士的各级军人在什列斯维希就象在柏林一样只是盲目地服从命令。

柏林又发出命令:普鲁士人必须再次发动进攻。现在他们又精神抖擞地向北推进。但是这个喜剧还没有结束。我们等着瞧吧,看看这一次普鲁士人又会在哪里接到撤退的命令。

总而言之,这是康普豪森内阁为了自我欣赏和为了德意志民族的荣誉而演出的地道的卡德里尔舞和军事芭蕾舞。

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个剧场的舞台是由燃烧着的什列斯

丹麦称作:康格-奥、哈德尔斯列夫和奥卡罗。——编者注
即宋涅韦德。——编者注

维希村庄的火焰照亮的,而合唱队是由丹麦的“兵痞”和叫喊复仇的志愿兵组成的。

康普豪森内阁用这个事件证明了他在国际舞台上负有代表德国的崇高使命。由于康普豪森内阁的过失而两次被弃置不理和遭受丹麦人侵略的什列斯维希,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来纪念我们“负责的”大臣们的这个初次的外交实验。

我们可以信赖康普豪森内阁的英明和毅力!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6 月 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5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5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反 动 派

科伦 6 月 5 日。愿死者安然升入天堂²⁹。康普豪森先生背弃了革命，反动派竟敢建议妥协议会辱骂革命是暴乱。在 6 月 3 日的会议上有一个议员提议给 3 月 18 日死亡的士兵建立纪念碑。

写于 1848 年 6 月 5 日

载于 1848 年 6 月 6 日

“新莱茵报”第 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柏林社会安全委员会

科伦 6 月 5 日。象 1793 年的巴黎一样，柏林现在有了自己的 Comité de sûreté générale [社会安全委员会]。不同的是：巴黎的委员会是革命的，而柏林的委员会却是反动的。据柏林的消息说：“负责维持治安的各个当局”认为必须“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因此他们成立了一个社会安全委员会，会址设在奥贝尔瓦尔大街。这个新机构的成员如下：(1) 主席——内政部长普特卡默；(2) 卫戍司令及前任市民自卫团总指挥阿朔夫；(3) 警察总监米奴托利；(4) 检察官泰梅；(5) 市长瑙宁和两名市政局委员；(6) 市参议会会长和 3 名参议员；(7) 5 名军官及两个市民自卫团士兵。这个委员会将

“了解一切妨害或可能妨害社会安宁的事件，并将全面地和认真地研究事实。它将不采用过去种种旧的和不适用的手段和方式，它将避免多余的手续，它将和各方商议采取适当的办法并通过各个管理机关来迅速而有效地实行必要的措施。只有采用这种在目前条件下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一致行动的办法，才能作到既迅速、坚决，又有先见之明。特别是负责保卫城市的市民自卫团将有可能在必要时使得在它参加下通过的当局的各项决定产生应有的效力。完全可以相信，这一定会受到全体居民尤其是可敬的(!)手工业者阶层和(!)工人的同情和协助。同任何党派的观点和倾向没有关系的议员已经着手执行自己的艰巨任务，并希望能够主要采用使大家安宁的和平调停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任务。”

这种阿谀奉承、委婉哀求的语调使人预感到,一个反对柏林革命人民的反革命活动的中心已经在这里形成了。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就证实了这一点。首先是普特卡默先生,就是那个在担任警察总监时曾以发布驱逐令闻名的普特卡默先生。完全和在官僚专制制度下一样:无论哪一个重要机关至少都要有一个普特卡默。其次是阿朔夫先生,他由于粗暴的丘八作风和反动的阴谋诡计而引起了市民自卫团的极大憎恨,以致市民自卫团决定要撤换他。他也确实辞职了。其次是米奴托利先生,他在1846年揭露了波兰人的阴谋,因而在波兹南拯救了祖国,不久前当排字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而实行罢工的时候,他又用流放来威胁他们。再其次是已经变得极端反动的两个机关即市政局和市议会的代表,最后还有市民自卫团的军官及其反动头子布莱桑少校。我们希望柏林人民无论如何不要让这个冒牌的、反动的委员会来保护自己。

这个委员会已经开始进行反动活动,要求取消原定昨天(星期日)举行的到二月牺牲者的陵墓去的群众游行,因为这是示威游行,而示威游行总是有害的。

写于1848年6月5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6月6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6号

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 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

科伦 6 月 6 日。昨天 ,我们向我们的读者报道了“激进民主党³⁰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制宪国民议会上所发表的论证性宣言”。在法兰克福新闻栏里 ,今天你们将看到左派的宣言。乍看起来 ,好象这两个宣言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区别 :激进民主党编辑的文笔拙劣 ,左派编辑的文笔练达。但是细看之下 ,就会发现这两个文件有着本质的差别。激进党的宣言要求在“不限资格的选举”的基础上“并采取直接投票的方式”召开国民议会 ,而左派的宣言则要求在“自由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国民议会。自由普选固然没有资格的限制 ,但绝不排斥间接选举。用这种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说法的用意究竟何在呢 ?

我们再一次觉察到 ,和激进党的要求相反 ,左派的要求是非常暧昧、非常含糊的。左派要求“由国民议会在一定期间选出对国民议会负责的中央权力执行机关”。但这种中央权力机关是否应该象激进党的宣言所明确要求的那样从国民议会内部选出 ,这个问题它却没有加以解决。

最后 ,左派的宣言要求立即规定、宣布并保证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 ,防止各邦政府对这些权利的一切可能的侵犯。而激进党的宣言并不以此为满足。它宣布 :

“国民议会现在就应该把全国的一切国家权力统一于自身,并立即行使各种权力和实现它所应确立的各种形式的政治生活,同时也应指导整个国家的内外政策。”

两个宣言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力图“只让国民议会去制定德国宪法”,而不许各邦政府过问此事。两者的共同点还在于:它们“在不损害国民议会所应宣布的人民权利的原则下”,让各邦去选择国家制度,不论是君主立宪制或者是共和制。最后,两个宣言都认为德国应成为联盟国家或联邦国家。

激进党的宣言至少反映了国民议会的革命性质。它要求适当的革命行动。难道制宪国民议会存在这一事实不正好证明了任何宪法都不存在吗?既然任何宪法都不存在,那末任何政府也都是不存在的。既然任何政府都不存在,那末国民议会就应该自己来管理。国民议会活动的第一个表现应该是由8个字组成的法令:“永远解散联邦议会³¹”。

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具有革命积极性的积极的议会。而法兰克福议会却象小学生做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对各邦政府的行动却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那末,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

德国国民议会患着德国特有的病症,何况它还是间接选举的产物。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仅仅是一个理想的中心,这个理想的中心仅仅适合于过去所理想的即想象中的德国的统一。法兰克福也不是一个拥有大量的能捍卫国民议会并推动国民议会前进的革命居民的大城市。大民族

的制宪议会在小城市召开，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德国过去发展的遗产。法国和英国的国民议会处在巴黎和伦敦的火山口上，而德国的国民议会却找到了一块中立的基地可以从容不迫、冷静沉着地考虑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这一点它应该认为很幸运。德国当时的状况总算使国民议会有可能去克服极为不利的生存条件。国民议会本来应该处处以专政的办法反对腐朽政府的反动企图，这样它就能在人民中间取得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任何反动势力都会碰得头破血流。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却眼睁睁地让美因兹遭受暴兵们的肆意蹂躏，让其他地区的德国人成为法兰克福庸人的恶意挑剔的牺牲品。这个会议不是引导德国人民或者接受德国人民的引导，而是废话连篇，使人民感到厌倦。诚然，对国民议会来说，观众是存在的，他们有时还会带着善意的幽默来观赏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国会复活了的幽灵的有趣动作，但是对国民议会来说，人民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议会的生活中找不出人民生活的反映。到现在为止，国民议会连革命运动的回声也够不上，更不用说是革命运动的中央机关了。

即使国民议会能从自己内部选出中央政权，但是以它现有的成员而论，再加上坐失良机，也很难期待这样的临时政府会做出什么令人满意的事情。如果它不建立任何中央政权，那它就等于自动辞职，稍微有一点革命风浪就会彻底瓦解。

左派的纲领也和激进党的纲领一样，其功绩就是认清了这个必然性。两个纲领和海涅一起声明：

“只要我们能深思熟虑，
我们就根本用不着皇帝。”³²

“谁应该当皇帝”这一难于解决的问题,以及那些替选举的皇帝或世袭的皇帝辩护的许许多多充实的论据,迫使国民议会的保守派多数也断然拒绝选举任何皇帝。

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所谓的激进民主党如何能把君主立宪国、小公国和小共和国的联邦,即以共和政府为首的、由如此不同的成分所组成的联盟国家(左派所主张的中央机关正是如此)宣布为德国的最终国家组织。

毫无疑问,国民议会所选出的德国中央政府最初必然会跟事实上还存在的各邦政府同时并存。但中央政府一经产生,就会同各邦政府展开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不是中央政府同德国的统一同归于尽,就是各邦政府同它们的立宪君主或小共和国一起消失。

我们并不提出空想的要求,要 *a priori*(预先)宣布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但是我们要求所谓的激进民主党不要把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出发点同它们的最终目的混淆起来。德国的统一以及德国的宪法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运动来实现,这种运动的决定因素将是国内的冲突或对东方的战争。国家制度的最终确立不能依靠颁布命令的办法,而要在我们即将进行的运动中实现。因此,问题不在于实现这个或那个意见,这种或那种政治思想;问题在于理解发展的进程。国民议会只应该采取一些在最近期间切实可行的步骤。

不管民主党宣言的拟订者如何要我们确信“每个人都乐于摆脱自己的糊涂思想”,但是他把北美联邦国家作为德国宪法的蓝本这种奇怪的思想却是再糊涂不过的了!

北美合众国所占的面积等于整个文明的欧洲,更不必说它的各个州都具有同样的政治结构。只有欧洲联邦才会同合众国相似。

但是,为了使德国和其他国家结成联邦,它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统一的国家。在德国,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斗争就是近代文明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正当一些大的君主国家在西方形成的时候,德国陷入到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义里去了,而正当世界市场为西欧开放的时候,德国又被排挤出世界市场了。这些国家富裕起来了,德国却贫穷下去。这些国家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德国却变成了农民国家。即使俄罗斯不来敲德国的大门,经济关系本身也会迫使德国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即使从纯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德国牢不可破的统一也是摆脱它目前的贫困和创造国家财富的首要条件。在这种分裂为 39 个小邦的领土上,究竟怎样解决现代的社会任务呢?

但是,民主党纲领的拟订者没有必要涉及据说是次要的物质经济关系。他的论证超不出联邦这个概念的范围。联邦就是自由者和平等者的联合。因此,德国应当成为联邦国家。难道德国人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就会违背自由者和平等者的联合这个概念吗?

写于 1848 年 6 月 6 日

载于 1848 年 6 月 7 日

“新莱茵报”第 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柏林的妥协辩论³³

科伦 6 月 6 日。关于妥协等等的辩论正在最愉快的气氛中在柏林进行。提案一个接着一个,为了不致在提交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漫长过程中半途搁浅,大多数提案甚至提出了五六次。一有机会,就有许许多多先决的问题、相关的问题、中间的问题、补充的问题以及主要的问题提出来。在讨论每一个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的时候,总是“立即”和主席、大臣等畅谈起来,在令人疲惫的“大辩论”中,这倒是求之不得的休息。那些通常被速记专家称作“票”的匿名的妥协分子,尤其喜欢在这些畅谈中倾吐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些“票”太为自己的投票权骄傲了,他们有时甚至“同时既投赞成票又投反对票”,6 月 2 日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后来十分不幸,在这幽闲的生活中竟爆发了一场大辩论式的斗争,参与这场斗争的不仅有讲台上的发言,而且还有妥协派的合唱:他们跺脚,喧嚷,争相喊叫,不一而足。自然,这种戏每次都以道貌岸然的右派取得胜利而结束,而且差不多每次都由保守大军提议表决来解决。

在 6 月 2 日的会上,荣克先生就同俄国达成引渡逃亡罪犯的协定一事向外交大臣提出了质问。大家知道,早在 1842 年社会舆论曾迫使撕毁这一协定,但是到 1844 年反动时期又恢复了。谁都知道,俄国政府对于引渡给它的人不是活活打死,就是流放到西伯利亚。谁都知道,引渡刑事犯和流浪者的协定,不过是将政治流亡

者引渡给俄国当局的一种方便的借口罢了。

外交大臣阿尔宁先生作了如下的回答：

“不用说,谁也不会反对引渡逃兵,因为按一般的惯例,友邦之间是经常互相引渡逃兵的。”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大臣看来,俄国和德国是“友邦”,俄国陈兵于布格河和尼门河上,实际上无非是要尽快地使“友好的”德国摆脱革命的威胁。

“而且,引渡罪犯要由法庭作出决定,所以完全可以保证被告在刑事审讯结束以前不会被引渡。”

阿尔宁先生力图使议会相信,好象普鲁士法庭在审理对罪犯们的控告。其实完全相反!俄国的或俄属波兰的司法机关只是把审讯某个流亡者的决定送交普鲁士当局。普鲁士当局只须查明该文件是否确实,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法庭就应作出引渡的决定;“所以完全可以保证”,俄国政府只需示意一下自己的法官,就可以把带着普鲁士镣铐的任何流亡者弄到手里,只要对该流亡者还未提出政治性的控告。

“自己的臣民不应引渡,这是不言而喻的。”

封建的冯·阿尔宁男爵先生,“自己的臣民”早已不能引渡了,因为自从人民敢于占据街垒为自己争取自由以来,在德国已不存在什么“臣民”了。

“自己的臣民”!就是指我们这些选举国民议会,制定国王和皇帝也得遵守的法律的人吗?我们是普鲁士国王陛下的“臣民”吗?

“自己的臣民”要是国民议会还有一点点革命的骄傲(国民议

会所以存在 ,应归功于这种骄傲) ,它就应该同声斥责卑躬屈膝的大臣 ,把他从讲台上和大臣席位上哄走。可是它对这种侮辱的话却置若罔闻 ,毫不表示抗议。

雷费德先生就 Seehandlung [海外贸易公司]³⁴恢复收购羊毛并在票据贴现上优待英国买主而薄待德国买主一事向汉泽曼先生提出了质问。由于总危机而每况愈下的羊毛工业 ,原以为按照今年极低的价格收购羊毛至少能获取一点利润。不料来了一个 Seehandlung ,它的大量收购使得价格暴涨。同时 ,该公司对伦敦的可靠票据的贴现大大地方便了英国买主的收购 ,这一措施也因招徕新的买主而引起价格上涨 ,使外国买主比本国买主获得更多的好处。

Seehandlung 是君主专制政体的遗物 ,曾被君主专制政体用来达到种种目的。20年来该公司把 1820 年的国债法变成了一纸空文 ,而且非常可恶地干预着工商业。

雷费德先生所谈的问题 ,实际上和民主派没有多大关系。这里的问题是 :是羊毛生产者或多或少地得到几千塔勒的利润呢 ,还是羊毛加工者得到几千塔勒的利润。

羊毛生产者几乎全是大地主 ,勃兰登堡、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波兹南的封建主。

羊毛加工者大部分是大资本家 ,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所以 ,羊毛价格问题不是一般利益的问题 ,而是阶级利益的问题 ,是谁剪谁的问题 ,是土地贵族剪大资产阶级呢 ,还是大资产阶级剪土地贵族。

作为现在的执政党即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派到柏林去的汉泽曼先生 ,却把大资产阶级出卖给了战败的贵族地主。

对我们民主派来说,有意义的只是汉泽曼先生现在站到了战败者的一面,他支持的不是单纯保守的阶级,而是反动的阶级。我们的确没料到资产者汉泽曼会来这么一手。

汉泽曼先生起初证明他绝不是 Seehandlung 的庇护者,然后又补充说:不应立即停止 Seehandlung 的收购和关闭它的工厂。至于收购羊毛,那是有合同的,根据合同,今年收购一定数量的羊毛是……Seehandlung 的义务。我认为,如果说这种收购有一年能使私人周转不受损失的话,那末这正是今年(?)……因为,不这样价格就会一落千丈了。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当时汉泽曼先生是言不由衷的。他曾答应要损害羊毛加工者的利益来讨好阿尔宁、沙夫科奇和伊岑普利茨这一类人物,而现在又不得不从对贵族十分无情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中引经据典,为自己的轻举妄动辩护。他自己心里非常明白,他是在愚弄整个国民议会。

“不应立即停止 Seehandlung 的收购和关闭它的工厂”。因而, Seehandlung 还在收购羊毛并让它的工厂加紧生产。既然不应立即“关闭”Seehandlung 的工厂,自然也就不能中止收购。因此, Seehandlung 仍将以自己的毛制品供应市场,使本来就已饱和的市场更加饱和,使本来就很低廉的价格继续下跌。总而言之,为了使勃兰登堡和其他地方的容克地主们在他们的羊毛上发财, Seehandlung 将使目下的经济危机更加尖锐,将夺去羊毛加工者们目前仅有的一些顾主。

至于说到英国票据问题,汉泽曼先生发表了一篇辉煌的演说,说明英国基尼落入勃兰登堡容克地主们的腰包会使整个国家得到巨大的利益。当然,我们不想认真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只是不理解

汉泽曼先生当时怎么能够保持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为波兹南任命一个委员会的问题。这事明天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6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7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7 号

妥 协 辩 论

科伦 6 月 6 日。在 6 月 2 日的柏林妥协会议上 , 罗伊特先生提议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波兹南内战³⁵的原因。

帕里鸠斯先生要求立即讨论这个提案。

主席正想把这个问题提交表决 , 康普豪森先生提醒说 , 帕里鸠斯先生的提案根本还没有讨论 :

“从我自己方面来说 , 我也应该提请大家注意 , 通过这个 (罗伊特的) 提案就意味着通过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 , 但是 , 这个原则有权 (sic ! [请注意 !]) 要求各部门事先加以研究。”

我们很想知道这个包含在罗伊特提案中的“重要原则” , 可是康普豪森先生对这个原则一直避而不谈。

当我们不得不耐心地等待这方面的解释的时候 , 会议主持人 (副主席埃塞尔先生) 和许多“票”却在准许或不准许辩论帕里鸠斯的提案这个题目上谈论起来了。当时埃塞尔先生所依据的是 *soidisant* [所谓] 国民议会的主席口中发出的各种怪论 , 例如 , “我本来想 , 凡是国民议会要解决的问题都准许讨论 !”

“我本来想” ! 人在想 , 而康普豪森先生在操纵 , —— 他拟定了谁也不能理解的会议规则草案 , 并且强迫自己的国民议会临时通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过。

这一次康普豪森先生是仁慈的。他需要讨论。要是不讨论,也许会通过帕里鸠斯的提案,会通过罗伊特的提案,也就是说,会间接通过对康普豪森先生的不信任案。而且,更糟糕的是,如果不讨论,他的“重要的政治原则”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于是进行讨论。

帕里鸠斯先生希望立即讨论主要的提案,以免浪费时间,并且使委员会能够在讨论奏摺以前提出自己的报告。否则,在草拟奏摺时势必对波兹南的情况一无所知。

莫伊泽巴赫先生起来反对,但是态度相当温和。

可是里茨先生接着起来发言,他迫不及待地要否决罗伊特的煽动性的提案。他是普鲁士王国的谏议,不能容忍任何议会(即使是妥协议会)干预他的权限。他认为只有一个机构有这种权利,这就是总督署。在他看来,再没有比从属关系更高的东西了。

他大声叫道:“诸位先生,你们想怎样派遣委员会到波兹南去呢?难道你们想把自己变成行政当局或司法当局吗?诸位先生,从提案中我看不出你们打算干什么。难道你们想向司法当局(可怕!)的统帅或者向行政当局(谏议只要一想到这里,就说不出的话来)的统帅要文件吗(何等狂妄!)?难道你们想委托仓卒成立的委员会(大概没有经过任何考试)去调查任何人都还没有弄清楚的东西吗?(大概里茨先生只是为了调查任何人都已经弄清楚的东西,才任命委员会的。)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你们竟要越俎代庖……”(抗议。)

对于这个旧式的谏议,这个微末小吏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倒象卡姆画中的那个乡下人,二月革命后他来到巴黎,看见墙上都贴着

《R épublique française》〔法兰西共和国〕的标语,就到总检察官那里去告密,说有坏分子要推翻国王的政府。这个可怜的人过去一直在睡觉。

里茨先生也睡着了。“波兹南问题调查委员会”这句雷鸣般的话把他惊醒了,他还在睡眼朦胧中就惊叫起来:难道你们想越俎代庖吗?

敦克尔先生认为成立调查委员会是多余的,“因为奏摺起草委员会应该要求内阁作必要的解释”。但是要知道,成立委员会正是为了查对内阁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布洛姆先生说这个提案必须立即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在讨论奏摺前解决。有人谈到仓卒成立的委员会。昨天汉泽曼先生的内阁信任案也是仓卒提出的,但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表决。

在进行所有这些乏味的辩论的时候,汉泽曼先生大概正在反复考虑他的新的财政计划,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才从金色的幻梦中惊醒过来。他对谈话的内容茫无所知。但是既然已经叫到他的名字,他就得讲话。他还记得起来的可以作为根据的只有两点:他的上司康普豪森的演说和里茨的演说。他在奏摺问题上说了几句空话以后,用他们二人的演说拼凑成了下面这篇雄辩的杰作:

“现在还不知道委员会到底要做什么,要派遣自己的委员到大公国去,还是要做别的什么事情。正是这种情况证明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在这里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对一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采取草草了之的态度。我想国民议会不会这样做,我信任国民议会,相信它会慎重行事……”

汉泽曼先生给国民议会下这种结论,未免太轻视国民议会。我们要任命的委员会也许会派到波兹南去,也许不会派去。正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委员会应该留在柏林,还是应该派到波兹南去,所以是

否应该任命一个委员会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所以它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

但是这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到底是什么 ,汉泽曼先生现在还没有说出来 ,正如康普豪森先生不肯说出自己的重要的政治原则一样。让我们再说一遍 ,我们要耐心等待 !

汉泽曼的逻辑给人一种非常可怕的印象 ,以致立即有人起来要求中止辩论。当时就表演了这样一幕戏 :

荣克先生要求发言 ,他反对中止辩论。

主席 :在我看来 ,要发言反对中止辩论是不许可的。

荣克先生 :按通例 ,可以让人发言反对中止辩论。

泰梅先生念了暂行会议规则第 42 条 ,根据这一条 ,荣克先生是对的 ,而主席是不对的。

荣克先生获准发言 :我反对中止辩论 ,因为最后发言的是大臣。大臣的发言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因为它把大部分人都吸引到一边去了 ,因为议会上大部分人都不同意拒绝大臣.....

啊哟 ! 啊哟 ! 一片喊声经久不绝。右派席位上发出可怕的喧嚣声。

法律顾问摩里茨先生(即席)发言 :我提议叫荣克先生守规矩 ,他竟敢对整个国民议会进行人身攻击 ! (!)

“右派”那一边又有人喊道 :我附议 ,我抗议.....

喧嚣声越来越厉害。荣克使尽了浑身力气也无法压倒这种喧嚣声。他要求主席让他继续讲下去。

主席 :既然国民议会表示了自己的意志 ,我的职责已经尽到了。(! !)

荣克先生 :国民议会没有表示自己的意志 ,您首先应该进行正

式的表决。

荣克先生不得不再走下讲台。他不离开讲台,喧嚣声就不会平息。

主席:看来(!)刚才这位发言人是反对中止辩论的。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想发言赞成中止辩论。

罗伊特先生:中止辩论还是继续辩论的辩论已经化费了16分钟;再辩论下去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位发言人接着又絮絮谈到必须立即讨论任命委员会的提案。这使得汉泽曼先生不得不再次发言,阐明自己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汉泽曼先生:先生们!事情关系着一个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就是说,国民议会是否打算走上那条会引起严重冲突的道路的问题!

果然,汉泽曼先生就象始终如一的杜沙特尔一样,又宣称所讨论的问题是信任问题了。对他来说,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说,都是信任问题,而信任问题,对他来说,自然又是“最重大的政治问题”!

看来,这次康普豪森先生对这种简单速成的方法是不满意的。他说话了。

“应当指出,要是议员愿意提出质问(要知道人们愿意亲自查明!),国民议会也许已经了解情况了(关于波兹南)。这就可以成为一条使问题得到阐明(但是怎样阐明?)的捷径。……我最后要宣布,整个提案的本质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国民议会必须决定我们是否应当为了某种目的而成立调查委员会;我完全同意这个问题应该加以周密考虑和阐明,但是我不同意在这里这样仓卒地把它提出来讨论。”

这样一来,这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就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妥协议会有权利成立调查委员会,还是它自己有意放弃这个权利!

法国和英国的议会早已成立了这类调查(enquête parliamentary inquiry〔议会调查〕)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s〔议会特别委员会〕),而且那些循规蹈矩的大臣们从来不反对这样做。没有这些委员会,大臣们的责任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可是康普豪森先生却否认妥协派有这种权利!

够了。说话容易表决难。辩论快要结束,表决就要进行,而无穷的困难、犹豫不决、卖弄聪明和良心谴责都产生了。但是我们不想使我们的读者陷到这里面去。在连续不断的高谈阔论之后,帕里鸠斯的提案被否决,罗伊特的提案被提交给各部门。愿它安然瞑目!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6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8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8 号

奏摺问题

科伦 6 月 7 日。柏林议会为了使内阁有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证明它过去的活动是正当的,决定向国王呈递奏摺。据说这个奏摺不应当象过去省议会的感恩书那样,甚至也不应当成为请安的文疏:据陛下至尊的“负责任的”各部大臣承认,陛下只是提供了使多数派的原则和内阁的原则“调和”的一个“最方便的”、“最好的”机会。

既然国王这个人物(我们又要引用首相本人的话了)实际上只是象用来进行交易的货币一样的交换手段,那末就商讨的形式来说,他(这个人物)就远不是无足轻重的了。首先,人民意志的代表因此便要直接同国王打交道了,由此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奏摺问题的辩论本身就是承认“妥协论”³⁶,否认人民的主权。其次,同需要特别尊重的国家元首谈话决不能象直接向大臣们说话那样。表示意见要很谨慎,多暗示,少开门见山,此外,还要取决于内阁的决定,看它能不能接受甚至是怯懦的批评,认为这种批评可以和它的继续存在相容。至于矛盾非常尖锐的复杂问题,则尽可能避而不谈,或者只是表面上谈谈。这里很容易引起害怕同国王过早破裂的心理,据说这种破裂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并且很容易用这样的借口来掩饰:不应当操之过急,因为对各个问题还要进行认真的讨论。

因此,对君主个人或君主政体的整个原则衷心敬仰,担心操之过急,害怕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一切都会使内阁在讨论奏摺时占很大的便宜,而康普豪森先生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声言,这是造成稳固的多数的“最方便的”、“最好的”机会。

现在要问,人民代表是不是存心使自己处于这种恭顺的从属地位,制宪议会已大大地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因为它甘愿放弃自己的首要职责,不去要求各部大臣报告他们在临时执政期间的一切活动。据说议会之所以提前召开,是为了要用人民的间接意志来支持政府的措施。实际上,现在在议会召开之后,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它的召开仅仅是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可以指望长期存在的宪法”。

议会不仅没有用适当的行动一开始就宣布它的真正任务,反而辱没了自己,在各部大臣的压力之下答应同意总结报告。令人惊奇的是没有一个议员反对成立奏摺起草委员会的提案,而要求内阁除了只对它过去的活动负责以外,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出席议院。而这却是反对奏摺的唯一能令人信服的论据,任何其他的论据都是对各部大臣有利的。

写于 1848 年 6 月 7 日

载于 1848 年 6 月 8 日

“新莱茵报”第 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对波兰的重新瓜分³⁷

科伦 6 月 8 日。冯·普富尔先生在波兹南划定的新界线是对波兰的新的掠夺。这个新界线把波兹南的“应当改组的”部分缩小到不及整个大公国的 $\frac{1}{3}$ ，而把大波兰的大部分并入了德意志联邦。波兰的语言和民族性只是在沿俄罗斯边界的狭长地带才得到承认。这一地带包括弗勒申和普列申州以及莫吉尔诺、冯格罗维茨、格内森、施罗达、施里姆、科斯滕、弗劳施塔特、克廖本、克罗托申、阿德瑙和席尔德堡等州的一部分。这些州的其余部分以及布克、波兹南、奥博尔尼克、扎姆特尔、比恩包姆、梅泽里茨、博姆斯特、恰尔尼科夫、荷德捷日、维尔济茨、勃罗姆堡、舒宾、伊诺弗罗茨拉夫等州则根据冯·普富尔先生的命令，干脆全部变成了德国的领土。但是毫无疑问，就是在这一片“德意志联邦的领土上”，大部分居民讲的还是波兰话。

旧分界线至少还以瓦尔塔河作为波兰人的边界。新分界线却把应当改组的部分又缩小 $\frac{1}{4}$ 。其理由是：一方面陆军大臣“希望”波兹南要塞周围方圆 3—4 英里的地区不包括在改组范围以内；另

波兰称作：弗热斯尼亚，普列舍夫。——编者注

莫吉尔诺，冯格罗维茨，格涅兹诺，斯罗达，斯列姆，科息茨雅恩，弗斯霍瓦，克罗地亚，克罗托申，奥多利娅努夫，奥斯特舍舒夫。——编者注

布克，波兹南，奥博尔尼基，沙莫士雷，门兹胡德，门兹热奇，巴比莫斯特，恰尔恩库夫，荷德捷日，维日斯克，贝德哥什。——编者注

方面各城市,例如奥斯特洛夫等等要求并入德国。

说到陆军大臣的希望,那是不言而喻的。起初掠夺波兹南城市和楔入波兰内地 10 英里的波兹南要塞,然后为了毫无阻碍地享有掠夺来的东西,便承认侵占方圆 3 英里的新地区是合乎希望的。侵占了这一地区也就必然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小范围的圈地,而且这是把德国边界逐渐向俄属波兰边界推进的最好的借口。

至于“德国人”住的城市希望合并的问题是这样的:在全波兰,德国人和犹太人是从事工商业的市民的主要核心;他们是那些主要由于宗教迫害而离乡背井的移民的后裔。他们在波兰土地上建立了城市,并且在数百年间和波兰国家同命运共呼吸。这些德国人和犹太人(居民中的极小部分)却企图利用这个国家目前的状况来争夺统治权。他们借口自己是德国人,然而他们和美洲的德国人一样,很少象德国人。把他们并入德国,也就等于抑制波兹南占半数以上的波兰居民的语言和民族性,而且受抑制的正好是该省民族起义声势浩大的部分即布克、扎姆特尔、波兹南、奥博尔尼克等州的波兰居民的语言和民族性。

冯·普富尔先生声言,新界线一经内阁批准,就是最终的界线。他丝毫没有提到妥协议会和德国国民议会,既然是关于确定德国边界的问题,这两个议会也应当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过,即使内阁、妥协派、法兰克福议会批准了普富尔先生的决定,只要这条分界线没有得到另外两种力量即德国人民和波兰人民的批准,它还是不可能成为“最终的”界线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6 月 8 日
载于 1848 年 6 月 9 日“新莱茵报”第 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王朝之盾

科伦 6 月 9 日。正如德国报纸所报道的那样 ,康普豪森先生在 6 月 6 日向他的妥协派倾吐了心怀。他发表了

“一篇与其说是出色的 ,不如说是出自肺腑的演说 ,这篇演说令人想起了保罗 的话 :‘如果我用人类和天使的语言说话而没有爱 ,那我就象是一块发出响声的金属!’他的演说充满了我们称为爱的那种神圣的激动情绪……他向被鼓舞者发表了有鼓舞力的演说 ,掌声经久不息……要经过长久的歇息 ,才能吸收和领会这篇演说的全部印象。³⁸

谁是这篇出自肺腑、充满了爱的演说中的英雄人物 ?谁是那样鼓舞了康普豪森先生 ,使他向被鼓舞者发表有鼓舞力的演说的主要角色 ?谁是 6 月 6 日的这首即兴诗“亚尼雅士之歌”中的亚尼雅士³⁹ ?

不是别人 ,而是普鲁士亲王 !

应当读一读速记记录 ,看一看富有诗意的首相怎样描绘现代安契西士 的儿子的漂泊经过 ,他怎样在

神圣的特洛伊城陷落 ,
柏里亚 倒下 ,
长枪手柏里亚的人民遭到毁灭⁴⁰

的那一天 ,怎样在容克地主的特洛伊城陷落之后 ,经过了长时期的

基督教原始时代的传道者 ,见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 ,十三章。——译者注
亚尼雅士的父亲。——译者注
特洛伊国王。——译者注

漂泊流浪 ,终于在现代的迦太基靠了岸 ,受到了迪多娜女皇的亲切接待 ,他怎样比亚尼雅士一世走运 ,因为竟有康普豪森这样的人来竭力复兴特洛伊城和重新发现神圣的“法制基础” ;康普豪森怎样终于使他的亚尼雅士回到了家园 ,现在特洛伊城的宫殿里怎样又充满了欢乐的气氛⁴¹。只有看完了这一切 ,看完了那些充满诗意的描绘 ,才能感觉到鼓舞者向被鼓舞者发表演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过 ,这整首史诗只是康普豪森先生用来赞美他自己和他的内阁的借口罢了。

他高声说道 :“是的 ,我们以为立宪制度的精神要求我们挺身做一个崇高的人物 ,要求我们出来承受一切必将袭来的攻击……结果也正是这样。我们象盾牌一样护卫着王朝 ,承受了一切危险和攻击 !”

这是对“崇高的人物”、对“王朝”的怎样的赞语啊 如果没有康普豪森先生和他的 6 位骑士 ,王朝就会崩溃。康普豪森先生说这样的话 ,该是把霍亨索伦王朝看作多么强大、多么“深得民心的王朝”啊 其实 ,如果康普豪森先生不是那样“有鼓舞力地向被鼓舞者”说话 ,如果他不是那样“充满了我们称为爱的那种神圣的激动情绪” ,或者如果他只是让他的满足于作“发出响声的金属”的汉泽曼讲话 ,那末对王朝也许会更有利些 !

“然而 ,诸位先生 ,我这样说并不是狂妄自大 ,而是谦恭温顺 ,是由于意识到摆在你们和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只有在宽容和妥协的精神也光临这个议会的条件下 ,只有在我们不仅能指望你们的正义 ,而且能指望你们的宽容的条件下 ,才能得到解决 !”

康普豪森先生做得对 ,他向那个本身也极需要公众宽容的议会哀求宽容 !

写于 1848 年 6 月 9 日

载于 1848 年 6 月 10 日“新莱茵报”第 1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科伦在危急中

科伦 6 月 10 日。美妙的降灵节来到了，田野一片翠绿，树上花儿盛开⁴²，所有分不清第三格和第四格的人⁴³都开始准备在一天之内就把反动派的圣灵散发到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中去。

时机选择得很适当。在那不勒斯，近卫军的上尉和瑞士的雇佣兵已经把年轻的自由淹没在人民的血泊中。在法国，资本家会议用残酷的法律来制服共和国，并任命 2 月 23 日在基佐家中下令开火的佩罗将军为文森要塞的司令。在英国和爱尔兰，宪章派和合并取消派⁴⁴被大批地投入监狱，手无寸铁的人们的集会将被龙骑兵驱散。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现在自己确定了要实现曾经由永垂不朽的联邦议会提出而被五十人委员会⁴⁵否决的三头政治。在柏林，右派靠人多势众和跺脚喧嚣而节节胜利，普鲁士亲王则以进入“全民财产”⁴⁶宣布了革命的毁灭。

在莱茵黑森集结着军队；法兰克福周围驻扎着因镇压滨湖地区的共和派起义部队而驰名的英雄们⁴⁷，柏林和布勒斯劳周围也驻满了军队，至于莱茵省的情况怎样，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反动势力在准备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

正当在什列斯维希进行着战斗，俄国发出威胁性的通牒并将

见本卷第 21—24 页。——编者注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30万军队向华沙集中的时候,莱茵普鲁士却挤满了军队,虽然巴黎议院的资产者已经又一次宣布“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和平”!

在莱茵普鲁士、美因兹和卢森堡驻扎有(根据“德意志报”⁴⁸的报道)整整14个步兵团(13,15,16,17,25,26,27,28,30,34,35,38,39,40),也就是说,驻扎有整整 $\frac{1}{3}$ 的普鲁士常备军步兵和自卫军步兵(全普鲁士共有45个步兵团)。这些步兵团的一部分已按战时编制加以扩大,而其余部分则用召集 $\frac{1}{3}$ 预备兵的办法来加强。此外,这里不驻扎着3个枪骑兵团、两个骠骑兵团和一个龙骑兵团,并且在最近还要增加一个重骑兵团。这里还应当加上第7和第8炮兵旅的大部分,其中至少有一半已进入动员状态(即每个炮兵连已配备19—121匹马,或是2—8付火炮系架)。除此以外,还为卢森堡和美因兹成立了第3炮兵连。这些军队布置成一个大的弧形,从科伦和波恩经过科布伦茨和特利尔直到法国和卢森堡的边境。所有的要塞都在加强武装,堑壕都加筑了木栅排,堡垒斜坡上的树木有的地方已完全砍掉,有的地方只把炮火线上的砍掉。

在科伦这里,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科伦的炮台已经装备齐全。安好了炮床,开好了炮门,大炮就安在这里并已架设在待机阵地上。每天从早晨6时到傍晚6时都在进行这些工作。据说,为了避免发出任何声响,大炮是在夜里裹好了车轮运出城去的。

护城的工事从拜恩士姆开始,已经筑到第6号棱堡,即包括了一半要塞围墙。第一地段已架设了20门大炮。

不完全正确。第13步兵团只有一部分驻扎在这里,第15步兵团全在威斯特伐里亚,但乘火车在几小时内就可到达此地。——编者注

在第2号棱堡(塞费林托尔),大炮是架设在城门上的。只要掉转炮口就能向城市轰击。

这里堡垒斜堤上的树木原封未动,这就最有力地证明了,这种武器不过是表面上用来对付外敌而已,实际上是对付科伦本身的。这样一来,如果军队离开城市而隐蔽到炮台里去,架设在城墙上的大炮就无法轰击炮台,可是炮台的臼炮、榴弹炮和24磅火炮却可以毫无阻碍地用榴弹和炸弹越过树木轰击城市。炮台距离城墙总共只有1400步,因此炮台可以用有效射程为4000步的炸弹轰击城市的任何部分。

现在来谈谈直接对付城市的措施。

区行政机关对面的军械库已搬运一空。枪支已包装得好好的(为了掩人耳目),并已运到了炮台。

炮弹是装在枪械箱中运到城里去的,并存放在炸弹轰击不到的沿城墙的军需库里。

当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炮兵正在分发上了刺刀的枪支,虽然大家知道,普鲁士的炮兵根本就没有受过使用上了刺刀的枪支的训练。

步兵已有一部分驻扎在炮台里。全科伦都知道,前天每个连队都分到了5000发子弹。

为了在发生冲突时对付人民,曾发布了以下的命令。

在发出第一个警报信号时,(要塞的)炮兵第7连就开往炮台。

第37炮兵连也应随即出城。这个炮兵连已经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

第5和第8炮兵连暂时留在城内。这些连队的每一辆弹药车都装有20发炮弹。

轻骑兵由多伊茨开赴科伦。

步兵占领新市场,哈能托尔和埃伦托尔,以便掩护全部军队撤出城市,军队撤完后自己也要隐蔽到炮台里去。

同时,高级军官在用一切办法教导军队拥护旧普鲁士,仇视新制度。在目前反动势力气焰万丈的情况下,借口反对煽动者和共和主义者而对革命和君主立宪制进行最恶毒的攻击,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其实,科伦在最近恰好比任何时候都要平静。除了在区警察员家门前的一次人数不多的集会和干草市场上的几次斗殴之外,最近四周以来连稍微惊扰市民自卫团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由此可见,所有上述措施都是毫无根据的。

再说一遍:上述一切措施完全不可理解,我们收到的来信证明军队正在向柏林和布勒斯劳集结,反动派切齿痛恨的莱茵省充满了士兵,根据这一切情况来判断,毫无疑问,反动势力正在准备发动一次普遍的强大的进攻。

看样子,在科伦这里,这种进攻是计划在降灵节的第二天开始的。现在谣传纷纷,说在这一天“将要开始”。他们将竭力制造一些小纠纷,然后好立刻出动军队,以炮击来威胁城市,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把主要的煽动者监禁起来,一句话,象对付美因兹和特利尔那样来对付我们。

我们郑重地警告科伦的工人们不要上反动势力的当。我们坚决请求他们不要给拥护旧普鲁士的政党提供任何足以被用来使科伦受到横暴的军法制裁的借口。我们请求他们要特别安静地度过

两天降灵节日,以便粉碎反动派的全盘计划。

如果我们给反动势力提供了攻击我们的借口,我们就会遭到毁灭,遭到同美因兹的居民一样的命运。如果反动势力由于寻衅不成而被迫首先开始向我们进攻,如果它真的敢这样做,那末科伦人就会证明,他们将毫不动摇地决心为3月18日的胜利果实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附笔:刚刚颁布了下列命令:

在两天的降灵节日里,取消接受口令时的集合(平时宣布口令总是特别隆重的)。军队留在营房,口令也在营房里向军官传达。

在节日的两天内,要塞的炮兵连、大炮修理连以及炮台的步兵卫戍部队每天除平常的口粮外,还预领4天口粮,这样一来,他们就经常储备有8天的口粮。

炮兵在今晚7时就要举行战斗演习。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10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6月11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11号

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 承认自己有名无实

科伦 6 月 11 日。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都承认了自己有名无实，并把这一点郑重地记入记录。法兰克福议会通过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表决承认了联邦议会为上级机关⁴⁹。柏林议会否决了贝伦兹议员的提案，而通过了说明理由的转入议程的决定，这不只是背弃了革命，而且是公开声明，它的召开不过是为了协商制定宪法而已，这样也就承认了康普豪森内阁提出的宪法草案的基本原则。两个议会都给自己做了正确的评价。它们俩都是有名无实的。

写于 1848 年 6 月 11 日

载于 1848 年 6 月 13 日

“新莱茵报”第 12—1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

—

科伦 6 月 13 日。妥协议会终于发表了肯定的意见。它背弃了革命,承认了妥协论。

妥协议会要谈的问题的实质就是如此。

3 月 18 日国王答应立宪,实施必须交纳押金的出版自由,并且发表一系列的声明说,要实现德国的统一,必须把德国溶化到普鲁士里面去。

3 月 18 日的让步就是如此,让步的实际内容归结起来就是这样。柏林人满足于这一点,他们到皇宫前去游行,向国王谢恩,这就最明显地证明了 3 月 18 日的革命是必要的。不但国家必须革命化,而且国家的公民也必须革命化。只有在流血的解放斗争中,他们才能摆脱忠君爱国的精神。

某种“误会”引起了革命。不过误会确实发生了。士兵的进攻,16 小时的战斗,人民一定要军队撤退,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人民根本不懂得 3 月 18 日的让步。

革命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

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

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去组阁,可是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建议和旧普鲁士的贵族、官僚结成同盟,因而立即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加入内阁的有阿尔宁、卡尼茨和施韦林。

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害怕工人和民主的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

联合起来的反动派从使革命成问题这一点来着手反对民主。他们否认人民的胜利,捏造“17个被害士兵”的臭名昭彰的名单,千方百计地诽谤街垒战士。不仅如此,内阁还决定真正召开革命前就宣布召开的联合议会,以便 *post festum* (随即)表演从专制到宪制的合法过渡。这样,它就公开地背弃了革命。随后内阁发明了妥协论,从而再度背弃了革命,同时也背弃了人民的主权。

这样,革命就真的成了问题。它本来就可能成问题,因为它只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只是长期的革命运动的开端。

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目前普鲁士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向民主过渡的必然阶段,为什么大资产阶级一上台就站到反动派方面去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地说明。我们现在只指出事实本身。

妥协议会现在必须表示态度:它是否承认革命。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承认革命就是承认革命的民主的一面,这是和大资产阶级背道而驰的,因为大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的这一面化为乌有。

承继革命在目前恰恰就是承认革命的不彻底性,从而承认为了反对革命的某些结果而掀起的民主运动。这就意味着承认德国正在发生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康普豪森内阁、妥协论、间接选举、大资本家的统治和妥协议会本身的活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即使可能成为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也决不能成为最后的结果。

在议会辩论是否承认革命时,双方发言都非常冗长、非常积极,但是在思想上却暴露了惊人的贫乏。很少能看到有比这种模棱两可的辩论更枯燥无味的东西了。辩论经常被喧嚷或会议规则的细节上的争论所打断。不是党派斗争的高度的热情,而是时时刻刻会使辩论变为谈心的冷静的气氛;不是击中要害的尖锐的论证,而是乱七八糟东拉西扯的冗长的空谈;不是中肯的反驳,而是关于道德的本质和特性的枯燥无味的说教。

左派在这场辩论中也并不突出。它的大多数发言人都是彼此重复,谁也不敢肯定地对问题的本质发表意见,公开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说话。他们总是怕引起别人的讨厌,怕侮辱了和吓倒了什么人。要不是3月18日的战士们在斗争中比左派先生们在辩论中显示了更大的毅力和热情,德国的情况就糟了。

二

科伦 6 月 14 日。开始辩论时,柏林议员贝伦兹提出如下的提案:

“议会承认革命,宣布 3 月 18 日和 19 日的战士对祖国有巨大的功劳。”

提案的形式,法国大革命从古罗马人那里借来的这种简要的形式,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贝伦兹先生论证他的提案的方式却是不恰当的。他的演说不是革命的,而是调和的。他本来应该在反动派的会议上把遭到诽谤的街垒战士的愤怒表达出来,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那里心平气和地进行枯燥乏味的说教,好象他还是以柏林手工业者协会的一个教师的身分在说话。他本来应该为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事情辩护,可是他的议论却混乱透顶。

贝伦兹先生的发言是这样开始的:

“诸位先生!承认革命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个议会本身就是对席卷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的伟大运动的明确的承认。议会就是由这次革命产生的,因此,它的存在就是在实际上承认了革命。”

第一,问题根本不在于一般地承认“席卷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的伟大运动”是事实,——这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不,问题在于承认那个被说成是叛乱的柏林巷战是真正的实际的革命。

第二,一方面,柏林议会当然“承认革命”,因为如果没有柏林

的巷战,就不会有什么“协商的”宪法,最多也不过是钦定的宪法。但是由于议会召开的方式,由于联合议会和内阁授予它的权利,它同时也就否定了革命。因为,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的议会不是进行妥协,而是要发号施令。

第三,议会在表决奏摺时的态度说明它已经承认了妥协论,它投票反对到阵亡战士墓去游行⁵⁰说明它已经背弃了革命。它背弃了革命,因为它始终和法兰克福议会同时“开会”。

这样,贝伦兹先生的提案实际上已经两度被否决了。而这一次,议会必须公开发表意见,这个提案就更会遭到否决。

既然议会已经是反动的,既然已经看得很清楚,人民对它不再抱有什么希望,那末左派就应该使支持提案的少数尽量少些,而且只包括一些最坚决的议员。

所以贝伦兹先生根本用不着拘于礼节。他应该尽量坚决、尽量以革命的精神发言。他不应该沉溺于幻想,似乎议会是制宪议会,似乎议会想成为制宪议会,似乎议会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他应该向这个议会说明它已经间接地背弃了革命,并且要求它现在公开地这样做。

但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所有左派发言人都没有遵循民主党派应该遵循的这个唯一的政策。他们沉溺于幻想,似乎能够劝议会采取革命的步骤。因此他们作了让步,缓和了紧张局势,讨论了和解的问题,这样,他们自己也就背弃了革命。

于是贝伦兹先生继续非常冷静、非常呆板地对一般的革命特别是柏林的革命作了冗长的发言。他在发挥他的思想的时候,提到这样一个反对意见:革命是多余的,因为国王早就同意一切要求了。对于这种意见他回答说:

“当然,国王陛下已赐予了很多……但是难道人民满足于这种赐予吗?难道我们得到了真正实现这个诺言的保证吗?我认为这种保证……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得到!……可以肯定,类似的国家变革只有经过斗争的大灾难才能产生,才能扎根。3月18日的一个重要的让步还没有实现,这就是武装人民……只有人民武装起来了,他才感觉到自己有了保障,不致发生可能产生的误会……因此(!),斗争当然是一种自发的现象(!),但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是一种灾难,国家生活的变革是在这种灾难中成为现实,在这种灾难中实现的。”

从这段冗长、混乱、再三重复的议论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贝伦兹先生根本不明白革命的结果和它的必要性。关于革命的结果,他只知道对3月18日的诺言所作的“保证”,只知道“武装人民”;他凭空塑造革命的必要性,再一次用精细的笔法来描写“保证”,最后郑重其事地断言,任何革命没有革命就不能实现。

革命是必要的——显然这只是说,为了取得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东西,革命是必要的。革命的必要性和它的结果成正比。但是由于贝伦兹先生不明白这些结果,所以他自然只好求助于冗长的庄严的论断来塑造革命的必要性。

革命的结果怎样呢?它绝对不是“保证”实现3月18日的诺言,恰好相反,是推翻这些诺言。

18日那天允许成立这样一种君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下,贵族、官吏、军阀和牧师保持着政权,同时让大资产阶级通过钦定宪法和必须交纳押金的出版自由来行使监督权。对人民说来,是德国的旗帜、德国的舰队代替了普鲁士的旗帜和舰队,是为德意志联邦服兵役,而不是为普鲁士服兵役。

革命打倒了君主专制的一切势力——贵族、官吏、军阀和牧师。它使大资产阶级独自获得了政权。它给了人民不必交纳押金

的出版自由的武器,给了他们结社的权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他们物质的武器——步枪。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结果。在街垒上进行过战斗并获得了胜利的人民,已经完全不是3月18日到皇宫前游行、只是遭到龙骑兵袭击后方明白他们所获得的让步的真正意义的人民了。他们完全能够做不同的事情,他们完全能够以另一种态度对待政府。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革命本身。

“作为一个柏林人,我完全有权利说我们饱尝了悲痛的滋味(如此而已!)……看到有人诽谤这个斗争……我要提醒大家注意首相先生的话,他……证明说,摆在伟大的人民和全体人民代表面前的任务是本着宽容与和解的精神进行工作。我也向大家呼吁要有这种宽容的态度,并以柏林代表的身分建议你们承认3月18日和19日。柏林人民在革命后的行动,一般说来,无疑一直是令人非常满意、非常尊敬的。可能有过个别的过火行为……因此,我认为议会的声明是恰当的等等,等等。”

对这个背弃革命的怯懦的结论,我们只补充一点:经过这样的论证后,这个提案应该遭到否决。

三

科伦 6 月 14 日。针对贝伦兹的提案提出的第一个修正案之所以短命，应该归功于议员布莱梅先生。这是一个含糊的善意的声明，它(1)承认革命，(2)承认妥协论，(3)承认革命的所有参加者，(4)承认下面这个伟大的真理：

无论骏马或骑士都不能
保卫王公所在的顶峰⁵¹，——

这样一来，革命本身又打上了真正普鲁士的烙印。可敬的老教师布莱梅先生想讨好各政党，可是它们根本不想理睬他。他的修正案未经讨论就被否决了，于是布莱梅先生怀着失望的博爱者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悄然下台了。

德里奇的舒尔采先生走上讲台。舒尔采先生也是革命的信徒，但与其说他是街垒战士的信徒，不如说他是战斗后的人们的信徒，这些战斗后的人们是和通称为“人民”的那种“战士”不同的。他希望“战斗后的人们的行为”特别得到承认。当他听到了

“人民在已经没有任何敌人和他们对抗时(!)的温和与审慎……他们的严肃认真的精神，和解的愿望……以及对朝廷的态度……我们看到，人民非常懂得在这种时候正视历史本身！”

这些话时，他简直喜不自胜。

舒尔采先生之所以喜不自胜，与其说是由于人民在战斗时的革命行动，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在战斗后的绝非革命的无所作为。承

认人民在革命后宽宏大量,其含义不外乎下面两种:

要就是侮辱人民,因为如果说人民的功劳在于他们在胜利后没有发生卑鄙的行为,那就是对人民的侮辱。

要就是承认人民用武力取得胜利后无所作为,因而使反动势力得以重新抬头。

舒尔采先生“把两者结合起来”,“惊喜若狂”,因为人民不但自己行为规矩,而且使反动派得以苏醒。

“人民的行为”表现在正当他们应该去创造历史的时候,他们却兴高采烈地去“正视历史本身”;表现在他们由于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温和”、自己的“审慎”、自己的“高度的严肃认真”和“不灭的神圣的星火”,没有能够阻止大臣们用欺骗手段陆续从他们那儿夺去已经获得的自由;表现在他们不继续进行革命,反而宣布革命已经结束。而维也纳人的行为就大不相同,他们一步一步地击退了反动派,他们现在争得的不是妥协会,而是制宪议会!⁶²

可见,舒尔采先生(来自德里奇)是在不承认革命的条件下承认革命的。因此他应该博得震耳欲聋的“喝采”。

经过短时间的关于会议规则上的争论后,康普豪森先生亲自上台发言。他指出,按照贝伦兹的提案,“议会应该对一种观念发表意见,应该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康普豪森先生看来,革命只不过是一种“观念”。因此,他“让”议会去决定它是否打算这样做。对问题本身,他认为“大概没有什么严重的意见分歧”,他所根据的是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两个德国人发生争论时,他们的意见 au fond [实质上]总是彼此一致的。

“如果有人想重复说……一个必然会产生……最伟大的改革(就是说还

没有最伟大的改革)的时期到来了,那我比谁都更同意这一点。”

“相反地,如果有人想说国家和国家政权失去了合法的基础,说发生了以暴力推翻现存政权的事件,……那我就要反对这样的说法。”

过去康普豪森先生认为自己主要的功劳在于把已经断了的那根合法性的线又接上了,现在他认定这根线从来也没有断过。让事实来揭穿他的诺言吧,——说政权从博德尔施文克转到康普豪森是不间断的合法的过渡,这根本不是事实。

“如果有人想暗示说我们正处在事变的前夕,其结局正如我们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史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史中所知道的那样,政权将落入独裁者手中”,

那末康普豪森先生也一定会反对。

我们的考察历史的朋友当然不会错过机会对柏林革命发表德国市民在罗泰克的著作中读到的而且越读越爱听的那种意见。柏林革命已经不能算是革命了,因为否则它就必定会产生克伦威尔和拿破仑,而这是康普豪森先生所反对的。

最后,康普豪森先生让妥协派“对在不幸的冲突中牺牲的人表示同情”,但是指出“表达的方式”在这里“有着重要的和巨大的意义”,并认为这个问题应交给委员会去审查。

由会议规则引起的新风波平息后,一个洞察事物因而善于感动人心的演说家最后发言,这就是瓦尔劳的法师弥勒牧师先生,他赞成舒尔采提出的补充意见。牧师先生并不打算“拖延”议会,他想“只谈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抱着这种目的,牧师先生向议会提出如下的问题:

“这个提案把我们引到道德上去了,如果我们不是从提案的表面(居然想从表面来看问题?) ,而是从它的内容(内容空洞,废话连篇) 来考察它,那末不管多么困难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它涉及的恰好是在道德上承认暴动的问题;因此我要问:暴动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不是某个政党的问题,而是一个无比重要的神学上和哲学上的道德问题。议会应该同国王协商制定的不是宪法,而是哲学上的道德体系。“暴动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所在。而牧师先生是怎样回答屏息凝神的议会的呢?

“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决定这个崇高的道德原则!!”

牧师先生钻到问题里去,不过是为了声明他无法了解问题的内容。

“这是许多深思熟虑的人们思考的问题,但是他们也还没有得出任何肯定的解答。因此,我们在简短的辩论中是无法弄得一清二楚的。”

犹如霹雳一声,使议会大吃一惊。牧师先生以必要的异常尖锐和异常严肃的态度向议会提出了道德问题;他向议会提出这个问题,为的是要立即说明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妥协派一定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已经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了。

但是这不过是牧师先生劝人为善的手腕,好让议会去忏悔祈祷。他已经为悲痛的议会准备好了宽心丸:

“我认为还有第三种观点,这里应该加以注意:3月18日的牺牲者是在不允许采取道德上的决定的情况下行动起来!!”

街垒战士对他们的行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

“但是如果你们问我,我认为他们有没有道德权,那我就肯定地回答:有!”

我们要问:如果一个乡村传教士力图当选柏林议会的议员,只是为了用他那劝人为善的诡辩来喋喋不休地劝说全体到会议员,那末这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霍弗尔议员作为波美拉尼亚的农民,对整个问题提出反对意见。

“因为士兵们是些什么人呢?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和儿女吗?请你们好好想一想,如果父亲在海岸(温德语:po more,即波美拉尼亚)听到这里是怎样对待他的儿女的,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呵!”

就算士兵们行动随便,就算他们让别人把自己变成了最卑鄙的背叛行为的工具,他们反正是我们波美拉尼亚的青年,因此应该为他们欢呼三次!

万茨列本的议员舒尔采说:先生们,柏林人的行动应该得到承认。他们无比勇敢。他们不只是克服了恐惧大炮的情绪。

“如果把怕被霰弹击中的恐惧和参加街头暴动的危险——要受严厉的、也许是侮辱性的惩罚——对比一下,这种恐惧又算得了什么呢!参加这种斗争所要的勇气实在太伟大了,以致连毫无掩蔽地站在炮口前的人的勇气在它面前也会完全黯然失色!”

因此,德国人在1848年前没有进行革命是因为怕警察署长。

施韦林大臣声明,如果通过贝伦兹的提案,他就辞职。

埃尔斯纳和赖辛巴赫反对舒尔采的补充意见。

迪尔施克指出,革命应该得到承认,因为“争取道德自由的斗

争还没有进行到底”，因为议会也“负有实现道德自由的使命”。

雅科比要求“完全承认革命及其一切结果”。他的发言是整个会议期间最好的发言。

最后，我们满意地看到，在这么多说教的、枯燥无味的、犹豫不决的、调和妥协的发言之后，我们的汉泽曼上台发言了。现在我们总该听到一种坚决的、肯定的东西了，——其实不然，汉泽曼先生今天的发言也是软弱的、调和的。他这样做有他的理由，他没有自己的理由，是决不会做的。他看到议会动摇不定，投票的结果还未见分晓，合适的修正案还没有想出来。他竭力主张延期讨论。

因此，他竭力把话讲得简短些。事实俱在，无可辩驳。只不过有人把它叫做革命，有人把它叫做“大事变”而已。我们绝

“不要忘记，这里没有发生过象巴黎以及更早以前的英国那样的革命，——我们有的是国王和人民的协商（靠霰弹和枪弹来进行的独特的协商！）。但是正因为我们（大臣们）就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对事情的本质发表反对意见，而另一方面，又因为必须寻找一种能够保存政府基础的论点”，——

所以应该延期讨论，使大臣们能够彼此交换意见。

真是妙不可言，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的汉泽曼作这样的转变，值得他承认政府的“基础”如此动摇，以致任何一个“论点”都足以把它推翻！只有那种能够重新把一切问题归结为信任问题的令人高兴的事情，才能使他得到安慰。

于是，讨论延期了。

四

科伦 6 月 14 日。第二天。讨论又从长时间的关于会议规则的争论开始。争论结束后,察哈里埃先生发言。他提出一个一定能使议会摆脱困境的修正案。这是一个合乎内阁心意的公式。这个公式说:

“鉴于伟大的三月事变——由于这个事变,也由于国王的赞同(赞同本身就是“三月事变”,虽然不是“伟大的”) ,我们这里才确立了目前的国家法制——的崇高意义以及为它(即国王的赞同)而斗争的战士的功劳都是无可争辩的(!),此外,鉴于议会认为自己的任务不在于发表见解(议会应该声明它没有任何见解!),而在于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议会应转入议程。”

这个提案的目的是想使各方面都满意;对于这个提案,察哈里埃先生引以自慰的是希望“所有的人,甚至贝伦兹先生,都能在这个提案中找到他能想到的一切东西,如果他是善意地提出自己的提案的话”。这个混乱而空洞的提案,这碗又酸又甜的稀粥,也就是康普豪森内阁所“依据”的和能够依据的“论点”。

柏林的济多夫牧师先生为他的同事弥勒的成就所鼓舞,也走上了讲台。道德问题萦绕于他的脑际。弥勒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能够解决。

“诸位先生,请允许我在这里马上(他已经进行了半小时的说教)谈谈我的责任感迫使我说的话:如果辩论还要继续下去,那末,我认为在没有尽到自己良心上的义务以前,谁也不应该沉默无言。(好呀!)

请允许我谈谈我个人的意见。关于革命,我的意见是这样(讲本题!讲本题!),在发生革命时,革命只是双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罪过的征兆。这(这种庸俗的见解,这种最廉价的回避问题的方法)是看事物的最高的道德观点,因此(!)我们不应该预先讨论国家的基督教道德见解。”(在这些先生们看来,他们坐在那里究竟是干什么的呢?)(会场发生骚动。有人叫:回到议程上来!)

“但是,先生们”——这位勇敢地捍卫最高的道德观点和未经预先讨论的国家的基督教道德见解的人继续说道,——“我不同意说人民由于自发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政治自卫(!)的时候不会到来,……到那个时候,我认为个人会以最道德的方式参加政治自卫。(感谢诡辩,我们得救了!)当然,他们也可能以不道德的方式参加,——那是他们的良心问题!”

街垒战士的问题不应该拿到 *soi-disant*(所谓的)国民议会上去讨论,而应该拿到忏悔室里去讨论。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牧师济多夫先生还声明说他是“有勇气”的,他从最高的道德观点喋喋不休地谈论人民的主权,他的发言又被不耐烦的叫声打断了三次,于是他得意地回到自己的座位,认为自己已经尽了良心上的义务。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济多夫牧师同意什么样的意见,不同意什么样的意见。

普伦尼斯先生说所有这些计谋都应该抛掉。因为提案经过了那么多的修正和再修正、经过了那样无休无止的辩论和无谓的争论,已经受到阉割,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普伦尼斯是对的。但是他除了注意到这种证明双方许多议员都很怯懦的情况以外,不可能

对议会表现更不友好的态度。

特利尔的赖辛施佩格先生说：

“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制造理论和颁布历史，而是应该尽可能地创造历史。”

绝对不是议会通过那个说明理由的转入议程的提案，就说明了议会之所以存在，恰恰相反，是为了使历史不存在。不过这也是一种“创造历史”的方法。

“我想起维尼奥的一句格言：革命喜欢毁灭自己的亲生儿女。”

唉！可惜！正好相反，倒是它的亲生儿女毁灭了它！

里德尔先生坦率地说，对于贝伦兹的提案我们“不应该只了解它的字面上的意义，——在它的后面还隐藏着原则性的争论”。而这位“最高的道德观点”的牺牲者乃是秘密档案的顾问和教授！

上台发言的还有一位备受尊敬的牧师先生。这就是在柏林向妇女传道的约纳斯先生。看来他真的把议会当做向有教养的阶层的女儿们说教的讲堂了。他以真正的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学生所具有的那种傲慢自大的态度，对革命和改革之间的如此重大的区别发出了一连串平淡无奇的议论。他还没有结束他说教的开场白，他的发言就被打断了三次。最后，他大声地讲了下面这段出色的话：

“革命是一种同我们现在的宗教意识、道德意识直接抵触的东西……革命这种行动诚然被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是伟大的、光荣的，但是在基督教的世界……”（刺耳的叫声，全场哄然。埃塞尔、荣克、埃尔斯纳、主席及其他许多人都一齐插嘴。最后，颇孚众望的传道者才继续讲下去。）

“无论如何我不同意议会对宗教原则、道德原则有表决的权利。对这些原

则任何会议都不能投票表决(？而宗教法庭,宗教会议呢?)。希望颁布或宣布革命是崇高的道德典范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意即随便什么东西),在我看来和议会希望作出关于有上帝或者无上帝或者有许多上帝的决定是一样的。”

果然如此!妇女传道者又顺利地把问题转到“最高的道德观点”上去了,现在这个问题自然只有新教的宗教会议,只有这些教义问答的作者才能处理了。

谢天谢地,在所有这些最高道德的空谈之后,我们的汉泽曼终于发言了。我们一接触到这样一个实际的人,就感到自己完全摆脱了“最高的道德观点”的危险。汉泽曼先生只用一句鄙视的评语就把道德观点完全清除了:

“我问问你们,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来进行这类原则性的争论?”

汉泽曼先生想起昨天有一位议员谈到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的问题。汉泽曼先生就利用这一点来耍手腕。他谈工人阶级的贫困,对他们的贫困表示怜悯并且问道:

“普遍贫困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感到,只要我们的国家法制还未确立,我们对整个现行制度的巩固就没有信心。”

这一次汉泽曼先生说出了心里话。他大声说道:必须恢复信任!而恢复信任的最好方法就是背弃革命。随后这位“看不见任何反动派”的内阁的发言人就以恫吓的口吻大谈其取得反动派好感的重要性。

“恳求你们促进各阶级的团结”(简直是侮辱进行革命的阶级!);恳求你们促进人民和士兵的团结;请你们想一想我们巩固独立的希望是寄托在士

兵身上的(!在人人皆兵的普鲁士才是这样 !) ;请你们想一想我们目前是处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这一点我没有必要详细地向你们解释 ,因为仔细阅读报的人(所有在座的先生当然都是这样的人) 都会同意这种情况是困难的 ,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在这种时候发表一个会引起国内纠纷的声明是不恰当的..... 因此 ,诸位先生 ,请你们努力使各政党和解 ,请你们不要提出问题来向对方挑衅。否则这样的事情无疑是会发生的。如果通过这个提案 ,那末就会产生最悲惨的结果。”

反动派看到平日如此坚决的汉泽曼不仅使议会感到恐惧 ,而且使他本人也感到恐惧 ,该会怎样大笑呵 !

这种引起议会里的大资产者、律师和学校教师的恐惧的办法 ,比所有那些“最高道德观点”的动听的词句起的作用都要大。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德斯特尔还再度猛扑 ,企图冲淡已经产生的印象 ,但是无济于事 ,因为辩论已经停止 ,议会以 196 票对 177 票通过了察哈里埃提出的说明理由的转入议程的建议。

议会就这样自己给自己定了罪 ,它表明了自己没有主见。

弗·恩格斯写于

1848年6月13日—14日

载于1848年6月14日—17日

“新莱茵报”第14号—7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科伦各党派的情况

科伦 6 月 16 日。几天以前,这里曾举行补选。这种补选最令人信服地说明:从普选以来各党派的情况起了怎样的变化⁵³。

法兰克福议会的后补议员、警察厅长弥勒先生被古梅尔斯巴赫市选为柏林议会的议员。

选举时提出了 3 名候选人。天主教派提出佩尔曼先生,立宪派(市民联合会)⁵⁴提出律师法依先生,民主派提出民主协会(什托尔维尔卡协会)⁵⁵主席、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先生。

第一次投票时(140 个复选人投票)法依先生得 29 票,佩尔曼先生得 34 票,施奈德尔先生得 52 票。其余的票数很分散。

第二次投票时(共 139 票)法依先生得 14 票,佩尔曼先生得 59 票,施奈德尔先生得 64 票。可见民主派还是获得了多数票,而且比第一次的票数还要多。

第三次投票时(共 138 票)法依先生 1 票也没有得到,施奈德尔先生得 55 票,佩尔曼先生得 75 票。这就是说,市民联合会的先生们因畏惧什托尔维尔卡协会会员而把自己的票投给了天主教派的候选人。

这几次投票的结果说明,这里的社会情绪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初选时,民主派处处占少数。补选时民主派成了 3 个相互斗争的党派中最强大的一个,它只是在其他两个党派反常地结成联盟的情

况下才被击败。我们不去责备天主教派同意结成这个联盟。我们只着重指出一个事实：立宪派已经消声匿迹了。

写于 1848 年 6 月 1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18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8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6月15日的妥协会议

科伦6月17日。几天前我们对你们说过：你们否认了革命的存在。可是第二次革命会证明革命是存在的。

6月14日的事件⁵⁶不过是第二次革命的第一道闪电，而康普豪森内阁就已经处于彻底瓦解的状态。妥协议会通过了对柏林人民的信任案，把自己交给柏林人民来保护⁵⁷。这是在事后承认了三月战士。议会把制订宪法的工作从内阁手中夺了过来，企图使宪法取得人民的“同意”，因而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一切有关宪法的请愿书和奏摺。这是在事后撤销了它的关于自己有名无实的声明。议会答应通过实际行动，即通过消灭旧建筑的基础，消灭束缚农村的封建关系来着手制订宪法。这就许下了8月3日夜间许下的那一类诺言⁵⁸。

总之，6月15日的妥协议会否定了它自己的过去，正如它6月9日否定了人民的过去一样。它经历了它自己的3月21日⁵⁹。

可是巴士底狱还没有攻下来。

而革命的使徒却不可遏止地、不停地从东方逼近。它已经来到

见本卷第72—74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

托恩 的门前。这就是沙皇。沙皇会拯救德国革命 ,因为他促使德国革命力量集中起来。

写于 1848 年 6 月 1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18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8 号

布拉格起义

科伦 6 月 17 日。波兹南式的血腥大屠杀即将在波希米亚 重演。奥地利的军阀把波希米亚与德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淹没在捷克人的血泊中了。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下令在维舍格勒和格拉德申⁶⁰对准布拉格架设大炮。正在集中军队 ,准备进攻斯拉夫人代表大会⁶¹和捷克人。

人民群众知道了这些作战准备 ,他们跑到公爵府去要武器。他们遭到了拒绝。骚动加剧了 ,愈来愈多的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聚集起来。从司令官官邸对面的旅馆传来了枪声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夫人应声而倒 ,伤势严重。于是立刻发出了攻击命令 ,龙骑兵冲向前去 ,击退了人民群众。但是到处都构筑起街垒来阻击军队。大炮推出来了 ,霰弹向街垒倾泻。血流成河。从 12 日晚上到 13 日早上 ,战斗通宵未停 ,13 日仍在继续进行。最后 ,士兵们控制了广阔的街道 ,迫使人民群众退到不能使用大炮的比较狭窄的街坊。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最后消息。此外 ,据说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在森严的警卫下被押解出城。根据这些消息 ,可以判断军

即捷克。——编者注

队获得了胜利 ,至少是获得了局部的胜利。

不管起义的结果怎样 ,德国人对捷克人进行歼灭性的战争现在仍然是唯一可能的结局。

德国人在他们的革命中必然会因自己过去的一切罪行而受到惩罚。他们已经因这些罪行而在意大利受到了惩罚。在波兹南他们又招致了整个波兰的咒骂。而现在该轮到波希米亚了。

法国人甚至在他们以敌人身分出现的地方都能博得尊敬和同情 ,而德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不到尊敬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不到同情。甚至在他们以慷慨的自由传播者的身分出现的地方 ,人们也总是辛辣地嘲笑他们 ,鄙弃他们。

理应如此。一个民族在它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甘愿把自己变成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工具 ,这样的民族必须首先证明它真正成了革命的民族。但是它不应该用两三次不彻底的革命来证明这一点 ,因为这种革命除了用另一种形式来保持先前的犹豫不决、软弱无力和互不往来以外 ,并没有什么别的结果 ,因为在进行这种革命的时候拉德茨基仍然在米兰 ,科隆布和施泰因埃克尔仍然在波荡南 ,文迪施格雷茨仍然在布拉格 ,许泽尔仍然在美因兹 ,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革命的德国本来应该抛弃自己过去的一切 ,特别是对于邻国的人民。它本来应该在自己获得自由的同时 ,也让一向受它压迫的人民获得自由。

然而革命的德国是怎样做的呢 ? 它完全同意德国军阀过去对意大利和波兰的压迫 ,以及现在对波希米亚的压迫。考尼茨和梅特涅的话完全被证实了。

然而德国人却要求捷克人信任他们 !

然而德国人却责备捷克人,说他们不愿意同一个一方面在解放自己、另一面却在压迫和侮辱其他民族的民族联合起来!

德国人责备他们,说他们拒绝派代表参加我们那个可怜的、怯懦的、害怕自己权限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德国人责备他们,说他们背弃了软弱无力的可怜的奥地利政府,这个政府的存在似乎仅仅是为了确定奥地利的解体,它不仅不能预防奥地利的解体,而且造成了奥地利的解体,这个政府非常软弱,它甚至不能使布拉格摆脱文迪施格雷茨的大炮和士兵的袭击!

但是最令人惋惜的是勇敢的捷克人自己。不管他们将获得胜利还是将被击溃,反正他们是要灭亡的。德国人4个世纪的压迫(这种压迫现在仍以巷战的形式在布拉格继续进行)迫使捷克人投入了俄国人的怀抱。在最近(可能过几个星期)就要爆发的西欧和东欧之间的伟大斗争中,不幸的命运将把捷克人推到俄国人方面去,推到反对革命的专制制度方面去。一旦革命取得胜利,捷克人将首先被革命摧毁。

使捷克人招致这种灭亡的结局,仍然应该归罪于德国人,因为德国人把他们出卖给俄国人了。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17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6月18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18号

瓦德涅尔的被捕。——泽巴尔特

科伦。大家知道，柏林妥协议会已经延期讨论温采利乌斯就逮捕特利尔区的议员维克多·瓦德涅尔一事所提出的质问。这有什么根据啊！因为在旧普鲁士的立法档案中，是找不到任何有关人民代表不可侵犯的法律的；同样，在普鲁士历史的废纸堆中当然也找不到人民代表本身。既然如此，在遵守国家法律的那种口实下来抹煞一切革命成果，就不费吹灰之力了！革命所提出的明显的要求、需要和权利，当然不可能获得立法的批准，因为立法的基础正是被革命本身所摧毁的。普鲁士人民代表的不可侵犯性，从普鲁士人民代表存在的时候起就存在了。或许，整个妥协议会的存在是由某一个警察总监或某一个高等审判厅的怪脾气来决定的吧！自然，茨魏费尔、赖辛施佩格以及其他那些把每一个政治问题变为程序问题的争论并且没有忘记利用瓦德涅尔事件来表现细小的吹毛求疵利巨大的奴才根性的莱茵的律师们，是完全可以不受这种偶然性的影响的。

我们不妨乘这个机会来问问赖辛施佩格第二先生：是否已经预定由赖辛施佩格先生代替那位应当从1848年7月1日起领取养老金而退休的沙贝尔格先生来担任科伦议会议长的职位？

瓦德涅尔在乘邮车到将要举行法兰克福议会议员选举的美尔茨去的时候被捕了。瓦德涅尔有把握获得大多数选票。要阻挠这

次预期会产生令人不快的结果的选举,最好的办法就是逮捕候选人!为了做得彻底,政府没有把瓦德涅尔的代理人格莱夫召来,虽然后者提出了要求,这样一来,政府不喜欢的6万个居民便失去了代表。我们建议格莱夫先生根据自己的代表权到柏林去。

最后,我们把御任县长和特利尔市市长、全能的泽巴尔特先生的警告转载在下面,它最能说明特利尔的状况。

警 告

一连好几个晚上,在城市的广场和街道上人们成群结队,人数特别众多;这引起一些胆怯的人的忧虑,他们耽心有人在准备违法的发动。我并不是这十来个胆怯的人中间的一个,如果街道交通不遭到破坏,我也许能忍受这种情形。可是,如果出乎意料之外,某些幼稚的人竟打算用下流的行为和侮辱性的嘲笑来破坏街道交通,那末我要坚决劝告优秀的公众立刻远离那些幼稚的人,因为在严重破坏秩序的情况下会采取严肃的措施,如果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肇事者逍遥法外,粗心大意的人反而遭殃,我将感到惋惜。

御任县长和市长

参 政 官 泽巴尔特

1848年6月16日于特利尔

这位高官表现得多么仁慈,多么象一个家长!

“如果街道交通不遭到破坏,他也许能忍受这种情形。”泽巴尔特先生的容忍精神多好啊!

胆怯的人在耽心发动。特利尔的独裁者没有具备胆怯的特性。但是,他必须表现出自己的威力,必须把胆怯的人的荒诞的幻想变成正式发表的猜疑,同时威胁说在严重破坏秩序的时候要采取严肃的措施。

这位大人物把严肃同仁慈结合得多么令人惊异！在这种严肃而仁慈的预见的保护之下，特利尔的优秀居民可以高枕无忧了。

写于 1848 年 6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19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9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6月17日的妥协会议

科伦6月19日。“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这句话既适用于康普豪森内阁,也适用于波旁王朝。

6月14日,因妥协派背弃革命而愤怒的人民冲进了军械库。他们想获得某种保障来反对妥协议会,他们知道,最好的保障就是武器。军械库被攻占了,人民武装起来了。

攻占军械库是没有直接结果的事件,是半途而废的革命,但它却产生了以下的后果:

(1)吓得发抖的议会撤销了昨天的决议,声明把自己交给柏林居民来保护;

(2)它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背弃了内阁,以46票的多数否决了康普豪森的宪法草案;

(3)内阁立即开始全面瓦解,大臣卡尼茨、施韦林和奥尔斯瓦特都辞职了(到现在为止,其中只有卡尼茨已决定要由施莱根施坦来代替),而康普豪森在6月17日才向议会请求3天的期限来补充他那分崩离析的内阁。

这一切都是攻占军械库的后果。

正当人民自我武装的后果这样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政府却胆敢指责人民的这种行动。正当议会和内阁承认起义的时候,对参加起义的人却进行法庭审讯,用旧普鲁士法律来对付他们,在议

会的会议上侮辱他们,把他们说成是普通的小偷!

就在吓得发抖的议会把自己交给攻占了军械库的战士们来保护的那一天,格里斯海姆(陆军部委员)和泰梅(检察官)两位先生却下令把这些战士宣布为“暴徒”和“强盗”。被革命从流放中召回的“自由主义的”泰梅先生,开始对继续革命的人进行严厉的审讯。科尔恩、勒文宗和乌尔班都被逮捕了。在全柏林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正确地估计了局势,立即了解到必须放弃军械库的纳茨梅尔上尉用和平撤退的办法使普鲁士避免了新的革命,使大臣们摆脱了极大的危险,这个人却被交给军事法庭,军事法庭根据军法将他判处死刑。

妥协派在这一场虚惊之后也恢复了常态。他们象在6月9日背弃了街垒战的战士一样,在6月17日的会议上背弃了攻占军械库的战士。在6月17日的会议上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康普豪森先生向议会声明:现在他要向议会说明全部情况,使议会能够做出决定,是否需要因攻占军械库事件而对内阁起诉。

当然,要控告大臣们是有理由的,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容许了攻占军械库,而是因为他们狡猾地把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人民的武装化为乌有而引起了这个事件。

继康普豪森先生发言的是陆军部委员格里斯海姆先生。他对军械库中的武器,即对“普鲁士独有的秘密,完全新式的”步枪,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武器和其他一切名贵的东西作了详尽的描写。他这样描绘军械库的警卫组织:楼上有250个士兵,楼下有市民自卫团。他指出:作为整个普鲁士国家主要武库的这个军械库的武器收发工作,就是在三月革命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中断过。

格里斯海姆先生说了上面这一段开场白,想以此来博得妥协

派对于军械库这个极其有趣的机构的同情,然后他才谈到6月14日的事件。

他说,有人经常使人民注意军械库,注意武器的发送情况,并且提醒人民,说什么武器是属于他们的。

可是要知道,武器确实是属于人民的,这首先是因为,它是全民的财产,其次,它是人民所争得的有保证的武装权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格里斯海姆先生“可以肯定地担保说:是人民队伍首先向市民自卫团射击的。”

这种武断简直和三月间“17名被害士兵”的传奇一模一样。

格里斯海姆先生接着叙述人民怎样冲进军械库,市民自卫团怎样撤退,当时“100支最新式的步枪怎样被窃走,这是不可补偿的损失”(1)有人劝纳茨梅尔上尉撤退,即劝他“违背自己的职责”;于是军队就撤退了。

当陆军部委员先生在他的报告中谈到下面这一段话的时候,这位老普鲁士人感到非常痛心,因为人民玷污了旧普鲁士的圣地。请听一听他是怎样说的:

“就在那军械库的楼上房间里发生了真正骇人听闻的事情:人们在那里盗窃、抢劫和破坏。新的步枪被扔到楼下,摔成碎块。无价的古物、用银子和象牙镶嵌的步枪以及精心制作而很难修复的炮的模型都被破坏了。用人民的鲜血换来的战利品和有关民族荣誉的旗帜也遭到了破坏和亵渎!”(全场愤怒,喊声四起:呸,呸!)

老武士对于人民的轻举妄动所表示的这种愤怒给人留下了真正可笑的印象。人民对旧的尖顶盔、后备军士兵的军帽和其他“无价的”废物干出了“真正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们把“新的武器”往楼

下扔！据在服役中白了头发的陆军中校看来，这是怎样一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呵，因为他只能在军械库中以敬仰的心情静观“新的武器”，而他的团队在操练时用的却是陈旧不堪的步枪！人民毁坏了炮的模型！格里斯海姆先生是不是要求人民在革命的时候戴上柔软的羊皮手套呢？然而最可怕的是旧普鲁士的战利品遭到了亵渎和破坏！

格里斯海姆先生在这里向我们叙述的这个事实证明柏林人民在6月14日表现了完全正确的革命机智。柏林人民踩坏了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中夺得的旗帜，从而否认了所谓解放战争。德国人在自己的革命中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自己的整个可耻的过去决裂。

可是，旧普鲁士的妥协派议会当然要对这种行为大喊“呸！呸！”因为这种行为意味着人民的第一次革命发动，意味着人民不仅反对自己的压迫者，而且也反对自己过去的美妙幻想。

尽管这种亵渎神圣的行为引起了格里斯海姆先生的勃然大怒，但是他并没有忘记指出：这整个事件“使国家损失了5万塔勒和可以装备几个营的武器”。

他接着说：

“攻击军械库根本不是为了要武装人民。武器以极低的价钱卖掉了。”

在格里斯海姆先生看来，攻占军械库不过是一些盗窃枪支来换钱买酒喝的小偷所干的事情。可是“强盗们”为什么偏偏要抢劫军械库，而不抢劫珠宝商的富有的店铺来换钱呢，关于这一点，陆军部委员认为没有解释的必要。

“对倒霉的（1）上尉之所以表示深切的同情，是因为据说他为了不让市民流血而违背了自己的职责；不仅如此，人们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值得赞扬

的和值得感谢的；甚至今天还有代表团去访问他，并且要求承认这是一种值得全国感谢的行为。（愤慨）这就是以陪审员施拉姆为首的各个俱乐部的代表。（右派表示愤怒和发出“呸！”的喊声）毫无疑问，上尉违背了士兵的首领职责——他违背没有特别命令不得擅自离职守的明确指示，放弃了自己的岗位。有人曾经怂恿他，说只有他撤退才能拯救王座，说全部军队似乎已经离开城市，国王已经从波茨坦逃跑。（愤慨）他和1806年的一个要塞司令的做法一样，那个司令不去保卫委托给他的要塞，而把它轻易地交给了敌人。至于有人认为他以撤退防止了市民的流血，那末这种意见自然是站不住脚的；谁也不会受到丝毫的损伤，因为他正是在赶来援助他的一个营的其余部分已经临近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的岗位的。”（右派大喊“妙极了”，左派则发出嗤嗤声。）

显然，格里斯海姆先生又忘记了：正是纳茨梅尔上尉的坚毅沉着的精神使柏林避免了新的武装斗争，使大臣们摆脱了极大的危险，使君主政体避免了灭亡。格里斯海姆先生原来又是一个典型的陆军中校，他在纳茨梅尔的行动中只看出破坏从属制度，胆怯地离开自己的岗位，按照著名的1806年的旧普鲁士方式来说，是叛变行为，此外没有看出任何别的东西。君主制度的救命恩人，应当被判处死刑。这对整个军队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而在格里斯海姆先生说这一番话的时候，议会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议会充当了他的愤怒的回声。左派最后用嗤嗤声来表示抗议。一般地说，柏林左派的态度愈来愈怯懦，愈来愈含糊了。在6月14日夜里，当人民由于孤立无援很快就要失去他们已经争得的优势的时候，当人民为了获得彻底胜利仅仅缺少领袖的时候，这些在选举中曾经利用过人民的先生们在什么地方呢？贝伦兹、荣克、埃尔斯纳、施泰因、赖辛巴赫这些先生们当时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不是呆在家里苟且偷安，就是向大臣们递交不关痛痒的呈文。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不敢保护人民不受政府委员们的诽谤和侮辱。没

有一个演说家出来说话。没有一个人愿意对曾经给他们带来初次胜利的人民发动负责。他们只敢发出嗤嗤声！这是什么样的英雄气概呵！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19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6月20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20号

施图普的修正案

科伦 6 月 20 日。科伦的施图普先生对于议员不可侵犯的法律提出了修正,这种修正虽然没有在妥协议会上讨论过,但是对他的科伦的同伙来说,也许并不是没有兴趣的。我们并不打算剥夺他们充分欣赏这种立法艺术作品的乐趣。

施图普议员的修正案

第 1 条 “对议会议员的投票或以议员资格发表的言论和意见,不得以任何方式追究责任。”

修正:“删去第一行的‘言论’两字。”

理由:“议员有权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足够了。‘言论’还可能包含有对荣誉的侮辱,这种侮辱给了被侮辱者提出民事诉讼的权利。使议员免受这种申诉,我觉得是同议会的声誉相抵触的。”

议员根本用不着发表任何意见,他们只要跺脚和投票就够了。真的,为什么不把“意见”这两个字也勾去呢?要知道,意见必须用“言论”来表达,甚至还可能用“侮辱荣誉的”言论来表达。此外,甚至在“意见”中也可能“包含有”侮辱荣誉的意见。

第 2 条 “在议会存在期间,未经议会批准,不得因某种应受处分的行为控诉或逮捕议会的任何议员,但在当场或者在犯罪后 24 小时内被捕者除外。逮捕欠债的议员,也须经议会批准。”

修正：“删去最后一句话：‘逮捕欠债的议员，也须经议会批准’”。

理由：“在这里存在着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干涉，我认为批准这种干涉是危险的。尽管议会的利益要求在自己中间有这种或那种议员，但我仍然认为尊重个人权利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我们采用这一法律并不是为了将来，即并不是为了将来某一个议院的议员，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假定我们中间有议员担心因欠债而被捕，在这种场合下，如果我们想要依靠我们自己所通过的法律，使我们自己免受债权人的法律追究，那末一定会给我们的选民留下不良的印象。”

或者，正好与此相反！给施图普先生留下了不良的印象：选民把那些可能因欠债而被捕的议员选派到“我们中间”来了。米拉波和福克斯是多么幸运，他们在世的时候还没有施图普法案！使施图普先生有些惶恐不安的唯一困难，就是“议会的利益要求在自己中间有这种或那种议员”。但是，人民的利益究竟谁会去过问呢？这里所议的只是“与世隔绝的团体”的利益，这种团体希望在自己中间有某一个人，而债权人却希望在监狱中看到。这是两种重要利益的冲突呵！施图普先生不妨把自己的修正说得更清楚些：那种负债累累的人，只有得到相当的债权人的允许才能被选为人民代表。债权人随时都可以把他们召回。在高等法院中，议会和政府必须服从国家债权人的最高决定。

对第 2 条的第二个修正：

“在议会开会期间，未经议会同意，当局不得因某种受处分的行为控告或逮捕议会的任何议员，当场被捕者除外。”

理由：“首先，‘议会’这两个字是用做团体的意思，因此，‘议会存在期间’这种说法是不适当的，所以我建议改为‘议会开会期间’。

把‘应受处分的行为’这个用语改为‘受处分的行为’更为妥当。

我坚持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应排除因受处分的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诉讼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会允许自己干涉个人权利。因此，也建议加上‘当局’两

个字。

如果保留‘或者在最近 24 小时内等等’补充意见,那末法官就能在犯某种罪行之后 24 小时内逮捕任何一个议员。”

法律草案保证在议会存在期间不得侵犯议员,施图普先生的修正则保证“在议会开会期间”,即在一昼夜的 6 小时内,至多在 12 小时内不得侵犯议员。多么聪明的理由呵!可以议开会期间,而不可以讲团体存在期间!

施图普先生不想允许当局未经议会同意而控诉或逮捕议员。也就是说他允许自己干涉刑法。民事诉讼方面的控诉,却是另一回事!只是不得干涉民法!民法万岁!原来私人倒应该得到国家所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民事诉讼高于一切!民事诉讼就是施图普先生的固定观念。民法就是摩西和预言者的圣诫!对着民法,特别是对着民事诉讼发誓吧!人民,尊崇最神圣的东西吧!

没有私法对公法的干涉,可是常常有公法对私法的“危险的”干涉。一般说来,既然我们有了 Code civil⁶²〔民法典〕、民事法庭和律师,还需要宪法干什么呢?

第 3 条 “对议会议员的一切刑事控诉和一切监禁,在开会期间应一律停止,如果议会要求这样做的话。”

对第 3 条拟从措词上作如下的修正:

“对议会议员的一切刑事控诉和一切因控诉而发生的逮捕,如果并不是根据法庭的决定进行的,都必须立即停止,只要议会决定这样做的话。”

理由:“我认为不应把那些已经根据法庭的决定判处监禁的议员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如果这个修正一旦被采用,那末它也适用于那些因欠债而被监禁的人。”

难道议会可以有削弱“法庭的决定的力量”或者甚至把那种因欠债而被“监禁”的人拉到自己中间去的犯罪意图吗？施图普先生浑身发抖，他简直不能容忍民事诉讼和法庭的决定受到这样的侵害。关于人民主权的一切问题现在也都得到了解决。施图普先生宣布了民事诉讼和民法的主权。不要这样的人司掌民法，而把他抛到立法权的从属范围中去，这是多么残酷无情呵！有主权的人民干出了这种“危险的”干涉“私法”的事情。因此，施图普先生对人民主权和公法提出民事诉讼。

而尼古拉皇帝却能够安静地退却。在第一次企图越过普鲁士边境的时候，施图普议员就一手拿着“民事诉讼”，一手拿着“法庭的决定”出来欢迎尼古拉。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战争，什么叫做战争？是对私法的危险的干涉！是对私法的危险的干涉！

写于 1848 年 6 月 2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21 日
“新莱茵报”第 21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在波兹南的新政策

科伦 6 月 20 日。在波兹南问题上又发生了新的转变！在崇高的诺言和热烈的宣言的阶段以后，在维利森的阶段以后，是发射霰弹、打烙印和剃光头⁶³的普富尔阶段，是血腥的屠杀和俄国人的野蛮行为的阶段。现在，在普富尔的阶段以后，新的调和的阶段开始了！

事与愿违，波兹南的总参谋长、屠杀和打烙印的主要参加者奥尔堡少校突然被调到另一个地方去了，科隆布将军也从波兹南调到科尼斯堡去了。普富尔(硝酸银)将军奉召赴柏林，博伊尔曼总督已经到达柏林了。

这样一来，波兹南就完全被那些带着打烙印用的硝酸银和手持剃刀的骑士所抛弃了，被那些从安全的掩护物后面在距离 1 000 步和 1 200 步的地方用榴霰弹杀害以镰刀武装起来的没有自卫力的农民的勇士所抛弃了。仇恨波兰人的德国犹太人在战栗，象过去的波兰人一样，他们现在看到政府把他们出卖了。

康普豪森内阁恍然大悟了。俄国人侵犯的危险现在向它指出，它使波兰人遭到官僚和波美拉尼亚后备军的蹂躏，是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现在它想不惜任何代价重新博得波兰人的同情，但是现在已经太迟了！

用各种残酷手段和野蛮行为(这使德国人蒙受永久的耻辱)对

波兰人进行整个毁灭性的流血战争,波兰人对我们抱着正义的不共戴天的仇恨,现在俄波两国必然要结成反德同盟(由于这个同盟,革命敌人的力量增加了 2 000 万勇敢的人民),——所以发生了和干出了这一切事情,难道只是为了让康普豪森先生最后有机会来嘟哝他的 *pater peccavi*(父亲,我犯了罪)吗?

难道康普豪森先生认为,现在当他需要波兰人的时候,他能够用甜言蜜语和各种让步来重新博得他们的已经淹没在血泊中的同情吗?难道他认为,手上打上烙印的人们会随时为他作战吗?剃光脑袋的人们会为他把自己的脑袋放在俄国的马刀下吗?难道他真的认为,他随时都能率领那些幸免于普鲁士的榴霰弹的人们来反对俄国的霰弹吗?

难道康普豪森先生认为,在他毫不含糊地亲口承认自己的无用以后,他还能继续执政吗?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6 月 20

原文是德文

日载于 1848 年 6 月 21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1 号

康普豪森内阁的垮台

科伦 6 月 22 日。

“不管太阳多么亮，
它总是要落的。”⁶⁴

染满了波兰热血的 3 月 30 日⁶⁵的太阳也落下去了。

康普豪森内阁曾经给反革命穿上他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服装。现在反革命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扔掉这副累赘的假面具。

一个无生命力的中间派左翼的内阁也许可以代替几天 3 月 30 日的内阁。但是它的真正继承者却是普鲁士亲王内阁。荣誉属于康普豪森，他赐给封建专制政党一个天然的首领，赐给自己一个继承者。

为什么还要继续同资产阶级保护人周旋呢？

难道俄国的军队不是驻扎在东方边境上，而普鲁士的军队驻扎在西方边境上吗？难道波兰人没有准备好用霰弹和硝酸银来替俄国宣传吗？

难道没有采取一切措施，准备象轰击布拉格一样，来轰击莱茵省的几乎所有的城市吗？

在丹麦的和波兰的战争中，在军队同人民之间的一系列小小的冲突中，难道军队没有足够的可能性使自己变为横行霸道的暴兵吗？

难道资产阶级没有厌倦革命吗？难道反革命将把自己的教会建立在上面的岩石(英国)不是巍然耸立在海洋之中吗？

康普豪森内阁还企图乞求一点声望，它断言内阁离开国家活动的舞台是由于受骗，想以此来博得社会的同情。果然，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受了骗的骗子手。为了给大资产阶级效劳，康普豪森内阁必须竭力用欺骗的手段来消灭革命的民主成果；在同民主派的斗争中，它必须同贵族政党结成联盟，并成为这个政党的反革命野心的工具。贵族政党充分壮大了，于是就抛弃了自己的保护者。康普豪森先生根据大资产阶级的精神播种了反动的种子，而根据封建政党的精神收获了反动的果实。这就是这个人的善意，这也就是他的厄运。对于失望的英雄，即使一点声望也是好的！

即使一点声望也是好的！

不管太阳多么亮，
它总是要落的。

但是它又从东方升起。

写于 1848 年 6 月 2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23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3 号

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 的第一件事迹

科伦。德国国民议会终于稍微动起来了。它终于通过了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的决议：它干预奥意战争。

而它是怎样来进行干预的呢？它宣布了意大利独立吗？它已派遣信使把命令送到维也纳，要拉德茨基和韦尔登立即撤退到伊宋佐后面去吗？它向米兰临时政府⁶⁶致过贺词吗？

没有的事！它声明说，它将把对的里雅斯特的任何攻击看成是宣战的理由。

这就是说，德国国民议会，在联邦议会的欣然同意下，允许奥地利人在意大利横行霸道，掠夺屠杀，允许他们把大量燃烧弹扔向每一个城市，扔向每一个村庄（参看本报意大利栏），然后安全地退到德意志联邦的中立地区！它允许奥地利人随时从德国的土地上派克罗地亚人和潘都尔兵⁶⁷去蹂躏伦巴第，但是却要禁止意大利人追击躲避在隐蔽所中的被击溃的奥地利人！它允许奥地利人从的里雅斯特封锁威尼斯，封锁皮阿味、布林塔、塔腊门托各个河口，可是却严禁意大利人对的里雅斯特进行任何敌对行动！

德国国民议会通过这样的决议，说明它的胆怯行为已经是无以复加了。它没有足够的勇气公开批准对意大利作战，它更没有勇气禁止奥地利政府进行这种战争。在这种困难的情形下，它通过了

(并且发出了赞成的叫喊声,以使用震耳的喧嚣声来抑制内心的不安)关于的里雅斯特的决议;从形式上看,这个决议既不赞成也不谴责反对意大利革命的战争,但实质上却是赞成这个战争的。

这个决议是对意大利的间接宣战,而这种宣战对德国这样一个有4 000万人的民族说来是特别可耻的。

法兰克福议会的决议在整个意大利引起了愤怒的风暴。哪怕意大利人只有一点自豪感和毅力,他们也会用炮轰的里雅斯特和进军布伦纳来回敬。

法兰克福议会在盘算,而法国人民却在部署。威尼斯向法国请援;在这个决议之后,法国人也许很快就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莱茵河畔看到他们。

有一个议员谴责法兰克福议会毫无作为。恰恰相反,它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使我们在北方进行一个战争,在南方进行另一个战争,而西方和东方的战争也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我们面临着一幅令人愉快的景象:既进行反对沙皇的斗争,又进行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斗争,既进行反对反动派的斗争,又进行反对革命的斗争。国民议会还关心让俄国、法国、丹麦和意大利的士兵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中举行一次会面。可是有人还说议会毫无作为!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22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6月23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23号

汉泽曼内阁

科伦 6 月 23 日。柏林的内阁危机有了新的转变！我们的汉泽曼受命组阁，他同旧内阁的残骸，同帕托夫、博奈曼、施来尼茨和施莱根施坦一起不胜感激地投入了中间派左翼的怀抱。洛贝尔图斯先生应当加入这个新的联合，以中间人的身分来为康普豪森内阁的悔悟的残余分子谋取中间派左翼的恩典和宽恕。

由于洛贝尔图斯先生的关照，我们普鲁士的杜沙特尔看到了他那梦寐以求的愿望的实现——他就要做内阁首相了。康普豪森的月桂冠曾使得他夜寐不眠，现在，他终于将要有可能来证明，当他可以舒展双翅的时候，他能够干出怎样的事迹来。现在我们可以赞美他那宏大、辉煌的财政计划，赞美他那些无穷无尽的消灭一切贫困的方案——他曾向他的议员们大肆吹嘘过的那些草案。只是现在他才能把他过去以铁路工作者的身分以及在其他活动场所光辉灿烂和卓有成效地发挥过的才干全部贡献给国家。只是现在才纷纷提出了对内阁的信任问题！

汉泽曼先生胜过了他的原型：由于洛贝尔图斯先生的自我牺牲精神，他做了内阁首相，而杜沙特尔则始终没有做过。但是我们要警告他。杜沙特尔显然是有理由经常居于第二位的。杜沙特尔知道：国内多少有教养的等级，不论在议会内或者在议会外，都需要有善于“雄辩”、长于词令的英雄，都需要有一个象基佐或康普豪

森那样的人,这种人在任何场合都善于用相应的论据、哲学推论、政治理论以及其他空洞词句来麻醉所有听众的良心和博得他们的同情。杜沙特尔甘愿把内阁阁揆职位的荣誉让给口若悬河的思想家。徒有其表的光辉对于他并没有什么价值,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掌握实权。他知道:他在哪里,那里就有实权。汉泽曼先生企图采取别的行动,当然,这一点他自己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我们再说一遍:内阁阁揆职位对于杜沙特尔是一个不适合的位子。

然而,当我们想到汉泽曼先生很快就会从他那令人头晕目眩的高位上摔下来的时候,我们感到十分悲伤。因为汉泽曼内阁还在未组成之前,还在连片刻的生存乐趣都未能享受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要灭亡。

“刽子手就站在门外”⁶⁸;

反动派和俄国人在叩门,不等鸡鸣三遍汉泽曼内阁就要垮台,即使有洛贝尔图斯和中间派左翼撑腰也无济于事。那末再见吧,内阁阁揆职位,再见吧,财政计划和消灭贫困的宏伟方案,这一切都将付之流水,而汉泽曼先生如果能安然回到他那平凡的资产阶级的老窠,并能细心地玩味人生若梦这句话,那倒是万幸了。

写于 1848 年 6 月 2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24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4 号

“新柏林报”论宪章派

科伦 6 月 23 日。“新柏林报”⁶⁹在它的第 1 号中向我们报道了英国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物以稀为贵。“新柏林报”至少有这样一个功绩：它完全按新的方式来描述英国的状况。它首先这样写道：

“看来，奥康瑙尔真的是个既无智慧又无骨气的人，在这里根本不受人尊敬。”

我们不打算评比奥康瑙尔的智慧 and 骨气是否同“新柏林报”一样多。就这些优点而论，古爱尔兰国王的后裔，大不列颠无产阶级的领袖也许不如这个有教养的柏林女人；至于尊敬，你这个有教养的柏林女人当然说得很对：就象所有的革命者一样，奥康瑙尔也是名声扫地的，他从来不会象你在第 1 号报纸中那样，善于博得所有善意的人的尊敬。

这位柏林女人继续写道：

“奥康奈尔说过：他（奥康瑙尔）虽然有毅力，但是缺少逻辑。”

这又是妙不可言的。已故的丹 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的毅力的逻辑在于：他每年从自己的穷老乡们的口袋中榨取 3 万镑的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丹尼尔·奥康奈尔。——编者注

地租；奥康瑙尔的鼓动的逻辑只能使一个声名狼藉的宪章主义者出卖自己的全部地产。

“宪章派中的激进派的第二个领袖琼斯先生(目前法院正在通缉他,但无论在哪里也找不到他)甚至找不到一个愿意为自己花 1 000 镑的保人。”

这是极有教养的柏林女人的第三条新闻。这几句话包含着三种极其可笑的说法:第一,当法庭还在通缉某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谈不上保证;第二,厄内斯特·琼斯先生已经在纽盖依特⁷⁰待了两个星期,而且,不久以前,当所有的英国资产阶级报刊都为琼斯的被捕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有教养的柏林女人大概被随便邀请到某一个极有教养而知识渊博的同事那里去喝了一杯茶;第三,琼斯先生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愿意为他支付 1 000 镑押金的人,即找到了那个既无智慧又无骨气的奥康瑙尔,可是法院以国会议员不能当保人为理由拒绝了奥康瑙尔。

最后,“新柏林报”扬言,说什么英国小城市中的宪章派往往自相残杀。亲爱的柏林女人,你稍微浏览一下随便哪种英国报纸吧!那时你就会看到,对宪章派说来,殴打警察从来就比自相残杀痛快得多。

我们建议我们的读者特别注意充满智慧和骨气的“新柏林报”。

写于 1848 年 6 月 2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24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4 号

“盖尔温努斯报”⁷¹的威胁

科伦 6 月 24 日。

“如果法兰克福议会及其宪法规定的威信能够箝制法国 ,那还不太要紧 ;普鲁士将从它的东方各省恢复它的威信 ,同时 ,看来它大概不会因暂时失去莱茵省而畏缩不前。”(见 6 月 22 日“盖尔温努斯报”)

教授报的驻柏林记者说得多么巧妙 !普鲁士将从“它的东方各省”恢复它的威信。它在哪儿恢复它的威信呢 ?在东方各省吗 ?绝对不是 ,那里讲的是从东方各省。在莱茵省吗 ?更其不是。因为它在恢复这种威信时指望“暂时失去莱茵省” ,就是说 ,暂时失去它在莱茵省的“威信”。

这样看来 ,它将要在柏林和布勒斯劳恢复它的威信。

可是 ,它为什么不在它的东方的省的帮助下来恢复大概在柏林和布勒斯劳失去的威信 ,而要从它的东方的省来恢复这种威信呢 ?

俄国并不是普鲁士东方的省 ,相反地 ,普鲁士倒是俄国西方的省。但是 ,俄国人将从普鲁士东方的省出发 ,同勇敢的波美拉尼亚人并肩远征索多玛和哥摩拉 ,并将重新恢复普鲁士的“威信” ,即恢复普鲁士王朝、专制王权的威信。从专制制度被迫把一块染满平民鲜血的“写满字的纸片”⁷²放在自己和自己的人民之间的那一天起 ,从宫廷被迫接受做谷物和羊毛生意的资产阶级商人⁷³的保护

和监视的那一天起,这种“威信”就已丧失了。

由此可见,朋友和救星都来自东方;为什么要把军队集中在东方边境呢?敌人来自西方,因此,军队就应当集中在西方。“科伦日报”⁷⁴驻柏林的幼稚无知的记者,不懂得波兰人的勇敢的朋友普富尔的英雄气概,他承担了到彼得堡去的使命,但在他的背后并没有10万大军保护。普富尔大胆地到彼得堡去!普富尔已经到了彼得堡,普富尔不怕越过俄国国境,而德国的公众则在纷纷谈论集中在德国边境上的俄国军队!“科伦日报”的记者怜悯德国的公众。可是,我们还是来谈谈我们的教授权!

如果俄国人迅速从东方帮助普鲁士王朝,法国人就会赶忙从西方帮助德国人民。而“法兰克福议会”就能安静地继续辩论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规定”。“盖尔温努斯报”的记者用华丽的词藻掩盖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法兰克福议会及其宪法规定”将要“箝制”法国。普鲁士将要失去莱茵省。可是它为什么因这种损失而畏缩不前呢?要知道,这种损失不过是“暂时的”。德国的爱国主义将再一次在俄国人的指挥下远征拉丁系的巴比伦,同时将在莱茵省和整个德国南部永久地恢复“普鲁士的威信”。呵,你真是有个有先见之明的天使!⁷⁵

如果普鲁士不会“因暂时失去莱茵省而畏缩不前”,莱茵省就更不会因“永久”失去普鲁士的统治而畏缩不前。如果普鲁士同俄国人结成同盟,德国人就会同法国人结成同盟,并同他们一道进行西方反对东方的战争,进行文明反对野蛮的战争,进行共和制度反对专制制度的战争。

我们希望德国统一,但是这种统一的因素只有从德意志大君主国瓦解中才能分离出来。这些因素只有在战争和革命的风暴中

才能结合在一起。只要事变一提出专制制度还是共和制度的口号，立宪主义就会自行消失。主张立宪的资产者会愤怒地向我们叫喊：可是，谁使德国人遭到俄国人的威胁呢？除了民主派还有谁呢？打倒民主派！他们说得对！

如果我们自己在本国实行了俄国的制度，我们就既可以使俄国人不必费力气来实行这种制度，也可以给自己节省军费。

写于 1848 年 6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25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5 号

帕托夫赎买法案建议书

科伦 6 月 24 日。在本月 20 日的妥协会议上,即在那次劫数注定的会议上,康普豪森的太阳落下去了,内阁的混乱状态出现了;帕托夫先生提出了有关基本原则的建议书,根据这些原则,他打算在消灭乡村中的封建关系方面有所控制。

读了这个建议书,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旧普鲁士各省中很久以来没有爆发过农民战争。多么繁重的义务、代役租和苛捐杂税,多么混乱的中世纪的名称,一个比一个荒谬!领主权(Lehnsherlichkeit),死亡税(Sterbefall),好家畜使用权(Besthaupt),治疗税(Kurmede),屠宰什一税(Blutzehnt),保护金(Schutzgeld),窝尔普尔吉士税(Walpurgiszins),养蜂税(Bienenzins),蜡租(Wachspacht),世袭大地主侵占的村镇附属地使用税(Auenrecht),什一税(Zehnten),租金(Laudemien),遗产税(Nachschu renten),——所有这一切,直到今天还在“世界上设备最完善的国家”中保存着,而且,如果法国人没有实行二月革命的话,这一切还会永久保存下去!

是的,如果一切事情都按照帕托夫先生的愿望进行,这些义务中的大部分,而且正好是最繁重的部分,就会永久保存下去。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把这个部门交给帕托夫先生掌管,使他尽可能宽容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顽固的容克地主,尽可能

骗取农民的革命成果！

柏林革命已经永远结束了所有这一切封建关系。不言而喻，农民已经立即在实际上废除了这些关系。政府只应当把实际上已经由人民的意志实现的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的事情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可是，在贵族决定来一个 8 月 4 日之前，他们的城堡必然要焚毁。目前的政府由一个贵族为代表出面维护贵族的利益，它向议会提出了一个建议书，要求妥协派现在也要把 3 月间在全德境内爆发的农民革命出卖给贵族。对于在乡村中实施帕托夫先生的原则所产生的后果，政府要负责任。

帕托夫先生希望农民为废除所有一切封建义务（甚至包括租金在内）而缴纳赎金！只有那些由世袭的农奴依存地位、旧的捐税制度和领主裁判权产生的义务，或者那些不给封建主提供任何价值的义务（多么仁慈呵！），换句话说，只有在所有封建重负中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的那些义务，在废除时才不需要缴纳赎金。

反之，一切已由契约或判决调整过的封建义务的赎金仍然有效。这就是说，农民将得不到任何补偿。可是农民在从 1816 年，特别是从 1840 年颁布的有利于贵族的反动法律生效期间，曾经赎买过自己的义务；当时为了封建主的利益，曾经用欺骗的手段，即最初利用法律，后来利用受贿的官吏剥夺了农民的财产。

为了欺骗农民，就需要建立农业银行⁷⁶。

假如一切事情都按照帕托夫先生的愿望进行，那末在他的法律下封建义务不会被废除，就象在 1807 年的旧法律下封建义务没有被赎回一样。

帕托夫先生的计划的真正标题是：“关于用赎金永久保持封建

义务的建议书”。

政府在挑起农民战争。也许普鲁士甚至不会因“暂时失去”西里西亚而“畏缩不前”。

写于 1848 年 6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25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5 号

起义的民主性质

布拉格。每天都有新的消息证明我们对布拉格起义(见本报第18号)的性质的看法是正确的;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德国各家报纸怀疑捷克党为反动派、贵族和俄国等效劳是完全错误的。

人们只看到列奥·图恩伯爵和他的贵族,但没有看到捷克的人民群众——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和农民。有人从贵族在某个时候曾经为了自身的利益和为了音斯布鲁克的权奸的利益而力图利用捷克的运动这一点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已经在1844年做过3天布拉格真正主人⁷⁷的革命的布拉格无产阶级,曾经维护过贵族和整个反动派的利益!

可是:所有这一类带有诬蔑性的言论,最终都为捷克人的第一次坚决的发动所驳倒了。起义的民主性质异那样明显,以致图恩伯爵们不仅没有起来领导运动,而且立即离开了运动,并被人民当作奥地利的人质扣留起来。起义的民主性质是那样明显,以致所有拥护贵族的捷克人都离开了它。起义的目的不仅是反对奥国的暴兵,而且也反对捷克的封建主。

奥地利人攻击人民,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捷克的人民,而是因为他们革命的人民。对于军阀来说,袭击布拉格只不过是一个序

幕,接着必然要焚毁和袭击维也纳。

“柏林阅报室”⁷⁸6月20日的维也纳通讯报道说:

“这里的市民委员会⁷⁹派到布拉格去的代表团今天回来了。该代表团的唯一任务是督促电讯的转达工作,使我们不要再象最近几天那样,日夜等待布拉格的消息。代表团向委员会报告了自己的旅行经过。它报道了暴兵们在布拉格横行霸道的骇人听闻的消息。它简直不能用言语来形容包围、炮轰和袭击这个城市的可怕情形。代表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乘马车从布拉格前面的最后一个火车站到达城里,又冒着同样的危险穿过许多军队到达了布拉格宫。

士兵们到处都用这样的呼声来对待他们:“你们在这儿,维也纳的坏蛋们!你们终于落到我们的手里了!”许多士兵想攻击代表团,甚至军官们的举动也粗暴得难以形容。最后,代表们来到宫殿,瓦尔莫登伯爵拿起委员会签发的授予代表们全权的文件,看了看上面的签字,说道:“皮勒斯多夫,他在我们这里是毫无意义的。”文迪施格雷茨对待穿便服的坏蛋的态度比任何时候都要粗暴,他说:“革命到处都胜利了,但是,这里的胜利者却是我们,任何民政权力我们都不承认。当我在维也纳的时候,那里平安无事。我一离开那里,暴风雨就大作,把一切都给打翻了。”没收了代表们的武器,把他们关在宫殿中的一间房里。两天以后才准许他们离开那里,但是并没有把武器交还给他们。这就是我们的代表们所叙述的情形,这就是布拉格的梯利对待他们的态度,这就是军队的品行,而这里竟还有人在装模作样,仿佛确信这不过是反对捷克人的斗争!可是,难道代表们说的是捷克话吗?难道他们不是穿的维也纳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吗?难道他们没有呈交内阁和从政府那里获得立法权的市民委员会发给他们的全权证书吗?

但是,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太大了。文迪施格雷茨认为他是能阻碍革命的唯一人物。有人在象枪杀狗一样枪杀捷克人,并且还在伺机反对维也纳。为什么文迪施格雷茨要释放列奥·图恩,即释放那个领导布拉格临时政府、甚至鼓吹波希米亚独立的图恩伯爵呢?试问,为什么要把他从捷克人手中释放出来呢?不是由于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同贵族勾结起来煽动起义的阴谋诡计,又是由于什么呢?

列车在前天已从布拉格开出了。这次列车载走的是德国避难的大学生、纳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一些从布拉格逃出来的家庭,显然他们感到布拉格的秩序虽然已经恢复,但毕竟不太安全。在开出布拉格后的第一个车站上,那里的哨兵要求所有的乘客一律交出武器;在这个要求被拒绝后,士兵们就向所有的车厢开火,射击没有自卫力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从车厢里抬出了6具尸体,乘客们揩去了沾在自己脸上的死者的血。在这里被极力描绘成德国自由的天使和保卫者的暴兵,就是这样来对付德国人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6 月 24 日

载于 1848 年 6 月 25 日
“新莱茵报”第 2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交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
“历史问题”杂志 1955
年第 11 期

巴黎消息

科伦 6 月 24 日晚 10 时。23 日的巴黎邮件没有收到。据到达这里的信差说 ,当他离开巴黎的时候 ,群众跟国民自卫军的厮杀已经开始了 ,在离城不远的地方他曾听到猛烈的炮声。

写于 1848 年 6 月 24 日

载于 1848 年 6 月 25 日

“新莱茵报”第 25 号的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巴黎消息

科伦 6 月 25 日晚 10 时。巴黎的邮件又没有收到。今天来的巴黎报纸还是 23 日的,要是邮局工作正常,报纸早在昨天晚上就该送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拥有的唯一资料就是比利时报纸上的那些含混不清、矛盾百出的报道,以及我们自己关于巴黎的知识。据此,我们力求尽量忠实地向读者描述一下 6 月 23 日起义的情况。

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作更进一步的评述。我们对这一事件的详细论断以及有关巴黎议会 23 日会议的较完全的评论,将在明日报道。

写于 1848 年 6 月 25 日

载于 1848 年 6 月 26 日

“新莱茵报”第 26 号的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6月23日事件的详情

起义带有真正工人起义的性质。工人的怒火喷向政府和议会，因为它们辜负了工人的期望，天天采取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工人的新措施，解散了卢森堡宫工人委员会，限制国家工厂的活动，颁布了禁止集会法⁸⁰。事件的一切详情都说明起义是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性质的。

林荫路(巴黎的主要命脉)首先成了群众聚集的场所。从圣丹尼门往下到维耶·杜·坦普尔大街这一段挤满了人群。国家工厂的工人声明不到索隆去，不到那里的国家工厂去；另一些人在讲，他们昨天往那里去，可是在枫丹白露关卡附近便被拦住，他们在那里等待前一天晚上答应发给他们的通行证和离境令，但终归无效。

10点钟左右，发出了构筑街垒的号召。巴黎的东区和东南区(从包松涅尔市区和包松涅尔郊区起)很快就筑起了街垒，但是看来这些街垒筑得还相当紊乱，没有总的计划。圣丹尼街、圣马丁街、兰布托街、佛布尔-包松涅尔街和塞纳河南岸通向圣雅克郊区和圣马索郊区的要冲——圣雅克街、拉哈普街、拉-尤舍特街以及毗连的桥梁上大体上都修起了防御工事。街垒上竖起了旗帜，旗帜上有的写着“没有面包，不如死亡！”有的写着“没有工作，不如死亡！”。

可见，起义无疑是以主要是工人居住的城市东部地区为根据

地,就是说,首先是依靠圣雅克、圣马索、圣安东、坦普尔、圣马丁和圣丹尼这些郊区,即依靠《aimables faubourgs》[“可爱的郊区”]⁸¹,其次是依靠介于这些郊区之间的市区(圣安东市区、马勒市区、圣马丁市区和圣丹尼市区)。

街垒刚筑好,紧接着就开始了小的接触。朋努威尔林荫路上的哨岗由别动队⁸²把守着,这个哨岗几乎在每次革命中都是首当其冲的。群众解除了这个哨岗的武装。

但是不久,西区的资产阶级自卫军就开来救援。他们又占领了哨岗。另一队占据了吉姆纳兹大剧院前的人行道,这是一个能控制相当长一段林荫路的制高点。群众打算解除几个前沿哨岗的武装,但是双方暂时都还没有使用武器。

最后,接到了攻取构筑在圣丹尼门附近林荫路中间的街垒的命令。国民自卫军在警察署长带领下向前挺进,谈判开始了;忽然响起了几下枪声,但不知道是哪一方开的枪,于是双方立刻开始射击。

接着,朋努威尔那边的哨岗也马上开始射击。第二军团的那个占领着包松涅尔林荫路的营也携带实弹的枪支前进。群众四面受敌。国民自卫军从有利的、有些地方很安全的阵地上对工人进行猛烈的交叉射击。工人坚持了半个钟头;最后,整条朋努威尔林荫路以及由此直到圣马丁门的街垒全被夺去了。到11点钟,国民自卫军在这个地区又夺下了坦普尔那面的街垒,并占领了通向林荫路的要冲。

攻占这些街垒的英雄是第二区的资产者。第二区以旧皇宫⁸³为起点,包括整个蒙马特尔郊区。在这里居住的尽是维芬街、里舍留街和意大利林荫路上有钱的商店老板,拉菲特街和伯热尔街上

的大银行家和堂甸大道上的生活舒适的食利者。在这里居住的有路特希尔德和富尔德,鲁日蒙·德·罗旺贝和加内龙。总之,这里有交易所、图尔托尼⁸⁴以及和它们有某种关系的一切。

这些英雄们首先受到红色共和国的威胁,而且受到最大的威胁,所以他们首先挺身而出。值得注意的是,6月23日的第一个街垒是2月24日遭到失败的人攻下的。他们以3000人进行攻击,用4个连攻击一辆被翻倒的公共马车。然而,起义者似乎在圣丹尼门附近又巩固起来了,因为大约在中午的时候,拉摩里西尔将军不得不调动一支包括别动队、常备军和骑兵的强有力的队伍,携带两门大炮,协同第二军团(第二区的国民自卫军)夺取防御坚固的街垒。别动队一个排在起义者的猛烈攻击下被迫退却。

圣丹尼林荫路上的战斗是巴黎东部各区中搏斗的信号。这是一场血战。起义者伤亡30人以上。愤怒的工人发誓要在第二天晚上全面发动攻势,同“共和国市近卫军”作殊死战。

11点钟,普朗什-米布雷街(圣马丁街向塞纳河延伸的部分)上也发生了战斗;有一个人被击毙。

在中央市场、兰布托街等等地区也发生了流血冲突。地上躺着四五具尸体。

下午1点钟,帕拉迪-包松涅尔街发生了小接触,国民自卫军开枪射击;结果不详。在包松涅尔郊区,经过流血冲突后有两个国民自卫军下士被解除武装。

圣丹尼街在遭到骑兵冲击后失陷。

午后,圣雅克郊区的战斗非常激烈。圣雅克街、拉哈普街和莫别尔广场上的街垒受到攻击,互有胜负,街垒还遭到了猛烈的霰弹射击。蒙马特尔郊区的军队也开炮轰击。

总之,起义者被击退了。市政厅解围,到下午3点钟,起义的地区只剩下郊区和马勒市区了。

此外,在拿枪的国民自卫军中可以看到少数不穿军服的人(即没有钱购买军服的工人)。可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却带着贵重的武器、猎枪等等。在步兵的行列中也有国民自卫军的骑兵(他们常常是些富家子弟)。在包松涅尔林荫路上,国民自卫军乖乖地让群众解除了武装,然后逃走。

5点钟,战斗还在继续进行,突然倾盆大雨,斗争才暂时停止。

但是在个别地方,战斗一直继续到深夜。9点钟,在巴黎工人的中心——圣安东郊区还能听到枪声。

直到现在,斗争还没有表现出革命决战的全部残酷性。国民自卫军除第二军团外,看来多半是不敢向街垒进攻的。工人们尽管盛怒难遏,但由于处境,也只限于坚守自己的街垒。

这样,双方到晚上就散去了,决定明天早晨再交锋。政府在斗争的第一天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被击退的起义者可以在一夜之间重新占领失去的阵地,他们果然这样做了。而下面两件严重的事情显然对政府不利:政府用霰弹射击,却并没有在第一天就把骚动平息。但是,在用霰弹射击以后,在黑夜(它带来的不是胜利,只是休战)过去以后,骚动就会结束,革命就要开始。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25日

载于1848年6月26日

“新莱茵报”第26号的号外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40年第3期

巴黎消息

科伦 6 月 26 日。鉴于刚从巴黎得到的消息所占的篇幅太多，我们不得不把所有评论性的文章抽掉。

因此现在只向我们的读者说几句话。赖德律-洛兰和拉马丁，以及他们的部长们下台了；卡芬雅克的军事独裁从阿尔及利亚搬到了巴黎；马拉斯特是内政独裁者；巴黎淹没在血泊中；起义发展成为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都要伟大的革命，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就是我们从巴黎得到的最后消息。这次规模巨大的六月革命不象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三天是不够的，但是人民的胜利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把握。法国资产阶级决心去做法国历代国王从来不敢做的事情：它自己下了赌注。法国革命的这个第二幕仅仅是欧洲悲剧的开始。

写于 1848 年 6 月 26 日

载于 1848 年 6 月 27 日
“新莱茵报”第 2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北极星报”论“新莱茵报”⁸⁵

由菲格斯·奥康瑙尔、乔·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编辑的英国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在最近一号中对于“新莱茵报”对英国群众运动所抱的态度和“新莱茵报”向来维护民主派利益这两点表示赞许。

我们谨向“北极星报”各位编辑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对本报所作的真正民主的友好的评语。同时请他们相信，在英国报纸中，唯有革命的“北极星报”的赞许才是我们所珍视的。

写于 1848 年 6 月 26 日

载于 1848 年 6 月 27 日
“新莱茵报”第 2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6月23日

我们继续得到关于6月23日战斗的许多新的详细情况。我们掌握的材料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时间只允许我们报道最重要的和最突出的事件。

无论就巴黎或者就全世界来说,六月革命都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斗争。在过去的一切革命中,最激烈的战斗要算是米兰的三月战斗了。在这个战斗中,17万几乎是赤手空拳的居民粉碎了两三万军队。但是米兰的三月战斗和巴黎的六月革命比起来,简直是儿戏。

六月革命和过去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根本没有幻想,没有冲动。

如果说在二月里,人民站在街垒上高唱《Mourir pour la patrie》(“为祖国而死”),那末在6月23日,工人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祖国对他们已失去了任何意义。“马赛曲”连同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其他一切回忆一起消逝了。人民和资产阶级都感觉到,他们现在所参加的革命比1789年和1793年的革命更为伟大。

六月革命是拚死活的革命,它是在沉默的愤怒中,在阴森而绝望的冷静中进行的。工人们知道,他们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残酷可怕的斗争面前,连法国人的愉快爽朗的性格都消失了。

历史上只有两个事件可以和现在大概还在巴黎进行的这个斗争相比拟,这就是古罗马的奴隶战争和 1834 年的里昂起义。里昂的旧口号“活着没有工作,不如战斗而死”,在 14 年之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口号现在又被写在旗帜上面了。

六月革命是第一个把整个社会真正分为以巴黎东区和西区为代表的两大敌对阵营的革命。二月革命的团结一致,那种富有诗意的、充满了迷人的幻想和诱人的谎言的团结一致消逝了。甜言蜜语的叛徒拉马丁曾经是这种团结一致的体现者。现在,残酷无情的现实使 2 月 25 日的一切伪善的诺言失去了效力。二月革命的战士现在互相厮杀起来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漠不关心的态度不再存在了,每一个能够拿武器的人不是站在街垒的这边战斗,便是站在街垒的那边战斗。

在巴黎街道上作战的军队和参加莱比锡民族之战⁸⁶的军队一样多。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六月革命的巨大意义。

现在我们来叙述一下战斗的经过。

如果根据昨天的消息来判断,可以想象得出,街垒是筑得相当杂乱的。但是从今天的详细报道看来,情况恰恰相反。工人的防御工事从来还没有构筑得象现在这样周密,这样有计划。

城市分为两个军营。从城市的东北郊附近开始,即从蒙马特尔往下到圣丹尼门,再从这里沿圣丹尼街,经过锡特岛,沿圣雅克街到城关,形成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以东的整个地区都被工人占据着,并筑有工事。资产阶级从西面进攻,并从西面得到增援。

一清早,人们就静悄悄地开始构筑街垒。这些街垒比过去任何街垒都高而坚固。在圣安东郊区入口处的一座街垒上飘扬着一面大红旗。

圣丹尼林荫路也筑有坚固的工事。林荫路和克列里街上的街垒以及邻近的已经变成真正堡垒的房屋,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如我们昨天已经报道的,在这里展开了第一次激战。人民以无比英勇的、视死如归的精神进行战斗。一队强大的国民自卫军由侧面向克列里街垒进攻。街垒的守卫者大部分都撤退了。只剩下七个男人和两个妇女(两个年轻漂亮的职业妇女)。其中有一个男人手拿旗子登上街垒,其余的人开始射击。国民自卫军进行反击。旗手倒下了。一个职业妇女,一个身材高大、衣着雅致、露着胳膊的漂亮的姑娘立刻举起旗子,越过街垒,向国民自卫军走去。射击继续着,国民自卫军里的资产者向这个姑娘开枪,在她走到他们刺刀跟前的时候杀害了她。另一个职业妇女马上跳了出来,抓住旗子,扶起她的女友的头,看到她已死了,就疯狂地向国民自卫军投掷石子。她也在资产者的射击下倒下了。双方的射击愈来愈激烈,从窗口射击,从街垒后面射击。国民自卫军的队伍愈来愈少了,但是援兵又立刻开了上来,街垒被攻下了。在守卫街垒的七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还活着,他被解除了武装,做了俘虏。第二军团的纨绔子弟和交易所的豺狼们建立了战胜这七个工人和两个职业妇女的丰功伟绩。

两支队伍会合并夺取了街垒后,出现了短时间的可怕的沉寂。但是沉寂很快就被打破了。勇敢的国民自卫军向占据着一部分林荫路的、手无寸铁的、平静的人群展开猛烈的射击。人们惊慌逃散。但是街垒并没有攻下来。只是在3点钟左右,卡芬雅克率领常备军和骑兵前来,经过长时间的战斗,才把通向圣马丁门的那一段林荫路拿下来。

在包松涅尔郊区构筑有许多街垒,特别是在拉斐德大街的拐

角处，许多房屋也成了起义者的堡垒。起义者由国民自卫军的一个军官指挥着。向他们进攻的有第七轻步兵团、别动队和国民自卫军。战斗继续了半小时。最后，军队胜利了，但这个胜利只是在死伤了约 100 人以后才取得的。这场战斗发生在下午 3 点钟以后。

在司法厅对面，在君士坦丁街，在邻近的街道上和圣米歇尔桥上，也构筑有街垒，桥上飘扬着红旗。经过长时间的战斗，这些街垒也被攻下了。

独裁者卡芬雅克命令炮兵占领诺特丹桥上的阵地。他在这里向普朗什-米布雷街和锡特街射击，他在这里可以毫不费力地移动大炮来对付圣雅克街上的街垒。

圣雅克街为无数道街垒所切断，那里的房屋变成了真正的堡垒。这里只有炮兵才能起作用，卡芬雅克毫不迟疑地使用了炮兵。整个下午，炮声隆隆。霰弹扫荡了街道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晚上 7 点钟，只剩下一个街垒没有攻下，死亡的人很多。

在圣米歇尔桥上和圣安德烈-德斯-阿尔街上也有大炮在射击。在城东北郊的尽头，在沙托-兰登街上（有一支军队大胆地向那里推进），也有一个街垒为炮火所摧毁。

午后，在东北各郊区，双方的射击愈来愈猛烈。拉-维勒特、邦丁等郊区的居民跑来援助起义者。街垒又不断地大批构筑起来。

在锡特岛上，有一连共和国近卫军⁸⁷借口和起义者联欢，冲入两道街垒之间，然后开枪射击。人民愤怒地向背信者猛扑，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消灭，逃脱的不到 20 人。

各处的战斗愈来愈激烈。天黑以前，各处都进行炮击；后来只用步枪射击，一直继续到深夜。在 11 点钟，整个巴黎还响遍了紧急

号声,在午夜还听到巴士底狱方面的枪声。巴士底狱广场和通向广场的各个要冲都在起义者控制之下。在起义者兵力的主要中心圣安东郊区,构筑有坚固的工事。骑兵、步兵、国民自卫军和别动队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从蒙马特尔街到坦普尔街的林荫路上。

晚上11点钟,已经有1000多人伤亡。

这是六月革命的第一天,这是巴黎革命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个日子。巴黎工人孤军同武装的资产阶级、同别动队、同新组织起来的共和国近卫军、同常备军各兵种作战。他们无比英勇地坚持战斗,这种无比英勇是同敌人的无比残酷相应而生的。当你看到巴黎资产阶级怎样兴高采烈地参与卡芬雅克所组织的血腥屠杀的时候,你会觉得许泽尔、拉德茨基、文迪施格雷茨之流的罪行简直不值一提了。

23日夜间,于6月11日重新恢复的“人权协会”⁸⁸决定为了红旗的利益而利用起义,从这一点出发,决定参加起义。因此,该协会召开会议制定了必要的措施,选出了两个常务委员会。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27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6月28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28号

6月24日

巴黎整夜充满了军队。在各个广场和林荫路上都配置有强大的前哨。

早晨4点钟,紧急号响了。一个军官带着几个国民自卫军士兵闯入各家,寻找不愿自动归队的人员。

这时,炮声又响了。圣米歇尔桥一带响得最厉害,因为圣米歇尔桥是左岸起义者和锡特乌起义者联系的工具。今天早晨被授予独裁全权的卡芬雅克将军渴望利用这种全权来镇压起义。昨天使用炮兵只是例外,并且使用的大部分是霰弹。今天到处都遭到炮击,不管是街垒还是房屋。不仅用霰弹射击,而且还用炮弹、榴弹和康格里弗火箭射击。

在圣丹尼郊区北部,一清早就开始了激战。在北火车站附近,起义者占领了一幢正在建筑中的房屋和几个街垒。国民自卫军第一军团开始进攻,但没有得逞。他们打完了弹药,死伤约50人。在炮兵未开来以前(约10点钟左右),他们险些失去了自己的阵地。炮兵摧毁了房屋和街垒。军队重新占领了北火车站。但是,在这个地区(该区名为克洛-圣拉查尔,“科伦日报”误译为“圣拉查尔官”),战斗还继续了很久,并且打得非常猛烈。“这真是一场大屠

杀”，——比利时一家报纸的记者这样写道。在罗什舒阿尔关卡和包松涅尔关卡附近构筑了坚固的街垒。在拉斐德街，街垒又恢复起来了，直到午后才在大炮的轰击下被占领。

在圣马丁、兰布托和格兰-桑提各条街上，街垒也是靠炮兵才攻下的。

圣米歇尔桥对面的库兹涅咖啡馆被炮火摧毁。

但是在下午3点钟左右，在花河沿街发生了主要的战斗。在这里，有名的“丽人”服装店被600名起义者占领，变成了堡垒。炮兵和步兵开始进攻。一个墙角被打垮了。在这里亲自指挥射击的卡芬雅克建议起义者投降，否则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起义者拒绝投降。炮击重新开始。最后，使用了燃烧弹和榴弹。房屋被摧毁。80名起义者葬身于瓦砾之中。

在圣雅克郊区，在潘庭区附近，工人也在四周筑起了街垒。象在萨拉哥沙城⁸⁹一样，每一幢房屋都必须用围攻来夺取。独裁者卡芬雅克想用突击攻占这些房屋的企图遭到彻底失败，于是这个残暴的阿尔及利亚的丘八就威胁说，如果占领这些房屋的起义者不投降，就要把他们烧死。

在锡特街，姑娘们从窗口向兵士和市民自卫团射击。为了在这里取得某些进展，也不得不使用榴弹炮。

想投到起义者方面来的别动队第十一营被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消灭了。至少据传说是这样。

到中午的时候，起义者占绝对优势。巴提诺尔、蒙马特尔、拉-沙佩尔、拉-维勒特等所有的郊区，总之，从巴提诺尔到塞纳河的所有巴黎城郊，以及塞纳河左岸的大部地区，都在起义者手中。他们在这里缴获了13门大炮，但是没有使用。在市中心，在锡特和在圣

马丁街南端,他们曾冲到市政厅附近,那里有强大的军队防守。尽管如此,巴斯蒂德还是在众议院宣布,市政厅在一小时后很可能被起义者占领。这个消息引起了混乱,于是就决定任命独裁者并宣布戒严。卡芬雅克一接受独裁全权,便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在文明城市中从来没有采用过,甚至连拉德茨基在米兰都不敢采用。人民又太宽宏大量了。如果他们以纵火来回答燃烧弹和榴弹炮,也许到傍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成为胜利者了。但是人民却不愿意使用敌人所使用的那种武器。

起义者的弹药大部分是由棉火药制成的,在圣雅克郊区 and 马勒市区大量制造着棉火药。在莫别尔广场上建立了一个弹药工场。

政府不断得到援军。庞图阿兹、卢昂、缪兰、曼特、亚眠、哈佛尔等地的国民自卫军整夜不停地向巴黎开来。从奥尔良调来了军队,从阿拉斯和杜埃调来了炮兵和工兵。从奥尔良还开来一个团。24日早晨,从文森运来50万发子弹和12门炮,但北面铁路上的铁路工人破坏了巴黎和圣丹尼之间的线路,使援军运不进来。

用了联合的兵力和空前残酷的手段,到24日下午才算把起义者击退了。

至于国民自卫军怎样残酷地进行战斗以及他们怎样清楚地了解事情同他们的生存有关,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不仅卡芬雅克,而且连国民自卫军本身都打算把整个潘庭区付之一炬!

进攻部队有3个指挥所:圣丹尼门,这里由拉摩里西尔将军指挥;市政厅,杜维维耶将军率领14个营驻扎在这里;索尔邦纳广场,达梅姆将军从这里向圣雅克郊区进攻。

到中午的时候,通向莫别尔广场的要冲全被占领,广场本身也

被包围。下午1点钟,广场被占领,别动队有50个人当场丧命!同时,经过猛烈的、长时间的炮击,潘庭区被攻占了,或者不如说是投降了。在那里防守的1500名起义者投降了,这大概是因为卡芬雅克先生和疯狂的资产阶级威胁要把这个地区全部焚毁的缘故。

这时,“秩序的维护者”沿着林荫路不断向前挺进,占领了邻近街道上的街垒。在坦普尔街上,工人们被骗逐到拉-科尔德利街的拐角处。在布什拉街上,战斗仍在进行,林荫路那面的坦普尔郊区也在作战。在圣马丁街还能听到零落的枪声。在普昂特·圣埃斯他什,还有一个街垒在坚持。

晚上7点钟左右,从亚眠来的两营国民自卫军开到了拉摩里西尔将军那里,他们立即被派去包围沙托·得奥背后的街垒。这时,圣丹尼郊区已经失陷并且沉寂下来,整个塞纳河左岸差不多也都是这样。起义者被包围在马勒市区的一部分地方和圣安东郊区。但是这两个区中间隔着博马舍林荫路和位于其后的圣马丁运河,而圣马丁运河是完全可以被政府军队利用的。

指挥别动队的达梅姆将军在厄斯特拉帕德街垒附近被子弹打伤了大腿,但伤势不重。议员比克西奥和多尔内斯的伤势也不象最初想象的那样严重。

贝多将军也受了轻伤。

到9点钟,圣雅克郊区和圣马索郊区实际上已被攻占。战斗异常激烈。当时在这里指挥作战的是布莱阿将军。

杜维维耶将军在市政厅并未取得多大的进展。但是,这里的起义者也被打退了。

拉摩里西尔将军不顾顽强的抵抗,把包松涅尔、圣丹尼、圣马丁等郊区的关卡占领了。只有克洛-圣拉查尔的工人还在坚持,他

们在路易-菲利浦医院构筑了街垒。

这是国民议会主席在晚上九点半钟向国民议会报告的消息。但是,他的话有几次是自相矛盾的。他承认,在圣马丁郊区,双方仍在猛烈地对射。

总之,24日傍晚的情况如下:

起义者大约还控制着他们在23日早晨占领的地区的一半。这一半地区包括巴黎东部,圣安东、坦普尔、圣马丁等郊区和马勒市区。克洛-圣拉查尔和植物园附近的几个街垒是起义者的前哨阵地。

巴黎的其余部分全部落在政府手中。

在这场决战中特别引人注意的就是“秩序的维护者”在作战时所表现的那种狂暴性。这些人过去对于“市民”流的每滴“血”是那样痛心,对于2月24日市近卫军⁹⁰士兵的死甚至伤感万分,而这些资产者现在却象杀戮野兽一样地杀戮工人。在国民自卫军队伍里,在国民议会里,对起义的工人没有一句同情的话,没有一句和睦的话,没有丝毫的伤感,相反地,只有狂暴的憎恨,冷酷的敌意。资产阶级是完全有意识地向工人进行斩尽杀绝的战争的。不管资产阶级现在会取得短时期的胜利,还是会被击溃,工人是决心要向他们报仇的。经过六月里的这3天中所发生的战斗以后,必然会采取恐怖手段,不是这一方采取,就是那一方采取。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27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6月28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28号

6月25日

斗争愈来愈紧张,愈来愈残酷,愈来愈猛烈。资产阶级愈是看到用残酷的手段不能立刻达到目的,它在战斗中以及在夜间巡逻和露营时愈是感到疲倦,它最后胜利的时刻愈是接近,它就愈加疯狂地向起义者进攻。

资产阶级宣布工人不仅是需要加以征服的敌人,而且是需要加以消灭的社会敌人。它散布这样一种谬论:工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己迫使他们起义的)只想抢劫掠夺、杀人放火,工人是一群强盗,因此应当象屠杀野兽一样杀掉他们。可是,占领了城市的大部分达3天之久的起义者却表现得非常高尚。如果他们也采用以卡芬雅克为首的资产者及其走狗所采用的那种残酷手段,巴黎就会变成废墟,而起义者也许会取得胜利。

从起义的一切详细报道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这次斗争中表现得多么野蛮。霰弹、榴弹和燃烧弹就不必说了,据证实,在大多数被攻占的街垒上,对战败者毫不留情。资产者把落到他们手里的人统统杀掉了。24日晚上,在天文台街,有50多名被俘的起义者不经任何审讯就被枪决了。“比利时独立报”(这是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的一个记者这样写道:“这是一场歼灭战。”在所有的街垒上,人们都深信起义者将毫无例外地被就地杀死。当拉罗什雅克兰在国民议会中说,必须设法消除这种想法的时候,资产者甚至不让他说

完就大吵大嚷,使得议长不得不戴起帽子宣布休会。后来,当塞纳尔先生(见下面关于议会的会议报道)本人想说几句关于仁慈和调解的伪善的话时,又大吵大嚷起来。关于宽恕之类的话,资产者连听都不愿意听。即使炮击会使他们损失一部分财产,他们也在所不惜,决心要把秩序的敌人,把强盗、暴徒、纵火者和共产主义者一下子消灭干净。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表现出资产阶级报纸所极力吹嘘的那种英雄气概。从今天关于国民议会的会议⁹¹报道中可以看出:起义一开始,国民自卫军就吓坏了;尽管各种各样倾向的报纸在报道时夸大其词,但从中可以看出,在起义的第一天,国民自卫军出来应战的人数很少,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卡芬雅克不得不把国民自卫军人员从床上拉起来,由一名上等兵和四名普通兵押着去作战。资产者虽然对起义的工人切齿痛恨,但仍然克制不了他们天生的怯懦。

相反地,工人却无比英勇地作战。虽然他们的损失愈来愈难以补偿,他们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逼得节节败退,但是他们丝毫不感到疲倦。25日早晨,他们一定已经看出,胜利的机会肯定已不在他们方面。新的军队不断从各地大量地开来;大批国民自卫军从郊区和其他较远的城市向巴黎集结。参加25日战斗的常备军比平时的卫戍部队员额还要多4万人。此外,别动队又出动了2万到25000人;此外,还有巴黎和其他城市的国民自卫军以及几千共和国近卫军。25日,进攻起义者的武装力量的总数不下15万到20万人。工人的战士也许还不到这个数量的 $\frac{1}{4}$;此外,工人缺少弹药,没有任何军事领导,没有一门能用的大炮。但是他们不声不响地、奋不顾身地同兵力占强大优势的敌人作战。士兵接连不断地向被重炮打

开的街垒上的缺口冲去 ;但是工人不声不响地迎击他们 ;工人到处都是战到最后一个人 ,街垒才落到资产者手中。在蒙马特尔 ,起义者向居民宣布 :不是他们消灭我们 ,就是我们消灭他们 ,我们绝不后退 ;愿上帝保佑我们胜利 ,否则我们就要把蒙马特尔全部烧掉。这个没有付诸实施的威胁当然被描写成为“卑鄙的计划” ,可是卡芬雅克的榴弹和燃烧弹却被认为是“值得大为赞扬的成功的军事措施” !

25日早晨 ,起义者占领了下列几个阵地 :克洛-圣拉查尔 ,圣安东和坦普尔郊区 ,马勒和圣安东市区。

克洛-圣拉查尔(前修道院领地)是一块很大的土地 ,一部分已经盖好了房屋 ,一部分正在建筑房屋、计划修筑街道等等。北火车站就在这个区域的中央。这个区有许多分散的没有次序的建筑物 ,此外还堆放着大量建筑材料 ;起义者在这里筑起了一个坚固的堡垒 ,它的中心是建筑中的路易-菲利浦医院。他们还构筑了一批巨大的街垒 ,据目击者谈 ,这些街垒是无法攻破的。街垒后面是被起义者所切断和占领的城墙。他们的工事从这里一直延伸到罗什舒阿尔街或者到城关区。蒙马特尔的各个关卡设有坚固的工事 ,蒙马特尔完全为起义者占领。40门大炮对这些工事轰击了两天 ,但还是没有把它们摧毁。

25日 ,40门大炮又对这些工事轰击了一整天 ;最后 ,在下午6点钟 ,罗什舒阿尔街上的两个街垒被攻下 ,不久 ,克洛-圣拉查尔也被占领了。

在坦普尔林荫路上 ,别动队在上午10点钟攻占了几幢房屋 ,起义者曾经从这里向进攻的敌人射击。“秩序的维护者”差不多已推进到菲伊·杜·卡尔佛尔林荫路。坦普尔郊区的起义者则被迫

步步后退，圣马丁运河有些地方被攻占；比较宽阔的、笔直的大街从运河和林荫路方面受到猛烈的炮击。战斗非常激烈。工人很清楚地知道，敌人在向他们阵地的正中央进攻。他们奋勇抵抗。他们甚至又重新夺回了以前失去的一些街垒。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后，他们被兵力和武器占优势的敌人打败了。街垒被逐一攻占；天黑时，不仅坦普尔郊区被攻占，而且敌人还沿着林荫路和运河前进，占领了通向圣安东郊区的各个要冲和这个郊区的几道街垒。

在市政厅附近，杜维维耶将军缓慢地但是顽强地前进。他从沿河的街道过来，由两翼包围了圣安东街的街垒，同时用重炮轰击圣路易岛和以前的鲁维叶岛⁹²。这里也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斗，但详情不明。只有消息说，在4点钟，第九区政府及其邻近的街道被占领，在圣安东街，街垒——被猛攻夺下，通向圣路易岛的要冲达米埃特桥也被占领。天黑时，这个区域的起义者被击退，通向巴士底狱广场的各个要冲都失陷了。

这样看来，除圣安东郊区以外，城内各区的起义者都被驱逐出来了。圣安东郊区是他们最坚固的阵地。这里是巴黎各次起义的真正策源地。通向这个郊区的许多要冲都构筑有很巧妙的工事。街垒彼此形成三角形，这样可以相互掩护，此外还有从房屋里射出的交叉火力来支援。因此，这些街垒就成了进攻者的巨大障碍。要攻取这些街垒，需要有很大的牺牲。

资产者，或者确切些说，他们的走狗的营地就扎在这些工事的前面。这一天，国民自卫军几乎没有行动。有所行动的主要是常备军和别动队；国民自卫军占领着平静无事的和早已被攻占的市区。

共和国近卫军和别动队的行为简直坏透了。经过改编和清洗

的共和国近卫军非常残酷地镇压工人，他们以镇压工人为共和国近卫军争得了声名。

主要从巴黎流氓无产阶级中招募来的别动队，由于薪俸优厚，在短期内就成了每次都替当权者卖命的御用军。被组织起来的流氓无产阶级反对未组织起来的劳动无产阶级。果然不出所料，象那不勒斯的流浪汉供斐迪南驱使一样，巴黎的流氓无产阶级甘愿供资产阶级驱使。只有由真正的工人组成的那部分别动队转到起义者方面来了。

目前在巴黎发生的这一切给人留下了多么卑鄙龌龊的印象！现在的别动队的成员都是不久以前的乞丐、浪人、无赖、顽童和小偷，这帮人在三四月间被每个资产者看作一群不能容忍的、惯于为非作歹的盗贼，而现在却大受宠爱，备受赞扬，得到大量的赏赐，因为这些具有无比胆量的“青年英雄”，这些“巴黎的姑娘”以非凡的勇敢精神爬上街垒等等；因为这些在二月里糊里糊涂地在街垒上作战的人们，现在又糊里糊涂地向无产者射击，象从前射击士兵一样；因为他们被收买了并且同意以一天30苏的代价去屠杀自己的弟兄！赞美这些卖身的流氓吧，因为他们为了一天30苏的代价竟枪杀最优秀最革命的巴黎工人！

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精神真是令人惊叹。三四万工人整整坚持了3天，来对付8万多士兵和10万国民自卫军，对付霰弹、榴弹和燃烧弹，对付那些不惜采用阿尔及利亚作战方法的将军们的“宝贵的”军事经验！工人被击溃了，并且大部分被残酷地消灭了。这次阵亡的战士不会受到象七月革命和二月革

命的牺牲者所受到的那种尊敬 ;但是历史将给他们以特殊的地位 ,
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决战的牺牲者。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6 月 28 日

载于 1848 年 6 月 29 日

“新莱茵报”第 29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

“布尔什维克”杂志

1940 年第 14 期

六 月 革 命

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暴力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即战败者的颜色，血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

没有一个著名的共和主义者（无论是“国民报”（《National》）⁹³派的或“改革报”（《R éforme》）⁹⁴派的）站在人民方面！人民除了起义本身以外，没有别的领袖，别的手段，可是他们对资产阶级和军阀的联合力量的抵抗，比任何一个拥有一切军事机构的法兰西王朝对任何一部分同人民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抵抗都要持久。要使人民丢掉最后一些幻想，要使他们和过去决裂，就需要让法兰西历次起义的司空见惯的富有诗意的装饰——充满热情的资产阶级青年、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三角帽等都站到压迫者方面去。医学系的学生拒绝给负伤的平民以科学上的援助。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菲利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⁹⁵——已象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烟火变成了卡芬

雅克的密集的炮火。

这就是 fraternité,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fraternité)。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

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学究们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许可做冗长的说教和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要求全部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只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领;王朝反对派⁹⁶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主义者⁹⁷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式样,——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人民本能地仇恨的路易—菲力浦并不是路易—菲力浦本人,而是一个阶级的王冠的统治,是坐在王位上的资本。但是人民始终是宽宏大量的,他们以为只要打倒了自己敌人的敌人,打倒了共同的敌人,就是消灭了自己的敌人。

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是一个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当时激烈反对王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平静地安睡,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还只是一种词句上和言语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个丑恶的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因

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它的王冠,显露了恶魔的原形。

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

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

在1780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

在临时政府时期,适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做法是使宽宏大量的工人相信,使成千上万的官方传单上所说的那些“甘愿贫困3个月来让共和国支配”的工人相信,二月革命似乎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而进行的,二月革命首先关心的是工人的利益,这种做法同时也是一种政策,一种引起幻想的手段。自从国民议会开幕后,平淡无奇的时期来临了。照特雷拉部长的说法,这里的问题只是要使劳动回到它过去的条件下去。这样,工人在二月革命中进行战斗是为了使自己陷入工业危机的深渊。

国民议会的工作至少对工人来说就是把二月革命的成果化为乌有,把他们拖回旧的关系中去。但是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因为,象国王一样,任何议会都不能命令具有普遍性的工业危机不再向前发展。国民议会极力想结束令人烦恼的二月革命的漂亮词句,可是它连那些在旧关系的基础上可能实现的措施都没有实现。它不是强迫17岁到25岁的巴黎工人参军,就是把他们抛到街头;它把

外地的工人从巴黎驱逐到索隆,并且连他们在结算时应得的工钱也不发给他们;它临时建议成年的巴黎人到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工场中去寻求施舍,但是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拒绝参加任何人民会议,也就是不再当共和主义者。然而无论是二月革命以后的充满柔情蜜意的花言巧语,无论是5月15日⁹⁸以后的残忍的法律,都没有达到目的。必须在行动中,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坏蛋,你进行二月革命究竟是为谁,为自己还是为我们?资产阶级既然这样提出问题,就必须用六月革命——霰弹和街垒来回答。

但是,正如一个人民代表在6月25日所说,整个国民议会都惊慌失措了。当问题和回答把巴黎的马路淹没在血泊中时,议员们呆然若失;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他们的幻想在战火中消失了,另一部分人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人民怎么敢单独地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俄国的金钱,英国的金钱,波拿巴的鹰,国王的百合花,各种各样的护身符,——他们就在这些东西中间寻找他们无法理解的这一事件的解释。但是,议会中的这两部分人都感到他们和人民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人敢替人民讲话。

他们一苏醒过来,就开始了疯狂的进攻。大多数人有充分的权利嘲笑那些犯了时代错误,不断重复博爱(fraternité)词句的可怜的空想家和伪善者。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要抛掉这种词句以及由这个词句的模棱两可的含意所产生的幻想。当正统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这个有着武士精神的空想家因那些宣布“战败者罪该万死!”(《Vae victis》)的人的卑鄙行为而发怒时,议会中的大多数人便疯狂起来,好象被毒蜘蛛咬了一样。他们为了掩饰“战败者”正是他们自己,便向工人高叫:“你们罪该万死!”不是他们现在就得死亡,就是共和国现在就得毁灭。因此他们拚命地嗥叫:“共和国万

岁！”

横在我们面前的深渊是否能把我们民主主义者引入迷途，使我们认为争取国家形式的斗争似乎是空洞的、幻想的和毫无意义的呢？

只有意志薄弱的胆怯的思想家才会这样提出问题。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

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对国民自卫军，对别动队，对共和国近卫军，对现役军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将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6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6 月 29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29 号

“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

科伦 6 月 30 日。我们介绍大家阅读一下从“伦敦电讯”上摘录下来的几段文字，并请把它们同德国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同勃律盖曼-杜蒙和沃尔弗斯先生关于巴黎六月革命的胡说八道对照一下，那时就会明白：英国的资产者起码有一点和德国的小市民不同（其他许多优点姑且不谈），即他们在评判伟大事件的时候，尽管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却毕竟还象个成年人，而不象街头的顽童。

第 122 号“电讯”这样说：

“……人们现在期待着我们谈一下这个可怕的流血事件的原因和结果。一开始就很明显，这是两个阶级间的真正战斗。（这种真知灼见真是千金难买——可敬的“科伦日报”和他的“沃尔弗斯”感叹地说。）这是工人反对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和反对现在支持这个政府的阶级的起义。阐明这场斗争的导火线要比指出引起这场斗争的经常的、直到目前还存在的原因来得困难。二月革命主要是工人阶级进行的，而且曾大声宣布：这个革命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这与其说是政治革命，不如说是社会革命。具有士兵的一切性格的大批愤愤不满的工人并不是一下子出现的。他们的贫困和不满也不纯粹是由最近 4 个月的事件产生的。在星期一，我们曾引证了勒鲁先生在国民议会中的声明。他说：法国有 800 万贫民和 400 万没有固定工作的工人。这个声明也许是夸大的，但是并没有人起来反驳。同时，他指的是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革命前的情形，他抱怨革命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灭这种可怕的现象。在法国形成的、如今对社会舆论起着巨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是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绝大多数人民所过的那种极端贫困的生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人民群众的贫困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问题；这也正是革命的真正重要的原因。国民议会很快就决定剥夺革命政治活动家曾经匆忙草率地答应给工人的那些特权。带有社会性质甚至政治性质的强有力的反动势力公然抬头了。它要求曾经得到大多数法国人支持的政权排除那些曾经赋予这个政权以生命的人们。最初奉承工人，哄骗工人，然后离间工人，用饿死来威胁工人，把他们遣散到外省去，使他们失去平常那种劳动上的联系，最后定出计划来消灭他们的力量。既然如此，工人的愤怒难道值得惊奇吗？当然，工人对于进行第二次更加有成效的革命的自信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奇。根据工人至今还在反抗政府武装力量的持久性来看：他们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要比许多人所预料的大得多。从上述情况，以及从人民中间没有政治领袖、从巴黎遣散的工人刚走到城关又立刻返回等情况来判断，可以得出结论：起义是工人阶级普遍不满的结果，而不是由政治煽动者挑起的。工人认为：他们自己的政府又背叛了他们的利益。现在，也象在二月里一样，他们拿起武器来同极端贫困现象进行斗争，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都是这种极端贫困的牺牲品。

目前的斗争只是二月革命的继续。它是争取较合理地分配每年劳动产品的席卷全欧洲的斗争的继续。在巴黎，这个斗争现在大概会被镇压下去，因为新政权从旧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力量显然占着优势。但是，不管这个斗争会被怎样顺利地镇压下去，它还会接连不断地爆发，直到政府实行较合理地分配每年的劳动产品，或者由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放弃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尝试，让自由的市场竞争去解决问题时为止……实际上，这个斗争是为争取充分的生活资料而进行的。领导革命的政治活动家甚至剥夺了中等阶级的生活资料。中等阶级变得比工人更野蛮。双方的强烈欲望燃烧起来，促使他们采取招致毁灭的行动。任何博爱都被抛弃了，双方宣布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无知的甚至是心怀叵测的政府，显然根本不了解自己在当前严重危机中的责任，它最初唆使工人去反对中等阶级，现在又帮助中等阶级去消灭失望的、受骗的和变得冷酷无情的工人。对于所发生的重大不幸事件的责难不应当涉及革命的原则本身，即不应当涉及反对贫困和压迫的坚定意向。应当

责难的倒是那些由于自己在政治上愚昧无知而使路易·菲力浦遗留下来的贫困状况更加恶化的人们。”

伦敦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就是这样描述六月革命的。这家报纸是维护科布顿、布莱特等人的原则的。除了被“曼彻斯特卫报”⁹⁹称为英国新闻界的两大专制者的“泰晤士报”¹⁰⁰和“北极星报”以外，它是英国销路最广的报纸。

现在请你们把上面所引的几段话和第181号“科伦日报”上的说法对照一下。这家绝妙的报纸把两个阶级的斗争歪曲成“正直的人”和盗贼的斗争！值得尊敬的报纸！好象这两个称号不是这两个阶级彼此赠送的。正是这家报纸，在最初听到关于六月起义的传说时承认自己对于起义的性质一无所知；以后巴黎的消息迫使它承认那里正在进行严重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不会因为遭到一次失败而告终；最后，这家报纸看到工人遭到了一次失败就欢欣鼓舞，认为这次起义不外是“绝大多数人”反对“一群野蛮的食人生番、强盗和杀人犯”的斗争。

罗马的奴隶战争是什么呢？难道是“正直的人”和食人生番的战争！让沃尔弗斯先生去写罗马史，而杜蒙-勃律盖曼先生去向工人，向这些“不幸的人”解释他们的真正的权利和义务，“使他们了解维护秩序和培养真正公民的科学”吧！

杜蒙-勃律盖曼-沃尔弗斯的神秘科学万岁！下面是这门神秘科学的一个例子：可敬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们一连两天在报纸上向轻信的读者说，卡芬雅克似乎打算在圣安东郊区埋设地雷。不幸的是圣安东郊区比光荣的科伦城还稍微大一些。但是，博学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我们建议德国国民议会请他们来制裁德国）杜蒙-勃律盖曼-沃尔弗斯能克服这种困难，他们知道，只要用一个

地雷就可以炸毁科伦城！他们对于要用来炸毁圣安东郊区的地雷的看法，同他们对于那种摧毁现代社会的地下力量的看法一样，是极为愚蠢的；在六月的日子里，这种力量使得巴黎发抖，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从巴黎的革命的火山口喷射出了血的熔岩。

但是，敬爱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们！伟大的杜蒙-勃律盖曼-沃尔弗斯，以登广告出名的伟人！登广告的卡芬雅克们！我们对于一度震撼世界的最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危机，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仅仅表示凭吊。我们并没有捏造这个事实，我们只是指出了这个事实。我们曾经指出：象卡芬雅克自己所说的，这两个阶级中的一个被战胜了。我们曾经在战败者的墓前感叹地说：“胜利者罪该万死！”连卡芬雅克本人也在历史责任面前发抖！而国民议会却责备它的成员胆小怕事，不敢公开承担这个可怕的历史责任。难道我们向德国人打开罗马神言集是为了让他们把它焚毁吗？难道我们描写宪章派同英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为了要求德国人也变成英国人吗？

可是，德国，忘恩负义的德国，尽管你也知道“科伦日报”和它的广告，但是你却不了解你的最伟大的伟人们，不了解你的沃尔弗斯，你的勃律盖曼，你的杜蒙！在阶级斗争中，在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中绞了多少脑汁，流了多少血汗！而这都是由于当时还没有“科伦日报”。但是，最勇敢

“罗马神言集”是希腊库麦城的巫女所写的预言格言集；在罗马把它作为官方的占卜资料。国家遇有危险时，元老院命令根据“罗马神言集”进行占卜，预测吉凶。公元前83年“罗马神言集”在大火时被焚，但后来部分被恢复。公元40年，“罗马神言集”被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斯蒂洪焚毁，据说是因为占卜不灵。——译者注

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们,如果现代社会这样大量地、积极地产生着“恶棍”、“食人生番”、“杀人犯”和“强盗”,以致他们的起义能够撼撼官方社会的基础,那末这算什么社会呢?这是怎样一种腐朽的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呵!你们自以为是在结束纠纷:你们把这出可怕的悲剧的演出者和观众贬低为科采布的那个奴颜卑膝的悲剧中的角色,而你们却自以为是在抬高他们的身价。

巴黎的“总汇通报”,即政府的机关报,路易十六、罗伯斯比、路易·菲利浦和马拉斯特·卡芬雅克的报纸报道说,在圣安东、圣雅克、圣马索等郊区的国民自卫军中总共只有50个人响应资产阶级号兵的召唤!对于要把人“培养”成真正的公民的科学来说,这是最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巴黎的这3个最大的郊区,在这3个工业最发达的郊区(在它们的产品面前,达卡的凡尔纱和斯比塔·费尔的天鹅绒也大为逊色),据说居住着“食人生番”、“强盗”、“暴徒”和“恶棍”。沃尔弗斯就是这样断言的!

沃尔弗斯当然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他能够使盗贼进行规模这样巨大的战斗,制造出质量这样优美的产品,建立这样伟大的英雄功绩,从而使得查理十世、路易·菲利浦、拿破仑的事迹都相形见拙,使得达卡和斯比塔·费尔斯的织工的产品也大为逊色,那末他会为盗贼增光不少。

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到过伦敦的“电讯”。读者们可能在昨天已经知道了艾米尔·日拉丹的意见。他说:工人阶级在把自己的债户——二月革命的还债日期延长了一个月以后,便以债主的身分去叩债户的门,用火枪、街垒和自己的肉体去叩门!艾米尔·日拉丹?他究竟是什么人?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绝对不是!然而他是翌日的共和主义者,明天的共和主义者(*républicain du lende-*

main), 而“科伦日报”, 沃尔弗斯、杜蒙和勃律盖曼之流都是前天的共和主义者, 共和国以前的共和主义者, 昨天的共和主义者 (républicains de la veille)! 艾米尔·日拉丹, 难道他能够和杜蒙一起当见证人吗?

对“科伦女人”来说, 流放和绞刑还不够, 它还要对流放和绞刑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它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多么值得钦佩! 本来它只需要向轻信而盲目的德国社会证明: 共和制度比君主制度强大, 有卡芬雅克和马拉斯特参加的共和制的国民议会能够干出有梯也尔和毕若参加的立宪制的众议院所不能干出的事情! Vive la république! 共和制度万岁! ——这位斯巴达女人即“科伦女人”向血流成河、备受折磨和火焰四起的巴黎高呼。原来她是一个隐蔽的共和主义者! 由于这个缘故, 一个叫做盖尔温努斯的人, 一家“奥格斯堡报”¹⁰¹才怀疑她胆小怕事, 怀疑她优柔寡断! 多么美好无瑕! 科伦的夏绿蒂·科尔黛!

请注意: 任何一家巴黎报纸, 不管是“总汇通报”、“辩论日报”¹⁰², 还是“国民报”, 都没有讲“食人生番”、“强盗”、“暴徒”和“杀人犯”。反复地讲过这样的话的只有一家报纸, 即梯也尔的“立宪主义者报”¹⁰³。雅科布·费奈迭曾经在“科伦日报”上大肆抨击梯也尔的不道德行为, “科伦女人”也曾经大声地反对过他:

“他们休想获得
德意志自由的莱茵,”¹⁰⁴

如今比利时的“独立报”以及由杜蒙-勃律盖曼-沃尔弗斯体现出来的莱茵的科学却从“立宪主义者报”中为自己吸取聪明才智!

德文中“科伦女人”这个字有轻佻的女人的意思, 这里指“科伦日报”。——译者注

现在你们可以稍微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科伦日报”用来辱骂战败者的那些可耻谣言了。就是这一家报纸在斗争一开始就声明自己根本不了解斗争的性质，在斗争过程中才承认这是“严重的社会革命”，而在斗争结束之后又说这是宪兵和盗贼打架。

他们进行了抢劫！抢劫了什么呢？抢劫了武器、弹药、绷带以及生活必需品。盗贼在窗板上写着：“Mort aux voleurs！”消灭盗贼！

他们“象食人生番一样杀人放火”！食人生番，他们不甘愿让那些跟在常备军后面向街垒进攻的国民自卫军去打碎他们伤员的头颅，去枪毙战败者，去杀害妇女。食人生番，他们只是在这种歼灭性的战争中（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这样称呼这次战争）歼灭敌人。他们放火了吗？然而，他们为了回答卡芬雅克的合法的燃烧弹而在第八区投出的一个唯一的火炬，象“总汇通报”所证明的，只不过是一种有诗意的、假想的火炬罢了。

沃尔弗斯说：“一些人质美巴尔贝斯、布朗基和素布里埃的纲领，另一些人则为拿破仑或亨利五世的健康而干杯。”

纯洁的“科伦女人”既不袒护拿破仑分子，也不袒护布朗基分子，它在起义的第二天就宣布：“这是为红色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可是她为什么要瞎扯僭望者呢？我们不是已经说过，她是一个习惯成性的隐蔽的共和主义者，是穿着裙子的罗伯斯比尔，她好象觉得到处都是僭望者，这使得她为自己的贞操耽心！

“他们几乎所有的人身边都有钱，有些人甚至有很多的钱。”

工人有三四万人，而且“他们几乎所有的人身边都有钱”，——据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样贫困，各种事业都这样萧条

的原因！钱所以这样少，一定是工人把它们隐藏起来了！

巴黎的“总汇通报”竭力渲染在起义者那里发现钱的事件。这种事件总共不超过 20 起。各种报刊和记者都引用了这些事件，但是所说的数目各不相同。以攻击手段圆滑见称的“科伦日报”，把对于这 20 起事件的不同说法说成是对于不同事件的报道，而且还加上种种流言蜚语，但不管怎样也超不过 200 起。不过这样它就有权利说：几乎三四万工人身边都有钱！到现在才弄清楚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身上带着钱的正统主义的、波拿巴主义的、也许还有菲利浦主义的奸细曾经钻到或者企图钻到街垒战士中间去。非常保守的国民议会议员帕耶先生在起义者那里做了 12 小时的俘虏，他声明说：

“他们大多数都是被 4 个月的贫困生活弄得绝望的工人，他们说：宁肯死于枪林弹雨之中，也不愿饿死！”

可是沃尔弗斯却硬说：“在被打死的人中间，很多人身上都有社会用来定罪的标记。”

这是卑鄙的谎言，无耻的诽谤，这是被反对起义者而拥护“国民报”的拉梅耐在他的“人民制宪报”¹⁰⁵上痛斥过，也被一向具有骑士精神的正统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在国民议会里痛斥过的一种卑鄙行为。所有这些谎言都是以一家通讯社发出的一条极不可靠的、未经“总汇通报”证实的消息为根据的。这条消息说，似乎发现了 11 具带有 T . F . 烙印的尸体。究竟在哪一次革命中不会找到 11 具这样的尸体呢？究竟是什么样的革命不会给比这多 100 倍的人打上这种烙印呢？

T . F . 是 Travaux forcés (苦役) 的简写。——编者注

我们看到：胜利者的报纸、宣言和彩灯都在证明他们怎样使人挨饿，怎样把人弄到绝望的境地，怎样杀戮、枪毙、活埋、流放，怎样侮辱死者。但是人们却只是引用谎言来反对战败者，这些谎言由“立宪主义者报”一手捏造，由“独立报”加以转载，而“科伦日报”则把它译成德文。黑格尔说：用谎言来证明真理是对真理的莫大侮辱。

在巴黎，妇女们坐在家门口为起义者的伤员撕扯裹伤用的棉线团，而“科伦日报”的编辑们却往伤口里加硫酸。

他们向资产阶级警察告发我们。而我们却相反，利用不朽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杜蒙-勃律盖曼-沃尔弗斯效劳的机会，奉劝工人，奉劝这些“不幸的人”“认清自己真正的权利和义务，了解维护秩序和培养真正公民的科学”。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6 月 3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1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31 号

六月革命

(巴黎起义的经过¹⁰⁶)

—

六月革命事件的全貌渐渐地在我们面前展示出来了。得到的消息比较全面了，这就有可能分清事实与谣传和谎言。起义的性质愈来愈明显了。愈能抓住六月中这4天所发生的事件的内在联系，就愈感到起义规模的巨大以及起义者的英雄气概、组织迅速和同心同德是令人惊异的。

工人军事行动的计划据说是由拉斯拜尔的朋友、前军官盖尔索济制订的，其内容如下。

起义者应当以4个纵队向市政厅分进合击。

第一纵队以蒙马特尔、拉-沙佩尔、拉-维勒特等郊区为作战根据地，由包松涅尔、罗什舒阿尔、圣丹尼、拉-维勒特等关卡向南挺进，占领林荫路，通过蒙托尔海伊街、圣丹尼街和圣马丁街接近市政厅。

第二纵队以几乎全是工人居住的、由圣马丁运河掩护的坦普尔郊区和圣安东郊区为根据地，沿坦普尔街和圣安东街、沿塞纳河北岸各沿河街道以及沿这两个市区间一切平行的街道向市政厅前进。

第三纵队以圣马索郊区为根据地，沿圣维克多街以及沿塞纳河南岸各沿河街道直抵锡特岛。

第四纵队以圣雅克郊区和医科学校区为根据地，沿圣雅克街前进，也到达锡特岛。两个纵队会合后，沿塞纳河右岸前进，从后方和侧翼包围市政厅。

可见，计划规定以纯粹是工人居住的那部分市区为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市区呈半圆形，包括巴黎的整个东半部，并向东扩展。预计首先把巴黎东部的敌人彻底肃清，然后沿塞纳河两岸向西部及其中心——推勒里宫和国民议会前进。

这些纵队由许多游击队支援，这些游击队在纵队的翼侧和纵队之间独立行动，构筑街垒，占领小街并保持纵队间的联系。

作战根据地都设有坚固的工事，并按照一切兵法规则建成为强大的堡垒，以备撤退时使用。在克洛-圣拉查尔，在圣安东郊区和市区以及在圣雅克郊区，都构筑有这样的工事。

如果说这个计划有缺点，那就是在作战的初期完全没有注意到巴黎的西部。这里，沿圣奥诺勒街的两侧，在中央商场和国民宫附近，有一些对起义行动非常有利的市区，那里的街道非常狭窄弯曲，住的主要是工人。在那里安置起义的第五个据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这里一方面可以切断市政厅的交通，另一方面可以在这个突出的据点附近箝制大量的部队。起义的成功在于是否能尽快地突入巴黎的中心区，保证夺取市政厅。我们不知道盖尔索济为什么不能够在这个区域组织起义的行动。但是很清楚，如果起义者一开始不能把同推勒里宫毗连的这个巴黎的中心区拿下，任何一次起义都是不会成功的。只要回想一下拉马克将军出殡时的起义¹⁰⁷就够了，当时起义者也曾成功地一直挺进到蒙托尔

海伊街，但后来被击退了。

起义者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行动。他们立即在自己的占区，即工人的巴黎和资产阶级的巴黎之间构筑了两道主要的工事：圣丹尼门街垒和锡特街垒。他们被驱逐出第一道工事，但是却成功地守住了第二道工事。第一天，6月23日仅仅是序幕。起义者的计划，在今天早晨发生了最初的前哨战以后，就完全清楚了（“新莱茵报”一开始就完全正确地了解到这一点，见“新莱茵报”第26号的号外）。横断第一纵队作战线的圣马丁林荫路成了激战的场所，在那里，部分地由于地形条件的关系，“秩序的”维护者取得了胜利。

通向锡特岛的各个要冲在右面被占领普朗什-米布雷街的游击队防守着，在左面被占领并加强锡特岛南面3座桥梁的第三和第四纵队防守着。在那里也展开了激战。“秩序的”维护者终于占领了圣米歇尔桥，一直挺进到圣雅克街。他们聊以自慰地希望起义在傍晚就会被镇压下去。

如果说起义者的计划已经很清楚，那末“秩序的”维护者的计划就更可以这样说了。他们的计划最初无非是用一切手段镇压起义。他们用炮弹和霰弹向起义者宣告了这个意图。

但是政府以为它是在对付一群普通的、行动根本没有计划的叛乱者的乌合之众。他们在傍晚肃清了主要的街道以后，就宣称叛乱已被平定，于是他们只用极少数的部队占领已经拿下的市区。

起义者成功地利用了这个疏忽，经过6月23日的前哨战后，就开始了决战。令人吃惊的是：工人竟那样迅速地掌握了军事行

动的计划，那样有计划地互相支援，那样巧妙地利用极为复杂的地形条件。这是因为工人在国家工厂的时候就被很好地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编成连队，因此只要把他们的企业组织运用到军事行动中来，就能立即形成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要不是这样，上述情况就完全不可理解了。

6月24日早晨，不仅完全收复了失去的地区，而且还占领了新的地区。虽然到坦普尔林荫路为止的林荫路这一线仍然被政府军队所占领，从而切断了第一纵队往市中心去的交通，但是第二纵队却由圣安东市区远远地向前挺进，几乎包围了市政厅。第二纵队把它的总部设在距市政厅300步远的圣约尔维教堂里，并攻占了圣马利教堂及其邻近的街道；它一直前进到市政厅后面很远的地方，同占领锡特岛的各个纵队一起几乎把市政厅的交通完全切断了。只有一条要冲还可以通行，那就是塞纳河右岸的沿河街。在南面，重新占领了整个圣雅克郊区，恢复了和锡特岛的联系，派去了援军，并安排好了往右岸去的渡口。

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巴黎的革命中心市政厅已经危在旦夕，如果不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就一定会陷落。

二

惊慌失措的国民议会任命卡芬雅克为独裁者。卡芬雅克自从在阿尔及利亚作战以来就惯于实行“坚决的”镇压，他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办。

立即有 10 个营沿着宽广的科·德·赖科尔街向市政厅前进。他们截断了坚守锡特岛的起义者同右岸的联系，保证了市政厅的安全，甚至使得有可能进攻市政厅四周的街垒。

普朗什-米布雷街以及和它相连的圣马丁街被政府军队占领，由骑兵扼守着。对面通往锡特岛的诺特丹桥被重炮弹所摧毁，于是卡芬雅克直接向锡特岛前进，以便在那里实行“坚决的”镇压。起义者的主要据点，“丽人”服装店起先被炮弹破坏，后来又为燃烧弹所焚毁；在炮击之下，锡特街也被攻占；通往左岸的 3 座桥梁被攻下，左岸的起义者被猛攻击退。同时，位于格列夫广场和各沿河街道上的 14 个营也解除了市政厅的包围，圣约尔维教堂也由起义者的指挥所变成了孤立的前哨阵地。

圣雅克街不仅遭到锡特岛方面的炮击，而且也遭到左岸的侧击。达梅姆将军沿卢森堡花园向索尔邦纳突进，攻占了拉丁区，接着派自己的纵队去攻取潘庭。潘庭广场变成了森严的堡垒。虽然圣雅克街早已被占领，但是那里的“秩序的”维护者在难以攻克的堡垒面前仍然束手无策。炮兵射击和白刃冲锋都毫无效果。直到最后，四面受敌的 1 500 个工人由于精疲力尽，粮尽弹绝，并受

到资产阶级要焚毁全区的威胁，才被迫投降。同时，经过长时间的、英勇的防御以后，莫别尔广场落到了“秩序的”维护者的手中，从自己最坚固的阵地上被击退的起义者于是不得不放弃了整个塞纳河左岸。

同时，在塞纳河右岸各林荫路上，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阵地也被利用起来，以便朝两个方向行动。拉摩里西尔指挥着这些部队，下令用重炮和猛烈的冲锋肃清圣丹尼郊区和圣马丁郊区的各街道、坦普尔林荫路和半条坦普尔街。傍晚，拉摩里西尔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他切断了第一纵队，并在克洛-圣拉查尔对第一纵队进行了半包围；他迫使第二纵队后退，自己则沿着各林荫路前进，楔入第二纵队。

卡芬雅克是怎样获得这些胜利的呢？

第一，由于他拥有强大的优势兵力，可以调动来对付起义者。24日，他不仅有2万巴黎卫戍部队、2万到25000别动队和6万到8万国民自卫军，而且有巴黎四郊和几个较远城市的国民自卫军（两三万人），此外还有从邻近的驻防军中紧急召来的两三万人。24日早晨，他手里的军队已远远超过10万人，到晚上；人数又增加了一半。而起义者至多只有四五万人！

第二，由于他采用了残酷的镇压手段。在这以前，在巴黎街道上用大炮轰击的事情只发生过一次，即1795年葡月，拿破仑用霰弹驱散了圣奥诺勒街上的起义者¹⁰⁸。但是，对街垒和房屋从来没有使用过炮兵，更没有使用过榴弹和燃烧弹。人民没有防备这一手；他们对于这种武器束手无策，而采取唯一的对付方法——纵火，他们又于心不忍。到现在为止，人民对于在巴黎街道上使用这种阿尔及利亚式的作战方法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向后退却，而

一退却就预示了他们的失败。

25日，卡芬雅克用更大的兵力展开进攻。起义者手中只剩下一个区域——圣安东郊区和坦普尔郊区；此外，他们还留有两个前哨阵地——克洛-圣拉查尔和到达米埃特桥为止的那部分圣安东市区。

卡芬雅克又得到了拥有强大炮兵纵列的两三万援军，他命令首先向起义者的孤立前哨，特别是克洛-圣拉查尔进攻。起义者固守在这里，就象固守着要塞一样。经过12小时的炮兵轰击和手榴弹投掷，拉摩里西尔终于把起义者赶出阵地并占领了克洛-圣拉查尔，但这只是在他能够从罗什舒阿尔和包松涅尔街进行侧击以后，只是在第一天用40门大炮，第二天用更多的大炮击毁了街垒以后，才作到的。

他的纵队的另一部分通过圣马丁郊区向坦普尔郊区进攻，但没有取得很大的胜利；第三部分沿林荫路往下朝巴士底狱广场挺进，但是也没有前进多远，因为那里有许多非常坚固的街垒，这些街垒只是在猛烈的炮击下作了长时间的抵抗以后才投降的。在那里，房屋遭到极严重的破坏。

由市政厅进攻的杜维维耶纵队以不断的炮火把起义者愈赶愈远。圣约尔维教堂被攻占，圣安东街靠市政厅那一大段也被占领了；沿着沿河街和与它平行的街道进攻的几个纵队夺取了达米埃特桥，圣安东市区的起义者就是通过这座桥梁同圣路易岛和锡特岛的起义者进行联系的。圣安东市区受到侧翼包抄，于是起义者只能向郊区退却，他们也这样做了，他们一面退却，一面同沿着沿河街挺进到圣马丁运河河口并从这里沿运河向布尔顿林荫路进攻的纵队进行激战。少数被切断后路的起义者被打死，极少数人被俘。

这一次战斗的结果,圣安东市区和巴士底狱广场被占领了。傍晚,拉摩里西尔纵队完全占领了博马舍林荫路,在巴士底狱广场同杜维维耶的军队会合。

占领达米埃特桥使杜维维耶能够把起义者从圣路易岛和前鲁维叶岛赶走。他大刀阔斧地使用了在阿尔及利亚使用过的野蛮手段,才达到了这个目的。重炮的轰击使一些市区也象现在的圣路易岛一样,变成了一片焦土。但是谁管这个呢?起义者已经击退了或击毙了,“秩序的”维护者在洒满鲜血的废墟上庆贺胜利。

在塞纳河左岸,还有一个据点没有被攻下。在圣马丁运河以东联结圣安东郊区和塞纳河左岸的奥斯特利茨桥上筑有坚固的街垒,而左岸桥梁与瓦留贝尔广场相连接的地方,在植物园前面,筑有强大的桥头堡。这个桥头堡,也就是潘庭和莫别尔广场陷落后起义者在左岸的最后一座堡垒,经过激烈的抵抗后被攻占。

这样一来,在第二天,即26日,起义者手中只留下他们最后的堡垒——圣安东郊区以及坦普尔郊区的一部分地方了。这两个郊区不太适合于进行巷战,那里的街道太宽而且几乎是笔直的,炮兵行动起来很方便。在西面,有圣马丁运河很好地掩护他们,而在北面则相反,他们是毫无掩护的。在北面有五六条宽广而笔直的街道直通圣安东郊区的中心。

主要工事构筑在巴士底狱广场和全区的主要街道——福布尔-圣安东街上。那里的街垒筑得非常坚固,有些是用马路上的大石板筑成的,有些是用圆木筑成的。它们形成凹角,一方面是为了减弱炮弹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为了延长防御正面,以便能进行交叉射击。房屋的防火壁被凿穿了,这样,许多房屋就可以互相沟通,起义者就能够根据需要,或者向敌军开火,或者隐蔽在街垒后面。各个

桥梁和沿运河的街道，以及和运河平行的街道，也都筑有坚固的工事。简单地说，还被起义者占领着的两个郊区很象是真正的要塞，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政府军队都必须用战斗来夺取。

26日早晨，战斗重新开始。但是，卡芬雅克不大愿意把他的军队投入这个街垒网中。他用炮击进行威胁。他调来了臼炮和榴弹炮。谈判开始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卡芬雅克下令在附近的房屋下面挖掘坑道，但是由于时间短促，由于街垒的一面有运河掩护，这个工作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他又命令凿穿已夺取的房屋的防火壁，与毗连的房屋建立内部交通。

谈判中断，战斗又起。卡芬雅克命令佩罗将军由坦普尔郊区进攻，拉摩里西尔将军由巴士底狱广场进攻。从这两个地点对街垒展开了猛烈的炮击。佩罗前进得相当迅速，占领了坦普尔郊区的其余部分，而在某些地点甚至楔入了圣安东郊区。拉摩里西尔前进得比较缓慢。尽管郊区的前排房屋被他的榴弹焚毁了，但第一道街垒在他的炮火下仍然屹立不动。他再一次举行谈判。手里拿着表，等待着他以炮火夷平巴黎最稠密的住宅区的得意时刻。最后，一部分起义者投降了，而另一部分起义者由于受到侧击，经过短促的战斗后也退出了城市。

六月的街垒战就此结束了。虽然在城外还有步枪声，但已没有任何意义了。逃出的起义者向四郊溃散，一一被骑兵俘获。

我们所以要对这一斗争作纯军事的叙述，是为了告诉我们的读者：巴黎工人作战多么英勇，多么齐心，多么有纪律，多么有军事素养。4万工人同4倍于自己的敌人鏖战了4天，而且差一点就要获得胜利。如果稍微再加一把劲，他们也许就可以在巴黎中心区巩固起来，夺取市政厅，成立临时政府，靠占领的市区的居

民和别动队(当时只要推动一下;就会使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来补充人员,使自己的人数增加一倍。

德国各家报纸断言,这是红色共和国和三色共和国之间的一场决战,是工人和资产者之间的一场决战。我们认为,这场战斗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它只能导致胜利者的内部分裂。其次,即使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整个事变的过程也证明:在不久的将来,工人一定会取得胜利。如果说4万巴黎工人在同4倍于自己的敌人的斗争中能够取得这样大的结果,那末全巴黎的工人群众齐心协力地一致行动起来,将会有多大的成就呵!

盖尔索济被俘,也许现在已被枪毙。资产者能够枪毙他,但是不能从他那里夺取这样的荣誉:他是巷战的最初的组织者。他们能够枪毙他,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在将来的一切巷战中采用他的战斗方法。他们能够枪毙他,但是不能阻碍他以第一个街垒战指挥者而名垂史册。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
30日到7月1日

载于1848年7月1日和2日
“新莱茵报”第31号和3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德国的对外政策

科伦 7 月 2 日。自古以来，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在德国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用不着追溯得太远，就以近 70 年来看，德国曾经为了英国的黄金而派它的雇佣兵去帮助英国人镇压争取独立的北美洲人。第一次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又受别人唆使，象一群疯狗似的去咬法国人；他们在不伦瑞克公爵凶恶的声明中威胁说要把巴黎彻底毁灭¹⁰⁹；他们和逃亡国外的贵族串通起来反对法国的新秩序，为此获得了英国的奖赏。当荷兰人在近两个世纪中好不容易第一次有了理智的想法（结束奥伦治王朝的昏庸统治，把国家变为共和国¹¹⁰）的时候，德国人又充当了戕害自由的刽子手。瑞士也可以说出不少关于它的邻居德国人的罪状，匈牙利要想很快地从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朝廷给它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是很困难的。德国雇佣兵甚至还被派到希腊去扶助那里的可爱的奥托¹¹¹的小小王位，德国的警察甚至被派到葡萄牙去。还有在 1815 年以后召开的各种会议，奥地利向那不勒斯、都灵、洛曼尼雅的进军，监禁伊普西朗蒂，法国在德国的压力下发动了反对西班牙的奴役性战争¹¹²，德国支持唐·米格尔¹¹³、唐·卡洛斯¹¹⁴，汉诺威军队充当英国反动派的工具，在德国的影响下比利时被分裂和热月化！甚至在俄国内地，德国人也是专制君主和小暴君们的

支柱——整个欧洲都充满了科布尔克家族的人！

波兰在德国军阀的干涉下被掠夺和分割；克拉柯夫也是被他们奸险地窒息了¹¹⁵。在德国的金钱和鲜血的帮助下，伦巴第和威尼斯被奴役，并且被弄得民穷财尽；意大利各地的任何一次解放运动都是在德国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下，用刺刀、绞架、监狱和划船劳役镇压下去的。它的罪行数不胜数，我们不必一一列举了！

这些卑鄙行为都是在德国的帮助下在其他国家中干出来的，这不仅是德国政府的罪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国人民的罪过。要是他们不盲目无知，没有奴隶精神，不甘愿扮演雇佣兵和“仁慈的”刽子手的角色，不甘愿充当“天生的”老爷们的工具，“德国人”这几个字在国外就不会被人当作充满仇恨、诅咒和蔑视的骂人话，而受德国奴役的各族人民也早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现在，当德国人在抛弃自己身上的羁绊的时候，也应当改变一下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话，我们的年轻的、几乎是刚刚预感到的自由就会被束缚在我们用来束缚别国民族的锁链上。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

光明终于真正开始出现。旧政府机关报所大肆散布的关于波兰和意大利的谣言和歪曲，人为地激起仇恨的种种企图，什么事关德国荣誉和德国威力等等言过其词的滥调，——所有这一切魔术手法都已失去了效力。只是在这些爱国主义的华丽辞藻里面包含着物质利益的地方，只是在一部分打着正式的爱国主义的招牌来图谋私利的大资产阶级那里，这种正式的爱国主义还会有自己的市场。反动的政党懂得并利用了这一点。但是，德国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了解或者至少感觉到，毗邻民族的自由是他们

本身自由的保障。难道奥地利反对意大利独立的战争,普鲁士反对波兰复兴的战争受人欢迎吗?难道对于这些“爱国主义的”十字军讨伐的最后幻想不是在消失吗?但是,仅仅有这种了解,仅仅有这种感觉还是不够的。为了使德国人不再违反德国本身的利益,为压迫其他民族而流血牺牲和浪费金钱,我们就应当争取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彻底摧毁旧的建筑。只有到那时,重新恢复起来的旧制度的血腥而又怯懦的政策才会被国际主义的民主政策所代替。当国内民主备受压制的时候,怎么能对外实行民主政策呢?但是,阿尔卑斯山的这面和那面都应当竭尽全力,采取一切措施来准备实现民主制度。意大利人一再表示对德国友好。请大家回忆一下米兰临时政府对德国人民的宣言¹¹⁶和意大利报刊上用同样精神写成的许多文章。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关于这种态度的新的证据,这就是佛罗伦萨出版的“黎明报”的编辑给“新莱茵报”的编辑的一封私人信。信上标明的日期是6月20日,其中特别讲到:

“……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对我们可怜的意大利的关怀。请你们相信:我们全意大利人都知道究竟谁在侵犯他们的自由,谁在压制他们的自由;他们懂得:他们的死敌并不是强大浑厚的德国人民,而是德国人民的专横的、非正义的、残暴的政府。请你们相信:每一个真诚的意大利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能够自由地向德国兄弟伸出手的日子的到来。因为他们知道:德国兄弟一旦稳固地确立了自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会保护它,尊重它,同时也会尊重自己所有兄弟的同样的权利。我们对于你们一贯遵行的那些原则深信不疑。

你们的忠实的朋友和兄弟 李·阿利纳里(签名)”

“黎明报”是意大利为数不多的坚决拥护民主原则的报纸之一。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2日
载于1848年7月3日
“新莱茵报”第3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马拉斯特和梯也尔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醒“新莱茵报”的读者注意“国民报”派的阴谋，这种阴谋的体现者是马拉斯特。我们已经揭露了这个派企图实行专政的诡计。同时我们也指出了：马拉斯特的专政会导致梯也尔的专政。

从一些事实可以明显地看出，“国民报”派由于自己的胜利而受到目前和王朝反对派紧密团结的梯也尔派怎样的排挤。

任命“国民报”派的代表卡诺为部长的事在国民议会里引起了一场大风波。国民议会主席候选人马利遭到反对，杜弗尔被提为候选人来代替马利。而马利之所以得到通过，是因为他（根据“辩论日报”的说法）被认为是“旧执行委员会中最贤明最稳健的委员”，就是说因为他对旧的王朝派作了最大的让步，他起草了禁止集会的法案（这是九月法令的继续），把这个法案提交国民议会并且为它辩护。显而易见，国民议会主席的职位是由“马拉斯特”和“梯也尔”在互利的的基础上磋商决定的。

但是“王朝反对派”对这点表示不满。王朝反对派起草的法律中有一项关于市政委员会的法律，这项法律是直接反对巴黎市长马拉斯特，反对他的独裁和权威的。马拉斯特定会垮台。

不久国民议会的所有议员就会争吵起来。反动派将继续进攻，直到“国民报”派放弃一切权力为止。“共和派”和“王朝反对派”又

将针锋相对。但是,如果还是象二月里那样,共和派就不会取得胜利。

人民再也不会沉溺于幻想了。他们不会把复仇的事情束诸“高阁”。正如科西迪耶尔所说的,他们再也不允许“斯底克斯河的水冲走他们的愤怒”¹¹⁷。Qui vivra vera〔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

写于 1848 年 7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3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33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妥 协 辩 论

科伦 7 月 2 日。悲剧之后是牧歌，巴黎六月的霹雳之后是柏林妥协派的鼓声。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这些先生了，原来正当卡芬雅克炮轰圣安东郊区的时候，康普豪森先生在发表忧伤的告别演说，而汉泽曼先生则在报告新内阁的施政纲领。

首先我们满意地指出，汉泽曼先生接受了我们的劝告，没有做首相。他懂得支配首相比做首相重要得多。

新内阁尽管假借了奥尔斯瓦特的名义(*prête-nom*)，实际上却仍然是汉泽曼内阁。它一方面把自己这样伪装起来，另一方面又吹嘘自己是办事内阁，是实践内阁。而事实上，奥尔斯瓦特先生是没有任何条件可以做办事大臣的！

汉泽曼先生的政纲是人所共知的。我们不去分析它的政治论点，这些论点已经成了那些无足轻重的德国报纸的报道资料。只有一个论点，它们不敢提出来讨论，为了使汉泽曼先生不受委屈，我们现在把被忽略了的东西补上。

汉泽曼先生声明说：

“为了振兴工业，从而消灭人民中的劳动阶级的贫困，除了恢复人们已经动摇了的信任，使他们相信法律秩序是巩固的，相信君主立宪制即将巩固地

确立起来而外,目前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我们正以全力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奋斗,因而我们是在最坚决地和失业现象、贫困现象作斗争。”

汉泽曼先生在他的政纲的一开头就声明说,为了这个目的,他将提出新的弹压的法律,因为旧的法律(警察国家的法律!)已经不够用了。

说得相当明确。旧的专制的法律已经不够用了!不是由公共工程大臣,也不是由财政大臣,而是由陆军大臣负责消灭劳动阶级的贫困。首先是弹压的法律,然后是霰弹和刺刀,——实在“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了!也许施莱根施坦先生(据一篇威斯特伐里亚的贺词说,仅仅他的姓就能使叛乱者胆颤心惊)已经在热望继承他在特利尔的业绩,想当普鲁士的小卡芬雅克了吧?

而除了这个“最有效的”办法以外,汉泽曼先生还有其他的办法:

“为了这一目的,依靠对国家有实际益处的公共工程来提供就业条件也是必要的。”

由此可见,汉泽曼先生答应要在这方面比帕托夫先生“做更多的工作来为人民中的整个劳动阶级造福”。但是只有“在内阁解除了由骚动和煽动所造成的使国家秩序遭到破坏的忧虑以后,在内阁恢复了获得必要的货币资金所必需的普遍信任以后”,他才会这样做。

目前,汉泽曼先生不可能进行任何工作,因为他没有钱。只有当信任恢复以后,他才能够得到钱。但是,等到信任恢复时,工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会找到工作,那时政府就用不着给失业者以

俏皮话:德文中施莱根施坦这个姓(Schreckenstein)含有“恐怖”(《Schrecken》)的意思。——编者注

工作了。

汉泽曼先生的消灭贫困的措施就在这个绝无恶意而具有市民阶级的善心的圈子里回旋。现在汉泽曼先生除了九月法令和小卡芬雅克以外,不可能向工人提出什么别的东西。是的,这就是办事内阁!

政纲中关于承认革命的问题,我们就不打算谈了。“科伦日报”的一位以《G》为笔名的“消息灵通的记者”刚才向大家暗示,汉泽曼先生为了同我们接近的评论家的利益是如何拯救法制基础的。汉泽曼先生只把那种实质上绝非革命的东西当做了革命。

汉泽曼先生刚一说完,奥尔斯瓦特首相便站了起来,因为他也应该说几句话。他掏出了一张写满字的小纸条,大致地朗诵了(只是不象朗诵诗的样子)如下的东西:

先生们!今天我呆在你们中间,
感到非常幸运,
这里有许多高贵的伙伴,
他们热情地向我吼吟。
我在这一瞬间的感受,
简直是无法计量的;
啊!这一美好的时刻,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¹¹⁸

我们将会看出,我们在这里给首相先生的那个很难理解的便条作了最有利于他的解释。

奥尔斯瓦特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念完,我们的汉泽曼又进来插嘴,为的是提出信任问题来表明他仍然和从前一样。他要求把奏摺草案转交委员会,并且说道:

见本卷第 60—61 页。——编者注

“议会接受这个提案,就会使人觉得崇高的议会是在一定程度上信任新内阁的。”

但是,这已经过分了。议员魏克塞尔(他无疑是一位“新莱茵报”的读者)愤慨地跳上讲台,对这种老是提出信任问题的方式表示坚决抗议。他一直讲得很好。但是德国人一打开话匣子,就不会很快收场。于是魏克塞尔先生就大发议论,谈到革命,谈到1807年和1815年,谈到在普通的短外衣里边跳动的热烈的心,谈到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所以要谈这一切,是因为“他认为必须谈”。左派发出的惊叫声和一部分叫“好”声,使得这位可尊敬的人不得不走下了讲台。

汉泽曼先生要议会相信,内阁绝不是故意轻率地提出信任问题的。况且这次提出的并不是信任问题的全部,而只是一部分,所以这一点也就没有说的必要了。

这时就展开了一场罕有的热烈的辩论。所有的人同时发言,乱扯一通。大家谈信任,谈日程,谈会议规则,谈波兰人的民族性,谈延期讨论;所有这一切都同叫“好”声和喧嚷声交织在一起。最后,帕里鸠斯先生指出,汉泽曼先生是代表内阁提出议案的,虽然内阁本身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议案,它只能发表通报。

汉泽曼先生回答说:他已经预先说明,议案按实质说来完全不是议案,而只是内阁的愿望。

于是,庄严的信任问题只归结为大臣先生们的“愿望”了!

帕里鸠斯先生从左边跳上讲台,里茨先生从右边跳上讲台。他们在讲台上碰头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位英雄谁也不肯让步;直到主席埃塞尔先生发言了,两位英雄才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察哈里埃先生以自己的名义提出内阁的建议,要求继续辩论。

察哈里埃先生是本届内阁和上届内阁的忠实的帮手,在讨论贝伦兹的提案时,他就在适当的时候起来为贝伦兹修正,因而成了贝伦兹的天使和救星,可是现在他再也找不到更多的理由来论证自己的议案了。财政大臣先生所说的已经足够了。

于是展开了一场带有不可避免的修正案、时断时续、杂以喧嚷声和叫喊声、在会议规则上吹毛求疵的长时间的争论。把我们的读者引入这个迷宫是没有必要的,只要在他们面前开辟几条走出这种混乱状态的最明显的道路就行了。

(1)议员瓦尔德克以教训的口吻说:奏摺不可能退还委员会,因为委员会已不存在。

(2)议员许弗尔声明说:奏摺不是给国王的答复,而是给大臣们的答复。起草御前演说的大臣们已不存在。我们又怎能答复那些已不存在的人呢?

(3)议员德斯特尔以修正案形式由此做出如下的结论:议会认为必须否决奏摺。

(4)主席埃塞尔把这一修正案说成这样:“这个声明似乎是新的提案,而不是修正案。”

争论的骨架就是如此。但是在这付消瘦的骨架上长满了肥肉,这就是大臣洛贝尔图斯先生和屈韦特尔先生、议员察哈里埃先生和赖辛施佩格第二先生等的发言。

情况是极为奇怪的。正如洛贝尔图斯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要内阁在讨论奏摺草案以及因此而发生争论的时候辞职,是议会史上闻所未闻的!”总的说来,普鲁士是得天独厚的,它在刚刚开始议会生活的头6个星期里,就发生了“议会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情。

汉泽曼先生和议会一样处在窘境中。作为对康普豪森-汉泽曼的御前演说的明确答复的奏摺,实际上应该成为对汉泽曼-奥尔斯瓦特政纲的答复。因此,对康普豪森谄媚的委员会,对汉泽曼先生也应该表示同样的媚态。困难只是在于要向人们解释这个“议会史上闻所未闻”的要求。为此他们采取了一切手段。洛贝尔图斯,这位中间派左翼的风神之琴,弹起了最温柔的调子。屈韦特竭力安定大家的情绪;在重新审查奏摺草案时,“会得出结论说,即使在目前,也没有提出任何修正案的理由(!)但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必须把草案退还委员会,——这难道是可能的么!最后,对这种长时间的争论一贯感到讨厌的汉泽曼先生来了个快刀斩乱麻,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应该把草案退还委员会的原因:他不希望新的修正案作为内阁的修正案从后门溜进来,——它们应该作为委员会的提案穿过敞开的大门从前门进入大厅。

首相声明说,“内阁根据宪法参与奏摺草案的起草工作”是必要的。这怎样理解,奥尔斯瓦特先生指的究竟是什么宪法,我们自己无论怎样思考,也弄不清楚。何况普鲁士目前没有任何宪法。

不过还需要提一下反对方面的两个发言——德斯特尔先生和许费尔先生的发言。德斯特尔先生非常成功地嘲笑了汉泽曼先生的政纲,说他把自己过去的看法——鄙视抽象概念、鄙视在原则等等问题上的无谓争论——运用于他的极为抽象的政纲中了。德斯特尔要求办事内阁“认真办事,抛开原则问题”。他的提案——整整一天中唯一合理的提案——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比所有的人都更为明确地对奏摺表示了正确看法的许费尔先生,也非常明确地对汉泽曼先生的要求表示了态度:内阁希望我们信任它,把奏摺转交给委员会,并且要我们决定它的存在。但是,内

阁只能要求对它自己的行动投信任票,而不能要求对它迫使议会采取的行动投信任票。

简单说来,汉泽曼先生要求投信任票,而议会为了解除汉泽曼先生的忧虑,间接地谴责了讨论奏摺草案的委员会。办事内阁很快就会向议员先生们指出,著名的 Treasury Whip(内阁的鞭子)是什么人。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7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4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34 号

逮 捕

科伦 7 月 3 日。办事内阁目前的表现说明它只不过是一个警察内阁。它的第一个行动是在柏林逮捕莫内克先生和弗恩巴赫先生,第二个行动是在萨尔鲁伊逮捕炮兵下士丰克。现在,这些“事情”也在科伦这儿开始了。今天早晨逮捕了医师哥特沙克先生和退伍中尉安内克先生。无论是逮捕的原因或逮捕时的情况,我们都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因此暂时不发表意见。

工人们是十分理智的,他们不会因挑衅而贸然行动。

写于 1848 年 7 月 3 日

载于 1848 年 7 月 4 日

“新莱茵报”第 3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逮 捕

科伦 7 月 4 日。昨天我们就答应我们的读者回头谈谈哥特沙克医师和安内克先生被捕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所得到的消息中,只有安内克被捕的消息比较详细。

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有六七个宪兵来到了安内克的住宅,他们一进门就马上粗野地把女仆推开,然后悄悄地沿着楼梯爬上楼去。3 个人留在前厅,4 个人闯进寝室。这时安内克和他的即将分娩的妻子还没有起床。这 4 个法庭的得力骨干中,有一个一早起来就喝了不少“Geist”、白酒和伏特加酒,走起路来已经有点摇摇晃晃。

安内克问他们要干什么。“跟我们走!”——回答很简单。安内克请求他们,至少要原谅他的有病的妻子,请他们到前室去。但是,神圣的埃尔曼达德¹¹⁹先生们不愿离开寝室;他们要安内克赶快穿好衣服,甚至不许他同妻子说几句话。在前室里,他们不但催逼,而且动起手来,有一个宪兵把一扇玻璃门打得粉碎。他们把安内克推下楼去。4 个宪兵把他带到新监狱,3 个留在安内克夫人那里看守着她,等候国家检察官到来。

根据法律,在逮捕人的时候至少要有个法警的官员——警

双关语:“Geist”意指“精神”,同时也指“烈性酒”。——编者注

察署长或者其他什么人到场。但是,既然人民已经有了两个保护自己权利的议会(一个在柏林,另一个在法兰克福),还要这样的形式手续做什么呢?

过了半个小时,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预审推事盖格尔就来进行搜索了。

安内克夫人申诉说,国家检察官不应该让那些粗野的宪兵在没有任何负责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就随便捕人。黑克尔先生回答说,他没有下令对被捕者要粗野。好象黑克尔先生可以下这种命令似的!

安内克夫人:看来是有意只派一些宪兵先来,这样就可以对这些人的粗暴行动不负责任。而且逮捕是非法进行的,因为没有一个是宪兵出示逮捕令;不错,有一个宪兵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什么小纸条,但是他并没有交给安内克过目。

黑克尔先生:“派宪兵进行逮捕是根据司法机关的决定”。难道司法机关的决定可以不遵照法律的规定么?国家检察官和预审推事没收了大量的文件和传单,其中有安内克夫人的一大包文件,以及其他东西。这里应该顺便提一下:预审推事盖格尔先生已被提名为警察厅长了。

晚上安内克被审问了半小时。他之所以被捕,似乎是由于他在居尔策尼希最近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¹²⁰。Code pénal(刑法典)¹²¹第 102 条所提到的公开演说,是指那些直接号召谋叛皇帝和皇族的言论,或旨在号召用内战,即非法使用武力、公开进行杀戮或掠夺来破坏国家安宁的言论。普鲁士的术语“煽动不满”未见于该法典。由于无法运用普鲁士的法律,所以在司法上完全不容许运用第 102 条的场合,也都要暂时采用第 102 条了。

就在进行逮捕的时候，城里集结了相当大的兵力；从早晨4点钟起军队就在兵营里集合了。兵营把面包师和手艺人放进来以后就不放他们出去了。早晨6点钟左右，骠骑兵从多伊茨开到了科伦，在全城驰骋而过。一支由300人组成的队伍已经到新监狱驻防。今天得到消息说，又有4人被捕，这4个人是严森，卡克尔，埃塞尔，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人。贴在墙上的严森号召工人保持镇静的告工人书，据目击者谈，昨天晚上已经被警察撕去了。这样做是为了维持秩序呢，还是为了在光荣的科伦城实现早已拟好的计划而寻找借口？

据说，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先生早已问过阿恩斯贝尔格高等法院，是否能根据先前的判决¹²²逮捕安内克，然后将他转送幽里希。看来，国王大赦妨害了这一善良意图的实现。问题已经转呈内阁处理。

据说，似乎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先生还声明说，他将要在一个星期内在莱茵河畔的科伦城里取消3月19日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取消出版自由，取消倒霉的1848年的其他一切产物。茨魏费尔先生的确不是一个怀疑论者！

茨魏费尔先生不是把执行权和立法权集于一身了吗？也许最高检察官的荣誉可以用来遮盖人民代表的难堪吧？我们要再次翻一翻我们心爱的速记记录，让读者看看人民代表、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活动的全貌。

总之，办事内阁所办的事，中间派左翼内阁所办的事就是如此，它是一个向旧贵族、旧官僚、旧普鲁士的内阁过渡的内阁。只要汉泽曼先生一扮演完过渡的角色，他就会被解职。

而柏林的左派应该懂得，只要旧政权能占据一切真正有决定

意义的阵地 ,它是能够放心地让左派在议会里获得小小的胜利和拟定大大的宪法草案的。只要在议会外解除了 3 月 19 日革命的武装 ,它是会在议会里大胆地承认这一革命的。

左派总有一天会相信 ,当它在议会里获得胜利的时候 ,它在实际上却遭到了失败。德国的发展或许也需要这种对比吧。

办事内阁在原则上承认革命 ,是为了在实际上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写于 1848 年 7 月 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5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35 号

妥协辩论

科伦 7 月 4 日。今天我们来谈谈 6 月 28 日的妥协会议。议会讨论的是新任主席、新的会议规则和新任各部大臣的问题。因而可以想象 ,那里的情況是多么混乱。

在对会议规则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事先酝酿之后 ,最后由议员格拉德巴赫发言。几天以前普鲁士军阁以强制手段解除了因信仰共和主义而被解散的、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返回斯潘道的志愿军兵团第六连士兵的武装 ;其中有些人甚至还被逮捕了起来。普鲁士军阀在法律上是绝对没有任何根据和任何权力这样做的。依照法律 ,军事当局根本没有擅自采取这种措施的权利。但是 ,这些志愿军中大多数人都曾参加过柏林街垒战 ,因此 ,近卫军先生们一定要向他们报仇。

格拉德巴赫先生就军阀的这种专横行为向内阁提出了质问。

陆军大臣施莱根施坦回答说 ,关于这件事情他一点也不知道 ,他保留向有关机关质询的权利。

原来 ,人民发给陆军大臣薪俸 ,是因为他 28 日在柏林还一点不知道距柏林 3 小时路程的斯潘道军事当局的行动 ,是因为可以说就在他眼前 ,在距柏林 3 小时路程的地方 ,近卫军的中尉占领了车站 ,夺取了武装的人民在战场上所夺得的、应归他们所有的武器 ,这些中尉甚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无须向大臣先生提出报告 但

是,作出这种英雄行动的陆军中校施利希廷先生当然是按照波茨坦的“指令”行动的,显然,他向波茨坦也提出过报告!

消息灵通的陆军大臣恳求说:明天,也许我就能给以回答!

察哈里埃接着问道:内阁曾答应提出市民自卫团的法案。这个法案是不是要以武装全民的原则为根据呢?

新任内政大臣屈韦特先生回答说:市民自卫团的法案业已提出,但是内阁还没有讨论,因此,对这个问题他不能提供更详细的材料。

原来新内阁组织得如此仓促,对基本的原则问题还十分不清楚,以致象武装人民这样紧要的问题还根本没有提出来讨论!

格拉德巴赫议员质问的第二件事情是关于有关机关最后确定市长和其他官员的问题。这些机关至今仍然负着这方面的责任。因为所有旧的行政机关都只是暂时性的,所以在依据有关法律最后确定各种官员的委任条例以前,它们只能暂时填空补缺。尽管如此,但是市长和其他官员仍然被最后确定了。

屈韦特大臣完全赞同格拉德巴赫先生的意见,并且声明说,他将发出通知:市长的委任只是暂时的。

主席格拉博夫先生巧妙地应付了格拉德巴赫先生接着提出的关于解除许多官员职务的问题。这些官员深为他们统治下的老百姓所痛恨,其中有一些(特别是在农村)在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就被赶跑了。

在会议规则问题上进行不大的争论以后,会议就开始讨论迪尔施克议员对克兹林宣言¹²³、对区行政机关和县长传播这个宣言提出的质问。但是,议员先生完全忘掉了,他的质问已列入议程,可是没有必要的论证文件。因此,他只好发表一些一般的抨击反动派

的言论,接受大臣的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和听取主席的发言,看来,迪尔施克对回答是满意的。

然而,迪尔施克先生还提出了第二个质问:各部大臣是不是事先就准备制止贵族和官僚的反动企图呢?

但是看来他又忘记了这个问题的证明文件。他又不列举事实,而只是夸夸其谈,并且认为最好是请内阁发表宣言声讨反动派。

屈韦特尔先生当然回答说,使他感到兴趣的不是贵族地主和官员们的信念,而只是他们的行动;这些人和迪尔施克先生享有同样的自由;不过迪尔施克先生应该举出事实来。他郑重地拒绝了发布声讨反动派的“命令”的荒谬意见。这时迪尔施克先生引证了一个事实:在他所在的奥瑙区,县长就似乎声明过,只有霰弹使国民议会团结起来后,它才会妥协,县长又说,这个区的议员(即迪尔施克本人)好象曾说过,吊死大臣是无谓之举。

主席由此做出结论说,迪尔施克先生对第二个质问的答复也是满意的,而迪尔施克先生也找不出反驳的东西了。

但是汉泽曼先生觉得自己并不满意。他责备发言人避开了基本问题。他“要议会判断,个人对官员提出控告究竟恰当与否,如果控告不能立刻证实的话”。

汉泽曼先生这样傲慢地挑战之后,便在右派和中间派的响亮的赞许声中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议员埃尔斯纳提出了一个紧急建议。他指出必须立刻委派一个委员会去调查纺织工人的状况和整个普鲁士亚麻工业的状况。

埃尔斯纳先生向议会做了一个简短而又使人信服的报告,叙述了旧政府怎样不止一次地使亚麻工业成了王朝和正统主义的各

种利益的牺牲品 ,或者更正确些说 ,成了奇癖怪好的牺牲品。西班牙、墨西哥、波兰、克拉柯夫便是证明。

幸亏事实是能使人信服的 ,而且所涉及的又只是旧政府。所以 ,没有人起来反驳 ;政府声明说 ,它早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委员会处理了。这样建议就一致通过了。

接着 ,德斯特尔对给波兰人剃光头一事¹²⁴提出质问。

德斯特尔声明说 ,他希望得到解释的不仅是这件事情本身 ,而且特别是内阁对付这种行动的措施。所以 ,他质问的并不是陆军大臣 ,而是整个内阁。

奥尔斯瓦特先生 :要是德斯特尔不希望得到关于这个具体事件的回答 ,那末“内阁就完全没有兴趣”讨论这个问题。

的确 ,内阁是完全“没有兴趣”讨论这个问题的 !真是奇闻 !实际上 ,人们通常提出质问的正是“内阁”绝对“没有兴趣”讨论的问题 ,正因为内阁没有兴趣回答 ,所以 ,首相先生 ,人们才向内阁提出了质问。

但是 ,首相先生也许认为 ,和他打交道的不是他的上司 ,而是他的下属。他答复质问总是要看问题的提出是否有利于内阁而不利于国民议会 !

我们现在只能用主席格拉博夫先生没有经验来解释他没有制止奥尔斯瓦特先生的这种官僚的傲慢行为。

但是 ,首相担保 ,政府将要采取坚决措施制止给波兰人剃光头 ,不过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他只能以后再谈。

德斯特尔欣然同意缓期回答 ,不过他希望奥尔斯瓦特指出赐复的日期。

奥尔斯瓦特先生大概听觉迟钝 ,他回答说 :我认为决不能从我

的声明里做出结论说 ,内阁今后不愿意 (!)再谈这个问题。但是日期他还不能确定。

可是 ,贝恩施和德斯特尔都坚决表示 ,他们要求把事实本身也解释一下。

接着 ,德斯特尔提出第二个质问 :政府在莱茵省 ,特别是在科伦城进行军事准备的用意何在 ? 是否产生了保卫与法国接壤的国境的必要性 ?

施莱根施坦先生回答说 :除了一些后备军外 ,最近几个月来 ,没有调任何军队到莱茵去。(就算这样吧 ,勇敢的巴亚尔 ,但是要知道 ,那里的军队早就绰绰有余了。)为了使祖国不致濒于危险 ,不仅科伦城 ,而且所有的要塞都在加强戒备。

这就是说 ,如果不把科伦的军队调到要塞(他们在那里既无事可做 ,居住条件又很坏)里去 ,如果不发给炮兵以大炮 ,不配给军队以 8 天的粮食 ,如果不供给步兵以弹药 ,给炮兵以霰弹和炮弹 ,那末 ,祖国就会处在危险中吗 ?可是 ,按照施莱根施坦先生的说法 ,只有科伦和其他大城市处在危险中 ,祖国才会处在危险外 !

但是 ,“军队的一切调动 ,必须交由军事人员 ,陆军大臣核准 ,否则他就不能负责 !”

这样说来 ,仿佛讲这种话的是一位无辜受辱的少女 ,而不是普鲁士 *pro tempore*(暂时)的巴亚尔 ,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 ,使人闻名丧胆的帝国男爵罗特·冯·施莱根施坦 !

议员德斯特尔医生同帝国男爵罗特·冯·施莱根施坦的魁梧身材比起来确实显得矮小 ;如果他要询问一下施莱根施坦先生某项措施的意义 ,那末伟大的帝国男爵就会认为 ,区区医生竟想夺取他调遣军队的权利 ,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能负责的 !

简单说来,陆军大臣先生声明的是,不应该向他追究责任,否则他就根本不能负责。

但是,议员的质问同“军事人员,特别是陆军大臣的核准”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德斯特尔声明说,诚然他并不满意,但是他从施莱根施坦的回答中得出一个结论:进行军事准备是为了保卫与法国接壤的国境。

奥尔斯瓦特首相对这个结论提出了抗议。

要是国境线上所有的要塞都加强戒备了,那末,整个国境就能“保卫住”。要是整个国境都保卫住了,那末,与法国接壤的国境也就能“保卫住”。

奥尔斯瓦特先生同意这些前提,因而“以内阁的名义不作”结论。

相反地,“根据”人们的常识,我们“要作”结论:奥尔斯瓦特先生不只是听觉迟钝。

德斯特尔和普法尔立刻表示抗议。赖辛巴赫声明说,东部西里西亚的最大要塞迺伊斯,就根本没有加强戒备,情况十分糟糕。当他开始列举这方面的详细材料时,右派在中间派的支持下便疯狂地叫嚣起来,于是赖辛巴赫不得不走下讲台。

摩里茨先生:

“赖辛巴赫伯爵没有指出他是根据什么理由发言的(!)。我想,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也能发言(!)。我认为用这样的方法……(喧声大作)使内阁处于困难的境地,谈论不应该广泛宣传的东西,是不符合议会制度的,是议会史上闻所未闻的……我们被派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使祖国陷入危险的境地。”(喧声惊人。我们的摩里茨只得走下讲台。)

议员埃塞尔第一对会议规则第 28 条作了及时而严肃的解释，才结束了这场喧嚷。

摩里茨先生提出抗议，并且声明说，他根本不希望提出实际的修正案，他只想“根据赖辛巴赫伯爵发言的理由来发言”议会中的保守派支持他，并且以大声叫“好”来鼓励他，而极左派却对此掀起抗议之声。

奥尔斯瓦特：

“对那些有关普鲁士国家的防御能力的情况进行全面的或部分的讨论是否妥当呢？”

首先，对此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谈的不是国家的防御能力，而是它无力防御。第二，不妥当是指陆军大臣以武力来反对国内的敌人，而不反对国外的敌人，但根本不是指提醒他注意他的职责。

右派郁闷不乐，要求停止讨论。在一片吵闹声中，主席宣布问题已经解决。

议程上列有荣克的质问。荣克先生认为缺席为佳。真是奇怪的人民代表！

这时，朔尔茨议员提出质问。他逐字逐句地说：

“质问内政大臣先生，是否能够解释，是否愿意回答在各个地区不合理地采用便衣警察¹²⁵的问题。”

主席：首先我要问，这个质问是否清楚。

（质问不够清楚，重说一遍。）

屈韦特尔大臣：我确实不知道，要我解释什么问题。我觉得问题提得不清楚。

主席：有人支持这个质问吗？（没有人支持）

朔尔茨：我暂时收回自己的质问。

在这场空前绝后的、“议会史上闻所未闻的”演出结束后,我们今天也“后”退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7 月 4 日

载于 1848 年 7 月 5 日

“新莱茵报”第 3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科伦 7 月 6 日。昨天“〔新〕莱茵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哥特沙克医师和安内克先生被捕事件的文章(文章注明“科伦 7 月 4 日”) ;刚才我们收到了一个反驳那篇文章的声明。

“据报载 ,似乎安内克夫人申诉说 ,在逮捕她的丈夫时没有一个负责人员到场 ,而我给她的回答是 :

我没有下令对被捕者耍粗野。

我现在声明 ,这样的报道是不真实的。

事实上 ,我只声明 :要是宪兵有举止不当的地方 ,那她表示遗憾。

其次 ,据报载 ,似乎我曾经这样说 :

‘派宪兵进行逮捕是根据司法机关的决定。’

我现在声明 ,这样的报道也是不真实的。

我只指出 ,逮捕是根据预审推事先生的逮捕令进行的。

依照法律逮捕令应由司法执行官或军事当局的代表执行。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定要有法警的官员到场。

这篇文章对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和执行逮捕的宪兵进行的诬蔑性的攻击和侮辱 ,将会在法庭审讯本案时得到应有的评判。

国家检察官黑克尔

1848 年 7 月 5 日于科伦”

我们敬爱的读者根据上面的引证就会相信 :“新莱茵报”增加了一位新的、前途很有希望的撰稿人—— 检察官。

我们只是在一个法律问题上犯了错误。在逮捕人的时候,应该到场的不是“法警的官员”,而是当局的代表。法典对人身不受侵犯表现了多么动人的关怀!

然而宪兵先生没有出示逮捕令这一点,毕竟还是非法的。我们后来得知,他们还在黑克尔先生及其随从到来以前就动手检查文件,这种行为也是非法的。但是尤其非法的,是使黑克尔先生表示遗憾的、对被捕者的粗野态度。使我们惊奇的是,法庭要审讯的不是宪兵先生们,而是揭露宪兵先生们的无礼举动的报纸。

要说侮辱,也许只侮辱了一位宪兵先生,报道中说这位先生一早起来就喝得有几份醉意,有点“摇摇晃晃”。但是,如果审讯证实——我们毫不怀疑这一点——当局的代表先生们确曾对被捕者态度粗野,那末,在我们看来,我们当时只是以极其关怀的心情和报刊应有的公正态度,并且也是为了我们所责难的先生们自己的利益,指出了唯一“可以减轻过失的情节”;可是检察官现在却把这种为博爱精神所驱使而指出唯一可以减轻过失的情节的说法说成是“侮辱”!

最后,我们来谈谈对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先生的侮辱或者诬蔑!

我们只登载了一条消息,并且如我们自己所指出的,这条消息是以我们从可靠方面得到的传闻为根据的。但是要知道,报刊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我们同时指出,茨魏费尔先生在议会里的活动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过去说他藐视人民可能是有根据的。难道有人想剥夺报刊评论人民代表的议会活动的权利吗?那末,又何必必要报刊呢?

难道报刊没有权利认为在人民代表茨魏费尔身上有着过多的

最高检察官的东西,而在最高检察官身上又有着过多的人民代表的东西吗?那末,为什么在比利时、法国等地发生了关于兼职问题的辩论呢?

至于谈到宪政的传统,我们介绍大家看一看路易·菲力浦时代的“立宪主义者报”、“世纪报”¹²⁶和“新闻报”¹²⁷是怎样评论既是检察机关的领导人、又是议员的阿贝尔、普路古尔姆等先生的议会活动的。请你们读一读比利时的力主宪政的报纸——“观察家”¹²⁸、“政治家”、“解放”,看看它们早在去年就怎样评论身兼议员和总检察官的巴魏先生的议会活动的。

难道在基佐内阁时期、在罗日埃内阁时期就一直容许的事情,在有最广泛的民主基础的君主制度下反而不容许了吗?难道任何一个法国复辟时期的内阁都不曾否认过的权利,到了原则上承认革命的办事内阁时期却成了犯罪行为吗?

此外,公众从我们今天早晨发行的增刊里可以看到,我们对于事件进程的预见是多么正确。洛贝尔图斯退出了内阁,而拉登堡却参加了内阁。几天功夫,中间派左翼内阁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旧普鲁士的反动内阁。右派决定发动政变¹²⁹,左派却以威胁的姿态退却了。

科伦最近发生的事件是早就在办事内阁的一个巨大的军事行动计划里规定好了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刚才我们得到通知说,“新莱茵报”被禁止送入监狱。这种禁止是根据监狱的规定呢?还是政治犯被处罚只准读“科伦日报”呢?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7 月 6 日

载于 1848 年 7 月 7 日
“新莱茵报”第 3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柏林的妥协辩论

科伦 7 月 6 日。目前在柏林,第二次内阁危机还在继续,用梅策议员的话来说,我们又将“从这场暴风雨中”回到妥协辩论的至今还这样“平静的海洋里”。不管怎样,我们在这个舒适安乐的环境中已经度过不止一小时了——

这里还是习俗和道德的世界,
而在我们中间,
恬静的欢乐却如花盛开¹³⁰。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 6 月 30 日的会议。在它开幕的时候,就发生了非常特别的重要事件。

谁没有听说过贝尔格区和马尔克区的 57 个家长为了拯救祖国而去长征的事呢?谁不知道这些保守的小市民阶层的英雄抛妻别子,不顾自己的事业,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去出征呢?他们向前挺进,是为了同革命作殊死的斗争,简单地说,是为了到柏林去向内阁呈递讨伐叛乱者的请愿书。

这 57 位骑士后来又向妥协议会呈递了一封含有温和而虔诚的反动愿望的信。议会宣读了这封信。一些右派先生当时就想知道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有哪些人。秘书刚开始念,就被“够了,够了!”的喊声打断了。

议员贝尔格:

“宣读的文件不是提案就是请愿书。如果是提案,那末我想知道哪一位议员支持这个提案。如果是请愿书,那末我们应该把它送交有关的委员会而不要再让这件事来打搅我们。”

贝尔格先生以这种言简意骇的回答把问题解决了。主席低声说抱歉抱歉,就把57个家长的信放在一边。

接着我们的老朋友,左派的朋友,万茨列本的议员舒耳茨走上讲台:

“前天我撤回了不按宗教仪式结婚的提案以及其他的提案,并且指出我将要修改这些法律草案的条文。在速记记录里我发现了对这件事的反应是‘笑声’。也许有人嘲笑过这件事,但是,这种嘲笑自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又是笑声)

于是万茨列本的议员舒耳茨非常天真烂漫地说,他只想把事情做好,他乐意接受良好的意见,并且考虑了人们对他的法律草案不完善的地方所提的意见,但是他自己无法对自己的提案提出修正,因此,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不向议会“提出”这个提案的初稿,而暂时把它收回。

“我一点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对‘笑声’两字我应该提出抗议,因为它使我的完全有根据的行动变成可笑的了。”

万茨列本的议员舒耳茨就象汤豪塞骑士一样:

只要想起这种笑声,
就要马上掉下泪来¹³¹。

议员布里尔指出,在向来是无懈可击的速记记录里,这回却漏掉了汉泽曼大臣的一句话:本届内阁的施政纲领是御前演出的继续。这个地方他所以记得特别牢,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印刷工人,当时就想起了他经常排印的字:“待续”。

这种对待严肃问题的轻率态度使议员里茨先生非常愤慨。他急速地跑上讲台声明说：

“诸位先生,我认为,为了维护议会的尊严,我们应该在发言中不用不适当的类推和不恰当的比较。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议会精神的。(喧声大作)上次会议我们开得太活跃了;我认为这有损议会的尊严……为了维护这个议会的尊严,我建议大家要慎重些。”

“为了”实现里茨议员的关于“慎重”的建议,我们要忠告里茨议员:“为了维护议会的尊严”,要尽量少发言,因为发言往往会带来“活跃”。

但是后来的事件明显地证明了,象万茨列本的舒耳茨先生和里茨先生这样有美德的人的善良意图,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往往受到不公正的评价。原来在主席格拉博夫先生所委派的计票人中,代表中间派左翼的是万茨列本的舒耳茨先生(笑声),代表中间派右翼的是布里尔先生。(活跃)说到布里尔先生,我们的读者应该知道,这位属于极左翼的议员,却坐在中间派右翼的席位上,靠近上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的农民;因为他有通俗的演说才能,所以能够使反动党派的一些破坏活动没有在这些农民中得逞。

接着,贝恩施先生就俄国的照会(据说弗兰格尔就是由于这个照会才从日德兰撤退的)提出质问。奥尔斯瓦特不顾“晨报”¹³²和俄国的“蜜蜂”¹³³的报道,竟否认有这样的照会。我们认为奥尔斯瓦特先生是对的;我们并没有认为俄国曾向柏林方面递交过正式的“照会”。至于尼古拉向波茨坦方面递交过什么东西,我们也象奥尔斯瓦特先生一样不大清楚。

贝恩施先生同时还就陆军少校维登布鲁赫递交丹麦政府的照会¹³⁴提出质问。从这个照会可以看出,丹麦战争不过是一场虚假的

战争,不过是为了给过度的爱国狂热寻找出路而想出来的一种游戏。

奥尔斯瓦特先生正在寻找借口,以便不回答这个质问。

在关于专门委员会的枯燥而混乱的争论结束后,这一次终于暴发了一场确实有趣的议会吵闹;在这场吵闹中,愤慨和论战的狂热一时压倒了右派惯有的喧声。我们应该把这场吵闹归功于格拉德巴赫议员。陆军大臣答应今天答复他的关于解除返国志愿军的武装并予以逮捕的问题的质问。

主席刚一宣布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早已熟识的陆军中校格里斯海姆先生立刻就起来发言。但是刺耳的叫声马上就结束了这种官僚式的丘八的纠缠。

主席解释说,根据会议规则第28条,大臣助理只有征得议会同意才能发言。

格里斯海姆:我就是以陆军大臣的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

主席:这一点我没有得到通知。

格里斯海姆:既然诸位先生不愿听我的发言……(啊哟!喧声)

“诸位先生!”在格里斯海姆看来,这些“先生”就是“崇高的议会”。主席先生应该叫格里斯海姆守规矩,因为他又举止失当了。

议会希望听完格里斯海姆先生的发言。格拉德巴赫先生为了要论证自己的质问就先发言了。但是,他首先声明说,因为他已向陆军大臣提出了质问,所以他要求陆军大臣出席——这是会议规则给予议会的权利。然而主席拒绝了这个要求;鉴于问题急待讨论,格拉德巴赫先生就开始叙述他的质问的内容。他叙述志愿

军怎样由于军事专横制度扩展到他们的兵团而退伍回家；他们怎样在斯潘道被“突然从各个偏僻的角落里钻出来的可恶的警察制度”烙上了“流浪者”这个侮辱性的绰号；他们怎样在斯潘道被解除武装和被扣留，而且发给通行证，强迫遣送回家。格拉德巴赫先生是第一个愤怒地叙述了这种应该受到愤怒斥责的可耻行为的议员。

格里斯海姆先生声明说，这些措施是根据柏林警察总署的请求采取的。

于是格拉德巴赫先生宣读了一个志愿军的退伍证明书，这个证明书是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爵弗里德里希签署的，其中写的都是好话；格拉德巴赫先生同时又把“根据内阁的决定”在斯潘道发给这个志愿军的通行证和这个证明书对照了一下，通行证给他规定了强制性的路线，这样就把他当做流浪者了。格拉德巴赫指出，通行证中包含着逮捕、强迫劳动和罚款的威胁；他根据官方文件证明，格里斯海姆先生的关于这一措施是出自警察总监的断言是假话。接着他问道：难道在斯潘道还有一个特别的俄国内阁吗？

内阁的明显的谎言第一次被揭穿了。整个议会群情激愤了。

内政大臣屈韦特先生迫不得已，终于站了起来，低声说抱歉抱歉。除了 18 名武装人员被缴械之外，也就是除了犯法之外，本来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呵！决不能容许武装暴徒即 22 名返国的志愿军人负未经许可就在国内游荡！（未经许可！）

议会对大臣先生的头一句话就明显地表示了不满。甚至右派对这些雄辩的事实都还记忆犹新，以致至少也得保持缄默。但是，当他们看到他们不幸的大臣难以摆脱左派的嘲笑和埋怨的时候，

他们很快就振作起来，开始为无力替自己辩护的屈韦特尔大声叫“好”；中间派中有一个人支持他们，于是屈韦特尔先生终于又振作起精神，竟敢声明说：下令采取这些措施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前辈；但是我要声明，我完全赞成这些措施，并且打算在同样的情况下采取同样的措施。

右派和中间派都大声叫“好”，来奖励他们的英勇的屈韦特尔的这种勇敢精神。

但是格拉德巴赫并没有被吓倒。他在保守分子的喧嚷声中走上讲台，再次问道：施莱根施坦先生还在斯潘道事件以前本来就是大臣，他怎么能够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呢？持有充分证明的4个志愿军人员怎么能够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呢？（这时中间派先生们提出会议规则来打断他的话）问题决不能认为已经解决了。怎么能够把这些人当作什么流浪者强迫遣送回乡呢？（发言人的话被打断了；喧声）关于通行证的问题我还没有得到回答。简直是侮辱这些人。为什么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容忍一伙好战的黑帮分子手持武器从乌培河谷来（喧声大作）侮辱首都呢？（喧声，“好啊”的喊声）

屈韦特尔终于找到了出路，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可疑的证明书引起的！就是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司令部签发的退伍证明书在屈韦特尔先生的警官看来是“可疑的”真是奇怪的官僚！

还有几个议员起来发言指责各部大臣，他们一直讲到主席宣布停止讨论，梅策议员把议会从这场辩论的暴风雨中带到教师生活的平静的海洋里为止；而我们也让它留在那里，希望它得到最大的田园乐趣。

我们很高兴，因为最后竟有一个左派议员能够提出很有根据

的质问，发表有决定意义的演说，使得大臣先生们受到很多人的抨击，并且引起了一场象法国和英国的议会辩论那样的争吵。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7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7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37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办事内阁

科伦 7 月 7 日。我们这里又发生了内阁危机。康普豪森内阁垮台了，汉泽曼内阁倒下了。办事内阁尽管用家用药物来治疗，尽管使用硬膏剂，尽管对报刊案进行审讯，尽管实行逮捕，尽管以官僚的傲慢无礼的态度重新抬起了它那盖满档案柜灰尘的脑袋，并且打算找岔子为自己的被推翻复仇，还是只存在了一个星期。“办事内阁”是由一些庸碌之徒组成的，它毫无远见，甚至在最后一次妥协会议开幕时还确信自己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

到会议闭幕时，内阁就完全瓦解了。这个包藏着种种后果的会议使首相冯·奥尔斯瓦特确信，他应该呈请辞职；冯·施莱根施坦大臣也不愿意再做汉泽曼的侍卫长了，于是整个内阁昨天就到桑苏西去见国王。他们在那里作出了什么决定，我们明天就会见分晓。

我们驻柏林的署名 # 的记者还补充报道说：

“刚才风闻 芬克、品德尔、梅维森已奉急召前去参加组织新内阁的事宜。”

如果这个传闻被证实，那末，我们就会从调停内阁经过办事内阁最后看到反革命的内阁。最后！即使这个内阁的反革命势力存在的时间极短，也足以使人民充分地看到那些渺小的人物，这些人只要反动势力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重新抬起自己的小脑袋。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7 月 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9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39 号

妥 协 辩 论

科伦 7 月 8 日。我们在得到汉泽曼内阁瓦解的消息的同时，也得到了 7 月 4 日妥协会议的速记记录。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洛贝尔图斯先生退出内阁的消息，这是内阁瓦解的第一个征兆；此外，关于波兹南委员会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表决以及左派的退出都大大加速了内阁的瓦解。

关于各部大臣先生对洛贝尔图斯先生退出内阁的意见，速记记录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情况；因此我们就不来谈论这个问题了。

福斯特曼先生站了起来，据说他不得不起来抗议格拉德巴赫先生在 6 月 30 日对“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最可敬的人的代表”所发表的言论。

贝尔格先生：我在不久以前就根据会议规则提过意见，说在这里宣读请愿书是不适当的，说我讨厌这样做。（喊声：我们讨厌！）好，我们。我的发言不仅代表我自己，而且代表其他许多人，即使今天又提出一些意见来打扰我们，也不能取消我的这个意见。

中央总署的发言人士伊斯豪斯先生报告了波兹南委员会的问题。中央总署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有关波兹南的一切问题，但是对委员会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的问题并没有发表

见本卷第 209—210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206—207 页。——编者注

意见。

沃尔弗先生、弥勒先生、赖辛施佩格第二先生和佐美尔先生都提出了修正案；所有这些修正案都得到了支持并提出来讨论。

土伊斯豪斯先生给他的报告补充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反对委员会的。据说真理在任何时候都居于中间，因此，议会在听了一些冗长而互相矛盾的报告后，只得出了双方都不对的结论，也就是说，议会将保留它现在的意见。首先应当要求政府作一个详细的报告，然后再做结论。

中央总署怎么能委派一个反对自己的报告的报告人呢？

罗伊特先生叙述了促使他提出任命委员会的问题的原因。最后，他声明说，他绝不是有意责难内阁；他是法学家，他很清楚，没有相反的法律，内阁对事件所负的一切责任都是虚幻的。

赖辛施佩格第二先生发言。他怀着满腔的同情向波兰起誓，他希望德意志民族不久就会偿还萨比斯基后裔那笔旧的名誉债。（要知道，这笔名誉债早已用 8 次瓜分波兰、榴霰弹、硝酸银和鞭笞来偿还了！）“但是，我们也应该表现出极度的镇静和理智，使德国的利益永远占居首要的地位。”（德国的利益自然是要尽量把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赖辛施佩格先生特别反对成立调查委员会，因为“这是一个只有历史或法庭才能解决的问题。”难道赖辛施佩格先生忘记了，在进行关于革命的辩论时他自己说过议员先生们的使命是要“创造历史”吗？他以关于议员地位的纯粹法学上的诡辩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我们还是回头来谈谈资格问题吧。

可是克罗托申的鲍威尔先生（他本人就是波兰的德国人）走上讲台来捍卫自己的同胞的利益。

“我恳求议会不要计较过去，而只关心人民的未来，人民是有权利指望我们的关怀的。”

多么使人感动啊！克罗托申的鲍威尔先生这样关怀波兰人民的未来，以致希望“不要计较”他们的过去，不要计较普鲁士军阀、犹太人和波兰的德国人的野蛮行为！为了波兰人本身的利益，我们应该拒绝讨论这些问题！

“从这种痛苦的分析中又能得到什么呢？即使你们认为德国人是有罪的，难道你们因此就不大考虑保卫他们的民族性、保护他们的个性和他们的财产了吗？”

真是直言不讳！克罗托申的鲍威尔先生承认德国人可能是错了，——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是应该牺牲波兰人的利益来维护德国人的民族性！

“我真不了解，挖掘过去对于圆满地解决目前这些复杂的问题究竟有什么好处。”

自然，对于波兰的德意志先生们和热烈支持他们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他们如此顽固地反对这样做。

接着鲍威尔先生企图恐吓议会，说这种委员会又会振奋人心，煽起狂热，结果就会发生一场新的流血冲突。这些博爱的见解使得鲍威尔先生不敢投票赞成委员会。但是，为了不致造成似乎他的委托者害怕委员会这样一种印象，他也不能投票反对。为了波兰人的利益他反对委员会，为了德国人的利益他赞成委员会，为了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表示自己不偏不倚，他就干脆不投票。

另一位波兹南的议员，即格内森的布斯曼认为，仅仅他出席

会议这一点就证明波兹南也住着德国人。他想根据统计资料证明在他那个区域内住着“大量的德国人”。(他的话被打断了)而且,该地区的 $\frac{2}{3}$ 以上的财产都掌握在德国人手里。

“此外我还要证明,我们普鲁士人不仅靠我们武器的威力(!?!)在1815年征服了波兰,而且靠33年的和平和我们的文化知识再次征服了它(这次会议就是证明)。(他的话被打断了。主席建议布斯曼先生谈问题的实质。)我不反对改组,但是,最合理的改组是施行附有官员选举制的地方自治条例;这个条例和法兰克福议会关于保护一切民族的决议就能给波兰人提供一切保障。但是划分界线我是坚决反对的。(他的话被打断了。再次受到警告。)如果谈问题的实质,我是反对委员会的,因为它毫无益处,它只会引起动乱;可是,我并不害怕成立委员会,如果必要,我也赞成……(有人打断他的话说:他说他赞成委员会!)不,我是说反对……诸位先生,为了给你们说明一下发生起义的原因,我想简单地……”(他的话被打断了。遭到反对。)

采什科夫斯基:别打断他!让他讲!

主席:我再一次要求发言人紧紧地抓住问题的实质。

布斯曼:“我已经说过,我反对委员会,我再没有什么补充的!”

这位波兰的德国地主先生说了这句气话后,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讲台,在与会者的哄堂大笑声中赶紧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勃罗姆堡区的议员海奈先生想挽救同乡的光荣,给委员会投了赞成票。同时他也忍不住责备波兰人伪善、欺骗等等。

鲍姆施塔克先生也是波兰的德国人,他仍然反对成立委员会。理由还是那些。

波兰人拒绝参加辩论。只有波克什夫尼茨基表示赞成成立委员会。大家知道,波兰人是早就坚持要调查的,可是现在才明白,

一切波兰的德国人除了一个人以外，都反对这样做。

波勒先生是很少有的波兰人，他把整个波兹南都划入德国的版图，而把德国和波兰的疆界叫做“分隔德国的一堵墙”。

拥护委员会的人一般发言都很冗长，而且不够明确。他们和反对委员会的人一样总是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老一套。他们的论据多半带有好辩的迂腐的性质，因而远不如波兰的德国人的偏颇誓言那样引人注目。

关于各部大臣和官员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有名的资格问题，我们明天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7 月 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9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39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内阁危机

科伦 7 月 9 日。汉泽曼内阁非常顽强地使自己的寿命拖延了几天。特别是财政大臣太爱国了，他竟想把国库交给没有经验的人来管理。从议会的角度来说，内阁已经瓦解了，但是实际上它还继续存在。看来，桑苏西已经决定设法使内阁再一次苟延残喘。时刻准备给内阁以致命打击的妥协议会立刻就惊恐起来，害怕自己的意图，但是这个议会的大多数显然都在猜想，如果说汉泽曼内阁还不是合乎他们心意的内阁，那末合乎他们心意的内阁将同时是危机的内阁和收场的内阁。因此，议会动摇了，不能贯彻到底了，玩弄鬼把戏和突然后悔了。而办事内阁却以俨然自若的、几乎是恬不知耻的冷淡态度接受了这种作为恩惠赐予的、时时刻刻都成问题的生活，接受了这种含垢忍辱的、仅仅靠弱者的施舍来维持的生活。

杜沙特尔！杜沙特尔！这个内阁拚命拖延了几天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将和它的存在一样可耻。判断这种存在的补充材料，读者可以在本报今天的一篇文章中找到，这篇文章是我们驻柏林的署名#的记者写的。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 7 月 7 日的妥协议会。妥协议会嘲笑汉泽曼 内阁，它把内阁打得半败才满意；内阁又好

笑又好气地低下了头；在告别的时候，崇高的议会在它后面喊道：“你们可别见怪！”无动于衷的三头政治的政治家汉泽曼-屈韦特尔-米尔德喃喃地回答说：《Pas si bête ! Pas si bête 》〔“我们并不那么愚蠢！我们并不那么愚蠢！”〕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7 月 9 日

载于 1848 年 7 月 10 日

“新莱茵报”第 4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7月4日的妥协会议

(第二篇论文)

科伦 7月 9日。任命一个全权调查委员会是公正地对待波兰人的一种十分必要而又刻不容缓的行动，这一点从 3天以前我们便已登载的那些根据正式文件写出的报道¹³⁵中可以看得到。

明目张胆地敌视波兰人的旧普鲁士官员们，把允许改组看成是对他们的生存的威胁。只要对波兰人稍微公正一点，他们就认为是一种危险。因此，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狂怒。他们在横行霸道的士兵的支持下，疯狂地攻击波兰人，撕毁条约，凌辱安分守己的公民，怂恿或认可最卑鄙的行动；这样做只会引起波兰人的发动，而由于力量太悬殊，这种发动无疑会遭到镇压。

康普豪森内阁不仅是一个软弱无能、耳目闭塞的内阁，而且是一个存心毫无作为的内阁，它对于任何事情都听之任之。闻所未闻的野蛮行为不断发生，但康普豪森先生却不闻不问。

关于波兹南内战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报道呢？

一方面是战争罪犯们（文武官员们）的偏私徇情的报道，以及内阁根据他们的话所提供的材料。在汉泽曼先生任期内，内阁本身也是当事人一方。这些材料是偏私的，但却是官方的。

另一方面是波兰人所搜集的事实，他们对内阁的控诉，特别是大主教普什鲁斯基给各位大臣的信件。这些材料在大部分场合

下都不是官方的，但提供这些材料的人是力求揭示真相的。

这两类报道根本是互相矛盾的。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查明真理在哪一方面。

要做到这一点，委员会只有亲自出马（少数情况除外）到现场去，根据见证人的口供至少把最重要的事实弄清楚。如果有人禁止委员会这样做，那末它的全部活动就会带有空想的性质，因为，它也许能够进行一些历史文献的考查工作，辨别这些或那些报道的可靠程度，但是它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

委员会的全部作用取决于它是否有权讯问见证人，正因为这一点，议会里仇恨波兰人的人们都力图用种种周密考虑的诡辩来阻碍它这样做；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会议结束时发生了政变。

议员布洛姆在7月4日辩论时说道：

“如果象某些修正案所说的那样，真相要到政府的报告中去寻找，难道这能说是力求弄清真相吗？当然不能！政府报告的根据是什么呢？大部分是官员们的报道。这些官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旧制度的产物。难道旧官员已经消失了吗？难道代表人民意志的新县长的选举工作已经进行了吗？根本没有。官员们向我们报告过国内的实际情况吗？旧官员现在所提出来的报告仍然和过去一样。因此，毫无疑问，仅仅熟悉一下内阁的文件，会使我们一无所得。”

议员李希特尔更进一步。他把波兹南官员们的行为看成仅仅是保存旧的管理制度和旧官员的一种最突出而必不可免的结果。

旧官员的职务和利益之间的这种冲突，在别的省里也是会每天发生的。

“自从革命以后，我们获得了新的内阁，现在，甚至也有了第二个内阁。但是内阁仅仅是灵魂，它应该在各处设立划一的机构。而在各个省里，到处都原封未动地保留着旧的管理制度。你们愿意让我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吗？

比如说：新酒不能装入发霉的旧囊。这也就是在大公国里发出强烈的控诉的原因。难道我们不应该根据这一点任命一个委员会来查明，无论是在波兹南还是在别的省里，以更合乎时代和环境的新制度来代替旧制度是多么必要吗？

议员李希特尔是对的。革命以后撤换全部文武官员和一部分法官，特别是检察官，这是一件首要的事情。否则，中央政权的最好的创议都会因为下级官员的抗拒而破产。法国临时政府和康普豪森内阁的软弱，都在这方面带来了最可悲的后果。

在普鲁士，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行政方面，组织得很好的官僚等级制度的绝对权力40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在普鲁士，主要的敌人（这个敌人在3月19日已经败北）正是官僚制度。因此，普鲁士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彻底更换文武官员。但是，调停内阁的使命自然不是实现革命的要求。它所理解的使命就是无所事事，因此，直到现在为止，它还是把实际的权力置于自己的旧敌——官僚之手。在旧的官僚制度和新的秩序之间，它以“调停人”的身分出现。但是在它给官僚制度进行“调停”时，却面临着波兹南内战，它必须对三十年战争以来尚未见过的残酷行为负责。

康普豪森内阁的继承人汉泽曼内阁，必须继承它的遗嘱人的全部资产和债务，也就是说，它不仅继承议会里的多数，而且继承波兹南的事件和波兹南的官员们。因此，内阁所迫切关心的是如何使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尽量空虚一些。内阁多数派的发言人，首先是法学家们，竭尽诡辩和狡黠的能事来寻找一些周密考虑的重大理由，使委员会不能讯问见证人。如果我们在这里对赖辛施佩格之流的法律遁辞赞美一番，那未免扯得太远了。我们只需要研究一下屈韦特尔大臣先生的详细发言。

屈韦特尔先生完全撇开问题的实质，一开始便声称，假如这类委员会能够以查明情况等等的方式使内阁减轻它所担负的复杂任务，内阁该多么高兴。是的，即使罗伊特先生不提出成立这种委员会的好主意，毫无疑问，屈韦特尔先生本人也会坚决主张这一点的。应当尽量给予委员会以更广泛的任务（为的是使它不能胜任！）；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畏缩和犹豫是不恰当的，他完全同意这一点。委员会的活动应当涉及波兹南省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既然问题只在于查明情况，内阁就不要胆怯地限制委员会的权限。当然，这样一来，人们也许会把事情扯得太远，但他相信委员会会明智地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它应不应该把波兹南官员的免职问题也包括在它的活动范围以内。

这就是大臣先生最初的让步，这些让步被相当分量的漂亮话所渲染，并且博得了热烈的“好啊”的喝采声。然而接着就是各种各样的“但是”。

“但是，既然这里有人说，关于波兹南的报告丝毫不能阐明事情的真相，因为这些报告全是来自官员，而且还是来自旧时的官员，那末，我认为我有责任来维护这个值得尊敬的阶层。假使真的有某些官员没有忠于职守，那就应该惩罚玩忽职守的个别人员，而不应该因为个别人员的失职而贬低整个官员阶层。”

屈韦特尔先生真勇敢！毫无疑问，失职的个别情况是有的，但是整个说来，官员们是光荣地尽了自己的职责的。

事实上，波兹南的官员们绝大多数都尽了自己的“职责”，即“对就职誓言尽了职责”，对整个旧普鲁士的官僚制度尽了职责，对这个职责所带来的私人利益尽了职责。他们在尽自己的职责时根本不择手段，只要能在波兹南消灭3月19日的后果就行。正因为

这样，屈韦特尔先生，您的“职责”就在于撤换所有这些官员！

屈韦特尔先生所谈的是由革命以前的法律规定下来的那种职责，而现在所谈的完全是另一种职责，即每次革命后出现的那种职责，它的任务在于正确了解已经改变的情况并促进其发展。要求官员们改变陈旧的官僚主义的立场而转到新的立宪的立场上来，要求他们也象新任大臣一样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照屈韦特尔先生的说法，这就是贬低这个值得尊敬的阶层！

屈韦特尔先生也拒绝了一般的谴责，例如说祸首们受到庇护，罪行没有受到惩罚。他要求拿出确凿的事实来。

难道屈韦特尔先生真敢断定，普鲁士军阀在官员们的支持和同意下，在波兰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赞许下所犯下的任何一件暴行和残酷行为都已受到惩罚了吗？屈韦特尔先生说，现在他还未全面地熟悉大量的资料。实际上，他显然是极端片面地熟悉了它们的。

现在，屈韦特尔先生接触到了“最棘手和最复杂的问题”，即委员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活动方式的问题。屈韦特尔先生希望比较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正象所指出的，它的基础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即关于 *droit d'enquête* [调查权] 的问题”。

使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后来屈韦特尔先生详尽地阐述了国家中的分权问题，这对于出席议会的上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的农民来说，大概有许多新的东西吧。听来令人可笑的是，普鲁士大臣（而且还是“办事大臣”）竟在公元 1848 年的夏天庄重而严肃地在讲台上阐述孟德斯鸠的观点。

屈韦特尔先生和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敬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

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也象其他一切永久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一样，这个原则只是在它符合于现存的种种关系的时候才被采用。例如，在君主立宪政体中，立法权和行政权都交错在国王身上；其次，在议院里，立法权是和对行政权的监督交错在一起的等等。关于在一个国家里分工方面的这些必要的限制，在我们的“办事大臣”这样的政治人物的口中得到了如下的说明：

“既然立法权是由人民代议制行使的，那末它就有自己的机构，行政权也象审判权一样，也有自己的机构。因此（！），假如没有专门法律的授权，一种权力直接利用另一种权力的机构是不可容忍的。”

“假如”没有“专门法律”的指示，抛弃分权原则是不可容忍的！反之，“假如”没有“专门法律”的指示，使用分权原则同样是不可容忍的！多么周密的考虑！多么了不起的发现！

至于在革命时期不经任何“专门法律”就停止分权的问题，屈韦特尔先生却只字未提。

接着，屈韦特尔先生又不厌其烦地说，如果赋予委员会以在见证人发誓下讯问见证人的权利，如果委员会有权要求官员们提供情报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如果赋予委员会以亲眼看到一切的权利，那就是破坏分权原则，因而必须由专门的法律来决定。他举出比利时的宪法做例子，该宪法第40条特别赋予议院以 *droit d'enquête* [调查权]。

但是，屈韦特尔先生，根据法律规定，难道普鲁士真的存在着您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也就是宪法意义上的分权吗？现存的分权难道不是有限的、残缺不全的、适应绝对的官僚君主政体的分权吗？所以，当这种分权还没有用宪法的精神加以改造的时

候，怎么能够把宪法的概念运用到这种分权上去呢？当宪法本身都还不存在的时候，普鲁士怎么能有这种宪法的第 40 条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照屈韦特尔先生的说法，任命一个全权委员会就是破坏宪法的分权。然而，在普鲁士还根本没有宪法的分机，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破坏。

但是，这种分权也必须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暂时的革命秩序里实行，因而照屈韦特尔先生的看法，它应当算是已经存在的。如果屈韦特尔先生是对的，那末宪法上的例外也应该被认为是存在的了。而立法机关进行调查的权利恰恰也属于这种宪法上的例外！

但是屈韦特尔先生完全错了。恰恰相反，暂时的革命秩序正是在于，分权暂时被废除了，立法机关暂时攫取了行政权或者行政机关攫取了立法权。革命的专政（不管它是通过怎样软弱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它仍然是专政）是掌握在国王的手里，还是掌握在议会的手里，或是掌握在这两者的手里，——这都无关紧要。如果屈韦特尔先生对这三种实例都感兴趣的话，那末这样的例子在 1789 年以来的法国历史上是很多的。

屈韦特尔先生所求助的那个暂时的秩序，恰巧证明是反对他的。这个秩序承认议会除了有调查权以外，还有其他性质完全不同的权力。它甚至授权议会在必要的时候变为审判庭，不经任何法律就可以做出判决！

如果屈韦特尔先生早就预见到这样的后果，他在“承认革命”的时候或许会慎重一些。然而请他放心吧：

德国是个安静的育儿所，
它不是凶手的巢穴，¹³⁶

妥协派先生们尽可以随意开会，他们的议会决不会成为“长

期国会”。

不过，如果把这位办事内阁的空谈家官员拿来和他的空谈方面的先驱康普豪森先生比较一下，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们之间找到重大的差别。康普豪森先生无论如何有更多的独特性，他身上有些东西是从基佐那里承受过来的；而屈韦特尔先生甚至还不能够超过矮小的约翰·罗素勋爵。

我们对屈韦特尔先生演说中的国家哲学的深奥已经颂扬得够多了。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发霉的智慧，即孟德斯鸠关于分权的整套理论的目的，探讨一下它的真正的实际基础。

现在，屈韦特尔先生恰好要从他自己的理论中得出结论。内阁以例外的形式同意命令官员们去完成委员会所需要的东西。但内阁不能同意直接由委员会来指示官员。

换句话说，和官员们没有直接联系的委员会没有任何高出官员们的权力，因而不能迫使官员们提供他们所不愿赐与的情报。加以处理公文非常迟缓，无止境的逐级旅行！在分权的幌子下把委员会变成一付不折不扣的空架子，好高明的手段！

“把政府所承担的全部任务委托给委员会来解决，这根本就谈不上。”

似乎有人曾建议授予委员会以管理权！

“政府同委员会一样，应该继续设法查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波兹南的纠纷（正是由于政府长期在查明而什么也没有查明，所以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根本不要它参与此事），因为同一个目的可以通过两条道路来达到，所以往往难免要白费时间和精力，而且也很难避免发生冲突。”

根据过去的例子判断，如果委员会接受屈韦特尔先生的建议，

走上无止境地逐级旅行的道路，那末它无疑是“要白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如果委员会能直接和官员们联系，而且就地查明误会并克服官僚主义的阻碍，那末就不会象走前一条道路那样容易发生冲突。

“所以（！）很自然，委员会力求在内阁的赞同和经常参与下达到目的。”

更妙 委员会必须在内阁的赞同和经常参与下来监督内阁 屈韦特尔先生毫不羞耻地暴露了他是如何指望把委员会置于他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把他置于委员会的监督之下。

“如果委员会希望居于一个独特的地位，那就发生了一个疑问：在这种情形下，它是不是能够而且愿意担当内阁所承担的责任。这里已经如此公正如此聪明地指出，议员们的不可侵犯性是和这种责任不能相容的。”

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管理，而仅仅是查明事实。委员会必须得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使用必要手段的权利。仅此而已。当然，无论是这种手段运用得不足或是运用得过于广泛，委员会都必须对议会负责。

所有这一切既和内阁的责任与议员的不可侵犯性很少关系，也和“公正”与“聪明”很少关系。

总之，在分权的借口下：屈韦特尔先生坚持请求妥协派接受这些建议来解决冲突，但他本人在这时连一个明确的建议也没有提出来。办事内阁感到自己的根基不稳固了。

以后的辩论我们不能再作详尽的阐述了。投票的结果已经揭晓：政府在记名投票时遭到失败，右派实行了政变，后来他们通过了一个已被否决的提案。关于这一切我们都已报道过了。我们只补充一点：在投票反对委员会拥有无限权能的莱茵省议员之中，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下面这些名字：

阿伦茨（法学博士）：鲍尔班特，弗伦肯，伦辛，冯·洛埃，赖辛施佩格第二，西蒙斯，以及按次序而不是按重要性排在最后一位的、我们的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7 月 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11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41 号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科伦 7 月 10 日。昨天本报的 11 个排字工人和克劳特先生接到命令，要他们在星期二（7 月 11 日）到预审推事那里去作证。事情仍然是关于查明被指控的文章的作者。记得在旧“莱茵报”¹³⁷时期，在书报检查和阿尔宁内阁时期，当局为侦察轰动一时的“婚姻法草案”¹³⁸一文的投稿人，既没有进行过搜查，也没有审问过排字工人和印刷所的老板。从那时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次革命，不幸的是，它已为汉泽曼先生所承认。

我们应该再来谈谈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先生 7 月 5 日的“反驳”。

黑克尔先生在这个反驳中责备我们，说我们加在他身上的各种意见都是谎言。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出材料来对这个修正案加以修正，但是谁能保证，在这场力量不均的斗争中，别人不再引用刑典第 222 条或 367 条来报复我们呢？

黑克尔先生的反驳是以这样的话结束的：

“该文（发文日期是科伦 7 月 4 日）对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先生和执行逮捕的宪兵的诬蔑性的攻击和侮辱，将在法庭审讯该案时得到应有的评判。”

见本卷第 190—193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202 页。——编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应有的评判！难道在康普茨任大臣时期黑红黄色曾在“法庭审讯”中得到了应有的“评判”吗？³⁹

我们来查阅一下刑法典。看一看第 367 条：

“凡在公共场所，或在合法的正式的文件中，或在已刊印或未刊印的文章中（只要这些文章已经张贴、出售或分发）指责某人做过会受到刑法或违警法的追究，或至少也会引起公民对他的轻视或憎恨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属实，提出这个指责的人也算犯了诬蔑罪。”

第 370 条 “如果控告所根据的事实按照法定手续查明是确实的，那末原告就不应受任何惩罚。只有根据法庭的判决或其他合法的文件提出来的东西，才算是合法的证据。”

为了说明这一条，我们再引证一下第 368 条：

“据此，原告要求给予机会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的请求将不予考虑，原告也不得借口文件或事实都是众所周知的，借口引起控告的指责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或者是他从外国报纸和其他刊物上抄来的等等为自己开脱”。

帝国时代及其整个精细的专制制度都在这些条文中反映出来了。

根据一般人的理智，说一个人遭到诬蔑，就是指他受到别人莫须有的指责；但是根据刑法典的特殊的理智，说一个人遭到诬蔑，是指别人指出了他确实犯过的而且能够加以证明的错误，不过在证明时用的不是唯一被承认的方法，即法庭的判决或正式的文件。法庭的判决和正式的文件真有奇异的力量！只有法庭确定的事实，只有正式用文件证明了的事实才算真正实在的事实。过去曾经有过如此粗暴地诬蔑一般人的理智的民法典吗？官僚机构曾经在自己和公众之间建立过一座象中国的万里长城那样的长城吗？在这一条文的保护下，官员们和代表们也 and 立宪君主一样不

引文中的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可侵犯了。这些先生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那些“引起公民对他们轻视和憎恨”的事情，但是你要想不被剥夺公民权、不被监禁和罚款，就决不能谈论、记述和发表这些事情。受第 367、368 和 370 条束缚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万岁！别人把你非法地监禁在狱中。报刊揭露了这种不法行为。结果：在“法庭审讯”“诬蔑”那位有不法行为的可敬的官员的案件时，这次揭露便得到应有的“胜利”，——竟有这样的奇迹：今天才发生的不法行为，昨天法庭已作了判决。

莱茵省的法学家，包括人民代表茨魏费尔在内，投票反对拥有无限权能的波兰委员会是不足为奇的！在这些法学家看来，对波兰人的判决应该是剥夺公民权、监禁和罚款，因为他们“诬蔑”科隆布、施泰因埃克尔、希尔什菲尔德、施来尼茨、国防线上的波美拉尼亚士兵和旧普鲁士的宪兵。这样也许就会妥善地在波兹南实现和平。

根据刑法典这几条的规定，把关于要取消“3月19日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取消出版自由”的传闻叫做诬蔑，真是荒唐！似乎用刑法典第 367、368 和 370 条来对付政治演说和著作并不是实际上最后地取消 3月19日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和出版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俱乐部成了什么东西呢？有了刑法典第 367、368 和 370 条，言论自由又成了什么呢？没有俱乐部和言论自由，3月19日革命的成果又成了什么呢？难道压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实际上不就是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只有诬蔑者才能空谈做这种事情的意图吗？在昨天拟定的居尔策尼希宣言¹⁴⁰上签名要多加

见本卷第 192 页。——编者注

小心。检察机关开始“审讯”你们“诬蔑”汉泽曼-奥尔斯瓦特的案件时，就会给你们的宣言以“应有的评判”；难道只有“诬蔑”（就法国刑法典这个用碑铭体写成的政治奴隶制法典而言）各部大臣才不受处罚吗？难道我们这里有责任的各部大臣和不责任的宪兵吗？

可见，问题不在于可以用关于“法律意义上的诬蔑”的条文，即关于违背常人的理智擅自捏造的诬蔑的条文，使报上被指控的文章得到应有的评判。至于说这里能找到应有的评判，这只能是三月革命的成果，是反革命势力已达到的发展程度，是官僚机构动用旧法律武库中残存的武器来反对新的政治生活的极恶劣的行径。把关于诬蔑的条文用来对付对人民代表的攻击——真是个巧妙的方法，它可以使这些先生免受抨击，使报刊不经过陪审法庭的审讯！

我们现在从控告诬蔑转来谈谈控告侮辱。我们看一看第 222 条，这一条说：

“如果行政机关或法院部门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或由于执行职务而遭到任何言语上的侮辱，使他们的名誉或良好品德受到损失，侮辱他们的人应判处一个月到两年的徒刑。”

在“新莱茵报”发表被指控的文章时，茨魏费尔先生是在柏林执行人民代表的职务，而决不是在科伦执行法院负责人的职务。因为他没有执行任何本职职务，所以事实上他不可能在执行职务时或因执行这些职务而受到侮辱。而宪兵先生们的名誉和良好品德只有在它们受到言语上的 (par parole) 侮辱时才能得到这一条的保护。我们是写，而不是说，par écrit〔文字上〕并不是 par parole〔言语上〕。那末，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教训在于议论最小的宪兵

比议论最大的公爵更要小心，特别是不敢触犯检察机关的极易发怒的先生们。我们再一次请读者注意：在科伦、杜塞尔多夫、科布伦茨等地同时发生了同样的审判案。多么奇怪，一连串的偶然事件！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7 月 10 日

载于 1848 年 7 月 11 日

“新莱茵报”第 4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 最近发生的事件

科伦 7 月 11 日。尽管几乎所有的德国报刊都发出了爱国主义的吼声，“新莱茵报”还是首先起来替波兹南的波兰人、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和波希米亚的捷克人辩护。首先我们揭破了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政策，这种政策由于它在德国国内的基础已经动摇，就力图麻痹民主力量，转移人们的视线，把革命的狂涛巨浪引向另一方面，制造对国内进行压迫的武器；为了这种目的，它挑起了自私自利的、与德国人的世界主义性格相反的对其他民族的仇恨，并且在各民族之间的空前残酷和无比野蛮的战争中建立了一种甚至在三十年战争中都没有过的黥武主义。

正当德国人为了争取国内的自由而同本国的各邦政府展开斗争的时候，却迫使他们就在这些政府的统率下从事十字军讨伐，去反对波兰、波希米亚和意大利的自由。多么阴险狡猾的勾当！多么荒诞的历史奇闻！被革命风潮所席卷的德国想在外寻找出路，即在为复辟而进行的战争中、在为巩固旧政权（而德国的革命恰好是反对这个旧政权的）的进军中寻找出路。只有反对俄国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德国的战争，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消除以往的罪过，才能巩固起来并战胜自己的专制君主，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象那些要摆脱长期的奴隶枷锁的人民所应该做的那样，用自己子弟的鲜血来换取宣传文明的权利，并且在解放国外各民族

的同时使自己在国内获得解放。

关于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材料公布得愈多，事实就愈加有力地证实我们对于德国用以污辱自己新纪元的各民族之间的战争的观点是正确的。为了说明我们对于所发生的事件的看法，我们引证布拉格一个德国人所写的一篇迟到的报道：

布拉格 1848 年 6 月 24 日（投递耽误）

“德意志总汇报”登载了写于本月 18 日的一篇关于德国人这一天在奥西格 举行会议的文章。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许多演说，这些演说对于最近在我们这里发生的事件毫无理解，说得客气一点，是决心污辱我们的独立报纸，因此，评论员认为自己有责任来澄清这种错误的认识，并且为了坚决捍卫真理，挺身而出反对那些认识错误的人和心怀恶意的人，而这样做在目前是可以办到的。不能不令人惊奇的是，人们象“德国人东方利益保卫同盟的创始人”一样，都向大会建议：“当斗争还在布拉格继续进行的时候，根本谈不到赦免，如果我们获得胜利，那末将来就应该利用这个胜利。”德国人究竟获得了什么胜利，粉碎了什么阴谋呢？自然，谁要是相信“德意志总汇报”的记者（显然是消息老是不很灵通的记者），或者相信“波兰人和法国人的小征服者”的动人词句，或者相信在巴登事件时唆使德国人反对德国人、现在又唆使德国人反对捷克人的背信弃义的“法兰克福报”的文章，谁就永远也不能了解这里的情况。显然，在德国到处都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布拉格街上进行的斗争仅仅是为了压迫居民中的德国人和为了建立斯拉夫共和国。关于后者我们不准备去谈，因为这种看法太幼稚了。至于前者，那末，在进行街垒战的时候根本看不出这是民族之间的竞争，德国人和捷克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同样准备自卫，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请说捷克话的人把他所讲的东西译成德国话，而每一次请求从来没有遭到拒绝。据说，革命比预定日期提前两天爆发了；如果是这样，那总得有某种组织，或至少总该有弹药储备，但实际上一无所有。凡是聚集有 10 到 12 个人的地方，街垒会突然就地而生。而且街垒多得再也无处构筑了，因为连最小的巷里也有三四处街垒。弹药按街道分配，数量很有限。当时不要说最高统帅，就是连一般的指挥也谈

不到。敌人从哪里向街垒的捍卫者进攻，他们就在那里作战，他们从房屋内、从街垒里毫无领导、毫无指挥地进行射击。根据这种无组织和无领导地进行抵抗的情况来看，根本谈不到什么阴谋，这无非是官方声明和调查报告中所散布的一种说法罢了。政府本身大概也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宫廷没有发表能够向布拉格解释流血的六月事件的任何东西。被捕获的同盟会会员几乎已被全部释放；其余的俘虏也将被释放，只有布科阿伯爵、维拉尼和其他一些人仍被监禁着。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布拉格的墙壁上看到说明这一切仅仅是误会的告示。指挥官将军的军事行动也没有说明这是为了必须保卫德国人免受捷克人的压迫。因为他不是用解释事件的方法把德国居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不是夺取街垒和保护城内“忠实的”居民的生命财产，而是扫荡旧城，转向莫尔达瓦河左岸并向德国人和捷克人射击，因为落到旧城的炮弹和枪弹是不会专门寻找捷克人的，而是同样地杀伤一切人，不管他戴的是什么帽徽。冷静地考虑一下：如果政府直到现在还不愿意或者不能提出任何说明，那末，究竟有什么根据认为斯拉夫人在搞阴谋呢？

莱比锡的公民格申博士给冯·文迪施格雷茨公爵写了一封谢函。但是这位将军不该赋予这封谢函以特别的意义，同时也不该把它看做民族情感的表现。公民格申是那些在二月事件之后突然变成了自由主义者的小心谨慎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他曾写信表示在选举法问题上相信萨克森政府，而整个萨克森却对这个选举法一致表示愤怒，因为它的 $\frac{1}{6}$ 的居民，其中恰恰包括最有才能的人在内，都被剥夺了基本的公民权利——选举权。他是那些在“德国人协会”中坚决反对非萨克森籍的德国人参加萨克森选举的一个，而在（请注意这人是多么伪善！）此后不久，他又代表自己的俱乐部答应全力协助居住在萨克森的非萨克森籍的德国人协会选举自己的议员到法兰克福去。简单地说，仅仅他是“德国人协会”的创始人这样一个事实，就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人给奥地利的将军寄了一封谢函，感谢他捍卫了所有德国人的祖国！我希望我在前面所讲的已足以说明，根据所发生的事情来看，还根本不能判定文迪施格雷茨公爵至今对德国人的祖国的功勋究竟有多大。只有调查的结果才能说明这一点。因此我们要让历史去判定将军的“崇高的勇气、大胆的活动、坚毅的精神”。至于公爵夫人是被人“卑鄙地杀害”的说法，我只想指出，现在还完全不能证明受到整个布拉格一致尊敬的公爵

夫人是被人谋杀的。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末凶手也难逃法网，而公爵的悲哀大概也不会比那位看见自己的女儿身遭惨死的母亲的悲哀更为深痛，她的19岁的女儿（也是一个无辜的牺牲者）的脑袋被打碎，尸体被拖走。谢函中说“勇敢的军队在您的指挥下多么英勇善战”，我完全同意格申先生的这些词句；但是如果他象我一样亲眼看到这些“勇敢的军队”星期一中午在策耳特涅加斯街怎样气势汹汹地向毫无防御的人群攻击，他就会觉得这些词句是太软弱无力了。至于我，那末不管对于我的军人的自尊心说来是多么沉重，我也必须承认，当我在大教堂附近在妇女和小孩们中间安然散步的时候，我就同他们一起当着三四十个皇家掷弹兵的面逃跑了，而且跑得那么仓卒，以致我的全部行李，即我的一顶帽子，也落到了胜利者的手里，因为我觉得当时是刻不容缓的，不然后面的炮弹就会象雨点般向我射来。但是，只是在6小时以后，我才看到那些皇家掷弹兵用霰弹和6磅重的炮弹向策耳特涅加斯街上最多只有20人守卫着的街垒轰击了半小时，虽然如此，他们却没有立刻攻下街垒，直到午夜，守卫者才放弃了它。除了掷弹兵占优势的个别场合外，一般没有发生白刃战。按房屋破坏的情况来看，格拉本街和新林荫路主要受到了炮兵的扫荡，于是我要问，为了用霰弹未扫荡由百十个几乎没有武装的人守卫着的宽阔街道，用得着什么特别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呢？

特普利茨的斯特拉达尔博士先生在他的最后发言中说：“布拉格的报纸为别人的利益而服务”（可以想象，这里指的是俄国人的利益），我要代表独立的布拉格报刊声明：这种说法不是非常愚蠢无知，就是卑鄙的诬蔑。我们的报纸的立场已经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种诬蔑是极端荒谬的。除了捍卫波希米亚的独立和维护两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之外，自由的布拉格报刊从来没有其他的意图。但是，它非常清楚，德国反动派无论在波兹南或者在意大利都力图使利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复活，其目的一部分是为了镇压德国内部的革命，一部分是为了培养黠武主义以准备内战。

写于1848年7月1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7月12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42号

即特普利茨。——编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7月7日的妥协辩论

科伦 7月 12日。我们在昨天晚上才接到 7月 7日的妥协会议的记录。平常我们接到速记记录只比书面报道迟 24 小时。现在，收到记录的时间不仅没有提早，反而更迟了。

改变这种缓慢状态是很容易的，法国和英国的报纸报道它们立法议会消息的速度就可以证明。英国议会开会经常开到早晨 4 点钟，可是 4 小时以后会议的速记记录就刊登在“泰晤士报”上，传遍伦敦的每个角落。法国议会往往要到下午一点钟才开会，到五六点钟才结束，可是到晚上 7 点钟，“总汇通报”就已把会议速记记录的版样送到巴黎各报的编辑部了。为什么可敬的“国家通报”不能以这种速度进行工作呢？

我们还是来谈谈 7月 7日的会议，在这次会上汉泽曼内阁受到不少恶意的讥讽。我们且不谈会议一开始就提出来的许多抗议，且不谈德斯特尔关于取消 7月 4日会议快结束时所通过的决议的提案（这个提案还依然留在议程上），也不谈列入议程的其他许多提案。我们只想谈谈今天猛烈地攻击内阁的一些质问和令人不快的提案。

菲力浦斯先生第一个发言。他质问内阁，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卫我国边境以防御俄国的侵略？

奥尔斯瓦特先生：我认为在议会的这次会议上回答这个问题

是不适宜的。

我们非常愿意相信奥尔斯瓦特先生。他能给我们的唯一答复是：没有什么措施，或者更确切些说，从德俄边境调了好几团人到莱茵。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议会对奥尔斯瓦特先生的这种可笑的答复却无动于衷，对他引用 *car tel est notre bon plaisir*（因为这样对我们有利）的话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只有几个议员对它“唬”了几声，另外几个议员喊了几声“好”。

博里斯先生提议在 1848 年下半年取消下层纳税人的等级税，并且立即取消为强制征收他们上半年的欠税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提案被提交给专门委员会。

汉泽曼先生起来声明说：这类财政问题必须经过非常慎重的讨论。而且完全有理由来等待讨论这个问题，尤其是他在下星期就要把一系列有关财政问题的法案（其中也包括等级税的法案）提出来讨论。

克劳泽先生向财政大臣提出质问：能不能在 1849 年年初以前以所得税代替磨粉税、屠宰税和等级税？

汉泽曼先生不得不再一次从座位上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解释道：他已经说过，下星期就要把财政方面的法案提出来讨论。

然而，汉泽曼先生还没有历尽艰辛和困苦。接着格雷贝尔先生起来提出一个冗长的提案，提案的每一个字都击中汉泽曼先生的要害：

只是把国库和财政枯竭当做发行强制公债的理由无论如何是不够充分的；

要讨论强制公债（格雷贝尔先生表示在实现一切诺言的宪法未通过以前，他反对发行强制公债）问题，就必须审查财政管理

方面的一切账簿和文件，因此，格雷贝尔先生提议：

任命一个委员会来审查 1840 年以来财政和国家管理方面的全部账簿和文件，并且就此提出报告。

然而，格雷贝尔先生所列举的理由比他的提案还要糟。他谈到许多耸人听闻的关于非法使用和挥霍国库资金的传闻；为了人民的利益，他要求有关方面提出关于 30 年和平时期里取之于民的一切款项的开支情况的报告；他说：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释以前，大会不能表决一文钱。强制公债引起了巨大的波动，强制公债是对以前整个财政管理部门的最后宣判，强制公债是国家破产的前奏。强制公债还产生了特别令人惊奇的印象，因为我们过去总是听说，财政状况很好，即使在严重的战争时期国库也不需要我们发行公债等等。其实，汉泽曼先生自己在联合议会里就计算过：库存至少应有 3 000 万。这也是很可能的。因为象在战时那样的重税不仅还在继续缴纳，而且其总额也亦不断增加。

提议发行强制公债的消息一传播出来，一切信任就随着这种痛苦的绝望立刻变为泡影了。

恢复这种信任的唯一办法，是马上完全真实地说明国家的财政状况。

虽然汉泽曼先生在说明强制公债的时候，试图用种种幽默的言词来和缓空气，但是他毕竟不得不承认，强制公债将造成不良的印象。

汉泽曼先生回答道：内阁既然要求款项，它自然要对过去的开支状况作一切必要的说明。但是在我已经提过两次的财政法案即将提交讨论的时候，应当等一等。至于传说国库尚有巨额库存（近几年来已不断减少），那是不可靠的。在最近这些艰难的年份

里，在由于商业的空前停滞而造成的目前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最好的财政状况也会陷入困境，这是十分自然的。

“这里有人说：强制公债是国家破产的前奏。不，诸位先生，它不应当是破产的前奏，相反，公债应当使信用恢复过来。”

（应当！应当！仿佛强制公债对信用的影响是取决于汉泽曼先生的善良愿望！）从国家证券行市的上涨就可以证明，这样的忧虑是多么没有根据。诸位先生，请等待财政法案的颁布吧，这一点我今天在这里已经是第四次向诸位保证了。

（可见普鲁士国家的信用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致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贷款给它，哪怕出最高的利息。于是汉泽曼先生除了采用这个使国家破产的最后的一着，即发行强制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汉泽曼先生还说国家的信用提高了，因为自从3月18日以来，国家证券的价格勉强上升了2—3%！如真正把强制公债发行出来，这些证券还不知会怎样跌价呢！）

贝恩施先生坚持要任命一个前已提出的财政检查委员会。

施拉姆先生：国家赈济贫民的拨款是不值一提的。如果说自由需要我们出钱，那末到现在为止政府从未为它破费分文。相反，政府宁愿花钱来使自由不要扩展到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阶段。

梅策先生：国库空虚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实。此外，我们现在还听说，国库早就分文无存了。这个消息更加证明有任命一个委员会的必要。

汉泽曼先生不得不又站起来声明：

“我从来没有说过国库里现在没有分文或者它早已分文无存；相反，我曾经说，在最近六七年以来，国库是大大地充实了。”

（如果把汉泽曼先生的这个声明和他给联合议会的报告、御前

演说对照一下，很难了解事情的真象究竟如何。)

采什科夫斯基：“我赞成格雷贝尔的意见，因为汉泽曼先生总是只给我们许下诺言，每当会议提出财政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他即将作解释，而这种解释他却从来没有作过。这种拖延态度之所以更使人感到奇怪，是因为汉泽曼先生就任大臣已经3个多月了”。

商业大臣米尔德先生最后出来帮助他的陷于窘境和同事。他请求议会还是不要任命委员会。他答应内阁方面要表示最大的坦率。他请大家仔细地研究一下既成的局面。但现在必须支持政府，因为政府目前正是要把国家这只大船从现在搁浅的窘境中拖出来。国民议会无疑会伸出援助的手。(好啊)

鲍姆施塔克先生也想给汉泽曼先生以可能的援助。然而财政大臣恐怕很难找到比他更笨拙、更不机智的辩护士：

“想掩饰财政实况的财政大臣，是一个坏财政大臣。如果某个财政大臣说，他将作应有的解释，我们就应当认为他也许是个正直的人，也许相反！！(全场活跃) 诸位先生，我从没有侮辱过谁，我是说：如果某个，而不是说：如果这位财政大臣！！！”

赖辛巴赫：这些高谈原则和信任问题的大辩论的美好日子在哪里呢？当初，汉泽曼先生急欲冲锋陷阵，可是现在，这种机会来了，而且又涉及到他本人的主管机关，他却回避了！的确，大臣们许下无数的诺言，提出种种原则，只不过是为了在几小时后就把它推翻罢了。(全场活跃)

汉泽曼先生等人起来替他辩护。然而，没有人这样做。最后，他惊恐地看到鲍姆施塔克议员站了起来，于是他自己赶快抢先发言，不让鲍姆施塔克再一次说他是“正直的人”。

你们是不是要等愤怒的、被讽刺和一切反对意见所折磨的狮

子-杜沙特尔最后显出他全部的威力，驳得他的敌手体无完肤，简言之，是不是等他提出信任问题呢？可惜，他以往的坚毅和勇气已经荡然无存，从前的威严已经消声匿迹，犹如艰苦年头的国库库存一样！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垂头丧气的、受了屈辱的、不为人所承认的大财政学家。事情已经到了他不得不找理由来搪塞的地步，可是找的导什么样的理由啊！

“凡是搞过财政工作，在工作中和许多数字（!!）打交道的人都会知道：对于财政问题方面的任何质问都不可能立刻作出充分的解释，税收问题非常复杂，在立法会议上也要辩论（汉泽曼先生使我们想起了他在上次联合会议上的出色演说）许多天甚至一个星期。”

但是，难道有人要求充分的讨论吗？开始大家要求汉泽曼先生就税收问题作简单的答复：“是”或者“不是”；随后又请他同意任命一个审查过去国库管理处的账目的委员会；当他拒绝这两件事以后，大家才指出他现在的谨小慎微和他过去的种种诺言是正相抵触的。

正因为“解释在工作中会碰到许多数字的财政问题”需要时间，所以委员会应当马上开始工作！

“不过，我没有事先提出财政问题，是有重要原因的。我认为，我稍微拖延一下，对全国的局势会有良好的影响。我希望国内局势稍稍恢复平静，国家的信用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我想，这种希望是不会落空的。我也相信，事先不提出这些法案来审查，这样做是对的。”

好一番剖白！原来汉泽曼先生的应该巩固国家信用的财政法案，却有破坏国家信用的危险！汉泽曼先生认为还是暂时保守国

家财政状况的秘密为好！

国家处在这种情况下，汉泽曼先生不公开宣布财政状况，不用事实来消除怀疑和谣言，反而不负责任地发表这种含糊其词的声明。在英国国会里，如果发表这种不妥当的声明，立即就会提出不信任案。

济贝尔特先生：

“直到现在，我们还一事无成。当所有的重要问题刚要解决的时候，不是停止讨论，就是搁置下来。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通过一个完善的决议，我们还没有把任何一件事进行到底。今天，难道我们还要重蹈复辙，还要去相信诺言而把问题拖延下去吗？谁能担保内阁不能再维持一个星期呢？”

帕里鸠斯先生提出了修正案，要求汉泽曼先生在14天内，把1840年以来有关财政和国库管理方面的必要资料提交应当立即选出的16人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帕里鸠斯先生声明说，这是他的选民给他的特殊委托，因为他们都想知道，1840年还拥有4000余万的国库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个修正案比原提案还要尖锐，按理说它会使受尽折磨的杜沙特尔暴跳起来的。现在，大概该提出信任问题了吧？

恰恰相反！汉泽曼先生虽然反对提案，但是对这个修正案和它的侮辱性的、最后通牒式的期限的要求却毫无异议！他只是说，这件事需要很多的时间，并且对承担这种令人不快的工作的可怜的委员们表示同情。

接着，关于表决问题做了一些说明，同时对汉泽曼先生又指责了几句，随即进行表决。关于转入议程的各种提案，不管是已说明理由的和未说明理由的，都遭到否决，得到格雷贝尔先生支持的帕里鸠斯的修正案，几乎一致通过。

汉泽曼先生只是因为没有表示任何反抗，只是因为对帕里鸠斯的侮辱采取了克己的态度，才避免了彻底的失败。他犹如一株片叶不存的光秃秃的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受人凌辱和摧残，连嘲弄成性的人看了也会产生怜悯之心。我们想起了一位诗人的话：

日耳曼的子孙，
绝不应用恶意的机智
嘲弄落魄的大人先生！¹⁴¹

关于会议的后一半的情况明天再谈。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7 月 12 日

载于 1848 年 7 月 14 日

“新莱茵报”第 4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福斯特曼先生论国家信用

科伦 7 月 13 日。福斯特曼先生在本月 7 日的妥协会议上发表演说，他用以下铁一般的论据来消除放肆的左派对稳固的普鲁士国家信用的怀疑：

“请你们自己判断，如果在昨天的交易所里，在贴现率为 5.5% 的条件下，利率为 3.5% 的国家证券是按票面额 72% 开的盘，那末对普鲁士财政的信任是不是会降低到零！”

由此可见，福斯特曼先生对交易所的投机事业和政治经济学一样无知。假如福斯特曼先生所提供的前提——国家证券的价格总是和货币的价格成反比——是可靠的，那末利率为 3.5% 的普鲁士证券的境况的确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贴现率既为 5.5%，那末它们就不能按票面额 72% 开盘，而只能按 $63\frac{7}{11}\%$ 了。但是有谁对福斯特曼先生说过，这种倒行的对比关系不是指 5—10 年期间的平均数而言，而是说每逢商业不景气的时候都有呢？

货币的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由各该时期的供求关系、由现存货币的多少来决定的。货币的多少又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由各该时期的工业状况、由全部交换的停滞或繁荣来决定的。

国家证券的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也是由各该时期的供

求关系来决定的。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由许许多多（尤其是在德国）非常复杂的条件来决定的。

在法国、英国、西班牙以及其他一切国家，它们的国家证券是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因此国家信用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普鲁士和更小的德意志各邦，它们的证券只是在小规模的地方交易所里流通，所以国家信用只起次要的作用。在这里，大部分国家证券不是用来进行投机活动，而是为了可靠地存放资本，保证证券占有者的固定收入。只有极少一部分证券投入交易所买卖。几乎全部国债都在小食利者、孤儿寡妇、监护院等等手里。如果证券的行情由于国家信用降低而下跌，这将使这些国家债权人更加有理由不出卖他们的证券。利息只够他们糊口，要他们以相当大的牺牲出卖他们的证券，他们就会破产。在一些小的地方交易所里流通的为数不多的证券，当然不能象法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中大量的证券那样受到供求、涨落等方面急剧的波动的影响，因为法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的证券主要是投机的对象，它们大量地在世界证券市场上流通。

因此，资本家由于银根紧，被迫不顾价格出售他们的证券从而造成证券行情下跌的现象，在普鲁士是少有的，然而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地却屡见不鲜。二月革命后，这种现象在法国国家证券空前迅速贬值中所起的作用，远比国家信用低落所起的作用大得多。

此外，买空卖空（《marchés à terme》）¹⁴²在普鲁士是禁止的，然而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地却是交易所的主要行当。

在地方市场上流通的普鲁士有价证券和法国、英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有价证券，在商业上所起的作用

用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很明显，普鲁士的证券行情无论如何也不能象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有价证券那样体现出本国细微的政治纠葛；普鲁士的国家信用决不象在其他国家那样能对国家证券的行情起迅速的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普鲁士和德意志各小邦卷入欧洲的政治漩涡，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普鲁士的国家证券就会象地产那样逐渐丧失不能转让的宗法性质而进入流通领域，变成普通的、经常转手的交易对象，而且将来也许还能在世界市场上占个小小的地位。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一般说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要国家信用不变，国家证券行情的上升处处都和利息率的下降成正比，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毋庸争辩的。

第二，在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这种对比关系即使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也是存在的，因为那里的大部分国家证券掌握在投机商手里，而且由于银根紧，每天都要调节证券行情和利息率之间的对比关系，所以不得不经常抛售证券。因此，在这些国家里，这种对比关系实际上往往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

第三，在普鲁士恰恰相反，这种对比关系一般来说只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才存在，因为，市场上流通的国家证券为数不多，交易所的买卖也有限，由于银根紧所发生的抛售，其实只是为了调节这一对比关系，而这种情况也很少；同时，地方交易所的证券行情首先是取决于地方的影响，而货币价格却取决于世界市场的影响。

第四，由此可见，福斯特曼先生从货币价格和国家证券行情的对比关系中作出关于普鲁士国家信用的现状的结论，只能说明

他完全无知。在贴现率为 5.5% 的条件下，利率为 3.5% 的证券按票面额 72% 开盘，这种行情丝毫也不能说成对普鲁士国家信用有利，强制公债就完全作了相反的证明。

写于 1848 年 7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14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44 号

妥 协 辩 论

科伦 7 月 14 日。今天我们来谈谈 7 月 7 日的妥协会议的后一半的情况。在使汉泽曼先生十分不快的关于财政委员会的辩论之后，大臣先生们还得忍受一连串不大的苦楚。这一天是提出紧急提案和质问的一天，是内阁遭受抨击和陷于窘境的一天。

万德尔议员提了一个提案：凡非法逮捕公民的官吏，应负责赔偿受害者的全部损失，此外还要处以监禁，时间应 4 倍于受害者被监禁的时间。

这个提案没有被认为必须立即讨论，因而被移交给专门委员会了。

司法大臣梅尔克尔先生声明，通过这个提案不仅不能加重现行立法所规定的对非法捕人的官吏的惩罚，反而会减轻它。（对啊）

司法大臣先生只是忘记提醒大家：根据现行的即旧普鲁士的法律，所谓官吏非法捕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依据可敬的旧普鲁士法的条款，最肆意妄为的捕人行为也可宣判无罪。

我们顺便来看一看大臣先生们的非议会作风。当提案还没有移交专门委员会或小组的时候，他们保持缄默，可是随后他们便针对这一点发表意见。他们十分自信地以为，这样一来谁也没有办法反驳他们了。在讨论博里斯先生的提案时，汉泽曼先生是这

样做的，现在，梅尔克尔先生也这样做。在英国和法国，如果大臣先生们在议会里采取了十分不可容忍的态度，人们就会完全用另一种方法让这些先生们规矩一些。可是在柏林呢！

德里奇的舒尔采先生提议：要求政府马上把拟好的或尚未拟好的构成法案提交议会，以便各小组进行讨论。

这个提案还含蓄地责备政府没有把补充宪法的构成法案提交议会或者有意拖延。令人伤心的是这种责备正好发生在政府已把两个法案（其中一个是关于市民自卫团的法案）提交议会讨论的那天早晨。看来首相（只要他稍为有点气魄）应该坚决地驳回这个提案。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只是简短地讲了几句话，说政府是想竭力满足议会的公正要求的等等。提案就以多数票通过了。

贝塞尔先生责问陆军大臣为何没有军律。普鲁士军队是唯一没有军律的军队。因此，在各军事单位，从步兵连到骑兵连，对于各种最重要的军职问题，尤其是各级军人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在看法上都存在着很大分歧。各种命令、指示和训令倒是不少，可是正因为它们数量多，而且混乱不堪、互相矛盾，所以它们更加无用。此外，所有这些文件都要通过层层的中机构，而这些机构总要想方设法地加以补充、说明、解释又解释，把文件弄得面目全非。这种混乱现象自然就助长了军官的跋扈，使士兵遭殃。结果，士兵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只知道一些义务。过去也有过军律，人们称之为猪皮律，可是到 20 年代就禁止私人使用。从那时候起，任何一个士兵都不能利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然而高级军官却还是用它来制服士兵！自卫军的军律也是这样，它从没有下达到全军。士兵虽然完全不了解它，但却要受到依据这种军律制订出来的命令的惩罚。这种荒谬绝伦的事情对于司令部的军

官和将军先生们当然是很合胃口的，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飞扬跋扈，残酷地虐待士兵了。可是下级军官、士官和士兵们却遭了殃。贝塞尔先生正是替他们着想才向施莱根施坦将军提出质问的。

可以想象，施莱根施坦先生听到“低能作家”——正象 1813 年人们常喜欢说的那样——这番冗长的话是感到多么惊讶啊！怎么，普鲁士军队没有军律吗？真是胡说八道！说实在的，普鲁士军队的军律不但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且是最简短的，它总共只有 4 个字：“服从命令！”在这支“不许打人”的军队里，如果士兵遭到拳打、脚踢，挨了枪托，或者刚从陆军学校出来的乳臭未干的少尉揪士兵的胡子或用手指弹他们的鼻子，如果士兵对此提出意见，那末得到的回答就是：“服从命令！”如果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校官要在饭后消遣一下，命令他的部队到沼地行军，强迫士兵在齐腰的水中摆方阵，如果士兵敢于抱怨，那末回答就是：“服从命令！”假如禁止军官上这家或那家咖啡店，如果他们对这一点提出意见，那末得到的回答就是：“服从命令！”这是一切军律中最好的军律，因为它适用于一切场合。

施莱根施坦先生是所有大臣中唯一还没有灰心丧气的人。一个在拿破仑时代服役过并受过 33 年普鲁士严格的军事训练的士兵，一个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飞弹哨声的士兵，实际上并不害怕妥协派和他们的质问！更何况在“服从命令！”这一伟大的条例濒临危急的时候。

他说：诸位！我对这一点非常了解。我非常清楚在这方面需要改进的是什么。这里谈的是破坏，而破坏是不应当进行的，因为恢复是件大难事。军事制度是夏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博伊恩和格罗曼拟订的，有 60 万武装人员和受训的公民服从它，只要纪

律得到遵守，它就能确保每一个公民的未来。我就打算遵守纪律，这就说明了一切。

贝塞尔先生：施莱根施坦先生根本没有回答问题。不过从他的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认为军律仿佛是破坏纪律的！

施莱根施坦先生：我已经说过，我要做军队目前所必需的并且对勤务有益的事情。

贝恩施先生：我们起码可以要求大臣先生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不然他就声明：我不愿意作答。直到现在我们听到的只是一些含糊其词的答复。

施莱根施坦先生生气地说：我不认为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对勤务有什么益处。

勤务，永远是勤务！施莱根施坦先生老是想着他是一师之长，他现在是在和他的军官谈话。他认为，即使作为陆军大臣，他的职责也只是关心勤务。至于军队里各级之间的法律地位，军队对整个国家以及公民的关系如何，则完全不加注意！我们还是生活在博德尔施文克时代；老博伊恩的精神笼罩着陆军部。

皮格萨先生就6月7日对梅尔岑的波兰人采取暴力手段的问题提出质问。

奥尔斯瓦特先生回答：他必须等待详细的报告。

可是这一事件已过了整整一个月，也就是说过了31天，而奥尔斯瓦特先生还没有收到详细的报告！真是卓越的治理方法！

贝恩施先生质问汉泽曼先生：他是不是打算在预算报告中概述一下1820年以来 *Seehandlung*〔海外贸易公司〕和1840年以来

国库的管理工作。

汉泽曼先生在哄堂大笑中说：一星期以后他才能答复！

贝恩施先生再次就政府保护侨民问题提出质问。

屈韦特尔先生回答：这是全德国的事情，他要贝恩施先生去找约翰大公。

格雷贝尔先生就军事主管机关官员兼后备军军官的问题向施莱根施坦先生提出质问。军事主管机关的这些官员在后备军受训时都算服现役，这样就使别的后备军军官没有受军事训练的机会。他提议，免除这些官员在后备军中的职务。

施莱根施坦先生回答：他将履行他的职责并研究这个问题。

费尔德豪斯先生就 6 月 18 日从波兹南到格洛高的行军中死亡的士兵以及为惩罚这个野蛮事件中的祸手而采取的措施问题向施莱根施坦先生提出质问。

施莱根施坦先生：这是真事。团长的报告已经送来了，确定行军宿营问题的总指挥部的报告还没有送来。因此，我现在还不能肯定，是不是破坏了行军部署。此外，这里涉及到控告司令部军官的问题，而这种控告常常使人痛心。我希望“崇高的全体会议”（!!!）在报告没有送来以前忍耐一下。

施莱根施坦先生并不把这种野蛮行为当做野蛮行为。对他来说，问题仅仅在于该校官“是不是服从了命令”。假如问题只是服从不服从命令，那末，18 个士兵象牲口一样极其可怜地死在大路上还有什么意思呢？

贝恩施先生(他也提过费尔德豪斯先生所提出的那种质问)指

出：既然这个质问题是多余的，那末我就收回我的质问。但是我要求陆军大臣先生指定一个答复的日期。事情已经过去 3 个星期，报告大概早就收到了。

施莱根施坦先生：我们没有放松一分钟，总指挥部的报告已令火速送来。

主席想回避议题。

贝恩施先生：我只是要求陆军大臣作答，并且指定一个日期。

主席：施莱根施坦先生认为怎样……

施莱根施坦先生：预先规定答复日期是完全不可能的。

格拉德巴赫先生：根据会议规则第 28 条，大臣有义务指定答复日期。我也坚持这一点。

主席：我再问一下大臣先生。

施莱根施坦先生：我不能提出肯定的日期。

格拉德巴赫先生：我坚持我的要求。

泰梅先生：我也是这样。

主席：也许，大臣先生过两个星期……

施莱根施坦先生：非常可能。刚才我提出，对于是不是服从命令我要作答。

主席：就这样，再过两个星期。

陆军大臣先生就是这样履行他对国民议会的“职责”的！

格拉德巴赫先生还就撤销人民所不满意的官吏的职务问题和临时补缺问题向内政大臣提出质问。

屈韦特尔先生的答复十分令人不满。格拉德巴赫先生继续发表意见。为他这种大胆行为所激怒的右派议席，发出一片怨声、叫声和喧嚷声，虽然格拉德巴赫先生英勇回击，但他的发言终于被

这些吵嚷声吞没了。

贝伦兹先生提议，在国内值勤的后备军应该受市民自卫团指挥部的指挥。因为这个提案没有被看作是必须立即讨论的，所以被取消了。以后，就开始对有关波兹南委员会的各种计策问题轻松愉快地交换意见。接二连三的质问、陆续不断的紧急提案没有了；著名的7月7日妥协会议接近尾声，它犹如和风轻拂，草原上溪水潺潺。汉泽曼先生怀着欣慰的心情离开会场，右派的喧嚷给他的荆冠上增添了一些锦花。施莱根施坦先生得意洋洋地沾着胡子，喃喃自语：“服从命令！”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14日

载于1848年7月15日

“新莱茵报”第4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

科伦 7 月 17 日。我们终于又等到了康普豪森先生所说的“大辩论”，这次辩论进行了整整两天。

这次辩论的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方面是政府提出的关于立即实施国民议会决议的保留条件，另一方面是雅科比的提案：承认国民议会有权不等任何人批准立即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但不同意国民议会关于中央政权¹⁴³问题的决议。

这样的问题竟能引起争论，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其他民族困惑不解。但是我们住在橡树和菩提树的国家中，因此不值得大惊小怪。

人民派代表去参加法兰克福议会，并授以全权宣布议会是凌驾于全德国及其各邦政府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议会由于有了人民交给的自主权，就应该通过关于德国宪法的决议。

但是议会没有立即宣布它的凌驾于德国各邦和联邦议会之上的自主权，反而胆怯地回避一切与此有关的问题，而且态度始终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的。

最后，它接触到了决定性的问题，即任命临时中央政权的问题。表面上它是独立的，而事实上是听命于各邦政府的（各邦政府通过加格恩来影响它），它亲自选举了各邦政府早已给它指定的帝国摄政王。

联邦议会承认已举行过的选举，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这次选举只是得到它的批准才具有了法律效力。

但是汉诺威甚至普鲁士以保留条件的形式提出了反对意见，而普鲁士的保留条件正是 11 日和 12 日讨论的基础。

因此，这次模糊不清的讨论很难怪罪柏林议会。罪过在于动摇不定的、软弱无力的、毫无魄力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本身，如果它的决议只能称作废话连篇的话。

雅科比简短而精确地（他常常是这样）论证了自己的提案。他使左派发言人的处境非常困难；除了关于中央政权诞生的经过这一严重败坏国民议会名誉的问题以外，他说出了关于这个提案所能说的一切。

果然，左派的议员在他发言后几乎没有谈什么新东西，而右派的情况就更糟：他们的发言不是流于空谈就是流于法律上的诡辩。两派议员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别人说过的话。

第一个让议会接触到右派论证的荣誉属于施奈德尔议员。

他从基本的论证说起，他认为提案本身就自相矛盾。提案一方面承认国民议会的自主权，而另一方面却建议妥协议会谴责国民议会，从而使妥协议会凌驾于国民议会之上。谴责只能由个人提出，而不能由整个妥协议会提出。

这个巧妙的论证（显然右派非常以这个论证自豪，因为它贯穿在右派的所有发言中）提出了崭新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在对国民议会的关系上，妥协议会的权力比个别人为小。

继第一个基本的论证之后是第二个即共和政体的论证。德国多半是由君主立宪的各邦所组成的，因此它应该有个立宪的不负责任的元首，而不应该有共和政体的负责的最高元首。这个论

证在第二天就受到施泰因先生驳斥：他说德国按其中央政治机构来说一直是共和国，诚然是个善良的共和国。

施奈德尔先生说：“我们受命全权草拟关于君主立宪的协议，而法兰克福的议员却被授以类似的全权，即同德国各邦政府协商制定德国的宪法”。

反动派把自己的愿望冒充为既成事实。颤抖的联邦议会因为没有丝毫法律权力的所谓预备国会的要求，召开了德国国民议会，在这样的时候是根本谈不上协商的，因为已召开的国民议会在当时是被认为有自主权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巴黎六月的日子不仅使大资产阶级的希望复活了，而且使已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的希望也复活了。每个顽固的容克地主都在幻想恢复自己旧时的鞭笞制度，从音斯布鲁克的皇宫到亨利七十二世世袭的城堡都传来了“协商制定德国宪法”的要求。的确，法兰克福议会本身应该承担这个罪过。

“所以，国民议会按照自己的职权选举了立宪的最高元首。但是它也按照人民的意志行动；绝大多数主张君主立宪。我将认为国民议会的其他决议甚至都是不幸的。这不是因为我反对共和制：在原则上我承认共和制（这里我并不自相矛盾）是最完善的和最高尚的国家形式，但实际上我们离它还远得很。在我们还没有相应的精神面貌以前，我们不可能有这种形式。当我们还没有共和主义者，即没有不仅在热情奋发时而且在任何时候都能自觉地慷慨地使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的高尚人物的时候，我们是不能盼望共和制的。”

要证明柏林议会中体现了哪些美德，还能有比施奈德尔议员的这些高尚而谦虚的话更好的东西吗？的确，如果过去还可以怀疑德国人是否适宜于共和政体，那末现在，在我们的辛辛纳图斯—施奈德尔的真正的公民美德和异常质朴而高尚的忘我精神的榜样面前，这种怀疑就应该烟消云散了！但愿辛辛纳图斯充满勇气

和信心，相信自己，相信无数高尚的德国公民；这些公民也认为共和制是最高尚的国体，但是认为自己是拙劣的共和主义者；对共和制来说他们已经成熟了，他们会象对待君主专制那样，以英雄的驯服态度来对待共和制。正直人的共和制将是一切曾经存在过的共和制中最幸福的：这是一个没有布鲁土斯和卡提利纳、没有马拉和六月风暴的共和制，这是“饱食的美德和有购买力的道德”¹⁴⁴的共和制。

但是辛辛纳图斯-施奈德尔大错而特错了，他高喊：

“在专制制度下，共和主义的特性是无法培养的，共和主义的精神不是呼之即来的；我们必须首先用这种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子孙！目前我认为共和制只是一种极大的灾祸，因为它是无政府主义，徒具被侮辱了的共和制之名，它是以自由为幌子的专制制度！”

相反地，德国人——正如福格特先生（从吉森来的）在国民议会中所说的那样——是天生的共和主义者，辛辛纳图斯-施奈德尔要用共和主义的精神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倒不如用他自己在年轻时代严以律己时所用的那种旧时的仁慈的德国风尚、谦虚和敬畏上帝的精神来教育他们。正直人的共和制不会是无政府主义和专制制度，它只会使辛辛纳图斯-施奈德尔所擅长的那种低级政客的纵谈阔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已。正直人的共和制决不会有玷辱了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切恐怖和罪行，它没有染满血污，它不仇恨红旗，它将创造奇迹，会使每个正直的市民能够在极其虔诚和幸福的情况下过着宁静的生活。谁知道，也许这个正直人的共和制甚至会把行会及其对没有加入行会的手工业者的一切可笑的控告重新还给我们！这个正直人的共和制不是空想，而是最实际的事实。它在不来梅、汉堡、卢卑克和法兰克福，甚至在瑞

士某几个州中都存在着。但在目前暴风骤雨的时代，它到处都遇到危险，到处都濒于灭亡。

因此，辛辛纳图斯-施奈德尔振作起来吧，放下铁犁和甜菜地，抛弃啤酒和妥协，骑上马去拯救遭受危险的共和制、你的共和制、正直人的共和制吧！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7 月 1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18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48 号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

科伦 7 月 18 日。在施奈德尔先生讲完话以后，瓦尔德克先生上台发言，他赞同雅科比的提案：

“现在普鲁士邦的情况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实际上，不能否认它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忧虑不安。”

这个论点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人忧虑不安。好象我们还是在听施奈德尔议员讲话。

“我们应该说，普鲁士担负着领导德国的使命。”

这仍然是那旧普鲁士的幻想，那甜蜜的美梦：妄想能把德国并入普鲁士，宣布柏林是德国的巴黎！是的，瓦尔德克先生看到这种甜蜜的希望在他眼前消失，但他痛心在目送着它，他责备过去的和现在的政府，说由于它们的过失，普鲁士没有领导德国。

可惜，那些美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关税同盟¹⁴⁵为普鲁士统治德国开辟道路，那时当地的爱国主义能够相信“在最近 200 年中，是勃兰登堡家族决定德国的命运”，而且今后还要决定它的命运；那些美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四分五裂的联邦议会的德国，甚至可以把普遍采用普鲁士官僚制度的紧身衣当做维持互相联系的最后办法！

“早就受到舆论谴责的联邦议会消失了，而法兰克福的制宪国民议会，突然在受惊的世界面前出现！”

的确，“世界”看到这种制宪国民议会不能不“受惊”。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你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瓦尔德克先生还发表了长篇大论反对德国设有皇帝，然后就是赖辛施佩格第二讲话。

赖辛施佩格第二声明说，雅科比提案的拥护者是共和主义者，他希望他们和法兰克福共和主义者一样公开地表示自己的意图。后来他断言，德国还不具备“充分的公民美德和政治美德，而一位大政治思想家曾经为这一点是共和制的最重要的前提”。既然爱国主义者赖辛施佩格都这样说，那末德国的情况的确不妙！

他继续说道，政府没有提出任何保留条件（！），而只是表示了自己的愿望。因为要这样做的理由已经很充分，所以我也希望国民议会在通过决议时，不要总是忽视各邦政府的意见。规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权限不属于我们的职权范围，国民议会本身没有为自己的职权创造理论，它实际上已经在它必须行动的地方行动起来。

换言之，这就是说，法兰克福议会在它还能左右一切的革命高涨时期，没有一举而坚决地结束同德国各邦政府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它宁可拖延决定性的战斗，为每个个别的决议时而同这个邦的政府，时而又同那个邦的政府发生小小的冲突。它离革命时期越远，它的消极行动使它的威信在人民眼中越发扫地，这些冲突就越加使它遭到削弱。在这一点上，赖辛施佩格先生说得对：这样一个不捍卫自己本身利益的议会是不值得帮助的！

但是赖辛施佩格先生下面这段话的确动人：

“讨论所有这些关于权限的问题都会是不从国家方面着眼；现在只有一点要求：在各个个别的场合下来解决实际问题。”

是的，用一个果断的决定来永远解决这些“实际问题”都会是“不从国家方面着眼”；如果不是象反动派那样力图镇压运动而是实现在街垒中诞生的任何会议的革命职能，也会是“不从国家方面着眼”；当然，克伦威尔、米拉波、丹东、拿破仑，整个英国的和法国的革命在极大程度上都是“不从国家方面着眼”，但巴塞爾曼、比德曼、艾森曼、维登曼、达尔曼等的行动却完全是“从国家方面着眼”的！革命一来，“大政治家”就都得下台，既然“大政治家”（特别是克姆彭区的议员赖辛施佩格第二这些大政治家！）现在又东山再起，显然目前革命是在打瞌睡！

“如果你们放弃这种制度，那就很难避免同德国国民议会或德国各邦政府发生冲突；无论如何你们会引起沉痛的纠纷；发生纠纷就会使无政府状态抬头，那时，谁也不能拯救我们摆脱内战，而内战将成为更大的灾难的开端……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人们谈起我们时会这样说：德国的秩序靠我们的东方和西方的朋友恢复起来了！”

赖辛施佩格先生也许是对的。如果国民议会要讨论权限问题，就可能引起冲突，其结果就是内战，就是法国人和俄国人的出现。但是如果国民议会和过去一样不讨论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更加可能碰上内战。冲突在革命初期还比较简单，但它会一天一天地复杂起来，而且越是迟迟不下决心，结局就越痛苦，流的血就越多。

象德国这样的国家，不得不给自己开辟一条从空前的分裂状态走向统一的道路，它在灭亡的威胁下需要有比它过去的四分五裂状态严密的革命的集中；它是一个在国内藏着 20 个万第 的国家，侧身于两个最强盛集中的大陆强国之间，周围是无数的小国，并且与各国的关系都很紧张甚至处于战争状态。在现代普遍发生

革命的时候，无论是内战还是对外战争，这样的国家都是无法避免的。人民及其领导者的行动越是犹豫不决，决心越是迟迟不下，这些我们完全不能避免的战争的危险性和毁灭性也就越大。如果赖辛施佩格先生的“大政治家们”继续执政，我们也许还能看到第二个三十年战争。但是，多亏事变的力量，德国人民、俄国皇帝和法国人民还要发表他们的意见。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7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19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49 号

万第——法国西部的省名。农业地区。富农和中农占有大部分土地。在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 19 世纪初，这里是贵族和僧侣在英国支持下所组织的富农和中农反动叛乱的场所。“万第”一词已经成了表示富农反革命活动策源地的通称。——译者注

斯图加特和海得尔堡 俱乐部被封

科伦 7月 19日。

所有的德国人都喝得酩酊大醉，
而你，你相信那干杯的祝辞；
你相信每一只烟斗
和它那黑、红、黄色的缨络¹⁴⁶！

善良的德国人呵，你又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你以为你完成了革命吗？错了！你以为你推翻了警察的国家吗？错了！你以为通过三月街垒向你飞来的自由结社的权利、出版自由、武装全民以及其他种种高调，现在已经有可能兑现了吗？错了，完全错了！

酒醉时，何等惬意，
觉醒后，景物全非¹⁴⁶。

面对你那些间接选举出来的所谓国民议会¹⁴⁷，面对德国公民的再度被逐出德国城市，面对美因兹、特利尔、亚琛、曼海姆、乌尔姆、布拉格的屠刀暴政以及柏林、科伦、杜塞尔多夫、布勒斯劳等地的逮捕和政治审判案，你会觉得景物全非。

但是，善良的德国人，俱乐部是你唯一的東西了！你可以到俱乐部去，在那里公开抨击最近几个月的政治欺诈；你可以向同道者吐露你的苦闷，你可以得到在同样的压迫下受苦难的志同道

合的爱国者的安慰！

但是现在就连这一点也没有了。俱乐部和“秩序”是不能共存的。为了“恢复信任”，绝对需要取缔俱乐部的暴乱活动。

昨天我们讲过维尔腾堡政府如何通过王室命令直截了当地查封了斯图加特的区民主联合会。现在要控告俱乐部的领导人甚至不用吹灰之力，只要采取旧的警察措施就行了。不仅如此，哈普雷希特先生、杜维尔努阿先生和毛克勒先生（他们曾签字确认这个命令）还更进了一步：他们以法律上没有的惩罚——监禁一年——来威胁违令者；他们不经议会讨论，只是“根据宪法第 89 条”就可以颁布特别刑法！

巴登的情况也同样糟糕。我们今天报道了海得尔堡民主大学生联盟被查封的消息。在这里，一般说来结社权并没有怎样公开被否认，这里只是有人根据联邦议会的旧的早已被废除的特别法否认大学生的结社权。大学生都受到这些已失效的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惩罚的威胁。

现在可以预料，在最近的将来也许连我们的俱乐部也要被封闭。我们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存在，也正是为了使政府能够毫无顾虑地采取这些措施而不引起舆论的愤慨。当然，这个议会会象它过去轻轻地越过了美因兹革命一样，将轻轻地越过种种警察迫害而转到当前的问题上去。

因此，我们不是希望要从法兰克福议会得到什么东西，而只是再次地迫使它的大多数向整个德国公开宣布它和反动派结成了联盟，我们号召法兰克福议会中的极左翼议员提出如下的提案：

这些措施的倡导者哈普雷希特先生、杜维尔努阿先生和毛克勒先生等破坏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将他们交法庭审判。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7 月 1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20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50 号

普鲁士出版法案

科伦 7 月 19 日。本来我们今天打算继续评述妥协辩论来使读者消遣，特别想向读者介绍一下鲍姆施塔克议员的出色的演说，可是事变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人皆先爱其身。当报纸的生存遭到威胁的时候，甚至连鲍姆施塔克议员也可以置诸脑后。

汉泽曼先生向妥协议会提出了临时出版法案。汉泽曼先生对出版物的这种慈父般的关怀促使我们立刻来研究这个问题。

过去，人们用普鲁士公法中的那些极其有教益的条款来装饰 G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现在，在革命以后，一切都改变了。现在，人们用 Gode〔法典〕和九月法令中的那些珍贵的珠宝来装饰普鲁士公法。杜沙特尔当然不是博德尔施文克。

几天以前，我们报道了这个出版法案中的一些主要条文。我们刚刚利用关于诽谤的诉讼案的机会证明了：Gode pénal〔刑法典〕的第 367 和 368 条同出版自由的矛盾是非常惊人的，而汉泽曼先生就已经准备不仅把它们推广到王国的每个角落去，而且至少还把它们加重两倍。在新的出版法案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由于我们实际体验过而觉得那么喜欢和珍爱的一切。

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禁止（违者处以 3 个月到 3 年的监禁）用应受法律制裁成“引起公众蔑视”的事实来控告某人的条文。在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只准许用“经过详尽证明的文件”来确定事实的可靠性的规定，——总之，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拿破仑专制时代对付出版物的一切典范手段。

实际上，汉泽曼先生已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已使各个旧的省份分享了莱茵省立法的好处！

出版法案第 10 条是上述一切条文的顶点，它规定：凡是在国家官员执行自己职务方面诽谤国家官员的人，罪加一等。

根据刑法典第 222 条规定，如果官员在执行职务时或由于（à l'occasion）执行职务而遭到言语上的侮辱（outrage par parole），侮辱他们的人应判处一个月到两年的徒刑。不管检察机关怎样煞费苦心，但由于一些很显然的理由，直到现在这一条还未能用来对付报纸。为了纠正这种过错，汉泽曼先生已把这一条改成上述的第 10 条。首先，用更方便的“在执行自己职务方面”的说法代替了“因”这个用语；第二，用 par écrit（在书面上）代替了 par parole（在言语上）这种受限制的用语；第三，惩罚加重了两倍。

从这项法律生效的那一天起，普鲁士的官员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如果普富尔先生用硝酸银给波兰人的手上和耳朵上打烙印，而报纸要是报道这件事情，那末就要处以 $4\frac{1}{2}$ 月到 $4\frac{1}{2}$ 年的监禁！如果公民们没有犯罪而被错误地监禁起来，而报纸要是报道这件事情，那末就要处以 $4\frac{1}{2}$ 月到 $4\frac{1}{2}$ 年的监禁！如果县长们变成了反动派的推销员，并为保皇党人的奏摺征集签名，而报纸要是揭露这些先生们，那末就要处以 $4\frac{1}{2}$ 月到 $4\frac{1}{2}$ 年的监禁！

从这项法律生效的那一天起，官员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逞凶

肆虐、横行霸道和违法乱纪了：他们可以放心地打人和命令别人打人、进行逮捕和不加审问就加以监禁。唯一有效的监督——报纸将变成无效的东西。在这项法律生效的那一天，官僚们将欢天喜地，因为他们将比三月以前变得更加强大有力，更加可以逍遥法外了。

其实，当不能让观众蔑视理应受到公众蔑视的东西的时候，究竟还有什么出版自由呢？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报纸至少还可以举出事实来证明自己的一般论断和控告。现在这种情况就要结束了。现在它将不能陈述事实了。它应当仅仅局限于一般的空话，使善意的汉泽曼先生和一切庸夫俗子都有权利说：报纸光会谩骂，而什么也没有证明！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禁止它证明的。

但是，我们建议汉泽曼先生在他那善意的出版法案中再加上一条。他不妨宣布：任何使官员先生们不仅遭受公众蔑视、而且遭受公众嘲笑的企图都应受到惩罚。不然，这将是令令人非常痛心的缺陷。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谈那些涉及违反道德的罪行的条文以及关于没收的命令等等。它们的妙处大大胜过了路易-菲利浦和复辟时期的出版法。我们只准备指出一点：根据第 21 条的规定，检察官不仅可以要求禁止已经印好的作品，甚至可以下令没收刚刚付印的手稿，如果当局认为它的内容包含有应受追究的罪行和过错的话！对于仁爱的检察官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广阔的活动天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报纸编辑部里去要求审查已经“付印的手稿”，因为在那些手稿中可能包含有罪行和过错，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娱乐！

在宪法草案和“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中有一条规定：“书报检查永远不能恢复”，但是在上述情况下，这种庄严重要的规定听起来简直是一种恶意的嘲笑！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7 月 1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948 年 7 月 20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50 号

市民自卫团法案

—

科伦 7 月 20 日。市民自卫团被解散，这就是关于建立市民自卫团的法案的最主要的一条，虽然这一条只是以极不显著的形式，即被列为第 121 条而放在该草案的末尾，内云：

“鉴于本法律规定要建立市民自卫团，目前属于市民自卫团或同它并存的所有一切武装部队，一律宣布解散。”

有人已毫不客气地开始解散那些不直接属于市民自卫团的部队。而解散市民自卫团本身只能以改编市民自卫团的名义进行。

礼节感迫使立法者把宪法中的下面这一句话列入第 1 条：

“市民自卫团的使命是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法定秩序。”

为了完全符合“这种使命的意义”，市民自卫团对于公共事务既不当考虑和谈论，也不应当讨论或做出决定（第 1 条）；既不当举行会议，也不应当拿起武器（第 6 条），总之，未经最高当局批准，不得有任何生存的标志。不是市民自卫团“保护”宪法不受当局的侵害，而是当局保护宪法不受市民自卫团的侵害。根据第 4 条规定，市民自卫团应当盲目地“遵守当局的命令”，对“村镇、行政和司法当局的活动”不得进行任何干涉，并且不得进行任何议论。在“拒绝”消极服从的场合下，区督察员有权“解除”市民自卫团的“职务”

4个星期(第4条)。假如市民自卫团引起圣上的不满,“根据国王的命令”,可以“解除它的职务”6个月或者甚至可以把它完全“解散”,只有在6个月之后它才能重新组织起来(第3条)。因此(根据第2条),“在王国的每一个村镇中,都应当组织市民自卫团”,只要区督察员或国王认为没有必要以别的方式来管理每一个村镇的话。如果国家事务不归市民自卫团“管辖”,那末,相反地,市民自卫团就要“归内政大臣管辖”,即归警务大臣管辖,因为他是它的天然上司,同时“按其使命的意义”来说,他又是“宪法规定的自由”的忠实的埃卡尔特¹⁴⁸(第5条)。当市民自卫团没有被区督察员或其他官员召来“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就是说“执行各位上司的命令”即执行职务的时候,它的当前任务就是执行由国王的某一个上校所起草的军事条令。军事条令是市民自卫团的 magna charta[大宪章],据说市民自卫团就是为了保卫和实现这一宪章而建立起来的。军事条令万岁!最后,参加市民自卫团使“从24岁到50岁”的每一个普鲁士人都得作如下的宣誓:

“我宣誓效忠国王、宪法和王国的各种法律。”

可怜的宪法!它卑躬屈膝地处于国王和各种法律之间,充满了市侩式的谦逊,表现得多么怯懦,多么羞涩。首先是保皇派的宣誓,即殷勤的顺民的宣誓,然后是对宪法的宣誓,最后是除了正统主义的意义之外没有任何意义的宣誓,仿佛除了根据宪法产生的法律以外,还有由国王的独裁产生的其他法律。可敬的市民原来彻头彻尾是归“内政部管辖”的。

这个正直的人在首先放弃自己的基本政治权利,如结社权等等的条件下得到了武器和军装。他那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的

任务，“按其使命的意义”来说，应当这样来解决：他应当盲目服从从当局的命令，用士兵的那种消极的、无意志的和无个性的服从来代替最普通的、甚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都承认的市民自由。正如施奈德尔先生在妥协议会上所说的，这是培养未来的共和主义者的出色的学校！我们的市民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普鲁士宪兵和英国警察之间的某种中间物。但是，军事条令和他服从命令的意识应当是他遭到一切损失后的安慰。不把军队溶化到人民中去，而把人民溶化到军队中去，这不是更新奇吗？

宪法中的话竟变成了普鲁士的现实，这真是一种奇观！

既然普鲁士国家制度适应于立宪制度，那末，为什么立宪制度就不能适应于普鲁士国家制度呢？可怜而立宪制度呵！正直的德国人呵！他们那样长久地抱怨没有实现“最郑重的”诺言！他们马上就将感受到一种恐惧，由于这些郑重的诺言似乎已真正无法实现而产生的恐惧！人民在 *par où il apâthé*（作茧自缚）。你们不是曾要求出版自由吗？那末你们就要受到出版自由的惩罚，就要受到不经书报检查官检查的检查，即受到检察机关的检查，受到法律（这种法律认为：出版物“按其使命的意义”来说应当关心所有一切东西，可是就不应当关心上级，完美无缺的上级）的检查，受到监狱的和罚款的检查。你们将象鹿渴望新鲜的水一样，哀求把受到很多辱骂而很少被重视的善良的老书报检查官归还给你们，把这个最后的罗马人归还给你们，你们曾在他的禁欲主义的审慎监视下过着那样舒服而平安的生活。

你们不是曾要求人民自卫团吗 那末你们就要遵守军事条令。你们要受当局的管辖，你们要受军事训练，有人将那样热心地教导你们消极服从，以致把你们弄得目瞪口呆。

普鲁士的立法者以其特有的嗅觉发现：每一项新的宪法规定都为新的刑法、新的章程、新的惩罚措施、新的监视、新的挑剔和新的官僚制度提供绝妙的借口。

更多一些符合宪法的要求！更多一些符合宪法的要求！办事内阁大声疾呼。我们要用行动来回答每一项要求！

要求：每一个市民都应当武装起来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

回答：从今以后每一个市民都要归内政部管辖。

瑟西把希腊人变成了假面兽，而普鲁士国家制度及其办事内阁则使宪法规定具有一种幻想的面貌，但是，从假面兽来辨认希腊人比从幻想的面貌来辨认宪法规定要容易得多。

在用普鲁士方式改组波兰之后，就是用普鲁士方式改组市民自卫团！

二

科伦 7 月 21 日。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市民自卫团法案的“总则”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市民自卫团已不再存在。我们还要稍微谈一下这个法案中的几节，以便更好地阐明“办事内阁”的精神，同时，我们还要在这里选择一些关于一个名不符实的机构的原始材料。很多条文都是以关于村镇和区的新条例、以王国新的行政区划等等为前提的，也就是以那些暂时还在办事内阁的秘密怀抱中过着隐蔽生活的措施为前提的。但是，为什么办事内阁在提出它所许诺的关于村镇、区等等的条例的草案之前就提出改组市民自卫团的法案呢？

在第 3 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张履历表，一张是市民自卫团中优秀成员的履历表，一张是必须在市民自卫团中服务并领取社会补助金的人的履历表（第 14 条）。官吏们的军队当然不包括在领取社会补助金的人当中。大家知道，在普鲁士，真正的生产阶级正是由他们组成的。如同古代罗马的奴隶一样，穷人是“仅仅在特殊的场合下才被召去执行职务”的。然而，如果穷人因为他们的市民依赖性的关系，也象那不勒斯的流浪汉一样很少负有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的使命，那末，他们在这种新的消极服从的机构中是否应当处于从属地位呢？

但是，除了穷人以外，我们还发现了必须在市民自卫团中服务的有支付能力的人同无支付能力的人之间的无比重要的差别。

事先还需要指出一点。根据第 53 条的规定：

“全国市民自卫团的服装应当简朴、一致,服装式样须经国王批准。其所以要规定这样的服装,是为了不要把市民自卫团和军队混淆起来。”

当然罗其所以要规定这样的服装,是为了把军队和市民自卫团对立起来,同时把市民自卫团和人民对立起来,以便在采用白刃战、扫射和类似的军事手段时不会发生任何混乱。但是,服装本身也同履历表、军事条令一样,是不可缺少的。这种服装无非是给自由穿的一种仆役制服。这种仆役制服为大大增加市民自卫团的服装费提供了借口,而这种费用的增加又如愿以偿地在资产者自卫团员同无产者自卫团员之间造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请再往下听吧：

第 57 条 市民自卫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设法自费购买服装（在有这种服装的地方）、服务证和武器。但是,村镇应当出资为那些实际执行职务而无能力自费购买的自卫团员购置这些东西。

第 59 条 村镇对它所购置的装备品保留所有权,而且,当这些装备品不被用来执行职务的时候,村镇可以把它们保存在特定的地点。

这样,所有无力自我购买全部军备的人（包括绝大多数普鲁士居民、全体工人和大部分中间等级）,“当他们不被用来执行职务的时候”,就要根据法律被解除武装,而市民自卫团中的资产者手里则始终握有武器和服装。因为正是这个资产阶级能以“村镇”的名义把村镇“购置的”所有“装备品”“保存在特定的地点”,结果是它不仅掌握着自己的武器,而且甚至还支配着无产阶级自卫团员的武器,并且在对资产阶级不利的政治冲突中,它“能够”并且“一定会”拒绝发给武器,即使这些武器是被“用来执行职务”的。这样一来,资本的政治特权便利用一种最难觉察同时也是最有效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恢复起来了。资本对穷人享有掌握武器的特权,就象中世纪的封建贵族对农奴享有掌握武器的特权一样。

为了使这种特权保持其绝对的特殊性，第 56 条规定：

“只有在乡村中和在人口不到 5 000 人的城市中，才允许用长矛和马刀来武装市民自卫团，使用这种武器时不要求穿军服，只要带上由上校规定的特殊服务证就行了。”

在所有人口超过 5 000 人的城市中，服装增加了实际上决定掌握武器权利的财产资格限制，同时也增加了市民自卫团中处于无产者地位的人的数目。正如服装和武器仅仅是租借给这个无产阶级，即仅仅是租借给绝大多数居民的一样，武装的权利，即无产阶级作为自卫团而存在的权利，一般也只是租借给他们的，*beati possidentes*，有产者到底是幸福的！穿着租借的衣服、尤其是穿着这种象士兵的衣服一样轮流着穿的租借的衣服的人，精神上会感到一种压抑，而这种精神上的压抑当然也就是负有“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的使命的罗马人所要求的首要东西。但是，与此相反，市民自卫团中有支付能力的成员的骄傲的优越感难道不会滋长起来吗？除此以外还需要什么东西呢？

但是，为了居民中那部分有产者的利益，即为了特权资本的利益，甚至这些把大多数居民的武装权利变成了幻想的条件，又被那些新的、有更多限制的条件所约束了。

这就是：村镇只应当为“实际执行职务”的那部分无支付能力的自卫团员储存装备品。根据第 15 条规定，“实际执行职务”的那部分人的情形如下：

“在能够执行日常职务的人数占居民¹/₂₀以上的所有村镇中，村镇管理机构有权把实际执行职务的人数局限于这一部分居民。如果村镇管理机构行使这种权利，那它就有责任来组织服务的次序，使所有被召来执行日常职务的人依次轮流执行这种职务。但是，每一次更换的人数不得超过¹/₃，而且应同时召集与被替换的人数相等的各种年龄的自卫团员来服务。”

现在是否需要统计一下，村镇实际上究竟为多少无产者自卫团员和多少居民购置装备呢？

在我们昨天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办事内阁怎样根据旧普鲁士的即官僚制度的国家精神来改组宪法所规定的市民自卫团的机构。今天我们看到，办事内阁怎样完成了它的最后使命，——我们看到，办事内阁怎样根据七月革命的精神，根据路易-菲利浦的精神，根据把资本捧上了宝座并

在锣鼓和喇叭声中
对它的青春光芒¹⁴⁹

赞赏不已的时代精神来改革市民自卫团的这种机构。

现在对汉泽曼-屈韦特尔-米尔德内阁说两句话。屈韦特尔内阁在最近把有关反动派阴谋的通令分发给所有的区督察员。这是怎么回事呢？

办事内阁想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又与旧的、警察的和封建的国家妥协。在解决这种双重矛盾的任务的过程中，办事内阁随时都看到，反动派怎样用封建专制的精神来颠覆刚刚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统治，并颠覆内阁本身，——而内阁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事先没有争取全体人民来作为自己的同盟者，没有为了争取人民而多少表现出一些民主精神，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取得统治的。

但是，企图把复辟时期同七月时期结合起来，力求使资产阶级还在同专制制度，同封建制度，同闭塞的容克地主，同军阀和官僚的统治作斗争的时候就抛开人民，奴役人民，把人民扔在一边——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任务，在解决这个任务时，甚至连办事内阁，甚至连三头政治的政治家汉泽曼-屈韦特尔-米尔德也不免要遭到失败。

三

科伦 7 月 23 日。市民自卫团法案中有关“选举和任命首长”的一节，是真正的选举方法的迷宫。我们想扮演阿莉亚娜这个角色，并给现代的底西亚斯——可敬的市民自卫团——一团线，把他们引出这个迷宫。可是，现代的底西亚斯也象古代的底西亚斯一样忘恩负义，他在杀死明诺托尔之后，竟背信弃义地让自己的阿莉亚娜——报纸——坐在纳克索斯岛的岩石上。

我们把迷宫的各道门列举出来。

第一道门：直接选举。

第 42 条 “市民自卫团的指挥官，包括大尉在内，一律由实际执行职务的自卫团员选举之。”

旁门：“实际执行职务的自卫团员”仅仅占真正“适合携带武器”的人员中的一小部分。参照第 15 条和我们前天的文章。

因此，“直接”选举也只不过是所谓的直接选举而已。

第二道门：间接选举。

第 48 条 “营的少校指挥官由相应各连的大尉、排长和班长以绝对多数票选出。”

第三道门：间接选举和国王任命相结合。

第 49 条 “团长由国王从相应各营的营长和排长以上的其他各级指挥官选出的 3 个候选人中任命。”

第四道门：间接选举和各个指挥官的任命相结合。

第 50 条 “副官由相应的各个指挥官从排长中任命,营的文书从班长中任命,营的鼓手从鼓手中任命。”

第五道门：由官僚机构直接任命。

第 50 条 “连的司务长和文书由大尉任命,骑兵连的骑兵司务长和文书由骑兵大尉任命,班长由排长任命。”

因此,如果说这些选举方法是以伪造的直接选举而开始,那末它们便以实际停止一切选举而告终,即以各位大尉、骑兵大尉和排长先生的专横而告终。Finis coronat opus〔事以结局为贵〕。这个迷宫有它的 pointe〔尽头〕,有它的顶点。

从这种复杂的化学过程中分离出来的这些结晶体,即上至鼎鼎大名的上校、下至默默无闻的上等兵,要沉淀 6 年之久。

第 51 条 “指挥官的选举和任命每 6 年举行一次。”

很难设想,为什么在提出这些预防措施之后,办事内阁还认为有必要在“一般法规”中不近人情地当面呵斥市民自卫团:你们应当由政治机构改组为纯警察机构和旧普鲁士军事训练的园地。为什么要破坏人们的幻想呢?

国王的任命是那样的神圣不可侵犯,以致在“市民自卫团法庭”一节中根本没有提到怎样的法庭可以审判“上校”,而只是确切地指出了审判少校以下的其他各级官员的法庭。难道国王任命的上校还会犯罪吗?

可是,对于在自卫团中供职的市民来说,只要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首长,即上至十全十美的国王任命的上校下至被大尉任命为司务长或被排长提升为班长的随便哪个小伙子的一句话,就可以剥夺自卫团员的人身自由并把他们监禁 24 小时,这简直是对市民这个概念的亵渎。

第 81 条 “在服役中,每个首长都可以申斥自己的部下;如果部下在执行职务时酗酒或有别的粗暴地违背职责的行为,首长甚至有权下令立即把他们逮捕和监禁 24 小时。”

当然,首长先生本人应当断定,什么是别的粗暴地违背职责的行为,而部下则应当俯首听命。

因此,根据这个法案的导言,如果市民只有在他们不再是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构成人的使命的东西,即不再是《zoon politicon》、“社会的动物”的时候,才获得了“自己的使命的意义”和“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的权利,那末,他们只有在放弃自己的市民自由,听凭任何一个上校或班长摆布的时候,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看来,“办事内阁”抱着特殊的东方的神秘观点,实行特殊的摩洛哥崇拜。为了保卫区督察员、市长、警察厅长和警察总监、警察署长、检察机关官员、高等审判厅厅长或审判长、检察官、治安法官、村长、部长、僧侣、现役军人、国境官员、海关官员和税吏、森林管理局和邮政局的官员、所有监狱的看守和狱吏、巡官,以及所有未满 25 岁和已满 50 岁的人(根据第 9、10 和 11 条规定,这些人并不包括在市民自卫团之列)等等的“宪法规定的自由”,为了保卫这些民族精华的“宪法规定的自由”,民族中的其余的人就应当流血牺牲,不仅要把自己的宪法规定的自由,而且要把自己的个人自由统统献给祖国。Pends-toi, Figaro! Tu n'aurais pas inventé cela! [上吊吧,费加罗!你再不要想到这一点了!]

不用说,关于惩罚的一节草拟得特别有趣和精密。而且市民自卫团的整个机构,按“其使命的意义”来说,只应当是对可敬的市民要求宪法和人民自卫团的意图的一种惩罚。不过还需要指出一点:

除了根据法律应受惩罚的行为以外,根据新的惩罚条例(见第 82 条和以下各条),在军事条令,即在这个由国王的上校在少校的协助下起草并经虚构的“区代议机关”批准的市民自卫团大宪章中所规定的各种情况,也要受到惩罚。不言而喻,监禁能用罚款的办法来代替,以便使市民自卫团中有支付能力的人同无支付能力的人之间的差别,即由“办事内阁”发现的市民自卫团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差别得到刑法的校准。

在宪法中应被办事内阁完全拒绝的特殊裁判权现在又被这个内阁偷偷地放到市民自卫团条例中去了。自卫团士兵和班长在军纪上的一切过错,应交给由两个排长、两个班长和 3 个士兵组成的连的法庭处理(第 87 条)。营的各个连里的指挥官,从排长到少校,在军纪上的一切过错,应交给由两个大尉、两个排长和 3 个班长组成的营的法庭处理(第 88 条)。对于少校又规定了另外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关于这种诉讼程序第 88 条叙述如下:“如果少校应交给营的法庭审判,那末营的法庭除了原有的成员外还需要增添两个少校”。最后,如前所说,上校先生是不受任何法庭审判的。

这一卓越的法案是以下面一条结束的:

(第 123 条)“关于市民自卫团在战时参加保卫祖国的条例,以及关于他们在战时的武装、装备和给养的条例,都是以建军总法为基础的。”

换句话说,后备军继续同被改编的市民自卫团并存。

仅就这个法律草案以及和丹麦的休战协定草案来说,难道还不应该对办事内阁起诉吗?

写于 1848 年 7 月 20 日—2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21、22 和 24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51、52 和 54 号

“祖国报”¹⁵⁰论和丹麦的休战

科伦 7 月 20 日。为了使祖国能够确信它对国民议会、帝国摄政王等进行的所谓革命,除了完全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光荣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外一无所得,我们援引丹麦“祖国报”如下一篇文章。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足以使那些甚至是制度的最轻信的维护者也能相信:4 000 万德国人被 2 000 万丹麦人利用英国的调停和俄国的威胁欺骗了,正如他们在“至高无上的帝王”时代经常受骗一样。

奥尔拉·列曼大臣私人办的“祖国报”对休战发表如下的看法:

“如果只从我们的希望和愿望的角度去观察休战,那末这个休战当然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政府能够有所选择,即或者停战,或者指望靠瑞典和挪威的帮助把德国人赶出什列斯维希,迫使他们承认丹麦在公国居民的同意下有管理该公国事务的权利,那末就必须承认,政府同意休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动。但是并没有这种选择的机会。应当考虑到,无论英国或俄国(这两大强国对解决这个争论问题最感兴趣)都要求签订休战协定来作为它们今后建立友好关系和进行调停的条件。瑞典—挪威政府在决定给予任何积极的援助以前,也要求我们采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瑞典—挪威政府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答应给予这种援助,即这种援助不是用来占领什列斯维希,而只是用来保卫日德兰和各个岛屿。因此,我们只能在下面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或者争取时间以等待国外形势的变化和整顿国内政治和军事机构,或者向较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单独战斗,但是这种战斗几乎一定不会取得胜利(即使占据有利阵地的联军遭到我们这个兵力要少一半的部队的进攻),相反地,它

也许会造成这样的情况：瑞典—挪威部队一旦撤退，德国人就会占领整个半岛。这种斗争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付出巨大代价而得不到好处的胜利，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会使我们全部防御力量消耗殆尽，并带来丧权辱国的和约。”

这家丹麦报纸进而申辩休战条件有利于丹麦。担心冬天一到德国部队能从冰上开到芬宁岛和阿尔森岛的时候军事行动会重新恢复是毫无根据的。德国人和丹麦人一样，在这种气候条件下进行冬季远征是吃不消的。而3个月的休战对丹麦和对丹麦抱友好态度的什列斯维希居民来说是很好的机会。如果在3个月内和约还不签订，那末休战条约自然就会拖延到春季。这家报纸继续写道：

“取消封锁和释放战俘大家会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交还截获的船只也许会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其实，我们截获德国船只仅仅是作为迫使德国不能越过我国国境的一种强制手段，决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去霸占别国的私有财产。而且这些船只的价值也决不象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在目前国内市场和整个欧洲贸易都处于停滞的情况下，这些船只能拍卖，而且至多也只能卖得150万，即两个月军费的总数。但是交还船只的代价是德国人退出两个公国和赔偿由于在日德兰实行征集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我们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种手段现在当然就没有必要再采用了。我们觉得，使3个地区摆脱力量比我们强大的军队的统治（我们自己决不可能迫使这种军队撤退），比国家出卖截获的船只所获得的那么点利益要大10倍。”

据说第7条引起极大的怀疑。这一条说，要继续保留公国中的特别政府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主义”；这一条规定，由丹麦国王任命的临时政府的两个成员必须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名

流中提出,这样就很难找到一个非“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然而“一切暴动”都受到严厉的斥责,临时政府的一切决议都被废除,而3月17日以前的制度又告恢复。

“这样,我们从丹麦的观点来考察了休战协定的一切基本条件。我们不妨也从德国的观点去看一下。

德国的一切要求归结为交还船只和取消封锁。

德国放弃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放弃由强大无敌的军队所占领的公国,这个军队能够打败比至今和它对抗过的敌人强大一倍的军队,来保卫自己的阵地;

第二,放弃什列斯维希加入德意志联邦,虽然联邦议会宣布过这件事情,而且国民议会也以吸收什列斯维希代表参加议会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

第三,放弃德国承认为合法的并且与其进行过谈判的临时政府;

第四,放弃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党,把这个党所提出的受到全德支持的要求原封未动地交给非德意志国家去研究;

第五,放弃援助奥古斯丁堡的王位篡夺者,虽然普鲁士国王曾经亲口答应援助这些王位篡夺者,但是在休战协定中却根本没有提到他们,而且既不保证他们得到赦免,又不保证他们享有避难权;

最后,放弃公国和德意志联邦各自担负的那部分战费的赔款。但是丹麦本身所耗费的那笔战费将得到赔偿。

我们觉得,我们相当强大的敌人在这个休战条约中所遭受的损失,比我们这个渺小而受人轻视的人民要大得多。”

什列斯维希莫名其妙地想做德国人。因此它自讨苦吃,受到德国的任意摆布,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休战协定的本文我们明天发表。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20日

载于1848年7月21日

“新莱茵报”第5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和丹麦的休战

科伦 7 月 21 日。我们的读者都知道,我们对丹麦战争始终采取很冷静的态度。我们既不赞同民族主义者那种大吹大擂的豪言壮语,也不赞同歌唱受海洋冲洗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那种令人厌烦和充满廉价热情的歌曲。我们非常了解我们的祖国,我们了解对德国的信赖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些事件充分证实了我们的观点。丹麦人毫无阻碍地占领什列斯维希;德国人重行占领这个国家,向日德兰远征,向什莱退却,再一次占领这个公国(直到克尼格绍),——所有这些始终令人不解的战争向什列斯维希人清楚地表明,从实现了革命的强大而团结的德国,即从似乎是有主权的 4 500 万人民那里能得到怎样的保护。但是为了彻底打消他们成为德国人的热望,为了使他们感到“丹麦的锁链”远比“德国的自由”来得仁慈,普鲁士代表德意志联邦进行休战谈判,我们今天把休战协定直译出来发表。

按照历来的惯例,在签订休战协定时双方军队保持原来的阵地,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在双方之间划出一块狭小的中立地带。可是在签订这个休战协定(“光荣的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次胜利)时,胜利的普鲁士人要后退 20 哩,从科尔丁 撤到劳恩堡;而被打败

丹麦称作 康格-奥。——编者注
即柯林加。——编者注

的丹麦人却保持着科尔丁的阵地,而仅仅放弃阿尔森。不仅如此,一旦休战协定被废除,丹麦人就会重新回到他们在6月24日所占领的阵地,就是说,他们会一弹不发地占领北什列斯维希6—7哩的地带,即他们曾两次被驱逐出来的地带;而德国人却只能推进到阿彭拉特和它的郊区为止。“德国军队的荣誉”就是这样“被保卫”的,而连遭德国部队4次占领以后濒于民穷财尽的北什列斯维希还不得不遭受第5次和第6次的侵略!

不仅如此。什列斯维希的部分地区甚至在休战的时候还将由丹麦部队来占领。按照休战协定第8条规定,什列斯维希将由在公国中招募的人员所组成的团队来占领,这个团队的人员部分由参加运动的什列斯维希士兵组成,部分由在丹麦担任警备勤务、和丹麦军队一起反对临时政府、受丹麦军官指挥并在各方面都表现为丹麦部队的那种团队组成。丹麦报纸对情况的估计如下。

7月13日“祖国报”写道:“毫无疑问,只要可靠的什列斯维希部队来到公国,就会大大提高人民的情绪,因为人民历尽了战争的灾难,他们现在对制造这种灾难的罪魁祸首深恶痛绝。”

而且还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动!丹麦人把它叫做暴动,普鲁士人象对付暴动一样来对付这个运动。得到普鲁士和德意志联邦承认的临时政府遭到了无情的摧残。自从什列斯维希独立以来颁布的一切法律和决定都一概无效;相反地,已被废除的丹麦法律却重新生效。简单地讲,关于对著名的维登布鲁赫照会的答复,即被奥尔斯瓦特所拒绝的答复就表现在这个休战协定草案的第7条上。运动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都遭到无情地破坏,革命中涌现出

来的政府也由 3 个正统的当权者所任命的正统政府所代替。霍尔施坦和什列斯维希的部队又重新受丹麦人的指挥和丹麦人的惩罚；尽管临时政府最近发布了命令，霍尔施坦和什列斯维希的船只仍然是“Dansk-Eiendom”〔“丹麦的财产”〕。

最后，前面所说的那个新政府圆满地结束了这一切活动。请听“祖国报”是怎样说的：

“如果我们在从中选择新政府的丹麦成员的有限的人中间，也许不能发现现象普鲁士在选择自己的成员时将会取得的那种毅力和才能、智慧和经验的结合（那也万无一失）。政府人员无疑必须从公国的人民中挑选出来，但是谁也没有禁止我们用其他地区出生的和定居的居民中选出的秘书和助理来包围他们。在挑选这些秘书和顾问的时候，用不着考虑地区的条件，而只要注意他们的能力和才干就行了；很可能这些人对政府活动的全部精神和方针的影响很大。可以指望，甚至位居高职的丹麦官员都不惜降低级别猎取这种职位。在当前的情况下，每个善良的丹麦人都把担任这个职位看成是光荣。”

因此，内阁的报纸向各公国预言，充斥公国境内的将不仅有丹麦的部队，而且还有丹麦的官员。半丹麦政府将把位于公认为德意志联邦领土上的伦特斯堡作为自己的官邸。

这就是休战协定带给什列斯维希的好处。德国将得到的好处也不少。对于把什列斯维希列入德意志联邦的这件事却只字未提；相反地，联邦议会的决定由于新政府的组成方式而完全遭到否定。霍尔施坦的代表由德意志联邦挑选，什列斯维希的代表由丹麦国王挑选。什列斯维希因此受丹麦的统治，而不受德国的统治。

如果德国能达到取消海峡税¹⁵¹，即旧时封建掠夺的残余，那它可能真的会把这次丹麦战争看作自己的功劳。遭受封锁和船只被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掠夺等损害的德国海滨城市还可能会甘心情愿长期忍受这种压迫，如果这种压迫能使海峡关税取消的话。政府大声疾呼地到处声明，无论如何要取消关税。从这种吹嘘中可以得出什么结果呢？英国和俄国想保留海峡关税，而一味顺从的德国当然是唯命是听的。

不言而喻，交还船只将以赔偿在日德兰征集的全部东西为条件，其根据是德国相当富裕，能够为自己的荣誉付出代价。

这就是汉泽曼内阁在这个休战条约草案中答应给人民的好处！这就是和 50 万人口的小国人民打了 3 个月仗的胜利果实！这就是我们那些民族主义的报刊、我们那些气势汹汹地主张消灭丹麦人的刽子手大吹大擂的结果！

据说，休战协定是不会签订的。得到贝泽勒尔支持的弗兰格尔将军断然拒绝在休战协定上签字，虽然普尔塔勒斯伯爵把奥尔斯瓦特的有关命令转交给他并一再请他签字，虽然屡次提醒他不要忘记普鲁士将军的义务。弗兰格尔声明说，他首先服从德国的中央政权，但是如果军队不能保住现在的阵地，如果临时政府在签订和约以前不能保住政权的话，那末中央政权就不会同意签订休战协定。

因此，普鲁士的草案可能不会得到实现。但是不管怎样，这个草案作为普鲁士在领导德国时怎样保卫它的荣誉和利益的证据来说，是耐人寻味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7 月 2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22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52 号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

科伦 7 月 22 日。事变、法案、休战计划等等终于使我们又回到我们所喜爱的妥协辩论上来。上台发言的是幽里希的议员冯·贝尔格先生,这是一个使我们倍感兴趣的人:第一,他是莱茵省的居民,第二,他不久前才成为内阁的拥护者。

贝尔格先生提出各种理由来反对雅科比的提案。他的第一个理由是:

“提案的第一部分要求我们反对德国议会的一个决议,这无异是以少数反对合法的多数。其次,这无异是在立法机关中遭到了失败的一部分人想在外寻找支持,其后果必然会导致内战。”

在 1840—1845 年提议废除谷物法的科布顿先生在下院是处于少数的地位。他是“在立法机关中遭到了失败的”人。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呢?他企图“在外寻找支持”。他不仅反对议会的决议,而且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他创立了反谷物法同盟,创办了反对谷物法的报刊,——总之,他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谷物法的宣传活动。在贝尔格先生看来,这就是“必然会导致内战”的企图。

不朽的联合议会的少数派议员也曾试图“在外寻找支持”。康普豪森先生、汉泽曼先生和米尔德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现过丝毫的动摇,可作为证据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显然,在贝尔格先生看来,他们的行动的后果也“必然会导致内战”。但他们并没

有导致内战,而取得了大臣的职位。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能举出几百个来。

总之,如果立法机关的少数派不想引起内战,就不应该到外面去寻找支持。但是“在外面”究竟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指选民,即创立立法机关的人们。但是,既然不能用影响这些选民的方法来寻找“支持”,那末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支持呢?

难道汉泽曼先生、赖辛施佩格先生、冯·贝尔格先生等人的演讲只是给议会听的吗?或者也给那些从速记记录来读这些演讲的公众听呢?这些演讲不也就是这些“立法机关内的人企图”或希望“在外面寻找支持”的手段吗?

一句话:贝尔格先生的原则会取消一切政治宣传鼓动。宣传鼓动无非就是把人民代表不受侵犯、出版自由和结社权,亦即以法律为基础的普鲁士现有的各种自由加以运用。这些自由是否会导致内战,和我们毫无关系;只要它们存在就够了,此外我们还要看一看,如果今后这些自由遭到侵犯,将会“导致”什么结果。

“诸位先生,少数派想在立法机关外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的这些企图不是最近几天才产生的,它们从德国人民站起来的那天起就产生了。在预备国会里少数派为了表示抗议曾离开了会场,结果就产生了内战。”

第一,在雅科比的提案中“少数派为了表示抗议而离开会场”一事只字未提。

第二,“少数派想在立法机关外扩大自己影响的企图”,当然“不是最近几天产生的”,它们是从有立法机关和少数派那天起就产生了。

第三,内战不是预备国会中的少数派为了表示抗议而离开会场所导致的,而是米特迈尔先生的“道义上的信念”,即认为黑克尔

和菲克勒尔等是卖国贼,以及巴登政府为此所采取的最可耻的恐吓措施所导致的¹⁵²。

在关于内战的论证(当然它能使德国市民感到极其恐惧)之后的另一个论证,是关于没有权力的论证。

“我们的选民选举我们来制定普鲁士的宪法,这些选民派了自己的另一些同胞到法兰克福去建立中央政权。不能否认,把全权委托给他人的选民也有权赞成或不赞成他的全权代表的行动,但是选民没有委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代替他们投票。”

这个有分量的论证使议会中的法学家和法学的涉猎者赞不绝口。我们不是受全权委托的!但是,这位贝尔格先生两分钟后就又声称,法兰克福议会的“召开是为了同德国各邦政府协商制定德国未来的宪法”;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政府不先和妥协议会或根据新宪法选举出来的议会讨论一下,难道就会批准吗?可是,内阁却立即把它承认帝国摄政王和它的保留条件通知了议会,并建议议会发表意见!

可见正是贝尔格先生的观点、他的演讲和奥尔斯瓦特先生的发言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议会无疑完全有权来研究法兰克福的决议!

我们不是受全权委托的!这就是说,如果法兰克福议会又要实行书报检查,并且在议会与国王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派遣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军队到普鲁士去援助国王,那时贝尔格先生就没有“权力”了!

贝尔格先生的权力到底是什么呢?照字面上说,不过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因而他无权提出质问,无权协商制定关于代表不受侵犯的法律、关于市民自卫团的法律、关于赎买以及其它在宪

法上没有明文规定的法律。反动派每天强调的也正是这点。他自己说：“超出这些权力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不公正的，都是对自己权力的破坏甚至是叛变行为！”

可是贝尔格先生和整个议会仍然无时无刻不得不破坏自己的权力。由于暂时的革命的(或者现在更确切地说是反动的)情况，他们不能不破坏它们。由于这种暂时的情况，议会的权限扩大到一切能巩固三月革命成果的措施上，而如果这个目的通过对法兰克福议会施以道德影响就能达到的话，那末妥协议会不仅有权，而且应该施以这样的影响。

随后是莱茵—普鲁士的论证，这个论证对我们莱茵省居民来说是重要的，这特别是因为它表明了我们的利益在柏林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我们这些莱茵省、威斯特伐里亚以及其它各省的居民，除了归附于普鲁士王国外，和普鲁士就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我们破坏了这种关系，国家就会分裂。我和我省的大多数代表可能一样，完全不懂为什么我们需要柏林共和国。如果这样我们倒宁可希望有一个科伦共和国。”

这里我们不来分析这些无聊的推测：如果普鲁士变成“柏林共和国”，我们“能希望得到”什么。同样也不来分析关于普鲁士邦存在条件的新理论等等。我们作为莱茵省的居民只是抗议所谓“我们归附于普鲁士王国”。相反地，“普鲁士王国”依属于我们。

接着起来反对雅科比提案的是爱北斐特的西蒙斯先生。他把贝尔格先生所说的重述了一遍。

在他讲完后走上讲台的是左派发言人，然后是察哈里埃先生。他又把西蒙斯先生所说的重述了一遍。

敦克尔议员又重述了察哈里埃先生的发言。但是他也谈了一

些别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十分明确地重述了别人已经说过的话,所以值得简短地来谈一下他的发言。

“如果我们,1 600 万德国人的制宪议会,这样责难代表全体德国人的制宪议会,那末,我们这样是否能在人民意识中巩固德国中央政权的威信、德国议会的威信呢?我们这样不会破坏个别民族为了使制宪议会的行动有利于德国的统一而对它表示应有的心甘情愿的顺从吗?”

按照敦克尔先生的意见,中央政权和国民议会的威信——“心甘情愿的顺从”——在于人民盲目服从这个政权,但个别的政府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条件,而且一有机会就完全不服从它。

“现在,事实的力量是如此巨大,某种理论上的声明还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1 600 万德国人”的代表承认法兰克福议会的自主权只是“理论上的声明”!?

“如果将来普鲁士政府和人民代表认为在法兰克福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行不通的,不能实现的,那末,这种决议还有执行的可能吗?”

因此,光是普鲁士政府和普鲁士人民代表的意见、见解就能使国民议会的决议行不通。

“如果全体普鲁士人民,如果德国有 $\frac{2}{5}$ 不愿意服从法兰克福的决议,那末不管今天我们怎样说,它们还是无法执行的。”

这就是古老的普鲁士的高傲,这就是闪耀着昔日极盛的光辉、带着老弗里茨的发辫和拐杖的柏林民族爱国主义!我们固然是少数,我们只占 $\frac{2}{5}$ (甚至更少),但我们已经向多数表明,我们是德国的主人,我们是普鲁士人!

我们劝告右派议员先生们不要在“ $\frac{2}{5}$ ”和“ $\frac{3}{5}$ ”之间挑起这种

冲突。数量上的对比毕竟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些省或许还会记得,它们从古以来就是德国的,而只是在30年前才变成了普鲁士的。

可是敦克尔先生能找到出路。法兰克福的议员和我们一样应该“只通过表达合理的共同意志和真正的社会舆论、并为国家的道德意识所容许的决议”,即合乎敦克尔议员心意的决议。

“如果我们和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一样通过这些决议,那我们就会自主,他们也会自主,否则,即使我们把这决议颁布10次,也是办不到的。”

敦克尔先生在谈了这个含意深刻的、符合他的道德意识的自主权的定义后,叹了一口气说:“但这是将来的事。”他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篇幅和时间都不允许我们再来谈左派在那一天的发言。但是,根据我们所援引的右派的发言,看来读者可以确信帕里鸠斯先生提出延期举行会议的建议还不至于不对,他的理由是,“天气这么炎热,在会场里要保持完全清醒的头脑是不可能的”!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22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7月23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53号

都灵的“协和报”¹⁵³

科伦 7 月 23 日。不久以前我们曾经提到，在佛罗伦萨出版的“黎明报”越过阿尔卑斯山向我们伸出友谊的手。可以预料，另外一家报纸，即具有相反倾向的都灵“协和报”也会发表相反而并不含敌意的意见。有一号旧“协和报”曾经说过，“新莱茵报”每次都站在“失败者”那一边。“协和报”根据我们对布拉格事件的评价以及我们对反对反动的文迪施格雷茨之流的民主派所采取的同情态度，做出了这个含糊不清的结论。不过，从那时起，都灵的这家报纸对于所谓捷克运动的性质也许有了较好的了解。

可是，不久以前，“协和报”却针对“Nuova Gazzetta Renana”（“新莱茵报”）写了一篇多少带学究气的文章。“协和报”读了我们报上登载的关于在柏林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¹⁵⁴的纲领，对于其中应由工人讨论的 8 条大为不安。

“协和报”如实地转载了全部纲领，并发表了如下的批评意见：

“在这些建议中有许多正确和公正的地方，但是‘协和报’如果不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的错误，就可能背叛自己的使命。”

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坚决反对“协和报”的“错误”，这种错误就是：“协和报”把工人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所起草而仅由我们转载

的纲领当做我们自己的纲领。虽然如此,只要“协和报”纲领比那一大堆人所共知的博爱词句和关于自由贸易的流行教条更充实的话,我们准备同“协和报”就政治经济问题进行辩论。

写于 1848 年 7 月 2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25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55 号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完)

科伦 7 月 24 日。几天前,世界事件的洪流使我们中断了关于这些辩论的报道,我们毗邻的一位评论家殷勤地代我们做了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他已经把大家的视线转移到“这两天大辩论中多数派的讲演者(特别是我们的无与伦比的鲍姆施塔克)所提出的许多卓越的和精辟的见解上,以及他们对真正自由的正确的、合理的理解上”¹⁵⁵。

我们应该尽快地结束我们的报道,但我们也不能放弃机会从右派所发表的“许多”卓越的和精辟的见解中挑几个例子看看,以资消遣。

辩论的第二天首先发言的是阿贝格议员,他用威胁的口气向议会声明说:要阐明与这个提案有关的一切问题,就势必要完全重复法兰克福的全部讨论,而崇高的议会显然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你们的选民先生们“根据他们所固有的机智和常识”也永远不会赞成这样做!此外,如果(这里表现了异常“卓越的思想”)“问题不只是一些保留条件”,而是“肯定地赞同或不赞同法兰克福的决议”,那末,德国的统一将会变成什么呢?所以只好满足于“纯粹形式上的服从”!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当然,可以把“纯粹形式上的服从”限定为“保留条件”,而在万不得已时甚至可以公开破坏,德国的统一不会因此而遭到损失;但是从文体的、逻辑的或实际的观点来赞同或不赞同这些决议,来评价这些决议,却真是史无前例的!

阿贝格先生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指出,对那些提交柏林议会而不是提交法兰克福议会审查的保留条件,应该发表意见的是法兰克福议会,而不是柏林议会。不许预料法兰克福议员的见解,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侮辱!

柏林的先生们没有资格去判断他们自己的大臣向他们所作的声明。

我们不打算再谈小人物的偶象,不再谈巴尔策、肯普夫和格莱夫这些人了,我们要尽快地来谈谈当日的英雄,即无与伦比的鲍姆施塔克。

鲍姆施塔克议员声明:在他没有被迫承认自己对某件事情一窍不通以前,他永远不会同意宣布自己没有资格过问这件事情,——但是难道8个星期辩论的结果会是一窍不通吗?

所以,鲍姆施塔克议员是有资格的。也就是说:

“我要问:我们以前所表现的智慧是不是赋予我们全权(即资格)去反对国民议会,这个议会以

它的高尚的思想,

崇高的理智,

合乎道德的国家观点”,总之,

“以一切使德国在历史上备受称颂的东西,

唤起了德国普遍的兴趣,

引起了全欧洲的赞美。我对所有这些都推崇备至(即宣布自己是没有资格的) ,并希望议会出于真理感(!!)也对这些推崇备至”(即宣布自己是没有资格的)!

“有资格的”鲍姆施塔克议员继续说:“诸位先生,昨天的会议上有人说关于共和国等的谈话带有非哲学的性质。但是:认为民主意义上的共和国的特征就是国家元首的个人责任制,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非哲学的。诸位先生,无疑地,所有的国家法的哲学家,从柏拉图直到达尔曼(鲍姆施塔克议员的确不能再“往下”了)说的正是这个观点,如果我们没有尚待提出的完全特殊的理由,我们就不能同这个千年以上的真理(!),同历史事实发生矛盾。”

这就是说,鲍姆施塔克先生认为这种甚至要同“历史事实”发生矛盾的“完全特殊的理由”还是可以找到的。不过,右派议员先生们在这方面通常是不拘礼节的。

其次,鲍姆施塔克先生又宣布自己是没有资格的,他把资格推到“所有的国家法的哲学家,从柏拉图直到达尔曼”的身上,而鲍姆施塔克先生当然是不属于这类哲学家的。

“诸位只要想一下这个国家大厦!一个议会和一个负责的帝国摄政王,这是以现行的选举法为基础的!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大家都会同意,这是违反常识的。”

在这里,鲍姆施塔克先生说了一段深思熟虑的甚至经过最缜密的研究也不会违反“常识”的话。

“诸位先生,共和国需要两个东西,即人民的意见和领导人。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看看我们德国人民的意见,我们未必能在其中找到这种共和国(即上述的帝国摄政王的共和国)的迹象!”

因而,鲍姆施塔克先生又宣布自己是没有资格的,可是,这一次有资格过问共和国问题的不是他,而是人民的意见。因此,在这

个问题上人民的意见要比鲍姆施塔克议员“理解得”透彻。

但是最后讲演人证明,也有一些问题,他多少能“理解”,这首先就是关于人民主权的问题。

“诸位先生!历史给我们证明了——这点我也要谈谈——,在我们这里人民主权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是它在变化中,它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

接着就是一系列的关于勃兰登堡—普鲁士历史和人民主权的“异常卓越的思想 and 极其精辟的见解”,这些思想和见解使毗邻的评论家由于过分地感到立宪的幸福和学究式的狂喜而忘记了世上所有的苦难。

“当伟大的选帝侯不理睬那些腐朽的染上了法国荒淫毒素(可是初夜权正是被“法国荒淫的”文明所逐渐埋葬的!)的等级分子时,当他甚至(!)消灭了他们时(“消灭”无疑是抛弃某种东西的最好方法),具有深厚的道德感的全国人民都热烈地欢迎他,这样,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国家大厦就巩固起来了。”

令人赞叹的是17世纪勃兰登堡市侩们的这种“深厚的道德感”,他们预先就深知事关自己的利益,因而热烈地欢迎选帝侯,当时选帝侯正向他们的敌人——封建主进攻,但是却把特权出卖给他们。更令人赞叹的是鲍姆施塔克先生的“健全的理智”和“精辟的见解”,他认为“人民主权”就表现在这种热烈之中!

“当时,没有一个人不表示自己忠于这个君主专制制度(因为,否则他就会遭到鞭笞),而伟大的弗里德里希如果不依靠真正的人民主权,他就永远不会有这样重要的地位。”

鲍姆施塔克先生所谓的真正的人民主权,就是鞭笞、农奴制和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劳役的人民主权。这是坦白的承认！

鲍姆施塔克先生现在从真正的人民主权转而谈到假的人民主权。

“但是,另外一个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到来了。”

他用了一长篇“立宪的演说”证明这点,这篇演说简单地归结起来就是,从1811年到1847年普鲁士人民一直要求的是宪法,而决不是共和国(!);接着又从容地指出,“人民甚至也愤怒地离弃了”德国南部的最近一次共和派起义。

由此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第二类的人民主权(自然,不能再称它是“真正的”)就是“立宪的”人民主权。

“这类人民主权主张国王和人民分享国家权力,这是被瓜分了的人民主权(让“从柏拉图直到达尔曼的国家法哲学家们”给我们解释这是什么);它应该完全地、无条件地(!!)属于人民,但是也要无损于国王的合法权力(3月19日以后,这种权力在普鲁士是由什么法律确定的呢?)。这里是非常清楚的(特别是在鲍姆施塔克议员的头脑中);这个概念是由立宪制度的历史确定下来的,因此谁也不会对此再发生怀疑。”(遗憾得很,一读鲍姆施塔克议员的演讲,又开始产生了“怀疑”。)

最后,“还有第三类的人民主权,即民主共和的人民主权,它应该建立在所谓最广泛的基础上。最广泛的基础,这是多么倒霉的说法!”

鲍姆施塔克先生也“发言”反对这个最广泛的基础。这个基础会使国家崩溃,会导致野蛮状态。我们这里没有能赋予共和国以道德基础的卡托分子。于是鲍姆施塔克先生开始用孟德斯鸠的古老的、破旧不堪的、布满裂痕的号角大吹共和国的美德,使得毗邻的评论家惊喜若狂而随声附和,使整个欧洲感到惊奇的是,他卓越地

证明“共和国的美德也恰好导致……宪政”但是,鲍姆施塔克先生马上就改变了音调,说明没有共和国的美德也会导致宪政。在这次二重唱中,两个声调经过一系列极伤心的不谐和之后,终于在宪政这样一个调和的和弦上融合起来了;这次二重唱的辉煌效果读者自己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经过十分冗长的议论以后,鲍姆施塔克先生终于得出结论说,在实质上各部大臣并没有提出“任何实在的保留条件”,而只是拟定了“关于未来的无关紧要的保留条件”,最后鲍姆施塔克自己也谈到最广泛的基础,他声明说,挽救德国的唯一方法就是采取民主立宪制度。这时“关于未来德国的思想占据了他”,以致他高呼“人民立宪的世袭的德国王权万岁,万万岁!”

的确,他有权说:这个倒霉的最广泛的基础!

随后,双方都还有些讲演者发言,但在鲍姆施塔克议员以后,我们已经决定不再向我们的读者报道他们的讲演了。不过还要指出一点:瓦克斯穆特议员声明,他的信念是基于高贵的施泰因的论点:自由人们的意志是每个王位的不可动摇的支柱。

我们毗邻的评论家简直乐不可支,大声叫道:“这就是问题的真正实质!自由人们的意志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不可动摇的王位的庇护下这样安逸,而王位也只有建立在自由人们的有理智的热爱上才会如此巩固!”

的确,在这次辩论中,大多数讲演者发挥了“许多卓越的思想 and 精辞的见解”以及“对真正自由的合理的理解”,但这些仍然不能同毗邻的评论家的深刻而又丰富的思想相提并论!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7 月 2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25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55 号

强制公债法案及其说明

—

科伦 7 月 25 日。有一次，伦敦幸福的圣詹尔士区的一个著名的骗子手到陪审法庭受审。他被控告的原因是：他把全城闻名的守财奴的钱箱减轻了 2 000 镑。

被告开始说：“陪审员先生们，我不想占很长时间来唠唠不休地使你们不耐烦，因此，我不准备多说。我的辩护是带有政治经济性质的。我从克里普斯先生那里拿了 2 000 镑。这的确是事实。可是我拿私人的钱是为了把它们交给社会。这 2 000 镑到哪儿去了呢？我难道自私自利地把这些钱保存起来吗？请你们搜查我的钱袋。如果能找到一个辨士，我就把我的灵魂以一个法新卖给你们。这 2 000 镑你们可以在裁缝那里、在小铺老板那里、在饭馆等等地方找到。那末我究竟干了什么事情呢？守财奴把金钱埋在坟墓里；只有强制公债‘才能把‘这些无益地埋在坟墓里的钱’挖出来，而我使这些钱‘流通起来’了。我帮助了流通，而流通是创造国民财富的首要条件。先生们，你们是英国人！你们是经济学家！你们不要给民族的恩人判罪！”

圣詹尔士区的经济学家现在在凡迪门地方，他有可能深思一下自己同胞的那种盲目的忘恩负义行为。

但是他并没有虚度年华。他的原则成了汉泽曼的强制公债的

基础。

汉泽曼在说明这一措施的理由时说：“发行强制公债是以下面一个无可争辩的理由为依据的：大部分现金或多或少地、无益地存在私人手中，只有用发行强制公债的办法才能使它们流通起来。”

你们消耗资本就会使资本流通起来。如果你们不使它流通起来，国家就要消耗它，以便使它流通起来。

譬如一个纺织工厂厂主雇用了 100 个工人。假定他每天付给每个工人 9 个银格罗申，那末，每天就有 900 个银格罗申或 30 个塔勒从厂主的口袋里转移到工人的口袋里去，又从工人的口袋里转移到小铺老板、房东、皮鞋匠、裁缝等等的口袋里去。30 个塔勒的这种旅行就叫做塔勒的流通。厂主从他只有亏本才能卖出他的棉织品或根本卖不出去的时候起才停止生产和停止雇用工人，而随着生产的停止，30 个塔勒的旅行也就停止了，流通也就停止了。我们要强制恢复流通呵！——汉泽曼感叹地说。厂主为什么把钱无益地摆在他那里呢？他为什么不使它流通起来呢？在天气好的时候，许多人在街上散步。汉泽曼为了制造好天气，就把人们赶到街上去，强迫他们散步。好一个制造天气的能手！

内阁危机和商业危机使资产阶级社会的资本无利可图了。国家为了帮助这个社会摆脱困境，也就要剥夺资本本身。

18 世纪著名的交易所投机商人犹太人品托在他的“关于流通”¹⁵⁶一书中推荐有价证券的交易。有价证券的交易虽然不创造任何东西，但它能促进流通，促进财富从一个钱袋向另一个钱袋转移。汉泽曼把国库变成旋转国民的财富的旋盘赌的赌盘。汉泽曼

旋盘赌是一种赌博，以一种旋转的圆盘置于桌中央，盘中刻有带号码的球槽，盘中放有一球，旋转圆盘，然后看球落入哪个槽来决定输赢。——译者注

—品托！

但是汉泽曼在说明“强制公债法”的“理由”时碰到了严重的困难。为什么自愿公债没有带来所需要的金额呢？

大家知道，现在的政府享有“绝对的信任”。大家知道，大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非常热烈的，它只是抱怨某些煽动叛乱的人竟然不赞同它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信任。大家知道，各省都递了表示忠诚的保证书。然而“不管这一切的一切”¹⁵⁷，汉泽曼不得不把富有诗意的自愿公债变成平淡无味的强制公债！

例如，在杜塞尔多夫区，贵族认购了4 000塔勒，军官认购了900塔勒。除了杜塞尔多夫区的贵族和军官外，究竟在哪里能找到更大的信任呢？皇室各大公认购的情形根本不值一提。

我们让汉泽曼本人给我们解释这种现象。

“到目前为止，自愿认购的数目并不多。也许，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由于不够信任我们的制度。不如说是不了解国家的真正需要，同时，在没有弄清楚是否真正要吸收居民的货币资金和吸收多少以前，每个人都认为可以观望一下。根据这种情况可以希望，只要向人家解释清楚义务认购公债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人都会量力自愿认购。”

境遇极其悲惨的国家向爱国主义呼吁。它恳求爱国主义献给祖国1 500万塔勒，而且甚至不必赠送，仅仅自愿认购公债就行了。对国家的信任是不可动摇的，可是所有的人对国家求援的呼声却充耳不闻。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不了解”“国家的真正需要”，他们都怀着无比惋惜的心情暂时不准备给国家任何东西。不错，人们非常信任国家政权，可是可敬的国家政权却断言：国家需要1 500万塔勒。人们正是由于信任的缘故才不相信国家政权的声明，人们把它求助1 500万塔勒的号叫仅仅看做是一般的玩笑。

可敬的宾夕法尼亚人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从来也不借给自己的朋友一块钱。他对他们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那样信任,他对他们的殷实可靠的事业那样相信,以致他直到临死都不“了解”他们“真正需要”钱。他把他们的迫切要求仅仅看做是考验他的信任的一种意图,而他的信任是不可动摇的。

普鲁士国家政权发现整个国家内居住的全都是这种宾夕法尼亚人。

但是,汉泽曼先生还用另一种特殊的“情况”来说明这种奇怪的政治经济现象。

人民不自愿出钱,“因为他们认为可以观望一下,看是否真正要吸收他们的货币资金和吸收多少”。换句话说,谁也没有自愿出钱,因为每个人都在观望,什么时候将迫使他们出钱和出多少。小心谨慎的爱国主义呵!高度复杂的信任呵!在惬意的、热情的自愿公债后面现在隐藏着的是阴暗的、忧郁的强制公债,汉泽曼先生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希望所有的人都量力自愿认购公债的”。现在至少连最顽固不化的怀疑者也不会不了解,而且会深信:国家政权实在迫切需要钱,但是全部事情,象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就糟在这种令人痛心的不了解情况上。如果你们不把钱交出来,就要从你们那里索取,而这不论对你们或对我们来说,都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希望:你们的信任将不再是那样过分,不再是娓娓动听的漂亮话,而成为叮当发响的塔勒。Est-ce clair?〔明白吗?〕

不管汉泽曼先生对这种“情况”抱着怎样的“希望”,可是他的宾夕法尼亚人的多疑癖也已传染了他,他觉得不得不采用更加强烈的刺激剂来促进信任。信任诚然存在,但无论如何不愿表现出来。必须用刺激剂来使它摆脱这种隐蔽状态。

“可是,为了更有力地刺激人们来自愿认购公债(比强制公债的前途有力),在第一条中规定按 $3\frac{1}{3}\%$ 的利率付给利息,并确定一个日期(10月1日),在这个日期以前还可以认购利率为 5% 的自愿公债。”

这样,汉泽曼先生就给认购自愿公债的人规定了 $1\frac{2}{3}\%$ 的奖金。现在,爱国主义一定会变成现金,钱箱子马上就可以打开,信任的金流将源源流入国库。

当然,汉泽曼先生认为富人认购的公债的利率比穷人的高 $1\frac{2}{3}\%$ 是“公平的”,因为从后者手中只能用强力才能夺取最必要的东西。此外,穷人还应当负担诉讼费用,作为对他那种不太令人满意的财产状况的惩罚。

这样,圣经上的一个箴言正在实现。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云。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5 章第 29 节。——译者注

二

科伦 7 月 29 日。正如皮尔曾经给谷物税发明了“调节制”¹⁵⁸一样,汉泽曼-品托也给非自愿的爱国主义发明了“调节制”。

我们的汉泽曼在他的对法案的说明中写道:“义务认购公债的百分比按累进制计算,因为很明显,和财产增加的比例相比较,拥有金钱的可能性是按照算术级数的比例增长的。”

财产增加了,拥有金钱的可能性也随着增长。换言之:手里拥有的金钱越多,就越能拥有更多的金钱。这一切暂且都是正确的。但是,甚至当财产按照几何级数的比例增加时,拥有金钱的可能性收只是按算术级数的比例增长的。这是汉泽曼的发明。这个发明超过了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按算术级数增加的原理,它将使汉泽曼在后代中间享有更大的荣誉。

这样说来,如果财产增加的比例是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那末,按照汉泽曼先生的发明,拥有金钱的可能性的增长则是 1, 2, 3, 4, 5, 6, 7, 8, 9, 10。

尽管义务认购公债的数目表面上在增加,可是在我们的经济学家看来,拥有金钱的可能性却随着财产的增加而下降。

塞万提斯在一个短篇小说¹⁵⁹中描写过一个被关在疯人院中的非常伟大的西班牙财政学家。这个财政学家发明:如果

“国会通过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陛下所有 14 岁至 60 岁的臣民,在

一个月中间必须有一天只吃面包和水(究竟在哪一天由他们自己选择),把这一天需要买水果、蔬菜、肉、鱼、酒、鸡蛋和豆子的钱省下来分文不留地交给陛下,破坏誓言应受到惩罚”。

那末西班牙的国债就会偿清。

汉泽曼简化了手续。他建议他的凡是年收入为 400 塔勒的西班牙人在一年中能够有一天放弃 20 个塔勒。他建议财产少的人应照调节制在 40 天内几乎放弃一切需要。如果他们在八九月间找不到 20 个塔勒,在 10 月里司法执行官就要去找他们。因为俗话说:只要找就可以找到。

我们来继续探讨我们普鲁士的奈克尔的“说明”。

他开导我们说:“营业的从最广义上讲的一切收入,即不管这种收入是否应课营业税,同医师和律师的收入一样,在计算的时候只能扣除生产费用(包括债务的利息在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定纯收入。根据这种理由,如果按照收入计算出来的公债额高于按照流动资本计算出来的公债额,那就不必去注意营业流动资本。”

Nous marchons de surprise en surprise [意外的礼物给我们一件一件地送来]。确定收入时只能扣除流动资本,因为强制公债无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所得税。可是,企业的费用和企业主的收入的关系,就同树木的干与根和树木的果实的关系一样。因此,根据上述应当课税的是收入而不是流动资本这一理由,如果对国库更有利,那末应当课税的正是流动资本而不是收入。由此可见,“用什么办法计算纯收入”在汉泽曼先生看来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他所感到兴趣的只是,“用什么办法计算”可以使国库“获得最多的收入”。

图谋侵犯流动资本的汉泽曼先生,象野蛮人一样,是砍树取

果。

“因此,如果(根据法案第9条)按照营业流动资本计算出去的公债数额高于按照收入的10倍计算出来的数额,那末就按照前一种方式计算”,那时就应当“注意营业流动资本”本身。

由此可见,每当国库认为合乎自己利益的时候,它可以把财产作为自己要求的基础,而不把收入作为自己要求的基础。

人民要求调查秘密的普鲁士国库。办事内阁这样回答这个不知分寸的要求:它有权深入地审查所有帐簿和编制关于全体公民财产状况的清单。普鲁士的宪政时期不是由人民检查国家的财产状况开始,相反地,而是由国家检查公民的财产状况开始。这样,就给官僚制度无耻干涉公民交往和私人关系大开方便之门。在比利时,国家也发行强制公债,但它仅仅满足于税收册和抵押登记簿,满足于现有的官方文件。而办事内阁却把普鲁士军队的斯巴达精神运用到普鲁士的政治经济学中去。

诚然,汉泽曼在自己的“说明”中企图用种种甜言蜜语和友好诺言来安慰公民。

他低声对他们说:“摊派公债是以自报为基础的”。“凡能引起敌意”的一切,都是不容许的。

“甚至不需要关于财产各个组成部分的一般资料。”“为检查自报情况而成立的区委员会应当用善意的说服办法号召大家自愿认购公债,只有在这种办法无效时,才由区委员会确定认购的数目。对区委员会的决定有意见时可以向省委员会提出申诉等等。”

自报!甚至不需要任何关于财产各个组成部分的一般资料!善

意的说服！申诉！

难道这些你还嫌少吗？⁶⁰

让我们立刻从未尾即从申诉开始谈起。

第 16 条规定：

“征收在规定的日期内进行，而不管所提出的申诉，如果将来申诉被认为是合理的，可以退还所缴纳的款额。”

总之，首先是强制征收，而不管申诉，然后是承认申诉的理由，而不管强制征收！

不仅如此！

“在申诉被全部或部分地驳回的情况下”，申诉的“费用应由申诉者负担。在必要时，这些费用应按行政方式征收”（第 19 条）。凡是知道在经济上不可能精确估计财产的人，立刻就会明白申诉总可以被部分地驳回，这样一来，损失总要有申诉者负担。因此，不管是怎样的申诉，金钱损失始终是和它形影不离的。多么值得欢迎的申诉权呵！

让我们再从末尾回到开头，即从申诉回到自报吧！

看来，汉泽曼是不害怕他的斯巴达人虚报产额的。

根据第 13 条的规定，“义务认购公债者的自报是摊派公债的基础”。汉泽曼的法案的结构是这样的：从房屋的基础不可能判断出它以后的轮廓。

或者，更确切些说，“自报”（它将以“报税单”的形式交给由“财政大臣”先生“或根据他的委托而由区行政机关任命的特殊官吏”）这个基础现在得到了更深刻的论证。根据第 14 条的规定，“为了审查自报说明书，需要召集一个或几个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及其他

委员均由财政大臣或由他授权的当局任命,其人数不得少于 5 人”。因此,财政大臣或由他授权的当局的任命就构成了审查的真正基础。

如果自报同这种由财政大臣任命的区委员会或市委员会的“意见”有分歧,就把“自报者”请来,让他说明理由(第 15 条)。不管他是否提出这种说明,反正都一样,因为一切都要看自报是否使由财政大臣任命的委员会“感到满意”来决定。如果自报不能令人满意,“委员会就根据自己的公议来确定认购的数目,并把这一点通知义务认购者”。

首先由义务认购者自报,并把这一点通知官吏。现在由官吏进行公议,并把这一点通知义务认购者。“自报”的结果怎样呢?这个基础结果被彻底破坏了。自报只不过是义务认购者进行切实的“审查”提供了理由。别人的公议则直接造成了强制征收。第 16 条中规定:

“区(或市)委员会的决定应交给区行政机关。区行政机关根据这些决定立即编制公债数额一览表,并把它们交给相应的征收处,按照现行税务条例进行征收,必要时可以采用强制手段。”

我们已经看到,申诉的道路并不是经常“蔷薇遍布”,而且也荆棘丛生的。

第一,检查申诉的区委员会是由根据 1848 年 4 月 8 日的法律选出来的复选人所选出的代表组成的。

但是,在强制公债面前,全国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倔强者的阵营和忠顺者的阵营,在区委员会中,对后者已经缴纳的和答应缴纳的款项不会提出任何异议。所以,代表只能从忠顺者的阵营中间选举(第 17 条)。

第二,主席由财政大臣任命的委员担任,并且派一个官员担任秘书,暂时归他领导(第18条)。

第三,区委员会有权对财产或收入进行特殊的公议,同时为了这个目的,还可以要求交出估价单,或者可以审查账簿。如果这种审查还嫌不够,可以拷问申诉者的口供,叫他宣誓。

由此可见,如果有人不是无条件地同意接受由财政大臣任命的官吏所做的“公议”,那他就应当让2个官吏和15个竞争者去了解他的全部财产状况,作为对他的一种惩罚。这就是荆棘丛生的申诉的道路。因此,汉泽曼在草案说明中所讲的下面一段话简直是对他的读者的嘲弄:

“摊派公债是以自报为基础的。为了使它不致引起丝毫的敌意,甚至可以不要关于财产各个组成部分的一般资料。”

办事大臣在他的法案中甚至没有忽略对“破坏誓言”的惩罚,——真是和塞万提斯笔下的空洞计划制订者一模一样。

如果我们的汉泽曼不去熬费苦心地捏造他那虚假的说明,而用喜剧角色的口吻说出以下的话,也许要更为痛快一些:

“如果你们不借给我钱,叫我怎么去还旧债借新债呢?”

但是,在目前,当普鲁士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准备背叛德国和力图起来反对中央政权的时候,每一个爱国者的职责就是不要自愿为强制公债付出一个分尼的钱。只有彻底剥夺普鲁士的生活资料,才能迫使它向德国屈服。

写于1848年7月25—29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7月26和30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56和60号

关于区等级会议的妥协辩论

(7月18日的妥协会议)

科伦7月25日。我们今天从许多混乱的、无用的、纯粹个人的文件和讨论（一切会议通常都是由此开始的）中抽出两点来谈谈。

第一点是前任大臣洛贝尔图斯交给主席的、后来在讲台上宣读的书面声明：虽然他报名发言时说要反对雅科比的提案，但是他打算只反对这个谴责法兰克福决议的提案的第一部分，同时也反对内阁在7月4日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声明。大家知道，不等洛贝尔图斯先生发言，讨论就中止了。

第二点是布洛多夫斯基先生代表全体波兰议员对德籍波兰议员的没有根据的声明所作的声明；他不赞同把波兹南的一部分并入德意志联邦，他认为这是非法的；他的根据是1815年的条约和国王所引起的省等级会议反对把这块土地划入德意志联邦的声明¹⁶¹。

“解决这个问题的下一步合法途径我不知道，因为还没有征求国家对这件事情的意见。”

接着对奏摺进行最后的讨论。大家知道，奏摺在左派的“又是信任问题！”的叫喊声中和全场的大笑声中被否决了。

随后讨论了委员会关于94位议员提议取消区等级会议课税

权的报告。

我们打算来谈谈这个问题。它使我们又想起了真正的旧普鲁士的立法；日益强大的反动派越来越赞美这种立法是完美无缺的典型，而不想扮演过渡内阁角色的办事内阁则越来越恬不知耻地赞美博德尔斯文克内阁。

根据还在 1840 年以前就颁布的一些法律，区等级会议有权规定本区居民的税赋。

这些区等级会议是旧普鲁士“代议制”的最好的典型。在一个区里，农民中最大的土地占有者总共可派 3 个代表；每座城市通常派一个代表；但是每个贵族地主则都是区等级会议的世袭代表。城市里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乡村里的小私有者和外乡人，总之，绝大多数的居民都没有代表。虽然这些阶级没有代表，但是代表们，特别是“区等级会议的世袭代表”先生们却要向他们课税，至于为了什么目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这些区等级会议还能完全独立地支配一区的财政，但是在解决课税问题时，必须取得总督或国王的同意。此外，如果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和某个等级有特殊的意见，就由内政大臣来作最后的决定。由此可见，旧普鲁士国家制度是多么善于巧妙地保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合法取得的权利”和官僚制度的最高监督权。

但是，正如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极其明确地承认的那样，官僚制度的这个最高监督权只是为了保护地方官吏的权力，使他们不受区等级会议的任何干涉，而决不是为了保护区里的居民，特别是那些没有代表权的居民，使他们不受区等级会议代表先生们的侵犯。

报告在结束时建议废除赋予区等级会议以课税权的法律。

报告人布赫尔先生论证了这个提案。正是这些使没有代表权的居民特别苦恼和非常痛恨的区等级会议的决议,首先得到了各区政府批准。

“在原则上已经废除但是可惜在事实上至今还存在的警察国家的灾殃也就在这里,——官吏或官厅在官僚等级制度的阶梯上所占的地位越高,就越深信他们对一切问题,甚至对这些专门问题也都比别人了解得透彻,可是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对地方上的贫困一点也不了解。”

正在讨论的提案之所以特别应该认为是恰当的提案,是因为这个提案不是创造性的,而只是破坏性的,“不能否认,议会在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尝试方面到现在还没有成功……所以,目前主要从事破坏性的活动是适当的”。因此,发言人建议废除反动法律,特别是在1815年以后颁布的反动法律。

这太过分了。报告人不仅宣布旧普鲁士国家制度、官僚制度和区等级会议应该受到谴责,甚至还讽刺前几次妥协辩论的结果。对内阁来说形势好转了。况且在朝廷方面,不容许废除的正是现在的国王所颁布的那些法律。

于是,屈韦特尔先生走上讲台。

“区等级会议的成分是这样,所以它的结构无疑要改变,因为”——等级制度总是同法律上的平等相抵触,恰恰相反!只是“因为现在每个贵族地主是区等级会议的世袭代表,而城市无论拥有多少贵族领地,只有派一个代表去参加区等级会议的权利,农民的乡镇也只有3个代表。”

在我们面前暴露了办事内阁的秘密计划。建立了中央人民代议制,等级代议制就必然要废除,这已是无可挽救的了。但是在一些较小的代议机关中,在一些区(也许还在一些省?)中,有人还想保存等级代议制,只废除贵族所享有的、优越于市民和农民的最突出的特权。对屈韦特尔先生的声明只能作这样的理解——这至少

可以从下面这一点看出：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恰好坚持在区代议机关中确立法律上的平等；但是，屈韦特尔先生却用缄默来回避这个问题。

屈韦特尔先生对提案的内容无法反对；他只问是否应该使这个提案完成“立法的手续”。

“区等级会议会滥用课税权的危险也许不致于这么大……政府的监督权绝对不致于象有些人企图描述的那样虚妄；这种权力始终是认真地行使了的，不过是等级税的下等纳税人尽量想免税而已。”

当然，屈韦特尔先生曾经是博德尔施文克内阁的官员，因而他竟敢损害整个办事内阁的名誉，认为无论如何必须捍卫博德尔施文克官僚制度过去的功绩。我们发觉，在汉泽曼先生的伙伴屈韦特尔用这种方法来声明汉泽曼先生和博德尔施文克先生意见一致时，汉泽曼先生并不在场。

屈韦特尔先生声称，在发布不批准区等级会议所通过的税收的特别指示以前，他已经发指示给各区行政机关，这样，目的似乎就达到了。

晏奇先生戳穿了大臣先生的全部把戏，他说，按照等级税（贵族的领地完全免税）的比例征收通行税（主要对贵族的领地有利）已是区等级会议的惯例了。

屈韦特尔先生和当事人冯·万根海姆先生企图捍卫区等级会议。特别是高等法院院长，萨奇希区等级会议代表冯·万根海姆先生发表长篇演说来赞美这个值得赞美的机构。

但是摩里茨代表又损害了全部效果。屈韦特尔先生的指示有什么作用呢？如果内阁被迫辞职，区行政机关就会不理睬这个指示。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些不好的法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应

该废除它们。至于在这里遭到否认的滥用职权的问题,那末

“区等级会议不仅滥用了它的课税权,给予个人以豁免权,批准对全区居民无益的开支,而且还为了个别人的利益,为了特权阶层的利益,决定修筑道路……打算把区的中心鲁平城和汉堡—柏林铁路联结起来。区行政机关不但没有使铁路线通过符斯特尔豪森城(虽然该城表示愿意自己出资来弥补不足的费用),而且拒绝在这个没有丝毫资金的小城市修筑公路。结果公路是通过一个贵族地主的3个领地敷设的!!”

赖辛巴赫先生注意到:内阁的指示对区的财政问题毫无影响,区的财政完全受区等级会议的支配。

大臣先生用几句软弱无力的话作了回答。

布赫尔先生宣称,他决不认为大臣先生有权发布实际上是废除现行法律的指示。只有通过立法的方式才能有助于事。

屈韦特尔先生又叽叽咕咕地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来为自己辩护,然后就开始表决。

议会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提案,废除了授予区等级会议以课税权和支配区财政权的法律,并附带声明:“根据这些法律通过的区等级会议的决议仍然有效。”

这样,我们就看到办事内阁所办的“事情”就是企图用警察手段来达到反动目的和搞垮议会。

(待续)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25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7月26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56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关于普鲁士国民议会7月18日会议以后的情况,弗·恩格斯在“关于瓦德涅尔案件的妥协辩论”一文中作了评述(见本卷第338—341页)。——编者注

巴登各民主团体的解散

科伦 7 月 27 日。反对结社权的反动警察措施接踵而来。首先封闭的是斯图加特民主联合会,接着就是海得尔堡民主联盟。胜利使反动派先生们增加了勇气。巴登政府目前正在解散巴登所有的民主团体。

这正是在 *soi-disant* (所谓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讨论永久保障“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结社权问题时发生的。

结社自由权的基本条件是:警察机关不能解散或封闭任何一个社团,任何一个协会。这些措施只有在法庭判决某一社团或它的活动和宗旨多非法的,从而要惩处有关过失人员的时候,才能采用。

当然,对于迫不及待地要实施自己的惩罚措施的马提先生来说,这个过程未免太长了。过去他自己要以宪兵的名义逮捕“卖国贼”菲克勒尔时,曾认为逮捕前先要得到逮捕令或者至少自己要被委任为特别警察那种作法太无聊,同样,现在他认为任何法庭的、法律的途径也是不值一顾的,不切合实际的。

这个新的警察暴力行动的动机是很有教益的。据说各个团体已联合为一个全国性的民主团体的组织¹⁶²,这个组织是根据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倡议成立的。这个代表大会

“所抱的目的是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似乎这是被禁止的!) ,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从下面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在这些决议中对暴动者表现了同情(从什么时候起“同情”被认为是非法的“手段”?) ,此外,这些团体的中央委员会今后甚至将不承认德国国民议会,而且它要号召国民议会中的少数派同议会彻底分裂,以便通过非法途径成立新的议会。”

随后是代表大会关于民主党派组织机构的决议。

因此,在马提先生的看来,巴登的各个团体应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负责,即使它们没有执行这些决议也罢。如果这些团体在法兰克福委员会的坚决要求下确实已向国民议会的左翼发出了退出议会的号召,那末马提先生是决不会忘记宣扬这一点的。不过决定上述号召是否非法的不应该是马提先生,而是法庭。可是,要宣布党的区级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为非法,确实非有马提先生不可! 难道立宪主义者和反动分子的联盟¹⁶³不也是按照这种形式组织起来的吗?

但是,当然,“当国家制度的基础遭到破坏,从而整个国家大厦被社团的力量所震动的时候,这是不能容许的和有害的”。

马提先生,结社权的存在正是为了能够不受处罚地(当然是以合法的形式)“破坏”国家制度! 如果社团拥有的力量比国家还大,那对国家就更糟!

我们再次向国民议会呼吁,如果议会不想失去任何尊敬的话,应立即将马提先生提交法庭审判。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7 月 2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28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58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

科伦 7 月 29 日。如果莱茵省的某一个居民忘记了他应该把什么事情归功于“外国的统治”和“科西嘉岛暴君的压迫”，那就请他读一读汉泽曼先生在幸福的 1848 年提交他的妥协派“讨论”的关于无偿地废除各种义务和苛税的法案吧。领主权 [Lehnsherrlichkeit]，封地转为自由地的赎金 [Allodifikationszins]，死亡税 [Sterbefall]，好家畜使用权 [Besthaupt]，治疗税 [Kurmede]，保护金 [Schutzgeld]，权利宣告税 [Jurisdiktionszins]，诉讼罚金 [Dreidtinggelder]，饲养税 [Zuchtgelder]，盖印金 [Siegeldes]，屠宰什一税 [Blutzehnt]，养蜂什一税 [Bienenzehnt] 等等。这些荒谬绝伦的名称，在我们听到过法国革命破坏了封建制度、听到过 Code Napoléon [拿破仑法典] 的两只文明的耳朵听来，是多么陌生，多么野蛮！这一大堆中世纪的义务和苛税，这一大堆太古时代的腐烂得发霉的废物，对我们来说，是多么不可理解！

还是把你的鞋子脱下吧，德国的爱国者，因为你是站在神圣的土地上呵！所有这一切野蛮的习俗，是基督教德意志的光荣的残余，是贯串着全部历史并把你同你们祖先的伟大，甚至同赫鲁斯克人居住过的森林联系起来的那条锁链的最后一环！这种令人室

赫鲁斯克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部族，纪元前一世纪生活在威悉河和易北河中游。纪元前一世纪末至公元一世纪初被罗马人征服。公元 9 年在领袖阿尔明

息的空气,这种又在这里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的封建烂泥,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国的特产,而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都应当同诗人一起高呼:

这正是我的祖国的空气!
我的脸颊感到了它那温暖而清新的气息。
一路上的粪土,
也就是我那亲爱的祖国的污泥!¹⁶⁴

当你读这一法案时,乍看起来,似乎我们的农业大臣吉尔克先生按照汉泽曼先生的命令进行了异常“勇敢的冲击”,似乎他大笔一挥就消灭了整个中世纪,当然,这是完全无偿的!

但是,如果仔细地看一下法案的说明,那末就可以看出,它正好一开始就证明了任何封建义务实际上都不允许无偿地废除,即一开始就下了直接同“勇敢的冲击”矛盾的勇敢的断言。

现在,大臣先生的畏缩的实践小心翼翼地在这两种勇敢之间徘徊。左边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和“时代精神的要求”,右边是“地主合法取得的权利”,中间是“农村关系更加自由发展的值得赞许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吉尔克先生的不好意思的茫无所措的态度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呵!

总之,吉尔克先生完全承认:一般说来,封建义务只能通过赎买来废除。因此,保存了那些最繁重、最普遍和最主要的义务,或者,因为这些义务实际上已被农民废除了,所以又把它们恢复起来。

但是,——吉尔克先生认为——

尼(Арминий)的领导下在多德堡森林击溃了罗马军队,从罗马统治下获得解放。——译者注

“如果某些个别的关系，由于它的内在的理由不充分，或者由于它的继续存在同时代精神的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幸福不相容，而被无偿地废除了，那末，遭到这一方面损失的人们不能不承认：他们蒙受某些牺牲，不仅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而且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合理的利益，使享有特权的人和应尽义务的人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从而使领地一般能在国家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来保证整体的幸福。”

农村中的革命就是在实际上废除了一切封建义务。据说是承认革命的办事内阁，是这样承认农村中的革命的：暗地里把它消灭。完全恢复旧的 *Status quo*（秩序）是不可能的，这样做农民简直会把封建主杀死——这一点是吉尔克先生都懂得的。因此，要废除一连串仅仅在某些地方实行的微不足道的封建义务，而恢复那些主要的封建义务，这种义务用两个字来表达，就是徭役。

由于丧失了一切应该废除的权利，贵族在一年中失掉的还不到 5 万塔勒，但是得到的却有好几百万塔勒。况且，象大臣所指望的那样，贵族因此还能同农民和好，甚至以后在议院选举时能得到农民的票。的确，只要吉尔克先生的如意算盘没有打错，这笔交易是不坏的！

这样，就可以消除农民的抗议，而贵族如果正确地了解自己的地位，也不会提出抗议。剩下的还有议院，还有法律上的怀疑和激进派的吹毛求疵。应该废除的义务和不应废除的义务之间的区别，不外是几乎毫无价值的义务和具有重大价值的义务之间的区别；为了使议院满意，必须使这种区别具有虚构的法律上和经济上的理由。吉尔克先生必须证明：应该废除的义务（1）没有充分的内在的理由，（2）同全国人民的幸福矛盾，（3）同时代精神的要求矛盾，（4）把它们废除实际上并不是破坏所有权，并不是无偿的剥夺。

为了证明这些苛税和义务存在的理由不充分,吉尔克先生深入到封建权利的最黑暗的领域中去。他呼吁给“整整1000年来德意志各邦一开始就很缓慢的发展”以援助。但是这对吉尔克先生难道有什么好处吗?吉尔克先生愈是深入到遥远的过去,愈是搅动陈腐的封建权利的淤泥,这种权利就愈向他证明:上述义务存在的理由根本不是很不充分,而是从封建的观点看来非常充实;不幸的大臣竭力按照现代民法的概念去阐明封建权利,并且迫使别人象议论19世纪的资产者那样去议论12世纪的封建贵族,就只能遭到别人的嘲笑。

吉尔克先生顺利地继承了冯·帕托夫先生的基本原则:无偿地废除从领主权和继承的农奴依从地位中产生的一切义务,而其他一切义务只能通过赎买来废除。但是,难道吉尔克先生认为,需要具备特殊的洞察力才能向他证明,一般说来,一切应该废除的义务也都是“从领主权中产生”的吗?

吉尔克先生为了贯彻到底,到处把现代的权利概念同封建的权利规定相提并论,并且在紧要关头总是诉诸现代的权利概念,这一点看来用不着多说了。但是,如果吉尔克先生用现代权利的要求去衡量某些义务,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不用这种要求去衡量所有的一切义务。当然,如果他这样做,就很难使徭役同个性和所有权的自由相一致了。

可是,当吉尔克先生用社会的幸福和时代精神的要求来论证时,他和他的关于义务的划分就更糟糕了。因为不言而喻,如果这些微不足道的义务妨碍社会的幸福,并且违背时代精神的要求,那末,象徭役、工役、租金等等义务,就更是如此了。吉尔克先生莫非认为拔掉农民的鹅毛(第1节,第14条)的权利是不合时

宜的，而拔掉农民身上的毛的权利倒是合乎时代精神的吗？

接着就证明，法案规定废除封建义务并不是破坏所有权。这个极端荒谬的论点当然只能从外表上来证明，而且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通过算细账，贵族了解到这些权利对他们并没有什么价值，当然，这种计算只能是近似的。于是吉尔克先生非常仔细地计算第 1 节的所有 18 条，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他证明上述义务是毫无价值的，也就是证明他的法案是毫无价值的。好心肠的吉尔克先生！我们破坏了他那快乐的幻想，践踏了他那阿基米德的封建图样，是感到多么难受！

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困难！过去在为了取消封建义务（这些义务现在应该废除）而进行赎买时，也象在进行任何赎买时一样，农民受到了受贿的、为贵族谋利益的委员会可怕的欺骗。现在农民要求修改旧政府时代所缔结的一切赎买契约，而农民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吉尔克先生对此却漠不关心。“明文规定的权利和法律”是同农民的要求“矛盾”的。但它们总是同任何一种进步矛盾的，因为每一项新的法律都是要废除旧的明文规定的权利和旧的法律的。

“可以确有把握地预言由此所产生的结果：为了采取同一切时代的法权准则相矛盾的措施（各种革命也是同一切时代的法权准则相矛盾的）来使尽义务的农民得到好处，就得使国家中的很大一部分领地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从而（！）使国家本身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

于是吉尔克先生以惊人的理由证明：这种行动

“会使领地的整个法权基础发生问题和受到震动，并且由于无数的诉讼程序和诉讼费用，给领地这一国民福利的主要基础带来很难医治的创伤；”“破坏那些使契约有效的法权准则，会损害毫无疑问的契约关系，其结果是使人们对民法的稳定性的信任发生动摇，从而使整个经济生活遭到极其可怕的危险！！！”

因此，吉尔克先生在这里看到了所有权的破坏，这种破坏会动摇一切法权准则。但是，为什么无偿地废除在法案中提到的各项义务就不是破坏所有权呢？其实在这里，不仅存在着毫无疑问的契约关系，并且还存在着从太古以来就无条件存在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而修改契约的要求所涉及的那些契约就决不是无可争辩的，因为贿赂和欺诈是众所周知的，在许多场合下是有真凭实据的。

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不管被废除的义务是多么微不足道，吉尔克先生废除它们，就是“采取同一切时代的法权准则相矛盾的措施来使尽义务的农民得到好处”，这同“明文规定的权利和法律是直接矛盾的”；他“动摇了领地的全部法权基础”，他从根本上侵犯了“毫无疑问的”权利。

其实，吉尔克先生为了达到这种微不足道的结果，是否值得犯这样严重的罪行呢？——

实际上，吉尔克先生在侵犯所有制，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并不是侵犯现代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而是侵犯封建所有制。他破坏封建所有制，借以巩固在封建所有制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所有制。他之所以不想修改赎买契约，只是因为通过这种契约，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因为他如果修改这些契约，就要同时在条文上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而资产阶级所有制当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封建所有制是容易被攻破的和

可以侵犯的一样，——至于程度如何，要看大臣先生的需要和勇气。

这一项长篇大论的法律的简要意思是什么呢？

是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 1848 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 1789 年法国革命的讽刺。

1789 年 8 月 4 日，攻取巴士底狱后过了 3 个星期，法国人民在一天之内就战胜了一切封建义务。

1848 年 7 月 11 日，三月街垒战后过了 4 个月，封建义务战胜了德国人民。Teste Gierke cum Hansemanno〔见证人就是吉尔克和汉泽曼〕。

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

1848 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联，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

保存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 1848 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7 月 2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7 月 30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60 号

“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

科伦 7 月 31 日。

“在英国 ,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对于在法国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一点憎恨呢 ?只是对于曾经利用谷物垄断向工业课取不公平的繁重捐税的贵族一度有过这样的憎恨。在英国 ,资产者不享有任何特权 ,他们是靠自己的勤劳起家的 ;在法国 ,在路易·菲力浦时期 ,资产者则是垄断、特权的产物。”

这种伟大的、学术性的、热爱真理的名言出现在沃尔弗斯先生给消息一向很灵通的“科伦日报”写的社论中。

真奇怪 ! 在英国 ,存在有人数非常众多、非常集中和非常典型的无产阶级 ,它的队伍每隔五六年就要遭受一次由经济危机的毁灭性的灾难以及饥饿和伤寒所造成的浩劫 ,—— 这个无产阶级有半生时间是工业中多余的人 ,无法谋生 ;在英国 ,每 10 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穷人 ,而每 3 个穷人中就有一个被关在穷人的巴士底狱¹⁶⁵中 ;在英国 ,每年花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的钱几乎等于普鲁士国家的全部支出 ;在英国 ,赤贫现象被公开说成是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财富的必要因素。虽然如此 ,在英国 ,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对于资产阶级的一点憎恨呢 ?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具有广大无产阶级的国家中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都没有达到象英国那种程度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极端贫困和巨大财富之间的这种显著的对比。虽然

如此,究竟在哪里能找到对于资产阶级的一点憎恨呢?

当然,在 1825 年以前还是秘密的、但从 1825 年起就已公开的工人联合,并不是为了反对某一个厂主的临时性的联合,而是反对整批厂主的永久性的联合,是许多劳动部门、许多城市的联合,最后是全英国境内无数工人的联合,所有这一切联合以及它们所进行的反对厂主的无止境的斗争,它们所举行的引起了各种暴行、报复性破坏、纵火、武装攻击和杀害等等的罢工,——所有这一切都不外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爱的证明!

已经延续了 80 年之久的工人反对厂主的整个战争,从破坏机器开始,经过联合,经过对个人以及对厂主的财产和少数忠于厂主的工人的个别攻击,经过各种大小规模的发动,经过 1839 和 1842 年的起义,发展成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最自觉的阶级斗争,——宪章派即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政党的这种反对资产阶级有组织的国家权力的整个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象巴黎的六月战斗那样,引起极其可怕的流血冲突,可是它的顽强性、群众性以及斗争的范围都要比六月战斗大得多,——这种社会性的内战,对于“科伦日报”和它的沃尔弗斯来说,当然不过是英国无产阶级对于统治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爱的一种证明。

不久以前,大家不是热衷于把英国描绘成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典型国家,并且在同英国的所谓“不自然的状况”比较下,竭力赞扬拥有资产者国王、资产阶级的议会斗争和始终非常勇敢地作为资产阶级而战的善良工人的法国吗!不久以前,“科伦日报”不是每天都在重弹这个旧调,并且在英国的阶级斗争中找到了预告德国要提防保护关税制度和在这种制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那种“不自然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工业的理由吗!可是六月的日子把一切都颠倒

过来了。“科伦日报”被六月的战斗吓糊涂了，于是伦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几百万宪章主义者同巴黎的4万叛乱者比较起来，反而变成微不足道的了。

法国成了憎恨资产阶级的典型国家，并且根据“科伦日报”现在的断言，法国从1830年起就已成了这样的国家。怪事！英国的鼓动家在整个无产阶级的赞同下10年来孜孜不倦地在大会上、小册子里和报纸上唤起对资产阶级的最强烈的憎恨的时候，法国工人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则经常鼓吹同资产阶级调和，当时它们所根据的恰巧是：在法国，阶级矛盾还远不象英国那样尖锐！而恰好那些人（“科伦日报”听到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名字就毛骨悚然）——路易·勃朗、卡贝、科西迪耶尔、赖德律-洛兰，在许多年当中，在二月革命以前和以后一直在鼓吹同资产阶级和平，而且他们多半是 *de la meilleure foi du monde*（非常真诚地）去做这件事情的。“科伦日报”不妨翻阅一下上述各人的全部大作，不妨浏览一下“改革报”、“人民报”¹⁶⁶，甚至不妨浏览一下“同盟月刊”、“人民的蜂房”、“博爱月刊”¹⁶⁷这样一些最近几年来的工人报纸，——不然只要读一下两部人所共知的著作，读一下路易·勃朗的全部“十年历史”（特别是末尾）和他的两卷“革命史”也就够了。

可是，“科伦日报”并不满足于仅仅断言英国根本不存在“对于在法国被称之为资产阶级”（在英国也同样有，我们的消息非常灵通的同行，请参看一下两年来的“北极星报”）的那些人的憎恨，它还解释为什么正好应当是这样，而不是另一种样子。

皮尔废除了垄断并确立了自由贸易，因而使英国资产阶级免受这种憎恨：

“在英国,资产者不享有任何特权和垄断,在法国,资产者则是垄断的产物。”“皮尔的措施就是使英国不致遭到极其可怕的革命的措施。”

皮尔消灭了贵族的垄断,从而使资产阶级不致遭到无产阶级的带有威胁性的憎恨——,这就是“科伦日报”的奇怪的逻辑!

“英国人民,我们说:英国人民日益深信,只有实行自由贸易才能指望解决同他们当前的一切痛苦和忧虑有关的迫切问题,——而人们最近却力图在血泊中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不要忘记:自由贸易的思想最初是从英国人民中产生的。”

英国人民!但是“英国人民”从1839年以来就在所有的集会上和刊物中同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作斗争;在反谷物法同盟¹⁶⁸最兴盛的时期,英国人民迫使他们秘密集会,迫使他们规定持有特殊的入场券才能进入自己集会的会场;英国人民以极其辛辣的讽刺把自由贸易论者的所作所为同他们的花言巧语加以对照,把资产者同自由贸易论者完全看作一丘之貉!英国人民有时甚至不得利用贵族、垄断者的暂时支持去反对资产阶级,例如在10小时工作日¹⁶⁹问题上就是这样。应当把这个非常善于从公开会议的讲台上赶走自由贸易论者的人民,把这个“英国人民”描绘成自由贸易思想的鼓吹者吗?科伦日报”幼稚无知到什么地步,它在自己的空谈中不仅随着曼彻斯特和里子的大资本家重复他们的幻想,而且轻易地相信他们故意散播的谎话!

“资产者在英国不享有任何特权和垄断!”可是在法国却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工人来说,资产者从来就是垄断者,因为可怜的农民要给垄断者付60%的犁铁税,因为垄断者在出卖煤炭时进行重利盘剥,他们让法国的所有葡萄酒酿造者活活饿死,他们在把一切东西出卖给酿造者时总要贵20、40、50%……”

可敬的“科伦日报”所知道的“垄断”，只不过是关税的垄断，也就是在外表上仅仅压迫工人但实际上却困死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从保护关税政策中得不到好处的企业主的那种垄断。“科伦日报”除了从亚当·斯密到科布顿这些自由贸易论者老爷们所攻击的那种垄断，即地方性的由法律规定的垄断以外，别的什么垄断也不知道。

可是，资本的垄断，即不依靠立法和时常不顾立法而存在的垄断，对“科伦日报”的老爷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直接而无情地压迫工人，并且引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正是这种垄断。这种垄断正是产生现代阶级矛盾的特殊的现代的垄断，而解决这些矛盾是 19 世纪的特殊任务！

但是，其他一切地方性的小垄断消失得愈快，这种资本的垄断就愈益强大有力、无所不包和带有威胁性。

竞争由于消灭了一切“垄断”而变得越自由，工业封建主手中的资本就集中得越快，小资产阶级就破产得越快，同时英国这个资本垄断的国家使周围各国屈服于它的工业的过程也就越快。要是消灭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垄断”，这些国家在吞并一切的英国资产阶级面前，就会处于无产者的地位。那时，英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就会象英国资产者现在压迫英国无产者那样，来压迫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但是，因此而受害最大的就是这些国家的小资产阶级。

所有这些最起码的常识现在已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了，因为这样作只会使人见怪，——只有“科伦日报”的博学多才的老爷们是例外。

这些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们认为自由贸易是使法国避免工人和

资产者之间的毁灭性战争的唯一手段。

实际上把本国的资产阶级也降低到无产阶级的水平，——这就是只有“科伦日报”才配采取的调和阶级矛盾的手段！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7 月 3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8 月 1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62 号

关于瓦德涅尔案件的妥协辩论

科伦 8 月 1 日。我们又要报道几次妥协会议的消息。

在 7 月 18 日的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召请瓦德涅尔议员的问题。中央委员会表示同意接受这个提案。莱茵省的 3 个律师反对这个提案。

第一个发言的是前国家检察官爱北斐特的西蒙斯先生。西蒙斯先生大概认为他仍是在陪审法庭或违警法庭上演说。他以国家公诉人的资格发表了一篇反对瓦德涅尔先生和维护司法的真正的辩护词。他说:检察院正在审理此案,而且很快就能作出决定,瓦德涅尔不是获释,便是上陪审法庭受审。在后一种情况下,“顶好不要把这个案件分割开来,并且不要拖延对他的判决”。在西蒙斯先生看来,司法的利益,即检察院、国家检察官和陪审法庭的特权,高于人民代表的自由和人民代表不受侵犯的利益。

其次,西蒙斯先生企图诬蔑瓦德涅尔的辩护人所提出的证人,然后再诬蔑瓦德涅尔本人。他宣称由于瓦德涅尔的缺席,议会“并没有失去什么天才人物”,后来他又说,瓦德涅尔在没有洗清自己阴谋反对政府和以暴力反抗军事当局的一切嫌疑以前,无权出席议会。至于天才人物,那末按照西蒙斯先生的逻辑,可以象逮捕瓦德涅尔先生那样,把可敬的议会的⁹/₁₀的议员逮捕起来,而不使它失去什么天才人物;至于第二个论证,的确使西蒙斯先生引以为荣:他从来也没有参加过反对专制制度的“阴谋”活动,也决不能控

告他在三月街垒上“以暴力反抗国家当局”。

瓦德涅尔的代理人格莱夫先生确凿地证明瓦德涅尔没有任何嫌疑,至于这里所指的行为,也不能认为是非法的(因为他在履行他的义务时,帮助了根据法律所建立的市民自卫团,市民自卫团是得到市政局的同意才占领了特利尔的街垒的)。这个声明发表后,鲍尔班特先生起来为检察机关辩护。

鲍尔班特先生也产生了极大的疑问:“陪审员未来的判决不会因召请瓦德涅尔而预先决定吗?”这个深思熟虑的见解在博尔夏特先生发表了如下简短的意见后更无法解决了:陪审员未来的判决不会因拒绝召请瓦德涅尔而预先决定吗?两端论法的确高深莫测,甚至比鲍尔班特先生还高明的思想家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也会白费多年的时间。也许在全体议员中只有一个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鲍姆施塔克议员。

鲍尔班特先生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相当长的时间,讲得既冗长又混乱。博尔夏特先生对他作了简短的回答。接着施图普先生上台发言,为的是也来反对瓦德涅尔,他说他对西蒙斯和鲍尔班特的发言“在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可补充的”。这当然使他有足够的理由一直胡扯到有人要求停止辩论时为止。然后赖辛施佩格第二和温采利乌斯先生为瓦德涅尔简短地讲了几句话,于是,大家知道,议会就通过了召请瓦德涅尔的决议。瓦德涅尔先生跟议会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他没有接受这次召请。

博尔夏特先生建议:议会尚未对利济斯基先生的关于废除死刑的建议发表意见,为了防止即将执行死刑起见,一星期后必须对这个提议作出决定。

里茨先生认为这种轻率的作风不是议会的作风。

布里尔先生：既然我们（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很快就要作出关于废除死刑的决议，而如果在作出决议以前有人被杀头，那自然无疑地完全是非议会的作风。

主席想中止争论，但亲爱的鲍姆施塔克先生已站在讲台上，他目光炯炯，面容因高贵的愤怒而显得绯红：

“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讲几句严肃的话！这里所谈的问题丝毫不是这种性质的，即可以随便上台不加思索地宣布斩首是非议会的作风！”（认为斩首完全是议会作风的右派，发出了暴风雨般的叫“好”声。）“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意义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大家知道，鲍姆施塔克先生对自己所谈的每个问题都是这样讲的）。其他的议会……立法和科学界的伟人（即“国家法的所有哲学家，从柏拉图直到达尔曼”）在200—300年中（每个人？）都曾研究过这个问题，而如果你们想要别人责难我们如此轻率地解决这样重要的问题……（对呀！）只是良心驱使我说……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在这一点上多等一星期的确没有任何意义！”

高贵的议员鲍姆施塔克对这样巨大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所说的严肃的话变成了最轻率的举动。看来，鲍姆施塔克先生希望关于废除死刑的争论再继续200—300年，而在这期间可以平静地看着人们被杀头，的确，还能想出比这更轻率的举动吗？在这一点上多等一星期的确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在这个时期中一些人被杀头一样！

可是首相宣称，暂时不打算执行死刑。

在德里奇的舒尔采先生对议程发表了一些深思熟虑的意见后，大会否决了博尔夏特的提议，采纳了奈特先生的修正案，他建议中央委员会加速对问题进行审查。

希登哈根议员提议，在提出相反的法案以前，主席应该以如下

庄严的公式来结束每次会议：

“但是，我们认为内阁应该用一切方法来加速提出新市政条例的法案。”

遗憾的是，这个异常庄严的提议不适用于我们资产阶级的时代：

“我们不是罗马人，我们都抽烟”。¹⁷⁰

想在格拉博夫主席先生那样粗糙的石头上雕刻出亚庇·喀劳狄的古典形象和把庄严的 *Ceterum censeo*〔可是，我认为〕¹⁷¹用来解决市政条例问题的企图，在议会“异常活跃”的情况下破产了。

巴门议员布累特用十分温和的口气向商业大臣又提出了 3 个质问，即关于把整个德国联合为一个关税区，联合为一个有航海税的统一的通航联盟的问题，以及关于临时的保护关税问题。在他得到米尔德先生对这些问题的同样温和的、但令人极不满意的回答后，格拉德巴赫先生结束了辩论。利萨的许采先生打算要格拉德巴赫规矩一些，因为他在讨论解除志愿部队武装问题时的发言太强硬了，但许采先生收回了自己的提案。可是，格拉德巴赫先生极其从容地向勇敢的许采先生和整个右派挑战，他讲（这使旧普鲁士人十分愤怒）了关于一个普鲁士中尉的有趣的笑话：这个中尉骑在马上打瞌睡，并且就这样在志愿军中周游。志愿军唱着“睡吧，孩子，你睡吧”的小调来欢迎他，就因为这一点他们要受军事法庭审判！许采先生嘟哝了几句语无伦次的气愤话以后，会议就闭幕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8 月 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8 月 2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63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波兰叫列式诺。——编者注

见本卷第 194—195 页，207—211 页。——编者注

俄国的照会

科伦 8 月 1 日。俄国的外交当局暂时以通告的形式给俄国驻德国的各个使馆送来了一个照会,而没有送来军队。这个照会首先在法兰克福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的官方报纸¹⁷²上找到了藏身的地方,不久又受到别的官方和非官方报刊的友好欢迎。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先生所受到的这种借以进行正式外交活动的欢迎越是异乎寻常,这种活动也就越值得仔细研究。

在 1848 年以前的美好日子里,德国书报检查机关关心的是不许报纸刊载一句不利于俄国政府的话,甚至在希腊或土耳其的报道栏里也是这样。

在不幸的三月事件之后,可惜这个方便之门被关闭了。因此涅谢尔罗迭才成为政论家。

在他看来,“仇恨俄国的情绪似乎暂趋缓和的德国报刊”,对于俄国在边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散布了“毫无根据的推测和解释”。他用十分温和的语调说完后就提高嗓子说:“德国报刊每天都在散布极荒谬的谣言,对我们进行极卑鄙的诽谤。”接着又说什么“狂暴的叫喊”、“狂人”和“阴险的诡计”等等。

在最近的一件报刊审判案中,德国国家检察官便可以把俄国照会当做据以控诉的可靠文件。

为什么要攻击德国的报刊,尤其是“民主的”报刊而且在可能

的时候还要消灭它呢 因为它不承认俄国皇帝的“既友善又无私的感情”和“真诚爱好和平的愿望”！

涅谢尔罗迭代表他的统治者问道：“德国怎么能抱怨我们呢？当征服者在大陆上实行残酷统治的期间，俄国为了支持德国维护它的完整和独立而流过血。俄国的领土早已解放，但是俄国仍然在欧洲各个战场上继续援助自己的盟友德国。”

虽然俄国以高薪雇佣了大量的暗探，但是，如果俄国想在1848年拿所谓的解放战争来博得他人的好感，那就大错特错了。俄国真的为我们德国人流过血吗？

1812年以前俄国“支持”德国的“完整和独立”不过是表面结成同盟，暗中却和拿破仑订立密约，而且后来还靠抢劫和掠夺充分地补偿了自己的所谓援助。这点姑且不谈。后来俄国帮助的是和它联合的各邦君主，支持“天赋的”专制制度的代表反对由于革命而升到统治地位的人民，虽然它曾发表过卡里斯宣言¹⁷³。神圣同盟和它的决非神圣的行动，在卡尔斯巴德、来巴赫、维罗那等地召开的强盗式的代表会议，俄德对一切自由言论的追究，——也就是俄国从1815年以来所执行的全部政策，自然值得我们深深感谢。罗曼诺夫王朝和它的外交家们可以放心，这笔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至于谈到俄国1814年和1815年的援助，那末我们别的情感都有，只是不会对这种英国经济支持下的援助有感激之情。

这件事情的原因对所有明察事理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拿破仑在德国成了胜利者，那末依照他的坚决果断的原则，他至少要撤去3打为人敬爱的国君。法国的立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就会为德国的统一确立巩固的基础，就会使我们摆脱涅谢尔罗迭先生所推崇备至的联邦议会的暴虐统治和它33年来使我们所处的

可耻地位。拿破仑的一些法令将彻底清除所有中世纪的废物、徭役、什一税、优惠和特权、封建经济和宗法关系，在我们祖国的各个偏僻角落里这些东西现在还压在我们头上。德国其他地方也许早就达到莱茵河左岸在法国第一次大革命后所达到的地步了；我们这里现在也许既没有乌刻马克贵族，也没有波美拉尼亚的万第人了。我们也许不必呼吸“历史的”、“基督教德意志”沼泽里的窒息空气了。

但是，俄国是宽宏大量的。即使对它不表示任何谢意，俄国皇帝仍会象从前那样对我们怀着“既友善又无私的感情”。的确，“尽管蛮横无礼和出言伤人，也不能改变我们的（俄国的）感情”。

这些感情目前表现在“消极观望的政策”上。应当承认，这种政策俄国运用得非常巧妙。它善于等待，一直要等到适当的时机。虽然从3月起俄国就大量调动军队，但是涅谢尔罗迭先生却非常天真，要我们相信俄国军队一直“驻扎在原来的地方”。虽然有典型的“先生们，准备马吧！”¹⁷⁴的说法，虽然华沙警察局长阿布拉莫维奇流露了真情，发表了反对德国人民的恶毒言论，虽然（确切些说是由于）彼得堡发出了威胁性的别有用意的照会，俄国政府却仍然力争“和平与和解”。俄国仍然是“真诚爱好和平的，并且抱着防御的态度”。根据涅谢尔罗迭的通告，俄国本身是容忍而虔诚的，虽然它屡次无辜地遭到侮辱和损害。

现在我们举出照会中所提出的德国对俄国犯下的几个罪行：(1)“敌对的情绪”，(2)“要求全德实行改革的狂热”。回答沙皇这种善意的竟是“敌对的”情绪，太对不起我们亲爱的内兄的情谊了。加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之还有这个可诅咒的病魔——“要求改革的狂热”！实际上它最可怕，虽然这里把它放在第二位。俄国有时还把另外一种疾病——零乱传染给我们。这不去管它！但是这种“要求改革的狂热”不仅能传染，而且有时还非常厉害，使得高贵的先生们不得不急忙跑到英国去¹⁷⁵。也许“德国人要求改革的狂热”就是制止俄国在三四月里侵入德国的原因之一吧？第三个罪行是：法兰克福预备国会宣布，目前与俄国作战是必要的。俱乐部和报纸上也有同样的声明，这就更加不可饶恕了，因为根据神圣同盟的决议和俄奥普三国最近签订的条约，我们德国人只应该为各国君主的利益流血牺牲，而不应该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流血。第四个罪行是：德国有人主张恢复旧波兰 1772 年时确有的疆界¹⁷⁶。真该先挨顿鞭子，然后再发送到西伯利亚去。但是，并没有这样，当涅谢尔罗迭写他的通告时，他还不知道法兰克福议会对兼并波兹南问题 表决的结果。议会为我们赎了罪，所以沙皇口边现在露出了温和的、宽恕的微笑。德国的第五个罪行是：“它对北方的一个君主国发动了一场值得惋惜的战争”。鉴于俄国政府威胁性的照会获得了成功，德国军队根据波茨坦的命令急忙撤退，并且考虑到普鲁士驻哥本哈根大使就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所作的声明¹⁷⁷，对于德国的这种卤莽行为可以从轻处罚，无须象没有这些情况时那样严厉。第六个罪行是：“公开鼓吹德法订立攻守同盟”。最后，第七个罪行是：“收容波兰难民，让他们免费乘坐火车到波兹南参加起义”。

要不是外交家一流的人物的舌头给他们提供了“掩盖自己的思想”的工具，那末涅谢尔罗迭和内兄尼古拉本该欢天喜地拥抱我

们,热烈地感谢我们。因为我们用了一切优待办法诱出法、英、比等国的波兰人,把他们送到波兹南去,以便在那里用霰弹和榴霰弹来扫射他们、用硝酸银来给他们打烙印、枪杀他们、给他们剃光头等等,此外还尽可能地用克拉柯夫叛变者的炮弹把他们消灭干净。

难道俄国对德国这 7 条滔天罪行的答复竟是保持防御状态而不企图进攻吗?是的,的确是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俄国外交家要全世界向他的皇帝的爱好和平与宽大为怀的精神跪拜。

根据涅谢尔罗迭先生的意见,俄国皇帝“至今片刻也不放弃”的行动方式是:

“当他国要改变自己的国家制度时,决不干涉其内政,并给各国人民以充分自由,不阻止他们进行任何政治的和社会的试验。不侵犯任何强国,只要它不侵犯俄国。同时坚决回击一切侵害俄国内部安全的企图,并注意使领土的均势在遭到任何破坏和改变时不要损害我们的合法利益。”

俄国的照会忘记了举例来说明上述这段话。七月革命后,俄国皇帝把军队调往西部边境,以便利他的忠实的德国朋友联合起来用事实向法国人证明,他是多么“想给各国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来进行政治的和社会的试验”。至于他的行动方式遇到了阻碍,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 1830 年波兰革命的过错,这次革命使他的计划改变了方向。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对待西班牙和葡萄牙采用的也是这种行动方式。俄国皇帝给唐·卡洛斯和唐·米格尔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援助就是证明。1842 年底,普鲁士国王想赐予国家一个以非常方便的“历史”原则(这个原则在 1847 的诏书¹⁷⁸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为基础的等级宪法,大家知道,正是尼古拉坚决反对这件事,以致使我们“基督教德意志人”很多年没有享受到诏书中所规定的种种乐事。他所以这样做,正象涅谢尔罗迭所说的,是因为俄

国从来不干涉他国的内政。克拉柯夫的事情不值得再提了。我们只提一下俄皇“行动方式”的最近的一个例子。瓦拉基亚人推翻了旧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他们要改变整个旧制度,并且要按照各文明国的榜样建立自己的制度。“为了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来进行政治的和社会的试验”,俄国军队侵入了他们的国家。

由此任何人都会明白,这种“行动方式”将会怎样应用在德国身上。俄国的照会不用我们费力去做结论,照会中说:

“无论盟邦采用何种新形式,只要它不侵犯邻国,不企图以武力扩张自己的版图或者把自己的合法权限扩大到约定的范围之外,本国皇帝也将同样尊重它的内部独立。”

这个问题在照会的另一个地方谈得更清楚:

“如果德国真正能解决它的政体问题而不损害它的国内的安宁,使赋予德意志民族的新形式不致扰乱他国的安宁,那我们是衷心高兴的,正如在德国旧政体下我们希望它强大和统一那样。”

通告中的下面一段话非常明确而毫不含糊地谈到俄国竭力支持德国取得和谐与统一:

“当然,不是热中于平等和扩展的民主派现在所幻想的那种物质上的统一(根据民主派的沽名钓誉的理论,这种统一一旦实现,迟早一定要使德国和所有邻国发生战争),而是精神上的统一,是德意志联邦必须和其他强国进行协商的一切政治问题的看法和想法的真正一致。

支持这种统一,加强德国各邦政府相互之间的联系,——这才是我们的政策所抱的目的。

我们那时所希望的,我们现在仍然希望。”

从上述这段话可以看出,俄国政府是愿意允许德国在精神上统一的,只是不允许在物质上统一,只是不让迄今存在的联邦议会被建立在人民主权上的政权所代替,这个政权不是表面上的政权,

而是实际的坚强的中央政权！多么宽宏大量呵！

“我们那时(1848年2月以前)所希望的,我们现在仍然希望。”这是俄国照会中唯一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的一句话。但是我们要给涅谢尔罗迭先生指出:愿望和实现愿望毕竟是两回事。

现在德国人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能期待于俄国的是什么。既然旧制度将继续保留下来(虽然它涂了一层现代的色彩),既然由于“一时的陶醉和兴奋”而脱离了俄国和“历史的”轨道的德国又将驯顺地进入这个轨道,那末俄国将是“真诚爱好和平的”。

俄国国内的情况是:霍乱猖獗,某些县发生骚动,彼得堡曾酝酿革命(但被及时制止),华沙要塞发生密谋事件,波兰王国成了火山基地¹⁷⁹,——总之,所有这些情况促使沙皇对德国表示既善意又“无私的感情”。

然而,德国本身在此以前所发生的各种事变,对俄国政府的“消极观望政策”无疑发生了更大的影响。

如果没有柏林—波茨坦、音斯布鲁克、维也纳、布拉格、法兰克福、汉诺威以及几乎我们祖国(它又被适合俄国口味的精神上的统一所笼罩)的每一个偏僻角落里在此以前所发生的种种事件,难道尼古拉本人能如此顺利地处理他的事务,如此迅速地实现他的意图吗?难道波兹南的普富尔(硝酸银)、科隆布和榴霰弹将军的行动,布拉格的文迪施格雷茨的行动没有使沙皇的心里充满欢乐吗?难道文迪施格雷茨没有从年轻的美延多尔夫先生的手里收到尼古拉经波茨坦寄给他的称赞的信吗?难道柏林的汉泽曼先生、米尔德先生、施莱根施坦先生和法兰克福的拉多维茨、施梅林和利希诺夫

指希尔什菲尔德。——编者注

斯基之流还不会使俄国心满意足吗？难道法兰克福议会里的比德曼和巴塞尔曼之流的主张不是不久前的许多痛苦的安慰剂吗？因此俄国外交当局不需派遣军队侵入德国。它完全可以满足于“消极观望的政策”，满足于上面分析的照会！

写于 1848 年 8 月 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8 月 3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64 号

汉泽曼内阁和旧普鲁士刑法草案

科伦 8 月 3 日。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汉泽曼内阁在竭力歌颂博德尔施文克内阁。既承认了革命，又承认旧普鲁士的制度，“这是世间的常轨”！¹⁸⁰

但是汉泽曼先生娴熟谄练到如此程度，甚至将要歌颂他过去当莱茵省议会议员时曾经激烈反对过的博德尔施文克、萨维尼先生及其娄罗们的那种行为，——这对波茨坦宫廷权奸确实是一种意外的胜利。但事实却是如此！请看最近一期“普鲁士国家通报”中的一篇文章：

柏林 8 月 1 日。最近一期司法部公报在“非官方栏”中援引了关于死刑的统计材料，同时还援引了从 1826 年到 1843 年期间判处和批准的死刑（不包括所谓对煽动分子的审讯的判决在内）的人数的通报。这个工作是根据司法部的案卷进行的，并且由于所涉的问题的重要性而特别值得注意。根据通报来看，在上述期间内：

- (1) 在莱茵省被判处死刑的人有 189 名，批准 6 名；
- (2) 在其他各省被判处死刑的人有 237 名，批准 94 名。

总共被判处死刑的人有 426 名，批准 100 名，但在这 100 名罪犯中间有 4 名因逃跑或死亡而没有执行死刑。

如果 1847 年新的刑法典草案在这期间生效，那末情况就会是这样：

(1)在莱茵省被判处死刑的人仅有 53 名,批准 5 名;

(2)在其他各省被判处死刑的人仅有 134 名,批准 76 名。

总共被判处死刑的人会是 187 名,批准 81 名,假定在批准的时候遵循的是过去的那些原则。这样一来,根据现行法律被判处死刑的 237 个罪犯就不会被处死刑了,而被判处死刑的 19 名罪犯也就不会被杀头了。

根据这个通报,每年的平均数如下:

(1)在莱茵省被判处死刑的人有 $10^9/8$ 名,批准 6^{18} 名;

(2)在其他省被判处死刑的人有 13 名,批准 $5^4/18$ 名。

如果这个法律草案在当时有效的話,那末每年的平均数就会是这样:

(1)在莱茵省被判处死刑的人仅有 $2^{17}/18$ 名,批准 5^{18} 名,

(2)在其他省被判处死刑的人仅有 $7^7/18$ 名,批准 $4^4/18$ 名。

因此,歌颂 1847 年普鲁士王国的刑法草案的仁慈、优越和伟大吧!莱茵省在 18 年内也许会整整少杀一个人!多么优越啊!

但是这里有无数的被告不能出席陪审法庭受审而受国王的审判官的判决和被关在监狱里;在莱茵省这里可能用旧普鲁士的棍子来实行可耻的体罚(在莱茵省我们早在 40 年前就已免除了棍子);这里有丑恶的对违反道德的罪行的诉讼,这种罪行在 Code [法典]上并没有规定,而是由普鲁士法的骑士的那种病态的和脱离现实的幻想所重新引起的;这里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司法概念的混乱;最后,这里有无数的由于这个鄙劣的文件中的那些专横而恶毒的规定所引起的政治诉讼案,总而言之,整个莱茵省都普鲁士化了,——难道在柏林的那些莱茵的叛徒们认为,如果少杀了一个人我们就能够忘掉这一切吗?

有一点很明显:汉泽曼先生想通过他在审判机关的代理人,即梅尔克尔先生来实行博德尔施文克没有实行成功的东西;他想使令人深恶痛绝的普鲁士刑法草案现在能真正生效。

同时我们知道,陪审法庭将仅仅在柏林实行,而且在这里也只

是试验而已。

因此,不是在旧普鲁士各省实行莱茵省的法律,而是在莱茵省实行旧普鲁士的法律——,这就是三月革命的伟大的成果和巨大的“成就”。Rien que 海[不过如此而已]。

写于 1848 年 8 月 3 日

载于 1848 年 8 月 4 日

“新莱茵报”第 6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科伦日报”论强制公债

科伦 8 月 3 日。在“科伦日报”第 215 号上刊载了一个号召莱茵居民爱国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如下:

“我们刚才获得可靠消息,得悉科伦城今天认购自愿公债的数目约达 21 万塔勒,其中有一部分已用现款缴付。应当指望,那些直到现在还没有认购国家公债的人在最近 10 天内一定会理解并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而且他们本身的利益也必然会促使他们最好在 8 月 10 日以前缴款,因为在 8 月 10 日以前缴款的利率是 5%,过了这个期限缴款的利率是 $3\frac{1}{3}\%$ 。特别重要的是:希望那些应当认购这种公债而直到现在还没有认购的乡下人不要错过这一期限。否则,在缺乏爱国主义和缺乏正确理解的地方就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

$1\frac{2}{3}\%$ 的奖金全是为了奖励纳税人的爱国主义而设的,但爱国主义却“不管这一切的一切”,仍然顽强地处于隐蔽的状态中! C'est inconcevable(这真不可思议)。区别就在 $1\frac{2}{3}\%$!难道爱国主义能抗拒得了 $1\frac{2}{3}\%$ 这种响亮的论据吗?

我们有责任向我们可爱的同行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

普鲁士国家打算用什么来偿付即使不是按 5%而只是按 $3\frac{1}{3}\%$ 的利率付给的利息呢?用新的税收。如果普通税收不够(这是可以预料的),就用新的强制公债来偿付。但是又用什么来偿付第二期强制公债呢?用第三期强制公债。而第三期强制公债呢?那就只好破产了。因此,爱国主义坚决主张采取一切手段来阻碍普鲁

士政府选择的道路——但是不主张用塔勒,而主张用抗议。

此外,普鲁士幸亏已经拥有为了在波兹南进行野蛮的侵略战争而借的1 000万塔勒的特别债。因而,1 500万塔勒自愿公债就仅仅成了波茨坦秘密内阁181阴谋活动的报酬,这个秘密内阁不愿软弱无力的柏林内阁的命令而为俄国和反动派的利益进行战争。容克反革命竟卑躬屈膝地向市民和农民的腰包求助,他们事后要酬谢容克反革命的这种英勇的功绩。而心如铁石的“乡下人”是否会接受这种荣誉呢?办事内阁”还要求维持警察所必需的经费,而你们为什么对于按照英国方式建立的普鲁士警察制度的善行缺乏“正确理解”呢?办事内阁”想捆住你们的手脚,而你们为什么不付给它买绳子的钱呢?简直令人不能理解!

办事内阁需要钱来抗拒德国的统一而保卫自私的乌刻马克的利益。尽管有 $1\frac{2}{3}\%$ 的奖金,而科伦地区的乡下人却无知到拒绝负担保卫乌刻马克-波美拉尼亚民族的费用?他们的爱国主义在哪里呢?

我们那些受“强制性罚款”威胁的爱国的同行简直热心得忘记了妥协议会还没有对强制公债进行表决,忘记了内阁草案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和“科伦日报”的社论一样。

写于1848年8月3日

载于1848年8月4日

“新莱茵报”第6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

巴黎 8 月 3 日。前天我们只能简短地报道蒲鲁东的演说。今天我们要比较详细地来谈一谈¹⁸²。蒲鲁东先生首先宣称，二月革命无非是社会主义的发动，社会主义在以后的一切事变中，在这次革命后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都力图表现自己。你们想消灭社会主义吗？好吧，听我说，我愿意向你们伸出援助的手。社会主义的胜利决不取决于个人，目前的斗争绝对不是我和梯也尔先生之间的斗争，这是劳动和特权之间的斗争。可是与此相反，蒲鲁东先生提出证据，说梯也尔先生侮辱和诽谤了他个人。“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基础上，那末我就会对梯也尔先生说：让我们两人忏悔吧！请你承认自己的罪过，我已准备承认自己的罪过了！”这里所谈的问题是革命的问题。财政委员会把革命看作是偶然的現象，是意外的事情，而蒲鲁东却是严肃地对待革命的。1793 年，私有主向共和国偿还自己的债务，交纳了 $\frac{1}{3}$ 的捐稅。1848 年的革命应该在这方面保持“相称的比例”。1793 年的敌人是专制制度和外国，1848 年的敌人是赤贫。“什么是劳动权(droit au travail)呢？”

“如果劳动供不应求，那就不需要国家的任何保障了。但事情并不是这样，消费量非常有限，商店里堆满了商品，而穷人却没有衣服穿！而且哪一个国家比法国更热中于消费呢？如果给我们的不是 1 000 万法郎，而是 1 亿法郎，即每人每天 75 法郎，那我们早就给这些钱找到用途了。”(全场大笑)

利率是人民破产的根本原因。如果设立一所有 20 亿资本的国民银行,发放无息的贷款,制定免费使用土地和房屋的规章,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全场哄动)

“如果我们遵循这个原则(笑声),如果拜金主义被消费的现实主义消灭(又是笑声),那末劳动就有了保障。取消劳动工具税,你们就会得救。不承认这一点的人,不管他们是叫吉伦特党人或是叫山岳党人,反正都不是社会主义者,都不是共和主义者(啊哟,啊哟!)……不是私有制战胜共和国,就是共和国战胜私有制。”(喊声:够了!)

然后,蒲鲁东先生开始大谈利息的意义和把利率降低到零的方法。只要蒲鲁东先生从经济观点来谈论问题,他就十分软弱无力,虽然他的发言在这个资产阶级议院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可是当他被这种愤怒所激动而站到无产者的立场上时,议员们就好象患了神经痉挛症一样。

“诸位先生,我的想法和你们完全不同,我站在和你们完全不同的立场上!旧社会的消灭开始于 2 月 24 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消灭究竟用暴力还是用和平方法,完全取决于资产阶级是否明智,取决于它抗拒的程度。”

随后,蒲鲁东先生就转而说明他的“消灭私有制”的思想。他建议不要立刻消灭私有制,而要逐步地消灭私有制,因此,他在他的报纸¹⁸³上宣称,地租是土地的自然礼物,国家应该逐步地把它取消。

“所以,一方面我向资产阶级揭示了二月革命的意义,同时我也预告私有制:它应该准备着灭亡,私有者应该对自己的抗拒负责。”

四面八方都高声喊道:负什么责?

“我是想说,如果私有者不自愿消灭,那我们就来消灭他。”

有些人问道:“我们是指哪些人?”

另一些人叫道：把他送到疯人院去，送到沙兰顿去。（全场骚动；真是一场雷鸣风啸的暴风雨。）

“我所说的我们，是指把我自己和无产阶级合而为一，把你们和资产阶级合而为一！”

然后，蒲鲁东先生就详细地叙述他的税收制度，于是他又变成“学者”了。这种“学问”本是蒲鲁东的弱点，可是在这个满是庸夫俗子的议院中，却变成了他的力量，因为它使他有勇气以自己纯洁的、正直的“科学”来反对梯也尔先生的龌龊的财政学。梯也尔先生在财政问题上证实他在实践中的英明。在他任内，国库空虚了，而他个人的财产倒增加了。

蒲鲁东在议员们不大注意听他后来的议论时，就直截了当地说，他至少还想说3刻钟。话一说完，大多数议员就准备离开会场，这时他就又转过来直接攻击私有制。“你们已经用二月革命废除了私有制！”可以说，每当蒲鲁东谈到（哪怕是一个字）反对私有制时，恐惧就把人们钉在凳子上了。“你们既然在宪法中承认了劳动权，那就是你们也同意消灭私有制”。拉罗什雅克兰问道，有没有盗窃权。另外一些议员则想阻挡蒲鲁东先生继续发言。

“你们不可能消灭既成事实的(faits accomplis)后果。如果债务人和佃户还纳租还债，那只是他们自愿这样做。”（喧声惊人。主席叫发言的人守规矩：每个人都应该偿还自己的债务。）

“我并不是说要取消债务，但是那些想在这里维护债务的人要消灭革命……”

我们这些代表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根本什么也不是；使我们取得了我们的权力的政权缺乏原则和基础。我们的全部威信就建筑在暴力、专横和更强大的权力上。（愤怒又爆发了）普选权是偶然的東西；为了使普选权具有某种意义，首先要有组织。指导我们的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而是暴力、必要性

和天意……4月16日,5月15日,6月23、24和25日,这全是事实,而且都是被历史法定化的事实。今天我们能够做我们所向往的事情,力量在我们方面。所以我们不打算谈暴动者,暴动者就是那些除了强权就没有其他权利的人,但是他们不愿承认别人也有这种权利。我知道我的建议是不会被采纳的。可是你们的处境是这样:你们只有采纳我的建议,才能免于灭亡。全部问题就在于信贷问题,在于劳动问题!信任永远也不会恢复了——不,它一去不复返了……”(多么可怕!)“你们尽可以反复地说,你们渴望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温和的共和国;资本不会冒险地在共和国中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共和国不得不装出一付样子,似乎它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所以,当资本在等待适当时机来消灭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在等待时机消灭资本。2月24日已规定了劳动权。如果你们把这个权利从宪法中勾掉,那末你们就是规定了起义权。

请你们永远用刺刀来保护自己,永远宣布戒严吧。但是资本还是要感到恐惧的,因为社会主义在警惕地注视着它。”

“科伦日报”的读者老早就知道蒲鲁东先生了。蒲鲁东先生(正如在转入议程的决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他在发言中攻击了道德、宗教、家庭和私有制)不久前成了“科伦日报”的著名的英雄。蒲鲁东的“所谓社会经济制度”受到了巴黎通讯、小品文和长篇论文的极力推崇。蒲鲁东关于价值的定义被宣布为一切社会改革的起点。这里姑且不谈这个对“科伦日报”有害的结识是怎么发生的。不过,这却是令人惊奇的事情!从前把蒲鲁东看作救星的报纸,现在却对他和他的“虚伪的同党”破坏社会的行为竭尽痛骂之能事,而犹嫌不足。难道蒲鲁东先生已经不是蒲鲁东先生了吗?

我们所批判的蒲鲁东先生的观点,是他的“空想的科学”,他企图用这种科学来缓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¹⁸⁴。我们还要回头来谈这个问题。他的整个银行制度,他的整个产品交换制度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现在,当他为了实现自

己模糊的幻想而不得不以民主的精神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议院，尖锐地指出这个矛盾的时候，议院就大叫道德和私有制受到了侵犯。

写于 1848 年 8 月 3 日

载于 1848 年 8 月 5 日

“新莱茵报”第 6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

科伦 8 月 4 日。柏林议会有时把旧普鲁士的一切脏东西揭露出来,正是在目前,当黑、白骑士阶层变得日益无耻的时候,这种揭露是非常有益的。

在 7 月 21 日的会议上又谈到了封建义务。中央委员会根据一个议员的建议,同意在当局的要求或有关一方的要求下,停止关于赎买问题和关于分配村社土地问题的没有结束的谈判和审判案。

迪尔施克议员谈到了现行的赎买条件。首先他详细地叙述了赎买的办法本身怎样欺骗农民。

“例如,徭役赔偿(Frohndienste)的规定是非常片面的。完全没有注意到,在几百年以前把徭役劳动的工资规定为 1 个或 2 个银格罗申是符合于当时的产品价格和当时的关系的;这种工资可以被认为是劳动的合理等价物,因此无论是地主或担负徭役义务的农民都没有特别收入。可是现在每天付给自由雇佣工人的不是 2 个银格罗申,而是 5—6 个银格罗申。因此,如果有关的一方声明愿意赎买,那就先把徭役日折算为雇佣劳动日,结果两者之间一天的差额至少是 3 个银格罗申,——这样一来,每年中有 50 天的地租必须规定为 4—5 个塔勒,这个数目贫农是付不起的,因为他们经常只有 $\frac{1}{4}$ 摩尔根土地,又没有干外活挣钱的可能。”

这是恩格斯为迪尔施克所用的“徭役”(Robotdienste)这个不大通用的词加的说明。——编者注

普鲁士旧面积单位,约等于 $\frac{1}{4}$ 公顷。——译者注

迪尔施克先生的这段话发人深省,而这是绝对不利于自由派极其有名的 1807—1811 年法律¹⁸⁵的。

首先,由此应该得出一个结论:徭役(特别是在迪尔施克先生所谈到的西里西亚)绝对不是实物地租或世袭租用金,绝对不是对使用土地的补偿;和帕托夫先生、吉尔克先生的说法相反,徭役是直接“从领主权和世袭农奴的依附地位产生的”,因此,根据这些伟人们自己的原则,徭役制必须无偿地废除。

什么是农民的义务呢?农民的义务就是:在一年中农民必须为地主服务一定的日子或做一定的工作。但决不是无偿劳动。农民因此得到工资,而且起初得到的工资完全和自由劳动的日工资相等。可见地主的利益决不在于农民的无偿的或极廉价的劳动,而在于他经常可以用一般的工资雇到他所需要的工人,而在他不需要他们时,他可以对他们的工作不负责任。地主的利益并不在于徭役的货币价值,而在于徭役的强制性质,徭役的坏处不在于它在经济上对农民不利,而在于它使农民处于不自由的地位。而这些义务难道不是“从领主权和世袭农奴的依附地位产生的”!

根据徭役的最初性质来看,毫无疑问,必须无偿地废除徭役制,如果帕托夫、吉尔克之流真的想彻底取消封建义务,他们就应当这样作。

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徭役制现在的性质,那末情况究竟怎样呢?

在几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徭役制始终没有变化,因而徭役劳动的工资也没有变化。可是生活资料的价格却上升了,自由劳动的工资也随着上升了。起先,徭役制在经济上对双方同样有利,甚至在农民没有工作时,还经常给他们以有优厚工资的工作。后来,照吉

尔克先生的说法,徭役对农民来说,已逐渐成为“真正的田赋”,而对地主老爷们来说则成为直接的货币收入。他们除了稳有把握地经常拥有足够数目的工人外,还从这些工人的工资中捞取一笔相当大的款子。几百年来,经常用这种欺骗农民的方法克扣了他们极大部分的工资,因此到最后他们仅仅拿到他们应得工资的 $\frac{1}{3}$ 甚或 $\frac{1}{4}$ 。假如一个农户必须出一个劳动力,在一年中只做50天工作,日工资在300年中平均只增加了2银格罗申,那末地主老爷们在每个这样的工人身上可以赚到整整1000个塔勒,而按5%的利率计算,500个塔勒在300年中得到的利息为7500个塔勒,在每个工人身上总共赚8500个塔勒。而这笔账还是按照地主实际所得总数的一半也不到的数目来计算的!

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不是农民应该向地主纳税,而是地主应该向农民纳税,不是农户应该向领主缴地租,而是领主应该向农户缴地租。

但是1848年的普鲁士自由派却不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完全相反,我们的律师的普鲁士良心是这样来解释的:徭役工资和自由劳动工资的差额,不应该由贵族向农民补偿,而应该由农民向贵族补偿。正因为如此,所以地主才这样长期地窃取农民工资上的差额,正因为如此,农民应该向地主赔偿被这些先生所骗去的东西。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这样,就算出了工资差额,这个差额的全年总数被当作地租而落入地主的腰包。如果农民想赎清这种地租,这种地租就变成利率

为 4% (即使不是 5%) 的资本, 因此他就要偿付这个等于地租 25 倍的资本。由此可见, 这纯粹是用奸商的办法来对付农民, 因此, 我们上面所举的贵族的利润计算法是完全有根据的。

此外, 农民使用¹/₄ 摩尔根贫瘠的土地常常需要缴 4—5 个塔勒地租, 其实一年只要出 3 个塔勒的地租就可租到一摩尔根肥沃的、免服徭役的土地!

赎买也可以用出让土地的方法来进行, 但所让出的土地的价值应和赎金相等。自然, 这只有大农才能办到。这样, 地主就可以得到这种土地, 作为对他和他的祖先一贯用狡猾的手段掠夺农民的奖赏。

赎买论就是如此。它充分地证明了在其他各个国家中所发生的事情, 在这些国家中, 首先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 封建关系是被逐步消灭的, 这就是说, 把封建所有制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 把领主主权变为资本, 每一次这种转变总是有利于封建主, 而对于不自由的农民则是一种新的不能容忍的欺骗手段。不自由的农民每一次都要赎买自己的自由, 而且要用很高的代价去赎买。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按照有钱活命无钱上吊的原则办事的。

但是, 赎买论所证明的还不止这些。

正如达奈议员所指出的, 向农民提出来的这种惊人要求的必然后果, 就是使他们都落入高利贷者的手里。正如法国、普法尔茨和莱茵省的实例所证明的, 高利贷是自由小农阶级的必然的伴侣。普鲁士的赎买论使那些旧省份的小农在还没有获得自由以前就尝到了高利贷盘剥的甜头。总之, 普鲁士政府一向善于使被压迫的阶级遭受封建关系和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双重压迫, 这样就使得羁绊加倍沉重。

此外,再补充达奈议员也注意到的一种情况:按时拿钱的专员愈好逸恶劳和愈不中用,庞大的开支就愈加增多。

“威斯特伐里亚的列士登奥城为 12 000 摩尔根土地化了 17 000 个塔勒,可是仍然入不敷出!”

下面来说一下赎买的实际情形,它更证实了上述情况。迪尔施克先生说:地方专员(Oekonomiekommissarien)即办理赎买的官吏

“扮演 3 个角色。第一,他们要当调查官,他们以这种资格听取双方的意见,规定赎买的实际原则和计算赔款的数目。他们经常极其片面地处理事情,不注意现行的法律关系,有时他们简直没有法律知识。其次,他们是鉴定人和见证人,并且擅自规定赎买物的价格。最后,他们提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结论几乎等于决议,因为总委员会认为他们熟悉当地情况,通常总是以他们的意见为依据的。

最后,地方专员是得不到农民的信任的,因为他们经常使农民一方受到损失,他们常被地主请去吃饭(地主本人也是当事的一方),让农民一等就是几个钟头,这就更引起农民一方对他们的不信任。Dreschgärtner〔打谷者〕¹⁸⁶在等了 3 个钟头以后,终于被接见了,可是地方专员经常叱责他们,粗暴地驳斥他们的一切不同意见。这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的,因为我曾任法庭的特派员,在赎买时维护农民的利益。因此,地方专员的独裁权必须废除。一人身兼 3 职——调查官、见证人和审判员是极不合理的。”

摩里茨议员起来为地方专员辩护。迪尔施克先生回答说:他们认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的行动是损害农民利益的;为了审理案件,我自己甚至反映过他们中间某些人的行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吉尔克大臣当然又起来维护旧普鲁士的制度和在这个制度的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基础上产生的法规。地方专员当然又被夸奖一番：

“我议会决定，是否容许利用它的讲台来进行这种没有任何证据的完全站不住脚的责难！”

迪尔施克先生不是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吗？

但是，由于吉尔克阁下大概认为那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值大臣们一驳，所以我们最近将要拿出一些“证据”来证明迪尔施克先生不仅丝毫没有夸大，而且甚至对地方专员的行动的谴责还非常不够。

讨论的情况就是如此。修正案太多了，只好把报告连同修正案一起退回中央委员会。议会通过最后决议的时间因而被推迟。

在这些修正案中有摩里茨先生的一个修正案，其中谈到了前届政府的另一个颇有教益的措施。他建议停止一切有关磨粉税的谈判。

在 1810 年决定废除专利权（Zwangs- und Banrechte）的同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赔偿磨粉主因投入自由竞争而遭受的损失问题。这个决议本身就是荒谬的。难道行会师傅因废除自己的特权而得到了赔偿吗？但是这里情况特殊。磨坊缴纳享用专利权的特别税，因此不是简单地废除这一切，而是给他们补偿费，可是特别税仍旧保留下来。形式本身是荒谬的，但这里至少有一种法的外表。

然而，在从 1815 年起合并进来的各省中保留有磨粉税，而废除了专利权，但是却不缴纳任何赔偿费。旧普鲁士在法律面前的平

是封建主的一种权利，根据这种权利他可以强迫农民在他的磨坊磨粉，用他的烘炉烤面包，从而收取一种特别税；专利权是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一种形式。——译者注

等就是如此。虽然手工业法废除了一切手工业税,可是按照 1845 年的手工业条例和根据赔偿法,在发生争执时,所有磨粉税不被看作手工业税,而被看作土地税。由于这种混乱状况和这些违法行为而发生了许多诉讼案件,各级法庭的判决互相矛盾,甚至最高法院也作出了一些极其矛盾的判决。从摩里茨先生所援引的事情中可以看出,过去的立法当局究竟把什么样的税当作“土地税”:萨克森有一家磨坊,它除了磨粉设备以外,还有水力,但没有田地,可是却被课 4 维斯佩尔¹⁸⁷谷物的“土地税”!

说实在的,不管那儿讲些什么,普鲁士自古以来就是管理方式最完善、最公平和最好的国家!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8 月 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8 月 6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67 号

“模范国家”比利时

科伦 8 月 6 日。我们终于又把视线集中在比利时了。这是立宪的“模范国家”，是建立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君主制的埃尔多拉多，是柏林政治家的大学和“科伦日报”的骄傲。

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经济状况，原来这样出色的政治制度只不过是经济状况的镀金框子而已。

比利时“通报”¹⁸⁸（比利时有自己的“通报”）公布了关于列奥波特的最大的陪臣，即关于赤贫现象的材料。

在卢森堡省 69 个居民中有 1 人领补助金
在那慕尔省 17 个居民中有 1 人领补助金
在安特卫普省 16 个居民中有 1 人领补助金
在列日省 7 个居民中有 1 人领补助金
在灵堡省 7 个居民中有 1 人领补助金
在海瑙省 6 个居民中有 1 人领补助金
在东弗朗德里亚省 5 个居民中有 1 人领补助金
在布拉班特省 4 个居民中有 1 人领补助金
在西弗朗德里亚省 3 个居民中有 1 人领补助金

这种赤贫现象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会使赤贫现象进一步加剧。所有能靠自己资财生活的人由于负担赤贫同胞救济税而失去了财

西班牙的南美开拓者虚构出来的幻想中的黄金国家或黄金城市。——译者注

产的均衡,自己也滚入官方慈善事业的深渊。赤贫现象以加速度产生着赤贫现象。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人民生命的源泉——青年日益堕落。

在 1845、1846 和 1847 年,这方面的情况是非常可悲的。

18 岁以下的少年男女根据法庭判决被拘禁的人数共计:

	1845	1846	1847
少年	2 146	4 607	7 283
少女	429	1 279	2 069
总计	2 575	5 886	9 352
总数			17 813

由此可见,从 1845 年以来,18 岁以下的少年罪犯的人数每年大约增加一倍。按照这个比例,比利时的少年罪犯到 1850 年将达到 74 816 名,而在 1855 年将达到 2 393 312 名,即超过 18 岁以下少年的总人数,而且超过全国居民的半数。这样,到 1856 年比利时全国人民(包括尚未诞生的小孩在内)都要坐牢了。那时君主制能不能期望自己有更广泛的民主的基础呢?要知道在监狱里大家都是平等的。

政治经济学的顽固分子徒劳地乞灵于他们的两种莫里逊氏丸:一种是自由贸易,另一种是保护关税。弗朗德里亚的赤贫现象是在自由贸易制度下产生的,并在为抵制外国亚麻布和麻纱而采取的保护关税制度下增长和加剧起来。

随着无产阶级中间赤贫现象和犯罪行为的急剧增长,资产阶级的财源也日益涸竭,不久前出现的比利时在 1846、1847 和 1848

年上半年的对外贸易对照统计表就证实了这点。

除了枪械制造厂和制钉工厂(在这个期间内它们的情况良好,这是例外)、呢绒工厂(它保持了以往的光荣)和锌制造业(同总产值相比它的产量是微不足道的)以外,比利时的整个工业都处于衰退和停滞状态。

除了个别情况以外,比利时的矿产品和金属制品的输出量在大大缩减。

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

	1847年上半年	1848年上半年
煤(以吨为单位)	869 000	549 000
生铁	56 000	35 000
生铁制品	463	172
铁和钢轨	3 489	13
锻铁制品	556	434
钉	3 210	3 618
总计	932 718	588 237

由此可见,这3个部门在1848年上半年的产品输出量总共缩减了344 481吨,即占总输出量的 $\frac{1}{3}$ 强。

再来看一看麻纺织业的情况:

	1846年上半年	1847年上半年	1848年上半年
麻纱	1 017 000	623 000	306 000
亚麻织物	1 483 000	1 230 000	681 000
总计	2 500 000	1 853 000	987 000

1847年上半年的产量同1846年上半年相比缩减了657 000公斤,1848年和1846年相比缩减了1 613 000公斤,即缩减了64%。

书籍、精制玻璃器皿和窗玻璃的输出量大为缩减;原麻和梳

麻、麻屑、树皮和烟草制品的输出量也减少了。

吞噬一切的赤贫现象、青年罪犯的空前增加和比利时工业的不断衰退,就是立宪的德政的物质基础。内阁的“独立报”共计有 4 000 多个订户(该报不厌其烦地对此进行报道)。年迈的梅利奈,这位唯一拯救比利时荣誉的将军遭到了软禁,并于日内将出席安特卫普的陪审法庭受审。根特的律师洛兰,这个两面派的叛徒当上了公共工程大臣,他进行秘密活动,为了奥伦治王朝的利益反对列奥波特,又为了列奥波特·科布尔克的利益反对他未来的同盟者,即反对比利时的自由派。陆军大臣夏扎尔男爵,这位昔日的旧货商和崇法狂者¹⁸⁹,挥舞他的大军刀来拯救欧洲的均衡。“观察家”为了祝贺蒙斯的 Doudou(杜杜)、安特卫普的 Houplala(乌普拉拉)和布鲁塞尔的 Mannequin Pisse(曼涅肯·皮斯),在九月盛典¹⁹⁰的节目中增添了一项娱乐,即大游行(Ommeganck General)。“观察家”(大韦尔哈根的报纸)对此作了很严肃的叙述。最后,比利时已成为柏林的孟德斯鸠(施图普、格林、汉泽曼和鲍姆施塔克之流)的大学,而且引起了“科伦日报”的颂扬,这是由于它受尽了一切苦难而给它的奖赏。幸福的比利时!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8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8 月 7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68 号

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

科伦 8 月 7 日。法兰克福议会中的辩论 ,从来也没有失去真正德国人的温和的性质 ,就是在最激动的时刻也是如此 ;可是在讨论波兹南问题的时候 ,终于群情激昂起来了。对于这个由普鲁士的榴霰弹和顺从的联邦议会的决议为议会准备好了的问题 ,议会必须作出明确的决定。议会必须拯救德国的荣誉 ,还是再一次使德国蒙上耻辱 ;这里丝毫没有折衷的余地。议会的行动不出我们所料 ;它批准了对波兰的 7 次瓜分 ,它把 1772、1794 和 1815 年的耻辱从德意志各邦君主的肩上转到了自己的肩上。

不仅如此 ,法兰克福议会还把对波兰的这 7 次瓜分说成是施给波兰人的 7 次恩惠。难道犹太-德意志种族的暴力侵犯没有把波兰提到它过去不能想象的文化高度和知识水平吗 ? 这些瞎了眼的忘恩负义的波兰人 ! 如果你们没有被分割 ,你们就得自己去向法兰克福议会乞求这种恩惠 !

在沙福豪森附近的天国修道院里 ,有一个叫博纳维达·布兰克的牧师驯养了 40 只棕鸟 ,他割掉了棕鸟的下喙 ,因此它们不能再自己获取食物 ,而只好从牧师手中得到饲料。庸夫俗子们老远地看到这些鸟向这位尊敬的牧师飞来 ,落到他的肩上 ,驯顺地在他的

手中啄食,因而对他这种高超的教化和修养感到惊讶。给这位牧师做传记的人说:鸟儿们爱他就象爱自己的恩人一样。

而这些受束缚、受摧残、受凌辱的波兰人却不愿意爱自己的普鲁士恩人!

为了说明普鲁士国家制度施给波兰人的恩惠,最好分析一下作为讨论基础的国际法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这篇报告是历史编纂学家施滕策尔执笔起草的。

这篇报告按风格来说完全是一种最刻板的外交文件,它首先叙述了1815年波兹南大公国通过“加入”与“联合”而产生的经过,接着列举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当时给波兹南人许下的诺言:保持他们的民族特性、语言和宗教,从当地居民中任命总督,把著名的普鲁士宪法¹⁹¹推广到波兹南人中间去。

大家知道,这些诺言哪一条也没有实现过。被分裂的3部分波兰之间的交往自由当然也没有实现过。这种自由愈是不能实现,维也纳会议也就愈是心平气和地表示同意。

接着谈到了居民成分问题。施滕策尔先生计算了一下:1843年在大公国居住的有79万波兰人、42万德国人和将近8万犹太人,总共约130万人。

施滕策尔先生的说法是和波兰人的说法,特别是和普什鲁斯基大主教的说法相矛盾的,照普什鲁斯基的说法,居住在波兹南的波兰人大大超过80万人,而德国人(不包括犹太人、官吏和士兵)只有25万人。

不过我们还是根据施滕策尔先生的说法吧。要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已经足够了。为了避免今后的一切争论,我们就假定在波兹南有42万德国人。那末,这些包括犹太人在内已达50万的德国人

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斯拉夫人主要是从事农业的人民,不大善于从事斯拉夫各国直到现代才可能从事的那种城市手工业。当贸易只限于零售交易的时候,贸易的形式是原始的、粗糙的,从事贸易的全是犹太行商。当人口增加和文化水平提高的时候,当感到需要城市手工业和城市人口集中的时候,德国人便伸展到斯拉夫各国来了。在中世纪帝国城市的小市民中、在萧条的商队的国内贸易中、在有限的海上贸易中以及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的行会手工业中达到空前繁荣的德国人,表现了自己有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小市民的才干,而且直到今天在整个东欧和北欧,甚至在美洲,他们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核心。在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和克拉柯夫,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在佩斯、敖德萨和雅西,在纽约和费拉得尔菲亚,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掮客大部分(往往是极大部分)是由德国人或祖籍是德国的人组成的。在所有这些城市里,都有纯粹讲德语的街区,而其中有些城市(如佩斯),差不多全是德国人。

德国人的这种移民,特别是向斯拉夫各国的移民,从 12 世纪和 13 世纪以来几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此外,自从宗教改革以来,由于对宗教教派的迫害,时常有大批德国人被迫逃亡波兰,他们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在其他斯拉夫国家,在波希米亚、莫拉维亚等等国家,斯拉夫人由于德国人的侵略战争而大大减少,德国人则由于侵略而增加了。

正是在波兰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几百年前就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德国小市民,在政治上早已很少倾向于德国,正象在美国的德国

人一样,或者象柏林的“法国移民”或蒙特维的亚的 15 000 个法国人在政治上很少倾向于法国一样。这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地方分权时代是可能的,他们成了波兰人,成了操德语的波兰人,而且早已和祖国毫无联系。

但是,不正是他们给波兰带来了文化和教育,带来了贸易和手工业吗!的确,他们随身带来了小型贸易和行会手工业;他们以自己的消费和有限的交换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生产。至于高等教育,1772 年以前在整个波兰都很少听到,以后在奥属波兰和俄属波兰的情形也是这样。关于普属波兰,我们还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同时,德国人在波兰却妨碍了波兰城市的建立和波兰资产阶级的形成!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语言,以自己 and 波兰居民的疏远,以自己成千上万种特权和城市法规,妨碍了中央集权这个使一切国家迅速发展的最有力的政治手段的实现。差不多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法律;尤其是在民族杂居的城市里,都存在过而且往往还继续存在着对德国人、对波兰人、对犹太人的不同的法律。波兰的德国人停留在最低级的工业发展阶段,他们没有掌握大资本,不善于从事大工业,没有控制广泛的贸易关系。为了使工业能够在波兰扎根,需要英国人科克里尔到华沙来。零售贸易,手工业,至多不过是粮食贸易和工场手工业(织布业等等),而且规模非常小,——这就是波兰的德国人的全部活动。在评价波兰的德国人的功绩的时候,也不应忽略下列情况:他们把德国的市俗习气和德国小市民的狭隘性随身带到了波兰,他们兼有两个民族的坏的特性,而没有吸取好的特性。

施滕策尔先生企图激起德国人对波兰的德国人的同情,他说:
“当国王……,特别是在 17 世纪,越来越软弱无力,甚至已经不能保卫当

地波兰农民不受贵族最残酷的压迫的时候,德国的乡村和城市也趋于衰落,其中有许多变成了贵族的财产。只有有一些比较大的国王的的城市拯救了自己旧有的一部分优惠权”(应读作:特权)。

施滕策尔先生真的不要求波兰人比保卫自己更好地保卫(其实也是“本地的”)“德国人”(应读作:波兰的德国人)吗?可是不言而喻,移居到某个国家去的外国人除了和当地居民共忧乐而外,不能有别的要求!

现在我们来谈谈波兰人应当特别感谢普鲁士政府的那些恩惠吧。

1772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侵占了涅茨区,次年,开凿了一条勃罗姆堡运河以沟通奥德河与维斯拉河之间的内河航运。

“那些几世纪以来波兰和波美拉尼亚争执不下的地方,那些满目荒凉、沼泽遍野而无人烟的地方,现在已经被开垦,而且住上了大批移民。”

这么说来,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完全不是什么掠夺。弗里德里希二世所占领的不过是“几世纪以来争执不下的”地区。但是,能够争夺这个地区的独立的波美拉尼亚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不再存在了呢?有多少世纪这个地区实际上已不再是波兰人所争执的地区了呢?这种“争执”和“要求”的生了锈的陈腐理论,这种在17世纪和18世纪适用于掩饰扩大贸易和圈地的野心的理论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在1848年,当各种“历史的权利”和“非正义性”已经毫无根据的时候,这个理论有什么价值呢?

不过,施滕策尔应当考虑:根据这个早已过时的理论,莱茵河的界线是法德之间“几千年来争执的对象”,而波兰人可以提出要

求把普鲁士省甚至把波美拉尼亚作为自己的封建领地！

简单地说，涅茨区已成为普鲁士的地区，从而已不再成为“争执的对象”。弗里德里希二世向这个地区移来了许多德国人，于是出现了因波兹南问题而闻名的所谓“涅茨同胞”。以国家为出发点的德国化是从 1773 年开始的。

“根据一切值得相信的材料来看，大公国里的犹太人全是德国人，而且都愿意成为德国人……波兰过去在宗教上采取容忍态度，以及犹太人具有某些为波兰人所缺少的特性，这就使得犹太人能够在几世纪以来扩大活动范围，深入到波兰的生活（即波兰人的腰包）中去。他们一般都通晓两种语言，即使在家里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也从小就讲德语。”

波兰的犹太人最近在德国所博得的出乎意料的同情和承认，在这里被正式表达出来了。凡是莱比锡市场的势力（投机、吝啬和腐败的最充分的体现）所及的地方，那里被侮辱的人突然成了德国同胞；正直的米歇尔含着喜悦的眼泪紧紧地拥抱他们，而施滕策尔先生则代表德意志民族妄想把他们看做今后愿意成为德国人的德国人。

为什么波兰的犹太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德国人呢？难道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家里”不是“从小”就讲德语的吗？还要讲什么样的德语呵！

但是，我们要请施滕策尔先生注意，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取得整个欧洲和半个美洲，甚至一部分亚洲。大家都知道，德语是全世界犹太人的语言。在纽约和君士坦丁堡，在彼得堡和巴黎，“犹太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家里从小就讲德语”，其中一部分人讲的德语要比

“涅茨同胞”的“同种族的”同盟者——波兹南犹太人所讲的更为正确。

这篇报告接着描述了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说得尽量含糊，尽量有利于由波兰的德国人、“涅茨同胞”和犹太人所组成的假想的 50 万德国人。德国农民的地产，按面积来说要比波兰农民的地产大（我们将看到这是怎么产生的）。自从波兰第一次被瓜分以来，波兰人和德国人（特别是和普鲁士人）之间的仇恨似乎已达到了顶点。

“普鲁士由于最坚决地整顿国家制度和行政制度（什么话！），由于严格推行这些制度，就特别明显地破坏了波兰人旧时的法律和固有的制度。”

可尊敬的普鲁士官僚的这些“坚决整顿的”和“严格推行的”措施是多么有力，它不但“破坏了”旧时的生活习惯和固有的制度，而且还“破坏了”全部社会生活，“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商业和采矿业，总而言之，毫无例外地“破坏了”一切社会关系，——关于这一点，不仅波兰人，而且普鲁士其余的居民，特别是我们莱茵省的居民，都能说出一些惊人的事情来。但是，施滕策尔先生在这里连 1807—1848 年的官僚都不谈，而只谈 1772—1806 年的官僚，谈最典型的地道的普鲁士国家制度下的官吏，他们的卑鄙、贪污、贪婪和残酷，在 1806 年的叛变行为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些官吏似乎保护了波兰农民反对贵族，而得到的却是忘恩负义；当然，这些官吏一定会感到：“任何东西，甚至是强施于人的善行，都不能补偿民族独立的丧失”。

我们也熟悉那种直到最近还为普鲁士官吏所特有的“把一切

强施于人”的习惯。哪一个莱茵人没有和新入口的旧普鲁士官吏打过交道,哪一个莱茵人不对这种无比的狂妄自大、这种到处多管闲事的可耻行径、这种眼光短浅和极端自信的结合、这种横行霸道的行为感到惊讶!诚然,在我们这里,旧普鲁士人先生们的骄气往往很快就受到了挫折;在他们的管辖之下,已经既没有“涅茨同胞”,也没有秘密审判,既没有普鲁士法律,也没有体罚;由于没有体罚,有人甚至悲痛欲绝。但是,正是在波兰,在这个可以肆无忌惮地采取体罚和进行秘密审判的地方,他们究竟是如何进行统治的,我们不说也可以想象得到了。

总而言之,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已经给自己取得了这样一种爱:“早在耶拿战役以后,波兰人的仇恨就已表现为普遍起义和驱逐普鲁士官吏的形式”。因此,官吏的统治暂时停止了。

但是在1815年,这种统治又恢复起来了,只是形式稍微改变了一下。“经过改良的”、“有教养的”、“廉洁的”、“优秀的”官吏,又企图在这些倔强的波兰人那里取得胜利。

“但是就连建立波兹南大公国也未能取得充分的同意,因为……普鲁士国王当时决不能允许个别省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而把自己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变为联盟的国家。”

所以,普鲁士国王,用施滕策尔的话来说,“当时决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和维也纳条约¹⁹²!!

“1830年,波兰贵族对华沙起义的同情引起了忧虑,从那时起就开始实行一个经过周密考虑的政策,这个政策归结起来就是采取一些措施(!),即采取收买、分割波兰领地并把它们分给德国人的办法,来逐步地彻底地消灭波兰贵族,于是波兰贵族对普鲁士的仇恨就增长起来了。”

“采取一些措施!”就是采取禁止把地产拍卖给波兰人的办法,

以及采取施滕策尔先生所竭力渲染的其他类似的措施。

如果普鲁士政府在我们这里也禁止把按照法庭决定应该出卖的地产卖给莱茵省的居民,莱茵省的居民将说些什么呢?这方面的借口是不难找到的:为了使新旧省的居民混合起来,为了把土地分割和莱茵立法的恩惠扩大到旧省居民身上;为了促使莱茵省居民通过移民而在旧省培植自己的工业等等。要使普鲁士“移民”也为我们造福,理由是够多的。我们将怎样看待那些由于完全消除了竞争而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我们的土地、并且还得到国家援助的居民呢?我们将怎样看待那些只是为了使我们习惯于如醉如狂地欢呼“天佑吾王,天佑吾国!”而强行移入的居民呢!

要知道,我们毕竟是德国人,我们和旧省居民讲的是一样的话。而在波兹南,这些移民经常毫不让步地向国有地、向森林、向被分割的波兰贵族领地移动,以便把当地的波兰人和他们的语言撵出他们的故乡,建立一个真正普鲁士的省,这个省在普鲁士狂方面甚至要超过波美拉尼亚。

为了使波兰的普鲁士农民不致没有天然的统治者,接着就给他们派来了特雷斯科夫或吕提晓之流的普鲁士贵族的杰出人物,他们在那里也同样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了波兰贵族的领地,而且用的还是国库贷款。此外,1846年波兰起义¹⁹³以后,在崇高的和最崇高的大人物仁慈的庇护下,柏林成立了一个专为德国贵族收购波兰地产的股份公司。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贵族中的消瘦的食客,预见到对起义的波兰人的审判会使大批波兰地主遭到破产,而他们的地产很快就会廉价出卖。这对那些债务累累的乌刻马克的唐·腊努多¹⁹⁴该是多么好的生财之道啊!差不多是不化钱的肥沃土地,可以供奴役的波兰农民,而且还有为国王和祖国服务的功

劳，——这是多么光辉灿烂的远景啊！

这样就产生了德国人向波兰的第三次移民：普鲁士农民和普鲁士贵族定居于波兹南各地，在政府的支持下抱着明显的目的，他们不仅要使波兹南德国化，而且要使波兹南波美拉尼亚化。如果说波兰的德国小市民还可以有所辩解，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如果说“涅茨同胞”还可以夸耀，说他们开垦了若干沼泽地带，那末，近来普鲁士人的入侵是没有任何遁词的。他们甚至没有始终一贯地实行土地分割，因为普鲁士贵族紧跟着普鲁士农民来到了。

二

科伦 8 月 11 日。在第一篇论文里 ,我们分析了施滕策尔报告中的“历史论证” ,因为他的报告中有些地方涉及革命前波兹南的情况。今天 ,我们要谈谈施滕策尔先生所论述的波兹南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历史。

“对任何不幸者充满同情(这种同情是毫无价值的) 的德国人民 ,始终深切地感到他们的君主对波兰人干下了严重的非正义行为。”

当然 ,他们是以德国人的宁静的心“深切地感到”的 ,在这颗心里 ,感情藏得如此之“深” ,以致从来也没有在行动中表现出来 ! 当然 ,他们曾经通过 1831 年的某些施舍 ,通过宴会和波兰舞会来表示“同情” ,但是事情也只限于跳跳舞来祝福波兰人 ,喝喝香槟酒和唱唱“波兰人还没有灭亡 !”¹⁹⁵的歌罢了。如果真正要做一些重大的事情 ,真正要受一些牺牲 ,那就决不是德国人的事情 !

“德国人诚恳地伸出了友谊之手 ,来补偿他们的君主过去的罪恶。”

当然 ,如果悲天悯人的词句和令人沮丧的废话能够“补偿”什么的话 ,那末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面前都不象德国人那样纯洁。

“但是就在波兰人欢迎德国人(就是握住向他们伸出的友谊之手) 的时候 ,两个民族的利益和目的就不一致了。波兰人只想恢复他们以前的国家 ,至少恢复 1772 年第一次瓜分前的疆界。”

真的,单是那种向来就成为德意志民族性的主要装饰品的无思想、无内容、无目的的热情,就足以使德国人因波兰人的要求而感到茫然!德国人想“补偿”波兰所遭受的非正义行为。这种非正义行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撇开过去的种种叛卖行为不谈,至少是从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开始的。这怎样才能“补偿”呢?只有恢复1772年以前的status quo(局面),或者至少把德国人从1772年起掠夺波兰人的全部东西归还波兰。但是这和德国人的利益有没有矛盾呢?好吧,如果谈到利益,那就根本谈不上“补偿”这一类悲天悯人的话;那你们就得用冷酷无情的实际的口吻讲话,就得抛开宴会上的言词和温厚的感情。

况且,第一,波兰人决不是“只”“想”恢复波兰1772年的疆界。一般说来,波兰人这一次所“想”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他们首先只要求改组整个波兹南,并且只谈到今后如果德国-波兰和俄罗斯发生战争时的可能性问题。

第二,“两个民族的利益和目的不一致”,只是由于革命的德国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上的“利益和目的”仍然和以前专制的德国完全一样。当然,只要德国的“利益和目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同俄国订立同盟,或者至少同俄国和平共处,那末波兰的一切就必须照旧。但是以后我们会看到,德国的真正利益和波兰的利益是多么一致。

施滕策尔先生接着说了一段冗长、混乱和含糊的话,他详细地说明波兰的德国人是如何正确,他们虽然给了波兰应有的报答,但是同时却希望仍然做普鲁士人和德国人。在这里,“虽然”排除了“但是”,“但是”排除了“虽然”,——当然,这和施滕策尔先生是毫无关系的。

这里所以加进这样一段冗长混乱的历史叙述,是因为施滕策尔先生企图以此来详尽地证明:在“两个民族的利益和目的不一致”因而使相互间的仇恨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流血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德国人坚持“民族的”利益,波兰人则坚持纯粹“领土的”利益。这就是说,德国人要求按民族来瓜分大公国,波兰人则竭力争取他们以前的一切地区都归自己。

这又不合乎事实,因为波兰人只要求改组,并且声明他们完全同意让出那些德国居民占大多数而且愿意归并到德国去的民族杂居的边境地区。不过不应该由普鲁士官吏随便把居民变为德国人或波兰人,而应该给他们表示自己的意志的机会。

施滕策尔先生继续说:由于(虚构的,根本不存在的)波兰人反对让出德国居民占大多数的地区,维利森的使命自然遭到了失败。施滕策尔先生手头有维利森对波兰人的声明和波兰人对维利森的声明。这些已经公布的声明证明情况恰恰相反。但是,一个如施滕策尔先生所说的“多年研究历史并且立志永远不说假话,永远不隐瞒真相的人”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施滕策尔先生怀着这种永远不隐瞒真相的诚实精神,轻轻地放过了在波兹南横行无忌的残暴行为,放过了背信弃义地撕毁雅罗斯拉韦茨协定¹⁹⁶的无耻行径,放过了在特舍美什诺、米洛斯拉弗和弗勒申的屠杀,放过了只有三十年战争中的兵痞们才干得出来的毁灭一切的暴行,他对这些事情竟只字未提。

施滕策尔先生现在谈到普鲁士政府4次重新瓜分波兰的问题。最初是夺取涅茨区和其他4个区(4月14日);再加上总人口

波兰称作弗热斯尼亚。——编者注

为 593 390 人的其他各区的若干部分,并将这全部地区并入德意志联邦(4月22日)。随后是夺取波兹南城和波兹南要塞以及瓦尔特河左岸的剩余部分,——因此又有 273 500 人,就是说,和上述数字合计,要比居住于整个波兹南的德国人(即使按普鲁士的统计)多出一倍。这是按照 4月29日的诏书进行的,而 5月2日已经接收入德意志联邦了。施滕策尔先生眼泪汪汪地要议会相信,波兹南这个重要而强大的要塞留在德国人手中是多么必要,因为居住在这里的有 2 万以上的德国人(其中大多数是波兰的犹太人),他们拥有全部地产的 $\frac{2}{3}$ 等等。至于波兹南四周都是波兰的土地,它被迫实行德国化,波兰的犹太人根本不是德国人等等情况,对于“永远不说假话,永远不隐瞒真相”的人们,即对于施滕策尔先生之流的历史学家们是毫不相干的。

这样,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波兹南是决不能放弃的。既然照维利森的说法,建筑这个要塞是战略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那就可以毁掉这个要塞,而去加强布勒斯劳。但是加强波兹南要塞曾经花了 1 000 万(这又不合乎事实,恐怕连 500 万也不到),自然,把这个珍贵的艺术品留在手里,同时占领 20 至 30 平方英里的波兰土地,是更有利的。

如果已经控制波兹南“城和要塞”,自然就给夺取更多的地方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施滕策尔先生带着得意的微笑继续说道:“但是要保住要塞,就必须保证从格洛高、尤斯特林和托恩到要塞的通路,并且也必须保证从要塞通往东方的要塞区(只要前进 1 000 至 2 000 步就完全够了,如象马斯特里赫特要塞

即佛罗茨拉夫。——编者注

即格洛古夫、科斯特森和托伦。——编者注

区到比利时和灵堡的距离那样)。这样,同时就能够保证毫无阻碍地控制勃罗姆堡运河,而波兰居民占绝大多数的大批地区也不得不并入德意志联邦。”

正是根据这些理由,著名的硝酸银普富尔——这位人类保护者对波兰进行了两次新的瓜分,从而满足了施滕策尔先生的一切愿望,把整个大公国^{3/4}的地区并入了德国。施滕策尔先生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承认这种举动,因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看到这个路易十四的“归并议会”¹⁹⁷的再版(而且更胜一筹)是德国人已经学会从历史教训中取得教益的明证。

施滕策尔先生认为波兰人应该引以自慰的是,留给他们的土地比被归并地区的土地肥沃;他们的地产比德国人的地产少得多;“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都不会否认,波兰农民感到自己在德国政府管辖下要比德国人在波兰政府管辖下好过得多”!!历史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施滕策尔先生在结束时要波兰人相信,留给他们的那一小块土地对他们是足够的,同时向他们呼吁,要他们养成公民的一切美德,从而

“很好地准备走向现在还被未来的帷幕遮住的那个时刻,走向他们企图用最正当的也许是非常热烈的方式促其到来的那个时刻。他们的一位最有远见的同国籍的人说得很中肯:有一种王冠也能激起你的功名心,这就是公民的王冠!德国人可以添上两句:这顶王冠虽然不是光辉灿烂的,但它却是更值得重视的!”

“它是更值得重视的!”可是普鲁士政府4次重新瓜分波兰的真正原因还“更值得重视”。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见注释 63。——译者注

善良的德国人！你以为进行这几次瓜分是为了把你的德国同胞从波兰统治下拯救出来吗？是为了用波兹南要塞来保护你不受一切侵犯吗？是为了保护尤斯特林、格洛高和勃罗姆堡的通路或涅茨运河吗？多么错误的想法！

他们可耻地欺骗了你。他们几次重新瓜分波兰，不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而只是为了充实普鲁士的国库。

1815年以前对波兰的最初几次瓜分是武装掠夺领土；1848年的瓜分是盗窃。

善良的德国人，现在来看一看他们怎样欺骗了你！

在第三次瓜分波兰以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为了国家的利益，没收了波兰官方的领地和天主教僧侣的领地。正如1796年3月28日没收领地的公告中所说的那样，教会的领地是“全部地产中最大的部分”。这些新的领地由国王管辖或者把它们出租，这些新的领地是这样大，要加以管辖，就必须建立34个国有地管理区和21个林业总管理处。每一个国有地管理区管辖很多村庄，例如勃罗姆堡区的10个管理区共管辖636个村庄，而单是一个莫吉尔诺管理区就管辖了127个村庄。

此外，在1796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还没收了奥文斯克的一个女修道院的领地和森林，并把它们卖给商人冯·特雷斯科夫（特雷斯科夫的祖先是最后一次英勇战争¹⁹⁸中普鲁士军队的勇猛的首领）；这些领地共有24个有磨坊的村庄和2万摩尔根森林，价值至少也有100万塔勒。

以后，在1819年，又把至少值200万塔勒的克罗托申、罗兹德

即贝德哥什。——编者注

腊热夫、奥尔皮舍夫和阿德璠 这几个国有地管理区让给图尔恩-翁特-塔克西斯公爵,作为对他让出他在某些并入普鲁士的省份中的邮务特权的补偿。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把所有这些领地攫为己有,似乎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它们。但是这些领地,即波兰民族的财产,却被分赠了,让与了,出卖了,而由此所得的钱流到普鲁士的国库中去了。

格涅兹诺、斯科仁琴、特舍美什诺等国有地也被瓜分和出卖了。

这样,普鲁士政府手中还剩下 27 个国有地管理区和林业总管理处,总值至少有 2 000 万塔勒。我们准备用手中的地图来证明所有这些领地和森林,除了极少数例外,甚至毫无例外,都在波兹南被归并的地区内。为了把这个无价之宝拯救出来,而且无论如何也不再归还波兰民族,就必须把它归入德意志联邦;但是因为它自己不能到德意志联邦来,所以德意志联邦就得到它那里去,于是波兹南³/₄的土地就被并入德意志联邦了。

在两个月期间对波兰进行的 4 次有名的瓜分,其真正原因就是这样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某一民族的要求,也不是所谓战略上的考虑;占有领地的愿望和普鲁士政府的贪心,——这就是确定边界的唯一根据。

正当德国市民们因捏造的他们可怜的同胞在波兹南遭受苦难而悲痛欲绝的时候,正当他们热烈地希望保障德国东部边境的安全的时候,正当他们因听到捏造的关于波兰人惨无人道的消息而对波兰人深恶痛绝的时候,普鲁士政府却偷偷摸摸地行动起来,干

即奥多利亚努夫。——编者注

出了它的卑鄙勾当。可见德国人的无根据的盲目热情，仅仅适用于掩饰现代历史上最卑鄙的行为。

善良的德国人，这就是你的负责任的大臣们对你所开的玩笑！

但是，实际上你事先也能够知道这一点。凡是有汉泽曼先生参加的地方，那里的问题就决不会是德意志民族和军事需要的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谈，而总是关于现款和利润的问题。

三

科伦 8 月 19 日。我们已经详细分析了作为辩论基础的施滕策尔先生的报告。我们已经指出他如何伪造波兰现代的和更早的历史以及德国人在波兰的历史 ;他如何歪曲全部问题 ;历史学家施滕策尔不仅有意颠倒是非 ,而且暴露了自己鲁莽无知。

在谈到辩论本身之前 ,我们还要粗略地探讨一下波兰问题。

单独地提出波兹南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是无法获得解决的。它只是波兰问题的一部分 ,只能和波兰问题联系起来 ,同波兰问题一起解决。只有当波兰重新存在的时候 ,德国和波兰之间的边界才能确定。

但是波兰能不能重新存在 ,会不会重新存在呢 ?在讨论中这个问题被否定了。

法国一个历史学家说过 :il y a des peuples nécessaires—— 现时存在的都是不可缺少的民族。波兰民族无疑是在 19 世纪这些不可缺少的民族之列的。

然而正是对我们德国人来说 ,波兰的民族生存比对任何人都更有必要。

从 1815 年开始 ,某些方面甚至从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开始的欧洲反动势力 ,首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建立在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神圣同盟的基础上。而这个同盟是靠什么结成的呢 ?靠瓜分波兰 ,这 3 个同盟者从瓜分波兰中取得了利益。

这3个强国对波兰进行的瓜分的路线,乃是一根把它们互相连结起来的链条,共同的掠夺用团结的纽带把它们联系起来了。

从第一次掠夺波兰时起,德国就陷于依赖俄国的地位。俄国命令普鲁士和奥地利保持君主专制政体,普鲁士和奥地利必须服从。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为自己争取统治地位的那种本来就软弱无力的意图,由于不可能摆脱俄国,由于俄国支持普鲁士的封建专制阶级而落空了。

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从三个同盟国最初企图征服波兰的时候起,波兰人就不仅举行起义来争取自己的独立,同时还进行革命活动来反对本国的社会制度。

瓜分波兰之所以能够实现,是由于波兰大封建贵族和参加瓜分波兰的3个强国结成联盟。正如前诗人约丹先生所断言的,这个联盟根本不是进步的;它是大贵族摆脱革命的最后手段,它彻头彻尾是反动的。

第一次瓜分波兰的结果,波兰其他各阶级,即小贵族、城市市民和一部分农民结成了联盟,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个同盟既反对波兰的压迫者,也反对本国的大贵族,1791年的宪法¹⁹⁹证明,波兰人在那时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他们的独立是和推翻大贵族阶级和国内的土地改革根本分不开的。

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各个大农业国家,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摆脱宗法封建的野蛮状态,才能把农奴制的或劳役制的〔*frohnpflichtigen*〕农民变为自由的农民,这个革命和1789年法国农村中的革命完全相似。波兰民族是邻近的农业民族中首先宣布实行这个革命的民族,这是它的功绩。1791年的宪法,是改革的第一次尝试;1830年起义时,列列韦尔宣布土地革命是救国的唯一

方法,但是议会对这一点承认得太迟了;1846年和1848年起义时,曾公开宣布实行土地革命。

波兰人从被奴役的那一天起,就起来革命,从而使自己的奴役者更牢固地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他们迫使自己的压迫者不仅在波兰,而且在本国保持宗法封建制度。特别是从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时起,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而争取土地民主制(东欧民主制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的斗争。

由此可见,只要我们还在帮助压迫波兰,只要我们还把波兰的一部分拴在德国身上,我们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我们在国内就不能彻底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

建立波兰国家和调整波兰与德国的边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革命以来东欧所发生的一切政治问题中最容易解决的问题。散居和杂居在喀尔巴阡山以南的种族庞杂的各个民族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比起波兰争取独立的斗争和确定波兰与德国的边界问题来,要复杂得多,要以更多的鲜血作代价,要引起更多的纷争和内战。

不言而喻,问题不是要建立一个虚幻的波兰,而是要建立一个有生命力基础的国家。波兰至少应该拥有1772年时代的领土,它不仅应该管辖本国各大河流经过的地区,而且应该管辖各大河流的出口地带以及广大的沿海地带,至少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带。

如果德国在革命以后,为了自己的利益,有勇气拿起武器去要求俄国放弃波兰,它就可以保证波兰实现上述一切,同时也就保卫了自己的利益和荣誉。至于德国居民和波兰居民在边境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杂居的问题,双方应该互相作某种让步;某些德国人会

成为波兰人,而某些波兰人也会成为德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但是德国经过不彻底的革命,并没有找到勇气来采取这样坚决的行动。发表一些关于解放波兰的华而不实的演说,在火车站上欢迎来往的波兰人并对他们表示德国人民最热烈的同情(有谁没有被这种同情纠缠过呢?),——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至于同俄国开战,使整个欧洲的均势受到威胁,最后,退还掠夺来的某一小块土地,——如果期望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太不了解我们德国人了!

对俄国作战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俄国作战就是真正同我们过去可耻的一切进行彻底的公开的决裂,就是真正解放和统一德国,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以及在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基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对俄国作战是在对我们的斯拉夫邻邦特别是对波兰的关系上挽救我们的荣誉和利益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然而我们是市侩,而且始终是市侩。我们举行过好几打大大小小的革命,可是革命还没有完成,而自己就先害怕起来了。在我们大肆吹嘘以后,我们完全没有贯彻到底。革命没有使我们的眼界扩大,反而使它缩小了。在讨论一切问题的时候,那种最怯懦、最狭隘、最肤浅的庸俗见解就表现出来了,而我们的一切真正的利益当然又遭到了损害。从这种打小算盘的庸俗见解出发,解放波兰的大问题自然就归结为改组波兹南省的一部分地区的无谓的空谈,而我们对波兰人的热情也就变成了榴霰弹和硝酸银。

我们再重复一遍:对俄国作战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唯一能够保卫德国的荣誉和利益的办法。既然不敢进行这种战争,就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柏林被击溃的反动军阀在波兹南重新抬头,他

们在挽救德国的荣誉和民族利益的幌子下举起反革命的旗帜，镇压我们的同盟者，革命的波兰人，——在这个时刻，被愚弄的德国居然向它的胜利的敌人热烈致敬。重新瓜分波兰已经完成了，所差的只是德国国民议会的批准了。

要挽救这个问题，法兰克福议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否认整个波兹南属于德意志联邦，并且声明，在有可能同复兴的波兰进行 *d'égale à égal* [平等的] 谈判以前，边界问题是有讨论的余地的。

不过，这未免对我们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教授、律师和牧师们提出过多的要求了！诱惑力是非常之大的：他们，从来没有闻过火药味的和平的市民们，应该通过简单的投票方式为德国夺取 500 平方英里的地区，兼并 80 万“涅茨同胞”、波兰的德国人、犹太人和波兰人，虽然这是损害了德国的荣誉和真正的长远的利益的。多么大的诱惑！他们屈服了，批准了瓜分波兰。

根据一些什么理由，我们明天就会见分晓。

四

科伦 8 月 21 日。我们现在把波兹南议员应否参加讨论和表决这个先决问题放在一边，而直接谈谈关于主要问题的辩论。

开始辩论时，施滕策尔先生以报告人的资格发表了一篇非常混乱、非常含糊的演说。他俨然以历史学家和正人君子的姿态出现，谈到要塞和战壕，谈到善与恶，谈到同情心和德国人的心情，他追溯 11 世纪的情况，来证明波兰的小贵族从来就是压迫农民的；他利用波兰历史上极有限的一些事实，来为他的滔滔不绝的关于小贵族、农民、城市、君主专制政体的善行等等最肤浅最一般的议论作辩护；他证明瓜分波兰是正确的，但是每句话都吞吞吐吐，支吾其词；他乱七八糟地叙述了 1791 年 5 月 3 日的宪法原理，使本来就不知道这个宪法的议员，现在更莫名其妙了；他还打算把谈锋转到华沙大公国，但是他的话立刻被“扯得太远了！”的高叫声和主席的指责打断了。

弄得狼狈不堪的大历史学家用下面这些动人的话来继续他的发言：

“我说得简单一点吧。现在要问：我们打算做什么？这是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简直是！）。小贵族想恢复波兰国家。他们肯定地说，这个国家将是民主的。我不怀疑他们是真正这样想的。但是，诸位先生，其他各阶层自然（！）也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幻想。我完全相信他们的真诚，可是如果说公爵和伯爵

必须同人民融合起来,那我就不知道这种融合是如何发生的(这和施滕策尔先生有何相干!)。在波兰,这是不可能的”等等。

施滕策尔先生把问题说成这样:仿佛在波兰,小贵族和大贵族实质上是一样的。施滕策尔先生自己也引用过的列列韦尔的“波兰史”,以及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争论”²⁰⁰,还有其他许多现代著作,也许能把“多年来研究历史的人”教得聪明一些。施滕策尔先生所说的大多数“公爵和伯爵”,恰恰是波兰民主派斗争的对象。

因此,施滕策尔先生认为,必须把小贵族和他们的一切幻想抛开,另外创立一个农民的波兰(把波兰一部分一部分地并入德国)。

“最好是向贫苦农民伸出手去,让他们日益强国,使他们或许(!)能够创立自由的波兰,不仅能够创立,而且能够保持。先生们,这就是主要的任务!”

在中间派两翼²⁰¹的民族主义空谈家的“很好!”、“好极了!”的欢呼声中,为胜利所陶醉的历史学家离开了讲台。把重新瓜分波兰说成是对波兰农民的善行——这种荒谬绝伦的颠倒是非的伎俩,当然会使国民议会中充满善心和博爱的一群中间派感激涕零!

走上讲台的是从克罗托申来的果登,他是波兰的真正的德国人。在他之后发言的是从伊诺弗罗茨拉夫来的曾弗,这是“涅茨同胞”的极好的典型,他不会干任何欺骗勾当,他在报名发言时说要反对委员会的提案,而在发言时却赞成这个提案。由于这种欺骗方式,有一个要发言反对提案的人没有轮到发言。

“涅茨同胞”在国民议会中发言的手法是世界上最可笑的喜剧,它再一次表明真正的普鲁士人能够干些什么。大家知道,波兹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南那些自私自利的犹太普鲁士小人是同官僚,同普鲁士王国军官,同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地主,总而言之,同旧普鲁士的一切反动势力最紧密地团结起来,肩并肩地反对波兰人的。对波兰的叛卖是反革命的第一次断然措施,当时表现得最反动的正是“涅茨同胞”先生。

现在请看一看热爱普鲁士、以“天佑吾王,天佑吾国!”为口号的学校教师和官吏;请欣赏一下他们如何在这里,在法兰克福发言,强词夺理地把他们对波兰民主派的反革命的叛卖行为说成是革命,是为了有主权的“涅茨同胞”而进行的实际的真正的革命;他们如何蹂躏历史权利,并且在似乎已经死亡的波兰面前宣布:“只有活人才有权利”!

但普鲁士人就真是这样:在斯普列伊是“上帝的子民”,在华尔特是有主权的人民;在斯普列伊是平民的骚动,在华尔特是革命;在斯普列伊是“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权利”,在华尔特是填写了昨天日期的具体事实的权利,——虽然如此,诚实的普鲁士人的心情是毫不虚伪的,是正直而高尚的!

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果登先生的话:

“我们不得不再度捍卫那个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对我们祖国孕育着如此重大的后果的事业,即使这个事业本身在我们看来不完全是正义的(!),但是由于必要,我们也应该使它成为正义的(!!)。我们的权利与其说是根源于过去,不如说是根源于现代跳动很快的脉搏(更确切些说,是枪托的殴打)。”

“波兰的农民和市民,由于归并到别国(普鲁士),感到自己是处在前所未有的安全和幸福的状态(特别是从波普战争和瓜分波兰的时候起)。”

见本卷第 416 页。——编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因瓜分波兰而发生的违反正义的行为,已经由你们(德国的)人民的仁慈(特别是普鲁士官吏的笞杖),由他们的勤劳(在被掠夺和被分赠的波兰的土地上),并在今年4月间由他们的鲜血全补偿了!”

从克罗托申来的果登先生的鲜血!

“革命,这就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是根据这个权利到这里来的!”

“变成黄色的羊皮纸,现在已经不能作为证明我们加入德国的合法性的文件了,我们不是作为嫁妆或遗产、不是通过购买或交换加入德国的,我们是德国人,我们属于我们的祖国,因此,合理的、合法的、自主的意志鼓励我们这样做,这种意志是由我们的地理环境、我们的语言和习俗、我们的人数(!)、我们的财产,首先是由我们的德国的思想方法和对祖国的热爱决定的。”

“我们的权利是这样无可争辩,它在现代世界观上扎下的根子是这样深,即使不具有德国人的心情,也一定会承认它。”

普鲁士犹太人的“涅茨同胞”所具有的建立在“现代世界观”基础上的、依靠榴霰弹“革命”的、从战地现实生活的“跳动很快的脉搏”中产生的“自主的意志”万岁! 领取巨薪的波兹南官吏的德国精神、掠夺教会领地和官方领地的德国精神、弗洛特韦尔 ala(式的)货币贷款的德国精神万岁!

继大言不惭地高谈最高权利的骑士之后发言的是既不知羞耻也没有良心的“涅茨同胞”。在伊诺弗罗茨拉夫的曾弗先生看来,连施滕策尔的提案对波兰人也还是太客气了,因此他建议采取某种较强硬的措词。曾弗先生以此为借口,厚颜无耻地以委员会提案的反对者的资格报名发言,他同样厚颜无耻地声称,取消波兹南人的表决权是极不公平的:

“我认为正是波兹南的代表负有参加表决的使命,因为这里讨论的恰恰是派我们到这里来的那些人的最重要的权利问题。”

曾弗先生接着谈到第一次瓜分以来的波兰历史,他用许多有意歪曲和无中生有的材料来充实这部历史,同他比较起来,施滕策尔先生倒成了最渺小的拙劣的作者了。波兹南所有一切勉强过得去的事情,都应该饮水思源,感谢普鲁士政府和“涅茨同胞”。

“华沙大公国产生了。普鲁士官吏的位置被波兰人占据了,到1814年,普鲁士政府为这几个省所做的一切好事,几乎连痕迹都看不见了。”

曾弗先生说得对。无论是农奴身分,无论是波兰各州预算对普鲁士学校(例如对哈雷城的大学)的拨款,无论是懂波兰语言的普鲁士官吏的敲诈勒索和残暴行为,“连痕迹都看不见了”。但是波兰还没有灭亡,因为承俄国的眷顾,普鲁士又兴盛起来了,而波兹南也重归普鲁士了。

“从那时候起,普鲁士政府又竭力改善波兹南省的状况了。”

谁想知道这方面的详细情形,不妨读一读1841年弗洛特韦尔的备忘录²⁰²。在1830年以前,政府什么也没有做。在整个大公国里,弗洛特韦尔只发现4英里的公路!可是要不要列举一下弗洛特韦尔本人的善行呢?弗洛特韦尔先生这个狡猾的官僚,竭力用修筑公路、开辟运河、疏浚沼泽积水等等办法来收买波兰人,不过他不是用普鲁士政府的金钱,而是用波兰人自己的金钱来收买他们。这些改良主要是用私人的资金或各州的经费来进行的,如果说政府也曾为某些地方拨过一些补助金,那也不过是它以征税办法从省里搜刮来的或者以收入形式从波兰官方领地和教会领地取得的那个总额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其次,波兰人应当感谢弗洛特韦尔先生,这不仅是因为继续停止(从1826年起)各州州长的选举,而且特别是因为政府用收购被拍卖的领地并将其仅仅转卖给可信赖的

德国人(1833年的圣旨)的办法,来逐渐剥夺波兰地主的土地。弗洛特韦尔治下的最后一件善行是学校的改良。但这又是一种普鲁士化的措施。中等学校必须在普鲁士教师的帮助下使贵族青年和未来的天主教牧师普鲁士化,初级学校则是使农民子弟普鲁士化。关于学校的实质,勃罗姆堡区督察员瓦拉赫先生不知怎么在坦率直言时泄露出来了;有一次他写信给总督博伊尔曼先生说,波兰语是在农村居民中普及教育和推广福利事业的主要障碍!既然教师不懂波兰语,事情当然是这样。但是这些学校的经费是由谁负担的呢?仍然由波兰人自己负担,因为第一,多数最重要的但不是专门为普鲁士化这一目的服务的专科学校,是靠私人出钱或靠各省等级会议的经费创办和维持的;第二,即使是为了普鲁士化而创办的学校,也是靠1833年3月31日收归国有的寺院的收入来维持的,国库拨发的经费,在10年内每年只有21000塔勒。

不过,弗洛特韦尔先生也承认,一切改革都出自波兰人自己。而普鲁士政府的最大善行,就在于搜刮高额地租和征收重税,利用青年为普鲁士服兵役,——关于这一点,弗洛特韦尔先生也和曾弗先生一样,绝口不谈。

简单说来,普鲁士政府的一切善行,归结起来就是在波兹南安安置普鲁士的下级军官,不管是做教官还是做教师,也不管是做宪兵还是做税吏。

我们不能详细分析曾弗先生对波兰人的一些无根据的猜疑和不确实的统计资料了。显然,曾弗先生说话的唯一目的是要激起议会会对波兰人的仇恨。

接着发言的是罗伯特·勃鲁姆。他照例要发表所谓冠冕堂皇的演说,这种演说感情多于论证,而夸张又多于感情,不过,老实

说,这种练习朗诵的演说不会比克罗托申的果登先生的“现代世界观”产生更大的效果。波兰是反对北方野蛮行为的藩篱……,如果波兰人有某些缺点,那是他们的压迫者的罪过……,老加格恩把瓜分波兰叫做威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恶梦……,波兰人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不妨把他们当作榜样……,危险是从俄国方面来的……如果红色共和国在巴黎取得胜利,并且打算以武力解放波兰,诸位先生,那时候将怎么办?……我们将不偏不倚,等等,等等。

我们对勃鲁姆先生表示同情,但是如果从所有这些绝妙的议论中删去夸张的华而不实的词句,那末除了最庸俗的废话——纵然是(但愿如此)范围很广、说得很高明的废话——而外,就没有剩下什么了。勃鲁姆先生认为,如果国民议会愿意始终如一,就应该用对待波兹南的原则去对待什列斯维希、波希米亚、意大利的提罗耳、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亚尔萨斯;即使是这样一个论据,也只有在和多数派的荒谬绝伦的民族主义谎言和习以为常的不彻底性作对比时才能说是正确的。如果他断言德国只有同已经存在的波兰打交道,才能很好地进行关于波兹南问题的谈判,那我们也不否认这一点;但还是应该指出,他的演说中这个唯一中肯的论据,已经由波兰人自己几百次地发挥过了,而且发挥得非常好,而在勃鲁姆先生的嘴里,这种论据就象修辞学上的一枝钝箭,这枝箭“本着中庸之道和宽大为怀的精神”,徒劳无益地射到多数派石头一样的胸膛上去。

勃鲁姆先生说榴霰弹不能作为理由,这是对的;但是他不偏不倚地站在更高的“中庸”立场上,那就不对了,并且他自己也知道是不对的。如果说勃鲁姆先生不能认清波兰问题的实质,那是他自己

的过错。而勃鲁姆先生最糟糕的是：第一，希望争取多数派，由多数派要求中央政权至少作一个报告；第二，指望通过中央政权的那些在8月6日极其可耻地屈从于普鲁士最高统率权欲望²⁰³的大臣的报告，占得一些便宜，哪怕是最小的便宜。如果想做“极左派”，首先就应该把宽大为怀的精神抛在一边，并且不要指望从多数派那里得到什么东西，即使是最不足道的东西。

一般说来，差不多所有的左派，在波兰问题上也象在平常一样，沉溺于夸张甚至沉溺于荒诞的幻想，毫不触及实际材料和问题的实质。可是恰好在这里，材料是这样丰富，事实是这样明显。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研究问题，但是很明显，不这样做也行，因为既然已经通过了选举的涤罪所，就不必再对任何人负责了。

对于少数例外，我们在阐述辩论过程的时候还要回过头来谈谈。明天我们要简略地谈谈威廉·约丹先生，他决不是例外，而这一次，由于明显的原因，他简直是随波逐流了。

五

科伦 8 月 25 日。谢天谢地 , 我们终于离开了每天弥漫着空谈的多沙的平原 , 走上了阿尔卑斯的大辩论的高地 ! 我们终于攀登到白云笼罩的顶峰。鹰在这儿营巢 , 人在这儿和神直接见面 , 并且从这儿以蔑视的眼色 , 望着那些老远老远地在下面蠢动的可怜的小人物 , 望着他们用人类的平凡智慧的贫乏论据互相搏战。在某一个勃鲁姆同某一个施滕策尔、某一个果登和某一个伊诺弗罗茨拉夫的曾弗搏斗以后 , 大会战终于开始了 , 在这场会战中 , 阿里欧斯托式的英雄们的唇枪舌剑的碎片布满了战场 !

战士们的队伍恭敬地让开道路 , 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挥舞着宝剑一跃向前。

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

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在德国文艺活动的黄金时代是科尼斯堡的文学家。那个时候 , 常在“桶匠大院”中举行半公开的会议 ; 威廉·约丹先生参加过这种会议 , 在会议上朗诵过“水手和他的上帝”那篇长诗 , 并因此而被驱逐。

于是这位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就前往柏林。柏林的大学生常常举行会议。威廉·约丹先生在会议上朗诵过“水手和他的上帝”那篇长诗 , 并因此而被驱逐。

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于是前往莱比锡。莱比锡也举行过一些没有害处的会议。威廉·约丹先生朗诵过“水手和他的上

帝”那篇长诗,并因此而被驱逐。

以后,威廉·约丹先生出版了很多著作:长诗“钟和炮”,立陶宛民歌集(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创作,即他本人所编写的波兰诗歌),乔治·桑的作品的译文,一种杂志——不可理解的“可理解的世界”²⁰⁴,以及使遐迩闻名的奥托·维干德(他还没有他的法国祖师巴涅尔那样大的成就)有利可图的其他译著;随后,他又出版了列列韦尔的“波兰史”译本,并写了一篇向波兰人表示亲善的序言等等。

革命爆发了。En un lugar de la Mancha cuyo nombre no quiero acordarme,在德国的曼彻即勃兰登堡部落的一个地方,在唐·吉诃德们生长的那个地方,在一个连名称都不值得一提的地方,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提出自己为德国国民议会的候选人。这个地区的农民对君主立宪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威廉·约丹先生发表了很多动人心弦的、充满了最乐观的立宪精神的演说。心花怒放的农民选举了这个大人物做议员。这位高贵的“无责任心的”议员一到法兰克福,就坐在“极”左派的席位上,和共和派一起表决。以选民身分创造了这个议会中的唐·吉诃德的农民曾经寄信给他表示不信任,要他回忆他的诺言,要把他召回。可是威廉·约丹先生也象国王一样,很少认为自己应受诺言的约束,一有适当的机会,总是用他的“钟和炮”使议会震耳欲聋。

威廉·约丹先生每次走上圣保罗教堂²⁰⁵的讲台,实际上只是朗诵“水手和他的上帝”那篇长诗,但这并不是说,他因此就应该被驱逐。

拉·曼彻地方有一个乡村,它的名称根本不值得一提(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的开头第一句话)。——编者注

我们现在来听一听伟大的威廉·约丹最近就波兰问题发出的钟声和炮声。

“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应该提高到世界历史观点的水平,应该从这一观点来研究波兹南问题这个波兰大悲剧的插曲。”

强壮的威廉·约丹先生一下子就把我们高举到云端,高举到白雪皑皑、直冲霄汉的“世界历史观点”的秦波拉索,于是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望无际的远景。

但是在这以前,他还花了一些时间从事平凡的“专门”讨论,而且很成功。这里是几个例子:

“后来,根据华沙条约(即根据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涅茨地区归普鲁士所有,从那时候起,如果不算昙花一现的华沙大公国这一段时间,它一直是属于普鲁士的。”

约丹先生在这里把涅茨地区和波兹南其他地区对立起来了。他,这位世界历史观点的骑士、波兰历史的专家、列列韦尔著作的译者,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材料的呢?正是从伊诺弗罗茨拉夫的曾弗先生的演说中得到的。他这样严格地遵循曾弗先生的演说,甚至完全忘记了波兹南的其他部分即大波兰部分在1794年就已“归普鲁士所有,从那时候起,如果不算昙花一现的华沙大公国这一段时间,它一直是属于普鲁士的”。但是“涅茨同胞”曾弗没有谈到这一点,因此,“世界历史观点”只知道波兹南地区仅仅在1815年才“归普鲁士所有”。

“其次,西部各州——比恩鲍姆州、梅泽里茨州、博姆斯特州、弗劳施塔特

秦波拉索是南美厄瓜多尔的火山,海拔6272公尺。——译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州——从这些城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按其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

但是门兹胡德州也是这样吗,约丹先生?——“从这个州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按其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自古以来就是波兰的”吗?

不过,门兹胡德也就是比恩鲍姆州。用波兰话来说,这个城市就叫做门兹胡德。

这一个“可理解的世界”的“世界历史观点”的语源学“古玩陈列室”,会从基督教德意志的利奥先生那里得到多大的支持!不消说,Mailand, Lüttich, Genf, Kopenhagen “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可是“世界历史观点”是否“从名称上就已”看出海孟斯-艾希赫、维尔斯-来登、耶纳乌和加尔天菲尔德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呢?当然,世界历史观点是很难在地图上找到这些自古以来的德国名称的,当它知道这些名称指的就是勒-克纳乌、里昂、热那亚和康波-弗列多的时候,它自然只有感谢杜撰了这些名称的利奥先生。

如果法国人在最近宣布Cologne, Coblenz, Mayence和Francfort自古以来就是法国的领土,那么世界历史观点将怎么说呢?那将是世界历史观点的不幸!

可是我们准备在更伟大的人物也要碰到的 *petites misères de la vie humaine* (人类生活中的渺小的不幸) 上面耽搁了。我们现在要跟着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飞到更高的地方去。我们在那

波兰称作:门兹胡德、门兹热奇、巴比莫斯特、弗斯霍瓦。——编者注

米兰、列日、日内瓦、哥本哈根的德文名字。——编者注

科伦、科布伦茨、美因兹和法兰克福的法文名字。——编者注

里会听到说：“和波兰人越疏远，对波兰人了解得越少，就越爱波兰人；反之，和波兰人越接近，就越不爱”波兰人，因此，“这种同情”的基础“与其说是对波兰性格的真正赞美，不如说是某种世界主义的唯心主义”。

但是地球上各民族对其他某个民族，无论在“同它疏远”的时候，或是在“同它接近”的时候都不“爱”它，世界历史观点对此将作何解释呢？地球上各民族空前一致地鄙视、利用、讥笑和凌辱这个民族，“世界历史观点”对此又作何解释呢？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民族。

世界历史观点会告诉我们：这是建立在“世界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就这样摆脱了困境。

不过，全世界历史的鹰并没有因为这一类小小的异议而感到难堪，它越飞越勇敢，越飞越高，最后，一直飞到自在自为思想的纯以太中，大唱英勇的、全世界历史的黑格尔学派的如下颂歌：

“让人们给历史以应有的报赏吧，历史在它的为必然性所注定的道路上，总是用铁蹄无情地践踏那个在同等民族中间已经无力支持的民族，但是看到这个民族所受的长期苦难而不表示任何同情，毕竟是残忍的和野蛮的，我决不能这样冷酷无情（上帝会奖赏你的，高贵的约丹！）。可是，被悲剧所感动是一回事，想使悲剧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是另一回事。要知道，仅仅那个使英雄屈服的铁的必然性，就能把他的命运变为真正的悲剧；而要干预这个命运的行程，想用人类的同情来阻止正在转动的历史车轮，并且还要把它倒转过来，这就意味着他本身会遭到压死的危险。希望波兰复兴，仅仅是因为它的灭亡引起了正义的哀痛，——我把这叫做怯懦的感伤。”

多么丰富的思想！多么深湛的智慧！多么动人的言词！世界

历史观点后来整理自己的演说速记记录时这样说。

波兰人必须选择：如果他们想表演“真正的悲剧”，那末他们就应该驯顺地让铁蹄和正在转动的历史车轮来蹂躏自己，同时告诉尼古拉：“陛下，服从你的意志”！或者，如果他们想起来造反，想试一试能否用“历史的铁蹄”来痛击自己的压迫者，那末他们就不表演任何“真正的悲剧”，而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对他们就不会再感到兴趣。在罗生克兰茨教授那里受过美学教育的世界历史观点这样说。

暂时把波兰消灭了的那个铁面无情的铁的必然性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小贵族民主制的崩溃，也就是大贵族在小贵族内部的产生。这是前进的一步，因为它是摆脱过时的小贵族民主制的唯一途径。但它的后果是什么呢？是历史的铁蹄即东方的3个专制君主粉碎了波兰。大贵族为了要消灭小贵族民主制，不得不和外国结成同盟。波兰的大贵族在不久以前，有一部分一直到今天，还是波兰压迫者的忠实同盟者。

使波兰恢复自由的那个铁面无情的铁的必然性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从1815年起在波兰，至少在波兹南和加里西亚，甚至在一部分俄属波兰没有中断过的大贵族统治，现在也象1772年的小贵族民主制那样垮台了；这就是土地民主制的建立对波兰来说不仅是迫切的政治问题，而且是迫切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如果农奴制的或“有义务”[robotpflichtige]的农民不能成为自由的农民，那末波兰人民赖以生存的农业就要毁灭；最后，这就是如果不同时获得独立的民族生存，不占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波兰各河流的出口地带，实行土地革命是不可能的。

从柏林来的约丹先生却把这说成是想阻止正在转动的历史车

轮,并且还要把它倒转过来!

当然,小贵族民主制的旧波兰早已死亡了并被埋葬了,只有约丹先生才能指望什么人来使这个波兰的“真正悲剧”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个悲剧的“主角”却生了一个强壮的儿子,仔细地认识一下这个儿子,的确会使某个目空一切的柏林文学家胆颤心惊。这个儿子刚刚在准备演自己的戏,刚刚把自己的手放到“正在转动的历史车轮”上去,而他的胜利却是有保证的,——这个儿子就是农民民主制的波兰。

有一些陈腐的小说式的虚夸,有一些装腔作势的对世界的蔑视(这在黑格尔看来是勇敢,而在约丹先生看来却是不足道的平凡的蠢举),简单说来,有一些钟和炮,丑恶的言词所包含的“烟雾和音响”²⁰⁶,加上在最普通的历史方面的难以置信的糊涂和无知,——整个世界历史观点归结起来就是这样!

世界历史观点及其可理解的世界万岁!

六

科伦 8 月 26 日。会战的第二天,场面比第一天更加伟大。诚然,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没有在场,没有用他那张巧嘴来吸引所有听众的心神,但是我们不要苛求,象拉多维茨、瓦滕斯累本、凯尔斯特和罗多芒特·利希诺夫斯基²⁰⁷这样的人也是不应该忽视的。

第一个走上讲台的是拉多维茨先生。这个右派领袖说得简单、明了、中肯。演说的腔调是适度的。提出的一些前提是谬误的,但是很扼要;从这些前提中迅速地作出了一个结论。利用了右派的恐惧情绪。鉴于多数派的怯懦,而冷静地确信有成功的把握。极端轻视整个议会,既轻视右派,也轻视左派。这就是拉多维茨先生所发表的简短演说的特点,而我们也完全理解这些不多的、象冰一样冷的、不加修饰的朴实言论,对听惯了华而不实的空洞词藻的议会究竟会产生什么效果。如果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用他所有的“可理解的”和不可理解的形象世界所产生的印象,哪怕只达到拉多维茨用简短的实际上也是毫无内容的演说所产生的印象的 $\frac{1}{10}$,那他也就很幸运了。

拉多维茨先生不是“有骨气的人”,也不是很不错的有坚定信念的人,但他是一位具有鲜明轮廓的明确的人物;只要听他一次演说,就可以完全了解他。

我们从来不要妄想取得某个议会左派机关报的荣誉。恰恰相反,

我们认为在德国民主党成分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对民主党人进行最严格的监督,正是绝对必要的。而在一切政党的领袖(除了少数例外)都缺乏毅力、决心、才干和知识的情况下,我们在拉多维茨身上发现了至少可以较量的敌人,我们只有高兴。

继拉多维茨先生之后发言的是舒泽尔卡先生。他不顾以前的一切教训,又来用感人的词句向心灵申诉。喋喋不休的冗长的演说,有时穿插着历史上的事例和闪耀着奥地利人的理智的光辉。一般说来,这种演说是令人厌倦的。

舒泽尔卡先生到维也纳去了,他在那里也当选为国会议员。他在那里是适得其所的。如果说他在法兰克福曾置身于左派,那末他在那里却成了中间派;如果说他在法兰克福还能起某种作用,那末他在维也纳的第一次发言就一败涂地了。这就是所有这些从事文学活动、爱发哲学议论、爱作无谓空谈的大人物的命运,这些大人物只是利用革命来为自己创造地位;只要把他们放到真正的革命基地上去待一瞬间,他们马上就会逃之夭夭。

接着发言的是 *ci-devant*〔前〕伯爵冯·瓦滕斯累本。瓦滕斯累本先生以满怀好意、头脑简单的善良人物的姿态发言。他叙述了他在 1830 年以后备军人资格向波兰边境进军的逸事,接着就扮演桑科·判札的角色,用“天上的仙鹤不如手中的家雀”这句谚语奉劝波兰人,同时,他居然以最天真的形式插进了下面这个卑劣的意见:

“为什么一次也没有找到同意在波兹南的应该分离的部分负责进行改组的波兰官吏呢?恐怕是他们自己害怕自己,他们觉得还没有成长到能够平安无事地组织居民的程度,同时却以种种理由来掩饰,说什么热爱祖国波兰妨碍了他们着手进行令人高兴的复兴工作!”

换句话说,整整 80 年来,波兰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始终不渝地进行斗争,是为了他们自己也认为不可能的和无意义的那种事业。

瓦滕斯累本先生在结束时表示同意拉多维茨先生的意见。

从波兹南来的波兹南国民委员会委员雅尼舍夫斯基先生走上了讲台。

亚尼舍夫斯基先生的演说是圣保罗教堂的讲台上发出的真正议会辞令的第一个典范。我们终于听到了雄辩家的言论,他不追求会场的赞许,他用真正生动活泼、热情洋溢的语言来说话,正因为如此,他给人的印象同以前几个发言人完全不同。勃鲁姆对议会的良心所作的呼吁,约丹的微不足道的热情,拉多维茨的始终如一的冷淡,舒泽尔卡的模棱两可的温厚,在这位捍卫自己的民族生存、要求恢复自己的无可争辩的权利的波兰人面前,都黯然失色了。亚尼舍夫斯基说得兴奋而热烈,但是并不装腔作势;他只是以合理的愤怒心情来说明事实,没有这种愤怒的心情,就不可能正确地阐明这类事实,而在辩论的过程中听到了无耻的捏造以后,这种愤怒的心情是加倍合理的。他的演说真正是辩论的中心点,他击退了以前对波兰人的种种攻击,纠正了波兰的朋友们的一切错误,使辩论回到它的唯一实际、唯一真实的基础上去,并且预先剥夺了在他后面发言的右派的最有力的论据。

“你们吞下了波兰,但是我发誓,你们决不能把它消化!”

亚尼舍夫斯基演说的这个明确的结论将使我们永志不忘,同样使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他对波兰的朋友们的种种哀求所作的自豪的声明:

“我不是以一个穷人的身分向你们说话的,我所依据的是自己的无可争辩的权利;我不是来呼吁同情,而只是来呼吁正义的。”

在亚尼舍夫斯基之后发言的是从波兹南来的凯尔斯特校长先生。在为本民族的生存、为本民族的社会和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波兰人之后,是为自己的薪金而斗争的、迁居波兹南的普鲁士教师。在被压迫者的激昂慷慨的高贵的演说之后,是靠压迫来过幸福生活的官僚的卑鄙无耻的发言。

瓜分波兰,“现在叫做耻辱”,在当时却是“极普遍的现象”。

“按民族来独树一帜的民族权利,完全是一种新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承认过的权利。”“在政治上,只有实际的占有才能起决定作用。”

这就是凯尔斯特的论证所根据的那些意味深长的格言中的几个例子。再说下去就矛盾百出了。

他说:“有些地带随着波兹南归并德国,毫无疑问,这些地带大部分是波兰的;”过了一会又说:“至于波兹南的波兰部分,它并没有要求合并到德国去,据我想来,诸位先生,你们不要违背它的意志,把这一部分合并过去!”

在发表了这些议论之后,他引用了关于居民成分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是靠“涅茨同胞”所使用的有名的计算方法获得的。根据这些资料,只有完全不懂德语的人,才算是波兰人,多少能就几句德语的人则一律算作德国人。未了,他使用了一个极端巧妙的计算方法,由此得出结论说,波兹南省议会表决时,赞成合并到德国去的17票对26票的少数,其实是多数。

“根据省的法规,毫无疑问,必须有 $\frac{2}{3}$ 的多数,才有权做出决定。当然,17票还不到26票的 $\frac{2}{3}$,但是不够的部分是很小很小的,在决定如此重要的问题时是不必加以重视的!!”

这样一来,少数既然成了多数的 $\frac{2}{3}$,”根据省的法规”,它就是

多数了！旧普鲁士国家制度，无疑会因凯尔斯特先生的这种发明而给他加冕。实际上，问题是这样的：必须有 $\frac{2}{3}$ 的票数，才能提出建议。加入德意志联邦也就是这样的建议。因此，这个建议只有得到议会的 $\frac{2}{3}$ ，即43票的 $\frac{2}{3}$ 的票数的赞成，才是合法的。可是，几乎有 $\frac{2}{3}$ 的票数表示反对。这说明了什么呢？原来，17是“43的 $\frac{2}{3}$ 弱”！

如果说波兰人不象“理智的国家”的公民那样，他们不是“有教养的民族”，那末，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理智的国家给他们派去当教师的是这样的算术专家。

从波恩来的克雷门斯先生作了一个公正的批评，他说普鲁士政府的目的是不是要使波兹南德国化，而是要使它普鲁士化，并且把使波兹南普鲁士化的尝试同在莱茵区的类似的尝试作了比较。

奥斯滕多尔夫先生是从左斯特来的。这个“红色土地”的产儿大发庸俗的政治议论，满口可能性、或然性和假定，废话连篇，乱扯一通，由约丹先生扯到法国人，由红色共和国扯到北美洲的红色人种，把波兰人和红色人种等量齐观，而把“涅茨同胞”和美国人相提并论。只有红色土地才能产生这样大胆的比拟！让凯尔斯特先生、曾弗先生、果登先生扮演带着枪和锹住在小木房里的森林垦殖者的角色，真是无与伦比的喜剧！

从列温堡来的弗兰茨·施米特先生走上讲台。他说话心平气和，毫不夸张，这一点特别值得指出，因为施米特属于一般说来最爱夸张的那个阶级，即属于德国天主教的僧侣阶级。在亚尼舍夫斯基的演说之后，施米特先生的演说是整个辩论过程中较好的

演说，这至少是因为它最有说服力，因为它显示出对争论的问题具有最丰富的知识。施米特先生向委员会证明，它的假学术论据（这些论据的内容我们已经分析过）包含着对实际情况的绝对无知。施米特先生在波兹南大公国住过好多年，他向委员会指出，甚至在他最熟悉的那个小州的问题上也犯了极大的错误。他指出，正是在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委员会没有向议会提供必要的说明，它简直是命令议会不需要任何材料，对争论的问题不必有任何了解，就随便通过决议。他要求首先说明实际情况。他指出委员会的提案和委员会本身的前提是多么矛盾；他引证弗洛特韦尔的备忘录，并且要求备忘录的作者（也在这里当议员）发言，如果说这个文件是伪造的话。最后，他当众揭发了“涅茨同胞”如何去找加格恩，打算用波兹南爆发起义的假消息来迫使加格恩赶快中止辩论。不错，加格恩否认有这回事，但是凯尔斯特先生却公开地以此自夸。

议会的多数派对施米特先生的理直气壮的演说的报答，是设法在速记记录中歪曲这篇演说的原意。有一个地方，施米特先生曾亲自把速记稿上添加的谬论修改过3次，但它还是印出来了。对施略费尔鸣鼓而攻，对布伦坦诺进行公开的迫害²⁰⁸，对施米特施展伪造文件的伎俩，右派先生们，这真是绝妙的批评！

这次会议是以利希诺夫斯基的演说来结束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位朋友留到下一篇文章中来谈；对于利希诺夫斯基这一类型的发言人，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

七

科伦 8 月 31 日。议会的 bel homme(美男子)、德国的巴亚尔、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前公爵(基本权利第 6 条 209)冯·利希诺夫斯基含着得意的微笑,以骑士的风流姿态走上了讲台。他以地道的普鲁士陆军中尉的语调和旁若无人的潇洒态度,吐露了他打算告诉议会的一些思想片断。

杰出的骑士是这些辩论中决不可少的因素。从果登先生、曾弗先生和凯尔斯特先生这几个范例来看,还不能十分相信波兰的德国人是多么值得尊敬,而在骑士利希诺夫斯基身上,可以看到普鲁士化的斯拉夫人虽然举止优美,却是一种不雅观的人物。利希诺夫斯基是和波兰的德国人同种族的人;单是他在讲台上出现这一点就给文件作了补充说明。上西里西亚的小贵族变成了普鲁士的落后的容克地主这一事实,向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说明博爱的普鲁士政府打算把波兹南的小贵族变成什么。尽管利希诺夫斯基先生作了种种庄严的保证,但他决不是德国人,他是“改造了的”波兰人,并且他所说的也不是德国话,而是普鲁士话。

利希诺夫斯基先生首先庄严地保证他对波兰人具有骑士的同情,然后向亚尼舍夫斯基说了一些恭维话,又对波兰人作了应有的评价,说波兰人有“伟大的殉道诗篇”,而突然之间就急转直下了。为什么这些同情减少了呢?因为在所有的起义和革命中“波兰人总是站在街垒的第一线”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罪恶行为,只要波兰人

经过“改造”,这种罪恶行为是不会再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使利希诺夫斯基放心,使他相信在“波兰的流亡者”中间,甚至在他认为堕落不堪的波兰小贵族流亡者中间,也有人是保持清白,和街垒完全无关的。

接着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场面。

利希诺夫斯基:“用脚踏已经变成黄色的羊皮纸的左派先生们,以奇怪的方式呼吁历史权利。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为了波兰的事业而挑选日期。对历史权利来说,是不存在任何日期的。(左派大笑) ”

对历史权利来说,是不存在任何日期的。”(左派大笑)

主席:“诸位先生,让发言人有可能把话说完,不要打断他的话。”

利希诺夫斯基:“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左边来的笑声)

主席:“请不要打断发言人的话,请保持肃静。”(骚动)

利希诺夫斯基:“对历史权利来说,能够要求比更早的日期有更大权利的那个日期是不存在的!”(左派叫“好”,活跃)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说高贵的骑士讲的不是德国话,而是普鲁士话吗?

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权利遇到了我们的高贵的骑士这个厉害的敌人:

“如果我们深入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波兹南)许多地区曾经是西里西亚和德国的;再深入下去,我们就到了斯拉夫人建成莱比锡和德勒斯顿的时期,随后就会达到塔西佗——如果我们深入这个问题,天知道这些先生还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笑声是由利希诺夫斯基的文法错误引起的,他连用两个否定词(《Für das historische Recht gibt es kein Datum nicht》),这是违反德语规则的。恩格斯在这几篇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引用利希诺夫斯基的这句话,每次都保留了文法错误的句子构造。——编者注

利希诺夫斯基这次的句子构造是正确的。——编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世界上的事情大概是很糟糕的。普鲁士贵族的领地无可挽救地被抵押出去,犹太债主变得非常顽固,一人签字的票据所规定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付款期限来得太快;拍卖,丧失自由,因轻率举债而被免职,——看来,所有这一切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的惨状,使普鲁士贵族有必遭破产的危险,因为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有一位利希诺夫斯基竟否认他在唐·卡洛斯亲信的骑士中为了获得骑士马刺²¹⁰而捍卫的那种历史权利!

如果我们想深入历史债务权利的问题,那就自然只有天知道,法庭执行吏要把憔悴的骑士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可是,难道负债不是普鲁士骑士们的最好的、唯一可饶恕的特点吗?

美男子在转到本题时,认为在反对波兰的德国人时不应该“描绘隐藏在渺茫的远处的未来波兰的朦胧远景(!)” ;他认为波兰人不会以波兹南为满足:

“如果我有荣幸做一个波兰人,那末我日日夜夜所想的只是如何恢复以前的波兰王国。”

但是既然利希诺夫斯基先生“没有这种荣幸”,既然他只是上西里西亚的一个改造了的波兰人,那末他“日日夜夜”所想的就完全是另外的、爱国精神比较少的事情了。

“谈到荣幸,我必须说,几十万波兰人应该成为德国人,老实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对他们决不是不幸。”

相反地,假如普鲁士政府再建立一个苗圃,来栽培可以制造利希诺夫斯基这一类人物的木材,那该多好啊。

我们那位蓄着翘起的胡须的骑士,继续用那种实际上是用来

双关语:德文《Schulden》——“负债”,《entschuldigende》——“可饶恕的”,“可宽宥的”。——编者注

跟剧场楼座中的女士们谈话的、但也十分适合议会水平的亲切而潇洒的语调胡诌了一些时候,然后以如下的话作结束:

“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现在请你们自己决定,你们是把50万德国人接收到我们这方面来呢,还是拒绝他们……但是那时候你们也得删掉老民歌手的歌词:‘哪里讲德国话,那里神就在天上载歌载舞’。²¹¹请删掉这些歌词!”

老阿伦特在写这首歌时,竟没有想到波兰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德国话,这当然是很糟糕的。但是幸而出现了我们上西里西亚的骑士。谁不知道贵族阶级对犹太人负有几世纪来都奉为神圣的老债务呢?过去平民所忽略了的事情,骑士利希诺夫斯基都想起来了。

波兰的犹太高利贷者死不要脸地说着蹩脚的德国话,
对所有的人进行招摇撞骗的地方,

就是利希诺夫斯基的故乡!

八

科伦9月2日。辩论的第三天,大家都露出了倦意。论证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如果不是第一位可敬的发言人阿尔诺德·卢格先生拿出了他的丰富的新论据来,速记记录就会是枯燥乏味的。

但卢格先生对自己的功绩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他许下诺言：“我要用我的全部热情、我的全部知识。”

他提出了建议,但是这不是什么普通的建议,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唯一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建议,绝对的建议。

“决不能有任何别的建议、别的假定了。当然可以采取另一种行动,诸位先生,因为人是习惯于离开正确的道路的。正因为人离开了正确的道路,他也就具有自由的意志……但是正确的决不因此就不再是正确的了。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的建议是可能提出的建议中唯一正确的建议。”

(这样一来,卢格先生就使自己的“自由的意志”为“正确的”东西牺牲了。)

我们现在来仔细地看一看卢格先生的热情和知识,看一看他的唯一正确的建议。

“消灭波兰之所以是可耻的非正义行为,是因为这样就压制了这个民族的宝贵的发展,这个民族在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中曾经树立过巨大的功绩,曾经辉煌地发展过中世纪生活的一个阶段,即发展过骑士精神。专制主义妨碍了小贵族共和国实现它本身的内在的(!)消灭,而这种消灭,借助于革命时期制定的宪法是有可能实现的。”

中世纪的南方法兰西民族和北方法兰西民族,不比现在的波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有更多的亲属关系。南方法兰西民族——vulgo〔即一般所谈的〕普罗温斯民族——在中世纪时代不仅完成了“宝贵的发展”,甚至还走在欧洲发展的前面。它在新时代的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它的诗当时对拉丁语系各民族甚至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望尘莫及的范例。在创造封建骑士精神方面,它可与卡斯提尔人、北方法兰西人和英格兰诺曼人相匹敌;在工商业方面,它丝毫不逊于意大利人。它不仅“辉煌地”发展了“中世纪生活的一个阶段”,甚至使古希腊文明在中世纪末期回光返照。因此,南方法兰西民族“在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中”不仅“有”很大的“功绩”,而且简直有无限的“功绩”。可是它终于象波兰一样,起初被北方法兰西和英国瓜分,后来又被北方法兰西人全部征服了。从阿尔比教派战争 212 起到路易十一止,北方法兰西人对南方法兰西人进行了连绵不断的奴役战争,结果把全国征服了,但是北方法兰西人在文化程度上低于其南方的邻人,犹如俄国人低于波兰人一样。“专制主义”(路易十一)“妨碍了”南方法兰西“小贵族共和国”(在它的繁荣时期,这个称号是完全正确的)“实现它本身的内在的消灭”,而这种消灭,借助于城市市民阶层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有可能实现的,正象波兰小贵族共和国借助于 1791 年的宪法来实现它的消灭一样。

南方法兰西人同自己的压迫者斗争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历史的发展是铁面无情的。经过 300 年的斗争,普罗温斯人的优美的语言论落到了地方方言的地步,他们本身也成了法兰西人。北方法兰西的专制主义,在南方法兰西身上压了 300 年,只是在 300 年后,北方法兰西人消灭了南方法兰西民族独立的最后一点残余,才补

偿了自己的压迫。制宪议会把那些独立的省划分为几个部分,国民公会的铁拳破天荒第一次把南方法兰西的居民变成法兰西人,并为了补偿他们已经丧失的民族特性,给予他们以民主。但是在3个世纪中对他们的奴役,可以一字不差地借用卢格先生关于波兰人所说的话:

“俄国的专制主义并没有解放波兰人,消灭波兰的小贵族阶级以及把这样多的贵族家庭逐出波兰,——这一切既没有使俄国建立民主制度,也没有使俄国具备合乎人道的生活条件。”

可是,从来也没有把北方法兰西人征服南方法兰西叫做“最可耻的非正义行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卢格先生?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征服南方法兰西是可耻的非正义行为,或者征服波兰决不是非正义行为。请你选择吧,卢格先生!

波兰人和南方法兰西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南方法兰西象一个软弱无力的累赘那样被北方法兰西人拖着走,直到它的民族特性完全消灭为止,而波兰人却完全有希望很快站在斯拉夫各部族的前列呢?

南方法兰西由于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分析),是法国的反动的部分。它对北方法兰西的反对立场很快就变成了对整个法国各进步阶级的反对立场。它成了封建主义的主要支柱,并且直到现在还是法国反革命的堡垒。

波兰就恰恰相反,它由于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见本报第81号),成了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革命的部分。它对它的压迫者们的反对立场同时也就是对本国大贵族的反对立场。甚至小贵族阶级(一部分还站在封建的立场上)

也以无比的忘我精神参加民主的土地革命。当德国还在最庸俗的立宪思想和浮夸的哲学思想中徘徊的时候，波兰就已经成了东欧民主的策源地。

波兰复兴的保证，波兰复兴的必然性就在这里，而根本不在于久已埋葬了的骑士精神的辉煌发展。

但是卢格先生还有另外一个为“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必须有独立的波兰存在作辩护的论据：

“加在波兰身上的暴力，使波兰人散布在欧洲各地；他们到处流散，因为遭到非正义行为而充满了愤怒……波兰精神在法国和德国（！）成了更合乎人道的精神，而且纯化了，因为波兰的流亡者成了宣传自由的人（^{Nº1}）……斯拉夫人是能够加入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的（没有“大家庭”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流亡者真正做到了传播自由（^{Nº2}）……多亏波兰人这些自由的传播者（^{Nº3}），所有的俄国军队（！！）才感染了新时代的思想……我尊重波兰人在全欧洲表现出来的那种手执武器宣传自由（^{Nº4}）的可敬的志向……只要他们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在历史上就会受到赞扬，因为他们到处以急先锋（^{Nº5}）的姿态出现（!!!）……波兰人是投到斯拉夫民族中去的自由的因素（^{Nº6}）；他们把在布拉格举行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引上了自由的道路（^{Nº7}），他们在法国、俄国和德国进行活动。由此可见，波兰人在现代文明中也是积极的因素，他们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他们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他们是必需的，所以他们决不是没有生气的。”

卢格先生要证明：第一，波兰人是必需的；第二，波兰人不是没有生气的。他在证明时说：“因为他们是必需的，所以他们决不是没有生气的。”

如果从上面所引的那段把同样的意思重复了7次之多的冗长

的话中去掉几个字——波兰人、因素、自由、宣传、文明、传播,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段夸夸其谈的话还剩下些什么。

卢格先生要证明波兰复兴的必要性。他以如下的话来证明这一点。波兰人不是没有生气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充满生命力的,他们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们是全欧洲自由的传播者。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和可耻的非正义行为,使他们散居在欧洲各地,他们带来了因为遭到非正义行为而产生的愤怒,正当的革命的愤怒。他们在被放逐中使自己的这种愤怒“纯化”了,而这个纯化了的愤怒又使他们能够传播自由,并使他们“站在街垒的最前列”。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要放弃可耻的非正义行为和加在波兰人身上的暴力,要复兴波兰,——那时候“愤怒”就会消失,那时候愤怒就不会再纯化,那时候波兰人就会回家,而不再“传播自由”。如果说“因为遭到非正义行为而产生的愤怒”是使波兰人成为革命者的唯一原因,那末放弃非正义行为就会使他们成为反动分子。如果说反抗压迫是波兰人维持生命力的唯一来源,那末请放弃压迫吧,这样波兰人就会没有生气。

这样一来,卢格先生恰恰证明了他想要证明的反面。由他的论据引伸出来的结论,就是为了自由和欧洲各民族大家庭的利益,波兰不应该复兴。

而且,卢格先生的“知识”是很奇怪的,他说到波兰人时,只提到流亡者,只看到街垒中的流亡者。我们绝对不想侮辱波兰流亡者,他们在战场上以及在为了波兰的利益而进行的18年秘密工作中,证明了自己的毅力和勇气。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凡是熟悉波兰流亡者的人,都知道波兰流亡者远不象卢格先生跟在前公爵利希诺夫斯基后面信口妄谈的那样,达到了以传道者的精神热爱自

由和一心想置身街垒的程度。波兰流亡者为了复兴波兰,表现得很坚定,忍受了很多痛苦,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难道波兰国内的波兰人做的事情就少吗?难道他们没有蔑视严重的危险吗?难道他们没有遭受麻比特和斯皮尔堡的监狱、鞭笞、西伯利亚矿场、加里西亚的屠杀和普鲁士的榴霰弹等等的惨祸吗?可是这一切在卢格先生看来都是不存在的。他很少注意到,没有流亡的波兰人和几乎所有的波兰流亡者(除列列韦尔和梅洛斯拉夫斯基以外)比较起来,接受的一般欧洲文明要多得多,对他们常住的波兰的需要要清楚得多。卢格先生认为波兰所有的一切知识,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传播到波兰人中间的、波兰人所掌握的”一切知识,是由于他们居住在外国取得的。我们在^{No}[81]中曾经指出:波兰人既不当从二月以后已经由于空谈而没落的法国政治空想家那里去了解本国的需要,也不应当从还没有机会没落的深思熟虑的德国思想家那里去了解本国的需要;我们曾经指出:波兰本身就是研究波兰需要什么的最好的学校。波兰人的功绩就在于他们首先承认并宣告土地民主制是使一切斯拉夫民族获得解放的唯一可能的形式,而根本不是象卢格先生所设想的那样,把“在法国成熟了的政治自由的伟大思想”这一类空话“甚至(!)把在德国产生的哲学(卢格先生陷在这种哲学中)搬到了波兰和俄国”。

在卢格先生发表这篇演说以后,波兰人也许要高叫:请上帝把我们从我们的朋友中拯救出来吧,至于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能够对付。可是波兰人历来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的外国朋友总是用世界上一切最拙劣的论据来替他们辩护。

指“新莱茵报”第81号。——译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在法兰克福左派方面,非常值得称赞的是:他们(除了少数例外)因卢格先生关于波兰问题的演说而欣喜若狂,这篇演说中说:

“诸位先生,我们不想争论我们究竟要什么,要民主的君主政体,要民主化的君主政体(!)还是要纯粹民主制的问题,——我们的要求一般说来是相同的,就是要求自由,人民的自由,人民的政权!”

左派听到有人说他们的要求和右派的要求“一般说来是相同的”,说他们的要求和拉多维茨先生、利希诺夫斯基先生、芬克先生以及其他肥的或瘦的骑士们的要求是一样的,就赞美备至,难道我们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左派而欢欣鼓舞吗?得意忘形的左派一听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的政权”这一类空洞的高调就忘记了一切,难道我们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左派而欢欣鼓舞吗?

我们且把左派放在一边,再来谈谈卢格先生。

“在整个地球上,开未曾有过比 1848 年更伟大的革命。”

“按它的原则来说是最人道的”,——因为这些原则是由抹杀最对立的利益而产生的。

“按它的法令和公告来说是最人道的”,——因为这些法令和公告是欧洲一切空虚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关于博爱的幻想和关于友爱的多情的词句的撮要。

“按它的表现来说是最人道的”,——这些表现就是波兹南的屠杀和野蛮行为、拉德茨基的杀人放火的勾当、巴黎六月胜利者的野兽般的残暴行为、克拉柯夫和布拉格的屠杀、普遍的军阀统治,简单地说,就是在今天,在 1848 年 9 月 1 日,“表现”为这个革命的全貌的一切卑鄙行为,由于这一切卑鄙行为,4 个月来所洒的鲜血,比 1793 年和 1794 年所洒的鲜血的总和还要多。

“人道的”卢格先生!

九

科伦 9 月 6 日。我们跟在“人道的”卢格先生后面，沿着他的道路对波兰的必要性作了历史的考察。直到现在为止，卢格先生所说的只是令人厌恶的过去，只是专制主义的时代，他修改了不合理的事件，现在他转到了当前的时代，转到了光荣的 1848 年，转到了革命，现在他踏上了故土，现在他修改“事件的理性”²¹³。

“怎样才能实现波兰的解放呢？波兰的解放可以用缔结条约的方式来实现，欧洲两大文明民族必须参与缔结条约，它们必须同德国，同解放了的德国组成新的三国同盟，因为它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它们的要求一般说来是相同的。”

在我们面前的这句大胆的话中包含着对外政策方面的事件的全部意义。“想法一样、要求一般说来相同”的德国、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同盟，就是现代 3 个瑞士人——卡芬雅克、莱宁根和约翰·罗素之间的新的留特利同盟²¹⁴。不过，近来法国和德国依靠上帝的帮助，又后退得这样远，以致它们的政府关于一般政治原则的“想法”几乎“是一样的”，官方的英国这块在大海中屹立不动的反革命的岩石也是这样。

但是这 3 个国家不仅“想法”是一样的，而且“要求一般说来也是相同的”：德国要得到什列斯维希，英国则不愿意使它有这种机会；德国要实行保护关税，英国则希望有贸易自由；德国要统一，英国则希望它分散；德国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则力求在工

业上奴役它。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它们的要求“一般说来”毕竟“是相同的”！至于法国，它颁布反对德国的关税法；它的部长巴斯蒂德嘲弄代表德国驻法国的劳麦老师，这就很明显，它的要求“一般说来”和德国“是相同的”。真的，英国和法国都非常确切地证明，它们的要求也就是德国的要求，同时以战争来威胁德国：英国是为了什列斯维希，法国是为了伦巴第！

卢格先生具有思想家所特有的天真想法，他认为各民族如果在某些政治观念上相同，那末单凭这一点就应该结成同盟。在卢格先生的政治调色板上，一共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即奴役和自由。在他看来，世界分为两大部分：文明民族和野蛮人，自由人和奴隶。6个月以前穿过莱茵河彼岸的自由的分界线，现在同俄国的国境线一致了，而人们就把这个过程叫做1848年的革命。现代运动在卢格先生头脑中的反映是这样混乱。二月和三月的街垒战斗口号，译成波美拉尼亚文²¹⁵就是如此。

如果把卢格的议论反过来从波美拉尼亚文译成德文，那末，3个文明民族，3个自由民族，虽然发展的形式和阶段各不相同，原来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民族，而处在宗法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民族，都是“奴隶和仆役”。严格的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阿尔诺德·卢格所理解的自由，是最平凡的“肤浅的”自由主义，是至多不过具有假民主形式的资产阶级的统治，——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既然法国、英国和德国都是资产阶级在统治，那末这3个国家是天然的同盟者，——卢格先生是这样断言的。可是如果这3个国家的物质利益绝对相反，如果同德国和法国进行自由贸易是英国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如果对英国实行保护关税是法国和德国资

产阶级的迫切需要,如果德国和法国之间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类似的情况,如果这个三国同盟实际上变成了在工业上奴役法国和德国的工具,那将怎么说呢?目光短小的利己主义,贪吝的生意人精神”,——波美拉尼亚的思想家卢格暗自嘟囔说。

约丹先生在他的演说中曾经谈到世界历史的悲剧性的嘲弄。卢格先生给这一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例子。他也象所有多少在思想上属于左派的人们一样,看到他的最宝贵最喜爱的幻想、他的思想上的最大的努力,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面前碰得粉碎了。他的博爱的世界主义的计划,在贪吝的生意人精神面前碰得粉碎了,于是他不得不(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不愿意这样做)以思想上多少歪曲的形式来代表这些生意人的利益。思想家在想,而商人在操纵。这就是世界历史的悲剧性的嘲弄!

接着,卢格先生指出,法国“声明说,虽然1815年的条约已经撕毁,但它还是愿意承认目前的领土状况”。“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卢格先生在拉马丁的宣言中找到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找到的东西,即新的国际权利的基础。他用下面的话来发挥这种见解:

“从与法国的这些关系中应该出现新的历史(!)权利(N^o1)。历史权利就是各民族的权利(!N^o2)。在我们所说的(?)情况下,是指新的国际权利(!N^o3)。这是对历史权利(!N^o4)的唯一正确的理解。对历史权利(!N^o5)的任何别的理解都是荒谬的。其他任何国际权利(!N^o6)都是不存在的。历史权利(N^o7)是历史所实现的、时间所批准的权利(原来如此!),因为它(什么?)取消和撕毁旧的条约,代之以新的条约。”

总而言之:历史权利就是修改事件的理性!

在德国统一的使徒行传上,即在法兰克福议会速记记录²¹⁶第1186页第一栏中,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记载着的。可是还有人埋怨“新莱茵报”用感叹号批评了卢格先生。这种令人头晕的、疯狂的历史权利和国际权利的舞蹈,自然会使心地纯洁的左派惊讶,当波美拉尼亚的哲学家以不可动摇的信念对着左派耳朵高喊“历史权利是历史所实现的、时间所批准的权利”等等时,他们自然会惊得目瞪口呆!

但是要知道,“历史所实现的”东西和“时间所批准的”东西常常是恰好相反的,而“时间”的批准也总是在于消灭“历史所实现的”东西。

现在卢格先生提出了“唯一正确的和切实可行的”建议:

“建议中央政权协同英法两国召集一个恢复自由和独立的波兰的会议,通过本国的大使邀请一切有关国家参加。”

多么大胆的善良的想法!罗素勋爵和卡芬雅克应该恢复波兰;英法资产阶级应该用战争来威胁俄国,以便实现目前和他们毫不相干的波兰的解放!在现在这个普遍混乱和一团糟的时代,每一个安定人心的消息把行市提高了0.8%,遇到一连串破坏性的打击又化为乌有;工业同慢性的破产作斗争;商业陷于瘫痪状态;为了使失业的无产阶级不致作普遍的最后的殊死搏斗,必须耗费大量的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难道3个文明民族的资产者还会制造新的纠纷吗?什么样的纠纷呵!对从二月起就成了英国的最亲密的同盟者的俄国作战!对俄国作战,进行这个谁都知道会使德法资产阶级毁灭的战争!为了什么利益呢?什么利益也不为!这实在比波美拉尼亚的天真还要天真!

但是卢格先生拿脑袋来担保,说“和平解决”波兰问题是可能

的。越来越妙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谈的是：

“维也纳条约力求达到的东西，现在应该成为现实，应该真正实现……维也纳条约力求确立一切民族反对大法兰西民族的权利……它求复兴德意志民族。”

现在弄清楚了为什么卢格先生的“要求一般说来”和右派相同。右派也要求实现维也纳条约。

维也纳条约是反动的欧洲对革命的法国取得巨大胜利的总结。它是欧洲反动势力在 15 年复辟时期进行统治的典型形式。它恢复了正统主义、天赋的王权、封建贵族、僧侣的统治、宗法式的立法和行政。但是因为这次胜利是在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取得的，所以对资产阶级也必须作若干让步。可是肥美的战利品已经被君主、贵族、僧侣和官僚们分完，资产阶级就只好满足于任何时候也不会兑现、任何人也不想兑现的未来的期票。卢格先生不去研究维也纳条约的真正的实际内容，他相信这些空洞的诺言也就是条约的真实内容，而把反动的实践仅仅解释为为非作歹！

过了 33 年，在 1830 和 1848 年的革命以后，还相信这些期票会兑现，还以为维也纳诺言的多情的词句在 1848 年有某种意义，这的确要有非常宽大的胸怀！

卢格先生在扮演维也纳条约的唐·吉珂德的角色！

卢格先生在结束时向议会泄露了一个大秘密：1848 年革命之所以发生，不过是由于 1846 年在克拉柯夫破坏了 1815 年的条约。这对于所有的暴君是一个警告！

简单地说，卢格先生自从我们在文艺舞台上同他最后会晤以来，一点也没有改变。还是那些他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²¹⁷上

扮演德国哲学的守门人这一角色时就记得烂熟的老一套词句,还是那样糊涂,还是那样轻率,观点还是那样混乱,还是那样善于以冠冕堂皇的形式来传达最空洞最荒谬的思想;还是那样缺乏“知识”;尤其是,还是那样力求得到一生中用没有听过类似的话的德国庸人们的赞许。

我们对波兰问题辩论的评论就此结束。如果还要我们谈一谈从波兹南来的勒弗先生以及在他以后发言的其他一些大人物,那未免要求过分了。

所有这些辩论所留下的印象都是微不足道的。长篇演说是这样多,内容是这样贫乏,对情况的了解是这样有限,才能是这样不够。过去或现在的法国议会或英国下院中最没有意思的辩论,也要比3天来对现代政治中一个最有意义的问题的讨论具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实际知识、更多的实际内容。本来可以用一切办法来利用这些辩论,可是国民议会却把它们变成了无谓的空谈!

真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议!

决议是大家都知道的。占据了波兹南³/₄的地方;不是靠武力,不是靠“德国人的勤劳”,不是用“犁”去侵占,而是靠无谓的空谈,靠不确实的统计,靠羞羞答答的决议去侵占。

“你们吞下了波兰人,但是我发誓,你们决不能把他们消化!”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8月7日—9月6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8月9日、12日、20日、22日、26日、31日,9月1日、3日、7日“新莱茵报”第70号、73号、81号、82号、86号、90号、91号、93号、96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德国公民权和普鲁士警察

科伦 8 月 11 日。大家知道,8 月 6 日普鲁士军队曾怎样向德国的统一宣誓²¹⁸。普鲁士警察不能落后于普鲁士军队。在普鲁士警察看来,在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国国民议会、德意志帝国摄政王和德意志帝国内阁还没有在法兰克福出现以前,在普鲁士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德籍外国人或外国的德国人。

执行警察厅长职务的盖格尔先生(对他的上任我们早有预感,而且早已向他祝贺过了)显然接到了特别命令,要把科伦的德籍外国人清除出去,在这古老帝国的城市里只允许普鲁士的臣民居住。假如他切实照办,那末除了警察、军队、官僚和土著普鲁士人以外,谁还有公民权呢?盖格尔先生本人也不可能不包括在这些“最后的马喜坎人”之内。

对于“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的普鲁士国籍问题所发生的冲突,我们以后再报道。现在来谈谈“新莱茵报”的撰稿人和校对卡尔·沙佩尔先生。

沙佩尔先生今天早晨曾经被所在区的警察署长传去。警察署

马喜坎人(Могикане)是 18 世纪被荷兰和英国殖民者杀绝的北美东岸的印第安人——阿尔工金人(Алгонкины)的部族。“最后的马喜坎人”一语指某一民族或部族的最后代表者。——译者注

见本卷第 451—454 页。——编者注

长先生通知他,遵照盖格尔先生的命令,他这个外国人应在明天一早离开科伦和普鲁士国境。署长先生又补充说,他由于好意,把出境期限延长了8天。

沙佩尔先生不仅是德国人,而且还是拿骚人,他有 in optima forma(完备的)拿骚身分证。沙佩尔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3个孩子都住在科伦。他是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又是“新莱茵报”的校对,因此他是身犯三重罪过。

业已通过的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一条称:“凡是德国人皆享有全德公民权”。按照盖格尔先生的解释,这大概是说:凡是德国人皆享有被驱逐出37个德意志邦的权利。除了国民议会的立法还有盖格尔的立法!

但是,我们要奉告办事大臣汉泽曼先生:他可以用警察手段随意迫害议员,但是对报刊可得小心谨慎点。报刊会揭露他的一些资产阶级往事并且——

假如您愿意起舞,
大人,请您示意——
我为您伴奏!¹⁹——

不管盖格尔(Geiger)之流怎样用自己的警察局(Violine)来进行威胁。

写于1848年8月1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8月12日
“新莱茵报”第73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俏皮话:《Geiger》是姓,《Geiger》是“提琴手”;《Violine》是“小提琴”;《Violon》是“监狱”,“警察局”。——编者注

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 目前失败的原因

3月间,奥地利人很快便被赶出伦巴第,现在,他们以同样的速度凯旋归来了,而且已经进入米兰。

意大利人民不惜任何牺牲。他们为了完成已开始的事业和争取民族独立,曾准备以殊死的精神进行战斗。

但是这种勇气、这种热情、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当权者的心愿。他们公开或秘密地进行种种勾当,利用他们权限范围内的一切手段来麻痹人民的力量,尽快地恢复实质上的旧秩序,而不是使国家从奥地利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

教皇日益受奥地利天主教会的政治影响,而且日益受它指挥。他同“黑色”和“黑黄色”²²⁰结成联盟,给马米阿尼内阁的道路上设下重重障碍。内阁本身曾经在两院会议上发表了充满爱国精神的演说,但是没有表现出为实现它那些良好愿望所必需的魄力。

在多斯加那,政府虽然说得天花乱坠,然而做得更少。可是在意大利的一切君主中,意大利自由的最可恶的敌人还是查理·阿尔伯特。意大利人应当时刻温习并记住这一句格言:“请上帝把我们从我们的朋友中拯救出来,至于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能够对

付！”。对于波旁王朝的斐迪南，他们是用不着特别耽心的，因为他早已被揭穿了。相反，查理-阿尔伯特硬要别人到处把他当作《la spada d'Italia》（意大利的剑），当作英雄来歌颂，说他的剑是意大利自由和独立的最好保障。

他派往意大利北部各地去的特使把他描绘成唯一能够拯救而且正在拯救祖国的人。可是要他实现这一点，他们说，当然就必须建立一个北意大利王国。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掌握不仅能抵御奥地利，而且还能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的必要力量。查理-阿尔伯特的功名心曾驱使他和烧炭党人结成了联盟（以后又出卖了他们），当时这种功名心空前强烈，他幻想能得到很大的权力和威势，这样，他很快就能凌驾于意大利的其他一切君主之上。他曾力图利用1848年的全民运动来达到个人目的。他对一切具有自由思想的活动家充满仇恨和猜忌。他把一些比较忠实于专制制度和倾向于支持国王的贪求功名的计谋的人安置在自己周围。他把一些就智慧或政治观点来看都可使他放心，但不得士兵信赖而且缺乏顺利指挥作战所必备的才干的将军任命为军队的首脑。他吹嘘自己是意大利的“解放者”，并且提出要以被解放的人甘受他的奴役为条件。情况对他格外有利。然而他贪得无厌，他想尽可能捞得多一些，尽可能什么都捞到，结果反而连已经得到的东西也失掉了。当伦巴第归并皮蒙特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的时候，当建立共和制的可能性还存在的时候，他苟且偷安，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抗御奥地利人，尽管当时奥地利人相当软弱。他让拉德茨基、达斯普雷和韦尔登等人接连占领了威尼斯的许多城池和堡垒，而他自己却按兵不动。一直到威尼斯向王权求救的时候，他才认为值得一救。他对帕马和摩地那的态度也是这样。可是拉德茨基这时却在聚集

力量,他同查理-阿尔伯特及其将军们的盲目无知、无所作为相反,他为了组织进攻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结果是世人皆知的。从此,意大利人不能也不会把他们的解放事业托付给哪一位君主了。为了拯救自己,他们应尽快地把这把《spada d' Italia》(“意大利的剑”)当作废物扔得远远的。假如他们早就这样做了,假如他们早就离弃了国王、他的体制以及他的一切信徒而结成民主联盟,那末现在意大利也许就不会有一个奥地利人了。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意大利人白白地遭受了他们的敌人所进行的那个野蛮战争的种种灾祸,他们白白地忍受了极其巨大的牺牲。此外,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还经受了残忍的梅特涅-奥地利的反动分子及其军阀们的摧残。凡读过拉德茨基告伦巴第市民书或者韦尔登告罗马教皇使节书的人都会懂得:阿梯拉和匈奴人对意大利人来说仿佛是温柔的小天使。反动派和复辟在庆祝胜利。绰号叫《il carnefice》(“刽子手”)的摩地那公爵也回来了,他曾经给奥地利人120万盾的贷款作为战争费用。人民常常由于自己的宽宏大量而自掘坟墓,直到后来他们才聪明起来,从自己的敌人那里也学到了一些东西。摩地那人让他们的公爵安然地走掉了,而这位公爵在他过去统治的年代里曾经把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监狱、绞死和枪杀,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和他不同。而现在,他又回到他们这里来了,他想以加倍的勤勉来从事他那血腥的公爵行业。

反动派和复辟在庆祝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人民充满了革命精神,要长期压制它已不可能了。米兰、布里西亚及其他城市已在3月间证明,这种革命精神能干出怎样的事情来。当苦难已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再次发生起义。最近几个月的惨痛教训

会预告意大利人不要堕入新的幻想,会帮助他们在统一的民主旗帜下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8 月 1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8 月 12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73 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科伦日报”论意大利

科伦 8 月 26 日。昨天,我们注定要倾听柏林的文学家威廉·约丹先生从世界历史观点出发对政治问题的高谈阔论。命运无情地追随着我们,今天,同样的遭遇又落到我们头上了。3 月间的主要收获就是文学家包办了政治。

闵斯德的列文·许金先生(他是杜蒙先生广告机构中的无名小卒)在“科伦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们在意大利的政策”一文。

“我的这位有双幽灵的眼睛的朋友列文”²²¹说了些什么呢?

“德国从来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大好时机,它可以把对意大利的政策建立在永世不朽的良好基础上。我们光荣地(由于查理-阿尔伯特的出卖)为我们的旗帜洗去了耻辱,这种耻辱是那些一有胜利便骄傲起来的人民造成的。这支不仅在战斗和胜利方面无与伦比,而且在坚忍和顽强方面也十分惊人的军队,是一个 barba bianca,白髯公带领的,他把光荣的(!?)德国双头鹰竖立在暴动城市的塔尖上。600 多年以前,一位黄髯公皇帝也曾在这里竖起同样的旗帜作为德国统治意大利的象征。现在这种统治权属于我们了。”

“科伦日报”的列文·许金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当手无寸铁的人民经过 5 天的激战把拉德茨基的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步兵从米兰赶跑的时候,当“十分惊人的军队”在戈伊托城下被击溃而向维罗那败退的时候,“我的这位有双幽灵的眼睛的

见本卷第 402—408 页。——编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朋友列文”的政治竖琴竟默不作声！但是，自从得到增援的奥地利军队由于查理-阿尔伯特胆小而不光彩的叛卖行为（我们已无数次地预示过这一点）取得了不应有的胜利以后，我们相邻的政论家又登上了舞台，他们鼓吹“被洗去了的耻辱”，他们冒昧地把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和拉德茨基·巴巴比安相提并论；从这时起，在1848年革命中完成了最光荣的革命的英雄城市米兰，便成了一个“暴动的城市”；我们这些自古以来什么也没有享有过的德国人，却享有了“对意大利的统治权”！

“我们的旗帜”！在维也纳受人践踏的梅特涅反动派的一堆黑黄色破布，就是“科伦日报”的许金先生的旗帜！

“光荣的德国双头鹰”！那正是纹章志上的怪物，它在热马普、弗略留斯、密雷栖摩、里沃利、诺依维特、马连峨、霍恩林屯、乌尔姆、奥斯特里茨和瓦格拉姆等地²²²被武装的革命拔光了羽毛。这就是“科伦日报”的许金先生的“光荣的”爪牙！

当奥地利人吃败仗的时候，他们是以宗得崩德²²³为榜样而行动的奥地利人，甚至几乎做了祖国的叛徒。但是一旦查理-阿尔伯特陷入了圈套，一旦奥地利人向基契诺推进，他们就成了“德国人”，并且好象是“我们”完成了这一切。我们愿意承认，“科伦日报”在沃尔塔和库斯托查打了胜仗并且占领了米兰²²⁴。但是它同时也要对这支“在坚忍和顽强方面也十分惊人的”野蛮军队的惨无人道的行为（这种情况它也很了解）负责，正如它过去曾经对加里西亚的屠杀负责一样。

“现在这种统治权属于我们了。意大利和德国，这是两个在自然和历史条件方面彼此都有联系的民族，是由天意联结起来的民族，是彼此有亲密关系的民族，正如科学和艺术、思想和感情一样”——

正如勃律盖曼先生和许金先生一样！

正是为了证明德国和意大利是“由天意联结起来的”民族，所以 2 000 年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经常不断地进行斗争；意大利人一再推翻德国人的压迫；米兰的大街经常被德国人的鲜血所玷污！

正是因为意大利和德国“彼此有亲密关系”，拉德茨基和韦尔登才使威尼斯的全部城市遭受浩劫和焚烧。

我的这位有双幽灵的眼睛的朋友列文现在希望我们放弃从伦巴第到艾契河的土地，因为人民不喜欢我们，尽管有些贫苦的《cittadini》（“市民”）（学者许金先生这样称呼 contadini——农民）是兴高采烈地欢迎奥地利人的。但是，假如我们自己的举止象“自由的人民”那样，“意大利人民就会向我们伸出手来，让我们把他们引导到他们单独无法走的道路——自由的道路上去”。

的确如此！早在德国沉眠不醒的时候就巴争得了出版自由、陪审法庭和宪法的意大利，在巴勒摩完成了这一年的首次革命的意大利，赤手空拳在米兰战胜了“无与伦比的”奥地利人的意大利，如果没有德国即那个拉德茨基的引导，便不能走上自由的道路！当然，如果为了走上自由的道路，法兰克福议会、毫无意义的中央政权、39 个宗得崩德和“科伦日报”都是必需的……

于是，为了使意大利人正是请求德国人“引导他们走向自由”，许金先生控制了意大利的提罗耳和威尼斯省，以便把它们奖赏给奥地利王公，他还派了“2 000 个南德意志帝国军队的士兵到罗马去，好让克里斯特的地方长官在他自己的家里重建安宁”。

但是，可惜得很！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
海洋是属于英国人的，
但是在梦中，在天空的王国里，
德国人的威力是无可争辩的。
在这儿我们掌握着领导权，
在这儿我们紧密地溶成一片；
而其他国家的人民，
却是在平坦的土地上发展。²²⁵

正是在梦中，在天空的王国里，“意大利的统治权”是属于我们的。对于这一点，谁也没有许金先生清楚。他从德意志帝国的利益出发谈到这个英勇的统治政策的时候感慨地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这个伟大而崇高的政策，只有德意志帝国这样的强国才有魄力实行。遗憾的是，它在我们这里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幻想，这种情况大概还要延续很久！”

我们推荐许金先生到施蒂尔夫山峰去担任看门人，去担任守卫德国荣誉的边防哨。这位穿着铠甲的“科伦日报”的小品文作家可以从那里了望意大利并进行监视，使“德国对意大利的统治权”不要有半点放松。只有这样，德国才能高枕无忧。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8 月 2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8 月 27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87 号

“阅报室”报论莱茵省

科伦 8 月 26 日。“柏林阅报室”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如下：

“不久以前我们曾经说过：长期以来把腐朽的各邦机体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精神日益消失的时机已经来到了。在奥地利未必会有人怀疑这一点。在普鲁士，证实我们这种看法的时代标志也日益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现在只有一点利益还可以把德国各省和普鲁士邦联合起来，这就是对发展自由主义的国家机构，对通过共同努力建立和发展新的自由的社会关系形式的关怀。如果普鲁士作为一个邦不能完全适应这种利益的要求，那末坚定地走上政治和社会进步道路的西里西亚，对自己作为普鲁士的成员这一点，未必会感到满意。关于萨克森省的情况大家都十分清楚。自从它归并入普鲁士邦之后，它对普鲁士一直心怀敌意。至于莱茵省，也许大家还记得，它的议员在 3 月 18 日前夕曾经在这里发表过什么样的威胁性演说，他们对加速变革曾经起过什么作用。要求分离的情绪正在这个省里滋长。一种没有注明出版者和出版地址的传单现在正在大量散发，这就是这种敌对情绪的新证据。”

“阅报室”所说的传单，我们的读者大概都知道。

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无论是对全德国来说，无论是对莱茵省来说，柏林并不是巴黎这种见解至少在柏林人中间找到了一个拥护者。柏林开始意识到，它不能统治我们，它不能赢得一个首都城市所享有的那种威望。在不彻底的三月革命中，在袭击军械库以及不久前发生骚动²²⁶的时候，柏林充分地暴露了它的软弱无力。除了柏林人表现得不够果敢以外，各个党派也十分缺乏有才干的人。自从

2月起,在运动的全部进程中,柏林没有出现一个能够领导自己政党的人。“精神”的首都的这种精神充满了善良的意向,但是它也和肉体一样并不健壮。柏林人甚至不得不把他们的汉泽曼、康普豪森和米尔德从莱茵或者西里西亚解救出来。柏林还远不能称为德国的巴黎,它甚至连普鲁士的维也纳也称不上。它不是首都,而是“官邸”。

更值得注意的一种情况是:柏林的人们也开始得出在莱茵早已成为公认的结论,即只有德国各个所谓的列强的崩溃,才能产生德国的统一。我们从未掩饰过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无论是德国过去的光荣还是现在的光荣,无论是各次解放战争还是在伦巴第和什列斯维希“德国武装的光荣胜利”,我们都不赞赏。但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从德国得到某些有用的东西,德国的集中是必要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德国应当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为此,首先必须使“无论是奥地利或普鲁士”²²⁷都不再继续存在。

不过,把我们和腐朽的普鲁士“长期以来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精神”,是完全可以感觉得到的粗野的精神,即15000把刺刀和一批大炮的精神。在莱茵建立了上西里西亚波兰人和卡舒布人的士兵驻扎区不是无目的的,我们的青年被赶入柏林近卫军也不是无目的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使 we 和其他省份和解,而是为了挑拨省与省之间的不和,为了利用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民族仇恨以及一个微不足道的德国省份对其邻省所抱的地域敌视态度来巩固封建宗法的专制统治。《Div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

的确,“各省”即乌刻马克的和东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地主用他们许多惊慌的呼吁强令柏林人扮演的那种虚构角色(柏林人慌忙地承担了这种角色)已经是结束的时候了。柏林不是——而且永远

也不会是——革命的中心,民主的首都。只有勃兰登堡的贵族们在面临破产而惊慌失措的时候、在因债务被捕和受绞架威胁而吓得发抖的时候所产生的幻象,才能赋予柏林这种作用。也只有那些有轻浮的虚荣心的柏林人才会把这班贵族当作真正的地方代表。我们承认三月革命,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真实情况。它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使柏林人革命化。

“阅报室”认为,借助于自由化的机关就能使瓦解中的普鲁士国家重新巩固起来。恰恰相反!这些机关愈自由化,各种不同的因素就愈容易彼此分离;分离的必要性就愈明显,柏林各党派政客的昏庸无能也就愈加暴露无遗。

再说一遍:莱茵省并不反对和旧普鲁士各省一起仍然作为德国的成员。但是要它永远作为普鲁士的组成部分(不论普鲁士将来是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一样),这就是说要使德国的统一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这也就是说,德国为了使普鲁士保留莱茵省,也许(这里我们是反映人民的共同意见)自己要丢掉一个广大而美丽的省份。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8 月 26 日

载于 1848 年 8 月 27 日

“新莱茵报”第 87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载于
1944 年版“马克思和恩
格斯反对德国反动派”
文集

调停和干涉。 拉德茨基和卡芬雅克

由于查理-阿尔伯特的判卖行为而签订的停战协定²²⁸大约再过3个星期(9月21日)就到期了。法国和英国提出调停。奥地利对这一提议至今还未置可否,——关于这一点可以看看卡芬雅克的报纸“共和主义观察家”。奥地利的这种无礼态度终于激怒了法国的独裁者,他威胁说,如果维也纳政府到特定的日期不给以回答或拒绝调停,他就要进行武装干涉。奥地利是否容许那位卡芬雅克恰好在它战胜了维也纳的民主派和意大利的“暴动者”以后的今天强迫它接受和平呢?奥地利很清楚:法国的资产阶级希求“和平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意大利将来是自由还是被奴役,这对于一般资产阶级来说完全一样;只要不在全世界面前公然侮辱资产阶级,因而也不强迫它违背自己的意志拿起宝剑,它就会赞同一切。据说,拉德茨基不久要到维也纳去决定调停问题。但是,要决定这个问题他完全可以不必到维也纳去。他的政策目前占有优势,即使他仍然留在米兰,他的意见也是一点不会减少分量的。如果奥地利接受英法所提出的媾和条件,这并不是因为它害怕卡芬雅克的干涉,而是由于更加紧要和更加迫切的原因。

意大利人也和德国人一样被三月事件欺骗了。意大利人想,现在无论如何要推翻外来的统治了;德国人认为,旧制度永远被埋葬

了。但是实际上,在意大利,外来的统治空前加强了,而在德国,旧制度在三月里受了某些打击后又恢复了常态,并且变本加厉,急待复仇。

目前意大利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等待当前的法国政府来拯救。实际上只有这个政府垮台以后他们才能得救。其次,意大利人认为,在法德等国的民主势力日益丧失立足之地的时候,他们也能解放自己的国家,这也是错误的。现在打击意大利的反动势力并不是来自意大利本国,而是来自欧洲。意大利单独不能逃出这一反动势力的魔掌,要想在法国资产阶级的援助下做到这一点更加不可能,因为法国资产阶级正好是全欧洲反动势力的真正支柱。

首先必须在法国打垮反动派,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意大利和德国消灭它。因此,法国应该首先宣布成立社会民主共和国,法国的无产阶级应该首先箝制住本国的资产阶级,只有这样,意大利、德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民主派才能获得巩固的胜利。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8 月 31 日

载于 1848 年 9 月 1 日
“新莱茵报”第 9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

科伦 9 月 2 日。模范的立宪国家比利时又一次出色地证明了它的制度的优越性。由于里斯康土的滑稽可笑的事件²²⁹,竟有 17 个人被判处死刑!一些冒失的莽汉企图撩起道德高尚的比利时民族的立宪外衣的衣角,这对她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为了洗雪这种侮辱,17 个人被判处死刑!17 个人被判处死刑,这是多么野蛮!

里斯康土事件是人所共知的。比利时的工人在巴黎聚集起来,企图向祖国实行共和主义的进军。从布鲁塞尔来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支持了这种蠢事。赖德律-洛兰尽力促其实现。“心地纯洁的”叛徒拉马丁,对待外国的民主主义者也象对待法国的民主主义者一样,向来是说话漂亮,做事肮脏;他经常吹嘘说,他曾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进行秘密活动,就象避雷针同闪电一样。就是说他最初支持比利时军团,是为了后来更好地出卖它。军团出发了。诺尔省政府委员德勒克吕兹把第一纵队出卖给比利时的铁道官员;运送第一纵队的列车被背信弃义地开进了比利时的领土,落入了比利时的刺刀丛中。第二纵队曾由 3 个比利时密探带领(巴黎临时政府的一位委员亲自对我们说过这件事,后来事情的整个发展过程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密探响导把它领到了比利时领土上的一个森林中,那里有实弹的大炮在等待它。纵队的一部分人被击毙,大部分人被俘虏。

1848年革命的这个小插曲,由于背叛行为的层出不穷和在比利时对它的规模的夸大,而使它变成滑稽可笑的了。它成了比利时检察机关的一块画布,比利时检察机关在这块画布上描绘出了一幅不知何时策划好的规模巨大的阴谋案的景象。安特卫普的解放者梅利奈老将军、特德斯科、巴兰——简言之,布鲁塞尔、列日和根特等地的最坚决最积极的民主主义者都被牵连到这一案件中去了。如果若特兰先生不了解那些内情和没有掌握那些文件(把这些文件公布出来就会使整个比利时政府,包括最英明的列奥波特在内,都要名声扫地),他也许会被巴魏先生牵连进去。

为什么要逮捕这些民主主义者呢?为什么要对那些象审判他们的陪审员一样同这个事件没有多大关系的人们进行这种骇人听闻的审判呢?为的是要激起比利时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并利用这种恐惧心理来征收额外税和发行强制公债;强制公债好像是建筑美好的比利时国家大厦的水泥,没有它大厦就要垮台!

被告出庭受审。审判他们的是安特卫普的陪审员,是佛来米酒徒中间的优秀分子,这些人同法国政治上的自我牺牲精神或庄严的英国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都是格格不入的;审判他们的是一些财迷转向、利欲熏心的鲨鱼商。伟大的巴魏知道他在和什么人打交道,于是就利用了这些人的恐惧心理。

究竟谁在安特卫普真正看见过共和主义者呢?而现在却有32个这样的怪物站在惊惧的安特卫普人面前;吓得直打哆嗦的陪审员竟同最英明的法官一起把17个被告按Code pénal(刑法典)第86条和以下各条判处,就是说处以死刑!

在1793年恐怖时期,就曾有过利用审判来实行镇压的情形,那时官方公布的事实并不是判决的真正原因。但是,甚至狂热的富

吉耶·丹维尔也从来没有主持过这种充满粗鲁无耻的谎言和偏颇盲目的仇恨的审判。难道比利时爆发了内战？难道半个欧洲都和叛乱分子勾结起来，并且陈兵于比利时的国境，就象 1793 年在法国那样？难道祖国已经处于危急之中？难道宝座上出现了裂缝？恰恰相反，谁也不想去奴役比利时，最英明的列奥波特直到现在还每天不带警卫从拉肯到布鲁塞尔，又从布鲁塞尔回到拉肯。

陪审员和法官把 81 岁的梅利奈老人判处死刑，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呢？这位法兰西共和国的老战士在 1831 年挽救了比利时的最后一点荣誉。他解放了安特卫普，因此安特卫普要把他判处死刑！他的全部罪过就在于：他曾保卫自己的老朋友贝克尔免受比利时官方报纸的攻击，当贝克尔在巴黎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他仍和他保持友好的关系。梅利奈和阴谋没有丝毫关系。可是人们却要轻率地把他判处死刑。

而巴兰呢？他是梅利奈的朋友，他经常去拜访他，有人看见他同特德斯科一起进咖啡馆，——这就是把他判处死刑的充分根据。

最后，特德斯科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他不是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吗？难道他同那些被比利时警察当作暗投假匕首的对象的人没有联系吗？难道没有人看见过他同巴兰一起进咖啡馆吗？证据确凿，里斯康士附近人们的战斗是特德斯科煽动起来的，因此把他判处死刑！

对其他人的判决的根据也是如此。

这些“阴谋家”之所以被判处死刑，仅仅因为他们是民主主义者；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我们有权称自己是他们中间很多人的朋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战友威廉·沃尔弗侨居比利时期间，比利时警察为了把他逮捕，诬称他家藏有匕首、图谋不轨，实际上是栽赃陷害。——译者注

友。如果卖淫式的比利时报纸诬蔑他们，我们就要在德国民主派的面前至少替他们的声誉辩护。如果他们的祖国抛弃他们，我们就承认他们是自己人！

当审判长宣布对他们的死刑判决时，他们热烈地高呼：“共和国万岁！”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以及在宣判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真正革命者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卑贱的比利时报纸在说些什么。

“安特卫普报”写道：“和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兴趣的整个审判案一样，判决在城内也没有引起更强烈的反应。只有在劳动阶级中间（应读为：流氓无产阶级中间）才可以看出对共和国骑士的敌意；其余居民根本没有注意审判案，在他们看来，这种挑起革命的企图，即使在死刑宣判以后，也仍然是滑稽可笑的，况且谁也不相信这个判决将会执行。”

当然，只有把以安特卫普的救星——年老的梅利奈为首的 17 个共和主义者绑赴刑场斩首的有趣场面实地拿给安特卫普人看的时候，他们才会对审判案发生兴趣！

似乎不应该把比利时政府、比利时陪审官和比利时法庭把死刑判决当儿戏的作法看作是他们的兽行！

“列日自由主义者”写道：“政府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但是，它表现出的只是兽行而已。”

可是，佛来米民族的命运给终就是如此。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9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9 月 3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93 号

马克思和普鲁士国籍²³⁰

科伦 9 月 4 日。前些日子我们曾经提到，“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为普鲁士国籍问题曾和当局发生了一场纠葛。这件事情又一次证明，为了用欺骗手段把 3 月间许下的诺言化为泡影，当局采取了些什么手段。从马克思致内政大臣屈韦特尔先生的下列文件中便可看出究竟。

大臣先生！

请允许我就本地王国区行政机关对我个人作出的决议向您提出申诉。

1843 年我离开祖国——莱茵普鲁士——暂时居住巴黎。1844 年我获悉，由于我的一些著述，王国驻科布伦茨总督指令有关的边防警察当局逮捕我。这条消息也曾经在柏林各家受检查的报纸上公布。从那时起，我便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政治流亡者。后来，1845 年 1 月，由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我被驱逐出法国，移居比利时。但是普鲁士政府又要求比利时内阁驱逐我，这时我无可奈何，只得请求退出普鲁士国籍。为了免受诸如此类的迫害，我不得不采取这种非常措施。我申请侨居国外仅仅是从自卫的角度考虑，对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就是：我没有加入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国

见本卷第 432 页。——编者注

籍,虽然在二月革命后法国临时政府的委员们曾建议我加入法国国籍。

三月革命后我回到祖国,4月间我即在科伦申请公民权,当时地方市政局毫无阻难地给了我公民权。根据1842年12月31日法案的规定,事情须经王国区行政机关批准。现在我接到这里的警察厅长盖格尔先生的公函,内容如下:

No :2678

“马克思博士阁下:

兹通知阁下,王国区行政机关鉴于您过去的情况,认为对您不能行使1842年12月31日法案第5条所规定的批准外国人加入普鲁士国籍的权利。因此,您今后仍然应当算作外国人(上述法案第15、16条)。

警察厅长盖格尔(签名)

1848年8月3日于科伦”

我认为王国区行政机关的这一决议是非法的,原因如下:

根据今年3月30日联邦议会的决议,凡回到德国并要求重新加入德国国籍的政治流亡者,也享有国民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根据预备国会的决议,甚至已经成为外国公民的政治流亡者,只要他们愿意重新加入德国国籍,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这一决议没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可是它是在革命之后马上向德国人民许下的诺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有重大意义的。

无论如何,联邦议会的决议和康普豪森内阁依据该决议制定的选举制度在普鲁士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因为我想重新加入德国国籍的愿望在我申请科伦居住权时已经写得非常清楚,所以已取得德国国民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就是说至少我享有德国公民权。

假如我享有只有德国人才享有的那种最高权利,那末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给我普鲁士公民权这种有限的权利。

科伦的王国区行政机关援引了 1842 年 12 月 31 日的法案。但是,由于上述联邦议会的决议,这一法案也是对我有利的。

根据第 15 条第 1、3 款,普鲁士臣民凡本人申请退出或居留国外 10 年者,取消他们的普鲁士国籍。在革命后回国的许多政治流亡者,他们都在国外居留过 10 年以上,根据上述法案第 15 条,他们和我一样不再是普鲁士公民了。然而其中有的人,如象雅·费奈迭甚至出席了德国国民议会。所以,普鲁士“警察当局”(法案第 5 条)——只要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剥夺这些德国立法者的普鲁士公民权!

最后,我认为完全不能容忍的是,这里的王国区行政机关或警察厅长盖格尔先生在给我的通知书中都用了“臣民”的字样,而上届和本届内阁都已从所有的官方文件中取消了这一用语而代之以“国家公民”。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忽视我的普鲁士国籍,把我这样一个德国公民叫做“外国人”。

其次,王国区行政机关“鉴于我过去的情况”不给予我普鲁士国籍,这不会是指我的物质情况,因为依据 1842 年 12 月 31 日法案的确切含义,只有科伦市政局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决议。而科伦市政局的决议对我是有利的。问题只能是指我作为“新莱茵报”总编辑的活动,也就是说,鉴于我的民主主义见解和我对现政府所抱的反对态度。然而,如果这里的区行政机关或柏林的内政部在这种完全符合联邦议会 3 月 30 日的决议的情况下还有权利(我否认这种权利)不给予我普鲁士国籍,那末这种心怀叵测的借口只有在旧

日的警察国家里才会被采用!但绝不该在普鲁士被采用,因为这里已进行过革命,并且建立了责任政府。

末了,还应当指出:我曾经向警察厅长弥勒先生声明,我不能在目前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把我全家从特利尔搬到科伦去。弥勒先生曾向我保证说,恢复公民权不会遇到任何阻难。

根据上述一切,我请求您,大臣先生,下令本地的王国区行政机关批准本市市政局给我的居住权,从而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

谨致敬意。

卡尔·马克思

1848年8月22日于科伦

载于1848年9月5日
“新莱茵报”第9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和丹麦的休战

科伦 9月7日。

“如果普鲁士不再领导德国 ,如果普鲁士的部队不再保卫德国的荣誉 ,如果普鲁士这样一个强国的势力向幻想的德国中央政权那种虚无缥缈的统治让步 ,那末德国将成为什么样子呢 !”

普鲁士党 ,“天佑吾王 ,天佑吾国”的英雄们的党 ,东波美拉尼亚和乌刻马克的反革命的贵族这样大言不惭地声明。

普鲁士果然领导了德国 ,普鲁士果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保卫了德国的荣誉。

而结果怎样呢 ?对软弱的敌人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和不光采的胜利 ,在怯懦无比的外交影响下中途停战 ,在溃败的军队面前可耻地撤退 ,最后实行休战 ,这种休战对德国来说是这样的奇耻大辱 ,甚至连普鲁士的将军都不愿意在休战协定上面签字。

军事行动和谈判重新开始了。帝国的摄政王授予普鲁士政府签订休战协定的全权 ;但是这个全权没有一个帝国大臣副署 ,因此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依据这个全权 ,第一次休战协定得到承认 ,但需作以下的修改 : (1)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新政府成员必须在签订休战协定以前就“协商好 ,以便使新政府的成立及其顺利的活动有充分的保证” ; (2)在签订休战协定以前 ,临时政府所公布的一切法律和命令继续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 ; (3)驻扎在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一切部队都要服从德国总司令的命令。

如果把这个指令和第一次普鲁士-丹麦休战协定草案的条件比较一下,那末指令的目的就非常明显了。这些条件远不能满足胜利的德国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但是这些条件虽然在形式上作了很多让步,实质上却拯救了许多东西。

第一个条件:必须保证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德国)方面在新政府里比丹麦占优势。而普鲁士的作法怎样呢?它同意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丹麦党首领卡尔·莫尔特克作新政府的首领,并同意丹麦在政府中拥有3票以对付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2票。

第二个条件:如果不承认被联邦议会所承认的临时政府本身,那至少也要承认临时政府以前的活动。临时政府的法令必须继续有效。而普鲁士的作法怎样呢?反革命的普鲁士借口丹麦也放弃幻想的法令(这些法令是在哥本哈根为各公国颁布的,在阿尔森乌以外从来没有丝毫法律效力),同意废除临时政府的一切法令。

最后,第三个条件:必须预先承认各公国的统一和承认它们归附德意志;一切驻扎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部队都要服从德国总司令的指挥,这必然会使丹麦人企图暗中把曾在丹麦军队中服过役的什列斯维希人派遣到什列斯维希去的企图完全破产。而普鲁士的作法又怎样呢?普鲁士同意什列斯维希的军队和霍尔施坦的军队脱离,不受德国总司令的支配,并干脆移交给³/₅的成员是丹麦人的新政府去掌握。

此外,普鲁士只有签订为期3个月的休战协定(第一次草案第一条)的全权,但它却刚愎自用地签订了7个月的休战协定;这就

是说,在冬季的几个月期间,正当海军(这是丹麦人的主要力量)不能封锁德国和什列斯维希沿岸的时候,正当严寒使德国人能从冰上渡过小海峡,占领芬宁,并把丹麦的领土限制在一个西兰岛上的时候,普鲁士却给了丹麦人以休战的机会。

总而言之,普鲁士在上述三方面都没有完成所负的全权使命。为什么没有完成呢?原来这个全权没有副署!难道普鲁士驻中央政权机关的使节康普豪森先生在9月2日给黑克舍尔先生“阁下”(!!)的信中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普鲁士政府“根据这个全权,认为自己有权签订不带任何保留条件的条约”吗?

不仅如此,帝国的摄政王还派遣国务大臣助理、“自己的”马克斯·加格恩到柏林去,再由柏林到什列斯维希去监督谈判。摄政王授予他的依然是没有副署的全权。加格恩先生(我不知道他在柏林受到了怎样的接待)到公国去。而普鲁士的进行谈判的全权代表们却在马尔摩。这一点根本没有通知加格恩。在卢卑克互换批准书。这时才通知加格恩先生说:批准书已经交换过了,他现在可以安然回家了。负着没有副署的全权使命的倒霉的加格恩当然只好回到法兰克福去,抱怨自己无可奈何地扮演了那个可怜的角色。

光荣的休战协定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休战协定在最有利于作战的季节捆住了德国人的双手,消灭了革命政府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民主制宪议会,废除了这个政府所颁布的得到联邦议会承认的一切法令,把公国交给由可恨的莫尔特克领导的丹麦的政府(按成员议)去统治,强迫什列斯维希的士兵脱离自己的团队,

使他们不受德国总司令的支配,并把他们交给〔公国的〕丹麦政府(丹麦政府可以随意解散他们);这个休战协定迫使德国部队从克尼格绍 撤到汉诺威和梅克伦堡,并把劳恩堡转交给反动的丹麦旧政府去摆布。

不仅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且全德国(除了旧普鲁士各省以外)都因这个可耻的休战协定义愤填膺。而帝国内阁(康普豪森先生曾把休战协定通知过内阁)开始是张皇失措,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协定。那末康普豪森先生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大概采取了威胁手段,普鲁士官方对怯懦的反革命的帝国内阁来说,毕竟还是一种压力。但是后来问题提到了国民议会。必须取得国民议会的同意,不管国民议会的行动多么规矩,而黑克舍尔先生“阁下”在提出这个文件时仍然感到拘窘。他在宣读文件时打躬作揖和低声下气地要求大家保持安静和心平气和。然而群情顿然激昂起来。甚至中间派右翼,甚至一部分右派分子和达尔曼先生本人都感到非常气愤。责成委员会在24小时内提出报告。根据该报告做出了立即暂时停止撤退军队的决定。关于休战协定本身的决议还没有通过。

国民议会终于通过了一个强硬的决定,虽然内阁声明,这样的决定如被通过,它就提出辞职。这个决定不是拒绝休战协定,而是破坏休战协定。这个决定不仅会使公国群情激愤,而且还会引起对实行休战协定和新政府的抗拒;它会引起新的纠葛。

但是我们对议会否决休战协定本身这一点抱的希望不大。拉

丹麦称作:康格·奥。——编者注

这个戏法是这样变的:旧政府被解散,随后由丹麦把这个旧政府中一个成员重新选入新政府,由普鲁士选入另一个,再由丹麦和普鲁士共同选入第三个。

多维茨先生只要把中间派的 9 票争取过来 ,就能获得多数。难道他在决议通过前的几天内做不到这一点吗 ?

如果议会决定批准休战协定 ,那末结果将是这样 :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宣告成立共和国和发生内战 ,中央政权完全服从普鲁士 ,整个欧洲都要鄙视中央政权和议会 ,同时将会造成许多纠纷 ,这些纠纷足以使今后任何一个帝国内阁遭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垮台。

如果议会决定废除休战协定 ,那末结果将是这样 :发生欧洲战争 ,普鲁士和德意志分裂 ,爆发新的革命 ,普鲁士趋于崩溃和德国得到真正的统一。议会不必害怕 :至少有 $\frac{2}{3}$ 的普鲁士人是站在德国一边的。

法兰克福的资产阶级代表宁愿含羞忍辱 ,宁愿做普鲁士的奴隶 ,也不愿意在欧洲进行革命战争 ,使自己在德国的阶级统治遭受新风暴的威胁 ,难道不是这样吗 ?

我们认为事情一定会是这样。资产阶级的本性太怯懦了。我们不相信 ,法兰克福议会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能够挽救已经在波兰遭到侮辱的德国的荣誉。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9 月 7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9 月 8 日
“新莱茵报”第 97 号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办事内阁的垮台

科伦 9 月 8 日 ,晚上 10 点钟。办事内阁被推翻。在这以前它曾经不止一次地“摇摇欲坠” ,只是由于它厚颜无耻才又支持下来。内阁贪得无厌的奢望苛求 ,终于使议会明白内阁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秘密。

在妥协议会昨天的会议上 ,讨论了施泰因的提案²³¹。该提案说 :

“内阁刻不容缓的任务 ,就是马上根据 8 月 9 日的决议颁布命令以安定全国 ,并避免和国民议会分裂。”

内阁声明 :它不作任何让步 ,任何妥协。

左派声明 :如果议会否认它 8 月 9 日的决议 ,他们就退出议会。

在昨天的会议上 ,当首相发表了空洞无物的演说之后 ,翁鲁议员提出了下列修正案 :

“鉴于 8 月 9 日的决议既不是为了探究思想方式 ,也不是为了压制良心 ,只是为了使立宪国家的人民和军队之间建立必要的和睦关系 ,防止反动派的阴谋 ,预防今后有军籍的公民和平民之间的冲突 ,”——

议会声明 :

“如果内阁再迟迟不根据 8 月 9 日的决议向军队发布命令 ,它就会失去全国的信任。”

和中间派左翼这个修正案相对立的有塔姆瑙议员提出的中国派右翼的修正案。

后者称：

“国民议会认为有必要作如下的解释：国民议会在它今年 8 月 9 日的决议中所指的，是向军队的指挥人员发布 7 月 15 日财政部和内政部分别向区督察员发布的那种命令。议会并不是要强迫军队的军官陈述他们的政治信仰，也不打算向陆军大臣颁发这一命令的正文。议会认为为了公民的安全和新的立宪国家制度的发展，有必要颁布一项命令以防止军官的反动意向与共和意向。”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争论，“高尚的”施莱根施坦代表内阁声明同意塔姆瑙的修正案。而在这之前他还骄傲地提出保证说：内阁不作任何妥协！

又继续争论了一些时间，米尔德先生甚至警告议会不要变成革命公会（米尔德先生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接着便举行投票。这时会议厅外面挤满了人。

记名投票：

翁鲁的修正案以 320 票对 38 票被否决。

塔姆瑙的修正案以 210 票对 156 票被否决。

施泰因的提案以 219 票对 152 票通过。多数（多 67 票）反对内阁。

本报驻柏林的一个记者报道：

今天全城沸腾，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国民议会开会的那座大厦；在主席宣读了市民自卫团的十分忠诚的贺词之后，赖辛施佩格先生建议议会搬到其他城市去开，因为柏林处在威胁之下。

内阁垮台的消息刚刚传出来，聚集着的人们就响起了一片难以形容的欢呼声。当左派的议员出来的时候，人们不断地高呼“万

岁”，一直把他们送到菩提树街。当施泰因议员(今天投票通过的提案是他提的)出现的时候，人们的情绪激昂起来了。有几个人立即把他抬起来，以凯旋的心情把他送到陶本施街旅馆门口。成千上万的人随着前进，群众不断地高呼“万岁”通过了歌剧院广场。这里从来还没有看到过这样欢腾热烈的场面。愈为胜利担心，胜利就愈加光辉灿烂。

投票罢免内阁的有：左派，中间派左翼(洛贝尔图斯-贝尔格派)和中间派(翁鲁、敦克尔、科施)。在三次投票时主席都支持内阁。在这之后，瓦尔德克-洛贝尔图斯内阁可以指望得到绝对的多数。

因此，过些日子我们将会满意地看到：强制公债的倡议人办事大臣汉泽曼先生“阁下”将怎样在这里闲游，将怎样重过他那“市民的生活”并细心思考杜沙特尔和品托的言行。

康普豪森的垮台还算很体面。被自己的种种阴谋诡计拖下台的汉泽曼先生的结局却非常可悲！可怜的汉泽曼-品托！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9 月 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9 月 10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99 号

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

科伦 9 月 9 日。由于国民议会的优柔寡断(它不去迅速而果断地做出决定,设法任命新的大臣,却容许委员会不慌不忙地进行讨论,把内阁危机交给上帝去解决),我们现在再来谈谈和丹麦的休战。这种拙劣地掩盖“我们亲爱的朋友没有勇气”²³²这一事实的优柔寡断的态度,使我们有时间来谈这个问题。

意大利的战争一直不受民主党的欢迎,而且甚至连维也纳的民主主义者也早已对它不感兴趣了。普鲁士政府利用伪造的文件和谎话只能使因波兹南的歼灭战而引起的社会上不满的风暴延长几个星期而已。布拉格的巷战尽管被民族主义的报刊大肆渲染,但是它只能引起人民对失败者而不是对胜利者的同情。相反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一开始就受到人民的欢迎。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当时在意大利、波兹南和布拉格德国人曾反对革命,而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德国人则支持了革命。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战争。因此我们一开始就主张坚决和丹麦作战,但这和举杯歌颂受海洋冲洗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资产阶级的热情毫无共同之处。

对德国来说,最悲惨的是,它的第一次革命战争乃是历来战争中最滑稽的战争!

现在来谈谈问题的实质。丹麦人民无论在贸易、工业、政治和文学等方面都处于绝对依赖德国的地位。大家知道,丹麦的京城实际上不是哥本哈根,而是汉堡;丹麦政府在整整一年中仿照因街垒战而垮台的普鲁士政府的榜样对联合议会进行了各种试验;丹麦从德国获得全部文学资料,正如获得物质资料一样,因此丹麦文学(除了霍尔堡以外)实际上是德国文学拙劣的翻版。

尽管德国从来软弱无力,但是它能感到满意的是:斯堪的那维亚的各个民族(包括丹麦在内)毕竟要仰它的鼻息,它和这些民族比较起来甚至还算是革命的和先进的国家哩。

你们需要证据吗?你们不妨了解一下自从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的思想出现以来在各个斯堪的那维亚民族之间所展开的激烈论战。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的含义是:歌颂残酷、粗暴和海盗式的古诺曼人的性格,即极端的闭关自守状态,在这种闭关自守的状态下,表达丰富的思想和感情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即粗暴地对待妇女、经常酗酒和疯狂好战(Berserkerwut),而又多愁善感。

斯堪的那维亚主义以及与受海洋冲洗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有种族关系的理论同时出现在丹麦国王的土地上。它们彼此关联,相依为命,互相斗争,从而保存自己。

斯堪的那维亚主义是丹麦人向瑞典人和挪威人求援的形式。但是发生了在基督教日耳曼民族那里所经常发生的事情:立刻产生了一种争论,即谁是真正的基督教日耳曼人,谁是地道的斯堪的那维亚人。瑞典人说丹麦人“德意志化了”和退化了,挪威人又说瑞典人和丹麦人才是这样,而冰岛人却说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当然,

Berserker 是指斯堪的那维亚传说中凶猛的武士的形象。——编者注

一个民族越落后,它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越接近古诺曼人,它就越具有“斯堪的那维亚的”性格。

我们手头有一份 1846 年 11 月 18 日克利斯提阿纳的“晨报”²³³。在这份可爱的报纸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几处关于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的饶有趣味的地方。

这篇文章把整个斯堪的那维亚主义完全说成是丹麦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想激起运动的一种企图,它这样描绘丹麦人:

“这个活泼愉快的人民与古老、严峻和忧郁的战士的世界有什么共同之处(med den gamle, alvorlige og vemodsfulde Kjømpeverden)呢?这个性格柔弱而温和(甚至连一个丹麦作家也这样认为)的民族怎么能认为自己在精神上同坚强而精力充沛的古代人相近呢?这些操着柔和的南方口音的人怎么能以为他们讲的是北方话呢?我们这个民族和瑞典民族以及古老的北方居民的主要特征是:感情涵蕴而不外溢,可是这些敏感而诚恳的人却那样容易惊慌、激动和放弃己见,他们的一切举止神情很容易表露出自己的内心感受,虽然如此,这些人却认为他们是按照统一的北方样子制成的,他们在性格上是和其他两个斯堪的那维亚民族相近的!”

“晨报”用丹麦人和德国的联系以及在丹麦推行德国风俗来解释丹麦人的这种退化。虽然德国人

“丧失了自己最神圣的财富,即自己的民族性格;但是,不管德意志的民族性多么软弱无力和平淡无奇,而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更软弱无力和平淡无奇的民族性,即丹麦的民族性。德国语言在亚尔萨斯、瓦得和斯拉夫的境内虽然受到排斥(!!当时“德国弟兄们的”功绩还没有被宣扬出去),而在丹麦的境内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因此,据说丹麦人现在必须把自己的民族性和德国人对立起来,而且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才发明了斯堪的那维亚主义;丹麦

即奥斯陆。——编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的民族性是无力反抗的，

“因为，如上所述，丹麦民族虽然没有采用德国语言，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德意志化了。作者本人在一份丹麦报纸上读到过如下的自白：丹麦的民族性在本质上和德意志的民族性没有区别。”

“晨报”就是这样写的。

当然不能否认，丹麦人是半开化的民族。不幸的丹麦人！

根据法国人据以夺取了弗朗德里亚、洛林和亚尔萨斯以及迟早会侵占比利时的那种权利，德国正在夺取什列斯维希，这种权利就是：文明对于野蛮的权利，进步对于停滞的权利。即使（很值得怀疑）协定对丹麦有利，但是这个权利超过了一切协定，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权利。

只要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运动保持纯粹资产阶级的、和平的、合法的和庸俗的宣传性质，那末这个运动就只能激起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的热情。因此，在二月革命前，现在的丹麦国王在登极时曾答应实行自由主义的宪法，根据这个宪法，公国代表和丹麦代表的人数相等，但是公国对此表示反对，这样，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地方性质就令人讨厌地出现了。当时与其说要和德国（难道当时有德国吗？）合并，倒不如说要脱离丹麦而建立一个地方性的小的独立国家。

但是革命突然爆发了，因而使运动具有另外一种性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党应当抉择：或者是灭亡，或者是决心实行革命。它决心实行革命，而且正确地实行了革命：因为丹麦在革命以前所许下的慷慨诺言到了革命以后就不能令人满意了；和德国合并在过去是一句空话，而现在则有意义了；德国已经历了革命，而丹麦却照常拙劣地模仿德国的革命。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和由于这个革命而产生的临时政府，最初带有小市民的性质。但是战争很快就迫使它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个政府（它的成员仅仅是一些可敬的老自由主义的活动家，即韦尔凯尔、加格恩和康普豪森的老伙伴）给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提供了比较民主的法律，这些法律比德意志其他任何一个邦的法律都要民主。基尔会议是所有德国会议中不仅以普选权为基础，而且以直接选举为基础的唯一的一次会议。政府向基尔会议提出的宪法草案是至今用德文起草的所有宪法草案中最民主的草案。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在政治上一直是尾随德意志的，但由于革命战争的结果，它立刻建立了比德意志其余各邦都进步的制度。

我们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进行的战争是真正的革命战争。

谁一开始就站在丹麦一边呢？欧洲 3 个最反动的强国：俄国、英国和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自始至终进行的只是虚假的战争，只要回想一下维登布鲁赫的照会²³⁴、普鲁士政府根据英国和俄国的声明下令从日德兰撤退的决心以及两次休战协定就清楚了！普鲁士、英国和俄国这 3 个强国最害怕德国的革命和革命的最直接的结果——德国的统一。普鲁士怕德国统一以后自己不能再存在，英国怕因此不能再剥削德国的市场，俄国怕因此民主制不仅会推广到维斯拉河，甚至会推广到德维纳和德涅泊河。所以普鲁士、英国和俄国共同密谋反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反对德国和反对革命。

目前由于法兰克福的决定而可能引起的战争也许会成为德国反对普鲁士、英国和俄国的战争。这将是反对 3 个反动强国的战争，无精打采的德国运动正需要这种战争，这场战争将真正使普

鲁士和德国溶为一体，将使德国绝对需要和波兰结成联盟，将立刻使意大利获得解放，这场战争将要反对的恰恰是德国在 1792—1815 年的旧的反革命同盟者，它将使“祖国遭到危险”并从而拯救祖国，因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将以民主制的胜利为转移。

让法兰克福的资产者和容克地主对此不要抱任何幻想：如果他们决定反对休战协定，他们就注定要垮台，就象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吉伦特派参加了 8 月 10 日事件并赞成把以前的国王处以死刑从而使自己在 5 月 31 日垮台一模一样。相反地，如果他们同意所提出的休战协定，他们也注定要垮台，因为他们将受普鲁士的控制，他们的下场将是如此。何去何从，让他们自己选择吧。

也许汉泽曼垮台的消息还在投票以前就已传到法兰克福了。这个消息可能对投票的结果起很大的影响，这特别是因为，象大家所知道的，众所期待的瓦尔德克和洛贝尔图斯内阁会承认国民议会的自主权。

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但是我们再重复一遍：德国的荣誉操在坏人的手中！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9 月 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9 月 10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99 号

危机和反革命²³⁵

—

科伦 9 月 11 日。请读一下下面刊载的本报柏林通讯,看我们过去是否完全准确地预见到了内阁危机的发展。原来的大臣们辞职了;内阁的计划是想靠解散妥协议会,求助于戒严令和大炮来维持下去,看来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权奸的赞同。乌刻马克的容克地主渴望和人民发生冲突,渴望巴黎的六月事件在柏林的街头重演。但是,他们永远不会为汉泽曼内阁而奋斗,他们是要为普鲁士亲王内阁而奋斗。被召来执政的将是象拉多维茨、芬克这样一些可靠的人,他们和柏林议会格格不入,和柏林议会毫无关系。这些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贵族中的精华,为了摆样子而和一些值得尊敬的极右翼资产者联合起来,和受理乏味的国家贸易事务的贝凯拉特之流联合起来,这就是人们打算用来给我们造福的普鲁士亲王内阁。而且,他们散布种种谣言混淆社会视听,说也许会请瓦尔德克或洛贝尔图斯来组阁,他们同时却在进行战斗准备,伺机公开进攻。

我们迎接决战。在法兰克福和柏林同时发生的危机,以及最近两个议会所通过的一些决议,促使反革命进行决战。如果柏林有人胆敢践踏多数人支持的立宪原则,如果用两倍的大炮来对付 219

票的多数 ,如果不仅在柏林 ,而且在法兰克福有人竟敢嘲弄多数 ,组成两个议会都不能接受的内阁 ,从而挑起普鲁士和德国之间的内战 ,那末 ,民主主义者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

二

科伦 9 月 12 日。我们昨天发表的关于新的帝国内阁的消息，又从其他方面得到证实，今天白天也许就能得到它最后成立的消息，这时，柏林的内阁危机还在继续。危机的解决大概只有两条道路：

要么是成立瓦尔德克内阁，承认德国国民议会的威望，承认人民的主权；

要么是成立拉多维茨-芬克内阁，解散柏林议会，消灭革命成果，建立虚伪的立宪政体或者甚至是联合议会。

直截了当地说：柏林所爆发的冲突不是妥协派和各部大臣的冲突，而是第一次以制宪议会的面貌出现的议会和国王的冲突。

一切都取决于有没有勇气解散议会。

可是国王有权解散议会吗？

当然，在立宪的国家里，国王有权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解散根据宪法召集的立法议会，并且呼吁人民重新选举。

柏林议会是立宪的立法议会吗？

不是，它是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普鲁士国家的宪法”而召集的。它的成立并不是依据宪法，而是依据革命。它的职权决不是受自国王或者对国王负责的各部大臣，而是受自它的选民和它自己。议会是革命的合法体现者，它是独立自主的，康普豪森先生和联合议会以 4 月 8 日选举法的形式为它制定的职权，只不过是一种善

良的愿望,其命运还要由议会来决定。

起初议会或多或少地承认了妥协论。但它看出了各部大臣和权奸都在欺骗它。它终于采取了独立自主的行动,一度以制宪议会的资格出现而不以妥协议会的面貌出现。

作为普鲁士的独立自主的议会,它就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

独立自主的议会是谁也不能解散的,它不服从任何人的命令。

即使作为仅仅为了妥协而召集的议会,即使按照康普豪森先生本人的理论,它也和国王处于平等的地位。双方缔结国家条约,双方享有平等的主权,这就是4月8日的理论,康普豪森-汉泽曼的理论,即是国王本人认可的官方的理论。

既然议会和国王处于平权地位,国王就没有解散议会的任何权利。

不然,议会(如果它坚决彻底的话)也该有废黜国王的权利。

所以,解散议会就意味着政变。至于人们给政变的答复是什么,1830年7月29日和1848年2月24日的事件就已经表明。

有人说:国王还不是可以诉诸那些选民。然而今天的选民所要选的完全是另一种议会,这种议会对国王会更不客气,这难道还有谁不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解散这届议会后只可能诉诸和4月8日的选民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选民,并且除了在屠刀的威逼下进行选举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选举。

因此,我们不抱任何幻想。

如果议会取得胜利,组成了左派内阁,那末和议会并存的王权将被摧毁,国王就只能扮演一个领薪俸的人民仆人的角色。我们又经历3月19日,假若瓦尔德克内阁不象过去的其他内阁一样出

卖我们。

如果国王取得胜利,组成了普鲁士亲王内阁,那末议会将被解散,结社的权利将被取消,报刊就会受到压制,就会颁布关于选举资格的法律,也许还会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再次招回联合议会的魂灵,——而所有这些都是受到军事独裁、大炮和刺刀保护的。

这两方面究竟哪一方取得胜利,将取决于人民的行动,尤其是取决于民主党派的行动。民主派应当加以抉择。

我们正在经历7月25日。现在正在波茨坦策划的敕令敢不敢颁布呢?是不是要驱使人民在一天里就从7月26日跃进进2月24日²³⁶呢?

当然,并不是善意不足,而是要有勇气,勇气在哪儿呢?

三

科伦 9 月 13 日。柏林的危机更加深了一步,和国王的冲突,在昨天还仅仅估计是难免的,现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本报读者在下面就可看到国王对内阁呈请辞职的答复²³⁷。由于这封信国王自己就上升到了重要的地位——他和内阁站在一边,把自己和议会对立起来。

不仅如此,国王还背着议会邀请贝凯拉特组阁,众所周知,贝凯拉特是法兰克福极右翼的人物,他绝不可能指望在柏林获得多数。

国王的信是由奥尔斯瓦特先生副署的。奥尔斯瓦特先生这样就把国王推到前面去以掩饰他自己的可耻的退却,同时,他在议会面前却企图躲在立宪原则的后面践踏这一原则,破坏国王的声誉,并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这一切责任让奥尔斯瓦特先生都承担起来吧!

大臣们高喊:立宪原则!右派高喊:立宪原则!“科伦日报”也隐隐约约地随声附和:立宪原则!

“立宪原则!”难道这些先生真的这样愚蠢,以为依靠腐朽透顶的孟德斯鸠-德洛姆的分权学说,依靠陈词滥调和早就被揭穿的假象就能使德国人民摆脱 1848 年的风暴,摆脱日益临近的、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全部机构复灭的危险吗?!

“立宪原则!”但是,正是这些想不惜任何代价拯救立宪原则的先生们首先应当知道:在这种暂时的制度下,只有毅力才能拯救这

一原则。

“立宪原则！”难道柏林议会的表决、波茨坦和法兰克福的冲突、骚扰混乱、反动派的图谋以及军阀的挑衅不是早就表明，我们总是不顾一切空话而始终立足于革命的基础上吗？难道不是早就表明，说我们已经立足于业已确立的完美的君主立宪基础上的这种捏造，只会导致现在已经使“立宪原则”濒于毁灭的那种冲突吗？

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地展开公开的斗争。为了协商宪法而召集了国民议会，它和国王是平权的。一个临时机构里有两个平等的权力单位，正是康普豪森先生想借以“拯救自由”的这种分权，正是临时机构里的这种分权局面，必然会导致冲突。反革命的权奸、军阀和官僚都藏身于国王背后。资产阶级站在议会的多数方面。内阁想充当调停人。但是它太软弱，不能坚决维护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一举而推翻贵族、官僚和军阀的权势；它也太笨拙，它的财政措施每一次总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所提出的都是各个政党所不能接受的，因而正好引起了它所希望避免的冲突。

在任何一个尚未组织就绪的国家机构里，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这种或那种原则，而是 *salut public*，社会安全。内阁要想防止议会和国王之间的冲突，只有遵循社会安全的原则，并且即使在自己和国王有发生冲突的危险的时候也不畏缩。但是，内阁宁愿成为波茨坦“所能接受的”内阁。它一直坚决地采取各种社会安全措施 (*mesures du salut public*)、专制的措施来对付民主派。在梅尔克

尔先生业已承认普鲁士法律的某些条文应当废除之后又用这些旧法律来对付政治犯,这究竟是什么?在王国各地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这又是什么呢?

可是内阁在为了社会安全而对付反革命的时候却缩手缩脚!

正因为内阁对待日益猖獗的反革命采取这种消极态度,议会才不得不亲自提出社会安全的措施。既然大臣们所推崇的国王过于软弱,议会就不得不亲自干预。它已这样作了,例如,通过了8月9日的决议。不过它还是非常缓和的,只是向大臣们提出了警告。可是大臣们却置之不理。

的确,他们怎么能同意这一点呢?!要知道8月9日的决议践踏了立宪原则,它是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职能的干预,它要消灭为了自由的利益所十分必需的分机和权力互相监督,它要把妥协议会变成国民公会!

于是燃起了威胁的烈火,掀起了使小资产者心惊胆战的雷鸣般的呼号,说什么将来到处会笼罩着恐怖:断头台、累进税、没收财产和红旗。

柏林议会变成了公会!怎样的讽刺啊!

然而这些先生们并不是完全不对。如果政府今后照旧这样做下去,我们很快就会有公会。并且不只是普鲁士的公会,而且是全德的公会。这个公会应当用一切办法来制止我们的20个万第的内战和来自俄国方面的不可避免战争。而现在,我们的确只有一幅制宪议会的讽刺画²³⁸!

但是,呼吁立宪原则的各位大臣先生自己是怎样遵守这些原则的呢?

8月9日他们使议会相信各部大臣会执行议会的决议,于是

议会就安心地散会了。可是,他们却根本不想把自己拒绝执行决议的情况通知议会,也根本不准准备提出辞职。

各部大臣考虑了整整一个月,最后,在许多质问的威逼下,他们才简单明了地向议会宣布,他们不打算执行决议。

当议会针对这种声明命令各部大臣仍然要执行决议时,他们就躲在国王后面,在国王和议会之间制造裂痕,从而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

然而这些先生们还在谈立宪原则呢!

总起来说:

在一个临时机构里的两个平等的权力单位之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内阁不敢坚决果断地处理政务;它没有采取必要的社会安全措施。议会要求内阁尽忠职守只是执行了自己的职责。内阁宣布这样做是破坏国王的权利,是在它辞职的时候损害国王的声誉。国王和议会互相对立。“协商”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冲突。这种冲突也许还要用武力来解决。

谁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毅力,谁就能取得胜利。

四

科伦 9 月 15 日。内阁危机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并不是由于不受欢迎的贝凯拉特先生的到任和他的徒劳无益的努力,而是由于波茨坦和瑙恩的军事暴动。民主制和贵族制的冲突在自卫军中间爆发了。士兵们把议会 7 日的决议看成是他们摆脱军官的专横暴戾的武器,他们向议会致谢,向它祝贺。

这样就把反革命手中的屠刀夺下来了。他们现在不敢解散议会了。既然这样行不通,他们就只好让步,执行议会的决议,组织瓦尔德克内阁。

波茨坦的士兵暴动,可能使我们在目前暂不发动革命。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9 月 11、12、13 和 15 日
载于 1848 年 9 月 12、13、
14 和 16 日“新莱茵报”第
100、101、102 和 10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柏林的辩论自由

科伦 9 月 16 日。危机一开始，反革命的报刊就不停地断言，说什么柏林议会没有讨论的自由。尤其是“科伦日报”的极为著名的、署名为 G 的记者（他也只是“在没有委任他的接替者以前暂时”²³⁹执行自己的职务），以毫不掩饰的恐惧情绪报道了“8 000—10 000 个俱乐部的小娄罗”在“卡斯塔宁-韦尔德兴”公园里给他们的左翼朋友以“精神”支持的消息。“福斯报”²⁴⁰、“施本纳报”²⁴¹等也这样叫嚷，而赖辛施佩格先生甚至公然提议在 7 日把议会由柏林迁到别的地方（莫非是沙洛顿堡？）去。

“柏林阅报室”登载了一篇很长的论文，企图驳斥这种非难。它声明说，大多数人站在左翼方面这件事，虽然和议会过去的摇摆不定的行动不同，却决不能证明他们的行动前后不一致。我们可以证明

“即使从过去一向投票赞成大臣提案的人来看，7 日的投票也不可能同他们过去的行动发生矛盾，从这些议员的观点去看。这次投票甚至和他们过去的行动是完全一致的……”来自中间派两翼的议员们“误解了：他们这样想象，似乎大臣们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他们认为大臣们力图恢复安宁和秩序是代表他们自己的意志，代表大多数议员的意志的，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只是在人民的意志和国王的意志没有矛盾的时候，而不是在和国王的意志发生矛盾的时候，大臣们才重视人民的意志。”

“阅报室”就是这样用这些议员的想象和误解来“解释”这么

多的议员突然改变方向这件惊人的事的。要把这件事说得更无罪，那是很困难的。

但是，报纸承认曾发生过威胁的事。可是它认为

“如果外界的影响起了某些作用，那就说明外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内阁虚伪的诺言的影响，抵消了它想把议员弄得莫名其妙的尝试的影响，从而使许多意志薄弱和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议员有可能遵循……生活的自然本能。”

“阅报室”之所以这样在公众面前从精神上为摇摆不定的中间派两翼议员辩护，其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为公众写的，不如说是为中间派两翼的这些先生们本身写的。对于我们这些有权坦率直言以及只是在某一党派的代表发表革命的演说时才支持他们的人来说，这些原因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不对我们讲这些话呢？当然，中间派两翼的议员在7日害怕人民群众；他们的害怕是否有根据，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谈。

民主的人民群众的这种权利——出席制宪议会，从而在精神上影响制宪议会的立场——是人民旧时的革命权利，这种权利自从英法革命以来，就被运用于一切暴风雨的时代。历史几乎把这些议会的所有坚决的措施都归功于这个权利。如果死抓住“法律根据”的人们，如果怯懦的、具有庸俗情绪的“辩论自由”的朋友们发出号叫来反对这个权利，那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想要任何坚决的决议。

“辩论自由”！没有比这更空洞的口号了。从一方面说，“辩论自由”不过是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民武装的权利。从另一方面说，它不过是掌握在国王及其大臣们手中的现存的国

家权力：军队、警察和所谓独立的、但是事实上要依职务的升降和政治的变革为转移的法官。

辩论自由这句话向来只有一个意思：不依法律所不承认的一切影响为转移，而公认的影响——贿赂，职务的升降，私人的利益，解散议会的恐惧等——却使讨论成为真正“自由的”讨论。但是在革命时期，这句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在两种力量、两个党派陈兵对峙的地方，在随时都可能爆发斗争的地方，议员们只能作这样的抉择：

或者他们接受人民的保护，那末，他们就得同意随时接受有益的教训；

或者他们接受国王的保护，把议会迁到某个小城市去，在刺刀和大炮的保护下，或者甚至在戒严的保护下开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王和刺刀命令他们作出决定，他们也不能反对。

受手无寸铁的人民的威胁还是受全付武装的军阀的威胁，让议会来选择吧。

法国制宪议会已由凡尔赛迁到巴黎。说句老实话，假如妥协议会由柏林迁到沙洛顿堡，那倒是符合德国革命的整个性质的。

写于 1848 年 9 月 1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9 月 17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05 号

休战协定的批准

科伦 9 月 19 日。德国国民议会批准了休战协定。我们没有弄错：“德国的荣誉操在坏人的手中”。

投票在混乱和黑暗中进行，而且闲人、外交官等都挤进了议员席。仅仅多占两票的多数派迫使议会对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同时进行表决。休战协定以 21 票的多数获得通过，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做了牺牲品，“德国的荣誉”遭到了践踏，而且还决定把德国溶化到普鲁士里面去。

在任何其他问题上，人民的意见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坚定。在任何其他问题上，右派先生们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坦白地承认：他们赞成不能辩护的行动。在任何其他问题上，德国的利益都没有象在这个问题上那样明确无疑。国民议会做出决定：它给自己和由它所建立的所谓中央政权宣判了死刑。如果德国有自己的克伦威尔，那他定会立刻出现并且叫道：“你们不是国会！我以上帝的名义请你们给我滚开！”²⁴²

据说左派分子似乎打算退出议会。这些可怜的受人愚弄的左派分子，受到了多数派的打击，还要被高尚的加格恩斥责为不守秩序，可惜他们太没有勇气，少数派从来还没有象这些法兰克福左派

分子那样一贯遭受高尚的加格恩及其 250 个多数派英雄们的无礼藐视。可惜左派分子太没有勇气！

德国的一切运动由于缺乏勇气而趋于衰落。反革命努力也象革命的政党一样,不敢采取坚决的打击手段。现在所有的德国人(不管是站在右派方面还是站在左派方面)都知道,当前的运动一定会引起激烈的冲突,引起流血的战斗(不管是为了镇压它还是为了完成它)。两派(不管是反动派还是进步派)都不是勇敢地去迎接这些不可避免的战斗,不是采取一些速战速决的办法把战斗进行到底,而是策划合法的阴谋以尽量长期地拖延战斗。正是这些一贯的卑鄙诡计,这些微小让步和姑息手段,这些谋取妥协的企图造成了这种难以忍受和暧昧不明的政治局面,而这种政治局面到处都引起无数的零星暴动,要消灭这些暴动只有采取流血手段和限制已经取得的权利的办法。正是由于害怕斗争才引起无数小规模的战斗,使 1848 年成了空前未有的血迹斑斑的一年,使各个斗争的党派的情况如此错综复杂,以致最后的战斗必然特别残酷和具有毁灭性。但是“我们好心肠的朋友们却没有勇气”！

争取德国中央集权和建立民主组织的这场决定性的斗争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竭力加以掩饰和谋求妥协,可是这场斗争却日益迫近。维也纳、柏林和法兰克福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本身就会使这些情况得到解决。如果由于德国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而一切必将毁灭的话,那末法国会来拯救我们。六月胜利的果实目前在巴黎正在成熟:保皇党人无论在国民议会、报刊或俱乐部中都占了卡芬雅克及其“纯粹的共和党人”的上风;正统主义者的南方有普遍暴动的危险;卡芬雅克不得不采取赖德律-洛兰的革命手段,即派特命全权代表到各省去监督;卡芬雅克及其政府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才在星期六的议会会议上应付过去。再有一次这样的表决,梯也尔、巴罗及其伙伴们(六月的胜利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取得的)就会获得多数,卡芬雅克将被投到红色共和国的怀抱中去,而争取共和国本身生存的斗争将如火如荼。

如果德国再优柔寡断,那末法国革命的这个新阶段将同时成为在德国爆发新的公开斗争的信号,可以预期,这个斗争将把我们稍微向前推进一些,至少能使德国摆脱过去传统的桎梏。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9 月 19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9 月 20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07 号

法兰克福起义²⁴³

—

科伦 9 月 19 日 ,晚上 7 点钟。德国和丹麦的休战引起了狂风暴雨。法兰克福爆发了流血的起义。德国的荣誉被国民议会出卖给可耻下台的普鲁士内阁 ,但是法兰克福、欧芬巴赫、哈瑙的工人以及这些城市郊区的农民却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这种荣誉。

斗争的结局还未见分晓。到昨天晚上为止 ,士兵们的战绩看来并不大。除了策伊尔街以及其他几条街和广场以外 ,大炮在法兰克福很难使用 ,而骑兵几乎完全无用武之地。从这方面来说 ,时机对人民是有利的。因攻占军械库而武装起来的哈瑙居民赶去支援。很多郊区村庄的农民也都赶去支援。到昨天晚上为止 ,士兵大约有一万人 ,并装备有少量的大炮。夜里前去支援的农民一定非常多 ,而能够调遣去的士兵则非常少 ,因为临近郊区的军队全都调去了。奥顿瓦尔德、拿骚和库尔黑森等地的农民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 ,从那里继续调遣军队已经不可能 ;交通线可能已被切断。只要起义者能坚持住今天这一天 ,那末整个奥顿瓦尔德、拿骚、库尔黑森和莱茵黑森就会武装起来 ,富尔德、科布伦茨、曼海姆和阿沙芬堡之间的全体居民也会武装起来 ,那时军队的力量就不足以镇压起义了。而谁能担保美因兹、曼海姆、玛尔堡、加塞尔、维斯巴登平安无事呢 ?

在这些城市里 ,由于所谓的“帝国军队”的残酷暴行 ,人们对暴兵恨入骨髓。谁能担保莱茵河畔的农民不会行动起来呢?他们能够很容易地阻止从水路调动军队。

虽然如此 ,但必须承认 ,我们对这些勇敢的起义者的胜利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法兰克福这个城市太小 ,而过分强大的军队和法兰克福市侩们对反革命的那种人所共知的同情占的优势太大了 ,以致我们不能抱过高的希望。

但是 ,即使起义者被打败 ,这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革命会变得愈益蛮横无耻 ,它会宣布戒严 ,取消出版自由 ,封闭俱乐部和禁止人民集会 ,从而会使我们处于奴隶地位 ,但这是不会长久的。高卢雄鸡的叫声会宣布解放的时刻 ,会宣布报仇的时刻。

二

科伦 9 月 20 日。法兰克福的消息开始渐渐证实我们昨天的忧虑。看来下面的消息是可靠的：起义者已被从法兰克福击退，只是在萨克森豪森他们仍在坚持，他们在那里大概构筑有强大的防御工事。法兰克福宣布戒严；凡是手拿武器的人或者反抗“帝国政权”的人，都要交给军事法庭审判。

因此，目前圣保罗教堂的先生们的处境，就象他们的巴黎同伙一样。在充分安静和戒严状态中，他们能把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减少到“最低限度”。

通往美因兹的铁路有许多地方被切断了，所以邮件来得很晚，或者完全停邮了。

看来，炮兵决定了较宽阔的街道上的战局，并为军队迂回到街垒战士背后去打开了一条道路。法兰克福的市民们殷勤热心地向士兵们打开自己的家门，从而给他们创造了进行巷战的一切有利条件，同时用铁路迅速运来的军队的力量超过了缓慢地步行前去支援的农民，这一切决定了以后的战局。

但是，即使在法兰克福的斗争已经停止，这也并不意味着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了。怒不可遏的农民决不会轻易放下武器。即使他们不能驱散国民议会，他们也可以清除自己家乡的许多需要清除的东西。农民在猛攻圣保罗教堂未遂后，会转而袭击 6—8 座小官邸和成百块贵族的领地；从今年春天开始的农民战争，在没有达到

自己的目的(使农民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以前,是不会结束的。

为什么“秩序”在欧洲各地能经常取得这种胜利,但是从那不勒斯、布拉格、巴黎到米兰、维也纳和法兰克福,革命党派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同样的失败呢?

这是因为:所有的党派都知道,目前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和过去一切革命根本不同,而且它的意义也远比过去一切革命重大。因为不管是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不管是在柏林还是在法兰克福,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米兰,进行这种斗争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了实行这样一种变革,这种变革的最近结果甚至会使所有殷实的和投机的资产者都心惊胆寒。

近5个月来究竟在世界上哪一个革命中心没有在街垒上飘扬起红旗——被兄弟般的情谊联合在一起的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标志?

在法兰克福,反对容克地主和资产者的联合议会的斗争也是在红旗下面进行的。

正因为当前爆发的每一次起义都直接地威胁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间接地威胁着它的社会地位,所以都遭到了失败。大多数手无寸铁的人民,不仅要反对由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有组织的官僚军事国家的力量,而且还要反对武装的资产阶级本身。社会上其他一切组织完善的和武装齐全的阶级都起来反对没有组织的和武装很差的人民。因此,人民直到现在都遭受失败,而且在他们的敌人没有因进行战争或发生内部分裂而受到削弱以前,或者在他们没有被某种重大事件推动去进行殊死的斗争并使敌人士气沮丧以前,还要继续遭受失败。

在法国 ,这种重大事件正在酝酿中。

因此 ,我们不应当因为霰弹在最近 4 个月中到处战胜了街垒而灰心失望。相反地 ,我们的敌人的每一个胜利 ,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失败。胜利使得他们分裂 ,胜利所巩固的不是胜利了的、从 2 月和 3 月起就变得保守的那个党派的统治 ,而是在 2 月和 3 月中被推翻的那个党派的统治。巴黎的六月胜利只是在最初建立了小资产阶级的、纯粹的共和党人的统治。不到 3 个月功夫 ,大资产阶级、立宪派就威胁要推翻卡芬雅克 ,威胁要把“纯粹的共和党人”投入“红色共和党人”的怀抱里去。在法兰克福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胜利将不是有利于中间派两翼的那些正直的人 ,而是有利于右派 ;资产阶级一定会战胜那些代表军阀、官僚和容克地主的国家的先生们 ,可是不久以后它就会尝到自己这种胜利的苦果的滋味。

随你的便吧 ! 我们那时将等待巴黎吹起欧洲解放的号角。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9 月 19—20 日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载于 1848 年 9 月 20 和 21
日“新莱茵报”第 107 号的附页
和第 108 号

反革命内阁

科伦 9 月 22 日。总之 ,大局已定 !普鲁士亲王内阁已经组成 ,反革命想冒险来一次最后的坚决的打击。

请看一个议员写的一段话 :

“柏林 9 月 20 日 ,晚上 10 点钟。我们刚才得到的可靠消息说 ,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内阁已经组成 (下面是各部大臣的名单 ,我们昨天曾从“阅报室”的号外上转载过) 。在明天的会上这个内阁将宣读国王要解散议会的手谕。而国民议会将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是永久的 ,这样就可能引起新的流血的革命。国民议会中的各党各派都在它们平常聚会的地方接连不断地开会。人民的情绪非常激昂。弗兰格尔今天检阅了军队。双方都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 !”

总之 ,大局已定 !国王要求乌刻马克贵族保护 ,乌刻马克贵族就倾全力反抗 1848 年的革命运动。东波美拉尼亚的唐·吉河德们、昔日的武士、负债累累的地主 ,最后都有可能用煽动者²⁴⁴的鲜血来洗涤自己生锈的宝剑。在什列斯维希获得了廉价荣誉的自卫军必然会给革命以坚决的打击 ;因为革命侵犯国王的权利 ,它想禁止军官制造阴谋 ,想用汉泽曼财政措施的无情手段来完成极其“勇敢的行动”——钻入本来就变空了的勃兰登堡容克地主的钱袋里去。自卫军要洗雪 3 月 18 日的耻辱 ,它要解散柏林议会 ,而军官先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生们将跨过革命者的尸体沿着菩提树街前进。

好吧！前进 愿天佑吾王、天佑吾国！

写于 1848 年 9 月 22 日

载于 1848 年 9 月 23 日

“新莱茵报”第 11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俄

译文第一次发表

科伦的戒严²⁴⁵

科伦 9 月 26 日。今天我们又出版了一号没有标题的报纸,这是因为我们急于出报的缘故。我们从可靠的消息得知:在几点钟内,城市就要宣布戒严,市民自卫团将被解散和解除武装,“新莱茵报”、“新科伦报”²⁴⁶、“工人报”²⁴⁷和“莱茵守卫者”²⁴⁸将被禁止出版,同时将要建立军事法庭并取消在 3 月里争得的一切权利。风闻:市民自卫团将不容许解除它的武装。

写于 1848 年 9 月 26 日

载于 1848 年 9 月 27 日

“新莱茵报”第 11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新莱茵报”复刊

大家为维持“新莱茵报”的存在而给予的援助(特别是在科伦),使我们得以克服戒严状态所造成的财政困难,使报纸得以复刊。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不久前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参加了编委会。

“新莱茵报”总编辑 卡尔·马克思

写于 1848 年 10 月 11 日

载于 1848 年 10 月 12 日

“新莱茵报”第 11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维也 纳 革 命

科伦 10 月 11 日。“新莱茵报”第一号(6 月 1 日)曾报道过维也纳革命(5 月 25 日)的消息。今天,本报复刊(曾因科伦戒严而停刊)的第一天,我们刊登了极其重要的 10 月 6 日和 7 日维也纳革命的消息。由于要详细地报道维也纳事件,我们今天无法刊登任何评论性的文章。因此我们只能对维也纳革命讲几句话。本报读者从维也纳记者的报道中可以看出,由于资产阶级不信任工人阶级,这次革命已面临着危险:它即使不遭到失败,至少也会陷于瘫痪。但是,不管怎样,维也纳革命对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的影响,打乱了反革命进攻的全盘计划。如果维也纳的资产阶级不想向胜利者投降,皇帝和捷克议员逃离维也纳一事²⁴⁹就会迫使维也纳资产阶级继续战斗。维也纳事件将讨厌地打破法兰克福议会的幻想,这个议会现在正忙着准备赐给我们德国人

一所全国的大监狱和一条公共的鞭子²⁵⁰,而柏林内阁却不大相信戒严这种万应灵药。戒严和革命一样作了一次环球旅行。最近刚作了一次大规模进行这种实验的尝试,把这个实验推广到全国,推广到匈牙利。但这个尝试并没有使匈牙利发生反革命,反而使维也纳发生了革命。经过这次打击,戒严已无法恢复旧观。它的名声已彻底败坏了。和耶拉契奇同时,西方的戒严英雄卡芬雅克,成了他在 6 月里曾用霰弹拯救过的所有党派的攻

击目标 ,这是命运的嘲笑。他只有坚决地转到革命方面去 ,才能继续维持一些时候。

除了维也纳的这些最近的消息 ,我们还刊登了 10 月 5 日的一些通讯 ,因为它们反应了维也纳对匈牙利命运的期望和忧虑。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11 日

载于 1848 年 10 月 12 日

“新莱茵报”第 11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科伦革命”

科伦 10 月 12 日。“科伦日报”说得对，9 月 25 日的“科伦革命”是狂欢节的滑稽戏。“科伦警备司令部”在 9 月 26 日扮演了卡芬雅克的角色，于是“科伦日报”对“科伦警备司令部”的英明与温和就大加称赞。但是，究竟谁看来更可笑呢？是在 9 月 25 日构筑街垒的工人呢，还是在 9 月 26 日郑重其事地宣布戒严、停止报纸出版、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查封各个社团的卡芬雅克？

可怜的“科伦日报”！“科伦革命”的卡芬雅克丝毫不可能比“科伦革命”本身伟大。可怜的“科伦日报”！它把“革命”看作开玩笑，而对这次可笑的革命的“卡芬雅克”却很严肃。真是一个矛盾百出而令人烦恼的难题！

关于警备司令部的权限我们不来多费唇舌，因为德斯特尔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详尽的说明²⁵¹。况且我们是把警备司令部看作驯服的工具的。这个奇怪的悲剧的真正作者是“心地善良的公民”杜蒙及其伙伴。无怪乎杜蒙先生命令通过自己的报纸来散布反对德斯特尔、博尔夏特和吉尔的呈文²⁵²。这些“心地善良的人”应该保护的不是警备司令部的行动，而是他们自己的行动。

科伦事件的消息已经以科伦“辩论日报”所赋予它的形式传遍了德国报刊的撒哈拉大沙漠。因此，我们就更有理由来回头谈一谈这个事件。

当局打算逮捕工人联合会²⁵³中最受爱戴的领袖之一莫尔。沙佩尔和贝克尔已被逮捕。当局选择了星期一来实行这些措施,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大多数工人休息的日子。可见,当局预先就知道这些逮捕会引起工人的极大愤怒甚至会造成武力抵抗。这些逮捕恰好都在星期一发生,真是令人奇怪的偶合!愤怒是容易预料到的,因为由于发生了施泰因式的军令问题,以及在弗兰格尔发布了军令²⁵⁴、普富尔被任命为首相之后,时刻都会遭到反革命的坚决的打击,因而也能期待革命的到来,而这个革命的起点一定是柏林。所以工人必然会把逮捕看作政治上的措施,而不看法庭的措施。工人认为检察机关仅仅是反革命的机关。他们觉得有人想在发生重大事件的前夕夺去他们的领袖。工人决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不准逮捕莫尔。他们只是在自己的目的达到以后,才离开了战场。街垒只是在聚集在旧市场的工人得知军队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近的时候才构筑起来的。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攻击。所以他们也就不需要自卫。此外,他们得知,柏林没有传来任何重要的消息。因此,工人在白等了敌人大半夜之后就解散了。

所以,责难科伦工人胆小怕事是最可笑不过的。

但是为了给戒严寻找理由并把科伦事件说成是小型的六月革命,对工人们又提出了其他的责难。说什么工人们原来的计划是要抢劫光荣的科伦城。这个责难的根据是似乎有一家呢绒店遭到抢劫。但是要知道,每个城市里都有一批盗贼,他们自然会利用社会骚乱的日子来行窃。或者,也许会把抢劫理解为抢劫军械库?那就派遣科伦检察人员到柏林去控告三月革命吧。如果军械库没有被抢劫,我们也许就永远不会有看到汉泽曼先生做银行经理、弥勒先生做国务大臣的幸运了。

关于科伦的工人就谈到这里。现在我们来谈谈所谓民主主义者。“科伦日报”、“德意志报”、奥格斯堡“总汇报”和其他“公正的”报纸是怎样责难他们的呢？

英勇的勃律盖曼分子、巴塞尔曼分子等等渴望流血，仁慈的民主主义者却似乎由于胆怯而不让他们流这种血。

事情的真相实际上是这样的。民主主义者在“友谊之家”旅馆（在旧市场上）、在埃塞尔大厅和在街垒上向工人宣称，他们无论如何不希望发生“叛乱”。当没有任何重大的问题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必然遭到失败的时候，举行这种起义是卤莽的，这特别是因为最近几天就可能发生重大的事件，决不能恰恰在决定关头的前夕丧失战斗力。如果柏林内阁敢于发动反革命，那末人民决定进行革命的日子就到来了。法庭的审理会证实我们对事件的叙述。“科伦日报”的先生们与其在“黑夜”中“两手交叉，面带愁容”，站在街垒前“考虑本国人民的将来”²⁵⁵，不如站在街垒的高处向被蒙蔽的群众发表英明的演说。post festum（事后）的英明有什么意思呢？

由于科伦事件，市民自卫团受到了“好”报刊最严厉的责难。必须分清下面的情况。市民自卫团拒绝把自己贬低到没有意志的警察奴仆的地位，这是它的责任。但是它自动放下了武器，这也许只能由一种情况来说明。市民自卫团中的自由派知道非自由派会兴高采烈地利用机会抛掉武器。只有一部分人抵抗是无济于事的。

“科伦革命”的结果只有一个。它昭然若揭地指出由两千余名圣徒组成的行列是存在的，他们的“饱食的美德和有购买力的道德”²⁵⁶只有在戒严的条件下才能“自由地存在”。也许有一天会有机

会写出《acta sanctorum》〔“圣徒的事迹”〕,写出这些圣徒的传记来。那时我们的读者就会知道“无论是蠹鱼和铁锈”都不能腐蚀的“宝物”是怎样得来的,就会懂得“善良的品德”的经济背景是怎样取得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12 日

载于 1848 年 10 月 13 日
“新莱茵报”第 11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普富尔内阁

科伦 10 月 13 日。我们在康普豪森内阁垮台时曾经这样写道：

“康普豪森内阁曾经给反革命穿上他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服装。现在反革命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扔掉这付累赘的假面具。一个无生命力的中间派左翼(汉泽曼)的内阁也许可以代替几天 3 月 30 日的内阁。但是它的真正继承者却是普鲁士亲王内阁。”(6 月 23 日“新莱茵报”第 23 号)

果然,普富尔(纽沙特尔)内阁接替了汉泽曼内阁。

普富尔内阁醉心于宪法的词句,正如法兰克福中央政权醉心于“德国的统一”一样。如果把这个内阁的 *corpus delicti*(罪行),把它的实质同它在柏林议会上发出的声音,即它的立宪声明、安定人心的保证以及各种折衷妥协的论调对照一下,那末可以说只有福斯泰夫的这句话才适用于它：

“我们上年纪的人多么容易犯这种说谎的罪恶!”²⁵⁷

代替普富尔内阁的只能是革命的内阁。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0 月 14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16 号

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证券的 全国抵押银行的演说

梯也尔先生在“立宪主义者报”上陆续发表他的著作“财产论”²⁵⁸。我们准备在这个典型的庸俗著作全文载完后再来详细地论述它。可是梯也尔先生突然中断发表。所以我们暂且指出：梯也尔先生的这一著作使得比利时的“重要”报纸“观察家”和“独立报”²⁵⁹欢欣鼓舞。今天我们简略地来讨论一下梯也尔于10月10日在法国国民议会里所发表的关于抵押流通券的演说。用比利时“独立报”的话来说，这篇演说给了纸币以“致命的打击”。而且正如“独立报”所说的那样，梯也尔先生不管在论述政治、财政或社会等问题上都是出类拔萃的演说家。

我们之所以对这篇演说感到兴趣，仅仅是因为它表明了旧秩序的骑士的策略，即旧秩序的骑士振振有词地用来和新秩序的唐·吉珂德相对抗的策略。

如果你们象图尔克先生（梯也尔已回答了他的要求）那样，要求对工业和贸易关系实行局部的改革，这些人就会借口整个系统中各部门之间都相互联系和相互协作而不宜更动来反对你们。如果你们要求对整个系统实行改革，那末你们就会被指责为破坏分子、革命家、没有良心的人、空想家和忽略局部的改革。由此得出结论：一切照旧。

拿图尔克先生来说,他想通过国家抵押银行使农民易于出售土地。他想不经过高利贷者的手来使农民的土地投入流通。问题在于:在法国,象在小块土地占优势的所有国家中一样,封建主的统治变成了资本家的统治,农民的封建义务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抵押债务。

梯也尔先生首先是怎样回答的呢?

如果你们想通过建立国家信贷机关的办法来帮助农民,你们就会损害小商人。你们帮助这一个人,就不能不损害另一个人。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应当改革一下整个信用制度?

绝对不能!这是空想。图尔克先生的建议就这样吹了。

梯也尔先生那样热心关怀的小商人原来是巨大的法国银行。

让总额达 20 亿的抵押流通券来进行竞争,会损害这个银行的垄断权和股息,也许 something more[更有过之]。因此在梯也尔先生的这个论证里面隐藏着路特希尔德。

现在再来谈谈梯也尔先生的另外一个论据。梯也尔先生说,关于抵押的建议实际上和农业本身毫无关系。

梯也尔先生指出,土地不易投入周转,土地难以销售,资本回避土地,这一切都是事物的“本性”。他说,土地只能提供微薄的利润。但是另一方面,梯也尔先生不能否认,按照现在生产组织的“本性”来看,各个生产部门(包括农业在内)只有当它们的产品和工具能够迅速出售,能成为交换对象,并能投入流通的时候,才能顺利地发展。可是土地的情形却相反。因此结论应当是:在现在的文明制度下,农业不能顺利发展。所以必须改变现在的制度。图尔克先生的建议就是想实行这种改变的一个微小而不彻底的步骤。梯也尔大声疾呼:绝对不能!“本性”,即现在的

社会关系注定要使农业处于目前的状态。现在的社会关系就是“本性”，也就是说，它们是不可改变的。关于这些关系不可改变的说法当然是反驳一切要改变这些关系的建议的有力论据。如果说“君主制度”是本性的话，那末任何建立共和制度的企图都是违反本性的叛变。按照梯也尔先生的说法，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国家给土地所有者贷款的利率是3%，还是高利贷者给他们贷款的利率是10%，土地按照自己的本性总是提供同样微薄的利润。总而言之，这就是“本性”。

然而，梯也尔先生在这里不仅把工业利润和农业地租混为一谈，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和现在的社会关系，即和他称做“本性”的东西相矛盾的说法。

工业利润一般说来在不断下降，可是地租，即土地的价值却在不断增高。因此梯也尔先生应该解释一下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农民却反而日益贫困。梯也尔先生当然是不会讨论这个问题的。

此外，梯也尔先生关于法英两国农业之间的区别的肤浅论断真是使人感到惊讶。

梯也尔开导我们说，一切区别都归结为土地税。我们交纳很重的土地税，可是英国人却根本不用交纳。后一种说法的谬误姑且不谈，梯也尔先生无疑知道，在英国，贫民救济税和其他许多在法国所没有的捐税都是由农业负担的。英国拥护小农经济的人从反面利用了梯也尔先生的论据。他们说：你们是否知道英国的谷物比法国贵的原因？因为我们要交纳地租，而且是高额地租，法国人却不用交纳这种地租，因为他们通常不是租佃者，而是小私有者。因此，小私有制万岁！

只有象梯也尔那样庸俗无耻，才会把土地这种劳动工具目前在英国集中的现象(由于这种集中，才能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实行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并使英国的工业和商业同农业互相配合)，把这些广泛发展的关系归结为英国人不交纳土地税这种无稽之谈。

梯也尔先生认为法国目前的抵押制度对农业不起作用，这种说法我们用法国一位卓越的农业化学家的话来反驳。东巴尔认真地证明说，如果法国目前的抵押制度继续按照“本性”发展下去的话，法国的农业将破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²⁶⁰。

硬说土地关系对农业无关紧要，换言之，即社会关系（生产必须在社会关系下进行）对生产无关紧要，这是多么无耻和愚蠢！

梯也尔先生既然赞成给大资本家贷款，势必就要反对给小资本家任何贷款，这是用不着进一步证明的。贷款给大资本家同时也是剥夺对小资本家的贷款。当然，我们否认在现在的制度下可以通过某种财政把戏来帮助小土地占有者。但是梯也尔却偏要这样说，这是因为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

我们对梯也尔演说的这一部分还要指出一点。梯也尔反对土地流通，另一方面却推崇英国的关系，可是他忘记了英国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具有这样一种优越性：它是采取工厂方式经营的，而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也象任何其他交易所证券一样，都是活动的和流通的证券。采取工厂方式（按照大工业的方式）经营农业必然会使土地流通起来，使它成为自由交易的对象。

梯也尔先生演说的第二部分是攻击一般的纸币。他把发行纸币叫做发行贗造货币。梯也尔先生向我们说明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即向市场抛出大量流通手段——货币，就会使这些货币贬值，从而欺骗双方面：既欺骗私人又欺骗国家。他说这特别和抵押银

行有关。

所有这些发现在最蹩脚的政治经济学问答中都可以找到。

应当把下面两件事情区别开来。显而易见，我们随意增加纸币或金属货币的数量并不等于增加生产，即增加真正的财富。这正象在玩牌时把筹码的数目增加一倍并不等于把赢牌的数目增加一倍一样。

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很明显，如果由于缺乏筹码，即缺乏交换手段和货币而妨害生产的发展，那末交换手段的任何增加和获得交换手段的困难的任何减少，都同时意味着生产的增加。期票和银行等都是生产需要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抵押银行也能够促进农业的发展。

但是梯也尔先生决不是为了维护金属货币而反对纸币。他自己就曾在交易所里投机倒把，成了陈腐的重商主义偏见的俘虏。实际上他反对的是由社会通过国家来代替垄断组织控制信贷。图尔克提出关于全国抵押银行(抵押银行的证券具有强制性的比价)的建议正是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控制信贷的第一步，不管这个建议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1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0 月 14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16 号

“法兰克福总邮报” 和维也纳革命

科伦 10月 18日。

“德国在遭受奇怪命运的摆布。正当复兴共同的祖国的时机似乎已经来临，人们为此用感激的目光仰望着苍天的时候，迄今笼罩在欧洲上空的阴霾又忽然大作，雷电交加，使得献身于草拟德国宪法事业的人双手直打哆嗦。我们现在又遭到不久前才在维也纳遭到过的那种雷电的袭击。”

帝国摄政当局的“总汇通报”——“法兰克福总邮报”这样抱怨说。这家值得尊敬的报纸（它的最后一个编辑 在基佐所豢养的走卒中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刹那间 *au sérieux*〔认真地〕采取了自己的立场。在它看来，中央政权及其议会的框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真正是庄严的政权。德意志 38 个邦不是直接向臣民发布自己的反革命命令，而是迫使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命令臣民来执行它们的决定。就象在美因兹审讯委员会〔*Immediat-Kommission*〕²⁶¹时期一样，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中央政权可能想象它真正是政权，而它的“总汇通报”可能想象它真正是“总汇通报”。它唱道：“大家举起双手来祈祷，感谢上帝。”

然而，我们正在“遭受”来自维也纳的雷电的袭击。虽然有

头戴尖顶钢盔（这些尖顶钢盔就象是防止革命的无数避雷针）的军队，虽然有惩办批评黑红黄色人物及其 gesta〔事业〕的人的法令²⁶²（违者给以刑事处分），虽然有施梅林、默尔和加格恩这些巨人的坚决果断的词句，我们的莱喀古士们的“双手”却在“哆嗦”。革命的怪物又发出了吼声，而法兰克福又在“哆嗦”。“法兰克福总邮报”惊慌失措，不得不停止自己感谢上帝的祈祷。它悲痛地怨恨无情的命运。

在巴黎，操纵一切的是梯也尔派，在柏林，是普富尔内阁以及各省的弗兰格尔，在法兰克福，是中央宪兵队；全德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处于戒严状态；在意大利，由仁慈的斐迪南和拉德茨基奠定了和平；在维也纳，在匈牙利指挥过军队的耶拉契奇在消灭了马扎尔人之后和文迪施格雷茨一起宣布了“克罗地亚人的自由和秩序”；在布加勒斯特，革命淹没在血泊中；多瑙河流域诸公国得天独厚地受到了俄国制度的恩施；在英国，宪章派的所有领袖都被逮捕或流放；爱尔兰被饥饿折磨得有气无力。难道这些您还嫌少吗？²⁶³

维也纳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但是，革命的第一道闪光已经足以向欧洲照明反革命的全部阵地，从而使得一场总的生死决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反革命还没有被消灭，但是它已成了笑柄。它的一切英雄都同耶拉契奇英雄一起变成了滑稽人物，而傅阿德-埃芬蒂在血洗布加勒斯特后发表的文告²⁶⁴是对“宪法规定的自由和秩序”的朋友们

莱喀古士——传说中的古代斯巴达的立法者。据说决定了斯巴达人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法律是由他起草的。——译者注

匈牙利人自称马扎尔人。——译者注

的一切文告（从帝国国会的文告直到抱怨派的一切无足轻重的宣言）的辛辣讽刺。

明天我们再详细地论述直接在维也纳形成的局势和奥地利的一般情况。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0 月 19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20 号

普鲁士国王答国民议会代表团

科伦 10 月 18 日。国王总是给终如一的。陛下是从来不会自相矛盾的。他在科伦教堂奠基周年纪念会上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代表团说：

“诸位先生！我很了解你们议会的意义，我也知道你们的议会多么重要！……”——陛下的声调这时变得非常严肃而刺耳：“但是，请不要忘记德国还有许多君主……”——这时他把手放在胸前特别着重地说：“……而且不要忘记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柏林议会代表团 10 月 15 日在贝尔维宫进谒陛下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答复。国王说：

“我们正打算建筑一座万世长存的大厦。但是，诸位先生，我请你们注意，我们还有一种颇令人羡慕的、世袭的天赋权力。”——国王以特别着重的口吻说这些话，——“这是一种具有充分威力的权力。它是这座大厦赖以建筑的唯一基础，如果我们要使这座大厦象我所说的那样万世长存的话。”

国王是始终如一的。遗憾的是，三月事件把这张倒霉的纸片置于陛下和人民之间，不然的话国王就会永远是始终如一的了。

看来目前陛下又要象三月事件以前那样相信斯拉夫民族的“铁蹄”的威力了。维也纳人民也许就是把铁变成粘土的魔术师。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0 月 19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20 号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答 市民自卫团代表团

科伦 10 月 18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答复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挥官林普勒尔 10 月 15 日对他的祝贺时说：

“我知道英勇的人民也就是忠实的人民。但是，不要忘记你们是从我这里得到武器的，我责成你们维护秩序、法律和自由。”

如果说立宪的国王是无责任的，他们也就是不负责任的，这自然是符合立宪精神的。他们的言行举止不是代表他们自己，而是代表各个负责任的大臣。

例如汉泽曼辞职时就通过国王发表声明说，发布施泰因式的军令是和君主立宪政体抵触的。普富尔发布了这个命令，正是符合议会精神的。汉泽曼名声扫地，是符合立宪精神的。而国王因为什么也没有说，所以从来也不自相矛盾，这又是符合立宪精神的。

由此可见，上面所说的国王的声明不是别的，而是内阁的声明，这个声明本身就应该遭到批判。

普富尔真的认为国王是自愿建立市民自卫团的吗？要是这样，普富尔就会断言国王是三月革命的倡导者，可是即使按立宪的精神来说，这也是胡说八道。

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

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天赋的国王，把比较细小的事情交给了世人。甚至连“武器”和陆军中尉的军服也是用人间的方法制造的。可是人间的生产不同于天上的事情，决不能无中生有。人间的生产需要原料、劳动工具和工资，所有这些总起来说就是生产费用。这些生产费用国家靠捐税来抵偿，而税收的来源是国民的劳动。因此，从经济上说，一个国王究竟能够给予人民什么，这仍然是一个谜。首先人民应当制造武器，交给国王，然后才有可能从国王那里取得武器。国王永远只能把人民给予他的东西给予人民。从经济上说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恰恰在人们开始识破这个经济秘密的时候，立宪的国王就出现了。因此捐税问题始终是推翻天赋的国王的第一个原因。普鲁士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无形的商品，即国王在人民的压力下给予人民的特权，也是人民以前给予国王的，可是人民在取回这些特权时总是要付出现实的東西——鲜血和金钱。回顾一下 11 世纪以来的英国历史，就可以十分准确地计算出，宪法上的每一个特权是牺牲了多少头颅和花费了多少英镑才取得的。看来普富尔先生要我们回到戴韦南特经济表²⁶⁵流行的时代。这个表上关于英国的生产是这样说的：

1. 生产者：国王、军官、勋爵、乡村牧师等。
2. 非生产者：水手、农民、织工、纺纱工等。

根据这个表，第一类人生产，第二类人领受。因此普富尔先生也断定说国王给予了什么。

普富尔的声明表明了柏林期待于“克罗地亚的秩序和自由的”英雄 的是什麼。

柏林最近的事件使人想起了 8 月 23 日在维也纳发生的市民自卫团和人民的冲突（也是由权奸挑起的）。紧接着 8 月 23 日的就是 10 月 5 日。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1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0 月 20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21 号

“改革报”论六月起义

巴黎。除了英国的“北极星报”以外，“新莱茵报”是欧洲唯一有勇气有洞察力的报纸，它在6月29日对六月革命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它的言论并没有遭到反驳，却遭到了告密。

事实后来证实了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一点就连最近视的人也无法否认，只要他们还没有完全利令智昏。

那时法国的新闻界蒙受了奇耻大辱。巴黎几家比较坚决的报纸被查封了。卡芬雅克准许继续存在的唯一激进派报纸——“改革报”，在为崇高的六月战士辩护时也是吞吞吐吐，它象乞丐求食一样央求胜利者给予战败者以人道待遇。自然，人们是不会理睬央求者的。只是在六月胜利的结果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不受戒严限制的各省报纸进行了几个月尖锐的批评，以及梯也尔派公然复活以后，“改革报”才领会到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当极左派提出大赦草案的时候，该报在10月18日写道：

“人民在离开街垒时并没有惩办任何人。人民那时他们是主人，是元首，是胜利者；人们吻他们的手，吻他们的脚，向他们的工作服致敬；导口同声地称赞他们的高尚情操。说句公道话，人民是宽宏大量的。

现在，他们的孩子和弟兄却在坐监牢，被流放，在军事法庭受审。人民已经饿得忍无可忍，3个月来望眼欲穿地等待共和国的救济，最后又落了一

长空；他们看到自己选出来的人是一群争名夺利的野心家，这些人飞扬拔扈，出入宫庭而无视人民的疾苦。只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忍看着让自己挨饿的孩子和衰老的父亲死去，才不顾一切地投入了战斗。

他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的儿子在枪林弹雨中牺牲了，留下来的人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给军事法庭惩办，另一部分不经过审讯、不给予辩护的权利、不经过判决就被流放了！其他任何国家，甚至连卡拜尔族的国家也没有采用过这种手段。

君主国在它存在的 20 年中从来也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在那些日子里，利用王朝来投机取巧、沉醉于尸体的臭味、准备随时无礼侮辱死者的报纸（参看 6 月 29 日“科伦日报”）发出了各种恶意诬蔑的言论，它们还在审讯之前就污辱了人民的名誉，并且要求把战败者——不论活的和死的——一齐交给特别法庭惩处；它们把战败者交给国民自卫军和军队去折磨，它们成了刽子手的掮客、断头台的奴仆。这些报纸都是疯狂的复仇心的奴隶，它们捏造罪行，加深了我们的痛苦，它们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参看 7 月 1 日“新莱茵报”评法国“立宪主义者报”、比利时“独立报”和“科伦日报”。）

“‘立宪主义者报’公开地开设谣言公司，出售关于卑鄙暴行的各种荒诞无稽的新闻。这个报纸明明知道它在造谣，但是，它的生意和政治正需要它这样做。它既是商人又是外交家，它就象‘论价’出售其他商品一样在‘零售罪行’。这个如意的投机买卖总会有倒闭的一天。它的言论矛盾百出，在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在流放者的名单中连一个流刑犯的名字也找不到。侮辱和嘲弄失败者的手段已经用尽。而报纸在清算了自己的利润后，就默不作声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20 日左右

载于 1848 年 10 月 22 日

“新莱茵报”第 12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见本卷 158—166 页。——编者注

英法在意大利的调停

科伦 10 月 21 日。英法在意大利的调停中止了。在每次革命之后，主要在随着每次革命而来的反动势力的进攻之后，外交的骷髅就张牙舞爪。但是，每当新的革命发出了隆隆的雷声，外交就爬进了自己的芳香的墓穴。维也纳革命就象摧毁儿童用纸牌搭成的小房一样摧毁了法英的外交。

帕麦斯顿承认自己软弱无能，巴斯蒂德也是如此。根据这些先生们的自白，维也纳革命结束了他们之间的枯燥无味的通信。巴斯蒂德已把这件事正式通知撒丁大使李奇侯爵。

在回答后者提出的“法国在一定条件下是否会拿起武器来保护撒丁”这个质问时，严肃的共和党人巴斯蒂德（属于“国民报”）一连行了 3 次屈膝礼，并且唱道：

“信赖我，但不要自暴自弃，
那时上帝也许会救助你们。”²⁶⁶

据说法国坚持不干涉原则，即坚持在基佐当权时代巴斯蒂德和“国民报”的其余的先生们多年来一直反对的那个原则。

如果没有充满事件的六月的话，在意大利这个问题上，“正直的”法兰西共和国要算是丢尽了脸，受到了最大的耻辱。

Rien pour la gloire ! [不为荣誉化一分钱！] —— 商业的朋友们总是反复地这样说。Rien pour la gloire ! —— 慈善的、温和的、

文雅的、体面的、正直的，总而言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的口号也是如此。Rien pour la gloire！

拉马丁体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对自己的幻想，体现了它所编造的关于自己的夸大的、虚幻的、热烈的想象，体现了它关于自己的伟大的幻想。有什么不可以想象的呢！象从自己的皮囊中放出风来的伊奥拉斯一样，拉马丁也解开了自己的袋囊，放出了一阵风，轻轻地一吹就把一切空中的幽灵、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漂亮话——一切民族友好团结、法国会使一切民族获得解放、法国为维护一切民族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等等轻浮的词句吹向东方和西方。

可是他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

卡芬雅克及其对外工具巴斯蒂德用行动补充了拉马丁的漂亮话。

这些先生们对于在那不勒斯、墨西哥、米兰及其附近发生的前所未闻的情况采取冷淡的旁观态度。

他们在国际纠纷中采取旧的、同时永远也是新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和英国，和帕麦斯顿的英国，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英国 *entente cordiale*（亲密协商）。这就毫无疑问地说明：在“正直的”共和国里居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在君主立宪制时期进行统治的那个阶级，因而实行的也是同样的外交政策；在卡芬雅克执政时期实行的仍然是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政策。

但是，历史不应当忘记这种局势的紧张性、*pointe*（尖锐性）。“国民报”的编辑巴斯蒂德一定会拚命抓住英国的手，因为 *entente cordiale*，是可怜的患有恐英病的“国民报”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

内用来反对基佐的一张主要王牌。

在“正直的”共和国的墓碑上将会刻上：巴斯蒂德-帕麦斯顿。

但是“正直的”共和党人甚至超过了基佐的 *entente cordiale*。法国海军军官竟在那不勒斯军官举行的宴会上饱餐美味，在还冒烟的墨西拿废墟上为那不勒斯国王——这个愚钝的老虎斐迪南二世的健康干杯。而拉马丁的漂亮话在他们的头顶上空化为乌有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2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0 月 22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23 号

“模范的立宪国家”

科伦 10 月 21 日。每当我们考察“模范的立宪国家”——比利时的时候，兴趣总是愈来愈浓。

在本报过去的一号中，我们曾经证明：“列奥波特的最大的陪臣”是“赤贫现象”。我们指出了：仅就 18 岁以下的少年男女来说，如果他们中间的犯罪行为按 1845—1847 年那样的比例自发地增长，那末，“到 1856 年比利时全国人民（包括尚未诞生的小孩在内）都要坐牢了”。同时我们也指出了：随着赤贫现象和犯罪行为的增长，比利时工业收入的源泉也日益涸竭（“新莱茵报”第 68 号）。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模范国家”的财政状况：

	法 郎
1848 年的一般预算	119 000 000
第一次强制公债	12 000 000
第二次强制公债	25 000 000
强制处价的银行券	12 000 000
总计.....	168 000 000
此外，还有国家保证的	
强制比价的银行券	40 000 000
总数.....	208 000 000

罗日埃对我们说：比利时象中流砥柱一样地耸立着，世界历史的狂风骇浪在它的周围怒号，但是它却屹立不动。它站在自己的庞大机构的高峰上，稳如磐石。上面指出的 2 亿零 800 万法郎就是这些模范机构的奇异力量的最平凡的表现。使立宪的比利时遭到灭亡的将不是革命运动，使它遭到可耻灭亡的将是破产。

象一切自由派的内阁一样，比利时自由派的内阁，即罗日埃的内阁也不外是资本家、银行家、大资产阶级的内阁。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内阁怎样不顾赤贫现象的增长和工业的衰退，仍然采取巧妙的手段来为大银行家的利益而剥削全体人民。

前面列举的统计表中所提到的第二次公债的发行之所以能取得议会的同意，主要是由于许下了赎回国债券的诺言。这些国债券是在巴特米·泰奥多尔·窦的天主教内阁执政时期由天主教财政大臣马鲁发行的。这些国债券的发行是用一些金融大王自愿借给国家的资金来保证的。这些债券就是我们的罗日埃和他的自由派伙伴们在唠叨不休地批评窦的内阁时死抓住不放的一条小辫子。

自由派的内阁现在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它在“通报”（比利时有自己的“通报”）中宣布发行利率为 5% 的新国债券。

在赎回马鲁所发行的这种丢尽了脸的国债券的借口下骗去 2 500 万法郎的强制公债以后，又发行国债券，这难道不是无耻吗？但是这还不够。

国债券的利率是 5%。而同样由国家保证的比利时证券的利率则是 7—8%。在这种条件下，谁愿意认购国债券呢？此外，由于国家的一般状况和发行强制公债的结果，有力量自愿贷款给国家的人已经不多了。

发行这种新国债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银行无法把自由派政府委托它发行的强制比价证券全部投入流通。在银行的保险箱中还存有几百万这种无用的证券。显然,当这些证券还被紧锁在保险箱中的时候是不会获得任何利息的。除了把它们交给国家换取利率为 5% 的国债券以外,难道还能找到使它们流通的更好办法吗？

这样一来,银行就可以从这几百万张纸片中获得利率为 5% 的利息。这些纸片本身是毫无价值的,而它们一般说来所以有交换价值,那仅仅是因为国家赋予它们这种交换价值而已。在最近的预算中,比利时纳税的平民就会发现赤字增加了数十万法郎,他们必须尽自己的义务,完全为了穷银行的利益来弥补这些赤字。

比利时的金融大王认为君主立宪制比共和制更有利可图,这难道值得惊奇吗？天主教内阁所宠爱和保护的主要是大地主的最神圣的、物质的利益。自由派的内阁也同样无微不至地维护大地主、金融大王和宫廷奴仆的利益。这些所谓的党派同样贪婪地搜括国民财富(在比利时毋宁说是国民贫困),同时不止一次地彼此攻讦,如果它们在内阁谄练的领导下现在又重归于好,互相拥抱起来,并且组成一个唯一的大党——“国民党”,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2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0 月 22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23 号

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 “新莱茵报”

科伦 10 月 28 日。在“新莱茵报”第 116 号横线下面，即在报纸的非政治栏中，登载了一篇由“黑克尔”署名的“告德国人民书”。这一“历史性文件”在“新莱茵报”刊登以前，好几家德国报纸早已发表了。其余的德国报纸（莱茵-普鲁士的报纸和旧普鲁士的报纸也不例外）后来也都发表了这个文件。甚至“科伦日报”也有足够的历史见解来登载司徒卢威的公告，就象登载傅阿德-埃芬蒂的公告一样。

我们不了解，这也许是国家检察官黑克尔羡慕共和主义者黑克尔的荣誉？也许是为了让惊愕的世界知道，德国革命的双重失败是由于共和主义者黑克尔逃往纽约和国家检察官黑克尔留在科伦的缘故吗？这完全是可能的。我们的后代将把这两个伟人看作是现代运动的种种矛盾的戏剧性的体现。未来的歌德将在新“浮士德”中一起来描写他们。至于让哪一个黑克尔扮演浮士德，哪一个黑克尔扮演瓦格纳，这完全由作者自己来决定。

不管怎样，在共和主义者黑克尔作了荒诞无稽的临别致词之后，紧接着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就提出了同样荒诞无稽的控告。

根据当时书报检查法的规定，双横线下面为非政治栏，报纸对刊登在该栏中的
文艺作品、杂文等不负责任，文责由作者自负。——译者注

莫非是我们搞错了？也许国家检察官认为，“告德国人民书”是“新莱茵报”自己伪造的，而在自己的公告下面狡猾阴险地署上了“黑克尔”的名字，以便使德国人民相信：国家检察官黑克尔侨居在纽约，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国家检察官正式批准革命的良好愿望？

这种阴谋诡计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登载在“新莱茵报”第116号附页上的文件下面的署名不是“弗里德里希·黑克尔”，而 tout bonnement（索性）是“黑克尔”。黑克尔的签名用的不是花体字，而索性是黑克尔！难道在德国不是有两个黑克尔吗？

而其中谁是“索性的黑克尔”呢？不管怎么说，在这个索性中有某种模棱两可的东西，就是说，有引起对“新莱茵报”怀疑的某种东西。

不管怎么样，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先生公然认为“告德国人民书”是“新莱茵报”自己伪造的。他把它看作是推翻政府的一种直接号召，是一种明显的叛国行为，或者至少是参与叛国行为，按照 Code pénal（刑法典）规定，这“索性”是叛国。

因此，黑克尔先生向预审推事建议的不是把签署报纸的负责发行人，而是把报纸的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确定”为叛国者。但是把某个人“确定”为叛国者，换句话说；就是立刻把这个人投入监狱，暂且先把他拘禁起来。这里问题是“确定”单独拘禁。因此预审推事拒绝。然而，黑克尔先生一旦被某种思想所激动，他就和这种思想难分难解。“确定”“新莱茵报”的总编辑，对黑克尔先生说来已成了固定观念，正象他把“临别致词”下面的署名“黑克尔”看作是虚构的一样。因此他诉诸高等审判厅。高等审判厅拒绝。他又向上诉法院控告。上诉法院也拒绝了。但是，国家

检察官黑克尔先生从不放弃他的“确定”（仍然是上述意义的）“新莱茵报”的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的固定观念。可见，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并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思想，而是具有康德精神的“实践”理性的启示。

即使报纸转载革命事实或公告是一种叛国的行为，那也绝不能直接把卡尔·马克思“确定”为叛国者，而首先应当追究报纸的发行人，在上述文件刊登在横线下面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那怎么办呢？一种思想产生另一种思想。人们可能按照 Code pénal（刑法典）第 60 条控告卡尔·马克思是报纸发行人所犯罪行的同谋者。如果愿意，也可以把他控告为刊载任何一个声明的同谋者，即使“科伦日报”也刊载过这个声明。于是卡尔·马克思收到了预审推事的传票，他出庭并受到了审问。据我们了解，被传去作见证人的有一些排字工人、一个校对员以及印刷厂的老板。最后，被传去作见证人的还有报纸的负责发行人（Gerant）。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把后者传去作见证人。

难道虚构的作者应当作证反对自己的同谋者吗？

为了把事情叙述得很全面，我们必须指出，“新莱茵报”的编辑室曾被搜查。

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压倒了共和主义者黑克尔。一个黑克尔进行了叛乱的活动，发表了煽动叛变的公告。另一个黑克尔不顾一切地从现代历史中，从报纸中删去既成的事实。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果“坏报刊”发表了革命的事实和公告，它就犯了双重的叛国罪。它是犯罪行为的精神上的同谋者，因为它报道叛乱活动就说明

它内心喜欢这种活动；它又是通常法律意义上的同谋者，因为它报道这些活动就是宣传这些活动，既然宣传这些活动，它就成了叛乱的工具。不管从哪一种意义上讲，它都是要“被确定”的，因此它就获得了这种“确定”的果实。相反地，“好”报刊却有报道或不报道、歪曲或不歪曲革命文件和事实的特权。拉德茨基把这种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禁止米兰的报纸报道来自维也纳的事实和公告。而“米兰报”²⁶⁷向公众报道的不是维也纳的大“革命”，而是专门由拉德茨基所杜撰出来的维也纳的小叛乱。虽然如此，据说在米兰还是爆发了起义。

大家知道，黑克尔先生——国家检察官——是“新莱茵报”的撰稿人。作为我们的撰稿人，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原谅他，只是他反对我们报纸的读神“精神”的罪过是不能原谅的。可是他正好犯了这种罪过，他毫无批评嗅觉地（这对一个“新莱茵报”的撰稿人来说是从所未闻的）把流亡者黑克尔的公告变成了“新莱茵报”的公告。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对待运动的态度是慷慨激昂的，“新莱茵报”则是批判的。弗里德里希·黑克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个人的重大作用上，我们则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由经济关系引起的冲突上。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到美利坚合众国去研究“共和制度”，“新莱茵报”则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中找到了比那个合众国更加有趣的研究对象，因为在那个合众国里，西部还根本没有阶级斗争，东部的阶级斗争也只是按照旧的无声无息的英国形式进行的。在弗里德里希·黑克尔看来，社会问题是由政治斗争产生的，在“新莱茵报”看来，政治斗争不过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

见本卷第 202 页。——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可能是个优秀的三色共和主义者,而“新莱茵报”的真正的反对立场将在三色共和国时代开始。

例如,“新莱茵报”并没有完全背弃自己的过去,它怎么会向德国人民发出这样的呼吁:

“在高高举起和忠实保护人民主权的旗帜的人们的周围联合起来,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的极左分子的周围联合起来;用言论和行动去帮助共和起义的英勇领袖们。”

我们不止一次地声明过,我们并不是“议会的”机关报,因此我们有时甚至不怕招惹柏林和法兰克福的极左派的愤怒。我们号召法兰克福的那些先生们靠近人民,但从来没有号召人民靠近法兰克福的那些先生们。而“共和起义的英勇领袖们”在哪里呢,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大家知道,黑克尔在美国,司徒卢威在监狱里。海尔维格呢?“新莱茵报”的编辑们,特别是卡尔·马克思,在民众大会上坚决反对海尔维格在巴黎所进行的活动²⁶⁸,而怕引起激昂的群众的不满。果然,他们当时因此引起了那些自诩为革命者的乌托邦主义者的怀疑(参看“德意志人民报”²⁶⁹)。现在,当我们的预言不止一次地被事变所证实的时候,难道我们应当附和那些同我们意见相反的人吗?

但是我们将采取公正的态度。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先生还是我们报纸的一个年轻的撰稿人。政治上的新手和自然科学中的新手一样,都象是写生画家,只知道两种颜色:白色和黑色,或者黑白色和红色。至于 espèce(各种各样)颜色在色调变化上的较为细微的区别,只有熟练的和有经验的人才能辨认得出来。而且,黑克尔先生难道不受“确定”“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这种固定观念的支配吗?这种固定观念既不能被侦察机关的涤罪火熔解,也不能

被高等审判厅和上诉法院的涤罪火熔解,因此,应当承认这是一种耐火的固定观念。

三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用布鲁土斯-巴塞爾曼的话来说,无疑是“最高尚的和最优秀的人的统治”和他们沿着这种统治的阶梯扶摇直上。因此,我们希望我们那位可敬的撰稿人——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先生的丰功伟绩会把他抬上国家的奥林帕斯山的顶峰,就象那些驾着阿芙罗狄蒂的车子的白鸽闪电般地把她拉到奥林帕斯山上去一样。大家知道,我们的政府是实施宪政的政府。普富尔热衷于立宪制发。在立宪国家中,都有细心听取反对派报纸的意见的 usus〔习惯〕。因此,如果我们建议政府把杜塞尔多夫最高检察官的空位授给我们的黑克尔,也不算是离开了宪政基地。据我们了解,杜塞尔多夫的检察官阿蒙先生暂时还没有获得拯救祖国的奖章,因此,他即使有自己的奢望,但是在有更大的功劳的人面前,他也会立刻恭敬地放弃自己的奢望。如果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海姆佐特先生成了司法大臣,那我们就建议让黑克尔先生担任总检察长的助手。但是我们认为黑克尔先生能做更大的事情。只是黑克尔先生还年轻。就象一位俄国人所说的:沙皇是伟大的,上帝更伟大,不过沙皇还年轻。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0 月 28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0 月 29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29 号

“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 德国人民书”

科伦 11 月 2 日。兹将“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²⁷⁰告德国人民书
转载如下：

告德国人民书！

在漫长的可耻的岁月中，德国人民一直在专制制度的压迫下呻吟。维也纳和柏林的流血事件使我们有理由指望：德国人民的自由和统一将一举实现。可诅咒的反动派的种种恶毒的阴谋却阻碍了这种发展。反动派企图骗取英雄的人民辉煌起义的成果。德国自由的主要堡垒维也纳目前处在严重的危险中。它成了还很强大的权奸的奸计的牺牲品，人们又想把暴政的桎梏加在它的身上。可是高尚的维也纳居民万众一心，勇敢地起来反对自己的奴役者的武装匪帮。维也纳的事业就是德国的事业，就是自由的事业。维也纳要是陷落了，旧的专制政治就会空前猖獗起来，而维也纳要是胜利了，旧的专制政治就会被消灭。德国的同胞们，不让维也纳的自由遭到灭亡，不使维也纳成为野蛮匪帮军事胜利的牺牲品，这全要靠我们自己。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赶快帮助在危急中的兄弟城市，是德国各邦政府最神圣的职责；然而与此同时，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拯救自己而不惜任何牺牲去拯救维也纳，也是德国人民最神圣的职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我们决不应可耻地袖手旁观。因此，同胞们，我们号召你们每一个人都竭尽全力，来挽救维也纳的灭亡。我们帮助维也纳就是帮助德国。自动来帮忙吧！你们为了建立自由而派遣到法兰克福去的人已经用恶毒的嘲笑拒绝了帮助维也纳的号召。现在就靠你们自己了！你们应该不屈不挠和坚忍不拔地要求自己的政府服从你们大多数人

的意志，拯救德国人民的事业和维也纳自由的事业。赶快行动起来！你们就是力量，你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前进吧！前进，自由的人们，在全部德国的土地上和其他地方，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激动着高尚的心灵！前进吧，现在还不晚！拯救维也纳也拯救德国的自由。同代人将赞扬你们，后代人将使你们名扬千古！

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

1848年10月29日

这个告人民书缺乏革命的毅力，而充满了抱怨派说教的热情，这种热情后面所隐藏的显然是贫乏的思想和感情。

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告人民书指望：维也纳和柏林的三月革命将“一举实现”德国人民的“统一和自由”。换句话说，告人民书所梦想的是“一举”，这种“一举”会使得为了实现“统一和自由”所必需的“发展”成为德国人民的多余的东西。

可是这种代替了发展的、幻想的“一举”马上就变成了被反动派所阻碍的“发展”。这是自相矛盾的空洞词句！

我们更不用谈对同一个主题的单调的重复了：维也纳在危急中，德国的自由也和维也纳一起在危急中；帮助维也纳也就是帮助自己！这种思想并没有具体化。只是同一种词句在变各种不同的花样，直到变成不折不扣的说教时为止。我们只指出一点：这种人为的和虚伪的热情同这一类笨拙的演说术始终是相吻合的。

“德国的同胞们，不让维也纳的自由遭到灭亡，不使维也纳成为野蛮匪帮军事胜利的牺牲品，这全要靠我们自己。”

而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是依靠“德国各邦政府”的责任感。C'est incroyable！〔简直不可思议！〕

“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赶快帮助在危急中的兄弟城市，是德国各邦政府最神圣的职责。”

普鲁士政府应当派谁去反对奥尔施佩格、耶拉契奇和文迪施格雷茨呢？派弗兰格尔或科隆布去呢，还是派普鲁士亲王去？难道“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有权利稍微用这种幼稚和保守的观点来对待德国各邦政府吗？代表大会是否有权利稍微把德国各邦政府的事业和“最神圣的利益”同“克罗地亚的秩序和自由”的事业和利益区分开来呢？各邦政府将由于这种幼稚的梦想而沾沾自喜。

而人民呢？

人民一般被号召“不惜任何牺牲来拯救维也纳”。妙极了！但是，“人民”期待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提出一定的要求。谁要求一切，谁就一无所求和一无所得。一定的要求实质上是这样的：

“你们应该不屈不挠和坚忍不拔地要求自己的政府服从你们大多数人的意志，拯救德国人民的事业和维也纳自由的事业，赶快行动起来！你们就是力量，你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前进吧！”

假定通过大规模的人民游行示威能使政府采取半官方措施来拯救维也纳，那末我们会因“施泰因式的军令”的再版而感到幸运。企图把现今的“德国各邦政府”当做“自由的救星”，——难道他们在执行全帝国的体刑时没有完成“宪法规定的自由”的加甫利尔大天使们的真正使命和“最神圣的职责”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对德国各邦政府应当保持沉默呢，还是应当无情地揭露各邦政府同奥里缪茨和彼得堡之间的秘密勾结？

虽然告人民书建议要“赶快”，实际上也迫不及待，但人道主义的空洞词句把它带出了德国国境，带出了一切地理界线，把它带到一般“高尚心灵”的世界主义的幻想国中去！

“赶快行动起来！前进吧！前进，自由的人们，在全部德国的土地上和其他地方，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激动着高尚的心灵！”

我们并不怀疑，甚至在拉伯兰也有这种“心灵”。

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告人民书”在大谈这种极其暧昧的空洞词句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实质。

“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这样的文件是完全不可饶恕的。“同代人”将不会“赞扬”它，而“后代人”也不会使它“名扬千古”。

不管“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告人民书”怎样，我们还是希望人民从睡梦中苏醒过来，并给予维也纳以他们在目前能力所及的唯一帮助，这种帮助就是战胜本国的反革命。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 日

载于 1848 年 11 月 3 日

“新莱茵报”第 13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

科伦 11 月 2 日。还在六月起义以前,我们就不止一次地揭露过固守 1793 年传统的共和党人的幻想,即“改革报”(“巴黎的”)的共和党人的幻想。在六月革命及其所引起的运动的影响下,这些空想的共和党人才渐渐睁开了眼睛。

“改革报”11 月 29 日的社论向我们表明了这个党派内部旧幻想和新事实之间斗争的情形。

“改革报”写道：

“我们这里为掌握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从来就是阶级的战争。第一共和国产生时资产阶级和人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武装的人民在国外的自我牺牲,帝国时代资产阶级在国内的统治,长系波旁王朝时期封建制度复辟的企图,最后,1830 年资产阶级的胜利和统治,——这就是我们的历史。”

“改革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补充说：

“当然,我们以惋惜的心情来谈论阶级,谈论违背神的意志的、可恨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存在着,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这就是说：“改革报”的那种共和主义的乐观主义至今所看到的只是《citoyens》[“市民”]。但是历史已有力地把“改革报”逼得走投无路,使它不能再用幻想来消灭“市民”分裂为《bourgeois》[“资产者”]和《prolétaires》[“无产者”]的现象。

“改革报”继续写道：

“2月间,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治被摧毁了。人民要求什么东西呢?对人人一律公正,平等。这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口号,他们的第一个愿望。遭到雷殛而恍然大悟的资产阶级最初除了人民的愿望以外再没有别的愿望。”

“改革报”仍然用2月里的漂亮话来判断二月革命的性质。在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治根本没有被摧毁,而是获得了充分完善的表现。王冠,即掩盖着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一道封建的灵光圈,已被摘掉。赤裸裸的资本统治暴露出来了。在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斗争。当共同的敌人一被消灭,战场上就只剩下这两个敌对的阶级,它们两者之间就必然要开始决战。可是,有人会问我们,既然二月革命已建立了完备的资产阶级统治,为什么又会发生资产阶级退向保皇主义这种新的转变呢?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因为资产阶级留恋那个时期,当时它占居统治地位而不用对自己的统治负责;当时介于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虚构的权力既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又替资产阶级掩护;当时资产阶级有个戴着王冠的替罪羊,每当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本身射击的时候,炮弹总是落在替罪羊的身上,而一旦这个替罪羊成了资产阶级的累赘以及资产阶级想把自己的政权确立为专为自身服务的政权,资产阶级就自动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资产阶级把国王作为防备人民的避雷针,而把人民作为防备国王的避雷针。

“改革报”把路易·菲力浦失败后第二天得到广泛传播的部分伪善部分诚挚的幻想看做现实,把二月事件以后发生的运动看做一系列的错误和悲痛的偶发事件,如果有一个适应时势需要的大丈夫出现的话,这种错误和悲痛的偶发事件就可以避免。好象带有虚幻的光辉的拉马丁并不是适应时势的真正大丈夫似的。

“改革报”抱怨说：可是，真正的丈夫，大丈夫至今还不想出现，而时势却在每况愈下。

“一方面，工商业的危机在加深。另一方面，仇恨在增长。所有的人都力求达到相反的目的。那些在2月24日以前受压迫的人们，在关于崭新的社会的观念中寻找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的理想。那些在君主制度下占居统治地位的人们，只关心怎样恢复自己的权力和加倍残酷地来利用它。”

怎么，难道“改革报”竟站在这两个互相极端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立场上吗？它是否能提高到哪怕只是模糊地了解，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只能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呢？

不是的！“改革报”刚才承认了阶级对立的存在。但是，阶级对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迄今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由这种方式所决定的交换关系上的。而“改革报”认为改变和消灭这种对立的最好的手段，莫过于使自己的视线离开阶级对立的现实基础，就是说离开这些物质关系，而回头奔向共和国思想的虚幻高空，即奔向富有诗意的二月时期，因为六月事变用暴力把它从这个时期中揪了出来。请听吧：

“在这些内哄中，最令人悲痛的事情就是爱国的、民族的情感的消弭和丧失”，即两个阶级用来给自己的一定利益、给自己的生活条件添增爱国和民族色彩的那些幻想的消弭和丧失。当这些阶级在1789年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之间的真正对立还不显著。因此，现在提适合于当时状况的东西，仅仅意味着逃避承认目前状况。当时还是活着的东西，现在已变成了干尸。

“改革报”最后写道：“显然，法国在遭受一种根深蒂固的祸害的折磨，但是，这种祸害并不是不可救药的。它的根源是思想和道德的混乱，是忘记了社会关系中的公正和平等，是受了利己教育的有害影响。应当在这方面寻找改造的手段。然而人们不这样做，却诉诸物质手段。”

“改革报”把问题转移到“良心”方面去，而关于道德的空谈现在就成为根除一切祸害的手段了。由此看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由这两个阶级的思想产生的了。但这种思想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而这种关系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敌对阶级的物质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中产生的。在“改革报”看来，如果这两个阶级不再意识到自己的真正状况和自己的真正对立，并用 1793 年那种“爱国的”情感和漂亮话做鸦片来麻醉自己，对它们会有好处的。多么软弱无力呵！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1 月 3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33 号

维也纳革命和“科伦日报”²⁷¹

科伦 11 月 3 日。我们的读者对维也纳从来不抱空幻的希望。六月革命后我们容忍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卑鄙行为。还在取消戒严令后出版的第一号“新莱茵报”上我们就说过：“由于资产阶级不信任工人阶级，这次革命已面临着危险：它即使不遭到失败，至少也会陷于瘫痪。但是，不管怎样，维也纳革命对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的影响，打乱了反革命进攻的全盘计划！”

因此，维也纳的失败对于我们不会是什么意外。它只会提醒我们不要同那些用做生意的自由来衡量自由的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它会提醒我们拒绝一切调和，坚决反对可怜的德国中等阶级，这个阶级在不斗争仍能做生意的条件下是甘愿放弃自己的统治的。英法的资产阶级是有荣誉心的。维也纳的失败会证实德国资产阶级是寡廉鲜耻的。

总之，我们从来也没有保证维也纳人能取得胜利。他们的失败对我们不会是意外。失败只会使我们确信，同资产阶级不可能有任何的和平，甚至在过渡时期也是这样，人民应该站在资产阶级同政府的斗争之外，等待资产阶级的胜利或失败，以便利用它们的结果。再说一遍：读者们只要翻阅一下本报至今所出版的各号报纸就会相信，无论维也纳人的胜利或失败，对我们都不会是什么意外。

那末,什么对我们才是真正的意外呢?那就是“科伦日报”的第二次号外。这也许是政府为了消除柏林和全省的紧张状况而故意散播有关维也纳的谣言,或者,杜蒙从“柏林”晨报和“布勒斯劳”晨报获得“坏报刊”所得不到的消息,而给予普鲁士国家电报局里报酬?那末,杜蒙今天早晨究竟从哪里得到了我们没有得到的“紧急电报”呢?也许是代替了维特根施坦职务的特利尔城的比尔克这个小人物已被杜蒙聘请为编辑了吧?我们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不管勃律盖曼、沃尔弗斯或施万贝克是什么人,他们毕竟都不是比尔克。我们不相信杜蒙会聘请如此无能的人。

当时曾刊载了关于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虚假报道的杜蒙,今天晚上6点钟,又在他的报纸中以显著地位刊载了一条“电讯”消息,根据这条消息,维也纳向“温德人的疥疮”即向“文迪施格雷茨”投降了。

可能是这样。然而,凡是鲜血淋漓的“勃律盖曼”²⁷²这位旧“莱茵报”的记者,这位循规蹈矩的、自己的意见始终与意见的一般“交换价值”相符合的人认为是可能的事情,其可能性都是以“普鲁士国家通报”和“布勒斯劳报”²⁷³的报道为根据的。“勃律盖曼”或“科伦日报”所捏造的关于二月、三月和十月革命的谣言是对历史的一种独创的贡献。

我们把这些什么也没有报道的报道列举在下面。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11月3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11月3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133号第2附页

俏皮话:《W endische Krätze》意思是“温德人的疥疮”。《W indischgrätz》(文迪施格雷茨)是奥国姓。——编者注

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 最后消息

科伦 11月4日。黎明。

直接从维也纳来的消息仍然没有。但就是从普鲁士官方报刊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出：维也纳并没有投降，文迪施格雷茨故意地或由于误会而把虚假的电讯消息传给全世界，这条消息在“好”报刊上引起了殷勤的、纷纭的和正统的回声，虽然这个报刊竭力用虚伪的临葬悼词来掩盖自己的幸灾乐祸。如果把柏林和西里西亚的报道中所有那些由于自相矛盾而不攻自破的荒诞谰语去掉，那末就会弄清事情的真相：在10月29日以前，皇匪军只占领了城郊的几个地方。从现有的报道中看不出他们已经夺取了维也纳这个城市的据点。维也纳的全部投降只不过是维也纳市议会的一些叛变的公告罢了。10月30日匈牙利军队的先锋队向文迪施格雷茨进攻，但据说被打退了。10月31日文迪施格雷茨又炮击维也纳，但没有结果。他现在处于维也纳人和8万多匈牙利军队之间。文迪施格雷茨的无耻声明成了各省起义或至少是威胁性发动的信号。甚至布拉格的捷克狂热者，那些斯拉夫菩提树²⁷⁴的新信徒也从空虚的幻想中清醒过来，主张拥护维也纳而反对皇帝的施因德汉斯²⁷⁵。反革命从来不敢如此愚蠢和无耻地宣扬自己的计划。甚至在奥里缪茨这个奥地利的科布伦茨，戴着王冠的白痴脚下的土地也动摇起

来了。只要统率军队的是那位举世闻名的西彼赫-萨拉尔 耶拉契奇(他的声望是那样高,以致“月亮在他的马刀的闪光下都吓得藏到云彩后面去了”,而且常常是“炮声指给他”应该逃跑的“道路”),那末毫无疑问,匈牙利人和维也纳人就会把

这一群恶棍,横蛮的匪徒,
受尽生活折磨的饥饿的乞丐,
流浪汉,骗子手,可怜的奴隶,——
把这些无耻的不速之客,
全都赶到宽阔的多瑙河里去。
们全是克罗地亚人的败类,
被本国抛上了疯狂冒险之途,
抛上了必然灭亡的道路。

以后的消息是详细地报道了关于克罗地亚人以及“法定秩序和宪法规定的自由”的其他骑士们的骇人听闻的可耻行为。而欧洲的资产阶级却在他们的交易所和其他娱乐场所对这种难以形容的血腥场面拍手叫好。这就是那个最可怜的资产阶级,它在人民司法作出个别严厉判决的时候曾义愤填膺,齐声呵斥,异口同声地诅咒杀死了英勇的拉图尔和高尚的利希诺夫斯基的“凶手”。

为了惩罚屠杀加里西亚人的暴行,波兰人又成了维也纳解放者的领袖,就象他们成为意大利人民的领袖一样,就象他们到处都是高尚的革命将领一样。光荣,三重光荣都归于波兰人!

柏林的权奸沉醉于血染维也纳的情景,他们的眼睛被燃烧着

即总司令。——编者注

在维也纳十月起义中,维也纳起义者的最能干的指挥官是波兰革命者约瑟夫·贝姆(1793—1850),他曾参加1830—1831年波兰革命,后来又参加过1849年匈牙利革命起义。——译者注

的郊区的烟雾遮瞎了,他们的耳朵被克罗地亚人和海杜克 胜利的吼声震聋了,于是他们摘下了假面具。“柏林恢复了安宁”。Nous verrons(我们瞧着吧)。

最后,我们听到了从巴黎传来的预告要发生地震的最初的地下的轰隆声,这次地震将把那个正直的共和国埋葬在它本身的废墟中。

天快亮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4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1 月 5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35 号

匈牙利雇佣兵。1605 年德兰士瓦尼亚公爵斯蒂芬·博奇科伊由于他们在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1276—1918)的斗争中有功,赐给他们贵族特权,并授以大片领土。——译者注

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

科伦 11 月 6 日。“克罗地亚的自由和秩序”胜利了，并以难以形容的丑恶罪行——纵火、镇压、抢劫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如今维也纳落到文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和奥尔施佩格的手里了。在老卖国贼拉图尔被打死后，大屠杀紧接着把人类的牺牲者抛进了他的坟墓。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的全部悲观的预言²⁷⁶已经应验了，现在他自己可能已成为大屠杀的牺牲者了。

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希望匈牙利人来帮助解放维也纳，可是直到如今匈牙利军队的调动对我们仍然是一个谜。

各种背叛行为造成了维也纳的陷落。帝国国会和市议会在 10 月 6 日以后的全部历史不外是不断背叛的历史。帝国国会和市议会究竟代表什么人呢？

资产阶级。

维也纳的一部分国民自卫军在十月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公开地站到权奸那边去了。而在十月革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另外一部分国民自卫军反对无产阶级和大学生军团，暗中和皇匪军勾结。这些国民自卫军归谁所有呢？

资产阶级。

在法国，资产阶级只是在清除了阻碍本阶级进行统治的一切

障碍之后,才以反革命的首领的面貌出现。而在德国,资产阶级甚至连自己的公民自由和自己的统治所必需的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来得及取得就卑贱地作了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在法国,资产阶级以暴君的面貌出现,并实行了自己的反革命。而在德国,资产阶级则以奴婢的身分出现,并为自己暴君的利益而实行反革命。在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是为了制服人民。而在德国,资产阶级为了不让人民胜利而自己甘愿受人摆布。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

谁从维也纳成群结队地逃跑,把丢弃的财产交给宽大的人民来保管,可是在逃跑期间反而辱骂人民执行了看守的任务,而在回来时又观看他们怎样惨遭屠杀?

资产阶级。

当维也纳人民的生活稍有起色时寒暑表就下降,而当人民发出临死的呻吟时寒暑表就上升,这种寒暑表泄露了谁的最大的秘密呢?谁用股票行市上的秘密语言说话呢?

资产阶级。

“德国国民议会”和它的“中央政权”出卖了维也纳。它们代表谁呢?

首先代表资产阶级。

“克罗地亚的秩序和自由”在维也纳的胜利是以“正直的”共和国在巴黎的胜利为先决条件的。谁在六月的日子里取得了胜利呢?

资产阶级。

欧洲的反革命势力由于自己在巴黎取得了胜利以后便开始大摆人肉筵席。

在二月和三月的日子里武装力量到处都被击溃。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代表政府本身而外不代表任何人。六月的日子以后武装力量到处都得胜奏捷，因为资产阶级处处都和它暗中妥协，另一方面它又把革命运动的正式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采取了种种不彻底的措施，其结果就自然使得革命运动流产。

捷克人的民族狂热是维也纳权奸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同盟者中间已经开始了纷争。我们的读者会在本号报纸上看到布拉格代表团对于在奥里缪茨遇到的侮辱性的无耻行为的抗议书。

这是将在以耶拉契奇为首的斯拉夫派和以文迪施格雷茨为首的粗鄙的、凌驾于一切民族之上的权奸之间发生战争的第一个征兆。另一方面，奥地利的德国农民还没有被平定。在奥地利各民族的喧嚣声中，他们的声音特别响亮。而第三方面，爱民的沙皇的声音传到了佩斯，他的刽子手们在多瑙河上各公国里等候敕令。

最后，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最近决定把德意志的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如果德国中央政权和德国国民议会并不认为自己的使命仅仅是登台让欧洲公众嘲骂，这个决定本身就会导致巨大的冲突。不管它们多么温顺，奥地利将展开史无前例的规模巨大的斗争。

第二幕戏在维也纳刚刚结束，这出戏的第一幕是在巴黎演出的，叫做“六月的日子”。在巴黎有别动队，在维也纳有“克罗地亚人”，他们都是意大利南部的流浪者——被武装起来的和被收买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反对从事劳动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我们在柏林很快就会看到第三幕。

就算武器能帮助反革命在全欧洲复活，金钱也会促使它在全欧洲死亡。欧洲的破产，国家的破产，注定要把它的胜利化为乌有。

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象软绵绵的灯蕊一样。

但是,革命发展的进程将不会等待欧洲各国转嫁给欧洲社会的债务的偿还日期。在巴黎,六月革命会给以致命的反击。随着“红色共和国”在巴黎的胜利,军队将从各国的内地调到边境并越过边境,而各个斗争的党派的真正力量也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时我们会想起六月和十月,并且也会高声喊道:

Vae victis! [战败者罪该万死!]

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1 月 6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1 月 7 日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第 136 号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的遗稿

弗·恩格斯

Non parait rien de bon.

1

Lein mit Lein.

La belle France! Tu en fait, les Prangers de
des ein Spionnet Land & für jeden Kopf wenn sie
sich drinnen sind?

Melket Land in Europa wie hoch an Wissen,
an Mannhaftigkeit der Anlagen & Produkt, an W.
miserable mit Frankreich?

Spain? Aber zwei Drittel seiner Kraft sind
durch Kaffeehandeln oder von Natur von fast (Main
Cousin) & die abhängt. Seite der Gültigkeit, Portugal,
gesehen nicht gut.

Italien! Aber seit die Völkerverkehrung durch
den Ocean geht, sind die Dummheiten der Mittel
meer. Völkerverkehrung, hoch Italien verlor die

England & aber Frankreich ist seit aufsteigend auf
gegangen in Handel & Industrie. England ist
nicht England? Ist man Spracherklärung
eine Hand drückt?

Ja Norden eine große Veränderung
vo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sind die gewöhnlich
Norden getrennt, Spanien, wegen von Land der
König & Koggerboot, die verpöndeten Schiffe & der
Kolonien!

Aber Frankreich! An drei Meeren gelegen, sind
fünf große Ströme in all die Küstigen
im Norden fast drüßter abfließen, im Süden fast
italienische Meer, im Norden die Saigun, im
Süd die Main & Rier, im Norden die Olyu
im Süden die Rier, im Norden die fließt, im
Süd die Rier, & fast überall der Meer.

Und welche Wein! Völkerverkehrung, Nord-See
Strom bis zum Beringer Meer, von Beringer zum
Spencer & George Land, & fortgesetzt der
Süd? Ist man diesen zum Spracherklärung
Melket Mannhaftigkeit der Völkerverkehrung & der
König von
petit Mäcon oder Chablis zum Gambutin, zum
Grand Luvoy, zum Santona, zum
zum St. Monfray! Und wenn man bedacht daß

弗·恩格斯的“从巴黎到伯尔尼”的手稿第一页

从巴黎到伯尔尼²⁷⁷

—

塞纳河和罗亚尔河

La belle France ! [美丽的法国 !]的确 ,法国人有一个美丽的国家 ,他们有权以此自豪。

不论在财富方面 ,也不论在条件优越和物产丰富方面 ,在各个方面 ,欧洲有哪一个国家能同法国相比呢 ?

西班牙吗 ?可是由于荒芜或自然条件的关系 ,它有 $\frac{2}{3}$ 的面积是炎热的多石的荒野 ,而半岛上濒临大西洋的一部分地区——葡萄牙 ,并不是它的领土。

意大利吗 ?可是自从世界贸易的航路通过海洋以来 ,自从轮船横渡地中海以来 ,意大利就被遗忘了。

英国吗 ?但是在英国 ,80年来除了商业和工业、煤烟和畜牧业以外 ,别的什么也没有。英国的天气阴暗得可怕 ,并且不出产葡萄酒。

而德国呢 ?德国的北方是一片多砂的平原 ,一道花岗岩的墙壁——阿尔卑斯山脉把德国和欧洲南部隔开 ;这是一个不出产葡萄酒的国家 ,这是一个出产啤酒、烧酒和黑面包的国家 ,这是一个河流淤塞、革命规模狭小的国家 !

法国可就好得多了！法国三面临海，境内有5条大河朝着3个方向奔流；北方的气候同德国和比利时差不多，南方的气候和意大利差不多；北方出产小麦，南方出产玉蜀黍和稻米，北方出产油菜，南方出产橄榄树；北方出产亚麻，南方出产丝绸，而且几乎到处都出产葡萄酒。

什么样的葡萄酒呵！从波尔多酒到勃艮第酒，从勃艮第酒到圣若尔日烈酒、律内尔酒和南方的弗朗亭南酒，从南方的弗朗亭南酒到起泡沫的香槟酒，有多少种类呵！从普提-马康酒或沙布利酒到沙姆彼尔田酒、法托-拉罗兹酒、索帖尔涅酒，到卢西利昂酒和起泡沫的阿伊酒，有多少种白的和红的葡萄酒呵！妙不可言的是：喝了其中的每一种酒都会产生一种别致的醉意，喝了几瓶酒以后就能使一个人的情绪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从跳轻佻的四人舞到唱“马赛曲”，从跳康康舞的狂热到革命热情的激发，最后，喝了一瓶香槟酒，又能鼓起人间最愉快的狂欢节的情绪！

只有法国才有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全世界的电击，这个城市的居民和任何地方的人民不同，他们把追求享乐的热情同从事历史行动的热情结合起来了，这里的居民善于象最讲究的雅典享乐主义者那样地生活，也善于象最勇敢的斯巴达人那样地死去，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阿基比阿德，又体现了勒奥尼达斯；这个城市就象路易·勃朗所说的那样，它真的是世界的中心和头脑。

当你在城市的某一高处，或者在蒙马特尔，或者在圣克鲁平台上眺望巴黎的时候，当你沿着城市的四周漫步的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法国懂得巴黎对于它有什么意义，所以法

国曾不遗余力地细心抚育巴黎。就象一个宫女静静地躺在闪闪发光的青铜长沙发上一样,这个骄傲的城市安闲地屹立在蜿蜒曲折的塞纳河河谷中沐着阳光、栽着葡萄的丘陵上。在凡尔赛的两条铁路上从车窗下望,可以看到村落和小城市星罗棋布的一片翠绿的河谷,世界上哪儿能找到这样美丽的景色呢?象修伦、圣克鲁、色佛尔、蒙莫兰锡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乡村和城市,环境是那么引人入胜,建筑是那么精致优美,布置是那么别具风味,世界上哪儿能找到这样美丽的地方呢?随便走到哪一个关卡,随便沿着哪一条道路信步走去,到处都可以看到那样美丽的环境,那样别具风味地利用每一个地方,那样优美和精致。而这颗城市中的珍珠,是自己给自己创造了这样一个绝美的托盘的。

但是,当然,只有法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创造巴黎。只有当你看到了这一美丽国家的惊人的财富时,你才懂得这个光辉灿烂、宏伟壮丽的无与伦比的巴黎是怎样产生的。如果你从北方来,如果你乘火车奔驰过弗朗德里亚和阿尔图阿平原,奔驰过既无森林又无葡萄园的皮卡尔第山地,你当然感觉不到这一点。在那里,你只看见一片稻田和草地,只是因为还有低洼的河谷和灌木成林的远山,才不觉得单调;当你在庞图阿兹附近进入快要呼吸到巴黎的区域的区域时,你才开始有一点觉察到“美丽的法国”本身。当你乘车通过富饶的洛林河谷,越过满布葡萄园的白垩质的香槟山坡,沿着美丽的马尔纳河谷向首都进发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清楚地了解巴黎。当你乘车通过诺曼底,在从卢昂到巴黎这一条路上看到火车时而沿着蜿蜒曲折的塞纳河前进,时而穿过塞纳河奔驰的时候,你就更清楚地认识巴黎了。在塞纳河上,一直到塞纳河口,都散发出巴黎的大气,这里的村庄、城市和山冈,都使人联想到巴黎的郊区,不过你

愈接近法国中部,这一切就愈显得美丽、繁华和优雅。但是,只有当我沿着罗亚尔河岸行走,并从那里越过丛山进入遍地葡萄园的勃艮第山谷时,我才完全了解到怎么会有巴黎。

我知道巴黎是在它受君主政体统治的最后两年,当时资产阶级还在尽情地欣赏它的全部权力,工商业还能勉强维持,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青年还有足够的金钱去行乐和狂饮,甚至一部分工人的生活也还有保障,他们还能无忧无虑地参加一般的娱乐。我又一次看到巴黎是在3月和4月,在它暂时陶醉于共和国的蜜月中的时候,当时工人们不加考虑地相信共和国,满不在乎地下了决心,表示“甘愿贫困3个月来让共和国支配”,他们白天吃干面包和马铃薯,晚上在大街上种植自由树、放烟火和兴高采烈地唱“马赛曲”,而资产者则成天躲在家里,企图用五颜六色的灯盏来平息人民的怒火。在10月里,我又来到了巴黎,但是,我向黑克尔发誓,我决不是自愿来的!从那时到现在,巴黎经历了5月15日和6月25日,经历了空前残酷的斗争,曾经血流成海,有15000人死亡。卡芬雅克的榴弹把巴黎人的不可遏止的欢乐轰得烟消云散了。“马赛曲”和《Chant du départ》(“进军曲”)的歌声沉寂了;只有资产者还在低吟《Mourir pour la patrie》(“为祖国牺牲”)²⁷⁸。工人们没有面包,没有武器,咬紧牙关,把仇恨藏在心里。在戒严的学校中,鲁莽的共和国很快就变得循规蹈矩、千依百顺、考虑周到和举止稳重(sage et modéré)了。可是巴黎已经死了,这已经不是巴黎了。大街上只有资产者和警察密探,舞场和戏院空无一人,街头的

见本卷第155页。——编者注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时,巴黎工人为了纪念获得自由,在大街上种植白杨树。——译者注

流浪儿穿上了别动队的制服,每天为了30个苏为正直的共和国卖命,而且他们愈是愚蠢,就愈受到资产阶级的赞扬,——总之,这又是1847年的巴黎,不过没有灵魂,没有生命,没有火焰,没有工人们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满情绪的因素罢了。巴黎已经死了,而这个美丽的死人愈是美丽,就愈显得可怕。

我不能在这个已死的巴黎久留。我必须走开,不管到哪里去都行。于是我先动身上瑞士去。因为我身边的钱不多,所以只好步行。并且我也不愿意选择最短的路程,因为我心里是不想轻易离开法国的。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我动身了,一直信步往南走去。我一走出巴黎近郊,就在村落之间迷路了。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最后,我踏上了通往里昂的大道。我沿着这条道路走去,并且时常走到路边,在山坡上漫步。从山上眺望,只见塞纳河的上游和下游,在通往巴黎和枫丹白露的那个方向,有一片异常美丽的景色。在那遥远的地方,河流蜿蜒地流过宽阔的山谷;河的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山冈上葡萄林成荫,而在更远的地方,在地平面上,有一片蓝色的群山,群山后面有马尔纳河流过。

但是,我不想直接上勃艮第去,我想先沿着罗亚尔河岸走。第二天我才离开了这条大道,越过群山,向奥尔良城进发。当然,我又在村落之间迷了路,因为我的响导不过是太阳和与世隔绝的弄不清哪边是左哪边是右的农民。我在一个村子里住了一夜(从农民们的方言中,我怎么也不能弄清楚这个村子的名字),它离巴黎有15法里路,位于塞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的分水岭上。

组成这一分水岭的是从东南向西北伸展的宽阔的山脉。山的两麓被无数的山谷割开,山谷两旁溪流交叉纵横。在上面,在微风

拂拂的山顶上,只有麦子、荞麦、紫苜蓿和蔬菜,而在斜坡上,则到处都是葡萄树。在东面,很多石灰质的石块几乎布满了斜坡,这种石块英国的地质学家叫做 boulder stones〔圆巨石〕。这种圆巨石在丘陵起伏的地带常有发现,它们是在第二和第三纪层形成的。在这些大块的青色的圆巨石之间长满了翠绿的灌木和小树,同遍布山谷的草地和对面满山坡的葡萄树相辉映,看起来非常调和。

我慢慢地走进一条狭窄的河谷,顺着河谷走了一段路程。最后,我走上了大路,遇见了行人,从他们那里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据说:我已离奥尔良到巴黎途中的马舍尔布不远了。奥尔良位于我的旅途的西边,距离太远;我的最近的目的地是涅维尔,因此,我翻过附近的一座山,又一直往南走。山上出现了一片迷人的景色:树木成林的群山之间有一座美丽的小城——马舍尔布,山坡上村落星罗棋布,在上面,在一个山顶上,则有一个沙多勃利昂皇宫。而使我感到更高兴的是:在对面,在狭谷的那一边,有一条一直通向南方的省道。

原来,法国有三种道路。一种是国道,过去称为皇道,现在叫做民道,这是一些联接各个重要城市的美丽而宽阔的公路。这些民道在巴黎近郊不仅是公路,而且是真正华丽的大路,是宏伟的榆树林荫道,有 60 多英尺宽,中间是铺砌过的。但是离巴黎愈远,路的作用愈小,道路也就愈坏:路面愈来愈窄,两旁的树木也愈来愈少。有些地方竟坏到这样的程度:一连下了两个钟头不大不小的雨就几乎无法通行。第二类是省道,即二级交通线,它们是由省的经费来维持的。它们比民道狭窄、简陋。最后,第三类是大的村道 (chemins de grande communication), 它们是靠县的经费来维持的,这些路既狭窄又简陋,不过有的地方比起较宽

的公路来还要好些。

我穿过田野，一直向着我的省道走去，并且非常高兴，深信它是笔直通向南方的。沿途很少看到村庄和旅店。走了好几个钟头，我才到了一个大农庄，在这里，人们非常乐意地请我吃东西，为此，我给主人的孩子们在一张纸上画了几个脸谱，并且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卡芬雅克将军，这是路易·拿破仑，这是阿尔芒·马拉斯特，这是赖德律-洛兰等等，都是很象很象的。农民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些漫画，衷心地感谢我，并且立即把这些逼真的画象挂在墙上。同时，我还从这些可爱的人们那里打听到，我现在是在从马舍尔布到罗亚尔河畔的沙多卢的路上，离沙多卢大约只有 12 法里路了。

我继续往前走，经过了普尤伊左和另一个小城市（它的名字我忘记了），夜晚，才到达比利堡，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美丽的城市，我在这里过了一夜。道路通过高地，这里有许多地方长满了葡萄树，但这条路是相当单调的。

第二天早晨，我再走了 5 里路就到了沙法多卢，从那里又沿着罗亚尔河，沿着从奥尔良到涅维尔的一条民道走去。

在绿色的罗亚尔河岸上，
诱人的扁桃花正在怒放，
我感受到了相爱的魔力，
从此就爱上了那个地方²⁷⁹——

有些富于幻想的德国青年和温情脉脉的德国少女这样用海尔敏娜·冯·谢奇的软绵绵的词句和卡尔·马利阿·冯·韦伯的动人心弦的调子来歌唱。但是，谁学习 20 年代德勒斯顿的时尚，在罗亚尔河岸上寻找扁桃花和甜蜜的、温存的、热情的浪漫性格，谁就

给自己造成一种可怕的幻想，这种幻想是只有德国世袭的第三代女学者才能产生的。

在从沙多卢经过勒-博尔德到达姆比埃尔的路上，就几乎看不到这一条浪漫的罗亚尔河了。这条路在离河两三里路远的丘陵中穿过，从这里远远地望去，只能偶而看到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的罗亚尔河水。这个地方盛产葡萄酒、谷物、水果，而临河一带，则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这个没有树林的河谷，周围尽是波浪形的丘陵，看起来总觉得相当单调。

在道路中间，在几家农舍附近，我碰见了一个由4个男人、3个女人和几个小孩子组成的商队，他们赶着3辆满货物的驴车。这些人就在路边一大堆篝火旁做午饭吃。我在这里停了一下：我没有弄错，他们说的是德国话，而且是非常粗野的德国南部高原的方言。我和他们谈起话来；他们在法国中部听到了祖国的语言，简直喜出望外。可是，看来他们是斯特拉斯堡近郊的亚尔萨斯人，他们每年夏天都象现在这样，到法国内地去靠编制篮筐谋生。我问他们能否以此为生，他们这样回答：“当然，要买一切东西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多半是靠布施的。”从一辆小小的车子里，又有一个老头儿慢慢地爬了出来，在车子里，他有一张实实在在的床。这一群人俨然象茨冈人，他们穿着布施来的衣服，这些衣服没有一件是适合别人穿的。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表现出心满意足的神情，滔滔不绝地向我叙述自己的流浪生活。就在这里，在这场兴致勃勃的交谈中，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这是一个蓝眼睛的温和的人）几乎要互相揪住火红色的蓬乱的头发打起架来。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由于什么样的力量，德国的善良和德国的诚恳竟能透过茨冈人的生活方式和茨冈人的服装；我向它们告别，动身继续前

进，有一个茨冈人陪我走了一段路，他本来是在午饭前骑着骨瘦如柴的小驴闲逛的。

晚上，我到了达姆比埃尔，这是离罗亚尔河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大约有三四百名巴黎工人（这是以前国家工厂的剩余工人）在这里按照政府的命令修筑防洪坝。在他们中间有各行各业的工人：首饰匠，屠夫，鞋匠，木匠，直到巴黎街头捡破烂的人。在我过夜的一家宿店里，我碰见了大约 20 个这样的工人。其中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屠夫，他已担任监工的职位，他喜形于色地谈起了他们的工作情况：按照各人所做的工作，每天能赚 30 至 100 个苏；即使技巧不太高明，要赚 40 至 60 个苏也并不困难。他想马上把我编在他的小组内，并且向我肯定地说，我很快就会习惯于这项工作，从下星期起，每天一定能赚 50 个苏；说我可以好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而那里的工作至少还能维持 6 个月之久。为了使生活多样化，我并不反对在一两个月内放下笔杆，拿起铁铲。但是我身边什么证件也没有，可能会碰到不愉快的事情。

这些巴黎工人完全保持着他们的传统的欢乐。他们每天在谈笑风生中工作 10 小时，在玩乐中消磨休息时间，晚上则“发展”乡下姑娘作为消遣。由于在小村子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般说来，他们的意志是十分消沉的。他们对本阶级的利益，对与工人息息相关的日常政治问题却漠不关心。看来，他们连报纸也不看。他们对政治的全部兴趣，仅仅限于互相起各种各样的绰号：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的笨汉叫做科西迪耶尔，另一个坏工人和酒徒叫做基佐，等等。由于工作紧张，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主要由于同巴黎隔绝，被迫生活在法国的穷乡僻壤，他们的眼界就大大地缩小了。他们几乎已经农民化了，可是他们在那里总共才住了两个月。

第二天早晨，我到了奇恩，这样，我终于来到了罗亚尔河河谷。奇恩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城内有蜿蜒曲折的街道，有美丽的河岸街，有横跨罗亚尔河的大桥，这里的河面几乎同法兰克福附近的美因河一样宽。一般说来，这条河很浅，而且沙滩很多。

从奇恩到布里阿尔的道路沿着河谷伸展，离罗亚尔河约有 1/4 哩远。这条路通向东南，这一带地方渐渐带有南方的风味。道路两旁的榆树、榕树、洋槐和栗树连绵不断，构成了一条林荫道。绿油油的草地，收割后长满了非常繁茂的紫苜蓿的肥沃的田野，以及周围的一排排白杨树，散布在河谷的底部。在罗亚尔河的那一边，在明亮的远处，可以看见一系列山岗；在河的这一边，在路的近旁，又有一连串葡萄树成荫的小丘。在这一带地方，罗亚尔河的河谷根本不象平常所说的那样惊人的美丽或具有浪漫的气息，但是它使人产生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所有这些丰富的植物说明了气候的温和，因为植物的繁茂应该归功于温和的气候。甚至在德国最富饶的地方，我所看到过的植物也都不能同奇恩和布里阿尔途中的植物相比拟。

在和罗亚尔河分手之前，我还要谈一下我所经过的那些地方的居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从巴黎乘车至多走四五小时就可以到达的那些村庄，不可能提供关于法国其他地区的村庄的概念。这些村庄的配置，房子的建筑方式，居民的风俗习惯，受他们赖以生存的伟大首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只是在离开巴黎 10 法里路的地方，在远远的山岗上，才出现地地道道的村庄，才能看到地地道道的农舍。这一带地方一直到罗亚尔河，甚至到勃艮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农民们力求把自己家里的人口掩蔽起来，使它不暴露在道路面前。在山岗

上，每一个农家的院子都用石墙围着，穿过大门进入院子，在院子里才能找到进屋子的门，因为这道门几乎总是开在后面的。这些地方大部分农民都有牛有马，农舍都相当大；可是在罗亚尔河畔，种蔬菜很普遍，在这里，连富裕的农民也根本没有牲畜，即使有也很少，因为在这里，饲养牲畜是比较大的地主或土地承租人所独占的一种特殊副业，这里的农舍愈来愈小，常常小得令人感到惊奇：在里面怎么能容纳一家人以及全部家具和储藏物。但是在这里，进屋子的门也是背向道路开的，村子里几乎只有小酒馆和小铺子的门才是朝着道路开的。

这一带地方的农民虽然贫穷，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下生活过得相当好。至少在山谷里，酒几乎总是土产，质量既好，价钱又便宜（今年一瓶酒值两个到三个苏），除了最高的山顶以外，到处都生产面包，好的小麦面包。此外，还出产美味的干酪和很好的水果，大家知道，在法国各地，这是同面包一块儿吃的。同所有的乡下居民一样，他们很少吃肉，可是他们喝很多牛奶，喝各种蔬菜汤，而且通常都吃质量很好的素食。同德国北部的农民甚至相当富裕的农民比较起来，法国塞纳河和罗亚包河之间的农民的生活至少要好两倍。

这些农民是善良的、好客的、愉快的人，他们对外来的人很殷勤，很关切，虽然他们操着令人讨厌的 patois [方言]，但他们毕竟是非常真实的彬彬有礼的法国人。虽然他们对于他们的父亲们从贵族和牧师手中夺过来的一小块土地有着非常强烈的私有感，但是他们还保存着某些宗法式的美德，那些离大路很远的村子里的农民尤其是这样。

然而农民总归是农民，农民的生活条件时时刻刻影响着农民。

尽管法国农民具有个人美德，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莱茵河东部的农民好些，但是他们还是和德国农民一样，他们在文明世界中还是野蛮人。

在人口不多、只是随着世代的交替才发生人口变化的偏僻的村庄里，农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劳动紧张而单调，比任何农奴制都更有力地把他们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且代代相传，始终如此；他们的整个生活关系固定不变，千篇一律，他们的极其重要而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关系仅仅限于家庭，——这一切都使农民目光如豆，而一般说来，这种情形在现代社会中是可能的。虽然伟大的历史运动在他们身边掠过，有时也把他们卷入运动中去，但是他们对于推动运动前进的力量的性质，对于运动的发生和目的，是一点也不了解的。

在中世纪，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农民运动随着市民运动而产生，但是它经常提出一些反动的要求，它并没有给农民本身带来重大的结果，而只是支持了城市的解放斗争。

在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农民们只是当他们的显然可以感觉得到的迫切的个人利益要求他们进行革命的时候，他们才起来革命：只是当他们过去在封建关系下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保证的时候，当这种封建关系还没有永远被消灭、外国军队还没有撤离他们的国土的时候，他们才起来革命。一旦达到了目的，他们就贪得无厌地、疯狂暴戾地回过头来反对他们所不了解的大城市的运动，特别是反对巴黎的运动。公安委员会的无数公告，国民公会的无数法令，首先是关于规定商品最高价格和处理投机分子的法令，别动队和流动断头台，都是用来对付这些顽固不化的农民的。然而，恐怖统治驱逐了外国军队，平息了内战，使

农民得到的好处比任何阶级都要大。

当拿破仑推翻了执政内阁的资产阶级统治，恢复了秩序，巩固了农民土地占有的新条件并在自己的 Code civil〔民法典〕中加以肯定，把外国军队越来越远地驱逐出法国国境的时候，农民就欣喜若狂地归附于他，成了他的主要支柱。要知道，法国农民的民族感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自从他们根据财产继承权占有了一块法国土地以来，La France〔法国〕对他们就有了重大的意义。他们只知道外国人是蹂躏他们的国土、使他们蒙受巨大损失的侵略军。这也就说明了法国农民为什么具有无限的民族感，说明了他们对《l' étranger》〔“外国人”〕为什么怀着无比的仇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 1814 和 1815 年热情地参加了战争。

1815 年，当波旁王朝复辟的时候，当被驱逐的贵族又要求获得他们在革命中失去的领地的的时候，农民看到这是对他们的全部革命成果的威胁。因此，他们对波旁王朝的统治刻骨仇恨，而当七月革命又一次保证他们占有土地，并把三色旗交还给他们的的时候，他们又欢天喜地了。

但是在七月革命以后，农民又不再关心国家的一般利益了。他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土地占有已经不再受到威胁了，那面使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们保持胜利达 25 年之久的旗帜又在他们村子的自治局屋顶上迎风飘扬了。

可是，象过去一样，农民在这一次也很少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资产者立即开始拚命榨取自己的农村同盟者。土地分割和分散的后果、农民的贫困化和农民土地抵押权的扩大，在复辟时期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1830 年以后，这些现象愈来愈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但是，大资本对农民的压迫，在农民看来不过是

他们和他们的债权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并没有看到而且也不可能看到，这种愈来愈带有普遍性、愈来愈成为常规的私人关系，已渐渐发展成为大资本家阶级和小土地占有者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这种情况和封建义务完全不同，封建义务的起源早已被遗忘了，封建义务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它已不再是对服役的报酬，它早就变成了一方面的重负。至于抵押借款，这就是农民——或者他的父亲——借到了一笔 5 法郎硬币的债，而借据和抵押账簿一有机会就使他想到他担负义务的原因。农民应该支付的利息，甚至他们对高利贷者的一切新的繁重的支付，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义务，这种义务以同样的方式损害着所有债务人的利益。压迫是在完全现代化的、合乎时代精神的形式下进行的，而农民则按照仅仅保证他们占有土地的那些法权原则受到榨取，遭到破产。他们自己的 Code civil（民法典），他们现代的圣经，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鞭子。在抵押高利贷中，农民不可能看出阶级关系，他们不可能要求消灭这种关系，因为这样就会破坏他们自己的土地占有的基础，高利贷的压迫不是使他们卷入运动，而是把他们完全弄糊涂了。他们认为只有减少捐税才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今年 2 月里第一次发生了无产阶级提出独立要求的革命，农民对这一点简直莫名其妙。如果说共和国对他们还有某种意义，那末，这不过是减少捐税，有时也可能是某种程度的民族荣誉感，是进行侵略战争以及把国界推到莱茵河边去。但是在推翻路易·菲力浦的第二天，巴黎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工商业的停滞状态影响到了农村，在丰年本来就不值钱的农产品更加跌价，并且卖不出去，尤其是六月战斗使法国的穷乡僻壤都感到心惊胆战和惶恐不安，在这个时候，农民普遍地发出了狂暴的呼

声，扬言要反对革命的巴黎，反对贪得无厌的巴黎人。事情也只能是这样！顽固不化、目光短浅的农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社会共和国，对于劳动组织，对于那些在村庄的小范围内永远不可能使自己的基本条件和原因表现出来的事物，能够懂得什么呢！当他们偶而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的肮脏消息中模糊地知道了巴黎所发生的事件，当资产者向他们大声疾呼，要他们起来反对巴黎工人，说什么 *ce sont les partageux*（这些人想瓜分全部财产和全部土地）的时候，他们的怒吼就更加狂暴了，他们的愤怒简直无法遏止了。我曾经和法国各地的成百个农民谈过话，他们对巴黎，特别是对巴黎工人都切齿痛恨。“但愿这个万恶的巴黎明天就全部毁灭！”——这一是最温和的愿望。当然，农民本来就看不起城里人，由于今年的事件，这种蔑视的心理就更加厉害了，而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农民和农村必须拯救法国；农村生产一切，城市吃的是我们的面包，穿的是我们的亚麻和我们的羊毛织成的衣服，我们必须恢复应有的秩序，我们农民必须把事情承当起来，——这就是经常从农民的模糊的语言中多少明确地、多少有意识地发出来的叠句。

可是他们想怎样拯救法国，想用什么办法把事情承当起来呢？办法就是选举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的承担者是一个渺小的、爱虚荣的、糊涂的傻瓜）做共和国的总统！所有同我谈过话的农民对路易·拿破仑的热情，竟和他们对巴黎的仇恨一样强烈。这两种狂热，以及对整个欧洲的动荡局面感到毫无意识和毫无理性的困惑，这就是法国农民的全部政治。可是要知道，法国农民拥有 600 多万张选票，占法国全部选票的 $\frac{2}{3}$ 以上。

诚然，临时政府不善于把农民的利益同革命联系起来；它主要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把土地税增高了 45 生丁，因而就犯了不可原谅的和无法补救的错误。但是，即使它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过了几个月，到了夏天，他们也还是要脱离革命的。现在农民对 1848 年革命所抱的态度，并不是由于某种错误或偶然的失策——采取这种态度是很自然的，它的根源是小土地所有者的生活条件和他们的社会地位。法国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要求以前，首先必须平息普遍的农民战争——即使取消了一切抵押借款，也只能使这种战争的爆发延缓一个短短的时期。

只是因为在这两星期中几乎同清一色的农民，同各个地方的农民打交道；只是因为有机会在各外碰到了同样的情形：感觉迟钝，目光短浅，对城市、工业和商业的种种关系毫不了解，对政治盲目无知，对本村以外的一切东西妄下判断，用农民关系的尺度去衡量复杂的历史关系，——总之，只是因为恰好在 1848 年认识了法国农民，我才感觉到这种根深蒂固的迟钝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令人抑郁不安。

二 勃 艮 第

布里阿尔是一个古老的小城市，位于沟通塞纳河和罗亚尔河的一条运河的河口。在这里我打听了前面的路程，发现到瑞士去经过奥克萨里比经过涅维尔要方便。于是我就离开了罗亚尔河，翻山到勃艮第去。

罗亚尔河河谷的一片富饶景象逐渐地但是相当缓慢地消失了。地势的上升是不知不觉的，只是在离开布里阿尔五六英里路远的地方，在圣索维尔和圣法尔若附近，才出现一片满是森林的利于经营畜牧业的山地。绵亘于云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的山脉，在这里已经很高了，一般说来，在云纳河省的整个西部，出是相当多的。

离土锡不远，在离开奥克萨里 6 法里路的地方，我第一次听见了特殊的、纯朴而拉长音调的勃艮第方言——这种方言在这里和在勃艮第本地还算是相当亲切悦耳的，但是在弗兰契康帖的高地上，发音就变得难懂，笨拙，几乎带有教训的口吻。这好象纯朴的奥地利方言渐渐变成了粗野的巴伐利亚南部方言一样。勃艮第方言特别不象一般的法语，它的重音总是放在标准法语主要重音之前的那个音节上；它把短长格的法语变成了长短律的法语，因而也就大大改变了有教养的法国人在说话时善于表现出来的那种优美的抑扬顿挫的音调。可是，我再说一遍，在勃艮第本地，发音还是相当

亲切的,而美丽的姑娘讲起话来甚至是迷人的 *Mais, mà foi, monsieur, je vous demande ûn peu* [呀,先生,你,怎么能.....]

如果允许加以比较的话,一般说来,勃艮第人就是法国的奥地利人。纯朴,忠厚,非常轻信,在习惯的生活圈子里具有天生的聪明,对这一圈子以外的一切充满了天真可笑的想法,在不习惯的情况下显得笨拙可笑,而心情始终是无与伦比的愉快,——这几乎是所有这些善良的人的特点。和蔼可亲、忠厚善良的勃艮第农民在政治上一无所知,对路易·拿破仑非常崇拜,比起其他地方的农民来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勃艮第人身上的德国血液成分无疑要比离德国西部较远的法国人更多。他们的头发和脸色比较明亮,身材有点高大,特别是妇女;明察秋毫的智慧和敏锐准确的思想已经大大地减色,可是他们却具有更加天真的幽默,有时也有一点多愁善感。但是,法国人的愉快情绪在极大程度上还占优势,而在无忧无虑的轻佻方面,勃艮第人是不落人后的。

在云纳河省西部的多山地带,主要经营畜牧业。但法国人是不善于经营畜牧业的,勃艮第的牛羊是很瘦小的。除了畜牧业以外,还花很多时间来经营农业,到处都吃很好的小麦面包。

这一带地方的农舍也更象德国的农舍;屋子比较宽敞,住宅、谷仓和畜栏都在一座房子里;不过这一带地方的门通常也都开在道路侧面,或者是背向道路开的。

在通向奥克萨里的长长的斜坡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勃艮第的葡萄园,大部分葡萄都还没有搞掉,1848年的葡萄是空前丰产的。在有些葡萄藤上,葡萄累累,几乎连叶子都看不到了。

奥克萨里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地面坎坷不平,从内部看起来

并不美丽，在云纳河畔有一条美丽的河岸街，还有几条初具规模的大街，在法国，每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有这样的大街。在平时，这个小城市大概是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云纳河省的省长大概很少拿出钱来举办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必须给当地知名人士举办的义务舞会和晚会。但是现在奥克萨里很热闹，这是一年一度的热闹。社会民主党在土鲁斯举行宴会时，整个房间都用红色装饰起来，人民代表唐茹瓦先生在国民议会上曾经对这一点大发雷霆；如果这位可敬的唐茹瓦先生同我一道到奥克萨里来，他一定会吓得害神经病。在这里，不是一个房间，而是整个城市都用红色装饰起来了。什么样的红色呵！非常鲜明的血红色染红了房子的墙壁和楼梯，染红了男人和女人的衬衣；深红色的巨流甚至充满了排水渠，并且染红了马路；一些满脸胡子、面目凶恶的人提着大桶在街上走过，桶里装着触目惊心的起红泡的混浊液体。看来，红色共和国在使用一切恐怖手段来进行统治，看来，断头台、蒸汽断头台在不停地进行活动，“辩论日报”描写得那样可怕的 *buveurs de sang*（杀人魔王）在这里明目张胆地举行残忍不堪的痛饮会。但是奥克萨里的红色共和国是完全无辜的——这是勃艮第的采集葡萄的红色共和国，在这里津津有味地吞食这个红色共和国的最名贵产品的杀人魔王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正直的共和党人先生们，那些巴黎的大资产者和小资产者。而可敬的唐茹瓦先生虽然满怀善意，在这方面却充满了红色的贪欲。

在这个红色共和国中，要有满口袋的钱该多好啊！1848年葡萄空前大丰收，连装葡萄酒的桶子都不够。此外，质量也非常好——比1846年的葡萄酒还要好，也许甚至比1834年的葡萄酒还要好！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来，按照低得出奇的价格购买

1847年的剩余葡萄酒——只花2个法郎就可以买到140公升一桶的好葡萄酒；载着空桶子的大市一辆接一辆地来到每一家大门口，但是桶子还是不够。我亲眼看到奥克萨里的一个葡萄酒商人把满满好几桶质量很好的1847年的陈葡萄酒倒在街上，以便腾出桶子来装新的葡萄酒，当然，这种新的葡萄酒会给他带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投机机会。有人对我说，这个葡萄酒商人在几星期内就这样倒掉了将近40大桶（futs）葡萄酒。

我在奥克萨里喝了几瓶陈的和新的葡萄酒，就渡过云纳河，向右岸的群山走去。公路是顺着河谷前进的，但是我却沿着一条比较短的旧路翻过山去。天上多云，天色阴暗，我自己也感到很累，因此就在附近的一个离奥克萨里几公里路的村子里过夜。

第二天一早，太阳刚出来，我就动身了。这一天的太阳特别美丽。道路通过一片葡萄园，越过一个相当高的山岭。我在上山时花了不少力气，但是山上的美丽如画的景色已经给了我报酬。在我的眼前是一片一直通往云纳河的岗峦起伏的斜坡，再下去是绿色的云纳河河谷，河谷里绿草如茵，白杨环绕，无数村落和农舍散布其间，在后面则是灰色石头的奥克萨里，它靠着对岸峭然壁立的山岩；到处是村落，到处都看到葡萄园，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而耀眼的灼热的阳光（它的光芒只是在远处才被秋天的柔和的薄雾所挡住）倾泻到这个大锅里去，在这里，8月的太阳在煮最名贵的葡萄酒。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法国的这种说不上特别美丽的风景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当然，并不是某一个细小的部分，而是全部景色的总和，才使它显得这样丰满，而这在其他地方是很少看到的。莱茵河畔和摩塞尔河畔的悬崖峭壁比法国美丽得多，瑞士的各种景色的对照比法国雄伟壮丽，意大利的风景的色彩比法

国鲜明，可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它的全部景色的总和都没有法国这样和谐。我怀着异常满意的心情，把目光从铺满了繁茂的绿草的广阔的河谷转向长满了同样繁茂的葡萄树的群山，转向淹没在果树丛中的无数村落和城市。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到一小块光秃秃的土地，看不到一个不惹人喜爱的不悦目的地方，看不到一块没有长着植物的粗糙的岩石。到处都是繁茂的植物，到处都是一片发出秋天的青铜色的美丽而鲜艳的绿色，这一切都沐着阳光，而10月中旬的阳光还很强烈，足以晒熟葡萄藤上的每一颗葡萄。

我向前走了一小段路，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片新的同样美丽的景色。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在一个比较窄的盆地，是圣勃里，这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也只靠酿造葡萄酒为生。在这里，风景的细微末节也象前面的地方一样，不过规模较小。下面，在河谷中，小城市的周围有牧场和花园，在四周，在盆地的斜坡上种着葡萄树，只有北边，才有翻耕过的或者收割后长满了绿色的紫苜蓿的田野和草地。下面，在圣勃里的街道上，也象在奥克萨里一样，行人熙熙攘攘，到处都摆着桶子和压榨机，居民们到处都在欢天喜地地忙着压榨葡萄，把葡萄汁吸到桶子里去，或者提着装满葡萄汁的大桶在街上走。这里也有市场，在比较宽阔的街道上停着农民的大车，车上装着蔬菜、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农民们戴着白色的尖帽，农妇们围着马德拉斯布做的头巾，说说笑笑，吵吵嚷嚷，在葡萄酒酿造者中间挤来济去；在小小的圣勃里居然也有这样热闹的局面，使人觉得好象置身在大城市中一样。

在圣勃里的那一边，道路又缓慢地通到山上去了。但是我特别高兴地登上了这个山。在这里，人们还在忙着采集葡萄，而在

勃艮第，采集葡萄甚至比在莱茵地区还要快乐得多。一路上我尽碰见一群群非常快乐的人们、非常甜的葡萄和非常美丽的姑娘；在这一带地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只要步行3小时左右就能到达，居民们由于做葡萄酒生意，经常同外界发生关系，因此，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文明，而在接受这种文明方面，任何人都没有妇女那么快，因为她们从这种文明中可以得到直接的和最明显的好处。任何一个法国的城市妇女都会这样唱：

如果我敢在美丽方面，
同乡下姑娘比较，
我就戴上一顶
缀有玫瑰色或天蓝色带子的草帽²⁸¹。

恰恰相反，她们很清楚地知道，她们的魅力的全部财富应该归功于城市，归功于摆脱了一切粗活，归功于文明和金钱，由于有钱，她们才能够保持清洁和衣着称身。她们知道，农村姑娘即使没有从自己的父母那里承受下来法国人不喜欢而德国人却引以自豪的宽大的骨胳，但是由于在日晒雨淋下进行累人的田间操作，由于不容易保持清洁，由于无钱修饰自己，由于穿着虽然受人尊敬但是极不称身、极不雅致的衣服，在多数场合下，竟变成了走起路来象鸭子、打扮得鲜艳夺目的、笨拙可笑的稻草人。人们的爱好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德国的同胞更喜欢农家姑娘，这也许是对的。我们尊敬健壮的女养畜人的那种龙骑兵式的步伐，特别是她们的拳头；我们给予围在她们结实的腰部的那些翠绿和火红的方格纹衣服以应有的评价；我们尊重那些从她们的颈子一直拖到脚跟的无可非议的平面，它使她们从后面看上去就象一块发着五颜六色的花布的木板！可是人们的爱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希

望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同样值得尊敬的那一部分德国同胞能够原谅我，因为面孔洗得很干净、头发梳得很光亮、身材长得很匀称的圣勃里和威尔曼顿的勃艮第女人给我的印象，要比我在塞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遇见的那些母水牛给我的印象更加舒适；这些母水牛生来肮脏，毛发蓬乱，身体发胖，当人们在她们面前卷纸烟时，她们就瞪着两眼，当人们用地道的法国话向她们问路时，她们就叫着跑开去。

因此，人们会相信我：我在上山时花了更多的时间躺在草地上吃葡萄，唱葡萄酒，同种葡萄的人和他们的姑娘们谈笑；而我登上这一座不很高的山所花的时间，可以用来登上布罗肯山山峰，甚至登上少妇山。况且，每天都能把葡萄吃得饱饱的，因而在每一个葡萄园里都能找到适当的借口同这些老是笑容满面、和蔼可亲的男女们交往。可是凡事都有尽头，这座山也不例外。当我顺着对面的斜坡走下去，进入引人入胜的克尤腊河——云纳河的小支流——河谷，一直向环境比圣勃里还更美丽的小城市威尔曼顿走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但是，过了威尔曼顿，自然界的美很快就消失了。较高的佛锡昂山脉渐渐地迎面而来，这是塞纳河、罗尼河和罗亚尔河诸流域的分水岭。从威尔曼顿上山，走了好几个钟头的路程，并且通过了一块长长的贫瘠的高地，高地上裸麦、燕麦和荞麦多少已代替了小麦。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0 月底——11 月

原文是德文

最初发表于“新时代”杂志 1898 年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第 1 卷第 1 期和第 2 期

手稿就此中断。——编者注

附 录

附 录

附 录

告全体德国工人书²⁸²

工人弟兄们！

如果我们不愿意再做最受欺骗的人，如果我们不愿意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再受一小撮人的剥削、蔑视和蹂躏，我们就不应该错过时机，我们绝不应该死气沉沉，无所作为。

如果我们还象过去那样是一盘散沙，尽管我们人数众多，我们也会软弱无力。相反地，如果我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我们就会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弟兄们，在城乡各地建立起工人联合会来，在联合会里给大家说明我们目前的处境，提出改变这种处境的办法，考虑和选举工人阶级出席德国议会的代表，并且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我们的利益。此外，德国所有的工人联合会应该尽快地建立联系并且保持这种联系。

我们建议暂定美因兹为所有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并且建议大家和本委员会通信，以便磋商共同的计划，尽快地在各联合会代表会议上最后确定中央委员会的驻地等。

我们期待着未付邮资的来信，我们也将寄这种信给各个组织。

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委员会代表

第一主席 瓦 劳

书 记 克路斯

1848年4月5日于美因兹

通信处：

美因兹 弗兰契斯卡内尔街 156¹/₂ 号

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书记外阿道夫·克路斯先生亲收

载于 1848 年 4 月 8 日“德意志人民报”第 8 号，1848 年 4 月 10 日“曼海姆晚报”第 100 号和 1848 年 4 月 13 日“湖滨小报”第 89 号附页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共产主义者同盟 科伦支部会议记录²⁸³

1848年5月11日会议

主席马克思问哥特沙克对同盟有什么意见和主张，现在打算对同盟采取什么态度。

哥特沙克回答，他坚持他的退出同盟的声明，因为目前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同盟的章程也必须加以修改；因为他认为现行的章程威胁着他个人的自由。同时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同盟需要，他都愿意在上述条件下给同盟以全力支持。

主席 亨·毕尔格尔斯

书记 约瑟·莫尔

第一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5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7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科伦 7 月 7 日。预审推事昨天传讯了“新莱茵报”负责发行人科尔夫和总编辑卡尔·马克思；他们两人被控侮辱和诬蔑逮捕安内克的宪兵和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先生。审讯从 4 点钟开始，大约在 6 点钟结束。接着，预审推事和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同被告一起前往报纸编辑部，在警察署长参与下进行搜查，他们想找到那篇引起指控的文章的手稿，查出它的作者。他们找到了一篇不知出自何人手笔的稿件，但它并不是引起指控的文章的副本。这篇稿件也被列入控告马克思及其同谋者的材料中。从上述这种做法来看，显然是打算把整个编辑部 en masse〔完全〕交付法庭审判，尽管负责发行人科尔夫（报纸是由他一个人签署的）也要负法律责任。

载于 1848 年 7 月 8 日
“新莱茵报”第 3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迫害

科伦 7 月 22 日。今天早晨，预审推事又把“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传去，讯问他关于评论安内克先生被捕的那篇引起指控的文章的事。这一次，报纸负责发行人科尔夫先生没有被传讯。

载于 1848 年 7 月 23 日
“新莱茵报”第 5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关于召开莱茵地区各民主团体 代表大会的通知²⁸⁴

科伦 8 月 4 日。根据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确定科伦是普鲁士莱茵省的中心 [Vorort]，并且委托该地民主团体召开区域代表大会，以便组织莱茵省的民主党派），本市各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²⁸⁵建议莱茵省所有民主团体派代表出席 8 月 13 日（星期日）在本市召开的代表大会。会场设在什托尔维尔卡餐厅楼上大厅。

科伦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

施奈德尔第二，马克思（代表民主协会）；

莫尔，沙佩尔（代表工人联合会）；

贝克尔，许岑多夫（代表工人业主联合会）

当反动派以到处召集“制宪”会议为幌子，在全国进行视察和集中力量的时候，民主主义者必须坚决反抗，这是无须详加解释的。民主主义者应该利用高呼“天佑吾王，天佑吾国”的团体及其地方组织所享有的自由权利。

载于 1848 年 8 月 5 日
“新莱茵报”第 6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迫害

科伦 8 月 4 日。我们和检察机关的纠纷现在还没有解决。上星期一，预审推事又把负责发行人科尔夫传去，昨天，又把我们的编辑德朗克和恩格斯两人传去做证人。德朗克临时缺席，只有恩格斯出庭，但是他没有宣誓受讯。因为有人怀疑不久前在本报编辑部没收的那篇稿件是他写的，所以可能还要对他提出控告。

从这一切看来，发行人作为负责人出庭是不能使检察机关感到满足的。他们想把总编辑牵连进去，想找到那篇引起指控的文章的作者，想迫使编辑（其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上述文章的作者）互相检举，可能的话，甚至自己供认。

载于 1848 年 8 月 5 日
“新莱茵报”第 6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1848年8月11日科伦民主协会全体会议记录摘要

根据临时主席马克思的指示宣读并批准了上次全体会议的记录之后，沃尔弗先生宣读了就瓜分波兰问题致德国国民议会的抗议书。会议热烈地拥护这一文件并且一致通过。

里廷豪森先生列举许多理由，证明马克思先生应该享有不久前普鲁士政府拒绝授予他的公民权。他认为，最好明天就派遣一个代表团，迫使区行政机关取消这项各方面都很可笑的非法措施。假如区行政机关不同意，就直接向内阁大臣抗议它的这种行为。会议宣读了并且通过了抗议书，同时决定：如果政府不撤销拒绝授予马克思公民权的命令，今天晚上就动手为该文件征集签名。

马克思先生更详细地论证了政府对他所采取的措施的非法性，会议一致报以掌声，认为这些论据是令人信服的。政府拒绝授予马克思公民权的真正原因是以前政府超笼络马克思的企图没有得逞。

恩格斯先生谈到了警察对沙佩尔所采取的新的难以容忍的措施，即用驱逐出境来威胁他。恩格斯说，警察的这种行动是非法

见本卷第 584—585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451—454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432—433 页。——编者注

的，同时特别强调指出，沙佩尔作为拿骚公民，无论如何应该算是德国人，因此，根据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决议，他在德国所有的38个邦里都可以居住。

里廷豪森、施奈德尔和毕尔格尔斯当选为代表团团员，他们应该就马克思和沙佩尔的问题与区督察员和警察厅长进行谈判，力争撤销有关的决定。

与会者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国民议会议员格拉德巴赫；他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不应当对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抱有任何希望。

恩格斯先生指出：正是格拉德巴赫经常引人注意，因为他具有自由思想和勇敢精神，特别是因为他坚决抗议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在斯潘道所受到的待遇。与会者向格拉德巴赫3次欢呼致敬……

载于1848年8月25日
“莱茵守卫者”第2卷第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莱茵守卫者”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科伦民主协会抗议波兹南 并入德意志联邦²⁸⁶

科伦 8 月 12 日。科伦“民主协办”向国民议会呈递了一份抗议书，内容如下：

崇高的国民议会！

鉴于：

1. 争取本身自由的德国并不打算压迫其他民族，恰恰相反，而是想帮助其他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
2. 波兰的解放对德国本身说来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3. 3 个暴君实际上不止一次地剥夺了波兰人的自由和民族独立；
4. 从 1792 年开始，反动派对波兰的历次侵略和数度瓜分都是为了侵犯全欧洲的自由，另一方面，每当各民族解放的时机一到，复兴波兰的坚决要求也就提出来了；
5. 甚至五十人委员会²⁸⁷也代表德国人民愤怒地拒绝参与任何侵犯波兰的罪行，同时明确地着重地指出：德国人民有帮助波兰恢复独立的义务；
6. 甚至普鲁士国王在三月革命之后，在社会兴论的压力下也庄严地许下了改组波兹南的诺言；
7.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诚然是由间接选举产生的）无视

这一切，在今年 7 月 27 日的会议上决定把波兹南大公国的³/₄的领土并入尚未成立的德意志国家，这样，它就同维也纳会议和德意志联邦议会一样，参与了重新瓜分波兰的勾当，侮辱了自由，因而玷污了自己；

8 .但是，有理智的一部分德国人民不想也不会为了讨好反动派，为了普鲁士的一小撮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而参与任何镇压波兰人民的行动；——

科伦民主协会在本日会议上决定：

坚决抗议今年 7 月 27 日德国国民议会通过的关于波兹南大公国的决定，从而在德国、波兰和全欧洲面前坚决抗议这种仅仅有利于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的反动派的任意吞并的行为。

根据民主协会的委托

委员会

载于 1848 年 8 月 13 日
“新莱茵报”第 7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

科伦 8 月 12 日。本报和检察机关之间的值得注意的关系现在仍然在继续发展。昨天，预审推事又把本报的一位编辑恩斯特·德朗克传去作证。宣誓没有进行，因为有人密告，说德朗克在安内克被捕后的那个晚上访问过被捕者的妻子，并且在她那儿打听过逮捕的情况。法庭方面对这位要被控告的证人解释说，“马克思及其同谋者”一语应理解为：只在某种情况下才对负责发行人科尔夫起诉，而同时却准备对那篇引起指控的文章的假定作者总编辑卡尔·马克思起诉。

可是，德朗克说，他没有说出真象的义务，因为他作为编辑，可能被怀疑曾参与该文的写作，而他并不打算自己供认。

载于 1848 年 8 月 13 日
“新莱茵报”第 7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关于 1848 年 8 月 28 日马克思在 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上的发言

(简要报道)

维也纳 8 月 29 日。在民主联合会昨天的会议上，讨论了联合会应不应该向皇上或国会提出撤换施瓦策大臣，或者更确切些说，撤换整个多布尔霍夫内阁的问题。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先生和马克思先生以来宾身份出席了会议，并参与了辩论，为各种不同的观点辩护。

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先生赞成联合会把这个问题提交皇上，但是马克思先生则断言：民主的原则已体现在国会中。柏林的所谓民主主义者中的“理论家们”在实践中力图与各邦君主“妥协”，这一点在这里谁也没有感到奇怪。

载于 1848 年 9 月 5 日
“新莱茵报”第 9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马克思的这一段发言，维也纳的民主报纸“激进报”是这样报道的：“马克思先生说，谁当部长都是一样，因为现在在这里也象在巴黎一样，问题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的发言非常俏皮、尖锐而有教益”。——编者注

关于 1848 年 8 月 30 日马克思 在第一届维也纳工人联合会 上的演说

(简要报道)

马克思博士谈到工人的问题，也谈到在国外的德国工人的问题。

巴黎的国家工厂和最近发生的工人革命。他说：德国工人能够以大批流放者是他们的同胞而感到骄傲。

英国的宪章派，他们最近的言论。英国与欧洲工人的彻底解放。比利时……

载于 1848 年 9 月 1 日
“宪法报”第 13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宪法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维也纳的民主刊物“人民之友”是这样报道马克思的演说的：“‘（新）莱茵报’编辑马克思博士向联合会会员致敬，并且说：他认为能够在维也工人联合会发表演说是他的光荣，就象他以前在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工人联合会发表演说一样”。——编者注

辟 谣

“布勒斯劳报”第 201 号刊登了一篇柏林通讯，里面谈到骑士施纳普汉斯基²⁸⁸收买了大量的“新莱茵报”股票，所以描写他的小品文就不再出现了，因为报纸是不会攻击自己的股东的。假民主的“杜塞尔多夫日报”认为转载这种诬蔑性的言论是自己的职责。在柏林，人们可以任意造谣，可是西里西亚的报纸应该知道这种言论是谎话以及为什么是谎话。这种背信弃义的诽谤可惜出现得太迟了，早在收到第 201 号“布勒斯劳报”之前就已出版的第 92 号“新莱茵报”已经登载了上述小品文的续文。此外，“新莱茵报”是党的机关报，它已经充分证明是收买不了的。

“新莱茵报”负责发行人

载于 1848 年 9 月 3 日
“新莱茵报”第 93 号附页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迫害

科伦 9 月 5 日。由于马克思及其同谋者的案件，预审推事昨天又传讯了本报编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可是这一次被传讯不是作为证人，而是作为被告人之一。预审已经结束，如果检察机关提不出新的罪状，高等审判厅就必须在最近期间做出决定：马克思、恩格斯和科尔夫是否应该因被控侮辱或诬蔑最高检查官茨魏费尔先生和 6 位宪兵先生而出席陪审法庭受审。

载于 1848 年 9 月 6 日
“新莱茵报”第 95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民众大会和安全委员会

科伦 9 月 14 日。我们再来谈谈昨天的民众大会和它的结果，因为它在本市已经引起很大的兴趣。

刚过中午 12 点钟，民众大会就在弗兰肯广场举行，威·沃尔弗先生宣布开会；他扼要地报告了开会的目的，然后提议选举亨·毕尔格尔斯先生为主席，大会一致通过；毕尔格尔斯登上议台，请沃尔弗先生继续发言。沃尔弗先生这次提议选举安全委员会作为科伦城在目前的合法政权机关中没有代表的那一部分居民的组织。这个提议得到了弗·恩格斯先生以及海·贝克尔先生和恩·德朗克先生的支持，并且在全场不下五六千人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通过，只有 5 票反对；虽然再三邀请，但是没有人表示异议。随即确定委员会的人数为 30 人，并且选出了这 30 个委员²⁸⁹。因为在当选人中有两个人——哥特沙克和安内克已被逮捕，所以补选了两个人来代替他们。

随后，弗·恩格斯先生提出了下列致柏林议会书的草案：

为协商制定普鲁士宪法而在柏林召开的议会。

我们科伦市市民鉴于：

为协商普鲁士宪法而召开的议会已责成内阁执行 8 月 9 日的决议，立即针对军官的反动意图发布命令，以便安定全国，并且

见本卷第 460—461 页。——编者注

避免内阁和议会的分裂；

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已因这一决议辞职，国王已授命刚刚解除帝国大臣职务的贝凯拉特先生组织新内阁；

贝凯拉特先生这个人无论如何不能保证执行议会的决定，相反地，由于他有某些反革命的观点，甚至可能解散议会；

人员选出来协商君民之间的宪法事宜的议会，不能因单方面的行动而解散，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王权不是和议会平行，而是凌驾于议会之上；

因此，解散议会就是政变；——

我们要求：

在有人企图解散议会的时候，议员们能够执行自己的职务，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要擅离职守。

大会一致通过了这封呼吁书，然后就闭幕了。

虽然市民联合会²⁹⁰的大批代表占据着广场上较高的地方，并且的确有许多知名的“抱怨派”竭尽全力用收买和引诱的办法来鼓动一些人闹事，虽然有相当多的便衣警察到场；可是大会开得非常机警，使一切捣乱的企图无法实现。

同时，市民自卫团的指挥官先生们也在市自治局里开会讨论对策，因为有些人确信骚乱是不可避免的。正当会议争论得很激烈的时候，大门打开了，市民联合会的首脑们冲进大厅，他们说，成立安全委员会就是革命的第一步，科伦在危急中，红色共和国眼看就要宣告成立，假如市民自卫团靠本身的力量不能维持秩序，市民联合会可以完全听从冯·维特根施坦先生的指挥！但是，冯·维特根施坦先生明智地拒绝了这一建议，而且拒绝号召市民自

卫团拿起武器。后来的事件证明了市民自卫团这一次的行动是多么正确。

市民联合会的先生们对此感到不满，还在民众大会进行的时候，他们就张贴出下面我们所引的“抗议书”。这种没有任何人签名的抗议书5分钟后就到处都不见了。傍晚，它又以传单形式出现，由“科伦日报”印刷所用黑体字印成，并且分送给该报的订户。这一次，“抗议书”还加了这样一段可笑的前言：

所谓的民主主义者竭力利用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最近的决议所引起的愤懑，来夺回他们接连失去的阵地，并且无论如何要制造冲突。所以，他们利用并且故意以闻所未闻的方式来渲染本月11日科伦军民冲突²⁹¹的危险性和重要性，是为了达到罪恶的目的。今天早晨甚至贴出布告，说要在12点钟召开露天的民众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用呐喊的方式选出一个安全委员会，而选入安全委员会的都是事先串通好列入早已拟就的名单的人。

毫无疑问，谁也不会承认这种避开现在的政府而依靠偶然集结的人群的呐喊选出来的机关，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只要敢于以这样的身分进行活动，就会立即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防止犯罪胜于事后惩罚，因为犯罪是会造成巨大牺牲的。

所以，我们认为有责任警告全体公民，使他们注意这种可怕的危险。为此，特发表抗议书和呼吁书如下：

抗 议 书

成立安全委员会是革命的第一步

我们号召一切渴望真正自由和秩序的人全力支持现在的政府，反对少数人的罪恶阴谋，抗议成立安全委员会。

我们特别号召市民自卫团的全体士兵忠于职守，全力保卫法制和秩序。捏造的来自军队的危险已经消除，而真正的危险却是由于安全委员会的成立而产生的。

科伦市民联合会理事会诸理事

1848年9月13日于科伦

安全委员会在昨天晚上组成，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份可笑的抗议书归档，这一定会使市民联合会的先生们安心了。委员会选举了主席、书记和3个执行委员会委员，然后，通过了致区督察员、市卫戍司令、市政局、市民自卫团指挥官的信；这封信通知他们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并且声明，委员会将尽量取得各机关的同意，采取一切合法手段来执行自己的任务——维持治安，同时保障人民的权利。委员会还决定张贴宣传画，把这些情况告诉科伦居民。明天，我们将公布这两个文件。

今天早晨，人心不安的情况已经稍有缓和。现在大家都感到昨天的忧虑是可笑的。昨天，人们忧虑委员会会变成临时政府，变成 *Comité du salut public*（公安委员会），变成建立红色共和国的阴谋，总而言之，不管怎样变，总不会变成这个委员会本来的面目：一个由人民公开、直接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它的任务是代表在合法的政权机关中没有代表的那部分居民的利益，它只进行合法的活动，除了道义上的影响之外，决不妄想摄取任何权力，而这种道义上的影响，是结社的权利、法律和选民的信任所允许的。

载于 1848 年 9 月 15 日
“新莱茵报”第 10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沃林根民众大会

科伦 9 月 18 日。昨天，在沃林根附近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民众大会。莱茵河上的五六只大平底船，每只都载着数百人从科伦顺流而下；船头红旗招展。约伊斯、杜塞尔多夫、克雷弗尔德、希特多夫、弗雷亨和莱茵多夫等地都有人数相当多的代表团参加。大会在莱茵河畔的草地上举行，与会的至少有 6—8 千人。

科伦的卡尔·沙佩尔当选为主席，科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当选为书记。根据主席的提议，大会以多数票对一票通过成立共和国，即成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

根据科伦的恩斯特·德朗克的提议，沃林根大会一致赞成上星期三弗兰肯广场民众大会所通过的致柏林议会书（信上要求柏林议会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能解散）。

根据科伦的约瑟夫·莫尔的提议，承认了在公开的科伦民众大会上选出的安全委员会，并且由一个与会者带头，向委员会 3 次欢呼致敬。

根据科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提议，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心书：

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

在此集会的德国公民兹声明如下：

如果普鲁士和德国由于普鲁士政府反对国民议会和中央政权的决议而发生冲突，我们准备为德国而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1848年9月17日于沃林根

根据希特多夫的舒尔泰的提议，作出了“科伦日报”不代表莱茵省利益的决定。

此外发言的还有：科伦的威·沃尔弗，杜塞尔多夫的斐·拉萨尔，约伊斯的埃塞尔，科伦的卫尔、瓦赫特尔、贝克尔和赖希黑尔姆，弗雷亨的瓦尔拉夫，沃林根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弥勒，莱茵多夫的列文，克雷弗尔德的伊曼特。在纽约的亨利·布里兹倍恩，民主社会主义的“纽约论坛报”的著名编辑作了简短的发言后，讨论宣告结束。

开会的时候，从可靠方面得到的消息说，“第二十七团在星期二又将开入科伦，该团的其他几个营也要集中，准备挑起军民之间的冲突，借此宣布该城戒严，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总而言之，准备把美因兹的那一套拿来对付我们”。

参加大会的科伦郊的居民答应，只要这个消息被证实，冲突一旦发生，他们就援助科伦人。的确，沃林根人是准备一有召唤就到科伦来的。

此军请通知前市民自卫团指挥官维特根施坦先生。

载于 1848 年 9 月 19 日
“新莱茵报”第 10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科伦民众大会关于 法兰见福起义的决议

请翻印！

宣 言

鉴于 16 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决议批准和丹麦实行可耻的休战是背叛德国人民和有辱德国武装力量荣誉的行为，参加 9 月 20 日科伦 民众大会的德国公民特作出如下的决定：

1 .法兰克福的所谓国民议会的议员，除了向人民声明准备退出该会的以外，都是人民的叛徒；

2 .法兰克福街垒战战士为祖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本宣言请广为散发，作为布告张贴，并公诸报端。

“新莱茵报”发行科代收援助起义者及其家属的捐款。

载于 1848 年 9 月 23 日

“新莱茵报”第 11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在同时散发的标题为“民众大会决议”的传单上，在“科伦”两字之后加上了“由安全委员会、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倡议召开的”等字。——编者注在传单上这一句是这样印的：“‘新莱茵报’发行科准备代收援助法兰克福街垒战战士及其家属的捐款，并把捐款转送西里西亚的代表施略费尔分发。其他的民主报纸显然也不拒绝这样做”。——编者注

“新莱茵报”负责发行人关于 报纸停刊的通知

我们尊敬的订户！

由于科伦宣布戒严，笔杆不得不服从枪杆，

“新莱茵报”

被禁止发行了，本报目前已无法对尊敬的订户履行自己的义务。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非常状态只会延续几天。这几天过后，在 10 月份，本报由于资金大量增加，将扩大篇幅出版，并且因为我们最近准备采用新型的快速印刷机来印刷，本报会比以往更准时地分送给订户。

负责发行人

1848 年 9 月 28 日于科伦

以传单形式印行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呼吁订阅“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新莱茵报”在科伦戒严期间被武装的反动派极不负责地查封了几天。戒严状态自本日起解除。现在，本报又将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维护全体人民的民主利益。这正是目前特别需要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到，武装的反动派最近是多么蛮横无理地侵犯人民依法争得的自由。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维护民主的人，号召他们广泛订阅刚开始的第四季度的报纸，因为本来就遭受各方面迫害的民主报纸格外需要它的拥护者的积极支持。

科伦一季的订费为 1 塔勒 15 银格罗申；普鲁士其他各地为 1 塔勒 24 银格罗申 6 分尼；普鲁士以外的地方酌加邮费。

第四版各栏八号字一行（或者相应的篇幅）广告费为 1 银格罗申 6 分尼。

“新莱茵报”负责发行人 海·科尔夫

1848 年 10 月 3 日于科伦

以传单形式印行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通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命令

下开人犯，犯有刑法第 87、91 和 102 条所载之罪行，业已畏罪潜逃。兹根据科伦市检察官缉拿该等之命令，即请各有关机关和官员，采取措施，进行查访。一经拿获，请予逮捕，解交本人。

代理最高检察官

国家 检 察 官 黑 克 尔

1848 年 10 月 3 日于科伦

计开：I. 姓名：约翰·亨利希·盖尔哈特·毕尔格尔斯……

II 姓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阶层：商人；籍贯：巴门；宗教信仰：新教；年龄：27；身高：5 英尺 8 英寸；头发和眉毛：棕色；前额：正常；眼睛：灰色；鼻和嘴：匀称；牙齿：健全；胡须：栗色；下颚和脸：椭圆形；脸色：健康；身材：匀称。

载于 1848 年 10 月 4 日
“科伦日报”第 27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日报”
俄国文第一次发表

黑 名 单

科伦 10 月 13 日。一位消息极为灵通的朋友从布鲁塞尔来信说：

“恩格斯和德朗克之所以被捕，并且被押上囚车运出境外，只是因为他们不慎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一个据说曾参加营救瓦赫特尔的科伦工人施米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原来布鲁塞尔警察局掌握了一大批从科伦逃来的人的名单，所以比利时警察也完全知道施米茨准备参加营救瓦赫特尔的事情。”

这份黑名单是谁写的，是谁寄来的，难道代理警察厅长盖格尔先生不知道吗？……

载于 1848 年 10 月 14 日
“新莱茵报”第 11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马克思就当选科伦工人联合会 主席发表的演说

(摘自 1848 年 10 月 16 日科伦工人
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临时主席勒泽尔先生宣布，马克思博士接受联合会派去的代表团的请求，同意领导本会。因此，勒泽尔先生请马克思就任主席。

马克思博士说，他在科伦的处境是不稳定的。前任部长屈韦特尔对他的恢复公民权的请求所作的答复，就象是一道隐蔽的驱逐令。自然，他要向国民议会抗议这一决定。另一方面，他因被诬告破坏出版法，必然要出席陪审法庭受审。此外，由于“新莱茵报”编辑委员会的工作迄今还被迫处于停顿状态，他的工作已过度繁重。但是，他愿意在哥特沙克医生获释之前暂时满足工人人们的愿望。政府和资产阶级应当相信：尽管他们百般迫害，总有人愿意听工人的吩咐。

接着，马克思博士详细地介绍了在国外的德国工人的革命活动，结束时强调指出了工人在不久前的维也纳革命中所起的杰出作用。因此，他提议向维也纳工人联合会致敬（提议被一致通过）……

关于会议的议程，主席提议第一小时讨论与联合会有关的问题

题（即联合会的内外事务），第二小时讨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且建议会议在 8 点半钟开始（提议被通过）……

载于 1848 年 10 月 22 日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第 4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1848年10月22日科伦工人联合会 全体会议记录摘要

主席马克思博士宣布开会，接着对间接选举制发表了一些意见。

勒泽尔先生说：我们接受邀请，派代表出席本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但是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工人联合会单独派代表呢，还是和民主协会联合派代表？在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第一个方案，即决定单独行动，可是这一决定要经过全体会议批准才能生效，而且还应该考虑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派代表所需要的费用问题。因此我提议：

派一个代表出席，他只代表我们联合会，其费用采取自愿捐助的办法来解决。

提议被通过了，并且规定捐款至少为1银格罗申……

大家推举博伊斯特先生为出席柏林代表大会的代表。

会议批准马克思博士为联合会主席，勒泽尔先生为副主席

……

载于1848年10月29日
“自由、博爱、劳动”第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自由、博爱、劳动”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马克思就维也纳事件发表的谈话

(摘自 1848 年 11 月 6 日科伦工人

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主席马克思博士扼要地报告了维也纳事件的经过，并且特别强调指出，只是由于维也纳资产阶级屡次叛变，文迪施格雷茨才得以夺取该城.....

载于 1848 年 11 月 12 日
“自由、博爱、劳动”第 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自由、博爱、劳动”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 释

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 1848 年 3 月 21 日至 29 日之间在巴黎写成的。这些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刚开始的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3 月 30 日左右“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印成了传单,4 月初发表在“柏林阅报室”、“曼海姆晚报”、“特利尔日报”和“德意志总汇报”等民主报纸上。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作为指示性的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竭力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这个纲领性的文件。1848 年 9 月 10 日以前,“要求”在科伦印成了传单并分发给莱茵省一些地方的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会员。除了一些词句上的更动外,传单的原文第 10 条的条文也与 1848 年 4 月所发表的原文略有不同(见本卷第 4 页)。1848 年 10 月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博伊斯特以社会问题处理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一个纲领,这个纲领中的措施几乎完全摘自“要求”。1848 年 11 月和 12 月在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各次会议上曾讨论过“要求”中的个别条文(特别是第 1 条和第 4 条)。

1848 年底或 1849 年初“要求”在莱比锡由魏勒印成小册子,原文有所删节:文件开头的口号、第 9 条的第 2 段、第 10 条的最后一句话都被删掉了,另外,在签名中少了“委员会”这几个字。——第 3 页。

- 2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埃蒂耶纳·卡贝的信和反对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声明是根据芒特辽(法国塞纳河省)历史博物馆送给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原稿的照相副本发表的。根据声明和信都出自恩格斯的手笔这一点来判断,这两个文件是在 1848 年 3 月底,即在恩格斯到达巴黎以后写的。在这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

会的其他委员正进行反对德意志民主协会的斗争,因为该协会的领导人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企图利用在法国组织的军团把共和政体输入德国。“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前任编辑伯恩施太德由于这种计谋于3月16日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的倡议,1848年3月初在巴黎建立了德国工人俱乐部,它的章程是由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俱乐部来竭力团结巴黎的德国流亡工人,阐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并且同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的冒险计划相反,组织德国工人个别地回国去参加那里的革命斗争。——第6页。

- 3 马克思的这封信曾发表在1848年6月29日的“黎明报”上,信前面的编者按语中这样说:“我们发表下面这封科伦来信是为了表明高尚的德国人对意大利人的感情,他们热望受欧洲专制君主们挑拨离间而相互撕杀的意大利人民和德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由李·阿利纳里署名的“黎明报”编辑部的回信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有引证(见本卷第179页)。

“黎明报”(《L'Alba》)是意大利的一家民主报纸,1847年至1849年在佛罗伦萨出版,主编是拉法林。——第8页。

- 4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外回到德国之后,马上就着手实现他们的计划,即出版一种革命的机关报,他们认为这种机关报是教育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工具。他们选定了科伦作为办报的地址,因为这是莱茵省的主要城市,也是德国政治上和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莱茵省有出色的无产阶级干部,而且拿破仑法典在那里还有效力,这个法典比可怜的普鲁士法提供了较多的出版自由。为了强调继承革命传统,强调这一报纸与1842至1843年由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把新的机关报称为“新莱茵报”。他们在创办这个机关报的时候必须克服某些共产党人和民主党人(毕尔格尔斯和赫斯等人)的反对,这些人打算以类似的名称出版

一种狭隘的地方性的科伦报纸。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与此相反,他们着手创办一种大型的政治性报纸,这种报纸不仅会影响莱茵省,而且会影响全德国。在1848年4月到5月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展开了巨大的工作:为报纸征股,挑选通讯员,同其他国家的民主报纸建立经常的联系。被派到德国各个城市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在为报纸征股的同时也采取措施来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从同盟的委员们,如威·沃尔弗、德朗克、沙佩尔、波尔恩等人的信中可以知道,在地方上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的尝试当时没有成功,原因是当时德国工人缺乏组织性和政治上落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估计到这种情况,就以民主派的左翼即实际上是民主派的无产阶级一翼的身分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这样也就确定了“新莱茵报”的方针,报纸在出版时加上了“民主派机关报”这个付标题。

民主派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为了把德国和欧洲革命中的一切最重要的事件迅速地报道给自己的读者,编辑部常常在一天中出两次报;当材料多到四版也登载不下的时候就出附页,收到了新的重要消息便以传单的形式出号外。决定报纸对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的。这些社论都标有“科伦”和“科伦”作为记号。由于马克思担任总的领导和组织工作(特别是在报纸创办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当时大部分社论都是恩格斯写的。以一个小星为记号的编辑部的文章有时也登载在报纸的其他栏中(如意大利、法国、英国、匈牙利等国家的报道栏)。编辑除了修改通讯稿和帮助总编辑做组织工作之外,每个人都专门负责研究其一方面的问题。恩格斯写有关柏林国民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辩论的评论,也写有关捷克、波兹南、意大利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的文章,有关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文章,而在1848年11月至1849年1月间则写了一系列有关瑞士的文章。威廉·沃尔弗写关于德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关于农民状况和农民运动特别是关于西里西亚的农民状况和农民运动的文章,并且还领导了“国内新闻”栏的工作。格奥尔格·维尔特写诗体和散文体的小品文。恩斯特·德朗克一度当过“新莱茵报”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通讯员,他写了一些关于波兰的文章,1849年3月

至5月写了一些关于意大利的评论。斐迪南·沃尔弗有很长一个时间担任报纸驻巴黎的通讯员。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也参加报纸的工作,但是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只写了一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还是经马克思彻底修改过的。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在1848年10月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在报上发表了她的革命诗歌。

“新莱茵报”是集股创办的。可是,当登载有弗·恩格斯写的“法兰克福议会”(见本卷第14—18页)一文的第1号报纸问世以后,相当大一部分资产阶级股东就不再支持报纸了。而“新莱茵报”捍卫巴黎的六月起义者这一行动使得剩下的大部分股东也离开报纸。

“新莱茵报”的坚决而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报纸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当局以不承认马克思的普鲁士公民权来刁难他,不让他莱茵省居住,并且还对报纸的编辑,首先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连串的诉讼。在科伦九月事件之后,军事当局于1848年9月26日宣布科伦戒严,并且封闭了许多民主报纸,其中也有“新莱茵报”。恩格斯、德朗克和斐迪南·沃尔弗有被捕的危险,因此他们不得不暂时离开科伦,威廉·沃尔弗到普法尔茨去躲避了一个时候,后来又莱茵省藏了几个月,躲避警察局的通缉。戒严解除后,报纸从10月12日起又开始出版,这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他以忘我的努力克服了一系列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困难,把自己的全部现款都用来办报。在1849年1月以前,由于恩格斯被迫离开德国,编辑部的重担(包括写社论)主要都落在马克思一人的肩上。

在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警察局对“新莱茵报”编辑们的控诉和迫害更变本加厉了。1849年2月政府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尔夫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提出了控诉,结果是陪审法庭宣告被告人无罪。

尽管警察局百般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造成了报纸

停刊的原因。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新莱茵报,报纸的编辑在致工人们的告别书中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13页。

- 5 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5月19日会议上,拉沃建议同时被选入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的普鲁士议员有权享受双重资格。本文中所提到的(见本卷第17页)普鲁士内政大臣奥尔斯瓦特在1848年5月22日发表的声明中也作了同样的说明。

在本文中以及在以后论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辩论的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了速记记录,这些速记记录以后以单行本出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德国制宪国民议会的会议速记记录”1848—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Frankfurt am Main, 1848—1849)。——第15页。

- 6 顺民的制服是普鲁士内政大臣冯·罗霍夫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在德国是家喻户晓的。——第16页。
- 7 预备国会是指1848年3月31日至4月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各邦社会人士会议。预备国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宪派。预备国会作出了召开全德国国民议会的决定,并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的草案,这个草案只是一纸空文,它仅仅在口头上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但是没有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第16页。
- 8 代表德意志各邦政府的所谓“议会受托人”(hommes de confiance de la diète)会议是由德意志联邦中央机关——联邦议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集的。在联邦议会的主持下,“受托人”于1848年3月3日至5月8日举行了会议,按照君主立宪的精神制定了德意志帝国宪法草案。——第16页。
- 9 1815年5月22日普鲁士国王颁布诏书,答应成立“人民代议机关”,即

- 在普鲁士建立省等级会议,成立全普鲁士的代议机构和实施宪法。但结果只是根据 1823 年 6 月 5 日的法律,成立了具有有限的谘议职能的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第 19 页。
- 10 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 21 页。
- 11 圣仰派(由 *santa fede* “神圣的信仰”一语而来)指 19 世纪初教皇政权为镇压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而建立的恐怖队的成员。——第 22 页。
- 12 1792 年 8 月 10 日是法国人民起义推翻君主政体的日子。
1830 年 7 月 29 日 法国波旁王朝被推翻。
1820 年 在那不勒斯爆发了革命,这次革命是由 19 世纪初在意大利建立的秘密组织的成员烧炭党人领导的。由于神圣同盟各国的干涉,革命被镇压下去了。——第 23 页。
- 13 威廉·特里和阿尔诺得·维凯里得是关于 13 世纪末 14 世纪初瑞士人民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争取解放的战争的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第 23 页。
- 14 指瑞士各州和欧洲各国订立的提供雇佣兵的条约。这种条约从 15 世纪中叶一直存在到 19 世纪中叶;在 18—19 世纪的许多资产阶级革命中,瑞士的雇佣兵曾充当保皇派反革命的工具。——第 23 页。
- 15 指托尔瓦德森作的描绘死狮子的雕象,这个雕象建立在琉森街上以纪念 1792 年 8 月 10 日在巴黎为保卫皇宫免受人民进攻而死亡的瑞士士兵。——第 23 页。
- 16 1848 年 2 月 24 日是法国路易·菲利浦王朝被推翻的日子。——第 23 页。
- 17 这篇文章最初是由毕尔格尔斯写的。据马克思后来说,他在校阅这篇文章时删去了一半,另一半由他重新改写过。——第 25 页。
- 18 斯特恩“特利斯屈兰·善弟先生的生平和见解”第 1 卷第 11 章。——第 28 页。

- 19 指 1848 年 5 月 22 日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会的任务是“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1848 年 4 月 8 日颁布的选举法根据受间接(两级)选举法限制的普选法确定了议会选举条例。大多数议员都是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官僚的代表。
- 在写这篇文章以及后面那些关于普鲁士国民议会辩论的文章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了后来用单行本出版的速记记录:“普鲁士制宪议会的会议记录”1848 年柏林版(《Verhandlungen der constituirenden Versammlung für Preußen》Berlin,1848)。——第 28 页。
- 20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以及其他文章中讽刺康普豪森,称他为考察历史的朋友,暗指当时有名的卡·罗泰克的著作“从历史认识的萌芽时期到现在的通史;供考察历史的朋友参考”1813—1818 年夫赖堡和君士坦士版(K. Rotteck 《Allgemeine Geschichte vom Anfang der historischen Kenntniss bis auf unsere Zeiten;für denkende Geschichtsfreunde》Freiburg und Konstanz,1813—1818)一书中的小标题。——第 28 页。
- 21 “国家报”(《Staats-Zeitung》)是普鲁士国家总汇报(Allgemeine Preussische Staats-Zeitung)的简称。该报于 1819 年在柏林创刊。从 1819 年到 1848 年 4 月是普鲁士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从 1848 年 5 月到 1851 年 7 月以“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的名称作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出版。——第 28 页。
- 22 第二届联合议会是在康普豪森内阁时期于 1848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这是由普鲁士各省议会的代表组成的等级机关。这届议会通过了普鲁士国民议会选举条例,并同意政府发行遭到 1847 年联合议会拒绝的公债。在这以后,议会于 1848 年 4 月 10 日被解散。——第 30 页。
- 23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十七章。——第 30 页。
- 24 根据传说,公元前 390 年,当高卢人进犯罗马时,卡皮托里(罗马城中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丘,城市的捍卫者驻扎在这里)由于尤诺纳教堂里的鹅的叫声惊醒了卫兵而得救。——第 31 页。

- 25 根据希腊神话,斯巴达女皇勒达和宙司的女儿是由天鹅蛋孵出来的。
卡斯托尔是勒达的儿子,古希腊的英雄;双子宫星座中一个星的名字也叫卡斯托尔。——第 31 页。
- 26 指议会总管——普鲁士省议会的议长。——第 32 页。
- 27 德意志联邦是 1815 年 6 月 8 日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由于没有中央政府,保存有 36 个封建专制制度的德意志邦,从而巩固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的发展。——第 38 页。
- 28 格罗斯-培伦和登内维次是普鲁士的居民点,在柏林附近;联盟军队(包括普鲁士部队在内)在格罗斯-培伦(1813 年 8 月 23 日)和登内维次(1813 年 9 月 6 日)的战役中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第 38 页。
- 29 引自哥·奥·毕尔格尔的叙事诗“列诺尔”。——第 41 页。
- 30 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除了勃鲁姆、福格特等人的左翼而外,还有卢格、施略费尔、齐茨、特留茨什列尔等人的极左翼,或称激进民主党。——第 44 页。
- 31 联邦议会是根据 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国许多邦的代表所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没有实际的权力,它只是各邦政府反动政策的一种工具。1848 年三月革命以后,反动势力企图加紧联邦议会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国民主联合的目的。——第 45 页。
- 32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十六章。——第 46 页。
- 33 马克思和恩格斯称 1848 年 5 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为“妥协辩论”(《Vereinbarungsdebatten》),普鲁士国民议会是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而召开的。柏林议会采取了这种作法,从而否认了人民主权的原则,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称柏林议会为“妥协议会”(《Vereinbarungs-versammlung》),而把拥护这种妥协作法的议员叫做“妥协派”(《Vereinbarer》)。——第 49 页。

- 34 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是 1772 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托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部门的经纪人的作用。1904 年正式改为普鲁士的国家银行。——第 51 页。
- 35 1848 年三月革命后,在波兹南爆发了波兰人反抗反动的普鲁士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不仅有领导起义的波兰小贵族,还有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普鲁士政府于 1848 年 3 月作了让步,允许成立委员会在波兹南进行改革,组织波兰军队,任命波兰人担任行政及其他职务,承认波兰语为波兹南的正式语言。为了欺骗波兰人放下武器,在雅罗斯拉韦茨协定中许下了类似的诺言(见注释 196)。1848 年 4 月 14 日国王敕令将波兹南公国分为两部分:东部归波兰,西部归“德国”,在西部不准进行“改组”。波兹南起义遭到血腥的镇压后,东西两部分的分界线愈来愈向东移动,最后几乎席卷了波兹南大公国的整个领土。给波兰人许下的“改组”的诺言也就没有兑现。——第 54 页。
- 36 “妥协论”(《Vereinbarungstheorie》)是以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为代表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用来为自己的叛卖行为辩护的论据,它主张普鲁士国民议会应当只限于“在合法的基础上”通过同国王协商的办法来确立立宪制度。——第 60 页。
- 37 在该号“新莱茵报”的内容提要中本文标题为“对波兰的重新瓜分”,而正文的标题则是“对波兰的第七次瓜分”。——第 62 页。
- 38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1848 年 6 月 9 日第 161 号。
“科伦日报”是一家德国日报,自 1802 年起即以此名出版;在 1848—1849 年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它经常激烈地反对“新莱茵报”。——第 64 页。
- 39 亚尼雅士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城的保卫者之一,是安契西士和女神阿芙罗狄蒂的儿子;在希腊人侵占和掠夺特洛伊城的时候,他逃了出来,经过了长时期的漂泊才在意大利登陆。诗人味吉尔的诗“亚尼雅士之歌”就是描绘亚尼雅士的漂泊经过的。——第 64 页。

- 40 改写自荷马的长诗“伊利亚特”。——第 64 页。
- 41 指宫廷反动权奸的首领之一、三月革命时期逃往英国的普鲁士亲王于 1848 年 6 月 4 日回到柏林一事而言。——第 65 页。
- 42 这是按照歌德的长诗“狐狸-莱涅克”开头几句话改写的。——第 66 页。
- 43 暗指讲柏林方言的人(这里是指柏林的拥护专制制度的反动派。——译者注)。——第 66 页。
- 44 合并取消派(出自 Repeal of Union——取消合并一语)是取消 1801 年英爱合并的拥护者。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 1798 年爱尔兰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它剥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的议会。从 19 世纪 20 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成为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中最为得人心的口号,在 1840 年成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第 66 页。
- 45 五十人委员会是预备国会于 1848 年选出的。其中大部分委员属于预备国会中主张君主立宪的多数派。五十人委员会否决了联邦议会关于建立由 3 人组成的执政内阁作为德意志联邦的临时中央政权机关的提案。在 1848 年 6 月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选出的委员会通过了类似的提案。经过讨论,议会于 1848 年 6 月 28 日通过了关于建立由帝国摄政王和帝国内阁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权机关的决议。——第 66 页。
- 46 “全民财产”是柏林的武装工人写在逃跑的普鲁士亲王的宫墙上的题词。——第 66 页。
- 47 指 1848 年 4 月在巴登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和古·司徒卢威领导的共和派武装起义被镇压一事;起义的主要地区是滨湖地区(Seekreis)和黑森林。——第 66 页。
- 48 “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日报,是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君主立宪派的机关报。1847 年创刊,1850 年停刊,1848 年 10 月前在海得尔堡出版(由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盖尔温努斯主编),后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第 67 页。

- 49 1848年6月9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否决了未来的和丹麦和约须经国民议会批准的提案,从而放弃了对解决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干涉,给了联邦议会以充分的行动自由。——第71页。
- 50 1848年6月3日柏林国民议会讨论了是否参加大学生组织的到三月革命阵亡战士墓去游行示威的提案,这个提案以多数票被否决。——第76页。
- 51 引自普鲁士国歌。——第79页。
- 52 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奥国皇帝斐迪南一世被迫在1848年5月16日和6月3日的宣言中宣布奥国国会为制宪议会。——第80页。
- 53 这篇文章把1848年6月14日在科伦举行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补选结果同5月10日举行的这个议会的普选作了比较。——第90页。
- 54 市民联合会(Bürgervereine)是三月革命后在普鲁士产生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组织,其任务是在君主立宪范围内维护“法制”和“秩序”,以及同“无政府状态”,就是说同革命的民主运动作斗争。——第90页。
- 55 科伦民主协会于1848年4月成立,它经常在什托尔维尔卡大厅举行会议。民主协会的成员除了小资产者外,还有工人和手工业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加入民主协会,目的是影响加入该协会的无产阶级分子并促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坚决行动。马克思积极参加协会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新莱茵报”其他编辑人员的努力下,在民主协会会议上通过了揭露普鲁士政府的卖国政策,谴责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的立场不坚定的决议。1849年4月,马克思及其拥护者采取实际行动着手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后,就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组织关系,并退出了民主协会。——第90页。
- 56 1848年6月14日,因普鲁士国民议会背弃三月革命(见本卷第72—89页)而愤怒的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攻占了军械库,以便武装人民捍卫革命的成果并把革命推向前进。但是柏林工人的发动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及时赶到的援军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一起迅速地击退了人民,

- 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第 92 页。
- 57 普鲁士国民议会在柏林劳动群众革命发动的影响下于 1848 年 6 月 15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写道,国民议会“不需要武装力量的保护,而把自己交给柏林人民来保护”。——第 92 页。
- 58 法国制宪议会在日益增长的农民运动的压力下于 1789 年 8 月 3 日夜间接郑重地宣布废除一些实际上已为起义的农民所取消的封建义务。随后颁布的法令只是无偿地废除了一些个人的义务。直到雅各宾专政时期,根据 1793 年 6 月 17 日颁布的法令,才完全无偿地废除了一切封建义务。——第 92 页。
- 59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柏林的街垒战所吓倒,于 1848 年 3 月 21 日发布了“告陛下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书”,答应成立等级代议机构,实施宪法,确立内阁责任制,规定公开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以及陪审制等。——第 92 页。
- 60 维舍格勒位于布拉格南部弗尔塔瓦河右岸,那里有一个同名的古堡。
格拉德申(捷克人称格拉德查尼)位于布拉格城西北部,是全城最高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古代宫殿。——第 94 页。
- 61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 1848 年 6 月 2 日在布拉格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人民的民族运动中的两种倾向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帕拉茨基、沙发里克)企图以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利契、里别尔特等)坚决反对这一点,他们竭力主张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运动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加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主义派代表于 6 月 16 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休会。——第 94 页。
- 62 Code civil——拿破仑民法典,这个法典曾在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在莱茵省归并普鲁士后,这个法典在该省境内继续有效。——第 108 页。
- 63 根据普鲁士将军普富尔的命令,给被俘的 1848 年波兹南起义的参加者

- 剃光头发,并用硝酸银在他们的手上和耳朵上打烙印。从此以后,硝酸银(von Höllenstein)就成了普富尔将军的绰号。——第 110 页。
- 64 引自斐·赖蒙德的“来自小仙人世界的姑娘,或一个农民-百万富翁”一剧。——第 112 页。
- 65 1848 年 3 月 30 日是康普豪森内阁开始活动的日子。——第 112 页。
- 66 米兰临时政府是在伦巴第人民反对奥地利统治意大利的起义获得胜利后于 1848 年 3 月 22 日成立的;奥地利军队被驱逐出米兰,以哈·卡萨齐为首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了政府。——第 114 页。
- 67 潘都尔兵——奥地利军队中的一种部队编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非正规步兵。——第 114 页。
- 68 引自海涅的“奥拉夫骑士”一诗。——第 117 页。
- 69 “新柏林报”(《Neue Berliner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报,1848 年 6 月至 10 月在柏林出版。——第 118 页。
- 70 纽盖依特是伦敦的监狱。——第 119 页。
- 71 人们用“德意志报”编辑盖尔温努斯的名字来称呼该报(见注释 48)。——第 120 页。
- 72 这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7 年 4 月 11 日联合会议上发表御前演说时所说的话。在这个演说中,国王宣称:决不同意实施宪法,他把宪法叫做“写满字的纸片”。——第 120 页。
- 73 暗指康普豪森,因为他在青年时代曾做过油类和谷物生意;又暗指汉泽曼,因为他是从做羊毛生意开始他的商业活动的。——第 120 页。
- 74 关于“科伦日报”见注释 38。——第 121 页。
- 75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六场(“玛尔特的花园”)。——第 121 页。
- 76 建立农业银行的法案中规定建立抵押信贷机构,是为了在最有利于地主的条件下来赎买农民的义务。——第 124 页。
- 77 指 1844 年 6 月下半月布拉格纺织工人的自发起义。有毁坏工厂和破坏

机器等现象的工人运动，被奥地利的政府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第 126 页。

78 “柏林阅报室”(《Berliner Zeitungs-Halle》)是一家德国的日报。从 1846 年起由哈·尤利乌斯在柏林出版；在 1848—1849 年间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之一。——第 127 页。

79 这是 1848 年 5 月在维也纳成立的市民、国民自卫军和大学生委员会的简称，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维护安全和保护人民的权利。——第 127 页。

80 指在路易·勃朗主持下在卢森堡宫召开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它是临时政府在工人要求成立劳动部的压力下于 1848 年 2 月 28 日成立的。这个由工人和企业家的代表组成的所谓卢森堡委员会的实际活动无非是仲裁劳工和厂主的争执，它的仲裁常常有利于厂主，这是由路易·勃朗的妥协政策促成的。1848 年 5 月 18 日人民群众示威游行(巴黎工人在这次游行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后，政府于 1848 年 5 月 16 日取消了卢森堡委员会。

国家工厂是 1848 年二月革命结束后立即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指示建立起来的。建立国家工厂的目的是要使路易·勃朗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信用，另外是想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厂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因为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性的计划没有成功，而国家工厂的工人反而更加受到革命感情的熏陶，资产阶级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取消国家工厂(如减少工人人数，把他们派到外省去从事公共工程的工作等)。这种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原因之一。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 1848 年 7 月 3 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厂。

禁止集会法是法国制宪议会因慑于法国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而在 1848 年 6 月 7 日通过的；该法令禁止一切露天的集会和群众大会，违者处 10 年以下的徒刑。——第 131 页。

81 《Aimables faubourgs》(“可爱的郊区”)是路易·菲力浦对巴黎郊区的称呼。——第 132 页。

- 82 别动队是临时政府为了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在 1848 年 2 月 25 日建立的；这支队伍主要由流氓无产阶级组成，曾被用来镇压六月起义。——第 132 页。
- 83 指巴黎的皇宫，1643 年起路易十四在这里居住，1692 年起变为波旁王朝奥尔良系的财产。1848 年二月革命后，宣布为国家财产，改名为国民宫。——第 132 页。
- 84 指意大利林荫路上的图尔托尼咖啡店；在交易所停止营业的时候，证券买卖就在这家咖啡店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人们称这个咖啡店及其附近地区为“小交易所”，以区别于正式交易所。——第 133 页。
- 85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是英国的一种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 年由奥康瑙尔创刊，1852 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 1844 年 11 月起在伦敦出版。1845 年 9 月至 1848 年 3 月弗·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
- “北极星报”在 1848 年 6 月 24 日的简讯中写道：“宣布自己为‘民主派机关报’的‘新莱茵报’，在编排的技巧方面是少见的，并且以胆识过人著称；我们向它致敬，它是在反对各种暴政和非正义行为的坚决斗争中的敬爱的、有才干的和英勇的同志。”——第 136 页。
- 86 指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的莱比锡会战，参加这个战役的有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的军队。结果联军获胜，拿破仑的军队败北。——第 138 页。
- 87 所谓共和国近卫军是根据被 5 月 15 日巴黎工人的革命行动吓倒的法国政府的命令在 1848 年 5 月 16 日成立的部队。这支部队共有 2 600 人，由警察厅长指挥。共和国近卫军在反革命军官的指挥下，曾在巴黎执行警察的职务。——第 140 页。
- 88 人权和公民权协会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组织，由巴尔贝斯和尤伯尔等人领导，产生于七月王朝时期。协会联合了首都和各省的许多民主俱乐部，目的在于实现 1793 年雅各宾派的人权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协会不同于其他许多小资产阶级组织，它不放弃和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该协会的某些会员曾是六月起义的领导者。例如拟订六月起义计划的退伍

- 军官盖尔索济就是人权和公民权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第 141 页。
- 89 萨拉哥沙保卫者在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以英勇坚毅著称；该城曾遭法军两次围攻（1808 年 6—8 月和同年 12 月）；1809 年 2 月萨拉哥沙在牺牲了 4 万多人以后，才向优势的法军投降。——第 143 页。
- 90 巴黎市近卫军是 1830 年七月革命后成立的，直属于警察局长；曾被用来镇压人民的起义。1848 年二月革命后市近卫军被解散。——第 146 页。
- 91 指法国国民议会 1848 年 6 月 25 日的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发表在 6 月 29 日的“新莱茵报”上。——第 148 页。
- 92 鲁维叶岛与塞纳河右岸之间有一条小支流，1844 年该岛与陆地相联，在莫尔兰林荫路和亨利四世沿河街之间形成一块陆地。——第 150 页。
- 93 “国民报”（《National》）派联合了以阿尔芒·马拉斯特为首、以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同它有关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支柱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在 40 年代，这个派的信徒聚集在“国民报”（“Le National”）的周围，该报自 1830 年至 1851 年在巴黎出版。——第 153 页。
- 94 “改革报”（《Réforme》）派联合了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附和该派的有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这个派的拥护者聚集在“改革报”（《La Réforme》）的周围，该报自 1843 年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第 153 页。
- 95 指执行权委员会，即制宪议会为了代替已经卸下全权的临时政府而在 1848 年 5 月 10 日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 1848 年 6 月 24 日卡芬雅克专政确立时为止。——第 153 页。
- 96 王朝反对派是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议院中由奥迪隆·巴罗领导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们反映了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情绪，他们主张实施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种改革是防止革命和保持奥尔良王朝的手段。——第 154 页。

- 97 正统主义者是 1830 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第 154 页。
- 98 在 1848 年 5 月 15 日巴黎工人的革命发动失败后，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厂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俱乐部。——第 156 页。
- 99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是自由贸易维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 年创刊于曼彻斯特。——第 160 页。
- 100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1785 年创刊于伦敦。——第 160 页。
- 101 指“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它是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 年创刊；1810 年至 1882 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 163 页。
- 102 “辩论日报”（《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 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是政府的报纸，奥尔良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 年革命时期该报代表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第 163 页。
- 103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 年至 1870 年在巴黎出版；40 年代是奥尔奥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 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 年 12 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主义的报纸。——第 163 页。
- 104 引自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尼·贝克尔的“德国的莱茵”一诗；这首诗在 1840 年写成后被多次谱成歌曲，曾被民族主义者所广泛利用。——第 163 页。
- 105 “人民制宪报”（《Le Peuple constituant》）是法国共和派的日报，1848 年 2 月至 7 月在巴黎出版，主编是拉梅耐。——第 165 页。
- 106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和马克思的一篇文章（见本卷第 153—157 页）以同

- 一名称发表在“新莱茵报”上；本文的小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 167 页。
- 107 指 1832 年 6 月 5—6 日的起义，参加起义准备工作的有共和党左翼和一些秘密团体，其中包括“人民之友”社；反对路易-菲利浦政府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许多街垒，非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保卫战。——第 168 页。
- 108 指 1795 年葡月 12—13 日（公历 10 月 3—4 日）拿破仑镇压巴黎的保皇派起义。——第 172 页。
- 109 反对法国革命的奥普军队总指挥不伦瑞克公爵于 1792 年 7 月 25 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威胁法国人民，要把巴黎彻底毁灭。——第 177 页。
- 110 指 1785 年荷兰反对聚集在威廉·奥伦治总督周围的贵族天主教党的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是由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领导的，起义结果，总督被驱逐出国；但是 1787 年在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又恢复了他的权力。——第 177 页。
- 111 1832 年，根据英法俄 3 国的协议，未成年的巴伐利亚王子奥托被立为希腊国王。奥托在巴伐利亚军队的护送下到达希腊。称号是奥托一世。——第 177 页。
- 112 指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扮演主要角色的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在 1820 年 10 月在特劳波召开、1821 年 5 月在来巴赫闭幕的会议上公开宣布了参加神圣同盟的各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来巴赫会议通过了奥地利派兵干涉意大利的决议；维罗那会议（1822 年）通过了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的决议，其目的是镇压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第 177 页。
- 113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 19 世纪 20—30 年代支持了葡萄牙的以唐·米格尔为首的封建教权派，这个派反对对专制制度的任何限制。——第 177 页。
- 114 在西班牙，唐·卡洛斯为了篡夺王位，以利于反动的封建教权派，1833 年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第 177 页。

- 115 波兰人民为了民族解放曾准备在 1846 年 2 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行为和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起义的领袖，总起义没有成功。只是个别地方发出了革命的火花。只有在从 1815 年起由奥、俄、普共管的克拉柯夫，起义者在 2 月 22 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柯夫起义在 1846 年 3 月初被镇压下去了。在 1846 年 11 月，奥、普、俄签订了关于把克拉柯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 178 页。
- 116 指米兰临时政府在 1848 年 4 月 6 日向德国人民发表的宣言。见“临时政府出版的法令、通知、宣言和通报等汇编”米兰版第 1 卷第 172—175 页（《R accolta dei decreti, avvisi, proclami, bullettini ec . ec . emanati dal governo provvisorio》T . I , Milano , p .172—175）。——第 179 页。
- 117 引自科西迪耶尔 1848 年 6 月 27 日在国民议会上的演说。见“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228 页（《Compte rendu des séanc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Vol . II , Paris , 1849 , p .228）。——第 181 页。
- 118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十二章（参看艾思奇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54 年作家出版社版第 67—68 页。——译者注）。——第 184 页。
- 119 神圣的埃尔曼达德是 15 世纪末叶由西班牙国王建立的城市同盟；国王当时企图利用资产阶级来反对大封建主，维护专制制度。从 16 世纪中叶起，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的武装力量执行警察的职能。后来就引伸出来称警察为神圣的埃尔曼达德。——第 190 页。
- 120 指安内克 1848 年 6 月 25 日在居尔策尼希大厅科伦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会上讨论了由科伦三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的代表建立联合委员会的问题。——第 191 页。
- 121 Code pénal 是 1810 年法国通过的刑法典，沿用于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1815 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它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莱

- 茵省。普鲁士政府曾经力图在莱茵省推行普鲁士的法律，企图用一系列的法律、命令、指示来在莱茵省恢复贵族的封建特权（长子继承权），实行普鲁士的刑法、婚姻法等。这些措施遭到了莱茵省的坚决反对。三月革命后，根据 1848 年 4 月 15 日的命令取消了这些措施。——第 191 页。
- 122 安内克曾经作为 1848 年 3 月 3 日科伦群众发动的领导人之一同哥特沙克、维利希一起被捕。控告他们的罪名是“煽动暴乱，组织非法团体”。由于国王大赦，1848 年 3 月 21 日 3 人全部获释。——第 192 页。
- 123 克兹林宣言是 1848 年 5 月 23 日克兹林（在波美拉尼亚）城内的反革命容克地主和官僚告普鲁士居民的呼吁书，书中号召他们向柏林进军，以便镇压革命。——第 195 页。
- 124 指普富尔将军对被俘的波兰起义者所采取的一种侮辱性的措施——剃光头。——第 197 页。
- 125 1848 年夏天在柏林除了普通的警察以外，又建立了一支身穿便衣的武装部队，他们的任务是防止人民群众在街头集会和武装发动，并且进行间谍活动。这支警察队伍所以叫做便衣警察，是因为他们同英国的特别警察相似；后者在破坏 1848 年 4 月 10 日的宪章派示威游行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第 200 页。
- 126 “世纪报”（《Le Siècle》）是 1836 年至 1939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日报。在 19 世纪 40 年代中，该报反映了一部分只要求温和的宪政改良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第 204 页。
- 127 “新闻报”（《La Presse》）是从 1836 年起在巴黎出版的资产阶级日报；在 1848—1849 年，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又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的机关报。在 19 世纪 40 年代，艾·日拉丹曾任该报的编辑。——第 204 页。
- 128 “观察家”（《Observateur》）是比利时的一家日报“比利时观察家”（《L'Observateur Belge》）的简称，1835—1860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在 19 世纪 40 年代，它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关报。——第 204 页。

- 129 普鲁士国民议会 1848 年 7 月 4 日的会议继续讨论了波兹南事件调查委员会的问题；会议结束时，议会决定授予该委员会以全权代表的权力；在这个标志着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失败的决定通过之后，右派代表违反议会的议事规则，坚持表决限制委员会职权的提案。左派议员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右派则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了一个提案，不准委员会启程赴波兹南，也不准它传讯见证人和鉴定人。这样就非法地取消了议会最初通过的决定。关于议会讨论波兹南委员会问题的情况见本卷第 54—59、213—217 和 220—229 页。——第 204 页。
- 130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二十五章。——第 205 页。
- 131 海涅“汤豪塞”第二章。——第 206 页。
- 132 “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70 年到 1862 年在伦敦出版。——第 207 页。
- 133 指“北方蜜蜂”；该报是俄国的政治和文艺报纸，由布尔加林和格烈奇主编，1825 年到 1864 年在彼得堡出版；是沙皇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第 207 页。
- 134 执行普鲁士国王秘密使命的陆军少校维登布鲁赫于 1848 年 4 月 8 日递交丹麦政府的一份照会中表明，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作战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夺取丹麦的公国，而只是为了反对“德国的激进分子和共和分子”。普鲁士政府竭力回避正式承认这个损害它的名誉的文件。——第 207 页。
- 135 这里指的是刊载于 1848 年 7 月“新莱茵报”上的恩·德朗克的几篇连载文章：“普鲁士的镇压和波兹南的改组”（《Die preussische Pacificirung und Reorganisation Posens》）。——第 220 页。
- 136 引自海涅的诗“安心”（参看冯至译“海涅诗选”195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107 页。——译者注）。——第 226 页。
- 137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 1842 年 1 月 1 日至 1843 年 3 月 31 日在科伦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人士创

- 办的。该报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查封了。——第230页。
- 138 1842年10月20日“莱茵报”发表了一个由政府方面极为秘密地拟制出来的极端反动的离婚法草案。于是各报对该草案展开了广泛的公开的讨论。“莱茵报”发表离婚法草案和编辑部坚决拒绝说出该草案的投寄人是该报被查封的原因之一。——第230页。
- 139 康普茨是美因兹中央审讯委员会(见注释261)委员，是1819年审判所谓“蛊惑家”——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的最热心的组织者之一。
黑红黄三色曾是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标志。——第231页。
- 140 1848年7月9日在居尔策尼希大厅(科伦)召开的民众大会上，根据民主协会的建议，通过了一个告普鲁士国民议会书，该书中举出一系列的例子来揭露奥尔斯瓦特-汉泽曼政府的反革命行动，并且呼吁普鲁士议会宣布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失掉全国信任”。——第232页。
- 141 引自海涅的“鼓手长”一诗(参看钱春绮译“新诗集”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版第189页。——译者注)。——第246页。
- 142 指的是定期交易，进行这种交易时商品或有价证券并不易手，全部活动只是在交易所行情和商品价格之间的差价上进行投机。——第248页。
- 143 1848年6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建立由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约翰被推选担任此职)和帝国内阁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权。临时中央政权没有自己的预算和军队，没有任何实力，它只是德国各邦君主反革命政策的传声筒。——第258页。
- 144 引自海涅的“1829年”一诗。——第261页。
- 145 确立了共同关税线的德国各邦于1834年成立了关税同盟。这个同盟是由于必须建立全德市场而产生的，它逐渐地包括了除奥地利和某些小

- 邦以外的德国各邦。普鲁士在同盟中起着领导作用。——第 263 页。
- 146 引自海涅的“给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一诗。——第 267 页。
- 147 在德国绝大多数的邦中，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选举不是直接选举。1848 年 4 月 8 日的法律规定，普鲁士国民议会的选举也是两级制。——第 267 页。
- 148 忠实的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的捍卫者的典型形象。——第 275 页。
- 149 海涅“哈尔茨游记”。——第 281 页。
- 150 “祖国报”（《Fædrelandet》）是丹麦报纸，1834 年至 1839 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最初是周报，后来改成日报；1848 年该报是丹麦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第 286 页。
- 151 海峡税是指 1425 年至 1857 年丹麦向通过海峡的外国船只征收的通行税。——第 291 页。
- 152 1848 年 4 月 2 日以黑克尔和司徒卢威为首的共和派少数为了抗议自由派多数的政策退出了预备国会。慑于共和运动蓬勃展开的巴登政府通过了关于扩大军队人数的决议，请求毗邻的德国各邦给以军事援助，并根据自由派分子马提的告密逮捕了共和主义者菲克勒尔。巴登政府的这些措施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和古·司徒卢威所领导的 1848 年 4 月 12 日共和派起义的导火线。这次起义由于一开始就准备得不够和组织得不好，到 4 月底即被镇压下去。——第 295 页。
- 153 “协和报”（《La Concordi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1849 年间在都灵出版。——第 299 页。
- 154 工人代表大会于 1848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3 日在柏林举行，该会议是根据许多工人组织的倡议而召集的。会议的纲领是在斯蒂凡·波尔恩的影响下拟定的，它给工人们规定了争取实现许多狭隘的工会要求的任务，以使们脱离革命斗争。这个纲领曾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过，发表时没有注明是柏林的通讯。——第 299 页。

- 155 1848年7月21日“科伦日报”第203号。——第301页。
- 156 伊·品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I. Pinto. 《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édit》. Amsterdam, 1771)。——第308页。
- 157 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篇“不管这一切”中的叠句。——第309页。
- 158 调节制(Sliding-Scale)是英国谷物法存在期间实行过的一种规定谷物税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谷物税的高低同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标准成反比例。在关于调节制的法律中,有一项法律是1842年由皮尔内阁实行的。——第312页。
- 159 塞万提斯“示范小说”。关于狗的谈话的故事。——第312页。
- 160 引自海涅的诗集“还乡曲”(《Heimkehr》)。——第315页。
- 161 对于普鲁士政府提出的关于把波兹南大公国并入德意志联邦的建议,波兹南等级代表会议于1848年4月6日表示反对。——第318页。
- 162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14—17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德国各城市的民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89位代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一切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并为此成立区域委员会和它们的领导机关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设在柏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有弗吕贝尔、劳、克利盖,他们的助手是拜尔霍费尔、许帖和安内克。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软弱和动摇,德国民主运动即使在通过这个决议以后也仍然是涣散的和无组织的。——第323页。
- 163 德国的温和资产阶级分子和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联合成立了以柏林立宪俱乐部为中心的立宪主义者协会和俱乐部,并成立了市民联合会(见注释54)。普鲁士的各个社团(Preu ßenvereine)和凶恶的容克反革命机构(维护私有制和保障各阶级福利的联盟)宣布了浸透着普鲁士精神的反动纲领。在莱茵省许多城市中都有天主教的组织——庇护九世联盟(Piusvereine),它们宣布了带有社会蛊惑性的立宪纲领。——第324页。

- 164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八章(参看艾思奇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54年作家出版社版第48页。——译者注)。——第326页。
- 165 1834年通过的英国济贫法规定,只准用一种方式救济穷人——把穷人收容到被人民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的实行监狱苦役制的习艺所中。——第332页。
- 166 “1841年人民报”(《Le Populaire de 1841》)是宣传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机关报;1841年至1852年在巴黎出版;1849年以前由埃·卡贝主编。——第334页。
- 167 “同盟月刊。工人自己编辑和出版的通报”(《L'Union. Bulletin des ouvriers rédigé et publié par eux-mêmes》)是1843年12月至1846年9月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月刊,由从圣西门学派分化出来的一个工人团体出版。
“人民的蜂房”(《La Ruche populaire》)是同空想社会主义者有联系的工人月刊;1839年12月至1849年12月在巴黎出版。
“1845年博爱月刊。共产主义刊物”(《La Fraternité de 1845. Organe du communisme》)是巴贝夫派的一工人月刊;1845年1月至1848年2月在巴黎出版。——第334页。
- 168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它反对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谷物法。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着自己的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
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由于1846年通过了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而告结束。——第335页。
- 169 争取用立法手段把工作日限定为10小时的斗争,在英国早在18世纪末就已开始了;而从19世纪30年代初以来就席卷了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因为土地贵族的代表人物在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力图利

用这个受人欢迎的口号，所以他们在国会中维护 10 小时工作日法案。关于童工和女工的 10 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在 1847 年 6 月 8 日由国会通过的。——第 335 页。

- 170 引自海涅的诗“安心”。海涅在这首诗里抨击德国小市民的市侩作风和因循习惯，并拿古罗马的共和主义者来和他们相比照。——第 341 页。
- 171 *Ceterum censeo* 是老卡托通常在议会中结束他的每一次讲演时所惯用的一句话的开头几个字：*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可是，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第 341 页。
- 172 指“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该报是 1619—1866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德国报纸，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是中央政权——帝国摄政王和帝国内阁——的机关报。
- 涅谢尔罗迭给俄国驻德国各邦大使的通告载于 1848 年 7 月 28 日该报第 210 号。——第 342 页。
- 173 指 1813 年 3 月 13 (25) 日在卡里斯城发表的“告德国人书”。俄国沙皇和普鲁士国王号召德国人起来反对拿破仑，允诺给他们自由和独立以笼络民心。——第 343 页。
- 174 根据和尼古拉一世同时代的一些人证明，尼古拉一世在得到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向出席宫廷舞会的军官们叫道：“先生们，准备马吧！法国宣布共和啦！”——第 344 页。
- 175 暗指普鲁士亲王逃往英国——见注释 41。——第 345 页。
- 176 1772 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第 345 页。
- 177 见注释 134。——第 345 页。
- 178 指 1847 年 2 月 3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开联合议会的诏书，其中援引了普鲁士在 19 世纪 20—40 年代颁布的关于等级代议制的法令。国王把召开联合议会（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议会）说成是实现以前许下的立宪诺言。——第 346 页。
- 179 1848 年的春天和夏天，严重的经济困难（几乎各地都歉收）和天灾

- (发生了霍乱和毁灭性的火灾)使得俄国的阶级矛盾尖锐化起来。这一年的特征是农民运动高涨,彼得堡和里加霍乱“猖獗”,某些省(例如弗拉基米尔省)爆发人民起义。波兰王国当时是酝酿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第 348 页。
- 180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二场(“花园”)。——第 350 页。
- 181 这里指的是反动派(格拉拉赫弟兄、拉多维茨和其他等人)包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事。——第 354 页。
- 182 本文中蒲鲁东的演说是根据通讯报道引述的。蒲鲁东在 1848 年 7 月 31 日法国国民议会上的演说全文载于“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 年巴黎版第二卷第 770—782 页(《Compte rendu des séanc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Vol. II, Paris, 1849, p. 770—782)。——第 355 页。
- 183 蒲鲁东主编的“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Le Représentant du Peuple. Journal quotidien des travailleurs)于 1848 年 4—8 月在巴黎出版。——第 356 页。
- 184 马克思于 1847 年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对蒲鲁东的经济观点和哲学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4 卷第 71—198 页)。——第 358 页。
- 185 1807—1811 年施泰因大臣和哈登堡大臣在普鲁士实施了不彻底的土地改革。1807 年农民的人身农奴依附地位被取消了,但重压在农民身上的一切义务仍被保留下来。1811 年给了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权利,其条件是:向地主缴纳相当于平常每年所缴纳的租费的 25 倍的金额,或出让给地主一半土地。——第 361 页。
- 186 在德国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在西里西亚,人们把处于依附地位的农民称为 Dreschgärtner(打谷者),他们从地主那里得到一小块土地和一间茅屋,因而必须为地主劳动(主要是打谷),而得到的是微不足道的一点钱或实物。——第 364 页。
- 187 维斯佩尔(Wispel)是 1872 年以前德国的谷物计量单位;在普鲁士,1

- 维斯佩尔等于 1319 公升。——第 366 页。
- 188 “比利时通报。官方报纸”（《Le Moniteur belge . Journal officiel》）是以法国政府的机关报为榜样的比利时日报的名称，该报是官方的机关报，1831 年创办于布鲁塞尔。——第 367 页。
- 189 崇法狂者是比利时对一切都崇拜法国的人的绰号。——第 370 页。
- 190 指在比利时为庆祝 1830 年宣告独立的纪念日而举行的传统的盛典；在节日里举行狂欢游行。——第 370 页。
- 191 恩格斯所讲的普鲁士宪法，是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屡次提出的关于在普鲁士实行等级宪法的诺言，但是这个诺言并没有兑现。——第 372 页。
- 192 在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 1815 年 5 月 3 日在维也纳签订的条约中以及在 1815 年 6 月 9 日维也纳代表大会的最后决议案中，都包含有在波兰全境建立人民代议制和民族国家机构的诺言。在波兹南，问题归结为召开具有谘议职能的等级代表会议。——第 378 页。
- 193 见注释 115。——第 379 页。
- 194 指丹麦作家路·霍尔堡的喜剧“唐·腊努多·迭·科利勃腊多斯，或称贫穷和骄傲”中的人物，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妄自尊大的没落贵族的典型。——第 379 页。
- 195 这是波兰国歌的歌词。——第 381 页。
- 196 雅罗斯拉韦茨协定是 1848 年 4 月 11 日由波兹南委员会和普鲁士军事代表维利森将军签订的。该协定规定，解除波兰起义部队的武装和解散他们的部队。交换条件是：答应波兰人在波兹南实行“民族改组”，即建立波兰部队，委任波兰人担任行政和其他职务，在行政和诉讼事宜中使用本民族语言。但是普鲁士当局背信弃义地撕毁了这个协定；普鲁士军队利用和起义部队所达成的协议，残酷地镇压波兹南的民族解放运动。答应波兰人实行“改组”的诺言也就没有实现。——第 383 页。

- 197 “归并议会”是路易十四在 1679—1680 年建立的,其任务是从法律上和历史上论证法国对邻国某些领土要求的合理性,论证以后,随即由法国军队进占这些领土。——第 385 页。
- 198 恩格斯用讽刺的口吻这样称呼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引起的普鲁士和丹麦的战争。——第 386 页。
- 199 1791 年的波兰宪法反映了波兰小贵族中最进步的人士和城市资产阶级的意向。这个宪法废除了利别龙委多(联邦议会的决议案必须一致通过的原则)和国王的被选举权,规定政府向联邦议会负责,并给予城市资产阶级以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这些措施反对大贵族和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巩固了中央政权。1791 年的宪法由于承认地主和农民之间所签订的赎卖契约具有约束力,而使农奴制关系稍微缓和了。——第 390 页。
- 200 约·列列韦尔“波兰史”1844 年巴黎-利尔版第 1—2 卷(J. Lelewel. 《Histoire de Pologne》. T. 1—2, Paris—Lille, 1844)。
“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争论”。该书写道,有人想什么就讲什么,但也有人不能把所想的全部讲出来。1848 年莱比锡版。(《D ébat entre la r évolution et la contr évolution en Pologne》. Par quelqu ' un qui ne dit que ce qu ' il pense, mais qui ne peut pas dire tout ce qu ' il pense . Leipzig, 1848)。——第 395 页。
- 201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人数最多的一派,即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分裂成两个派别:中间派右翼(其中有达尔曼、亨利希、加格恩、巴塞尔曼、马提、梅维森、施梅林等人)和中间派左翼(其中有米特迈尔、威纳尔、拉沃等人)。中间派议员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第 395 页。
- 202 “弗洛特韦尔总督先生关于 1830 年 12 月至 1841 年年初治理波兹南大公国的备忘录”斯特拉斯堡版(《Denkschrift des Oberpräsidenten Herrn Flottwell, über die Verwaltung des Gros-Herzogthum Posen, vom Dezember 1830 bis zum Beginn des Jahres 1841》, Strasburg)。——第 398 页。
- 203 根据帝国陆军大臣波伊克尔 1848 年 7 月 16 日的命令,德国所有各邦

- 的部队应在 1848 年 8 月 6 日的阅兵典礼上向帝国摄政王约翰大宣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妄图由自己来掌握德意志联邦武装部队的最高统率权，所以禁止原定于 8 月 6 日在普鲁士举行的阅兵典礼。——第 401 页。
- 204 指 1845—1846 年威·约丹在莱比锡出版的月刊“可理解的世界。论述科学问题的杂志”(《Die begriffene Welt. Blätt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Unterhaltung》)。——第 403 页。
- 205 全德国民议会自 1848 年 5 月 18 日至 1849 年 5 月 30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第 403 页。
- 206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六场(“玛尔特的花园”)。——第 408 页。
- 207 恩格斯用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一诗中的一个主人公——善于吹牛的罗多芒特的名字来称呼利希诺夫斯基。——第 409 页。
- 208 议员布伦坦诺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1848 年 8 月 7 日的会议上主张对参加巴登共和起义的人们和起义的领袖黑克尔进行特赦。起初，议会的右派议员对布伦坦诺鸣鼓而攻，后来强迫他离开讲台。——第 414 页。
- 209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1848 年 8 月 2 日通过的“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第 6 条规定，废除等级特权和一切与所担负的职务无关的贵族称号。——第 415 页。
- 210 唐·卡洛斯 1833 年因觊觎西班牙王位而反对国王斐迪南的女儿伊萨伯拉，他援引了 1713 年关于禁止母系继承王位的法律。利希诺夫斯基在 1838—1840) 年参加了唐·卡洛斯发动的内战，获得了准将的军衔。——第 417 页。
- 211 引自阿伦特“德国人的祖国”一诗。——第 418 页。
- 212 阿尔比教派战争是 1209 年至 1229 年北方法兰西的封建主和教皇对南方法兰西的“异教徒”(又称阿尔比教派，因南法城市阿尔比而得名)进行的战争。阿尔比教派运动是市民和小骑士阶层反对天主教教会和封

- 建国家的一种特殊形式。战争在 1229 年以朗基多克并入法国国王的领地而结束。——第 420 页。
- 213 在卢格起草的“德国激进改良党的选举宣言”（1848 年 4 月）中提出，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是“修改事件的理性”。——第 426 页。
- 214 这里指的是关于瑞士联邦形成的一个传说。瑞士联邦是由 3 个山地州——什维兹、乌利和温特瓦尔顿在 1291 年缔结条约而建立的。据传说，3 个州的代表于 1307 年在留特利（又称格留特利）的草原上聚会，宣誓在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联合斗争中忠实于联邦。——第 426 页。
- 215 这是按照海涅的话改写的；海涅在 1843 年欢迎卢格时，说他是“善于把黑格尔的话译成波美拉尼亚文”的人。——第 427 页。
- 216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德国制宪国民议会的会议速记记录”1848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2 卷第 1186 页（《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Bd .II ,Frank-furt am Main ,1848 , S . 1186）。——第 429 页。
- 217 “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和“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的简称，该杂志自 1838 年 1 月至 1841 年 6 月用小型日报的形式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在莱比锡出版，自 1841 的 7 月至 1843 年 1 月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出版。该杂志在 1841 年 6 月以前由阿·卢格和特·厄赫帖迈耶尔在哈雷编辑，从 1841 年 7 月起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顿编辑。——第 430 页。
- 218 见注释 203。——第 432 页。
- 219 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一幕费加罗咏叹调。——第 433 页。
- 220 “黑色”是指天主教修道士；黑黄色是奥地利国旗的颜色。——第 434 页。

- 221 引自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篇“蔷薇”。——第438页。
- 222 这里所列举的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执政内阁时期、拿破仑执政时期、帝制时期——奥地利人和法国人的会战。1792年11月6日在热马普，1794年6月26日在弗略留斯，1796年4月13—14日在密雷栖摩，1797年1月14—15日在里沃利，1797年4月18日在诺依维特，1800年6月14日在马连峨，1800年12月3日在霍恩林屯，1805年10月17日在乌尔姆，1805年12月2日在奥斯特里茨，1809年7月5—6日在瓦格拉姆，奥地利军队都吃了败仗。——第439页。
- 223 宗得崩德(Sonderbund)是瑞士经济落后的7个天主教州在1843年组织的单独联盟，目的是反抗在瑞士实现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堂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1847年7月瑞士联邦议会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是宗得崩德11月初向其他各州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所击溃。——第439页。
- 224 沃尔塔和库斯托查是意大利北部的两个小村。奥地利军队在拉德茨基的统率下于1848年7月25日在库斯托查打败皮蒙特军队，7月26—27日又在沃尔塔打败了它；1848年8月6日奥地利军队占领了米兰。——第439页。
- 225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七章(参看艾思奇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54年作家出版社版第40—41页。——译者注)。——第441页。
- 226 1848年8月21日，柏林为了抗议反动派组织的对沙洛顿堡(当时在柏林郊区)民主俱乐部人员的袭击，召开民众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人要求罢免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惩罚沙洛顿堡肇事的官员；他们向奥尔斯瓦特以及其他大臣的住所扔石头。办事内阁用种种迫害来对付八月事件。——第442页。
- 227 引自阿伦特的诗篇“狂欢之歌”。——第443页。

- 228 撒丁王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停战协定是在奥地利军队占领米兰之后，于 1848 年 8 月 9 日签订的。原订的停战期限（6 个星期）后来被延长了；1849 年 3 月 12 日协定被废除后，又开始了军事行动，但不久以后撒丁军队就被击溃，查理·阿尔伯特退位，新任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于 3 月 26 日又同奥地利人签订了停战协定。——第 445 页。
- 229 1848 年 8 月 9 日至 30 日在安特卫普进行的所谓里斯康士审判案，是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政府为了镇压民主主义者而制造出来的。审判的借口是由法国回国的比利时共和军团于 1848 年 3 月 29 日同守卫在距法国国境不远的里斯康士村附近的部队发生冲突。——第 447 页。
- 230 科伦当局不给予马克思普鲁士公民权的问题引起了科伦民主主义者的愤慨。科伦民主协会曾派代表请求地方当局取消对马克思的警察措施（见本卷第 582—583 页）。普鲁士内政大臣屈韦特于 1848 年 9 月 12 日批准了区行政机关的决议作为对马克思的申诉的答复。接着，普鲁士政府就利用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这一点，把他当作“违反外人居留法”的人驱逐出普鲁士国境。驱逐马克思和迫害其他编辑便成了“新莱茵报”停刊的原因。——第 451 页。
- 231 1848 年 8 月 9 日普鲁士国民议会通过了施泰因议员的提案——要求陆军大臣发布一道命令，让反对立宪制度的军官辞职。陆军大臣施莱根施坦违反议会的决议，没有发布这项命令。为此施泰因在国民议会 9 月 7 日的会议上再次提出他的提案；提案表决结果，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被迫辞职；继任的普富尔内阁终于在 1848 年 9 月 26 日颁布了这项命令，但语气比较和缓，而且只是一纸空文。——第 460 页。
- 232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十九章。——第 463 页。
- 233 “晨报”（《Morgenbladet》）是挪威的报纸，1819 年在克利斯提阿纳（奥斯陆）创刊；在 19 世纪 30 至 40 年代曾是所谓“人民党”的机关报。——第 465 页。
- 234 关于维登布鲁赫的照会见注释 134。——第 467 页。
- 235 这几篇连载文章的第二、第三、第四篇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的标题是“危机”。——第 469 页。

- 236 1830年7月26日法国国王颁布了废除出版自由、解散议会、修改选举法并减少¹/₄选民的敕令。查理十世政府的这些非常措施引起了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的七月革命。
1848年2月24日法国路易-菲力普王朝被推翻。——第473页。
- 237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9月10日的信中同意内阁的意见,认为普鲁士国民议会1848年9月7日的决议(见本卷第460—461页)破坏了“君主立宪的原则”,他赞同内阁以辞职来抗议议会的这种行动。——第474页。
- 238 指1789年7月9日至1791年9月30日的法国制宪议会。——第476页。
- 239 这句话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9月10日对大臣们请求辞职的答复相似:国王同意辞职的理由,同时建议大臣们在新内阁成立以前仍然执行自己的职务。——第479页。
- 240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即“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是以该报创办者福斯得名的日报,1785年起用这一名称在柏林出版。在19世纪40年代,该报遵循的是温和自由主义的办报方针。——第479页。
- 241 “施本纳报”(《Spenersche Zeitung》)即“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以该报出版者施本纳得名,1740年至1874年在柏林出版。1848—1849年,该报遵循的是君主立宪的办报方针。——第479页。
- 242 这是克伦威尔于1653年4月20日在驱散长期议会的娄罗时说的话。——第482页。
- 243 这几篇连载文章的第一篇没有标题,因为它是在“新莱茵报”的附页上发表的,附页中没有所刊载的文章的篇名。——第485页。
- 244 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称民主共和派为煽动者

- (Wähler),而民主共和派则称自己的敌人为抱怨派(Heuler)。——第490页。
- 245 被科伦革命民主运动的高涨吓得魂不附体的当局,“为了保护个人和财产”,于1848年9月26日宣布戒严。卫戍司令部发布命令,禁止一切旨在追求“政治和社会目的”的结社活动,禁止集会,解散市民自卫团并令其交出武器,建立军事法庭,“新莱茵报”以及其他许多民主报纸被禁止出版。——第492页。
- 246 “市民、农民和士兵的新科伦报”(《Neue Kölnische Zeitung für Bürger, Bauern und Soldaten》)是德国的革命民主报纸,1848—1849年由弗·安内克和弗·博伊斯特在科伦出版。报纸的任务是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在城乡劳动者及军队中进行宣传。——第492页。
- 247 指“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Zeitung des Arbeiter-Vereines zu Köln》),1848年4—10月出版,1848年7月以前由安·哥特沙克主编,7—9月由约·莫尔主编。这家报纸报道了科伦工人联合会和莱茵省其他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第492页。
- 248 “莱茵守卫者”(《Der Wächter am Rhein》)是德国的民主报纸,由卡·克拉麦尔主编,1848—1849年在科伦出版。除其他材料外,报纸还发表了关于科伦民主协会会议的报道。——第492页。
- 249 由于维也纳爆发了人民起义,奥国皇帝于1848年10月7日逃奔奥里缪茨(奥罗木茨)。奥地利帝国国会中的大部分捷克议员(捷克民族自由党党员)也由维也纳逃往布拉格。——第494页。
- 250 海涅“汤豪森”第三章。——第494页。
- 251 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德斯特尔在1848年9月29日的会议上要求政府解除科伦的戒严和追查科伦警备司令部的非法行动。——第496页。
- 252 科伦的一些具有反革命情绪的资产者(施图普、阿蒙等)在1848年10月2日向普鲁士国民议会提出呈文说,似乎得到莱茵省议员博尔夏特和吉尔支持的德斯特尔的关于解除科伦戒严的建议,“没有反映市民们的情绪和观点”。——第496页。

253 科伦工人联合会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盟员安·哥特沙克于1848年4月13日创立的。联合会起初约有会员300人,到5月初就增至5000人,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手工业者。领导联合会的是主席和由各种职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是“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而从1848年10月26日起是“自由、博爱、劳动”报。联合会城市中许多分会。在哥特沙克被捕后,莫尔于7月6日当选为主席,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科伦9月事件发生前,由于有被捕的危险,不得不逃往国外。由于工人的要求,马克思于10月16日暂代联合会主席职务。2月28日沙佩尔当选为主席,他一直担任到1849年5月底。

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哥特沙克、安内克、沙佩尔、莫尔、列斯纳、严森、勒泽尔、诺特莱克、贝多尔夫)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

工人联合会在初期处于哥特沙克的影响下,哥特沙克根据“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精神忽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任务的意义,实施抵制全德国民议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间接选举的宗派策略,在选举时反对支持民主派的候选人。哥特沙克的词句非常左而斗争的方法却非常温和(代表工人向政府和市政府呈递请愿书,只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支持染有手工业者偏见的落后工人的许多要求等)。哥特沙克的宗派策略一开始就遭到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路线的许多会员的反对。在他们的影响下,工人联合会的工作在6月底开始有了转变。从1848年秋天起,科伦工人联合会在农民中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联合会的会员在科伦郊区组织了民主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散发革命文献,其中有“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注释1)。联合会同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其他工人联合会保持有紧密的联系。

1848年冬,哥特沙克和他的追随者展开了旨在分裂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激烈的斗争。从1849年1月起,他们在自己所办的“自由、劳动”报上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编辑部进行猛烈的攻击和恶毒的诽谤。但是,这个分裂活动没有得到大多数会员的支持。

为了巩固联合会,马克思、沙佩尔和其他领导人在1849年1—2月改组了联合会。2月25日通过了新的会章,会章宣布联合会的主要任

务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4月间,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在联合会的会议上讨论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

工人们在革命进程中所获得的政治经验,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动摇政策的失望,——所有这一切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在1849年春实际提出关于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在组织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脱离了关系。4月16日科伦工人联合会决定退出德国民主联合会总会,加入以莱比锡为中心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总会。1849年5月6日召开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但是德国当时的局势(反革命的进攻,警察迫害的加剧)妨碍了科伦工人联合会进一步团结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工作。自从“新莱茵报”停刊和马克思、沙佩尔以及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离开科伦后,该会就日益失去政治的性质而逐渐变成了一般的工人教育团体。——第497页。

- 254 勃兰登堡军区司令弗兰格尔将军于1848年9月17日向部队发布了一项命令,内称普鲁士军阀打算公开取消革命的成果。命令指示要保障“社会安宁”,恫吓“违法分子”,并号召士兵团结在军官和国王的周围。——第497页。
- 255 引自“科伦街垒”一文,该文发表于1848年9月30日“科伦日报”第268号上。——第498页。
- 256 见注释144。——第498页。
- 257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二部第三幕第二场。——第500页。
- 258 梯也尔的这部著作于1848年9—10月在“立宪主义者报”(《Constitutionnel》)上发表,后来这部著作于1848年在巴黎以“财产论”(《De la propriété》. Paris, 1848)的名称出版单行本。——第501页。
- 259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资产阶级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在19世纪40年代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501页。

- 260 克·约·亚·马蒂约·德·东巴尔“罗维尔的农业年鉴或关于农业、农业经济和农业法的各种材料”1824—1837年巴黎版(C.-J.-A. Mathieu de Dombasle 《Annales agricoles de Roville, ou mélanges d'agriculture, d'économie rurale et de législation agricole》. Paris, 1824—1837)。——第504页。
- 261 美因兹中央审讯委员会是根据1819年德意志各邦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的决议成立的,目的是调查“蛊惑家的阴谋”,即镇压德意志各邦的反政府运动。美因兹委员会(它的委员由德意志各邦政府任命)不受联邦议会的约束,有权在德意志各邦直接(immediat)进行审讯或逮捕。——第506页。
- 262 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10月9日通过的“保卫制宪国民议会和中央政权机关官员的法律”。这个法律规定,侮辱国民会议员或中央政权机关官员的人要处以徒刑。这个法律是国民议会多数派和帝国政府在法兰克福九月起义后采取的镇压人民群众的措施之一。——第507页。
- 263 见注释160。——第507页。
- 264 1848年9月,土耳其军队为了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占领了瓦拉基亚。他们在布加勒斯特屠杀居民。土耳其政府专员傅阿德-埃芬蒂发表了一项文告,宣布要建立“合法的秩序”和“消灭革命的一切痕迹”。——第507页。
- 265 见查·戴韦南特匿名出版的著作“论如何保证一国在贸易平衡中的有利地位”1699年伦敦版第23、50页(《An Essay upon the Probable Methods of making a People Gainers in the Ballance of Trade》. London, 1699, pp. 23, 50)。——第511页。
- 266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十二章。——第515页。
- 267 “米兰报”(《Gazzetta di Milano》)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1816年创刊,1875年停刊,19世纪50年代以前是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当局的官方机关报。——第524页。

- 268 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德意志民主协会,该协会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他们鼓动德国流亡者组成志愿军团。他们指望用攻入德国的办法在那里引起革命和建立共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冒险计划。1848年4月,海尔维格的军团越过国境以后在巴登境内被德意志南部各邦的军队歼灭。——第525页。
- 269 “德意志人民报”(《Deutsche Volkszeitung》)是民主的报纸,1848年4月在曼海姆出版,主编是弗吕贝尔和佩尔茨,司徒卢威、黑克尔、卢格等人也参加了编辑工作。4月17日该报中登载了一篇巴黎通讯,其中声明德国共产主义者对海尔维格的举动持否定态度。——第525页。
- 270 指1848年10月26到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选出了德国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新成员(德斯特尔、赖辛巴赫、赫克扎梅尔)。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宪法原则的问题,并通过了“人权宣言”。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博伊斯特以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演说(见注释1)。可是,各种不同成分的代表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和分歧。代表大会不采取实际措施来动员群众同反革命进行斗争,而局限于制定毫无结果的和矛盾百出的决议。——第527页。
- 271 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535页。
- 272 暗指勃律盖曼过去的政治活动。由于他参加了反对政府的学生运动以及1832年在汉巴赫大典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注释157。——译者注)发表了捍卫出版自由的演说,曾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勃律盖曼在1840年大赦时被释放。——第536页。
- 273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是1820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创立的德文报纸,19世纪40年代奉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方针。——第536页。
- 274 斯拉夫菩提树是1848年4月底成立的捷克国民协会。布拉格协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沙法里克,加乌奇)的手中,他们在布拉格起义之后转入反革命阵营,而在各省分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主要是捷克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第537页。

- 275 施因德汉斯 (Schinderhannes) 即屠夫汉斯, 是德国强盗约翰·毕克列尔的绰号, 生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这里指的是文迪施格雷茨。——第 537 页。
- 276 这里指的是“新莱茵报”驻维也纳记者捷列林格的报道, 这篇报道载于 1848 年 10 月 27 日该报第 127 号上。——第 540 页。
- 277 弗·恩格斯的旅途随笔“从巴黎到伯尔尼”是按照手稿译出的, 手稿没有写完。在恩格斯写这篇随笔以前, 曾发生下列事件: 1848 年 9 月 26 日, 在科伦曾实行戒严, 并下令逮捕“新莱茵报”的几个编辑, 其中也有恩格斯 (见本卷第 600 页)。恩格斯流亡到比利时, 但是布鲁塞尔的警察当局把他逮捕了, 并在 10 月 4 日把他驱逐出比利时。10 月 5 日, 恩格斯到达巴黎, 在那里逗留了几天, 就步行到瑞士。经过日内瓦和洛桑, 约于 11 月 9 日到达伯尔尼, 在那里暂时住了下来。恩格斯在日内瓦开始写旅途随笔, 在手稿中, 最初的标题是“从巴黎到日内瓦”。
- 从附在手稿上的路线图的人种名称的记载和漫画可以推测到: 恩格斯中断随笔的写作工作, 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的请求, 开始写“匈牙利的斗争”这篇文章。——第 549 页。
- 278 “进军曲”(《Chant du départ》) 是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 后来受到法国民主人士的普遍欢迎。
- “为祖国牺牲”(《Mourir pour la patrie》) 是法国爱国歌曲中的叠句, 在 1848 年二月革命时期很受欢迎。——第 552 页。
- 279 韦伯的歌剧“欧里安特”, 海尔敏娜·冯·谢奇作词; 第一幕第二场。——第 555 页。
- 280 “从巴黎到伯尔尼”的手稿上附有两张恩格斯亲笔画的关于他所经过的路线的草图。这两张草图画的是恩格斯从奥克萨里 (法国) 到勒-洛克尔 (瑞士) 的行程的一部分。

在第一张草图上有如下的符号(尖括弧是恩格斯的删除号, 方括弧是手稿中不大准确的地方的符号):

(1) 从奥克萨里到沙龙的行程及其记号:

《奥克萨里——圣勃里——威尔曼顿——庞特-奥-阿鲁耶特——柳西-

勒·布阿——阿瓦伦——卢弗勒——索耳尧 向第戎的方向——尚波(尚波,在手稿中是尚托)——卢弗勒——向第戎的方向——阿尔涅·勒·杜克——沙托(长长的村庄)——在这里我去过邮局——煤矿——旅店饭馆——美丽的河谷,葡萄酒——同上——珊安伊——沙龙)。

(2)从博佛尔到日内瓦的行程及其记号:

《博佛尔——奥尔热列——厄恩——穆阿兰——庞·杜·利臧(庞·杜·利臧,在手稿中是庞·迪松)——圣克劳第——拉缪尔(拉缪尔,在手稿中是拉默尔)——米茹——热克斯——费尔涅——萨科涅——日内瓦)。

此外,在这一张草图上还有几张插图,其中有穿匈牙利制服的骑士的形象。在这里能区别出人种名称的记载:

捷 克 人	} 克罗地亚人	} 塞尔维亚人	} 波 兰 人
摩 拉 瓦 人	} 伊利亚人	} 波斯尼亚人	} 卢 西 人
斯洛伐克人	} 斯 罗 文 人	} 保加利亚人	} 卢 西 人

在第二张草图上有如下的符号:

(1)从奥克萨里到日内瓦的行程及其记号:

《奥克萨里——圣勃里——威尔曼顿——庞特·奥·阿鲁耶特——柳西·勒·布阿——阿瓦伦——卢弗勒——索耳尧——阿尔涅·勒·杜克——长长的村庄——伊弗里——拉坎什——珊安伊——沙龙——圣马尔谢耳——鲁安——博佛尔——奥尔热列——厄恩——穆阿兰——两座山——庞·杜·利臧(庞·杜·利臧,在手稿中是庞·迪松)——圣克劳第——拉缪尔(拉缪尔,在手稿中是拉默尔)——米茹——热克斯——日内瓦)。

(2)从穆阿兰到圣克劳第的行程及其记号:

《穆阿兰——磨粉厂——庞·杜·利臧(庞·杜·利臧,在手稿中是庞·迪松)——圣克劳第)。

(3)从日内瓦到勒·洛克尔及其记号:

《日内瓦——贝尔维宫——科彼——尼翁——罗耳——奥邦——莫尔日——科索涅——拉·萨腊——奥尔勃——伊韦尔登——圣克卢阿——弗廖尔耶——特腊韦尔——勒·庞——勒·洛克尔)》。——见第 564 页和 565 页之间的插图。

- 281 恩格斯改写的歌德的“宣战”一诗中的一节。——第 570 页。
- 282 “告全体德国工人书”是从巴黎来美因兹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特派员、同盟中央委员瓦劳和盟员克鲁斯起草的。1848 年 4 月 8 日马克思和恩格斯赴科伦途中在美因兹停留下来,他们在那里与当地的共产主义者讨论了今后的行动计划。——第 575 页。
- 283 科伦早在 1848 年三月革命之前就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德斯特尔、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安内克和哥特沙克等人都是支部的成员,其中大部分人都处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之下。1848 年 4 月初科伦组织增加了一批从国外回到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从发表的记录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达科伦后不久,就和哥特沙克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个文件是由毕尔格尔斯和莫尔以科伦组织的领导人的身分签署的;马克思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出席了会议。——第 577 页。
- 284 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 1848 年 8 月 13—14 日在科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确定科伦三民主体中央委员会(见注释 285)为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大会的决定使委员会(马克思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活动不仅限于莱茵省,而且扩大到威斯特伐里亚。大会通过了必须在工厂工人中和农民中进行工作的决议。——第 580 页。
- 285 根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6 月底成立了由科伦三民主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以及工人业主联合会)的代表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直暂行区域委员会的职务。——第 580 页。
- 286 这个决议是科伦民主协会在 1848 年 8 月 11 日的全体会议上通过的,这次会议由马克思担任主席(见本卷第 582 页)。——第 584 页。
- 287 五十人委员会是 1848 年 4 月由临时国会选出的,其中大多数人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它在 4 月 6 日的“告德国人民书”中号召德国人民“协助波兰人重建祖国”。——第 584 页。

-
- 288 格·维尔特曾经以施纳普汉斯基骑士为题在一系列小品文中嘲笑著名的反动分子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小品文“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刊载在 1848 年 8—9 月、12 月和 1849 年 1 月的“新莱茵报”上，文章没有署名。——第 589 页。
- 289 选入科伦安全委员会的还有“新莱茵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威·沃尔弗、德朗克和毕尔格尔斯，以及科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沙佩尔和莫尔。——第 591 页。
- 290 关于市民联合会见注释 54。——第 592 页。
- 291 1848 年 8 月 9 月 11 日，驻扎在科伦的第二十七团士兵和科伦居民发生冲突，市民自卫团中拥护民主的一部分人支持科伦居民。——第 593 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48年3月—11月)

1848

- 3月下半月—4月初 由于德国革命已经开始,在巴黎的以马克思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组织了三四百名德国工人个别回德国去,其中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 3月21日左右 恩格斯由布鲁塞尔到巴黎,立即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他是未到巴黎来以前就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
- 3月21至29日之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个文件以传单的形式和“共产党宣言”一起分发给回德国的工人。
- 3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准备回德国。他们在寄回德国的信里谈到了他们打算出版革命的大型日报。
- 3月底—4月5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反对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的冒险计划,他们企图依靠武装的德意志军团把共和制输入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对这件事的态度通知他们在德国和法国的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给卡贝,请求他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刊登在他的“人民报”上。这个声明强调指出:在巴黎和同盟有关的只有一个组织即德国工人俱乐部,共产主义

者同盟和海尔维格及伯恩施太德所领导的德意志民主协会毫无共同之处。在声明上署名的有卡·马克思、卡·沙佩尔、亨·鲍威尔、弗·恩格斯、约·莫尔和威·沃尔弗。

在马克思所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倡议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美因兹建立了工人教育协会,并以该会的名义向德国全体工人呼吁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组织工人联合会。

- 4月6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直接参加革命。
- 4月8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逗留在美因兹,和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讨论今后组织和联合工人联合会的任务。
- 4月1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达科伦,立即准备出版大型的政治日报。
- 4月11日以后 科伦市政委员会答应马克思的请求,给予他在科伦居住的权利。
- 4月上半月 马克思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派代表(德朗克、威·沃尔弗、沙佩尔等)分赴德国各城市组织新的同盟支部和公开的工人协会。
- 4月15日左右 为了给报纸募集股份和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恩格斯前往巴门、爱北斐特和莱茵省的其他城市。
- 4月下半月 恩格斯进行“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翻译工作。
- 4月24日左右 “新莱茵报”的出版广告问世。
- 4月 1847年12月马克思所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说全文在布鲁塞尔付印。由于马克思忙于准备出版“新莱茵报”的工作,不能继续整理原稿,该文遂停止付印。
- 4月—5月 马克思与德国各城市的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 (德朗克、波尔恩、艾韦贝克、沙佩尔等)通信讨论同盟各支部的活动情况以及报纸股份的认购情况。
- 5月6日 为了和恩格斯讨论“新莱茵报”的出版问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问题,马克思和维尔特一起到爱北斐特去住了几天。
- 5月11日 马克思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参加同盟科伦支部的会议,讨论哥特沙克对同盟的态度问题。
- 5月中旬 马克思通过维尔特把“新莱茵报”即将出版的消息通知比利时民主主义者“社会辩论报”的编辑若特兰,并且提议在两报之间建立经常的联系。
- 5月20日 恩格斯从巴门回到科伦,同马克思一起积极准备出版“新莱茵报”。
- 5月20日以后 由于德国政治局势的恶化和反动势力的抬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提前出版“新莱茵报”,原定7月1日出版,改为6月1日开始出版。
- 5月底 马克思写信给佛罗伦萨的意大利民主报纸“黎明报”的编辑,报道“新莱茵报”即将出版的消息,并且谈到该报编辑部准备捍卫意大利人民的自由与民族独立。马克思建议彼此经常交换报纸和消息。马克思的这封信发表在6月29日的“黎明报”上。
-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派赴德国各城市的代表报道,同盟各支部的组织很薄弱,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民主运动,构成这个运动的左翼,即实际上的无产阶级一翼。他们参加了科伦民主协会,并建议他们的支持者除了参加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外,还须积极地参加民主协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应当把“新莱茵报”作为传达同盟的总的指示

- 和在德国宣传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武器。
- 6月1日 “新莱茵报”创刊号问世,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报上登载了“‘新莱茵报’编辑部的话”和弗·恩格斯的文章:“法兰克福议会”和“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
- 6月 “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选择材料、建立通讯网以及报纸出版的其他工作都由马克思一手办理。因此该报的社论大部分是恩格斯写的。
- 6月初 由于发表了弗·恩格斯针对德国国民议会怯懦的妥协政策所写的文章“法兰克福议会”,“新莱茵报”的相当多的资产阶级股东都不再支持该报。
- 6月2日—3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关于康普豪森内阁的文章,发表在6月3日和4日的“新莱茵报”上。
- 6月5日 “新莱茵报”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文章“战争的喜剧”。
- 6月6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柏林的妥协辩论”的文章,发表在6月7日的“新莱茵报”上。以后,恩格斯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又对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作了系统的评论,并且对该会的活动进行了批评。
- 6月7日 在“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这篇社论和以后发表在“新莱茵报”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决主张必须通过革命来统一德国,认为这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
- 6月8日 恩格斯写“对波兰的重新瓜分”一文,发表在6月9日的“新莱茵报”上。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以及其他的许多文章里,热烈地支持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且指出,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的德国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 6月13日—14日 恩格斯写“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的一系列文章,这些

- 文章发表在 6 月 14 日到 17 日的“新莱茵报”上。
- 6 月 17 日 恩格斯写“布拉格起义”一文,表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捷克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情。该文发表在 6 月 18 日的“新莱茵报”上。
- 6 月 19 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关于袭击柏林军械库的文章,题为“6 月 17 日的妥协会议”。文章着重指出了人民武装的意义,认为它是革命胜利的条件。该文发表在 6 月 20 日的“新莱茵报”上。
- 6 月 20 日 恩格斯写“在波兹南的新政策”一文,发表在 6 月 21 日的“新莱茵报”上。
- 6 月 23 日左右 科伦民主协会委员会派马克思参加科伦各民主组织的代表会议,商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民主协会的合并问题。这个问题是根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来的。
- 6 月 23 日 “新莱茵报”发表弗·恩格斯的“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的第一件事迹”一文,批评议会对意大利革命所采取的政策。
- 6 月 24 日 马克思参加科伦三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以及工人业主联合会)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会议。委员会通过决议,认为必须建立科伦各民主团体的中央委员会,其职能相当于区域委员会;同时责成委员会在各组织之间进行经常的联系并准备在科伦召开莱茵省民主主义者第一届代表大会。
- 6 月 25 日 “新莱茵报”发表弗·恩格斯的论布拉格起义的文章“起义的民主性质”。
- 6 月 25 日—7 月 1 日 由于巴黎的六月起义,恩格斯写了一系列阐明巴黎无产阶级第一次阶级战斗的进程的文章,发表在 6 月 26 日到 7 月 2 日的“新莱茵报”上。

-
- 6月28日 马克思写“六月革命”一文,发表在6月29日的“新莱茵报”上。在该报发表了坚决地捍卫起义的巴黎工人的言论后,剩下的大部分股东都停止支持“新莱茵报”。
- 6月底—8月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对普鲁士国民议会关于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的讨论,在“新莱茵报”发表一系列的社论(“帕托夫赎买法案建议书”、“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为农民辩护,对德国资产阶级背叛自己的天然同盟军农民和拒绝实行德国革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即完全废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的行为给予无情的批判。
- 7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战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莫尔(他从7月6日就任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和卡·沙佩尔给工人联合会的活动以更大的影响,对哥特沙克宗派主义政策的拥护者进行顽强的斗争。
- 7月2日 恩格斯写“德国的对外政策”一文,揭露德国资产阶级继续执行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政策,并拟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原则。该文发表在7月3日的“新莱茵报”上。
- 7月6日 马克思写“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一文,发表在7月7日的“新莱茵报”上。
由于7月5日的“新莱茵报”发表了“逮捕”一文,预审推事传讯了马克思。马克思和负责发行人(经理)科尔夫被控侮辱了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和宪兵。在传讯终结后在该报编辑部进行了搜查。由于搜查中查出了该文的一份不知出自何人手笔的材料和马克思拒绝指出该文的作者,便成了不仅传讯该报负责发行人科尔夫,而且也传讯马克思、恩格斯和德朗克的借口。
- 7月7日和9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关于柏林的政府危机的文章“办事内

- 阁”和“内阁危机”,发表在7月9日和10日的“新莱茵报”上。
- 7月10日 马克思写“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一文,发表在7月11日的“新莱茵报”上。
- 7月14日 恩格斯在科伦民主协会的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说,批评柏林的国民议会。他建议大会委托国民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德斯特尔反对限制军官的结社权利。
- 7月17日—24日 恩格斯写“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的一系列文章,发表在7月18至25日的“新莱茵报”上。
- 7月21日 马克思出席科伦民主协会的全体大会。会上选举参加科伦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一致选举马克思和施奈德尔第二为民主协会的代表。会上魏特林发表演说,叙述了他对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任务的混乱的宗派主义的看法。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改在下次会议发表。
- 7月21日—2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的一系列社论中批评市民自卫团法案。
- 7月22日 “新莱茵报”刊载了弗·恩格斯的“和丹麦的休战”一文。预审推事就“逮捕”一文再度传讯马克思。
- 7月26日和3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批评强制公债法案。
- 7月31日 恩格斯写“‘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一文,发表在8月1日的“新莱茵报”上。
- 8月3日 “新莱茵报”发表“俄国的照会”的社论,揭露俄国沙皇制度的反动的对外政策。
- 马克思接到区行政机关的通知,拒绝给予他普鲁士公民权,因而今后和过去一样,普鲁士政府将把马克思当作外国人看待。
- 预审推事传讯恩格斯作证,企图查出“逮捕”一文

- 的作者。
- 8月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科伦民主协会的全体大会。大会继续讨论魏特林的发言。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魏特林把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分开来的论点,指出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是密切联系的,并揭露了魏特林对德国革命的民主任务的无知。恩格斯通知大会,普鲁士政府拒绝给予马克思公民权,因此马克思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 马克思和科伦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通知莱茵省所有的民主团体,要它们派代表出席8月13日在科伦召开的莱茵省民主主义者第一届代表大会。通知发表在8月5日的“新莱茵报”上。
- 8月6日 马克思写“‘模范国家’比利时”一文,发表在8月7日的“新莱茵报”上。
- 8月7日—9月6日 恩格斯写“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8月9日到9月7日的“新莱茵报”上。
- 8月11日 科伦民主协会召开全体大会,由马克思担任主席。大会通过了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抗议书,反对把波兹南并入德意志联邦。大会还讨论了普鲁士政府拒绝给予马克思公民权的问题。马克思揭露了政府对他采取这种措施的真正原因。恩格斯举出了警察迫害民主运动领袖(包括沙佩尔)的新材料。大会选举了一个代表团,委托他们要求科伦当局取消对马克思和沙佩尔所采取的警察措施。
- 8月13日—1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在科伦举行的莱茵省民主主义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7个民主团体的代表。大会批准了早已选出的作为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科伦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参加了

-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恩格斯在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着重地指出了莱茵省人民群众对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制度的憎恨。大会通过决议,认为必须在工厂工人和农民中进行工作,在乡村中建立组织并且和这些组织保持经常的联系。
- 8月22日 马克思向普鲁士内政大臣屈韦特尔申诉,要求取消区行政机关的非法决定,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
- 8月23日—9月11日左右 为了巩固和各民主团体以及工人组织的联系,并促使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更坚决的斗争,马克思到柏林和维也纳去,同时也希望为“新莱茵报”筹集经费。
- 8月25日—26日 马克思在柏林。
- 8月26日 恩格斯写“‘科伦日报’论意大利”和“‘阅报室’报论莱茵省”两文,发表在8月27日的“新莱茵报”上。
- 8月27日 马克思到达维也纳。
- 8月28日 马克思参加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会议,会上讨论维也纳8月23日巷战后的形势问题。马克思在他的演说中着重指出,维也纳事件的实质不在于内阁的更迭,而是象巴黎六月的战斗一样,在于它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 8月28日—9月6日 马克思在维也纳停留期间会晤了各民主团体和工人组织的领导人。特别是他和奥地利国会的德国捷克党团的领导人鲍洛施讨论了奥地利的民族问题以及捷克工人与德国工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马克思同时也就“新莱茵报”的经费问题进行了谈判。
- 8月30日 马克思在维也纳第一个工人联合会会议上发表演说,论述了西欧的社会关系和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

-
- 9月2日 恩格斯写“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一文。这篇为17个被判处死刑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辩护的文章发表在9月3日的“新莱茵报”上。
马克思在维也纳第一个工人联合会会议上做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长篇报告。
- 9月4日 预审推事再次传讯恩格斯,但是他已经不是作为证人被传讯,而是作为“新莱茵报”“逮捕”一文案件的同案人被传讯。
- 9月7日 科伦民主协会和“新莱茵报”编辑部在练马场召开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数千人。大会通过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书,要求取消普鲁士政府和丹麦缔结的休战协定和致普鲁士国民议会书,抗议反民主的市民自卫团法案。
- 9月7日—10日左右 由于普鲁士政治局势的尖锐化,马克思决定提前返回科伦。他路过柏林时停留下来和民主运动的领导人继续商谈,并且出席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会议。马克思和波兰民主主义者商量资助“新莱茵报”的问题。根据这次商谈弗·科斯策尔斯基于9月18日寄给马克思2000塔勒。
- 9月8日 恩格斯写“办事内阁的垮台”一文,发表在9月10日的“新莱茵报”上。
- 9月8日和10日 “新莱茵报”发表弗·恩格斯的“和丹麦的休战”和“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两篇文章。
- 至迟9月10日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在科伦印成传单,立即在莱茵省的许多地方散发。
- 9月11日左右 马克思回到科伦。
- 9月11日 恩格斯在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组织劳

- 动是否可能以及法国国家工厂失败的原因的详细报告。
- 9月11日—15日 马克思在9月12到16日的“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几篇连载的文章“危机和反革命”里,阐述了一个最重要的原理: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应该是人民的革命专政,专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对反革命的坚决回击和消灭旧制度的残余。
- 9月11日—25日 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在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解释工作和组织工作,竭力动员人民起来反对猖獗的反革命势力。
- 9月12日 普鲁士内政大臣屈韦特答复马克思的申述,认为科伦当局拒绝给予马克思普鲁士公民权的决定是合法的。
- 9月13日 “新莱茵报”编辑部、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在科伦弗兰肯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约有6000人。
大会根据威·沃尔弗的提议(恩格斯支持这个提议),选举了由30人组成的安全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大会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致柏林议会书,要求议会的议员在政府企图解散议会、甚至在使用武力来对付他们的时候,也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
- 9月17日 恩格斯参加由科伦各民主团体发起的在沃林根(在科伦附近)召开的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约有8000人。恩格斯被选为大会的书记。大会赞成建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宣布承认科伦安全委员会,并根据恩格斯的提议,通过了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书,要求国民议会在普鲁士和德国发生冲突的时候,站在德国方面。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马克思参加了这个

- 委员会)宣布 9 月 24 日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民主主义者第二届代表大会。
- 9月19日—20日 恩格斯写“休战协定的批准”和“法兰克福起义”两文,发表在 9 月 20 日和 21 日的“新莱茵报”上。
- 9 月 20 日 由于法兰克福议会批准和丹麦的休战,由于法兰克福的起义,安全委员会、民主协会和科伦工人联合会在科伦埃塞尔大厅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通过了声援法兰克福起义者的决议,并且宣布同意批准休战的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为人民的叛徒。恩格斯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斥责法兰克福议会的可耻的决议,并且报道了法兰克福起义的经过。
- 9 月 23 日 “新莱茵报”发表了 9 月 20 日群众大会的决议,并且把这个决议印成传单在全城散发。
- 9 月 25 日 科伦检察机关对恩格斯、威·沃尔弗和毕尔格尔斯提起诉讼,控告他们在科伦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阴谋反对现行制度。
帝国司法大臣命令科伦检察机关对安全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提起诉讼,同时对“新莱茵报”发行科也提起诉讼,因为该报散发了 1848 年 9 月 20 日科伦群众大会的决议。
- 9 月 25 日晨 马克思去参加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会议;由于警察在清晨挑衅地逮捕了科伦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的领导人(沙佩尔、贝克尔等),会议未能举行。
- 9 月 25 日上午 马克思出席了在旧市场“友谊之家”饭店召开的工人联合会,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劝告到会的工人不要理睬警察的挑衅,并向他们解释武装起义的时机还未到来,过

- 早的发动会成为一种冒险的行动,它将使工人阶级在决战的前夜丧失战斗力。
- 9月25日下午3时 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在埃塞尔大厅举行的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联席会议上警告到会的人要防止过早的发动。
- 9月26日 科伦戒严。警备司令部命令“新莱茵报”和其他的一些民主派报纸停止出版。
- 9月26日以后 恩格斯由于有被捕的危险被迫离开科伦。恩格斯在巴门隐藏几天后就到布鲁塞尔去。
- 9月28日 “新莱茵报”的负责发行人以一种特殊的传单形式通知订户该报停刊,并且相信短期内即将恢复出版。
- 9月30日 “新莱茵报”的负责发行人宣布科伦的戒严即将解除,该报自10月5日起复刊。
- 9月底—10月上半月 马克思为“新莱茵报”的复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克服了报纸因被封而引起的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巨大困难。为了偿付债款和维持报纸的开支,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现金。
- 10月1日 科伦检察机关控告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在报上发表匿名的小品文“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是格·维尔特写的)并且怀疑1848年9月20日科伦群众大会的决议是他们草拟的。
- 10月3日 由于科伦的戒严业已解除,“新莱茵报”的负责发行人科尔夫发了一个特别的通知,宣布该报即将复刊,并且号召订阅第四季度的报纸。
- 国家检察官下令采取措施搜捕恩格斯。命令上还开列了恩格斯的特征。
- 10月3日以后 马克思建议弗莱里格拉特加入“新莱茵报”编辑部,弗莱里格拉特同意。

-
- 10月4日左右 恩格斯和德朗克(他也是从科伦逃出来的)一起到达布鲁塞尔。
- 10月4日 布鲁塞尔警察逮捕恩格斯和德朗克,把他们解到监狱,以后又押送到法国边界,他们前往巴黎。
- 10月5日 恩格斯和德朗克到达巴黎。
- 10月10日左右 恩格斯在巴黎逗留了几天后,就徒步到瑞士去,打算一有机会即回科伦。途中恩格斯和法国的农民进行了交谈,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情绪。
- 10月12日左右 科伦工人联合会派代表去见马克思,要求他领导联合会。
- 10月12日 “新莱茵报”第114号,即科伦戒严解除后的第一号出版。在报纸总编辑马克思署名的通知中指出,编辑部的人员增加了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报纸刊载了卡·马克思的文章“维也纳革命”。
马克思写“科伦革命”一文,发表在10月13日的“新莱茵报”上。
- 10月13日 马克思写“普富尔内阁”和“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证券的全国抵押银行的演说”两篇文章,发表在10月14日的“新莱茵报”上。
- 10月下半月—11月初 马克思对维也纳人民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反革命的斗争给以很高的评价,他给“新莱茵报”写了一系列关于维也纳起义经过的文章。
- 10月16日 马克思在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他同意暂时担任联合会主席的职务。马克思在会上发表了演说,论述了德国工人的革命作用,特别是在维也纳起义时所起的革命作用。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会议通过了向维也纳工人联合会致敬的信。
- 10月18日 马克思写“普鲁士国王答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弗里德

- 里希-威廉四世答市民自卫团代表团”两篇文章,发表在 10 月 19 日和 20 日的“新莱茵报”上。
- 10 月 22 日 “新莱茵报”发表马克思的“‘改革报’论六月起义”、“英法在意大利的调停”和“模范的立宪国家”3 篇文章。
科伦工人联合会全体大会批准马克思为联合会主席。马克思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论德国现行的间接选举制。大会选举博伊斯特为出席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博伊斯特在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坚持了以“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为基础的纲领。
- 10 月 24 日左右 恩格斯到达日内瓦。
- 10 月 26 日左右 马克思写信给日内瓦的恩格斯,告诉他“新莱茵报”复刊的消息,并要求他给报纸寄通讯和文章来。
- 10 月 28 日 马克思写科伦检察机关迫害“新莱茵报”编辑部的文章,题为“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和’新莱茵报’”。该文发表在 10 月 29 日的“新莱茵报”上。
- 10 月底—11 月 恩格斯写“从巴黎到伯尔尼”的旅途随笔。这篇随笔未写完。
- 11 月初 恩格斯在日内瓦逗留了几天后,就前往洛桑。他在那里和洛桑工人联合会建立了联系。
- 11 月 2 日 马克思写“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和“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两篇文章。在后面一篇文章里他批评这个文件空洞而不彻底。这两篇文章发表在 11 月 3 日的“新莱茵报”上。
- 11 月 6 日 马克思写“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一文,发表在 11 月 7 日的“新莱茵报”上。
马克思在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报道了维也纳陷落的消息,他着重指出,奥地利军队之所以能占领该城,只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叛卖行为。

人名索引

三 画

万德尔(Wander)——德国牧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同,属于左派。——第251页。

万根海姆(Wangenheim)——普鲁士官吏,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321页。

士伊斯豪斯(Tüshaus)——普鲁士官吏,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213、214页。

卫尔,巴托洛缪斯·约瑟夫(Weyll, Bartholomäus Joseph)——德国法学家,1848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会员和科伦公安委员会委员,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1848年10月)代表。——第596页。

四 画

巴罗,奥迪隆(Barrot, Odilon 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王朝反对派的首领;1848年12月—1849年10月领导依靠反革命君主派集团的内阁。——第484页。

巴兰,费里克斯(Ballin, Felix 约生于1802年)——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里斯康士案的被告之一,被判处死刑,后改为30年徒刑;1854年被释放。——第448、449页。

巴魏,沙尔·维克多(Bavay, Charles Victor 1801—1875)——比利时法官;1844年起任布鲁塞尔总检察官。——第204、448页。

巴尔策,威廉·爱德华(Baltzer, Wilhelm Edouard 1814—1887)——德国传教士,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302页。

巴亚尔,比埃尔(Bayard, Pierre 约1475—1524)——法国骑士,同代人称颂他是勇敢和高贵的榜样,是“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第198、415页。

巴巴罗萨——见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

巴斯蒂德,茹尔(Bastide, Jules 1800—187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编辑之一(1836—1846);曾任外交部长(1848年5月—12月)。——第144、427、515、516、517页。

巴塞尔蒙,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 Friedrich Daniel 1811—1855)——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巴登议会议员;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巴登政府在联邦议会中的代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16、265、349、498、526页。

比尔克(Birk)——普鲁士官吏,1848年9月起在科伦执行区督察员的职务。——

- 第 536 页。
- 比德曼, 卡尔 (Biedermann, Karl 1812—190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 后来是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265、349 页。
- 比克西奥, 雅克·亚历山大 (Bixio, Jacques Alexander 1808—1865)——法国政论家,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国民报”编辑之一, 1848 年为制宪议会的副主席, 1849 年是立法议会的议员。——第 145 页。
- 韦伯, 卡尔·马利阿 (Weber, Karl Maria 1786—1826)——杰出的德国作曲家。——第 555 页。
- 韦尔登, 弗兰茨·路德维希 (Welden, Franz Ludwig 1782—1853)——男爵, 奥地利将军, 1848 年向革命的意大利进军的参加者; 在镇压了 1848 年 10 月起义后任维也纳卫戍司令; 1849 年 4 月—5 月指挥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地利军队。——第 114、435、436、440 页。
- 韦尔凯尔, 卡尔·泰奥多尔 (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学家, 自由派政论家;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第 467 页。
- 韦尔哈根, 比埃尔·德奥多 (Verhaegen, Pierre Theodor 1800—1862)——比利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第 370 页。
- 丰克 (Funk)——德国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科伦民主协会的会员。——第 189 页。
- 丹东, 若尔日·雅克 (Danton, George Jacques 1759—1794)——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党人的右派领袖。——第 265 页。
- 巴涅尔, 洛朗·安都昂 (Pagnerre, Laurent Antoine 1805—1854)——法国出版家,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1848 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第 403 页。
-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irardin Emil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在 30—60 年代曾多次担任“新闻报”编辑; 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第 162 页。
- 毛克勒, 保尔·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奥伊根 (Mauder, Paul Friedrich Theodor Eugen 1783—1859)——维尔腾堡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1818 年起任司法大臣, 后来是秘密会议的主席 (1831—1848 年 4 月)。——第 268、269 页。
- 不伦瑞克公爵, 卡尔·威廉·斐迪南 (Herzog von Braunschweig, Karl Wilhelm Ferdinand 1735—1806)。——第 177 页。
- 文迪施格雷茨, 阿尔弗勒德 (Windischgrätz Alfred 1787—1862)——公爵, 奥地利元帅, 1848 年指挥镇压布拉格和维也纳的起义; 1848—1849 年率领奥地利军队, 镇压匈牙利革命。——第 94—96、127、128、141、299、348、507、529、536、537、540、542、605 页。

五 画

- 卡姆 (Cham 1819—1879)——著名的法国漫画家, 幽默的“喧声报”的固定撰稿人。——第 55 页。
- 卡诺, 拉查尔·伊波利特 (Carnot, Lazare 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

- 共和主义者;1848年是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制宪会议的议员。——第180页。
-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E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论家,空想的和平共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第334页。
- 卡洛斯,唐(Carlos, Don 1788—1855)——西班牙王位的僭望者,1833年至1840年在西班牙进行内战,目的是要夺取王位,恢复封建僧侣集团的无限权力。——第177、346、417页。
- 卡尼茨,奥古斯特(Kanitz August 1783—1852)——伯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5月—6月是康普豪森内阁的陆军大臣。——第73、100页。
- 卡克尔,约翰·威廉(Kalker, Johann Wilhelm)——1848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书记。——第192页。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 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侵占阿尔及利亚的参加者,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是阿尔及利亚总督,以在战争中采取野蛮手段著称;从1848年5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任执行机关的首领(1848年6月—12月)。——第135、139—145、153、161—163、171—173、175、182、183、184、426、429、445、483、484、489、494、496、513、516、552、555页。
-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Catiline, Lucius Sergius 公元前约108—62)——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反对贵族共和国密谋的组织者。——第261页。
- 瓦劳,卡尔(Wallau, Karl 1823—1877)——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1848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后来是美因兹市长。——第575页。
- 瓦拉赫(Wallach)——普鲁士官吏,勃罗姆堡(贝德哥什)区督察员。——第399页。
- 瓦赫特尔(Wachter)——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科伦公安委员会委员。——第596、601页。
- 瓦拉夫(Wallraf)——德国民主主义者。——第596页。
- 瓦德涅尔,维克多(Valdenaire, Victor 卒于1859年)——普鲁士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97、98、338、339页。
- 瓦尔莫登,卡尔(Wallmoden, Karl 1792—1883)——伯爵,奥地利将军,1848—1849年曾参加镇压捷克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第127页。
-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Waldeck, Benedictus Franz Leo 1802—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职业是律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主席和左派领导人之一;后为进步主义者。——第186、263、264、462、468、469、471、472、478页。
- 瓦克斯穆特,弗兰茨·鲁道夫(Wachsmuth, Franz Rudolf 生于1810年)——普鲁士官吏,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306页。
- 瓦滕斯累本,亚历山大(Wartensleben, Alexander 生于1807年)——伯爵,普鲁士地主,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 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 409、410 页。
- 布斯曼(Bu mann)——波兹南地主,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 206、207、340 页。
- 布里尔(Brill)——德国民主主义者,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 206、207、340 页。
- 布莱梅(Brehmer)——德国教师,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 79 页。
- 布累特(Bredt)——普鲁士官吏,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后来属于中间派。——第 341 页。
- 布洛姆,安东(Bloem, Anton 1814—1885)——德国律师,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后来属于中间派。——第 56、221 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从 60 年代末起为自由派政党的领袖之一;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职务。——第 160 页。
- 布赫尔,洛塔尔(Bucher,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官吏,政论家;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支持俾斯麦。——第 320、322 页。
- 布兰克,约瑟夫·博纳维达(Blank, Joseph Bonavita 1740—1827)——德国天主教牧师;维尔茨堡大学自然科学的教授;专研动物学。——第 371、372 页。
- 布莱阿,让·巴蒂斯特·菲德尔(Bréa, Jean Baptiste Fidèle 1790—1848)——法国将军,曾参加镇压 1848 年的六月起义,为起义者枪决。——第 145 页。
- 布莱桑,路德维希(Blesson, Ludwig 1790—1861)——德国军事著作家,反动分子,1848 年 6 月任柏林市民自卫团司令。——第 43 页。
- 布伦坦诺,罗仑兹(Brentano, Lorenz 1813—1891)——巴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律师;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1849 年领导巴登临时政府,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来流亡美国。——第 414 页。
- 布鲁士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士斯)(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约 85—42)——罗马政治活动家,反对尤利乌斯·凯撒的贵族共和国密谋的发起人之一。——第 261、526 页。
- 布里兹倍恩,阿伯特(“新莱茵报”上是:亨利)(Brisbane, Albert 1809—1890)——美国记者,傅立叶派。——第 596 页。
- 布洛多夫斯基,亚历山大(Brodowski, Alexander 1794—1865)——波兰地主,1848 年是波兹南民族委员会委员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 318 页。
- 弗伦肯(Frencken)——普鲁士官吏,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 229 页。
- 弗恩巴赫(Fernbach)——德国大学生,民主主义者。——第 189 页。
- 弗吕贝尔,尤利乌斯(Frö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政论家和进步著作的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后来是

- 自由主义者。——第 587 页。
- 弗兰格尔,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将军, 普鲁士反动军阀的主要代表之一; 1848 年 11 月参加柏林反革命政变, 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第 207、292、497、507、529 页。
- 弗洛特韦尔, 爱德华·亨利希 (Flottwell, Eduard Heinrich 1786—1865)——普鲁士的贵族官僚的代表之一; 曾任财政大臣 (1844—1846), 波兹南的总督, 后为威斯特伐里亚的总督;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 398、399、414 页。
-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 (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 开始活动时是浪漫主义者, 后来成为革命诗人, 1848—1849 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50 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 438—440、493 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鲁士国王 (1740—1786)。——第 297、375、376 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 (Friedrich Wilhelm 1620—1688)——勃兰登堡选帝侯 (1640—1688)。——第 303、304 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 (Friedrich Wilhelm II 1744—1797)——普鲁士国王 (1786—1797)。——第 386、387 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 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 (1797—1840)。——第 372、378 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 (1840—1861)。——第 346、474、509、510、584 页。
-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 (Friedrich I Barbarossa 约 1123—1190)——1152 年起是德国国王,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1155—1190), 曾不止一次地远征意大利, 企图兼并意大利。——第 439 页。
-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提安·奥古斯特 (Friedrich Christian August 1829—1880)——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爵。——第 209 页。
- 弗兰契斯科第五 (Francesco V 1819—1875)——摩地那公爵 (1846—1859)。——第 436 页。
- 皮格萨 (Piegsa)——波兰教师,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第 254 页。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 温和的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 (1848—1846), 在自由党的支持下, 废除了谷物法 (1846)。——第 312、334、335 页。
- 皮勒斯多夫, 弗兰茨 (Pillersdorf, Franz 1786—1862)——男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1848 年任首相 (5 月—7 月)。——第 127 页。
- 加格恩, 亨利希 (Gagern, Heinrich 1799—1880)——男爵, 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和主席, 属于中间派右翼; 曾任帝国首相 (1848 年 12 月—1849 年 3 月)。——第 258、400、414、467、482、483、507 页。
- 加格恩, 马克西米利安 (Gagern, Maximilian 1810—1889)——男爵, 德国官吏,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亨利希·加格恩之弟。——第 457 页。

加内龙, 奥古斯特·伊波利特 (Ganne-ron, Auguste Hippolyte 1792—1847) ——法国工业家, 银行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 133 页。

卢格, 阿尔诺德 (Ruge, Arnold 1802—1880) ——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 1866 年以后是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419、421—430 页。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俄国皇帝 (1825—1855)。——第 109、207、344—348、407、542 页。

汉泽曼, 大卫 (Hanseman, David 1790—1864) ——大资本家, 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 1848 年 3 月至 9 月任普鲁士的财政大臣, 实施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 32、34、35、51、52、56—58、65、72、84、88、89、116、117、120、182、188、192、206、212、213、219、220、222、230、233、240—246、251、254、257、270—272、281、292、293—294、307—317、321、325、326、331、348、350、351、370、388、433、443、462、468、469、472、490、497、500、510、592 页。

东巴尔, 克利斯托夫·约瑟夫·亚历山大·马蒂约·德 (Dombasle, Christophe Joseph Alexandre Mathieu de 1777—1843) ——法国著名的农学家。——第 504 页。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 (Struwe, Gustav 1805—1870)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新闻记者; 1848 年巴登起义和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起义失败后离开德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521、525 页。

六 画

安内克, 玛蒂尔达·弗兰契斯卡 (Anneke, Mathilde Franziska 1817—1884) ——德国女作家, 1848—1849 年曾为民主报刊撰稿; 弗里德里希·安内克的妻子。——第 190、191、586 页。

安内克, 弗里德里希 (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 ——普鲁士的炮兵军官; 1846 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军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 1846 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 “新科伦报”编辑,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中校; 后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北方的一边。——第 189—192、202、578、579、586、591 页。

毕若·德·拉·比贡利, 托马·罗伯尔 (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 Robert 1784—1849) ——法国元帅; 七月王朝时期的下议院议员, 奥尔良党人, 1848—1849 年是阿尔卑斯山部队的总司令, 立法会议员。——第 163 页。

毕尔格, 哥特弗利德·奥古斯特 (Bürger, Gottfried August 1747—1794) ——德国著名诗人。——第 41 页。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urgers, Heinrich 1820—1878) ——德国激进政论家, “莱茵报”的撰稿人 (1842—1843), 1848 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盟员,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从 1850 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 (1852) 中被判处六年徒刑; 后成为自由党人。——第 13、577、583、591、600 页。

达奈 (Dane)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

- 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 363 页。
- 达梅姆，爱德华·阿道夫 (Damesme, Edouard Adolff 1807—1848) ——法国将军，反动分子，在镇压 1848 年六月起义时指挥别动队。——第 144、145、171 页。
-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 (Dahlmann, Friedrich Christoph 1785-1860)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 265、458 页。
- 达斯普雷，康斯坦丁 (D'Aspre, Constantin 1789—1850) ——男爵，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意大利的 1848—1849 年革命。——第 435 页。
- 米格尔，唐 (Miguel Dom 1802—1866) ——葡萄牙国王 (1828—1834)。——第 177、346 页。
- 米尔德，卡尔·奥古斯特 (Milde Karl August 1805—1861) ——西里西亚的大厂主，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商业大臣 (1848 年 6 月—9 月)，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主席，属于右派。——第 31、219、243、281、293、341、348、443、461 页。
- 米拉波，奥诺莱·加布里埃尔 (Mirabeau Honore Gabriel 1749—1791)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利益的代表者。——第 107、265 页。
- 米特迈尔，卡尔 (Mittermaier, Karl 1787—1867) ——德国法学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中间派左翼的领导人之一。——第 294 页。
- 米努托利，尤利乌斯 (Minutoli, Julius 1805—1860) ——普鲁士官吏和外交家；1847—1848 年是柏林警察总监。——第 42、43 页。
- 列文 (Leven) ——德国民主主义者。——第 596 页。
- 列曼·奥尔拉，彼得·马丁 (Lehmann Or-la, Peter Martin 1810—1870) ——丹麦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祖国报”编辑 (1839—1842)，1848 年是不管部部长。——第 286 页。
-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 (Lelewel, Joachim 1786—1861) ——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 年参加波兰起义，为波兰流亡民主派领袖之一，1847—1848 年任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员。——第 390、395、403、404、424 页。
- 列奥波特一世 (Leopold I 1790—1865) ——比利时国王 (1831—1865)。——第 367、370、448、449、518 页。
- 多尔内斯，奥古斯特 (Dornès, August 1799—1848) ——法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共和主义者，1848 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第 145 页。
- 多布尔霍夫，安东 (Dobhoff, Anton 1800—1872) ——男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 年是商业大臣 (5 月) 和内政大臣 (7 月—9 月)。——第 587 页。
- 吉尔，乌利希·弗兰茨 (Kyll, Ulrich Franz) ——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是科伦出席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后来是进步主义者。——第 496 页。
- 吉尔克 (Gierke) ——普鲁士官吏，自由

- 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农业大臣（1848年6月—9月）。——第326—331、361、362、364页。
-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约384—322）——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284页。
- 亚尼舍夫斯基，杨·赫利佐斯托姆（Janiszewski, John Chrysostom 1818—1891）——波兰神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第411、412、413、415页。
- 伊曼特，彼得（Imandt, Peter）——德国教师，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来是政治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的支持者。——第596页。
- 伊普西朗蒂，亚历山大（Ypsilanti Alexander 1792—1828）——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莫尔达维亚1821年起义的组织者，起义失败后逃往奥地利，被捕，一直监禁到1827年。——第177页。
- 乔治·桑（George sand 1804—1876）——著名的法国女作家，著有长篇社会小说多种，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第403页。
- 齐茨，弗兰茨（Zitz, Franz 1803—1877）——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第15页。
- 艾森曼，哥特弗利德（Eisenmann, Gottfried 1795—1867）——德国政论家，医生；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
- 员，属于中间派，后来属于左派。——第265页。
- 考尼茨，温采尔·安东（Kaunitz, Wenzel Anton 1711—1794）——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所谓文明的专制制度的拥护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凶恶的敌人。——第95页。
- 西蒙斯，路德维希（Simons, Ludwig 1803—1870）——德国法学家，反动分子；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后来担任司法大臣（1849—1860）。——第229、296、338、339页。
- 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贵族特权的维护者；公元前184年被选为监察官，他监察之严格是人所共知的。——第305、341页。
- 托尔瓦德森，倍尔特尔（Thorvaldsen, Bertel 1768—1844）——著名的丹麦雕刻家。——第23页。

七 画

- 贝多，玛丽·阿尔丰斯（Bedeau, Marie 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温和的共和主义者。——第145页。
- 贝克尔，尼古劳斯（Becker, Nicolaus 1809—1845）——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第163页。
- 贝克尔，费里克斯（Becker, Felix）——法国诗人和革命家，曾参加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1848年2—3月在巴黎发起组织比利时军团。——第449页。
-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科伦工人业主联合会的

- 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西德意志报”编辑(1849年5月—1850年7月);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被告之一(1852);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497、580、591、596页。
- 贝恩施(Behnsch)——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198、207、242、254—256页。
- 贝塞尔(Besser)——普鲁士官吏,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第252—254页。
- 贝尔格,菲利浦(Berg, Philipp 1815—1866)——普鲁士天主教牧师,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205、213、293—296、462页。
- 贝伦兹,尤利乌斯(Berends, Julius 生于1817年)——柏林一印刷厂厂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71、75—77、79、80、83、85、87、104、186、257页。
- 贝凯拉特,海尔曼(Beckerath, Hermann 1801—187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48年8月—9月任帝国政府的财政大臣。——第469、474、478、592页。
- 贝泽勒尔,威廉·哈特维希(Beseler, Wilhelm Hartwig 1806—1884)——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临时政府的首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292页。
- 杜蒙,约瑟夫(Dumont, Joseph 1811—1861)——德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温和自由主义者;从1831年起是“科伦日报”的发行人。——第158、160—161、163、438、496、536页。
-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Du-faure, Jules Armand 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1848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1848年10月—12月为卡芬雅克政府的内政部长。——第180页。
- 杜沙特尔,沙尔(Duchâtel, Charles 1863—1867)——法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曾任内政部长(1839, 1840—1848年2月)。——第34、58、116、117、218、244、245、270、462页。
- 杜厄斯堡,弗兰茨(Duesberg, Franz 1793—1872)——普鲁士反动的国家活动家,1846年到1848年三月革命期间是财政大臣。——第32页。
- 杜维维耶,弗兰西阿德·弗略吕斯(Du-vivier, Franciadé Fleurus 1794—1848)——法国将军,曾参加镇压1848年的六月起义。——第144、145、150、173页。
- 杜维尔努阿,亨利希·古斯达夫(Duvernoy, Heinrich Gustav 1802—1890)——维尔腾堡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自由派内阁的内政大臣(1848—1849)。——第268页。
- 沃尔弗(Wolff)——德国官吏,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214页。
- 沃尔弗,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职业是教师,西里西亚一个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34—1839年被囚于普鲁士的监狱中;1846—1847年是布鲁塞尔共

- 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从1848年3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与战友。——第5、13、582、591、596页。
- 沃尔弗，斐迪南(Wolf, Ferdinand)——德国政论家，1846—1847年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离开德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后来放弃了政治活动。——第13页。
- 沃尔弗斯(Wolfers)——德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原籍比利时，1848年是“科伦日报”撰稿人和编委；后来成了波拿巴主义者的奸细。——第158、160—166、332、333、536页。
- 里茨(Ritz)——普鲁士官吏，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55、56、185、207、339页。
- 里德尔，阿道夫·弗里德里希·约翰(Riedel, Adolf Friedrich Johann 1809—1872)——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87页。
- 里廷豪森，摩里茨(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撰稿人，科伦民主协会会员；第一国际的成员，后来(1884年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第582、583页。
- 克劳泽(Krause)——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第240页。
- 克劳特，威廉(Clouth, Wilhelm)——科伦一印刷厂老板，“新莱茵报”从1848年6月1日至8月27日在该厂印刷。——第230页。
- 克路斯，阿道夫(Clu, Adolph 卒于1889年后)——德国工程师，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是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的书记，1849年流亡美国；在50年代和马克思、恩格斯经常通信，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许多民主报纸撰稿。——第575、576页。
-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领袖；1653年起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摄政大臣。——第81、265、482页。
- 克雷门斯，弗里德里希·雅科布(Clemens, Friedrich Jacob 1815—1862)——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第413页。
- 利奥，亨利希(Leo, Heinrich 1799—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极端反动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的辩护人，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之一。——第405页。
- 利济斯基(Lisiecki)——波兹南的普鲁士官吏，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339页。
- 利希诺夫斯基，费里克斯(Lichnowski, Felix 1814—1848)——公爵，普鲁士军官，反动分子，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在1848年9月法兰克福起义期间为人民所杀。——第348—349、409、414、415、416、417、418、538、589页。
- 佐美尔，约翰·弗里德里希·约瑟夫(Sommer, Johann Friedrich Joseph

- 1793—1856)——普鲁士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214页。佐尔姆斯-利希, 路德维希(Solms-Lich, Ludwig 1805—1880)——公爵, 普鲁士地主, 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 莱茵省省议会主席(1837—1845), 后来是1847年第一届联合议会主席。——第32页。
- 李奇(Ricci)——撒丁王国的外交官, 驻法国大使。——第515页。
- 李希特尔, 卡尔(Richter, Karl 1804—1869)——德国牧师, 神学教授;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第221、222页。
- 希登哈根(Hildenhagen)——德国牧师,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第340页。
- 希尔什菲尔德, 亚历山大·阿道夫(Hirschfeld, Alexander Adolf 1787—1858)——普鲁士将军, 1848年极端残酷地镇压波兹南起义。——第232、348页。
- 严森, 约翰·约瑟夫(Jansen, Johann Joseph 1825—184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家之一, 哥特沙克的支持者; 因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被枪杀。——第192页。
- 沙佩尔, 卡尔(Schapper, Karl 约1812—187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1848年9月25日至11月15日被监禁在狱中; 和马克思、施奈德尔第二等同为1849年2月8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的被告; 1849年2—5月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主席;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是伦敦的“左”倾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 1856年又和马克思接近;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5、432、433、497、580、582、583、595页。
- 庇护九世(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第434页。
- 辛辛纳图斯, 鲁齐乌斯·昆克提乌斯(Cincinnatus, Lucius Quinctius 公元前5世纪)——罗马政治活动家, 贵族, 根据传说他是朴实和刚毅的化身。——第260、261、262页。
- 亨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罗宾斯坦-艾贝斯道弗(Heinrich LXXII Reus-Lobenstein-Ebersdorf 1797—1853)——德意志一小邦弟弟罗伊斯的大公(1822—1848)。——第260页。

八 画

- 采什科夫斯基, 奥古斯特(Cieszkowski, August 1814—1894)——波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第260、261页。
- 阿蒙(Ammon)——普鲁士官吏, 1848年任杜塞尔多夫检察官。——第526页。
- 阿朔夫(Aschoff)——普鲁士将军, 柏林卫戍司令; 1848年4月—5月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挥官。——第42、43页。
- 阿梯拉(Attila 卒于453年)——匈奴领袖(433—453)。——第436页。
- 阿贝尔, 米歇尔·比埃尔·阿列克西斯(Hébert, Michel-Pierre Alexis 1799—1887)——法国的法学家和保守派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议会议员(1834—1848); 1841年起是王国法庭的总检察长, 曾任司法大臣(1847年—1848年2

- 月)。——第 204 页。
- 阿尔宁·劳科夫,亨利希·亚历山大 (Arnim-Suckow, Heinrich Alexander 1798—1861) ——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曾任外交大臣 (1848 年 3 月 21 日—6 月 19 日)。——第 49、50、73 页。
- 阿伦特,恩斯特·摩里茨 (Arndt, Ernst Moritz 1769—1860) ——德国作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曾积极参加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受民族主义的束缚;主张君主立宪;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 418 页。
- 阿贝格,布鲁诺·埃尔哈特 (Abegg, Bruno Erhard 1803—1848) ——普鲁士官吏,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第 301、302 页。
- 阿伦茨,埃基迪乌斯·鲁道夫·尼古拉斯 (Arntz, Aegidius Rudolf Nicolaus 1812—1884) ——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 229 页。
- 阿尔宁·博伊岑堡,阿道夫·亨利希 (Arnim-Boitzenburg, Adolf Heinrich 1803—1868) ——伯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反动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曾任内政大臣 (1842—1845) 和首相 (1848 年 3 月 19 日—29 日)。——第 230 页。
- 阿基米得 (Archimedes 公元前约 287—212) ——古希腊的伟大数学家和机械学家。——第 329 页。
- 阿基比阿德 (Alcibiades [Ἀλκιβιάδης] 约在纪元前 451—404) ——雅典政治活动家和统帅。——第 550 页。
-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 ——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最杰出的诗人,“疯狂的罗兰”的作者。——第 402、409 页。
- 阿布拉莫维奇,伊格纳策 (Abramowicz, Ignaz 1793—1867) ——波兰军官,1844 年起任华沙警察局长。——第 344 页。
- 拉沃,弗兰茨 (Raveaux, Franz 1810—1851) ——德国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是科伦出席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代表,属于中间派左翼;瑞士的帝国委员,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巴登临时政府委员,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离开德国。——第 15、17 页。
- 拉萨尔,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和律师,1848—1849 年曾参加莱茵省的民主运动;60 年代初倾向于工人运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 (1863) 的奠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来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 596 页。
- 拉图尔,泰奥多尔 (Latour, Theodor 1780—1848) ——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君主专制的拥护者;1848 年是陆军大臣;1848 年 10 月为维也纳起义者所杀。——第 538、540 页。
- 拉梅耐,费里西德 (Lamennais, Félicité 1782—1854) ——法国神父,政论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 165 页。
- 拉马丁,阿尔丰斯 (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 ——法国诗人,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40 年代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 年任外交部长,是临时政

- 府实际上的首脑。——第 135、138、153、428、447、516、517、532 页。
- 拉登堡,阿达尔贝特(Ladenberg, Adalbert 1798—1855)——普鲁士反动官僚的代表之一,曾任文化、教育和卫生事务大臣(1848—1850)。——第 204 页。
- 拉马克,马克西米利安(Lamarque, Maximilien 1770—1832)——法国将军,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卓越活动家之一。——第 168 页。
- 拉多维茨,约瑟夫(Radowitz, Joseph 1797—1853)——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宫廷奸党的代表人物;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右派的领导人之一。——第 348、409—411、425、459、469、471 页。
- 拉德茨基,约瑟夫(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奥地利元帅,1831 年起指挥在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军队,1848—1849 年残酷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第 95、114、141、144、425、435—436、438—440、445、507、524 页。
-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Raspail, Francois 1794—1878)——卓越的法国学者,自然科学家,政论家和社会主义者,接近革命无产阶级;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制宪议会的议员。——第 167 页。
-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路易·莱昂(Lamoricière, Christophe Louis Leon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 年积极参加镇压六月起义,后来是卡芬雅克政府的陆军部长(6 月—12 月),制宪议会的议员。——第 133、144、145、172、173、175 页。
- 拉罗什雅克兰,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La Rochejaquelein, Henri Auguste George 1805—1867)——侯爵,法国政治活动家,贵族院议员,正统派领导人之一,1848 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后来是第二帝国的参议员。——第 147、156、165、357 页。
- 罗素,约翰(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846—1852 和 1865—1866)。——第 227、426、429 页。
- 罗伊特(Reuter, 大约卒于 1860 年)——普鲁士官吏,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 54、55、58、59、214、223 页。
- 罗泰克,卡尔(Rotteck, Karl 1775—1840)——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第 81 页。
- 罗日埃,沙尔·拉图尔(Rogier, Charles-Latour 1800—1885)——比利时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7—1852 年任内政大臣。——第 204、519 页。
- 罗霍夫,古斯塔夫·阿道夫(Rochow, Gustav Adolf 1792—1847)——反动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普鲁士的内政大臣(1834—1842)。——第 32 页。
- 罗生克兰茨,卡尔(Rosenkranz, Karl 1805—1879)——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和文学史家。——第 407 页。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领(1793—

- 1794)。——第 162、164 页。
- 罗曼诺夫王朝(Романовы)——俄国沙皇的王朝(1613—1917)。——第 343 页。
- 帕耶,让·巴蒂斯特(Payer, Jean Baptiste 1818—1860)——法国学者,1848 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第 165 页。
- 帕托夫,艾拉兹穆斯·罗伯持(Patow, Erasmus Robert 1804—1890)——男爵,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康普豪森内阁的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 年 4—6 月)。——第 116、123、124、183、328、361 页。
- 帕麦斯顿,亨利·约翰(Palmerston, Henry John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开始活动时是托利党人,1830 年起是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 1835—1841 和 1846—1851),内政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515—517 页。
- 帕里乌斯,鲁道夫(Parisius Rudolf 1818—1905)——普鲁士法官,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后来是进步主义者。——第 54、55、59、185、245、246、298 页。
- 波勒(Pohle)——普鲁士法官,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第 217 页。
- 波旁王朝——法国的王朝(1589—1792, 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21、36、100、561 页。
- 波旁王朝——那不勒斯的王朝(1735—1806 和 1814—1860)。——第 21—24 页。
- 波克什夫尼茨基(Pokrzywnicki)——普鲁士官吏,原籍波兰,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 216 页。
- 图恩,列奥(Thun, Leo 1811—1888)——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原籍捷克,反动分子,弗兰茨·约瑟夫的最亲近的顾问之一,文化教育大臣(1849—1860)。——第 126—128 页。
- 图尔恩-翁特-塔克西斯,卡尔·亚历山大(Thurn und Taxis, Karl Alexander 1770—1827)——德意志一邦的君主,享有在德意志一些邦中组织邮政的世袭特权。——第 387 页。
- 图尔克,列奥彼得(Turck, Leopold 1797—1887)——法国医生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948 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第 501、502、505 页。
- 佩罗,本扎曼·比埃尔(Perrot, Benjamin Pierre 1791—1865)——法国将军,1848 年曾参加镇压六月起义。——第 66、175 页。
- 佩尔曼,安东(Pellmann, Anton)——德国法学家,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第 90 页。
- 佩尔茨,爱德华(Pelz, Eduard)——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是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德意志人民报”和“工人总汇报”的编辑。——第 16 页。
- 弥勒(Müller)——德国牧师,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第 81、82、85 页。
- 弥勒(Müller)——1848 年是沃林根(在莱茵省)工人联合会会员。——第 596 页。
- 弥勒,弗里德里希(Müller, Friedrich 生于 1811 年)——普鲁士官吏,科伦警察厅长,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 90、454、

- 497页。
- 奈特(Nethe)——普鲁士官吏,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第340页。
- 奈克尔,雅克(Necker, Jacques 1732—1804)——法国政治活动家,在18世纪70—80年代数度被任命为财政总管,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曾企图进行某些改革。——第36、313页。
- 果登,阿道夫(Goeden, Adolf)——波兹南的德国医生,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395、396、400、402、413、415页。
- 劳麦,弗里德里希(Raumer, Friedrich 1781—1873)——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1848年是帝国驻巴黎的使节,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427页。
- 法依,盖尔哈特(Fay, Gerhard)——德国法学家,自由主义者。——第90页。
- 芬克,格奥尔格(Vincke, Georg 1811—1875)——男爵,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右派领导人之一。——第212、325、469、471页。
-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第64页。
- 肯普夫(Kämpf)——德国教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302页。
- 迪尔施克(Dierschke)——普鲁士法官,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83、195、196、360、361、364、365页。
-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家。——第224、227、305、370、474页。
- 林普勒尔,奥(Rimpler, O.)——普鲁士退伍的炮兵军官,1848年7月起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挥官。——第510页。
- 屈韦特尔,弗德里希(Kühlwetter, Friedrich 1809—1882)——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内政大臣(1848年6月—9月)。——第186、187、195、196、200、209、210、219、222—228、255、256、281、320—322、451、602页。

九 画

- 施米茨(Schmitz)——科伦工人。——第601页。
- 施泰因,卡尔(Stein, Karl 1757—1831)——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1804—1808年期间担任过一系列的高级职务,曾参加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倡议在普鲁士进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第306页。
- 施泰因,尤利乌斯(Stein, Julius 1813—1889)——西里西亚的教师,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104、260、460、461、497、510、529页。
- 施梅林,安东(Schmerling, Anton 1805—1893)——奥地利国家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48年是帝国内政大臣(7月—12月),首相和外交大臣(9月—12月)。——第348、507页。
- 施图普,亨利希·约瑟夫(Stupp, Hein-

- rich Joseph)——普鲁士官吏, 教权派;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106—109、339、370页。
- 施米特, 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弗兰茨 (Schmidt, Ernst Friedrich Franz)——德国牧师,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第413、414页。
- 施韦林, 马克西米利安 (Schwerin, Maximilian 1804—1872)——伯爵, 普鲁士贵族和官僚的代表之一; 曾任文化、教育和卫生事务大臣 (1848年3月—6月),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 后来成了民族自由主义者。——第73、83、100页。
- 施利希庭 (Schlichting)——普鲁士军官。——第195页。
- 施奈德尔 (Schneider)——普鲁士官吏,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 后来属于中间派左翼。——第259—263、276页。
- 施瓦尔策, 恩斯特 (Schwarzer, Ernst 1808—1860)——奥地利官吏和政论家, 公共工程大臣 (1848年7月—9月)。——第587页。
- 施莱尼茨, 亚历山大 (Schleinitz, Alexander 1807—1885)——伯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反动分子, 曾任外交大臣 (1848年6月, 1849—1850, 1858—1861)。——第116、232页。
- 施略费尔, 弗里德里希·威廉 (Schlöffel, Friedrich Wilhelm 1800—1870)——西里西亚的厂主, 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第16、414、567页。
- 施滕策尔, 古斯塔夫·阿道夫 (Stenzel, Gustav Adolf 1792—1854)——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第372、374—379、381—385、389、394、395、398、402页。
- 施万贝克, 阿列克西斯 (Schwanbeck, Alexis)——德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 “科伦日报”编委。——第536页。
- 施莱根施坦, 路德维希·罗特·冯 (Schreckenstein, Ludwig, Roth von 1789—1858)——男爵, 普鲁士将军, 封建贵族的代表, 1848年6月—9月是陆军大臣。——第19、100、116、183、194、195、197—199、208、212、253—257、348、461页。
- 施奈德尔第二, 卡尔 (Schneider II, Karl)——德国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案中的辩护人。和马克思、沙佩尔一起同为1849年2月8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的被告;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 (1852) 的辩护人。——第90、580、583页。
- 施泰因埃克尔, 克利斯提安·卡尔·安东·弗里德里希 (Steinäcker, Christian Karl Anton Friedrich 1781—1851)——男爵, 普鲁士将军, 反动分子, 1848年是波兹南的要塞司令。——第95、232页。
- 施纳普汉斯基 (Schnapphahnski)——见李希诺夫斯基, 费里克斯。
- 施莱艾尔马赫, 弗里德里希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1768—183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神学家和传教士。——第87页。
- 科施, 拉法埃尔·雅科布 (Kosch, Raph-

- ael Jacob 1803—1872) —— 德国医生,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第462页。
- 科尔恩(Korn)——德国民主主义者, 1848年柏林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第101页。
- 科布顿, 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论者, 反谷物法同盟的发起人之一。——第160、293、335页。
- 科尔夫, 海尔曼(Karff, Hermann)——普鲁士军官, 因政治信仰于1847年被革除军职; 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的负责发行人; 后流亡美国。——第523、578、579、581、586、590、599页。
- 科尔黛, 夏绿蒂(Corday, Charlotte 1768—1793)——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反革命阴谋的参加者, 杀害马拉的凶手, 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第163页。
- 科采布, 奥古斯特(Kotzebue, August 1761—1819)——德国反动作家和政论家。——第162页。
- 科隆布,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Colomb, Friedrich August 1775—1854)——普鲁士将军, 反动分子, 1843—1848年是波兹南的普鲁士军队司令。——第95、110、232、348、529页。
- 科克里尔, 约翰(Cockerill, John 1790—1840)——英国工业家。——第374页。
- 科西迪耶尔, 马尔克(Caussidière, Marc 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巴黎警察局长, 制宪议会的议员, 1848年6月流亡英国。——第181、334、557页。
- 科布尔克家族(Coburg)——德国的一个公爵家族, 比利时、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王朝或属于这个家族, 或和这个家族有关系。——第178页。
- 勃丹, 沙尔(Baudin, Charles 1784—1845)——法国海军上将。——第22、23页。
- 勃朗, 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 1848年是临时政府的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的主席; 站在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第334、550页。
- 勃鲁姆, 罗伯特(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记者; 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 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的保卫战; 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把他杀害。——第18、399、400、402、411页。
- 勃律盖曼, 卡尔·亨利希(Brü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自由主义者; 1845—1855年为“科伦日报”主编。——第158、160、161、163、166、440、498、536页。
- 约翰(Johan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 1848年6月至1849年12月是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第255、455、457页。
- 约丹, 威廉(Jordan, Wilhelm 1819—1904)——德国资产阶级作家,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 在波兰问题辩论后转到中间派方面。——第390、401—409、411、413、428、438页。
- 约纳斯, 路德维希(Jonas, Ludwig 1797—1859)——德国神学家, 柏林的牧师;

-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87页。
- 洛埃 (Loë)——男爵，普鲁士地主，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229页。
- 罗兰，伊波利特 (Rolin, Hippolyte 1804—1888)——比利时律师，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党首领，曾任公共工程大臣 (1848—1850)。——第370页。
- 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 (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1848—1849年革命期间是温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中间派左翼领袖；后来宣传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第116、117、186、187、204、213、318、462、468、469页。
- 威纳尔，约翰·彼得 (Werner, Johann Peter)——德国律师，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18页。
- 威廉一世 (1797—1888)——普鲁士王储，普鲁士国王 (1861—1888)，德国皇帝 (1871—1888)。——第64、66、112、469、490、500、529页。
- 品托，伊萨克 (Pinto, Isaac 1715—1787)——荷兰的大证券交易商，经济学家。——第308、312、462页。
- 品德尔，尤利乌斯·海尔曼 (Pinder, Julius Hermann 生于1805年)——普鲁士官吏，温和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西里西亚总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212页。
- 济多夫，阿道夫 (Sydow, Adolf 1800—1882)——德国牧师和神学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85、86页。
- 济贝尔特 (Siebert)——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245页。
- 查理·阿尔伯特 (Charles Albert 1798—1849)——撒丁国王 (1831—1849)。——第434—436、438、439、445页。
- 查理·路易 (Charles Louis 1799—1883)——路加公爵 (1815—1847)，1847年起是帕马公爵，1849年退位。——第21页。
-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 (1824—1830)。——第162页。
- 哈尼，乔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宪章运动左派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的编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第136页。
- 哈普雷希特，亨利希 (Harprecht, Heinrich 卒于1859年)——维尔腾堡的律师，反动官吏。——第268页。
- 若特兰，律西安·列奥波特 (Jottrand, Lucien-Léopold 1804—1877)——比利时法学家和政论家，40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任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主席。——第448页。
- 耶拉契奇，约瑟夫 (Jellacic, Joseph 1801—1859)——伯爵，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总督，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和奥地利的1848—1849年革命。——第494、507、511、529、538、540、542页。
- 美延多尔夫，彼得·卡季米罗维奇 (Мейендорф, Пет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1796—1863)——男爵，沙皇俄国前外交官，驻柏林大使 (1839—1850)。——第348页。

十 画

- 马拉,让·保尔(Marat, Jean Paul 1743—1793)——法国政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第261页。
- 马提,卡尔(Mathy, Karl 1807—1868)——巴登政论家,官吏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269、323、324页。
- 马鲁,茹尔·爱德华(Malou, Jules Edouard 1810—1886)——比利时的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天主教派的拥护者,1844—1847年是财政大臣。——第519页。
- 马利,亚历山大(Marie, Alexandre 1795—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是临时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部长,后来是卡芬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第180页。
- 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传记材料)。——第5—7、9、432、451—454、493、522、523、525、577—580、582、583、586—588、590、602、604、605页。
- 马拉斯特,阿尔芒(Marrast 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国民报”编辑;1848年是临时政府委员和巴黎市长。——第135、153、162、163、180、555页。
-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牧师,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人,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312页。
- 马米阿尼,托伦西奥(Mamiani Torenzio 1799—1885)——伯爵,意大利诗人和政论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教皇领的内务大臣(1848年5月—8月)——第434页。
- 海奈(Heyne)——勃罗姆堡(在波兹南)市市长,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216页。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46、117、184、205、206、226、246、267、281、315、326、341、441、494、515页。
- 海姆佐特,亨利希(Heimsoeth, Heinrich)——普鲁士官吏,1848年是科伦律师。——第526页。
-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525页。
- 海尔根汉,奥古斯特(Hergenhan, August 1804—1874)——德国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48—1849年是拿骚的大臣,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17页。
- 埃塞尔,克利斯提安·约瑟夫(Esser, Christian Joseph 约生于1809年)——德国工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1849年是“自由、博爱、劳动”的编辑。——第192、596页。
- 埃塞伦,克利斯提安(Essellen, Christian 1823—185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1848年是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工人总汇报”的编辑;后流亡美国。——第16页。
- 埃尔斯特纳,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

- (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西里西亚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激进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新奥德报”的编辑之一。——第83、87、104、196页。
- 埃塞尔第一,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Esser I, Johann Heinrich Theodor)——普鲁士官吏,律师,教权派,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副主席,属于中间派。——第54、87、185、186、200页。
- 勒弗(Löw)——德国教授,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73—1876年是帝国国会议员,民族自由主义者。——第431页。
- 勒泽尔,彼得·格尔哈特(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制雪茄烟工人;1848—1849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席,“自由、博爱、劳动”的发行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1852)的被告之一;后来倾向于拉萨尔派。——第602、604页。
- 勒文宗,摩里茨(Löwinson, Moritz)——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柏林人民俱乐部的领导人之一,柏林第二届民主代表大会代表(1848年10月)。——第101页。
- 勒文施坦(Löwenstein)——德国民主主义者,学者,东方学家;1848年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主席,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代表(1848年6月)。——第16页。
- 勒奥尼达斯(Leonidas 公元前约488—480)——斯巴达国王;在希腊波斯战争期间统率斯巴达人的队伍,在德摩比利峡谷英勇地抗击波斯人。——第550页。
- 格林,雅科布(Grimm, Jacob 1785—1863)——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第370页。
- 格莱夫(Gräff)——普鲁士法官,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98、302、339页。
- 格罗曼,卡尔·威廉·格奥尔格(Grolmann, Karl Wilhelm Georg 1777—1843)——普鲁士军官,参加过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和夏恩霍斯特等一起制定军事改革的原则。——第253页。
- 格雷贝尔(Grebel)——普鲁士官吏,治安法官,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240、241、245、255页。
- 格拉博夫,威廉(Grabow, Wilhelm 1802—1874)——普楞茨劳市市长,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主席,属于右派。——第195—197、200、201、207、208、341页。
- 格奈泽瑙,奥古斯特·威廉·安东(Gneisenau, August Wilhelm Anton 1760—1831)——普鲁士将军、元帅和军事政治活动家;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垮后和夏恩霍斯特等一起制定军事改革的原则。——第253页。
- 格里斯海姆,卡尔·古斯塔夫(Griesheim, Karl Gustav 1798—1854)——普鲁士军官,反动分子,1848年是陆军部在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代表。——第

- 101—104、208、209页。
- 格拉德巴赫, 安东 (Gladbach, Anton 卒于 1873 年) ——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缪尔海姆 (在莱茵省) 出席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代表, 属于左派, 曾任柏林民主俱乐部的主席。——第 194、195、207—210、213、256、257、341、583 页。
- 特雷拉, 乌利斯 (Tr dat, Ulysse 1795—1879) —— 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1848 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 公共工程部部长 (1848 年 5 月—6 月)。——第 155 页。
- 特德斯科, 维克多 (Tedesco, Victor 1821—1897) —— 比利时律师, 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847—1848 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 里斯康士案的被告, 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 30 年徒刑; 1845 年释放。——第 448、449 页。
- 特雷斯科夫, 海尔曼 (Treskow, Hermann 1818—1900) —— 普鲁士军官, 1848 年和 1849 年曾参加反对丹麦的军事行动。——第 386 页。
- 特雷斯科夫, 西吉兹蒙特·奥托 (Treskow, Sigismund Otto) —— 德国商人, 1796 年起在奥文斯克 (波兹南) 置有产业。——第 379、386 页。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 —— 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81、162、172、253、265、270、271、325、343、344、561 页。
- 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 亲王, 拿破仑第一的外甥, 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51), 法国皇帝 (1852—1870)。——第 555、563、566 页。
- 夏扎尔, 比埃尔·艾曼纽尔·费里克斯 (Chazal, Pierre Emmanuel Felix 1808—1892) —— 男爵, 比利时将军, 1830 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任陆军大臣 (1847—1850, 1859—1866); 以前是在鲁塞尔的呢绒商人。——第 370 页。
- 夏恩霍斯特, 格尔哈特 (Schamhorst, Gorhard 1755—1813) —— 普鲁士将军; 1806 年普鲁士军队为拿破仑打败后任制订军事改革原则委员会的主席; 在 1813 年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第 253 页。
- 伦辛 (Lensing 生于 1783 年) —— 德国牧师,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 229 页。
- 晏奇 (Jentzsch) ——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第 321 页。
- 朔尔茨 (Scholz) ——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第 200、201 页。
- 唐茹瓦, 让·弗朗斯瓦·波利尼斯 (Denjoy, Jean François Polynice 1809—1860) ——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保皇派, 1848—1849 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 后为立法会议员。——第 567 页。
- 倍尔利, 卡尔·彼得 (Berly, Karl Peter 1781—1847) —— 德国新闻记者, “法兰克福总邮报” 编辑 (1829—1847), 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政府的密探。——第 506 页。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 (传记材料) —— 第 5、6、7、13、552—558、563、565—571、581、582、583、590、591、595、600、601 页。

荣克, 格奥尔格 (Jung, Georg 1814—1886)——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莱茵报” 负责发行人之一,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第 49、57、58、87、104、200 页。

翁鲁, 汉斯·维克多 (Urruh, Hans Victor 1806—1886)——普鲁士的工程师,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的领导人之一, 10 月起担任国民议会的主席; 后来是进步主义者的政党的创始人之一, 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460—462 页。

泰梅, 约多库斯·多纳图斯·胡贝尔图斯 (Temme, Jodokus Donatus Hubertus 1798—1881)——德国法学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 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第 42、57、101、256 页。

乌尔班 (Urban)——德国兽医; 1848 年 3 月柏林街垒战的领导人之一, 1848 年 6 月 14 日袭击军械库的参加者。——第 101 页。

茨魏费尔 (Zweiffel)——普鲁士官吏, 反动分子, 科伦的最高检察官,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 97、192、203、229、232、233、578、590 页。

纳茨梅尔 (Natzmer 卒于 1890 年)——普鲁士军官; 1848 年 6 月 14 日指挥守卫柏林军械库的部队, 拒绝向人民射击; 被判处 15 年徒刑, 1849 年逃走, 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来到英国, 1852 年起又流亡到奥地利。——第 101—104 页。

哥特沙克, 安得列阿斯 (Gottschalk, Andreas 1815—1849)——德国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 1848 年 4 月—6 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 从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立场来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德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第 189、190、202、577、591、602 页。

涅谢尔罗迭, 卡尔·瓦西里也维奇 (Не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伯爵, 沙皇俄国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外交大臣 (1816—1856)。——第 342—348 页。

十一画

梅策 (Mätze)——德国教师,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第 205、210、242 页。

梅特涅, 克雷门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反动分子; 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 95、436、439 页。

梅维森, 古斯塔夫 (Mevissen, Gustav 1815—1899)——德国银行家, 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 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第 212 页。

梅利奈, 弗朗斯瓦 (Mellinet, François 1768—1852)——比利时将军, 原籍法国, 1830 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各届主席, 里斯康士案的被告之一, 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 30 年徒刑; 1849 年 9 月被赦免。——第 370、448、449、450 页。

- 梅尔克 (Mærcker) —— 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 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司法大臣 (1848年6月—9月)。——第251、252、351、476页。
-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德维克 (Mieroslawski, Ludwig 1814—1878) —— 波兰政治军事活动家, 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曾参加1846年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 1848年的三月革命才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1848年领导波兹南起义, 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 1849年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 在50年代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 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被任命为波兰民族政府的执政, 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第395、424页。
- 莫尔, 约瑟夫 (Moll, Joseph 1812—1849) ——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职业是钟表匠;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年7月—9月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主席,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1848年科伦九月事件后流亡伦敦, 改名后很快就回到德国, 在德国各地区进行宣传鼓动; 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在牟尔克之战中阵亡。——第5、497、577、580、595页。
- 莫内克, 爱德蒙 (Monecke, Edmund) —— 德国大学生, 民主主义者。——第189页。
- 莫扎特, 沃尔夫干格·亚马多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 —— 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第433页。
- 莫尔特克, 卡尔 (Moltke, Karl 1798—1866) —— 伯爵,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国家活动家, 丹麦反革命派的首领, 1848年9月起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临时政府的主席。——第456、457页。
- 莫伊泽巴赫 (Meusebach) —— 普鲁士官吏, 保守派,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55页。
- 许采 (Schütze) —— 普鲁士法官,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341页。
- 许金, 列文 (Schücking, Levin 1814—1883) —— 德国作家; 1845—1852年是“科伦日报”的撰稿人; 曾写过大量的小品文。——第438—441页。
- 许费尔, 约翰·海耳曼 (Hüffer, Johann Hermann 1784—1855) —— 闵斯德市市长,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186—187页。
- 许泽尔, 约翰·汉斯·古斯塔夫·亨利希 (Hüser, Johann Hans Gustav Heinrich 1782—1857) —— 普鲁士将军, 反动军阀的代表之一, 1844—1849年是美因兹的卫戍司令。——第15、17、19、95、141页。
- 许岑多夫 (Schützendorf) ——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科伦工人业主联合会的会员。——第580页。
- 盖格尔, 威廉·阿尔诺德 (Geiger, Wilhelm Arnold) —— 普鲁士警官, 1848年任预审推事, 后为科伦警察厅长。——第191、432、433、452、453、601页。
- 盖尔索济, 约阿希姆·勒奈·泰奥菲尔 (Kersausie, Joachim René Théophile 1798—1874) —— 法国革命家, 1830年七月革命的参加者, 秘密社的卓越活动家; 1848年领导人权和公民权协会

- 行动委员会,是六月起义的军事计划的制定者;后来参加加里波第运动。——第 167、168、176 页。
-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Ge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1847 年至 1848 年 10 月是“德意志报”的编辑,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第 27、163 页。
-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杰出的德国哲学家,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人。——第 523 页。
- 康普茨,卡尔(Kamptz, Karl 1769—1849)——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司法大臣(1832—1842)。——第 231 页。
- 康坡巴索(Campobasso)——1848 年革命前是那不勒斯的警官。——第 21 页。
- 康格里弗,威廉(Congreve, William 1772—1828)——英国发明家。——第 142 页。
-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ph 1803—189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 年 3 月—6 月任普鲁士首相,奉行与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普鲁士驻中央政权的使节(1848 年 7 月—1849 年 4 月)。——第 28—37、39—41、54—57、58—61、64、65、71、72、74、80、81、85、92、100、101、110—113、116、117、123、182、187、212、220、222、227、258、293、443、452、457、458、462、467、471、472、475、500 页。
- 梯利,约翰(Tilly, Johann 1559—1632)——伯爵,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统帅,指挥天主教联盟的军队;1631 年 5 月梯利统率的军队向马格德堡发起进攻,抢劫了该城。——第 127 页。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曾任总理(1836, 1840);1848 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奥尔良党人;曾任共和国总统(1871—1873),屠杀巴黎公社起义者的刽子手。——第 163、180、355、357、484、501—505、507、513 页。
- 荷马(Homerus)——传说中的古希腊叙事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第 64 页。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他所代表的是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35、66、116、155、204、227、506、515—517、557 页。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 500 页。

十二画

- 博里斯(Borries)——普鲁士官吏,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第 240、251 页。
- 博马舍,比埃尔·奥古斯丹(Beaumarchais, Pierre Augustin 1732—1799)——杰出的法国剧作家。——第 284 页。
- 博伊恩,海尔曼(Boyen, Hermann 1771—1848)——普鲁士将军,原籍捷克;和

- 拿破仑作战期间负责组织后备军；曾任陆军大臣（1814—1819，1841—1847）——第 32、253、254 页。
- 博奈曼，弗里德里希·威廉·路德维希（Bornemann, Friedrich Wilhelm Ludwig 1798—1864）——德国法学家，自由主义者，司法大臣（1848 年 3 月—6 月），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第 116 页。
- 博尔夏特，弗里德里希（Borchardt, Friedrich）——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伦的律师，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 339、340、496 页。
- 博伊尔曼，摩里茨（Beurmann, Moritz）——普鲁士官吏，1848 年是波兹南总督。——第 110、399 页。
-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Beust, Friedrich 1817—1899）——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职，1848 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新科伦报”编辑之一（1848 年 9 月—1849 年 2 月），1848 年 10 月代表科伦工人联合会出席柏林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在会上捍卫了几乎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完全一致的纲领；1849 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革命后流亡瑞士。——第 604 页。
- 博德尔施文克，恩斯特（Bodelschwingh, Ernst 1794—1854）——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反动分子，1842 年起任财政大臣，1845 年至 1848 年 3 月任内政大臣。——第 32、81、254、270、319、321、350、351 页。
- 黑克尔（Hecker）——普鲁士法官，1848 年是科伦检察官。——第 191、202、203、230、294、521—526、552、578、600 页。
- 黑克尔，弗里德里希·卡尔（Hecker, Friedrich Karl 1811—1881）——巴登的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 4 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后流亡美国，参加美国内战，站在北部方面。——第 521—526 页。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最大的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极全面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第 166、408、523 页。
- 黑克舍尔，约翰·古斯塔夫（Heckscher, Johann Gustav 1797—1865）——德国法学家；曾任帝国司法大臣（1848 年 7 月—8 月）和外交大臣（1848 年 8 月—9 月），帝国政府驻意大利大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第 457、458 页。
- 普法尔（Pfahl）——普鲁士官吏，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第 199 页。
- 普富尔，恩斯特（Pfuell, Ernst 1779—1866）——普鲁士将军，反动军阀的代表人物之一；1832—1848 年是纽沙特尔省长；1848 年 3 月是柏林警备司令；5 月指挥镇压波兹南的起义；1848 年 9—10 月任首相和陆军大臣。——第 62、63、110、121、271、348、385、497、500、507、510、511、526 页。
- 普伦尼斯（Plonnis）——普鲁士官吏，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副主席，属于右派。——第 86 页。
- 普特卡默，奥伊根（Puttkamer, Eugen 1800—1874）——普鲁士官吏，1839—1847 年是柏林警察总监。——第 42、43

- 页。
-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 普什鲁斯基, 莱昂 (Przyluski, Leon 1789—1865)——曾任格尼兹诺和波兹南的大主教(1845—1865)。——第 220、372 页。
- 普路古尔姆, 比埃尔·昂勃鲁阿兹 (Plougoum, Pierre Ambroise 1796—1863)——法国官吏, 法学家, 议会议员(1846—1848)。——第 204 页。
- 普尔塔勒斯, 阿伯特 (Pourtalès Albert 1812—1861)——伯爵, 普鲁士外交家。——第 292 页。
- 舒尔泰 (Schulte)——德国民主主义者。——第 596 页。
- 舒尔茨 (Schultz)——普鲁士法官,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第 83、206、207 页。
- 舒尔采-德里奇, 海尔曼 (Schulze-Delitzsch, Hermann 1808—188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 60 年代是资产阶级进步分子政党的领袖之一, 企图以组织合作社的方式来使工人离开革命斗争。——第 79—81、83、252、340 页。
- 舒泽尔卡, 弗兰茨 (Schuselka, Franz 1811—1889)——奥地利政论家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 奥地利国会议员。——第 410、411 页。
- 菲力浦斯, 阿道夫 (Philipps, Adolf 1813—1877)——普鲁士官吏,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副主席, 属于中间派。——第 239 页。
- 菲克勒尔, 约瑟夫 (Fickler, Joseph 1808—1865)——德国新闻记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的巴登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第 295、323 页。
- 费奈迭, 雅科布 (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激进政论家,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 1848—1849 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第 30、163、453 页。
- 费尔德豪斯 (Feldhaus)——德国教师,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 255 页。
- 富尔德, 阿希尔 (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后来成为波拿巴主义者, 1849—1867 年曾数度担任财政部长的职务。——第 133 页。
- 富吉耶-丹维尔, 安都昂·刚丹 (Fouquier-Tinville, Antoine-Quentin 1746—1795)——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1793 年任革命法庭的公诉人。——第 449 页。
-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336 页。
- 曾弗, 艾米尔 (Senff, Emil)——波兹南的普鲁士法官,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第 395、397—399、402、404、413、415 页。
-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119、136 页。
- 敦克尔 (Duncker)——普鲁士官吏,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左翼的领导人之一。——第 33、56、296、297、

- 298、462页。
- 雅科比, 约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 ——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左派领导人之一, 70年代倾向于社会民主党人。——第84、258、259、263、264、293、294、296、301、318页。
- 莱宁根, 卡尔 (Leiningen, Karl 1804—1856) ——公爵, 巴伐利亚的将军, 反动分子, 曾任帝国首相 (1848年8月—9月)。——第426页。
- 傅阿德·埃芬蒂, 穆罕默德 (Fuad-Effendi, Mehement 1814—1869) ——土耳其的国家活动家, 1848年是多瑙河公国的政府委员, 血腥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50—60年代任外交大臣, 大维齐 (封建时代近东某些国家的高级官吏——译者注)。——第507、521页。
- 凯尔斯特, 赛米尔·哥特弗利德 (Kerst, Samuel Gottfried 1804—1875)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 后来成为进步主义者。——第409、412—415页。
- 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810—1859) ——那不勒斯国王 (1830—1859)。——第17—24、151、435、507、517页。
- 温采利乌斯 (Wencelius) ——德国法学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第97、339页。
- ### 十三画
- 奥尔堡 (Olberg) ——普鲁士军官, 1848年参加镇压波兹南的民族解放运动。——第110页。
- 奥托一世 (Otto I 1815—1867) ——巴伐利亚王子, 希腊国王 (1832—1862)。——第177页。
- 奥康奈尔, 丹尼尔 (O'Connell, Daniel 1775—1847) ——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 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领袖。——第118页。
- 奥康瑙尔, 菲格斯 (O'Connor, Feergus 1794—1855) ——宪章运动左翼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1848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118、119、136页。
- 奥伦治家族 (Orange) ——1572—1795年曾数度担任尼德兰总督, 1815年起为尼德兰王国的王朝。——第177、370页。
- 奥尔斯瓦特, 鲁道夫 (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接近资产阶级的自由贵族的代表, 曾任首相和外交大臣 (1848年6月—9月)。——第17、34、100、182、184、187、197、199、200、208、212、233、239、240、254、290、292、295、460、474、592页。
- 奥尔施佩格, 卡尔 (Auersperg, Karl 1783—1859) ——伯爵, 奥地利元帅, 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下奥地利指挥军队, 1848年10月积极参加镇压维也纳起义。——第529、540页。
- 奥斯滕多尔夫, 尤利乌斯 (Ostendorf, Julius 1823—1877) ——德国教育家, 温和自由主义者;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第413页。
- 塞纳尔, 安都昂·玛丽·茹尔 (Sénard, Antoine Marie Jules 1800—1885) ——法国法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6月任制宪议会主席, 1848年6月—10月是卡芬雅克政府的内政部长。——第148页。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 米格尔 (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 ——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 312、317、403、410、430、490、501 页。

塞巴斯提昂尼, 奥拉斯 (Sebastiani, Horace 1772—1851) ——伯爵, 法国元帅, 外交家; 曾任外交部长 (1830—1832), 驻伦敦大使 (1835—1810)。——第 155 页。

路易·拿破仑 (Louis-Napoléon) ——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菲力浦 (Louis Philippe 1773—1850) ——公爵, 奥尔良党人,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21、22、36、153、154、160、162、204、272、281、516、532、562、567 页。

路易十一 (Louis XI 1423—1483) ——法国国王 (1461—1483)。——第 420 页。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 ——法国国王 (1643—1715)。——第 385 页。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754—1793) ——法国国王 (1771—1792), 在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刑。——第 162 页。

路特希尔德, 詹姆斯 (Rothschild, James 1792—1868) ——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第 133、502 页。

瑙宁 (Naunyn) ——1848 年任柏林市长。——第 42 页。

塔姆瑙 (Tarnau) ——普鲁士法官,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第 461 页。

雷费德 (Rehfeld) ——181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 后来属于右派。——第 51 页。

十四画

维利森, 威廉 (W illisen, Wilhelm 1790—1879) ——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 1848 年任王室驻波兹南专员, 1850 年统率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军队对丹麦作战。——第 110、383、384 页。

维干德, 奥托 (W igand, Otto 1795—1870) ——德国的出版家和书商; 在莱比锡开有书店, 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著作。——第 403 页。

维尔特, 格奥尔格 (W irth, Georg 1822—1856) ——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13、589 页。

维登曼, 克利斯提安 (W iedenmann, Christian) ——普鲁士官吏,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第 265 页。

维登布鲁赫, 路易 (W ildenbruch, Louis 1803—1874) ——普鲁士外交官, 驻贝鲁特的总领事, 1848 年任驻哥本哈根公使。——第 207、361、345、467 页。

维特根施坦, 亨利希 (W ittgenstein, Heinrich 1800—1868) ——普鲁士官吏, 1848 年任区督察员 (5 月—9 月) 和科伦市民自卫团司令。——第 536、592、596 页。

福格特, 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 ——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 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 1849 年逃离德国;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小册子 (1860) 中揭露他是路易·波拿巴的走狗。——第 261 页。

福克斯, 查理·詹姆斯 (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第 107 页。

福斯特曼 (Forstmann) —— 德国商人,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 213、247、249 页。

歌德, 约翰·沃尔弗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 —— 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 121、521、570 页。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 —— 法国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1848 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第 355—358 页。

察哈里埃 (Zachariae) —— 普鲁士法官,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第 85、89、186、195、296 页。

十五画

德尔·卡烈托, 弗兰切斯科·萨韦里奥 (Del Carretto, Francesco Saverio 约 1777—1861) —— 意大利反动的政治活动家, 那不勒斯王国的警务大臣 (1831—1848 年 1 月)。——第 21 页。

德洛姆, 让·路易 (Delolme, Jean Louis 1741—1806) —— 瑞士国家活动家, 法学家,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辩护士。——第 474 页。

德朗克, 恩斯特 (Dranke, Ernst 1822—1891) —— 德国政论家, 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后来放弃了政治活动。——第 13、581、586、591、

595、601 页。

德斯特尔,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 (D'Estl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1—1859) —— 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 1848 年 10 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 后来流亡瑞士。——第 89、186—187、197—199、239、496 页。

德勒克吕兹, 路易·沙尔 (Delescluze, Louis Charles 1809—1871) —— 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 1848 年是杜尔省的政府委员; 1871 年是巴黎公社的卓越活动家, 倾向于布朗基-雅各宾多数派; 在街垒战中阵亡。——第 447 页。

赖蒙德, 斐迪南 (Raimund 1790—1836) —— 奥地利的演员和剧作家。——第 112、113 页。

赖德律-罗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 —— 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 “改良报”编辑, 1848 年是临时政府委员。——第 135、334、447、483、555 页。

赖辛巴赫, 爱德华 (Reichenbach, Eduard 1812—1869) —— 伯爵, 卓越的西里西亚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 1848 年 10 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 后来成为进步主义者。——第 83、104、199、243、322 页。

赖希黑尔姆 (Reichhelm) —— 德国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科伦公安委员会委员。——第 596 页。

赖辛施佩格第一, 奥古斯特 (Reichensperger I, August 1808—1895)——德国法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 87 页。

赖辛施佩格第二, 彼得·弗兰茨 (Reichensperger II, Peter Franz 1810—1892)——德国法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 奥古斯特·赖辛施佩格之弟。——第 97、186、214、229、264—266、339、461、479 页。

摩里茨 (Moritz)——普鲁士法官,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第 57、199、321、364、365 页。

摩地那公爵 (duca di Modena)——见弗兰契斯科第五。

鲁日蒙·德·罗旺贝 (Rougemont de Lowenberg)——法国银行家。——第 133 页。

十六画

鲍威尔 (Bauer, 约卒于 1850 年)——克罗托申 (在波兹南) 的普鲁士官吏,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第 215 页。

鲍威尔, 亨利希 (Bauer, Heinrich)——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职业是鞋匠; 1851年流亡澳洲。——第 5 页。

鲍尔班特, 约翰·约瑟夫 (Bauerband, Johann Joseph 1800—1878)——德国法学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 229、339 页。

鲍姆施塔克, 爱德华 (Baumstark, Edou-

ard 1807—1889)——德国教授;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 216、243、270、301—306、339、340、370 页。

霍弗尔 (Hofer)——德国农民,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第 83 页。

霍尔堡, 路德维希 (Holberg, Ludwig 1684—1754)——丹麦的最大作家,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第 379、464 页。

霍亨索伦王朝 (Hohenzollern)——勃兰登堡选帝侯 (1415—1701)、普鲁士国王 (1701—1918) 和德国皇帝 (1871—1918) 的王朝。——第 65 页。

默尔, 罗伯特 (Mohl, Robert 1799—1875)——德国法学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 帝国司法大臣 (1848—1849)。——第 507 页。

泽巴尔特 (Sebaldt)——普鲁士官吏, 1848年是特利尔的县长和市长。——第 97、98 页。

十七画

谢奇, 海尔敏娜 (Chézy, Helmine 1783—1856)——德国浪漫派的女作家。——第 555 页。

戴韦南特, 查理 (Davenant, Charles 1656/1714)——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重商主义者。——第 511 页。

十八画

萨维尼, 弗里德里希·卡尔 (Savigny, Friedrich Karl 1779—1861)——德国法学家, 反动的法的历史学派的首领, 1842—1848年间任修订法律大臣。——第 350 页。

萨让斯基, 杨 (Sobieski, John 1624—1696) —— 波兰国王 (1674—1696), 1683 年统率波兰和德国奥地利联军在维也纳打败了土耳其军队。——第 214 页。

魏克塞尔 (Weichsel) —— 普鲁士法官, 1848 年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第 185 页。

二十画

赛, 巴特米·泰奥多尔 (Theux, Barthelémy Theodor 1794—1874) —— 伯爵, 比利时国家活动家, 天主教派的首领, 曾任首相 (1846—1847)。——第 519 页。

期刊索引

一 画

- “1841年人民报”(Le Populaire de 1841)
——巴黎出版。——第334页。
“1845年博爱月刊。共产主义刊物”(La
Fraternité de 1845 Organe du commu-
nisme)——巴黎出版。——第334页。

二 画

- “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Le Représen-
tant du Peuple Journal quotidien des
travailleurs)——巴黎出版。——第356
页。
“人民之友。教育人民的文娱性杂志”(Der
Volksfreund Zeitschrift für Aufklärung
und Erheiterung des Volkes)——维也
纳出版。——第588页。
“人民的蜂房”(La Ruche Populaire)——
巴黎出版。——第334页。
“人民制宪报”(Le Peuple Constituant)
——巴黎出版。——第165页。

三 画

- “工人报”(Arbeiter Zeitung)——见“科伦
工人联合会会刊”。

四 画

- “世纪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
第204页。
“比利时观察家”(L'Observateur Belge)

- 布鲁塞尔出版。——第204、370、
501页。
“比利时通报。官方报纸”(Le Moniteur
belge Journal officiel)——布鲁塞尔出
版。——第367、519页。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
——布鲁塞尔出版。——第147、163、
166、370、501、514页。

五 画

-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伦
敦出版。——第136、160、334、513页。
“北方蜜蜂”(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彼得堡
出版。——第207页。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第
536、589页。
“可理解的世界。科学问题论丛”(Die be-
griffene Welt. Blätter für wissens-
chaftliche Unterhaltung)——莱比锡出
版。——第403页。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
——巴黎出版。——第163、166、204、
501、514页。
“市民、农民和士兵的新科伦报”(Neue
Kölnische Zeitung für Bürger, Bauern
und Soldaten)——第492页。

六 画

- “米兰报”(Gazzetta di Milano)——第524
页。

“协和报”(La Concordia)——都灵出版。——第 299、300 页。

“安特卫普报”(Le Journal d'Anvers)——第 450 页。

“列日自由主义者”(Le Libéral Liégeois)——第 450 页。

“自由、博爱、劳动”(Freiheit, Brüderlichkeit Arbeit)——科伦出版。——第 604、605 页。

“同盟月刊。工人自己编辑和发行的通报”(L'Union Bulletin des Ouvriers réunis et publié par eux-mêmes)——巴黎出版。——第 334 页。

“共和主义观察家”(Le Spectateur publicain)——巴黎出版。——第 445 页。

七 画

“改革报”(La Réforme)——巴黎出版。——第 153、334、513、531—534 页。

“杜塞尔多夫日报”(Düsseldorfer Zeitung)——第 589 页。

八 画

“国家报”(Staats-Zeitung)——见“普鲁士国家通报”。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第 153、163、165、180、515、516 页。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国家通报”。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第 236 页。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第 342、506、507 页。

九 画

“柏林阅报室”(Berliner Zeitung-Halle)

——第 5、127、442、444、479、480、490 页。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第 479 页。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第 479 页。

“科伦女人”(Kölnerin)——即“科伦日报”。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 121、142、158、160、161、163—166、184、204、332—336、353、354、358、367、370、438—441、474、479、496、498、514、521、523、535、536、593、596、600 页。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Zeitung des Arbeiter-Vereines zu Köln)——第 492、603 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奥格斯堡出版。——第 163、498 页。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 162—165、239、506 页。

“政治家”(Le Politique)——布鲁塞尔出版。——第 204 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出版。——第 163、180、496、567 页。

“施木纳报”(Spencer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

“宪法报。人民宪法生活和教育问题日报”(Die Constitution. Tagblatt für Constitutionelles Volksleben und Belehrung)——维也纳出版。——第 588 页。

十 画

“祖国报”(Fædrelandet)——哥本哈根出

版。——第 286、287、290、291 页。

“曼海姆晚报”(Mannheimer Abendzeitung)——第 5、576 页。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 160 页。

“阅报室”(Zeitungs-Halle)——见“柏林阅报室”。“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出版。——第 160、239 页。

“伦敦电讯”(The London Telegraph)——第 158—160、162 页。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第 5 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第 596 页。

十一画

“晨报”(Morgenbladet)——克利斯提阿纳出版。——第 465 页。

“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伦敦出版。——第 207 页。

“盖尔温努斯报”(Gervinus-Zeitung)——见“德意志报”。

十二画

“莱茵守卫者”(Der Wächter am Rhein)——科伦出版。——第 492、583 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科伦出版。——第 230、536 页。

“湖滨小报”(Seebblätter)——君士坦士出版。——第 576 页。

“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柏林出版。——第 28、239、350、536 页。

十三画

“新闻报”(La Presse)——巴黎出版。——第 204 页。

“新柏林报”(Neue Berliner Zeitung)——第 118、119 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出版。——第 8、13、18、20、24、27、31、35、37、40、41、43、48、53、59、61、63、65、70、71、89、91、93、96、99、105、109、111、113、115、117、119、122、125、126、128—130、134—136、141、146、152、157、166、169、176、179—181、185、188、189、193、201、202、204、211、212、217、219、229、230、234、235、238、246、250、257、266、269、273、285、288、292、298—300、306、317、322、324、331、337、341、349、352、354、359、366、370、421、424、429、431—433、437、441、444、446、450、451、453、454、459、462、468、478、481、484、489、491—495、499、500、505、508、509、512—514、517、518、520—526、530、534—536、539、543、578—581、585—590、594、596—599、601、602 页。

“新时代。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评论”(Die Neue Zeit Revue des geistigen und öffentlichen Lebens)——斯图加特出版。——第 571 页。

“解放”(L'Emancipation)——布鲁塞尔出版。——第 204 页。

“奥格斯堡总汇报”(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见“总汇报”。

十四画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见“柏

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十五画

- “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
1847—1848年在海得尔堡出版;1848—
1850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第67、120、121、498页。
- “德意志总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莱比锡出版。——第5、
236页。
- “德意志人民报”(Deutsche Volkszeitung)
——曼海姆出版。——第525、576页。
-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
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莱比锡出版。——第430页。
-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第430页。

- “黎明报。政治和文学性报纸”(L'Alba .
Giornale politico-letterario)——佛罗伦
萨出版。——第8、9、179、299页。

十六画

- “激进报。在国内外发行的德国报纸”
(Der Radikale Deutsche Zeitung für In-
und Ausland)——维也纳出版。——第
587页。

二十一画

- “辩论日报”(Débats)——即“政治和文学
辩论日报”。

译 后 记

本书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翻译的,有些文章在译校时参考了德文原文。“6月23日事件的详情”、“6月23日”、“6月24日”、“6月25日”、“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几篇文章,在译校过程中还参考了曹汀同志的中文译文(见“恩格斯军事论文集”第一分册,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朱中龙、徐云程、汤钰卿、苏锦元、冯如馥、江显藩等同志。译文最后是由易惠群、张文焕、樊以楠三同志校订的。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